历史的见证

（1929—1969年）

〔美〕查尔斯·波伦著





历史的见证

（1929—1969年）

〔美〕查尔斯·波伦著

刘裘　金胡译



商务印书馆

1975年·北京

Charles E. 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 1929—1969

W. W. Norton and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3

内部发行

历史的见证

(1929—1969年)

〔美〕查尔斯·波伦著

刘 裘　金 胡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21^{3}/_{8}$印张　441千字

1975年12月初版　197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17·180　定价：1.65元

出 版 说 明

本书是美国当代职业外交官、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1904年—)的回忆录。波伦自1929年进入美国外交界起，就以致力研究苏联问题和处理美苏关系为专业。他先后任美国驻外使馆的多种职务及美国驻苏联、菲律宾和法国大使，并充当了几任国务卿的苏联事务特别助理和负责政治事务的代理副国务卿。在1969年腊斯克辞职和罗杰斯接任的空挡中，波伦还当了两天代理国务卿。不久，他就挂冠离职。

这本回忆录于1973年在纽约出版，全书是围绕美苏关系问题展开的。波伦据其亲身经历概述了1934—1969年整整三十五年来美苏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史料比较丰富。作者由于自己的职业地位，有较多机会跟随美国政府首脑出席各种重要国际会议，甚至参与了某些重大的决策，如：罗斯福在德黑兰和雅尔塔同斯大林和丘吉尔举行会谈时，波伦是罗斯福的顾问和翻译；在波茨坦会议上，他是杜鲁门的翻译；在肯尼迪执政时期，波伦当过他的顾问和翻译；在约翰逊掌权期间，波伦经常向他献计呈策。无论战时或战后，凡属美苏关系问题，他总是备受谘询或主动献策，这就使这本回忆录或多或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决策人物和机构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想法和企图。同时，作者在叙述中还就苏联方面对一

系列重大事件的动机和意图作了自己的探索和分析。书的最后部分对美苏关系的前景提供了某些展望。这对于我们了解一些重大国际事件，了解苏美关系及其发展，了解苏美政府处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和手段，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波伦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豢养的维护资本帝国主义制度的谋臣策士，他的立场和观点是十分反动的，从而，他对许多问题的观察和分析也是错误的。他除了竭力维护美帝的扩张政策和霸权主义外，还处处表示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仇视，如：胡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符合俄国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多次攻击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及其政策，个别涉及我国的地方也进行了类似的攻击和诬蔑，等等。请读者注意分析和批判。

本书内部发行，仅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

1975年4月

目　　录

第三部分　在国务卿手下工作

第四部分　出任大使

第五部分　最后的年代

原编者附言

这本书的写作方法与众不同。奇普·波伦不会打字，他在圣保罗中学和哈佛大学读书时练出来的一手书法很不容易辨认。因此他象有些作者那样，使用磁带录音机。他就其毕生事业紧紧按照年代顺序口授了大约六、七十万字。接着开始为期十一个月的整理工作：我提问题——查对、探索，以至追问，目的在于澄清思想，更正错误，补充材料。他的答复仍由磁带录音，然后誊写出来，插入原稿，经过重新编辑，压缩为四十万字左右。在随后一年半时间里，这样的过程又进行了两次，我提问，他对着录音机答复，我再删改稿子。最后的作品，即大约二十二万字的这本书，确实是奇普的；他作了研究，亲自撰写，并且核对了事实。我作为稿件的组织者和整理者，对于他对尖刻的盘问和大刀阔斧的剪裁所表现出来的毫不气馁的态度和高度耐心，只能表示非常钦佩。

罗伯特·H·费尔普斯

前　言

这本书是从事美国外交工作将近四十年的个人经验和观察的搜集，是一个非常幸运地目睹和参与1929—1969年美苏关系中每一重大事件的外交官的回忆录。

虽然这本书的每一节都和那些重要年代的大事密切关联，但它既不是、也无意于作为一本美苏关系史。命运倒曾赋予我以不寻常的观察者的地位，当一些伟大的领导人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决策时，我在他们的身旁，但任何见证都有局限性。不同的眼力所看见的景象不同，不同的听觉所听闻的音响不同，不同的思想所感受的情势也各异。因此，我自认此书的确不能看做是一部不偏不倚的历史。

这本书也不是对美国和苏联政策的功过的分析，尽管我在指出我自己和别人的错误时从未有过犹豫。我的回忆录不是想要为美国政策辩护，或者对修改历史的历史学家进行攻击。我只是力图叙述、阐明和解释我经历过的事情。

我力求表述我曾为之效劳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其他高级官员在其任职期间给我的印象。在评价人物时，我总想尽量避免事后高明之嫌。所以，我对这个时期美国领导人的评价不应被理解为无可争辩的。它们只是一个有幸和他们亲密地共过事的人所表示的个人意见罢了。

因为必须处理的材料是这样浩瀚，挑选起来势必要下点

狠心。个人所经历的那些材料，只有和美苏关系的主题紧密相关的，才被采用。在菲律宾和法国大使任内的材料，虽从年份来说应该多写一些，但在本书中只给予较小篇幅。对于我的同事们也不可能一一提及。对于我在莫斯科、马尼拉和巴黎三地大使馆任大使时的全体外交、办事人员，以及我在国务院任职期间的助手们的美德和忠诚，我谨在此表示敬意。

我也要向阅读过初期手稿并给予许多有益的批评指导的三个人表示深深的谢意。他们是乔治·F·凯南和已故的卢埃林·E·汤普森，他们两人都出任过驻苏大使，在外交界负有盛名。另一位是达特默思大学的历史学家拉里·史密斯，现任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托马斯·J·麦金太尔的行政助理。

我还要向W·W·诺顿公司副总经理埃文·托马斯致谢，是他鼓励我著作此书，并帮助我解决了写作中的许多困难。

最后，我感到难于用言辞表达对《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新闻编辑罗伯特·H·费尔普斯的深切谢忱，没有他的无比珍贵和一贯的协助，要完成这本著作是决不可能的。

查尔斯·E·波伦



第 一 部 分

见 习 时 期

3

第一章　马合烟的气味

茫茫暮色笼罩着俄罗斯平原。这时，从华沙开往莫斯科的列车驶进了苏联边境的涅戈列洛叶村，我们跳到站台上。这是我踏上苏联领土的第一步，标志着我在俄国经历的开始。这番经历时断时续，长达三十四年以上。谁都不可能预见未来，即使懂得西伯利亚魔术的黄教僧侣也无法未卜先知。在那晴朗的、白雪皑皑的1934年3月7日这一天，我由于到达苏联而内心过于激动，以致除了几天内即将在苏联创建的第一个美国大使馆外，我当时不可能预想得更多。然而，展现在前头的将是二十世纪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特写镜头：斯大林的大清洗；纳粹-苏联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最高级会议；马歇尔计划；冷战；封锁柏林；击落U-2间谍飞机；古巴导弹危机。苏联成了我外交生涯的主要因素。

我做过这样的计划：选择苏联作为我研究的专业；从1929年进入外交部门开始，用五年时间为从事处理美苏关系的前程作好准备。我只是在决定充当一名外交官以后才选择这个专业的，但已想不起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决心干这一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孤立主义在美国盛行，外交肯定不是一种讨人喜欢的职业。在那经济繁荣时期，我在哈佛大学（1927年我以文学士学位毕业于该校）的大多数朋友为发财致富的

欲望所驱使，都打算投身股票市场、银行业或法律界。这样的前途于我并无魅力，我对商业不感兴趣，也不喜欢上述任何一类职业。

4 无论如何，我和大多数同辈相比，多少得到较多的世界知识教养，可能是这个背景使我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外交界。1904年8月30日，我诞生于纽约州克莱顿——千岛[①]之一——我家的避暑别墅中，在三个孩子中排行第二。我父亲查尔斯是继承了少量财产的有闲阶级，我母亲塞莱斯丁·尤斯蒂斯在新奥尔良出生以后就是亲法的。他们喜欢到欧洲旅行，而且经常携带我们兄妹三人同往。我八岁的时候，第一次到欧洲旅行。1912—1913年的冬天，我们是在瑞士的韦维度过的。在那里，我们就学于罗贝先生，练习法语；乘雪橇在小雪山滑雪；还让瑞士的巧克力给喂胖了。

在以后几年，我到过西欧大部分国家。我母亲对于我的影响大大超过我父亲，每次旅行她总要把法国列入路程之内。她对法国的热爱渊源于她是法国人的后裔，以及在巴黎的美国大使馆住过四年。她父亲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1893年由克利夫兰总统任命为第一任驻法大使。在此之前，我国所有外交代表的级别没有超过公使级的。在他大使任期内，我母亲充当了大使馆的女主人，因为我的外祖母已经去世了。正如我们这些孩子所熟知的，我母亲对于法国的迷恋几乎达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二十年代初，有一次在从瑟堡开往巴黎的火车上，她指着牧场上一群乳牛令人生气地说，“你们必须承认，它们比美国的乳牛可爱。”

① 圣劳伦斯河中一群小岛。——译者

这样，我在早年就有奔赴国外的意愿。但是，甚至在大学期间，这样的意愿还没有使我做出要当外交家的最后决定，在毕业的时候，我仍然对于应该选择哪项职业犹豫不决，因此，当偶然有机会到一艘将作六个月环球航行的不定期货轮上充当见习水手的工作时，我立刻很高兴地答应了下来。远航归来，我依然犹豫不决。在回国后的几个月里，我同亲属和朋友断断续续地研究了可能选择的各种职业。有人建议我进外交部门，并且提到我住在华盛顿的表姐威廉·C·尤斯蒂斯夫人同国务院的人相识。尤斯蒂斯夫人安排我去拜访负责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R·卡斯尔。正是1928年夏末的这次谈话，终于使我下定决心要当一名外交官。

5 风度潇洒和文质彬彬的卡斯尔先生直率而颇有见解地对我讲述有关外交部门的问题。他指出，由于1924年通过了关于外交职务的罗杰斯法案，国务院终于能够为一个对外交事务真正感到兴趣的年轻人提供体面的前途。我特别关心的是报酬。我错误地认为——甚至在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认为——没有薪俸以外的个人收入，谁也不可能在外交事业上获得成就。卡斯尔解释说，1924年法案规定的薪俸和津贴虽然不算太多，但足够维持象样的生活。他还说，有各种迹象表明，情况将不断地改善。他消除了我的顾虑，我决定争取到外交部门去。

同现在一样，当时必须通过一次包括笔试和口试的考试。考试前，我觉得最好是先到乔治城的一所私人学校去听课。这所学校是来自弗吉尼亚的可尊敬的克劳福德先生举办的。这位先生爱好威士忌酒，拥护民主党。他颇为博学，在为期两

月的授课期间，他通常是坚决戒酒的。可是，在1928年总统选举中，共和党人赫伯特·胡佛在弗吉尼亚获胜，克劳福德在选举的第二天喝得醉醺醺地来到教室，发表了一通关于"弗吉尼亚州的奇耻大辱"的情绪激昂的讲演，然后有一个星期不再露面。

由于克劳福德的指导帮助，我毫不费力地通过了笔试。那时候笔试比现在容易得多。我必须回答的试题只要求具有简单的事实知识，例如在列举的各个重要军事战役后面填上日期。此后不久，由普林斯顿大学约瑟夫·格林教授改革了这种考试方法，其目的不再是测验应考人是否记忆史实，而在于考查他的推理和写作能力，要求写出论文式的答案。

笔试几个星期后举行的口试也不困难。但在一个关于美国农业人口百分比的问题上，我却答错了。口试由国务院、文官委员会和商业部的代表组成的评议小组提问。对我来说，预料要身临这样的场面是令人神经紧张的。赴考前，我在自己的屋子里喝了从走私商那里买来的杜松子酒，借以壮胆。显然，评议小组有人闻到我回答问题时的酒味，因此在研究我的申请书时极力主张外交部门不应录用违反国家禁酒法令的人。[6]幸而卡斯尔是小组成员之一，他说服其他成员让我通过。

圆满完成考试以后，我于1929年3月26日为外交部门录用。我的初步训练是外交学院为期四个月的学习。象国务院的其他部门一样，学院设在紧挨白宫的一座外貌异常难看而内部相当舒适的建筑物里。它现在通称为行政办公大楼，是白宫的附属建筑物。外交学院的教程主要是实用主义的，例如学习处理护照申请书、签证货单的手续等。关于一般外

交政策，很少加以讨论。我国当时盛行的孤立主义哲学反映在关于一个外交官应如何汇报外国政治事件的课堂教学中。他应当客观而简明地提出报告，决不偏袒任何一方。

外交学院的学习结束后，我实习期的第二步是要求掌握外交手腕的某些基本技能。国务院认为，在富有经验的官员监督下进行学习，是最好的方法。我被指派到欧洲事务司司长J·西奥多·马里纳手下工作几个月。颀长、谦恭和具有巨大耐心的马里纳教我答复美国公民来信的初步知识。他经常的训诫是使有争议的问题平息下去。当时顽固的新教徒纷纷来信，因为他们担心美国将会向罗马教皇派遣外交使团。在马里纳的指导下，我起草的回信都是不痛不痒的，向那些关于罗马教皇的事提出警告的人保证，说国务院将考虑他们的意见。

马里纳是充塞于国务院各个要害部分的保守派外交官的典型。他们专心致力于孤立主义，打算为自己的国家做点好事。(1937年，马里纳被一个要求护照签证未遂的人杀害于贝鲁特，当时他在那里任总领事。)但是，这些守旧的人认为美国并未肩负什么重大责任。他们认为天下太平，美国只要不管别国的闲事，就绝无受人攻击之虞。两个主要的世界强国——英国和法国——被认为是友好的，即使美国有反对殖民主义的传统。这是因为它们同样持有西方基督教对社会的基本民主观点。其他的大国——德国、意大利、苏联、日本和中国——当时也没有表现明显的威胁姿态。美国无需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

结果，国务院任务轻松，需要为之操心的危急局面并不

多见。事实上，与国会的唯一接触只是审核一年一度的预算。1929 年预算总共仅一千四百万美元，其中半数以护照、签证手续费和其他业务的公费收入形式重新归还国库。定期公开听证、秘密汇报以及经常交换意见是当前国务院和国会关系中的正常部分，这在 1929 年是闻所未闻的。

作为一个单身汉住在到处都有单身姑娘的城市里，我度过的那些日子是令人陶醉的。就我记忆所及，无论是我或者其他任何年轻外交官员对于美国政府奉行的鸵鸟政策都没有什么异议。我决没有料想到，过不了几年美国将被卷入世界的各个地区，而外交官的安宁生活竟成了二十年代的陈迹。

我最初的怀疑不在于国务院是否与世界有关联，而在于它是否由怪人和不称职的人所组成，象有些美国人当时和现在仍然认为的那样。那年夏天，我所认识但并不很熟的一个外交官员在华盛顿市内电车上因猥亵地脱掉衣服遭到逮捕。接着，一个驻澳大利亚的总领事在悉尼港内因侮弄两名儿童被人从船上扔下水去。最后，一个驻布拉格的总领事因患精神分裂症而蛰居旅馆，靠啤酒和生牛肉过日子。当他听说领事正要来禁锢他时，他就跳上一辆出租汽车向卡尔斯巴德驶去，沿途乱扔大块大块的牛肉，大概是想分散追赶他的人的注意力。

我不久就知道，那些不过是孤立事件，决不是外交部门所特有的。国务院人员很少（1929 年在华盛顿国务院工作的人员仅为六百十四人，而 1972 年为六千三百九十六人），我很快就了解、喜欢和尊敬他们的大多数，虽然我甚至从未见过领导我工作的最初两位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和亨利·L·

斯汀生。外交部门因规模不大而产生的亲密关系大大有助于人事问题的处理。提级或考勤委员会以及人事官员，开始了解幷能以更多时间考虑每个官员的个人品质和问题。这也许是留恋过去，然而在我看来，一个较小的、更为紧凑和亲密团结的外交部门比起现在执行政府外交政策的乱糟糟一大帮人要好得多。[8]

我的外交训练第三步是决定象外交部门大多数的官员那样做一个一般的外交家，还是要专业化。我决定要专业化。

那个时期在外交部门的困难之一是一个官员往往在一个国家消磨两年、三年甚至四年的时间，然后在确实沒有很多机会认眞了解这个国家的风俗、制度和历史的情况下被调任到另一个国家。象水虱一样从一个国家匆匆地蹦到另一个国家，造成了我们职业外交官员一定程度的一知半解。为了增进对于某些国家或地区的了解，曾经制定了地区专业化的方案。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我决定专门研究苏联。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断之一，但我自己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要挑选苏联。在哈佛大学，我一般的研究范围是现代欧洲史，课程中当然也包括苏联在內。我猜想我对苏联事务发生兴趣，大概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问题，我幷未作过专门研究，也未看过多少书本，我想不起我曾对布尔什维克试图做的事情抱有什么浓厚的兴趣。我和普通美国人一样，对于苏联正在发生的变化是愚昧无知的。因此，我也沒有象我的某些同辈那样参加过任何亲苏组织，这些人后来都为此深表遗憾。

不过，我确实看到苏联的重要性日益增长，感到美国会需

要一些善于同这个共产党国家打交道的专家。另一位刚刚从事外交工作的官员爱德华·佩奇(以后出任驻保加利亚公使)也决定专门研究俄国问题。我们是根据专业化方案选择以苏联为研究对象而编入第三组的两个人。

我在开始专门研究以前，被派往布拉格去接受为期两年的一般外交工作的在职训练。我想，这次初步任命的另一目的，是要在对我进行专业训练以前考验我是否适宜于充任外交官。

我在布拉格执行了一个新任副领事的日常例行公事。为了取得经验，我轮流在领事馆的不同部门做各种工作——签证、货单、护照、商业报告，最后是政治报告。一般地说，这些工作都是例行公事。

[9] 那时，申请移入美国的人很多，这类签证是大量的。我们经常必须用心做的一件事就是查出并销毁在欧洲许多国家的首都出售的伪造签证。有时候，这些国家的地方官员往往伪造出生证和虚构事实以便使申请人得到合法签证。一天，一个捷克人和他的妻子带了几个孩子来领事馆。孩子们表面上看来都未成年，但其中一个“男孩”颇为高大，却穿着短裤，在走廊上玩着皮球。我们觉得可疑，请医生加以检查，结果证明这个“男孩”实际上是个成年男子。他没有得到签证。

我任职期中最有趣的一次经历是和领事馆的一位同事到当时称为波德卡尔帕斯卡-鲁斯的鲁特尼亚去。我在向国务院的首次报告中说，我发现主要是匈牙利人和乌克兰人地区的捷克政府比较公正。

1929、1930和1931年在布拉格的生活是愉快的。冬天，

我到捷克斯洛伐克北部的施平德尔米勒去滑雪。夏天，我去斯洛伐克的塔特拉山和整个波希米亚地区游览。那时来自德国的威胁尚未出现。事实上，除了匈牙利人的世仇宿怨和罗马尼亚人稍怀敌意以外，捷克共和国同它的邻国没有什么纠纷。

1931年9月，我被调往巴黎的国立现代东方语学校学习。因为我国大部分外交官懂得法语，他们多半被送到巴黎去学习各种语文。虽然我学的是俄语，巴黎对我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为得到母亲的传授，我已经能讲流畅的法语。

巴黎的生活有无可比拟的乐趣。因为世界经济萧条，物价下跌，我们靠着国务院二千五百美元的年薪，日子可以过得非常讲究。佩奇是和我同时开始学习外语的，我们在利勒路租了一套舒适的房间。我们在高级餐厅吃饭，享受巴黎为年轻单身汉提供的一切娱乐。1933年春，美元贬值，我们的这种豪华生活骤告中断。贬值意味着我们薪俸的购买力一夜之间下降百分之四十。佩奇和我不得不放弃我们那套奢侈的房间(只是经过几个月的争吵之后，我们才能解除租约而免于诉讼)，迁入较为廉价的公寓。我们被迫绝足于高级餐厅，而就餐于四、五流饭馆。直到那时，我才弄清楚法国的一套办法：甲级餐厅供应当天从市场买来的食品，没有消耗掉的则卖给乙级餐厅；乙级餐厅供应的是来自市场已经两天的食品，然后又将剩余的卖给低一级的餐厅。食品就这样逐日逐级渐次传递，离它刚从市场买来的日子也就越来越远，一直传到更低级的餐厅。

10 我在巴黎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学习俄国的语言、历史、风俗

习惯、地理和经济，特别是关于苏维埃时期的。那时苏维埃建立还不到十四年。学习任务很繁重，但我感到津津有味。课堂讲授主要使用俄语。法国教授讲几堂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历史的课，但我们研究这类题目的大部分内容来自书本，几乎全是反共的书籍，这些书籍是指定在自学时间阅读的。自然，我开始搜集有关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消息。许多报道来自拉脱维亚的里加，该地当时被用作对苏联的监听站，正如几十年以后香港被用作对共产党中国的监听站一样。

校长保罗·博耶是我们的俄语教师，讲课很有才华，并富于讽刺的机智。他具有高卢人的气质，对许多俄国辞句作了稍带粗鄙的曲解。例如他说，俄语"结婚"一词——使结合"于"某人——表示"肉体结合的意思"。

俄语是很复杂的，但如果你能象我那样花大量的时间进去，学会它也并不太难。由于有六个格和两种形式的动词，语法乍看起来十分复杂；然而，在博耶教授的指点下，表面上的矛盾自然而然就解决了，而且从整体来看，它变成很合乎逻辑的语言。俄语也是一种优美的语言，由于它有许多元音，用来作曲和写诗都非常动听。在学习俄语方面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特殊的困难，我至今仍从阅读俄文书籍和用俄语谈话中获得乐趣。

当然，对于任何语言来说，为了丰富词汇和谈吐流畅，实践是重要的。夏季，我被派往当时还是独立的爱沙尼亚，住在俄国人的公寓里，在那里，我埋头研究俄国人的语言和感情。公寓座落在纳尔瓦-乔苏，那里是以前俄国的休养地，有顶呱呱的海滩，距塔林约四小时路程。它曾经是圣彼得堡首屈一

指的避暑胜地，名叫亨格堡。谢列勃里雅科娃姐妹的公寓的生活无疑是遵循着沙俄时代有闲阶级的古老方式进行的。上午是语言课。午饭开得很晚，要到四点钟左右。然后睡午觉，接着是散步，往往到树林里去采蘑菇。吃过已经是很迟的晚饭，戶外桌上就摆出茶炊来。这时我们开始聊天，一连两三个小时，就象契诃夫小说里的人物，讨论哲学和道德，吟诵诗词，谈论政治，以及啜茗品茶等等。

11 谢列勃里雅科娃姐妹来自列宁格勒，她们在提到它时始终用圣彼得堡这个战前的地名。她们强烈地反对布尔什维克，一天到晚希望有朝一日梦魇将会消失，她们可以回到完整地保存着沙皇和贵族的旧俄国。她们姐妹中的一位受过良好教育，曾任专为俄国贵族小姐开设的斯摩尔尼学院的教师，这个学院十月革命前就被布尔什维克占用为司令部。是她启发了我对俄罗斯文学——托尔斯泰、陀思妥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人的古典文学——的兴趣。

海滩是纳尔瓦-乔苏生活中一个迷人的特色。人们在海滩上用线把海滩划分为两部分，妇女在左边裸体洗澡，男子穿着衣服在右边洗澡。我在海滩消磨过很多时间，但从未能忘却由于一群爱沙亚尼裸体美女向我打招呼而引起的新奇感觉。爱沙尼亚人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血统的一个异常俊秀的民族——与俄罗斯人相比较，他们修长、金发碧眼、身材匀称。

一次，一位从美国来的朋友到我住处逗留了一周左右，我们决定到苏联国境线上去走一趟。沿着一条满是尘土的道路，我们走到爱沙尼亚的国境哨所，站在那里，眺望俄国。这是我首次瞥见这个国家的土地，我们看得见苏联哨兵和一座

岗楼，但没有靠近到足以与任何一个俄国人谈话的距离。

夏天过后，我前往塔林，和一位战前在俄国经营木材的巨商的家庭同住了大约一个月，当时他继续在塔林经营他的买卖。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俄国人家庭，他们充满了革命前俄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好奇心，固执地抱着深奥的、不切实际的哲学概念。

我在爱沙尼亚度过两个夏季，生活是愉快的，而更重要的是，它使我的俄语能够讲得比较流利，因为，从我 6 月底踏上爱沙尼亚土地到 9 月中旬离去这一期间，我几乎没有讲过一句英语。

两年半的学习生活非常快活，以致我只是隐隐约约地了解到在欧洲和美国发生的根本变化。可是，我身受的两次经历却使我睁开眼睛看到不久我将作为外交官与之周旋的那种世界。1934 年 2 月 7 日，我目睹发生于巴黎的阶级冲突。右翼在协和广场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一辆公共汽车被推翻在地上并点着了火，乌烟滚滚笼罩了这个地区，透过浓烟闪耀着的街灯和探照灯的光芒时断时续地照亮了行进中的人群。示威群众秩序较好，直至机动防卫军开枪阻止他们通过前往议会的桥梁时，情况才变得险恶起来。他们开始向警察扔石块，用绑在木棍上的剃刀割断共和国防卫军马匹的腿筋。骚乱一直持续到当天深夜。第二天夜间变为左翼示威，群众在里沃利路一带闹事和抢劫。1934 年 2 月的骚乱导致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合作，即通称为人民阵线的一种联合。俄国人控制的第三国际在 1935 年正式采用了这个策略。 12

第二次经历涉及我在从什切青到塔林的轮船上碰到的一

位年轻德国军官。他的英语刚够及格，而我的德语则尚在初级阶段，然而在下棋时，我们仍能进行一场关于德国的讨论。他活着抱有一个目的，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蒙受的耻辱报仇雪恨。他争辩说，那种解决办法是背信弃义地强加于德国的。显然，他已深受纳粹宣传的影响——那时希特勒正在施展策略想掌握政权——而当我稍稍企图矫正他对这段历史记载的看法的时候，他表示了宽容、嘲笑和怜悯的样子。他说他强烈地期望战死疆场，他这一代的每一个德国青年都抱有同样的决心。他还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德国这次将作充分准备，并有克敌制胜的士气和意志。他谴责布尔什维克破坏了德国社会生活的结构，预料要和苏联打仗。

在美国，对苏联也有了强烈的兴趣，然而是另一种兴趣。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选总统不久，就决定结束两国十六年的疏远——他用“反常”这个字眼来称呼这种疏远——并给予苏联以外交承认。1933 年，我在华盛顿逗留期间，总统和即将就任我国首任驻苏大使的威廉·C·布利特正就承认条件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进行谈判。

显然，我对承认苏联的决定是感到高兴的。我看得很清楚，世界上两个可能是最强大的国家彼此之间互不正式对话的时代早就应该终止，考虑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独裁政权在欧洲的兴起，以及日本在远东的野蛮行动，尤其应该如此。

13 我被布利特大使挑选为新成立的大使馆的成员之一，接着奉命跟同他的大约十五名随行人员于 1934 年 2 月 27 日乘坐火车离开巴黎，我们中途在华沙下车停留了两三天。火车由于一场不太大的暴风雪减慢了速度，从华沙到苏联国境足

足走了二十四小时以上。我们在涅戈列洛叶换车，苏联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副司长到那里迎接我们。涅戈列洛叶火车站上潮湿的气味——湿渍渍的羊皮大衣的味儿、撒在地上吸收潮气的锯木屑的味儿、消毒剂味儿、药皂味儿、人身上的汗酸味儿和通常称之为马合烟的蹩脚俄国烟草的味儿——至今在我看来仍然是苏联的特有的气味。

14

第二章　幻想的破灭

1934年3月8日，当我们的列车渐渐开近莫斯科车站的时候，布利特大使看到月台上的乐队，就戴上帽子，穿上大衣，为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做好准备。但是，他一下火车才发现乐队不是面对他的车室，而是对着三等车厢。乐师们到那里欢迎的不是我们的大使，而是来到莫斯科庆祝红色国际妇女节的一个共产党妇女代表团。前来迎接大使和随行人员的只有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和布利特的老朋友格奥尔格·安德列伊钦两人。这件意外的小事结果变成了布利特使命的象征：殷切的期待和破灭的希望。

面对这样草率的欢迎，布利特丝毫没有表露出他的失望，他在穿白围裙的俄国搬运工人搬运行李的忙乱声中，面露微笑，摆好姿势让摄影记者拍了照。走出阴沉沉的洞穴似的车站，我有生第一次看到了莫斯科。这是一个异常单调、紊乱和忧郁的城市。人行道上到处是一堆堆肮脏的残雪，大多数行人耷拉着脑袋走路。我们登上汽车，驶向座落于城西的大使官邸斯巴索大厦。汽车循着贯穿市中心的路线行驶，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拥挤杂沓的人群，特别是大批紧紧抓攀在当时莫斯科的主要交通工具、深褐色的电车车身上的人们。

到了斯巴索大厦，布利特向工作人员说了几句鼓励的话，随即带领我们将在那里下榻的几个人巡视新居。（由于我是

单身汉，并且能讲俄语，就安排我住在官邸，直至莫哈瓦耶街的公寓兼办公室的大楼落成为止。)矗立在斯巴索列斯科夫斯[15]卡娅广场的花园中的斯巴索大厦原是一幢巨大而又较为精美的商人宅第，灰墁的外墙，房屋前部为圆柱支撑的环形阳台，可能是一幢意大利式的大厦。这座邸宅的主要特色无疑是在于它中间的宽广的大厅，有两层楼高，四周是大理石圆柱，天花板上悬挂着巨大的枝形吊灯。这是款待客人的最为理想的地方。在那些年月里，大厅成了《鲷鱼和贝斯》剧组临时演出的舞台，以及举行艺术展览、跳舞会、礼拜、儿童赛会和美国艺术家开音乐会的场所。

大厅的一边是原来设计为音乐室的宽敞的厢房，我们觉得用作羽毛球场、圣诞节晚会室、舞蹈室、课室和其他多种活动的场所非常合适。二楼的房间都是朝向廻廊的，而廻廊则围绕着那个悬挂着枝形吊灯的房间。大使一家就住在这层楼上。斯巴索最有趣的地方大概算是地下室了。许多小房间，包括一些在莫斯科十分必要的贮藏室，我们在那里贮藏了从西欧采购来的足够三、四个月用的食品和酒类，那是必须把门锁上，郑重保管的。地下室里还有厨房、仆役室、锅炉房和许多神秘的通道。

管理员谢尔盖和他妻子的住房也在那里。谢尔盖是一个瘦弱矮小的俄国人，经常带着一种愉快的表情。他的妻子是使馆女仆之一，相当漂亮，有点高傲。从一开始我们总认为这个斯巴索大厦是不安全的，谢尔盖可能是苏联秘密警察派遣的特务。因此我们不大在那里处理公事。我们还怀疑谢尔盖在他住房里安有间谍装置，但他的房间经常上锁，我们没有钥

匙可开。几年后，当我充任大使，而谢尔盖仍然充当管理员的时候，我坚持要一把钥匙。拖延了几个星期，钥匙终于交出来了，但房间也早已打扫得干干净净。不久，谢尔盖和他的妻子就退职不干了。

在巡视斯巴索大厦的时候，布利特告诉我，他希望这个大使馆能成为美国外交部门的一个模范单位。大使为人极有吸引力。他瘦弱，高矮适中，圆脸秃顶，性格易于兴奋，但善于自制。他那容光焕发的微笑、滔滔不绝的雄辩，连同他的渊博知[16]识，常常赢得即使是对他信疑参半的人们的喜欢。他相信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是可能的，并且在导致美国承认苏联的1933年谈判中起过重要作用。在从巴黎去莫斯科的火车里，我们饶有兴趣地听他叙述他在1919年到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当时它正在对实力雄厚的白卫军进行内战——访问和他与列宁会见的情况。威尔逊总统的亲信副官爱德华·M·豪斯上校也许得到威尔逊的同意，曾在凡尔赛和平会议期间派遣布利特去莫斯科执行一项纯粹是考察性的使命。几乎可以肯定，布利特超出了给他的指示的范围。他和列宁会谈了几次，带回了一个方案，如果这个方案被采纳并付诸实施，世界的历史可能会有所改变。方案要求所有在俄国国土上交战的派别实行停火，承认每支军队在其控制地区的权力，举行所有主要交战者之间的和平会议。考虑到当时白军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这显然不是布尔什维克所喜欢的方案。然而，它又是一个会给他们时间以恢复力量的方案。这是表明布尔什维克的现实主义的很好例证，因为他们当时考虑了俄国各种力量的对比并得出结论，认为在俄国土地上实行暂

时停战是符合长远利益的。布尔什维克提出这个方案，可能还由于这样的想法：方案势必遭到拒绝，从而可以增加他们作为和平的一方而博得的广泛同情。

布利特回到凡尔赛以后，发现会议的气氛已从热心关切急遽转变为露骨的敌视。既然会议上充满着反布尔什维克的情绪，任何与列宁妥协的想法都是值得咒诅的，因此布利特的意见被威尔逊总统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所拒绝。布利特给威尔逊写了一封信，用远见卓识的词句严厉批评了凡尔赛条约，随即愤而辞职。

十五年后，布利特出于务必做到不辱使命的殷切心情，亲自精心挑选了初创的美国大使馆的全部官员，这些官员有的是他的老相识，有的是他所信任的人推荐的。我认为，我们之被选中，是因为他相信我们将根据美国的利益来公正而客观地观察苏联的实际情况。他第一批幕僚中的五个人后来都成为大使这一事实，证明他挑选的人的品质是优秀的。

参赞（当时大使馆第二号人物的通称）约翰·C·威利是经验丰富的多年外交官。他身材高大，由于发音洪亮和谈吐幽默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个对欧洲各国的政策和态度具有广博知识的重视实效的外交家，尽管他初到俄国并且不会讲俄语。威利的稳重，恰好弥补了布利特的感情冲动和好走极端的缺点。他后来出任美国驻葡萄牙、伊朗、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等一系列国家的大使。

17

洛伊·W·亨德森是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他只是懂得一点俄语，但已研究苏联多年，经常发表意见，提醒我们与布尔什维克打交道时务必万分谨慎。他是一位具有高度责任感的

诚实人，帮助年轻馆员(我是其中一个)学习业务，不厌其烦。亨德森是大使馆的主要政治官员。实际上，他又是大使馆的行政官员，因为布利特和威利两人在这方面并不特别擅长。在斯大林大清洗期间，他至少有两年担任代办，从莫斯科发出一些非常出色的函电。后来，亨德森先后充任驻伊拉克、伊朗和印度的大使。

在其余的外交官中，我们有三个人是会讲俄语的——乔治·凯南、贝特尔·T·坎尼霍尔姆和我，都是三等秘书。在当时国务院会讲俄语的外交官中，我们三人就占了半数。胸怀大志的坎尼霍尔姆报道经济问题。凯南和我被派到政治科，在亨德森领导下工作。

凯南也许是大使馆工作人员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身高体瘦，稍微秃顶，加上几分道貌岸然的表情，因此虽然年轻，看来却是超群出众的。他智力上的许多长处也早为我们所了解。他是一位卓越的政治评论员和分析家，但即使在1934年，我已感到他对文学的兴趣是同对苏联政治事务的兴趣不相上下的。我们经常一起出去听讲演或听音乐会。虽然凯南在著作方面有显著成就，但我引以为憾的是，他没有写出他早在1934年就想写的契诃夫传记。凯南随后成为国务院一位出色的政策制订者，并在莫斯科充任过短时期的驻苏大使，最后在肯尼迪总统当政时期充任驻南斯拉夫大使。他一直是我的一位最好的朋友。在动乱的几十年间，我们经常保持联系，在对苏政策上，彼此的看法通常总是相似的。

埃尔布里奇·德布罗是我在大使馆里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负责领事馆的工作。他精力旺盛，心情愉快。我从大使馆

迁出后，和他同住一套房间，成为密友，至今亲密如故。在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时期，在美国卷入越南的战争以前，他在南越充任大使。

大使馆的另一位工作人员查尔斯·塞耶是我未来的姻兄。他作为旅行者到过莫斯科，在上一年的12月访问莫斯科时被布利特*雇为职员。蓝眼睛、圆脸庞的塞耶在权威面前满不在乎。他那出奇的诙谐滑稽常使我们乐不可支。他写过几本有关俄国的书籍。虽然塞耶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他却在1933年就离开了军队，1937年进入外交部门。战争期间，他是同共产党游击队的领袖、南斯拉夫共和国未来的总统铁托元帅保持联络的美国小组组长。1953年，塞耶成为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政治迫害的牺牲品而离开外交机关。

1934年，大使馆里另一位最有才干的人员是助理武官托马斯·D·怀特中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成为空军参谋长。

从一开始，莫斯科大使馆就和美国派驻国外的其他外交使团有所不同。每一个大使馆都要负责处理六、七项日常任务，其中最基本的一项是处理两国政府之间的公事。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必须搜集有关所在国家的政治形势情报，加以分析，以决定外交政策的方向；必须搜集军事资料，以估计一个政府为了支持其政策能调动多少军事力量。此外，每一个大使馆还必须为美国旅行者和想要访问或移居美国的外国人办事，以及协助处理贸易问题。

在莫斯科，我们任务的重点和美国已经派驻其他国家的

* 布利特于1933年12月递交国书，然后回华盛顿搜集大使馆的班子。

外交使团很不相同。造成区别的一个因素是，在俄国的美国旅行者寥若晨星，以及几乎沒有一个俄国人企图克服布尔什维克对出境的限制。结果，新大使馆得以免除两项繁琐的任务，而在西欧的我国外交使团都要为之耗费大量的时间。

这确实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必须在初期花费许多时间在19 破旧的萨沃伊旅馆建立临时总部。我们大多数都忙于家务：寻找运来的家具和供应品，提货时办理海关手续，并弄清楚住处是否有适当数量的热水等等。结果，我们最初沒有正规的办公时间，至少可以说，公事是若断若续的。

过多的时间还被消耗在寻找大使馆人员开始在莫斯科生活时必不可少的消费品上面，而这类物品的奇缺程度是惊人的。生活条件普遍地感到困难和复杂，即使美国外交官员也不例外，尽管我们到达莫斯科以后的几个月里还享受着特殊待遇。

斯巴索大厦欠缺的许多东西中有一样是衣架。布利特的两个法国仆人（他们刚到莫斯科立刻就感到大失所望）坚持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觅取挂大使衣服的衣架。塞耶雇用的一个名叫格里沙的俄国人不无蹊跷地竟然拥有一辆附有侧车的摩托车。查利、格里沙和我花了一整天乘坐倾斜着疾驶的摩托车，跑遍莫斯科的泥泞街道寻找衣架（我不得不到字典里查找“维什尔卡”这个俄文字眼）。我们终于发现数量有限的几个木质衣架，这才象打了胜仗一样，带了它们回到斯巴索。

连取得使馆人员用以购买物品的卢布也成了大问题。驻莫斯科的每个外交使团的卢布都是从黑市搞来的，这是因为，如果想拘泥于大约两个卢布对一美元的官方汇兑率，那就沒

有哪个政府维持得起一个大使馆。除官方汇兑率和黑市（大约六十卢布对一美元)以外,至少还有三种计算卢布价值的方法：指定给专门接受外币从而约略估计货价的商店使用的外侨商店卢布;对外贸易卢布;给苏联企业规定的特殊利率。在上年 12 月访问莫斯科期间,布利特在同财政人民委员G·F·格林科的一次谈话中得到保证，可以拟订一项获得大使馆所用卢布的合法办法。可是，布利特很快就失望了。财政人民委员和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都先后敷衍了事地通知他，对于苏联的汇兑率,不可能有什么例外。最后,李维诺夫承认美国公平交易的要求不好对付，因此告诉布利特,“如果到了毫无办法的时候,您也知道,我们将不可能反对您采用任何自认为合适的办法以取得纸卢布。”于是美国大使馆就和其他外交使团一样,从国外购买卢布,然后装在外交邮袋里运来。我相信,那时华沙和哈尔滨是供应卢布的主要来源。

新大使馆和美国驻其他国家的外交使团不同之处还在于它要为安全问题操心。虽然布利特对俄国人民颇有好感，他却知道苏联警察是会不择手段地刺探我们的秘密的。由于他的强烈要求，莫斯科成为由海军陆战队警卫的第一个美国大使馆。开始时,这六位海军陆战队员因为我们工作忙乱,很少做警卫工作。他们象在别的国家那样找到了女朋友。一天，我坐在萨沃伊旅馆的走廊里，这时一个涂脂抹粉的俄国妇女走到桌子跟前说,她要到奥迪安中士的房间里去,旅馆的俄国职员对她投以怀疑的眼光,问道,“你找奥迪安中士干吗？”她轻快地回答说,“我是他的俄语教师。”几个月后,大使馆办公室迁往莫哈瓦耶大楼,警卫才森严起来。

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是布利特强调要发展和苏联人民的紧密联系。他确信，巩固的政治联系的基础在于人们之间的互相了解，所以他常常鼓励我们同俄国人混杂在一起。作为一个单身汉，我热心地执行他的指示。同普通俄国人接触是比较容易的，尤其是芭蕾舞团年轻演员们看来总是乐意接受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的约会的。一天晚上，布利特邀请莫斯科芭蕾舞团的导演到斯巴索来参加宴会，为她放映了一部巴厘岛舞蹈的影片。这位导演深受感动地说，为芭蕾舞团全体团员放映这部影片也许是有益的。于是布利特显出很有气派的样子，转过身来对塞耶和我说，“给芭蕾舞团安排放映一场。”想到我们就要置身于一群年轻窈窕的姑娘中间，我们使出了异乎寻常的劲头从事安排。结果使我们感到沮丧的是，来了一群郁郁寡欢和矮小难看的年轻妇女。她们穿戴粗俗，容貌平庸，根本沒有打扮，头发也是随随便便梳拢的。尽管如此，那天晚上仍然是快乐的，我们还结识了几位可爱的朋友。

从此以后，经常有两三个女芭蕾舞演员出入于大使馆。她们到那里来吃午饭和晚饭，通宵达旦地坐着闲聊和喝酒。其中一位名叫恰尔诺茨卡娅的朴素、矮小的姑娘是共产主义学说的忠实信徒，她竭力向我们宣传苏联的光荣，一谈就是几
21 个钟头。有一次她对我说，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制造的汽车总比任何一个资本家制造的汽车质量好得多。

在那个时期，由于女芭蕾舞演员可以随便进出外交使团住所，这就造成了许多临时结合的事件。有一位姑娘对布利特发生了单相思，她长时间地倾诉她对大使的不朽爱情，把他称为她的太阳、她的月亮、她的星星。

有一次，一群热心的年轻戏剧工作者来到大使馆，要求协助他们演出美国剧本《第一版》。凯南和我每星期去剧院一两次，指导他们在演出时如何体现真实的美国情调。共产党宣传在这些年轻俄国人心目中成功地引起的对美国的一些曲解是好笑的。在他们的这个剧本的译本里，本市栏编辑主任头戴大礼帽、身穿燕尾服去上班。这些年轻俄国人满以为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有地位的人物的普通打扮。这次暂时进入苏联剧院帮忙，我们是很高兴的，特别对一次在后台举行的初演宴会。这是跟大多数俄国宴会一样的类型：轻松愉快，不必考虑来宾的身份；活泼地交流思想，自由自在，不拘礼节。这次晚会使我们第一次体验到了俄国人作冗长演说的习惯。包括凯南和我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发表了一通讲话。我们讲得结结巴巴，不过用的却是俄语。菜肴的花色品种很有限，唯独酒特别多，有的是伏特加、高加索葡萄酒和高加索白兰地，可以随便开怀畅饮。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是我认识以后比较友好往来的俄国人之一，他是当时俄国的一位杰出的剧作家。他有一张乌克兰人的圆脸，一个扁塌的酒糟鼻，从他那双明亮闪烁的眼睛里更能看出他喜爱社交的个性。他毫无顾虑地发表对苏维埃制度的看法。在苏联戏剧界，他已经获得了非常的成功，但人们对他的作品也有很多争论。他的剧作一直受到欢迎，但和苏联出版物检查的冲突也从未间断。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将永远不会把共产党员放进他的任何剧本，因为他认为他们一无可取，不过是些两面三刀的人物罢了。

在布尔加科夫写了一个题为《不祥的鸡蛋》的故事以后，

最后的一击就落到了他的头上。这是关于一位教授的故事:
22 这位教授疏忽大意，把他发明的一种助长剂注入弄错了的鸡蛋,结果孵出了小爬虫。这些小爬虫不断地生长,以致变成一百公尺长的怪物。它们繁殖得很快，开始蹂躏乡村。红军被召集来扑灭怪物，但遭到决定性的失败。正当灾难看来不可避免的时候,一场剧烈的霜冻不可思议地突然降临,冻死了所有的怪物。一个名叫《核心》的二、三流文学杂志全文刊登了这个故事,过后那些编辑才恍然大悟,它实际上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讽刺。它影射布尔什维主义把人变为怪物来毁灭俄罗斯,而只有上帝的干预才能制止怪物的祸害。

随着故事真实意图的暴露，发动了一场谴责布尔加科夫的运动。报纸上出现了写着“消灭文化战线上的布尔加科夫主义”这类标题的许多漫画。布尔加科夫用这些攻击他的漫画来糊墙。运动的结果是他所有的剧本被禁止上演，他再也找不到任何工作。他申请护照,要求出国。他告诉我,有一天他正没精打采地呆在家里，忽然电话铃响，电话里有人对他说,“斯大林同志要跟你谈话。”他认为这是哪个朋友开玩笑,给了一个合适的回答就把电话挂上。刚过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还是同样的声音,“我是绝对认真的。确实是斯大林同志。”事实果然如此。斯大林问布尔加科夫为什么要抛弃自己的祖国。布尔加科夫解释说,他是以剧作家为生的,可是在苏联他不能做这项工作，所以希望到外国去。斯大林对他说,“不要轻率行事,我们会作出安排的。”几天后，布尔加科夫被任命为莫斯科第一艺术剧院的助理导演，他的一出优秀革命戏剧《涡轮机时代》在这剧院重新演出。然而，布尔加科夫决

不是安分守己的，不久他又同剧院发生了纠纷。他去世前在莫斯科大剧院协助编写歌剧脚本。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里，他本来是无疑地会被公认为一个伟大的剧作家的。

我们常见面的另一个苏联公民是布利特的朋友格奥尔格·安德列伊钦。他那黑黝黝的脸庞和蓬松松的灰白头发很适合激进党人的模型。他理论上信仰革命，但并不崇尚暴力；事实上，他的性格和蔼得近乎温柔的地步。他口齿清晰，非常健谈。他是一个马其顿农民的儿子，曾被当地的牧师作为值得享受公费教育的有为青年推荐给保加利亚国王，其目的是要他成为君主政府的栋梁。但安德列伊钦不久却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他终于被带到国王面前。国王告诉他，他这样下去将会遭到逮捕。他们看来友好地分了手。事后，安德列伊钦遭到一次又一次的逮捕和囚禁，以及二十世纪初期革命家所遭遇的其他一切苦难。俄国革命以后不久，出于偶然的巧合，他和国王重逢于瑞士的一个小车站。被废黜的国王正亡命国外，而这个以前农民的儿子安德列伊钦即将成为苏联政府的官员，正在去俄国赴任的途中。

23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安德列伊钦曾在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这个革命组织中从事活动。他遭到逮捕，我相信布利特是保释他的人之一。然而，安德列伊钦逃离了美国。布利特一到莫斯科就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询问原先对安德列伊钦的起诉是否可以撤销。罗斯福在一封诙谐的回信里表示，对于布利特的感情，他是能够理解的，然而，总统绝对不可能取消对布利特的“小游伴”的起诉。

在我们到莫斯科的初期，苏联当局指派精通英语的安德

列伊钦当美国人的同伴。他在国际旅行社任职，须经常为贵宾到处导游。尽管苏联宣传如何提高妇女的地位，安德列伊钦的任务之一是为一些贵宾介绍姑娘。

布利特出于与俄国人交际的热切心情，鼓动我们教他们玩垒球。他派人到美国搞来了球棒、垒球和手套。我们每星期在一个公园里教练一次，但俄国人的兴趣不是很大，显然他们是奉命来同美国人玩球的。当一个学习接球的俄国人接不住一个快球的时候，他们的兴趣甚至更加低落了。球击中了这个俄国人的脑袋，把他打晕了过去。最后，终于放弃了垒球训练。

在试图推广马球上，塞耶同样倒了楣。在一次大家喝了大量伏特加的宴会上，他成功地说服了骑兵总监谢苗·M·布琼尼元帅让红军打马球。查利发电报给他在英国的表兄订购两套马球设备。布琼尼给查利派来一个哥萨克骑兵分队。查[24]利在西点军校打过马球。这些哥萨克都是优秀的骑手，可是他们完全不知道该怎样把球打中，也丝毫没有场界观念。他们打了球就在飞扬的尘土中疾驰而去，查利则跨着马在他们背后用俄语大声喊叫，“回来！回来！”两组马球队训练完毕，正式开始比赛。布利特充当裁判，国防人民委员克利缅特·E·伏罗希洛夫元帅是主宾。仪式稍微受到一点影响，那是因为当布利特的仪仗兵列队在他的面前走过时，有一半人把向右转的命令误为向左转。某些苏联官员把马球看作在苏联暗中进行资本主义宣传的诡计。因此，马球比赛至多只进行过两三次，甚至在布利特离任以前，这个大胆尝试早就放弃了。

布利特早期的交往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结识苏联官

员。在大清洗前，会见一些政治人物是较为容易的。1934 年夏季的一个晚上，布利特举行宴会，邀请了眞正的老布尔什维克之一、列宁的第一个政治局的元老尼古拉·I·布哈林。布哈林于 1930 年已经成为反斯大林的“右倾反对派”的领袖，但他被击败幷被撤销党的高级职位，虽然仍旧保留党籍。到 1934 年，他部分地恢复了职权，幷担任《消息报》的主编。

那天晚上，卡尔·B·拉狄克随同布哈林出席宴会，他是革命初期一位杰出的但幷非显要的布尔什维克，相貌无比丑陋，但有聪明的和愤世嫉俗的头脑。他出身于波兰，是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很能起作用的评论家。他由于和托洛茨基关系密切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在那里他表示改悔。在莫斯科，他为苏联各种报纸撰写社论，实际上是以此作为考验。他在评论布利特大使的一次谈话时用俄语对我说，“你们西方人永远也不会懂得布尔什维主义。你们把布尔什维主义看作热水澡，认为溫度可高可低，以适合洗澡人的爱好。这是不对的。你要么百分之百地泡进去，百分之百地赞成它；要么百分之百地不洗，百分之百地反对它。”他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几年后，他和布哈林都成了大清洗的牺牲者。

在早先的日子里，我们忙于筹建大使馆，沒有多少机会按照布利特的指示到莫斯科以外的俄国其他地方推行他的交往运动。到了 10 月底，任务已经减轻到有足够时间容许塞耶和我动身到高加索去。安德列伊钦作为国际旅行社的官员，为我们安排了旅行路线：先带我们到里海的巴库北部打猎，然后折回，横过半岛到巴统搭乘前往伊斯坦布尔的船只。

25

尽管莫斯科-巴库快车的木质车厢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前的老货，我们却觉得异常舒服惬意。因为俄国采用宽轨，车厢比美国火车宽敞，并且卧铺是横放的，而不是纵放的，这就大大减少了颠簸，容易使人入睡。餐车相当干净，饭菜花色不多，但看来总有足够的可口热汤。快车并不快，三天时间才走了大约一千英里路程。

在火车上，我们遇见了布琼尼元帅，他是俄国内战的英雄和红色骑兵部队的首领，在我们大胆尝试推广马球时，就是他同我们合作的。他似乎由于我们共乘一趟列车而感到高兴，我们邀请他到我们的车室喝美国威士忌。喝了一两杯以后，布琼尼说，他实在很喜欢我们的美国“酒”（俄语 vino 既指葡萄酒，也指白酒）。布琼尼是在往南去加格里的途中，要到那里去同斯大林一起狩猎野猪。他老是喋喋不休，很粗俗地叙述他早年的生活。象他所描述的关于沙皇军队的腐败无能、军官的漠不关心，以及极端缺乏纪律性和组织性的情况，是骇人听闻的。

布琼尼还向我们谈到内战中俘掳的一个白俄军官。他说，这个军官在一个被占领的村庄里下令处死他的几个未成年的亲属，匪徒们把儿童倒提起来将脑袋往石墙上摔。布琼尼捋了捋他那茂密的胡子说，“我恰当地处理了这个畜牲。”

暮色深沉时，布琼尼开始有点语无伦次。他把话题转向国际政治，说苏联和美国有着共同的伟大的命运，它们都应当同中国友好。他称中国是个了不起的国家。这话他是从哪个角度说的，我不太清楚，但是他在一张纸上写道，十年内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将证明这个发展。我倾向于认为，他的预言与其说是先见之明，还不如说

是醉中的想象。

第二天拂晓，布琼尼已经坐了一宵，他要列车员告诉他火 26 车什么时间到达他要到的车站。那个服务员回答说，我们已经过了这个车站。他勃然大怒，破口谩骂(在咒骂上，沒有哪种语言比俄语的內容更加丰富)，几乎要揍这个服务员。特别少有的现象是，服务员原来搞错了，我们还沒有到达布琼尼要到的车站。当我们抵达的时候，布琼尼站了起来，喘了一口粗气，扣上他军服的钮扣，慢慢走出车厢，神志显然是清醒了。

到了巴库，塞耶和我马上和国际旅行社社长、一位名叫巴达耶夫的可尊敬的先生取得联系，他撂下正在办理的一切公事(当时他还是巴库地区木材托拉斯的负责人)，立即着手为我们组织一次远征。

我们一行——包括巴达耶夫、他的随身公务员、一位苏联商业官员，以及查利和我在內——同乘一辆汽车从巴库出发，随后是一辆满载头戴黑色绒帽、手携猎枪的高加索人的大汽车。大汽车里还装着一桶啤酒，在里海沿岸，我们多次停下车来，从小贩那里买来海虾，津津有味地小酌一番。

我们的目的地是小羚羊(俄国人称为“吉兰”)出沒的大草原。到达草原后，两辆汽车并驾齐驱，在大汽车车顶上了望的高加索人一发现“吉兰”急剧摆动的白尾巴，立即大叫大嚷。汽车朝前猛冲，有时达每小时五十英里，比小羚羊奔跑的速度稍稍快一点。我们从急驰的汽车上射击。我在车的一边，查利在另一边，这样可以比较放手地射击那些跳跃的小羚羊。我射倒了两三只，查利也是如此。坐在后排座位中间的俄国人常常从我的主人和他正在驾车的公务员两人脑袋的空隙中

间射击出去，使我们非常提心吊胆。

有了这样直接地和俄国人接触的机会，我很快就喜欢他们的品质。就我所知，凡是在俄国呆过的人，无论他对这个制度的态度如何，总的说来沒有不对俄国人怀有好感的。他们性格纯朴，不矫揉造作——应当从最好的意义来理解的那种朴实——他们不喜欢那些富于世故的社会中的很多繁文缛节。他们态度自然，他们的性格和气质沒有被许多世纪来的积习所僵化。我始终认为，俄国人是个人主义者，他们处世接物不墨守成规，也不拘泥习俗。他们还有众所周知的消极地接受严厉的独裁统治的习性，这看来是同他们的个性不相一致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俄国的全部传统表明，人民在他们自己和统治者之间已经筑起了一道墙。在俄国，统治者象气候一样不可捉摸，个人的生活和当权者的意志并无直接关联。不管怎样，苏联老百姓仍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个人的生活，不受统治者在精神方面的影响。

俄国人默默地顺从当权者的统治的最突出的事例，是他们在1935—1939年斯大林对几百万人的清洗期间表现出来的消极态度。这种无动于衷的普遍大屠杀只能发生在这样的国家，在那里，统治者的行动不受普通老百姓的影响。然而，即使在恐怖时期，苏联老百姓在相当程度上仍然能够维持退隐的生活。当然，苏联当局确实力图渗入这个私人领域，几百万苏联老百姓遭受了个人悲剧，但任何外国人，只要在俄国呆过并有机会观察苏维埃制度下的俄国人，沒有不为这样的事实所感动：他们照样过日子，不受这个制度的政策（即使不是行动）的影响。

除非在极端暴虐的时期——俄国历史多次记载了极端的暴虐和残酷行为——普通的俄国人喜欢逍遥自在，多少有些厌恶持续的劳动。在形成这种性格方面，气候无疑地起了作用。这不仅是因为天气凛冽，而且是严冬持续很久的缘故。莫斯科的冬季长达七个月，白昼短促，在灰色阴沉的天空，密云低垂，城市四郊被漫无边际的茫茫白雪覆盖着，仿佛象沉睡一样。在一些小村庄里，农舍升起的几缕炊烟是生命的唯一迹象。沒有活可干的季节特别长，连串门都成了主要的活动，因此俄国人开始相信，他们过的生活是无法加以控制的。结果是陷于麻木状态，只是偶尔精神突然振奋，间或出现狂暴的行动罢了。虽然城市有了根本的变化，苏联人建立了综合工业体系，但俄国的农村生活相对地说并沒有什么变化，正如几乎每一个著作家所看到的那样。在冬天，俄国农民仍然有好几个月手里无事可干。

俄国人的性格有许多方面使外国人、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困惑不解。其特性之一是对待妥协的态度。在俄国人看[28]来，妥协常常等于背叛或投降。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看来，妥协是正常的生活方式。形成这种差别的一个原因是，俄国从未与外部世界进行过大量的商品贸易。权威人士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善于妥协的特性归因于英国几乎在建国之初就是从事贸易的国家这一事实。俄国人则专心于用攫夺和保有领土的方式以取得土地，基本上把邻邦当附属国看待。这样的关系当然产生不了妥协精神。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专横和褊狭的性质更使俄国人倾向于避免妥协，并把这种倾向看作他们国家生活中、特别是同外国交往中的行动准则。

就俄国人和美国人都是整个大陆的产物这个意义来说，双方有相似之处。两国都有宽广的土地可供迁移，有新的土地可以占用，这就使这两国的人民敢想敢干，富于想象力，不愿接受似乎形成和支配着西欧人的某种相沿成习的限制。俄国人象美国人一样，有不拘细节（也许我们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过于不拘细节）的倾向，而我们彼此的幽默感也往往是相同的。

另一方面，普通俄国人同普通美国人相比，毫无疑问处于较低的文化发展水平。革命前的俄国知识分子是全世界最卓越的集合体的一部分，今天有教养的俄国人仍然是颇为有趣的人。但是，普通俄国人与普通美国人不同，他们尚未摆脱过去的习性；俄国人至今仍然是迷信、易于受骗和其他许多特征的受害者，这些特征是他们许多世纪来处于愚昧无权地位的农民祖先所具有的。事实上，俄语中常用“无特权的人”一词来形容农民。

所以，许多美国人比较机敏、活泼、容易激动，而俄国人一般比较迟钝、细心、富于耐性。美国人缺乏俄国人的那种耐久力，特别是备尝艰辛痛苦而不怨天尤人的惊人的精神。最使美国人感动的是俄国人的友好态度和恳切热情，正如美国人的坦率和慷慨能够感动俄国人一样。在早期的日子里，每当思想意识的障碍不显现的时候，友谊和相互谅解之花即为之盛开。美国人不受旧规和传统的束缚，态度友好，习惯于相信人们是善良的，除非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俄国人是同样地友29好的，但他们谨慎小心，怀疑一切外国的事物，并且意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在同外国的交往中往往怀有自卑感。出身寒

微而又没有受过全面教育的苏联领导人在这方面尤为敏感。

俄国的传统始终影响着他们。对于多疑这种俄国农民的基本秉性，我们刚到莫斯科时就已觉察。我们曾经雇用一些俄国人帮助搬运办公室的家具用品。作为对他们工作的鼓励，我们有时付给外币作为报酬，而外币是可以用来购买俄国货币所买不到的东西的。一天，一位工人给我看一个敲扁了的波兰兹罗提。他解释说，这是前天付给他的工资中的，他的伙伴有人怀疑它是伪币。为了试验这个硬币的真假，他们把它放在石头上，用大铁锤敲打。在证明其并非赝品的过程中，他们破坏了这个硬币，从而满足了他们自毁其所企求的东西这一奇怪的俄国逻辑的要求。

同俄国人的交往和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谈话，使我在报道苏联新社会的政治状况方面获得一些经验。亨德森、凯南和我都认为我们到莫斯科来得正合时宜，因为1934年也许可以看作是苏联历史上最为乐观的一年。苏联的孤立状态正在结束。不仅美国承认了莫斯科，而且莫斯科也正在要求加入国际联盟。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的决定所造成的大饥荒剥夺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这场灾难已经过去。我们在莫斯科见到的普通老百姓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已经胜利，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巩固了。许多莫斯科人相信，他们能够理所当然地盼望出现一个自由和个人安全不断增长的时期，苏联将朝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固有的民主形式迈进。俄国青年、至少是城市里的青年对于苏维埃观念还保持几分热情。学生放弃周末休假到农村和矿场劳动，或者帮助建设工厂。他们这样做似乎没有任何真正强迫的迹象。

不仅俄国人，而且外国外交官的刺探的目光，都看不透斯大林的性格。他只在五一节或其他节日检阅游行队伍时公开露面，那时站在红场列宁陵墓顶上的斯大林不过是一个模糊的人影。斯大林的接见对于一个外国的外交官来说是难得的礼遇。(1933 年 12 月，斯大林偶尔来到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次宴会，布利特见到了他。)同他交谈过的人寥寥无几，他们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即使不是仁慈地、也至少是宽容地观察俄国实况的领导人，因为他在这种场合总是彬彬有礼的。斯大林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高踞于纷争之上，仅在下属对某个问题不能解决时才出来过问。斯大林总的说来是颇孚众望的，因为受控制的报纸当时正在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把他标榜为一位只关心苏联人民的繁荣和幸福的亲切仁慈的天才。一张典型的照片拍摄的是斯大林双臂抱着一个乌兹别克女孩，标语上写着:“同志们，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幸福!”这个运动的目的显然是想冲淡人们对饥荒的记忆，虽然在心存怀疑的俄国人和了解苏联宣传手法的外国人看来是异常可笑的。但在 1934 年，即使心存怀疑的人也没有看出斯大林不久在清洗中显露出来的近乎偏执狂的敌意和猜疑。

我们知道得更多的是民警，即执行巡逻的普通警察，而不是“奥格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后者是早在 1934 年对秘密警察的称呼，至今仍被不很精确地沿用着。苏联老百姓似乎并不害怕民警。他们害怕“奥格普”，但肯定不象对它在清洗时期的后身“恩克夫德”(内务人民委员部)和二十年代的前身“契卡”(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那样地害怕。无论如何，布利特所到之处都有四名便衣警察在后面跟踪。当布

利特在官邸的时候，甚至在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都坐守在外面；他们跟踪他到大使馆和他去的任何地方。一个美丽的6月傍晚，布利特和我决定去莫斯科河划船，因此我们租了一艘小艇就划开了。回头一看，我们看见我们称之为"跟班"的几个便衣警察正站在系船艇的浮动码头上抓耳挠腮。显然，他们不会划船。俄国官员坚持说这些人是派来保护布利特的，这话也有几分道理。自从1918年德国大使被暗杀后，苏联政府就担心有人企图暗害外国使节。然而，警察监视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搜集大使们的活动情况和他们会见过的俄国人的行踪。这样，苏联秘密警察跟踪所有的大使就成了惯例，只是到了1953年我充任大使时，这种做法方才废除。

足以说明1934年气氛的一个例证是，苏联政府在7月间把秘密警察的名称从"奥格普"改为"恩克夫德"时，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对布利特说，这个更改标志着苏维埃制度趋向自由化的一个明确的步骤。他说，这表明革命已经胜利，苏维埃政权已经确立起来。他预言苏联老百姓对"恩克夫德"不会比纽约市民对纽约警察感到更多的恐惧——一句令人吃惊的失言。我相信李维诺夫这样说是完全出于真诚的，因为他和其他许多苏联领导人一样，没有觉察到斯大林内心的阴暗深处。 31

管理家务、同苏联人民接触和写政治报告，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但大使馆最重要的任务是同苏联政府建立友好的和有意义的外交关系。尽管表面上友好，谈判却几乎从一开头就告失败。布利特指派我的一个任务是为租借莫斯科河岸的一片地产进行谈判。布利特早先得到斯大林同意的这个地

点，位于高崖上面，是可以俯瞰全市的一片幽美的土地。这是个树木茏葱的地区，它的斜坡一直延展到河边。美国希望在这里按照蒙蒂塞洛① 的式样（实在稀奇！）建筑一座大使馆——一块给美国大使馆全体人员提供居住和办公面积的场地。我们到莫斯科以后不久，李维诺夫就告诉布利特，不可能利用这块地产了。布利特听了很恼火，李维诺夫才作了让步，通知我们可以租借。但一经决定，谈判就转移到了管理全城地产的莫斯科市苏维埃那里。

我立刻陷入困境。一个障碍是，除非每一棵树都经过特别批准，莫斯科市苏维埃盲目地不让美国人砍倒地皮上的树木。由于必须先后砍倒的树木约有百棵以上，我们很快就领教了莫斯科官僚主义的僵硬性质。纠纷还涉及美国把工人运进俄国的权利，以及他们住宿、付酬和吃饭等问题。苏联官员对于苏联景况并非圆满无缺的任何暗示都抱有的敏感，往往在这些讨论中流露出来。然而，最难克服的困难是苏联人坚持我们必须按照官方汇率购买诸如砖瓦、水泥和木材等建筑材料。这就意味着国会为建造大使馆拨给的一百二十五万美 32 元经费实际上只能全部用来购买这些基本材料。我一再拜访莫斯科市苏维埃的官员，同他们商量问题，他们倒很殷勤，但即使是最简单的事情，他们也往往寸步不让。事体很快就清楚了，原来俄国人不愿我们在布利特选就的地点进行建筑，这个规划最后只得放弃。苏联人横加阻挠的真实原因至今弄不清楚，可是这却使我们避免了犯兴建蒙蒂塞洛式建筑物的错误，因为这种平顶建筑对于莫斯科的大雪是不适宜的。

① 美国总统杰斐逊住宅的名称。——译者

同沒有能够为大使馆找到一个称心地点的情况相比，我们和俄国人之间的其他外交问题是更为根本的。所发生的纠纷关系到苏联违背1933年就外交承认而签订的罗斯福-李维诺夫协定。在这条约中，苏联同意美国提出的三点特殊要求。莫斯科承认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前的借款，同意取缔图谋颠覆美国政府的组织，并保证在苏联居住的美国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沒有引起什么问题，其他一些协议却导致两国关系的冷淡和布利特心理上的改变。问题在于有关借款谅解的那份备忘录是一个草率拟定的文件，在后面我们还要述及的这个过失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苏联的交往中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个一直保密到1945年的备忘录提到华盛顿要贷给莫斯科的一笔“借款”。1934年春、夏、秋三季，李维诺夫在和布利特谈判时坚持“借款”这个字眼的意思是指美国答应给予苏联的资金可由苏联自由决定其用途和用法。美国则始终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提供苏联的任何款项必须以信贷形式在美国使用。备忘录的缺点还在于未曾提及进出口银行对苏联贷款的监督。布利特一直认为这种监督是他和总统据以行事的基本假定的一部分。进出口银行原是为苏美贸易提供资金而设立的。

随着纠纷与日俱增，布利特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李维诺夫是在自行其是，沒有把讨论的全部內容向斯大林汇报。有一天，他怒目圆睁，脸红脖子粗地和我谈到他怀疑李维诺夫在欺瞒斯大林。当然，存在着欺骗这位独裁者的可能性，但这样做是危险的，而且对于象李维诺夫这样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的无权的人来说，也不可能这样做。布利特显然认为李维诺夫

33

在执行他自己的政策，这种见解更难置信。可是，布利特好走极端，竟然利用老布尔什维克拉狄克去查对李维诺夫对斯大林讲话的内容。只要考虑到1927年拉狄克因为他持有托洛茨基的观点而被斯大林流放西伯利亚，就很难相信在七年以后拉狄克能够查看斯大林的卷宗。拉狄克告诉布利特，李维诺夫的汇报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歪曲。但是，布利特仍然认为李维诺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认为许多纠纷完全应该归咎于外交人民委员的不妥协态度。

也许，李维诺夫转变态度，专门在“借款”与“贷款”这类具体细节上下功夫，他所反映的并非外交人民委员的个人见解，而是苏联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态度的转变。1933年，在美国承认苏联时，斯大林对布利特说，日本正在策划在不久的将来进攻苏联。斯大林对美国的传统缺乏了解，大概认为美国可能会同苏联签订某种反对日本扩张的协定。这对美国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传统是拒绝缔结任何矛头指向任何国家的条约。固然，孤立主义是我们着眼于欧洲而产生的一种主义，对亚洲或拉丁美洲来说并不具有同样的含义，但是，同俄国缔结一项涉及亚洲的条约，使一个欧洲的共产党国家得到好处，这从政治上看是完全不可能的。到了1934年年底，苏联对日本的担心已经减弱，同我们签订有关亚洲的协定的迫切性也就消失了。那时，有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正在敦促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它于1934年加入）并参加为反对纳粹德国而缔结的某种集体安全协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苏联欠法国和英国的借款数额要大得多，苏联不准备同美国协商偿还数额较小的借款的问题，并且也这样明白表示过了。

布利特同他的幻想的最后决裂发生于1935年夏，在我离开苏联之后。当时苏联人举行了第七次——结果变成最后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会议宣告的各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吸收它们的死敌、社会民主党参加人民阵线以反对法西斯，但仍坚持它们阴谋颠覆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目标。布利特大发雷霆，提出了抗议，指出根据1933年李维诺夫-罗斯福协定，苏联有责任禁止任何团体在其国土上举行旨在使用武力颠覆美国政府的会议。李维诺夫对抗议置之不理，他声称他和斯大林不知道共产国际要举行会议，他的这种嘲弄态度使布利特确信，苏联缺乏那种有利于建立两国间良好关系的品质。 34

布利特终于成了苏联的死敌，因此他赞成法国和德国重归于好。直到1938年英国和法国在慕尼黑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希特勒时，布利特才得出结论，同纳粹德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布利特同希特勒签订协定的建议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不过，他作为大使关于美苏关系的最后一次建议却是有意义的。在1936年4月20日的报告中，布利特劝告国务卿科德尔·赫尔：

我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应当抱过奢的希望，在达不到时，也不应当沮丧失望。当气候有利于我们时，我们应当拿取我们所能得到的东西；当风向转变时，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把这些东西抓住不放。面对言过其实的友情表白，我们务必不为所动；面对轻蔑或暗中反对，务必镇定自若。我们必须在长时期内朝着最切合我们利益的方向坚定地施展我们左右形势的影响。我们不应当恫吓。我们要采取行动，让布尔什维克对我们行动的目的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

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持美国人有条不紊的办事效率、诚实

和直爽的声誉。我们决不应当派遣间谍去苏联。沒有任何武器能比绝对的诚实更迅速地缓和和影响我们和共产党人的关系了。他们对此了解得很少。

既然布利特个人的脾气和苏联的实际情况是如此，我相信沒有任何东西能够改变他的想法。在俄国革命的理想主义时期，即 1919 年 3 月，布利特曾短期访问过莫斯科，从此他抱有过多的幻想。俄国革命已经起了变化，这种变化妨碍了他的理想主义和他那旧式的美国人道德。布利特个人的态度对于苏美关系起不了持久的作用。阻碍两国良好关系发展的是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特性，而不是人们的个性。

1933 年，苏联领导人认为他们将发展和美国的友好关系。他们指望美国具有欧洲人对待苏维埃制度的现实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世故，不想向沒有成果可期的方向推进。苏联 35 官员都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短命的，他们是在对付一种暂时的现象。这种思想意识上的信仰并未变成个人的仇恨。事实上，就美国人来说，我们在一段时期里是很受欢迎的；我们在京城里是初次露面的男子和引人注目的对象。起着有利于我们的作用的事实是，美国已从欧洲摆脱出来；我们沒有落入不道德的旧欧洲国家的范畴。最后，新奇趋于平淡，我们被看作不过是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罢了。

只有了解布利特的背景、特别是 1919 年他和苏联政府的一段经历，才能了解他对苏联态度的改变。那时，他思想上有明确的亲苏倾向。早在 1918 年，当战争仍在进行，甚至在他访苏之前，布利特在他自己的私人笔记里就认为俄国革命有利于未来的发展。他写道，“作为一个国家，他们已经变得人

人亲如手足，开诚布公，摆脱传统的束缚，对生活无所畏惧。”

我和布利特一样，在那第一年里也遭受幻想破灭的痛苦。然而，我沒有太多的幻想可以破灭，一半是因为我沒有经历过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激动人心的初期，一半是因为我阅读过许多有关苏维埃独裁制度的著作。我们第一任驻苏使馆的全体人员都严格保持训练时所要求的客观性；我们避免发表缺乏根据的言论，在分析俄国人的动机时，我们始终小心翼翼，力求公允。因此，虽然苏联的宣传机器企图把对苏联的批评者置于道义上的防御地位，我们并沒有陷入那种困境。外国人的评论不管怎样正确或实事求是，只要它离开当时党的路线，总是要马上被布尔什维克斥为“反苏偏见”的。

在此期间，一位保持着同样客观态度的英国记者在访问莫斯科时受到一位“有点左倾的同行”的责问，后者气势汹汹地责备他“散播对苏联的诽谤，说他们有两套统计数字，他们自己保留的一套是秘密的，公之于众的一套是假的”。英国记者回答这位同行说，“我绝对否认这样说过。我说的是苏维埃制度有两套统计，而两套都是假的。”我们可以嘲笑苏联的做法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反苏的。

我并不认为，我在莫斯科第一次任职期间的结果形成了我对苏联的严厉态度。正如我已经指出的，1934年是比较温和、轻松的一年。当时仍然可以作这样的猜想：苏联正在从内战、农业集体化和开始工业化的艰苦岁月中挣脱出来，而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和平发展的平稳状态。我于1935年春离开 36 那里时，清洗刚刚开始，但并沒有任何迹象表明恐怖即将来临。直至清洗的规模已为众所周知，希特勒-斯大林条约已经

签订，我对苏联的态度才变得严厉起来。

我从布利特对苏联背弃协定的激烈反应中学到许多东西。实际上，他对苏联不良行为的预测和分析是准确的。他可以被责难的是他反应粗暴，持有偏见和不讲道理。我决没有忘记这个教训，它在麦卡锡时期尤其显得可贵。

1935年春，我离开苏联，首途回国度假，虽则当时我对斯大林政权的真正性质尚无所知，但是我仍然记得，我和查利·塞耶一起跨过国境时兴高采烈的心情。那种情景仿佛是从屋子里来到了清新的春天晴空下，这屋子的氧气虽然足以维持生命，但不足以产生思想和精神上的活跃状态。我相信几乎每一个外国人在离开俄国时都会有此同感。事实上，布利特早在1934年夏就以个人名义打了一份电报给国务院，要求拨出一笔特别经费，供大使馆人员到苏联境外旅行之用。他形容在莫斯科寻找轻松的娱乐同上下班时间在纽约地下火车里寻找座位一样困难。现在已经给莫斯科的美国外交官规定，每年至少可以离开俄国两次。我相信这个办法也已为在莫斯科的其他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和美国记者所仿效。经年累月地留在莫斯科，阅读苏联报刊，除了对当时重大问题的千篇一律的宣传外听不到一点消息，这种情况最后势必影响你的判断力。倘若你有内省的习惯，则更其如此，除非你能够指望“逃出来”——这个词本身就表明了苏联社会的封闭的性质。直到今天，即使是对苏联经验的强烈的同情者，在他跨过国境的时候，也会大大地松一口气，精神为之焕发，感到重新体会了单调、阴郁的莫斯科绝对不可能提供的那种愉快。

第三章　枪决，枪决，枪决

37

1935年春休假期满以后，我满心打算返回莫斯科。但有一次我到国务院去，出乎意外地听说我将被调回华盛顿。我在莫斯科呆了不到十五个月，本来希望至少再呆一年。调动是布利特要求的，他对我的工作效率写过表扬的报告，因此我不相信我的调动是由于他对我的工作有什么不满。调动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同苏联谈判破裂，布利特决定裁减大使馆人员，而我成为其中之一。被调回国的还有几位陆军武官，总领事馆的人员也作了调整。

我为未能返回莫斯科而感到的失望很快就淡忘了，因为当时我正着手和查利·塞耶的妹妹阿维斯·塞耶订婚。阿维斯的另一位哥哥乔治是我中学时的同班同学，他们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维拉诺瓦，那时我到他家作客，见到过阿维斯。当时她不过是个小丫头，并未给我特别的印象。然而，1934年她到莫斯科探望查利时，已成长为一位十分迷人的年轻小姐，我时常看到她。同阿维斯一起到莫斯科的还有她的姐姐和一位朋友。这三位姑娘都是首次旅游苏联，对目睹的一切东西都感到兴奋。一天，阿维斯在法国大使馆的秘书家里午餐后，携带照相机走回旅馆，路过克里姆林宫，她停下来照了像。两名便衣警察当场拦截了她，夺过照相机，将胶卷曝了光，随即把她带往警察局。她只会讲两句俄语，一句是根本不起作用的

38

"我的哥哥会讲俄语"，一句是大使馆宿舍的电话号码。四个小时以后，俄国人打电话给大使馆宿舍，那里的一位名叫伊林的电话员匆匆奔进查利的办公室说，"天哪！我的上帝！塞耶先生，你的妹妹被捕了！"她不久就获得释放。

阿维斯对国际事务、特别是对俄国的兴趣，增进了我们彼此的感情。1935年初夏，我多次去看她。我们谈情说爱，是在纽约的出租汽车中和酒吧间里，以及偶然访问阿维斯的家乡维拉诺瓦的时候。我们在6月订了婚，8月29日结婚于维拉诺瓦。蜜月是在百慕大度过的，我们回来后住在华盛顿第十六号街的一处公寓里。

国务院显然是根据专家（甚至在他们成为专家之前）应当广闻博见这一理论，指派我到副国务卿威廉·菲利普斯的办公室工作。威廉·菲利普斯瘦长的身体和老式的仪态使他显出一种高贵的风度。他为人高尚、能干，这是受过旧日外交训练的结果。我作为他的助手，任务繁多。除特定任务外，我还要摘录源源不绝送到菲利普斯先生办公室里来的信件、电报和公文，并且答复若干来信。工作并不费劲，但我感到多少是偏离了苏联问题的研究。所以，1936年夏天当我调到东欧事务司工作时，我感到很高兴，因为在这里我又可以专心致志地研究苏联了。

我的第一项任务是撰写关于布尔什维克使用恐怖手段的备忘录。这个题目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因为清洗运动正席卷整个俄国。我的主要结论是，布尔什维克在执政前坚决反对共产党对个人使用恐怖手段，但一旦当权，却把恐怖看作从事阶级斗争的完全合法的手段了。

同时，我还协助洛伊·亨德森在莫斯科主持的贸易谈判做些后勤工作。在同苏联签订这第一个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并未出现什么重大问题。唯一颇为有趣的事件是美苏双方确认相互减低关税不会起什么作用。因为苏联政府既是买主，又是征收关税的当局，苏联任何一个代理人订购商品，都无需为关税操心。即使苏联大幅度地降低对美国商品征课的关税，[39]也不会刺激或者限制那些商品的进口。最后的协定给予了苏联对美出口的商品以“最惠国”待遇，这就是说，美国征收苏联商品的关税和其他国家的商品一样低。莫斯科同意向我们购买价值四千万美元的商品作为回报。贸易协定的签订表明，即使在两国关系处于冷淡的状况下，仍有可能同莫斯科做些生意。协定还承认这样的事实：由于苏联产品很少是美国所需要的，苏美贸易不会达到平衡。

在为谈判而进行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处在国务院旧派人物和白宫有势力人物关于美国对苏政策的斗争的周围。当时争论的是美苏之间能否发展正常的合作关系，这个问题同样注定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提出，而且至今依然争论不休。

罗伯特·F·凯利是东欧司司长，他认为，由于布尔什维克坚持他们的意识，莫斯科和共产国际关系密切，美国同苏联发展有意义的关系是有限度的。身材修长、沉默寡言的凯利决不是反苏战士。他在二十年代对苏联进行过呕心沥血的研究，结果是他坚决主张，由于存在着围绕苏联问题而进行的情绪激动的争论，东欧司培训人员时不仅要求他们保持客观的态度，而且要求他们竭尽全力用确凿的证据去核实每一件事

情。从莫斯科的观点来看，这种态度就是反苏；但按照美国人的看法，这却是重要的训练。

凯利不愿按表面意义接受莫斯科的声明，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是东欧司苏联科的大多数人所共有的。白宫的某些人士（当时我认为其中有罗斯福夫人和哈里·霍普金斯，但现在我不敢肯定）把这种态度当作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障碍私下报告给了总统。反凯利集团担心美国可能要错过和苏联共同反对希特勒日益增长的威胁的机会。1935年苏联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互助条约，共产国际宣布成立人民阵线，这些事件使白宫人士获得深刻的印象。反凯利集团并不懂得，各国共产党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同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激烈对抗转变为互相合作，但也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回到原来的状态的。斯大林政策的实质首先是要维护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

1936年3月7日，希特勒派遣军队进驻不设防的来因地区，当时亲苏分子对苏联方面的主要注意点也是不很了然的。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要求国际联盟采取行动，并用一句不朽的名言提出警告："和平是不可分割的。"白宫集团深受李维诺夫巧言令色的迷惑，变得又聋又瞎，他们对于李维诺夫和维亚切斯拉夫·M·莫洛托夫两人透露的要同希特勒合作的暗示，充耳不闻；他们对于苏联领导人丝毫不想敦促法国将德国占领军逐出来因地区（这也许是及早推翻希特勒和拯救世界免于一场可怕战祸的办法）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

白宫集团为了孤立凯利，用陈旧的官僚主义的解决办法下了一道命令，将东欧司并入欧洲司，结果是削弱了研究俄国

事务的专家的影响。

我作为国务院正在成长中的俄国问题专家，在一些事情上不免受到两方面的牵扯。这种合幷是有意义的，因为俄国正在成为欧洲的一部分。我知道，凯利所领导的东欧司在二十年代的几年内曾经提出论证，支持美国不应承认苏联的观点。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在美国与苏联关于承认问题的谈判中，指导性的基本文件是凯利起草的。罗斯福相信苏联将成为世界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务院需要有新的观点来对付这个事实，他的这种想法我认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毕竟代表着国务院中的新鲜血液。然而，对于按表面的意义去接受布尔什维克的言论，我不能不表示担忧。凯利的怀疑是无可非议的。我在莫斯科首次任期内的耳闻目睹使我对此深有体会。包括凯南在内的研究苏联问题的年轻专家大都和我怀有同感。

东欧司有一位年轻官员确实支持那些对苏联抱有好感的人。他是诺里斯·B·奇普曼,曾在巴黎和我同学俄语。他对我说，我们在莫斯科写的报告看来是倾向于反对俄国人的。他把这种偏向归因于美国人在苏联所不得不忍受的困苦的生活条件。我坚持说他的看法是错误的，我们所报告的是宣传烟幕背后的眞实情况。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调往莫斯科之前不久。不到一个月,他丝毫不差地按照我们的方式进行汇报。 41

我相信俄国人自己也参与了反对凯利的运动。我从许多方面得到的情报证明，莫斯科和华盛顿两地的苏联官员都在私人谈话中抨击凯利。

不到几个月，白宫的压力取得了胜利，正如上面所指出

的，东欧司被归并于欧洲司。司长是皮尔庞特·莫法特，他对苏联事务并不特别关心。可是，某些反凯利分子的情绪非常强烈，他们对这个胜利并不满足，竟想收拾东欧司的重要档案并把它们运走，其实就是要销毁多年来苦心搜集的报纸、期刊和其他文献。保存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献，成为我最关心的事情。最初的打算是把它们堆放于国务院图书馆的顶楼上。在这种情况下，文献就将迅即失散。国务院图书馆馆员告诉我，唯一能够保存这些旧文献的场所是国会图书馆。我东奔西走，唇敝舌焦，央求了许多人，总算把这批收藏的文献转移到了国会图书馆，至今仍在那里保存着。

1937年春，我突然痛切地体会到自己在外交部门地位的低下。当时在伦敦举行国际食糖会议，我被指派为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团的秘书。这就是说我必须负责处理所有的具体事务：经管旅途中的膳宿，协助抄写工作，掌握密码和一般通讯，管理财务等等。我觉得这是一项十分繁重而又令人厌烦的差使。

同年秋天，我被调回莫斯科，但赴任前给我一项临时任务，指派我为参加另一次会议的美国代表团的秘书。这是一次比较有趣的会议——调查日本侵略满洲问题的九国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这次会议终于一事无成，主要是因为与会各国、特别是美国和苏联不愿卷入任何可能导致军事行动的事端。会议发布的新闻寥寥无几，于是喜欢活动的美国记者开始戏弄会议代表。一天，他们买通一个妓女，在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从开会的旅馆里出来的时候拦住了他。我和记者们坐在街对面的咖啡馆里瞧着，这个妓女一下子挽住艾

登的胳膊，跟他说些什么。艾登顿时面红耳赤，赶紧甩开她，一头钻进他的轿车急驶而去。这个妓女从此被称为“九国之雏”。

我的妻子和我在1938年1月4日到达莫斯科。我们注意到城市稍有变化。那里同样弥漫着进入国境就可闻到的那种气味。我的妻子从羊皮、锯屑、药皂、消毒剂和烟草的混杂味儿里还嗅出另一种成分，那就是外国人用“斯大林的香气”这个诨名来称呼的一种糟糕透顶的俄国香水味儿。但就已经竣工的中央一段的地下铁道来看，则是另一番景象，各个车站都有白大理石和雕像的华丽装饰。人们还告诉我地下铁道运输迅速，效率很高。电车也不再拥挤得车外象葡萄串那样挂满了人。但是，老百姓仍然耷拉着脑袋走路，好象心事重重。

在我1935年离开莫斯科以前，清洗是以低调开始的。我听到谣传，上年12月负责列宁格勒地区的政治局委员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被曾经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L·V·尼科拉耶夫暗杀后，在列宁格勒进行了逮捕。据说1934年12月1日那天晚上，斯大林、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曾乘夜车前往列宁格勒。由于这是1918年以来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第一次成为暗杀目标，而且第一次有一个人遭到了暗杀，同时由于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病态的恐惧心理稍为有所了解，我预感到这个政权将要出现新的情况。暗杀案发生几天后，第一个官方文告宣布处决一百零三名波兰白卫军，虽然他们已被监禁多年，显然同基洛夫暗杀案毫无关系。处决的公布无疑是想警告别人不要采用暴力行动。我们在外侨区，消息闭塞，对暗杀动机只能作各种猜

测。一位奥地利记者发表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杀害基洛夫的子弹来自左的方面，即来自急进派，因为他们对于布尔什维克体制的日趋保守感到怨恨，渴望恢复比较革命的政党的面貌。尽管清洗的第一批牺牲者有些人曾是托洛茨基分子，有些人在理论上比斯大林要左一些；但是，后来的发展不能证明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

要说当时外侨区就有人眞正怀疑斯大林是基洛夫暗杀案的幕后人，象现在普遍地认为的那样，那是夸大其词。基洛夫在党內是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一向以忠于这位独裁者著称。然而，我可以说，一开头我就对官方所说存在着一个"反革命恐怖集团"的报道表示怀疑。我甚至指出，那个被苏联当局断定为与列宁格勒恐怖分子持有同样宗旨的拉脱维亚俄国眞理兄弟会是由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组织的，这当然是暗示官方参与了基洛夫暗杀案。

我们还有另一条足以说明秘密警察和暗杀有牵连的线索，提供情报的是在莫斯科住了四十年的立陶宛驻苏联公使尤尔吉斯·巴尔特鲁赛季斯博士。他是第一流的俄语诗人，因为他用俄语写作，许多俄国人并不知道他是立陶宛人。布利特和巴尔特鲁赛季斯博士颇为知己，觉得他的情报是可靠的。

巴尔特鲁赛季斯博士把大逮捕说成与桃色的阴谋有关，这多少有些异想天开，但他是首先报告逮捕的实际规模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他告诉布利特，在列宁格勒"任何一个对苏联政府稍有不满的人"无不遭到逮捕。他估计从这城市流放出去的有二万一千人。我们在4月间得到的情报说是七千人。

这是基洛夫暗杀案发生后不到五个月的估计。谁也料想不到逮捕、流放和处决的人数最后会达到九百万到一千万之数——这个数字现在已得到普遍公认。清洗中令人最难以理解的一个特点是向军事领导人下手。主要的元帅和将军被秘密处决了。据估计，在希特勒不断加强的军事力量威胁苏联之际，至少有一万名军衔为上校或上校以上的将校被斯大林处决或者关进集中营。

正如我回到莫斯科以前所听说的，清洗遍及各处。甚至我的寓所也遭波及。我作为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兼领事，在莫哈瓦耶大楼享有四个房间作为寓所，室内配备着式样新颖的漆有胡桃木颜色的金属家具。房间虽然不大，按俄国标准却足够我们通过外交部雇用两名仆人。我们确信无疑，这两个人都负有按期向秘密警察汇报我们的活动的使命。女厨师克劳佳是来自喀山的鞑靼人，健壮、饶舌，是少数对清洗无所畏惧的俄国人中的一个。她每天从市场回来，往往把有关逮捕、流放的道听途说告诉我们。矮小、整洁而又秀丽的女仆索尼娅是伏尔加流域的日耳曼人，终日惴惴地担心被捕。她对我们绝口不谈任何事情。（她和其他伏尔加流域的日耳曼人一样，在德国进攻俄国时被捕，从此下落不明。） 44

秘密警察至少有两次闯进莫哈瓦耶大楼逮捕苏联公民，两次都是在秘密警察离开后我们才发觉的。一次是因为水淌进了大使馆的房间我们才知道有人被捕。楼上房间住的是和蔼可亲的老布尔什维克新闻记者帕维尔·L·米海尔斯基，他用拉宾斯基这个笔名为《消息报》撰写有关美国的文章。他异常熟悉美国和美国的风俗、人民和制度，虽然受苏联的意识

形态和政治目的的限制，持论还是公允的。我们上楼去他的房间，发现房门已被“恩克夫德”上了封条。我们的行政官员安格斯·I·沃德撕去封条，进入房间。原来是水龙头冻裂引起漏水。我们在制止漏水以后环顾室内，米海尔斯基的大批藏书乱七八糟地扔在地板上，许多书页已被撕去。衣服和其他东西也凌乱不堪。显而易见，警察为了觅取罪证，曾进行严密的搜查，时间估计总在半夜至拂晓之间。米海尔斯基被用车装走。我们将“恩克夫德”的封条送往外交部，说明必须进入房间的理由。外交部的反应是惊恐万状，他们不相信竟然有人敢撕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封条，但并没有对我们采取什么行动。米海尔斯基从此音信杳然，不难设想，他大概是被枪毙了。

另一次是因为我们发觉有人从前苏联礼宾司司长德米特里·T·弗洛林斯基的房间搬走家具。我们听说他被委派看管妇女集中营。由于他曾因犯鸡奸罪被捕，这种说法似不可信。

每次逮捕之后的严峻气氛未能阻挡我前往外交部交涉，要求占用这些房间，这样做似乎有点贪得无餍，但我们迫切需要增加住房面积。

清洗使大使馆的业务冷落下来，因为我们发觉大使馆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接替布利特的约瑟夫·E·戴维斯甚至使情况更加恶化。他来到苏联时，连苏维埃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最基本的东西都十分愚昧无知。也许是念念不忘布利特的失败教训，他决定保持一种极端乐观的态度。除了两国的争端外，他一切按照苏联的方针行事。他对清洗甚至缺

45

乏最起码的理解，竟然对于苏联官方发表的存在一个叛国阴谋集团的说法深信不疑。而且，他和他的夫人把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当作受雇的仆役看待，很少听取他们的意见。

大使馆大多数人员是好的，就是戴维斯不配领导。因为没有参赞，由主持过贸易协定谈判的一等秘书亨德森主管大使馆业务。不久，亚历山大·柯克接替了他。柯克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使我深受教益。瘦小、沉着的斯图尔特·格鲁蒙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起初对苏联的看法有些天真，他是二等秘书，接替凯南而主要担任政治汇报工作。三等秘书诺里斯·奇普曼是报道经济发展的。留着山羊胡子的生气勃勃的安格斯·沃德对亚洲问题很感兴趣，是领事科科长，负责处理签证、护照和其他行政事务。首席陆军武官菲利普·R·费蒙维尔上校是大使馆全体人员中的薄弱环节，他个儿瘦长，脸色红润，头上有一圈白发，具有鲜明的亲苏倾向。奇普曼、费蒙维尔和我是大使馆仅有的三个精通俄语的官员。

清洗使大使馆的主要任务之一——通过同苏联老百姓和官员的接触以改善两国关系——陷于停顿。我迫切希望访问在上次任期结交的几位朋友，但立即为大使馆的其他馆员劝阻。他们指出，外国人想同一个苏联老百姓接触的任何尝试都等于是签署一项使他遭受逮捕(如果不是处死)的命令。我也不敢打听格奥尔格·安德列伊钦的下落，这位国际旅行社的官员曾在1934年给我很多帮助。安德列伊钦已于1935年1月被捕，那是他在我的住所同我共进午餐的隔天或稍后一两天。

恰巧在我到达莫斯科之前，副外交人民委员列夫·加拉

罕也被列入了处决的名单。以布尔什维克运动的花花公子闻名的加拉罕相貌英俊，衣饰讲究，在妇女中间是个红人。我是在1934年认识他的。我比较熟悉的另一位牺牲者鲍里斯·施泰格尔是相当有名的桥牌手，他经常周旋于外交使团之间，到处玩牌赴宴。我始终猜不透他和克里姆林宫什么人相熟，但曾有一段时间他显然颇得权威人士的青睐。他是一位健谈家，他那愤世嫉俗、喜爱嘲讽的脾气常把外交使团的成员逗乐。即使他一定知道自己是即将被清洗的对象，他也不能放过开玩笑的机会。听说一天晚上他在宴会后走出大门到了街上，揉了揉后脑勺说，"在这种气候里，谁也无法过分当心他自己的后脑勺。"在苏联，执行死刑最常用的办法是用手枪给后脑勺一枪。他是1937年12月被处决的一批人中的一个。

46

一天晚上，首任苏联驻美大使亚历山大·A·特罗扬诺夫斯基偕同妻子到斯巴索大厦来赴宴。1938年6月戴维斯离任后柯克充任代办。当时几位美国医生正在莫斯科访问，柯克按照一般的礼节，发出请柬。特罗扬诺夫斯基为什么光临，我不清楚。他一定是得到政府批准的，但在那些日子里，即使如此，也难保太平无事。我极少经历过这样难受的场面。原来文雅温和的特罗扬诺夫斯基和他的妻子都患了神经震荡症，几乎达到惊恐的程度，美国医生认为他们早就该送进医院。当有人向他们提出问题时，他们蓦然一惊，吞吞吐吐地回答两句，随即陷于沉默。夫妇两人都害怕得要死。由于托洛茨基的关系，他们正在受到审查。这一点他们自己知道，但我们是后来才听说的。尽管特罗扬诺夫斯基夫妇恐惧万状，他们却沒有被捕。

甚至在 1934 年显得很坦率和友好的俄国人，这时在街上也回避同外国人有任何接触。一次，我的妻子看到一家商店里挤满了人。她曾听说，因为莫斯科商品奇缺，俄国人即使不清楚商店里正在出售何物，也会排起队来鹄候购买。如果买到的东西并非所需或非所好，就常常会转卖出去（也许为了赚钱）或和人交换别的东西。这一天，正在出售上等亚麻桌布，我的妻子决定买几块。可是，两个妇女注意到她的美国毛皮大衣（苏联最好的毛皮都运销国外）和她的美国口音，赶紧退避三舍，离开行列，无疑是害怕被人看见和一个外国人紧挨着。

由于外国人往往见不到苏联领导人，我的政治汇报工作相当清闲。回莫斯科半个月后，我才获得一次机会，看到苏联官员是怎样为了向斯大林表示忠诚而献媚邀宠的。事情发生在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我从外交使团的旁听席上仔细端详了苏联的领导人。三年前，斯大林检阅游行时，我隔着一段距离曾看见过他。现在他明显地比以前苍老，脸上皱纹增多，头发也变成灰白。他显出疲劳的神色，而在八天的会议期间，有时更显出一副劳累过度的模样。这个情况是以前没有人报道过的。

47

列宁格勒领导人安德烈·A·日丹诺夫几乎一直坐在独裁者身边，看来是得宠的，至少暂时是这样。伏罗希洛夫近乎滑稽可笑地竭力巴结斯大林，他不断挪动座位，以便挨近斯大林，并力图吸引斯大林跟他谈话。一个名叫尼基塔·S·赫鲁晓夫的圆脸矮胖子，老是笑嘻嘻地咧着嘴，他同样紧紧缠住斯大林。我在送往国务院的备忘录里写道，赫鲁晓夫的“拍马

屁的劲头还不象伏罗希洛夫那样露骨”。这是我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到赫鲁晓夫。

一些大使馆，例如希腊大使馆，因为它们的国家有相当数量的公民住在苏联，曾花了大量的精力来保护这些公民免遭清洗。这种事情我们只遇到一次。一天，我们从一位美国旅行者那里获悉，一对名叫鲁宾逊的夫妇在他们住的旅馆里突然失踪。经过在旅馆进行调查，得到三种说法：一是鲁宾逊外出旅行；二是鲁宾逊夫人在医院里；三是鲁宾逊本人住院，而且是呆在铁肺里。我们一再询问外交部，未获任何答复。最后，外交部才告诉我们，鲁宾逊因犯有反对苏联政府的罪行已经被捕，他的妻子作为这些罪行的从犯正在被拘留审查。当然，我们报告了国务院。国务院经过核对，通知我们说，鲁宾逊的真姓是鲁宾斯，他并非美国公民，是用冒领的护照在外面旅行的。虽然这个通知改变了案件的法律性质，但它并未减弱我们争取释放鲁宾斯夫妇的努力。经过好几个月的争论，苏联当局终于承认，鲁宾斯已被处决，但说他的妻子将被释放。后来，她果然获得了释放。

关于清洗，我的首要任务是观察 1938 年 3 月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公开大审讯。*

---

* 1936 年 8 月第一次公开审讯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供认有罪，和其他十四人同被处决。按照在后来的几次审讯中确定的一种格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指控阴谋颠覆苏联政府、谋杀斯大林和破坏苏联经济。除这些罪状外，在随后的二次审讯中，被告还被指控替德国和日本进行间谍活动。在 1937 年 1 月的第二次审判中，Y·L·皮达科夫（列宁的同事，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工业方面的执行人，曾要求判处季诺维也夫死刑）、卡尔·拉狄克（记者、布尔什维克第二流重要人物）和 G·Y·索科尼科夫（列宁的首届政治局委员）以及其他十四人被宣告有罪。其中大多数人被枪决。

第三次审讯中的主要被告是布尔什维克元老之一、早期的政治局委员尼古拉·I·布哈林。其他重要被告为A·I·李科夫和G·G·雅戈达；前者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也是政治局最早的委员之一，后者在前两次公开审讯时为"恩克夫德"头头，因缺乏干劲被撤职。 48

从审讯第二天开始，我作为戴维斯大使的翻译，每次开庭我都在场。审讯在圆柱大厅里进行，大厅的圆顶天花板垂挂着枝形吊灯。这个大厅以前是莫斯科的贵族俱乐部，临时改作审讯室。十月革命以后，这幢建筑物通常是工会举行会议的地方。我们必须向三道门岗出示证件，才能进入审讯室。

审讯室里大约有二百五十到三百个旁听者。旁听席分成两区，摆着有软垫的长凳。我们在专为大使和他们的翻译而设的旁听席就座。工人、政府官员和其他俄国公民坐在普通区，他们是经过精心挑选来观看审讯的，而且每天都要更换。旁听席前摆着一张桌子，那里坐着三名军事法官。在他们的右方，有一张小桌子是为检察官安德烈·Y·维辛斯基而设的，另一张小桌子是为三名不愿放弃辩护权利的被告的律师而设的。在法官左方，二十一名被告坐在仿佛象美国的陪审官席那样的囚犯席里，四角各有一名头戴蓝制帽、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的"恩克夫德"士兵警卫着。这些卫兵似乎几分钟就调换一次。士兵的不断走动所给人的印象是，审讯是在寒光四射的刺刀背后进行的。那三名法官只起陪审官的作用。

根据上两次的审讯，我们知道苏联报纸将发表纪录全文，所以我只给戴维斯大使当翻译(在审讯进行中，我可以对他低声耳语)，不做正式笔记。开庭时间分上下午，有几次下午四

点钟开庭，一直继续到翌日凌晨，甚至一直到早晨五、六点钟。

检察官维辛斯基是布尔什维主义最讨厌的产物之一。他原先是反对派孟什维克分子，写过一篇关于革命初期布尔什维克暴行的文章。他大量的残忍行径究其根源是想替他过去的反布尔什维克言行赎罪。他瘦瘦的中等身材，头上留着稀稀拉拉的略带红色的头发，蓄着上髭，尖鼻子上架着一副钢框49眼镜。他具有雄辩、尤其是谩骂的本领，非常聪明。如果有谁象我那样亲眼看到他残酷无情地追问、嘲弄和挖苦被告，谁就永远忘不掉他那侦探般的特征。几年后，有一次我偶然对维辛斯基谈到那次审讯时我也在场。他象戏院老板问起舞台布景那样问我，“你看来觉得怎样？”我说那次审讯有许多地方令人费解。他仿佛因他的表演在观众中产生效果而感到高兴。

审讯不过是为司法工作装点门面的。它对报纸和公众是公开的。被告有辩护的权利，但只有三个人利用了这种权利。被告律师在诉讼过程中不起什么作用。他们丝毫也不想对证据提出异议或反驳那些指控。我记不起在整个审讯期间被告和他们的律师有过任何商量。辩护一结束，律师就都承认被告有罪，只要求法庭给予无产阶级的宽恕。被告有诘问证人的机会，布哈林特别运用了这项权利。

1934 年夏，我曾会见过主要的被告布哈林，因此对他格外注意。他显得较为消瘦、苍白，但和当年并无显著不同。我坐在那里，回想四年前的那次宴会。看来他仍然象过去一样，是个高傲地相信自己事业的温雅学者。他谅必为那些分裂布尔什维克运动的事件深感痛苦，但即使这样，他也丝毫没有流露出忧伤的情感。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他完全镇定自若，没有

明显的内心激动和慌乱的迹象。所有二十一名被告总的说来确实都是这样沉着的。有几个被告，尤其是李科夫，仿佛象是正在扮演特别难演的角色的莫斯科第一艺术剧院的演员。

审讯中有许多怪诞的插曲。有一个证人作证说，原来的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为了想杀害他的继任叶若夫，在他离开"恩克夫德"大楼的前一天，站在椅子和沙发上往墙上喷洒有毒的溶液。更加令人吃惊的是，三个著名医生组成的委员会接着提出的一分报告断定，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使人致死，并且指出，如果未能及时发觉，它将招致叶若夫同志的死亡。他们说，正因为这样，叶若夫的健康已经受到损害。报告提到叶若夫健康不佳，清楚地暗示叶若夫也将同样成为清洗的牺牲 50 者。果然，不出几个月，他就垮台了。*

雅戈达有一分令人难以置信的供词，叙述1936年谋杀高尔基的事件怎样一直被隐瞒了下来。雅戈达说，这位老人被灌醉后放在一堆熊熊的篝火边上烤火，结果是前胸烤得过热，后背冰凉。据医生说，这样的冷热悬殊足以引起严重的肺炎，而这位伟大作家就是被肺炎夺去了生命的。

我们可以肯定，为了获得口供，曾经使用了暴力、威吓或许愿，至于对哪个被告使用过哪种手段，则不能确定。一次，

---

* 我们仿效在莫斯科的新闻记者行之多年的办法来证实叶若夫的撤职——核对五一和十月革命节展示的标语和图片。在这些节日，大使馆的每一个人在乘车或步行时无不密切注意观察标语和图片，把发现的情况回馆提出报告。大使馆人员的妻子有较多的空闲时间，因此更加孜孜不倦地用这办法去收集情报。在游行的日子，我们常常在俯瞰红场的大使馆大楼举行聚会，从办公室里舒舒服服地观察标语牌。新闻记者十分重视观察标语牌的办法，但大使馆始终认为这至多只能用来补充比较严肃的汇报方式。

当维辛斯基审问雅戈达，问到高尔基的儿子的死亡问题时，雅戈达悲伤地瞧着维辛斯基，轻轻地说，"我奉劝检察官公民不要在这方面追问得太远了。"维辛斯基马上转到别的题目上去。哪一点痛处被触动了，雅戈达和维辛斯基之间的默契又是在哪一方面被破坏了，我们将永远得不到答案。

在我没有去旁听的第一天审讯中，被告之一、曾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尼古拉·N·克列斯京斯基突然宣布他的口供是假的，是在威胁和讹诈下编造的，这使整个法庭为之愕然。我相信，这是任何被告推翻口供的第一次。克列斯京斯基翻供的原因只能加以猜测。我认为最可信的一种看法是，克列斯京斯基在被长期监禁后，断定党的高级官员对案情发展并无所知，为了促使他们注意事实真相，最好的办法是在公开的法庭上翻供。维辛斯基一口咬定克列斯京斯基已经在口供上签字，并且质问他说，如果原先签过字的口供可以不足为凭，他的翻供又怎能叫人相信呢。第二次开庭时一开始我就在场，当时克列斯京斯基要求法官准许他发表一个自愿声明。他说，他无法解释上一天他突然精神错乱的原因，他错误地推翻供词也许是因为发觉自己坐在犯有一系列叛国叛党严重罪行的被告席上而感到震惊的缘故。他再度承认了罪行。这是极端无力的解释，但它消除了怀疑，使人们觉得克列斯京斯基在上一天的翻供不可能是官方授意的。

51

3月13日凌晨四点钟，在强烈的弧光灯下，法官瓦西里·乌尔里奇将军，活象一头到处乱咬的猪猡，宣读死刑判词。他带着明显的兴致勃勃的神情，抑扬顿挫地念着被告姓名，接着在十八个案件里重复使用"枪决，枪决，枪决"这句话。全部

判词的宣读超过一个小时，当念到最后一个"枪决"时，我觉得我的天灵盖也炸开了。在此后将近一个月里，我转侧卧榻，不得安睡。被处决的十八个人中包括布哈林、李科夫、克列斯京斯基和雅戈达，其他三名被告判处十五至二十五年徒刑。

1938年秋，随着拉甫连季·P·贝利亚出任内务人民委员，逮捕有所缓和，到了1939年，恐怖时期告一段落。正如贝利亚后来的行动所表明的那样，这幷非由于他为人稳健，而只是因为斯大林断定清洗已经够彻底的了。对叛国和反苏罪行的逮捕则继续不断；事实上，自1917年11月开始，此类逮捕从未中止。但以铲除斯大林的一切潜在反对者为目标的有组织政治运动则已告结束。

布哈林-李科夫审讯庭上证词的每一点都成了大使馆讨论不休的话题。我们推测他们发动清洗的原因，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斯大林是否发疯了，他的头脑里是否还有别的阴险计划，起诉的罪行究竟有多少真实性，等等。

戴维斯大使幷非以深刻理解苏维埃制度著称，但他有着一种不幸的倾向，把审讯中表面上的现象看作是无疑的和绝对可信的。每逢想起他给国务院拍发的一些有关审讯的电报，我至今感到脸红。例如他对克列斯京斯基的评论。他认为克列斯京斯基第二天重新认罪时所讲的一套话是真实可信的。他侈谈诉讼程序的"尊严"，幷且说，"人们对第一次开庭的自然反应是，如果罪行确凿，那就看到了一幅把最恶劣的人类本性暴露无遗的可怕和卑鄙的图景。"他从一开始就认定被告有罪。

在审讯的一次间歇时间，戴维斯傲慢地询问《每日电讯

52 报》英国记者艾尔弗雷德·乔勒顿对审判的意见。乔勒顿回答说，看来苏联采取的行动只是痉挛病发作的结果，尤以最近这次最为猛烈。我记得当时谈话的情况。戴维斯说，"不，不，我是十分认真的。我愿意听取你对审讯的意见。"乔勒顿捻着胡子，用批评的眼神瞧着戴维斯说，"大使先生，除掉那些事实，我什么都相信。"戴维斯始终没有懂得乔勒顿开这句玩笑的真实意义。

审讯刚刚结束，戴维斯就向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赫尔打报告，他说，虽然他对受审的三名医生是否有罪还不敢肯定，但对于十八名政治犯，却有许多确凿的事实足以"证明他们曾阴谋推翻苏联现政府，并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颠覆苏联，因此根据苏联法律，被告犯有叛国之罪"。不过，关于戴维斯，也要说句公道话，他也曾为被告的权利缺乏保护而表示震惊。

我没有机会同戴维斯讨论他对审讯的看法。我还是个下级官员，他并没有征询我的意见。我只能猜测他打报告的动机。他殷切希望亲苏路线获得成功，同时，大概也反映了罗斯福的某些顾问想要提高总统在国内的政治地位的打算。我不敢肯定。我并不是说大使馆的其他人员对审讯的情况有深入的了解。除了陆军武官费蒙维尔以外，我们都对审讯抱有怀疑，可是又苦于缺乏怀疑的根据。

斯大林通过审讯企图达到什么目的，有几点我们是清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推卸他自己和仍然当权的追随者由于五年计划失败，未能大大增加消费品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应负的责任。尽管失败的原因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到解释，那就是很不现实的高指标，但在审讯中却归咎于怠工破坏和

故意玩忽职守。就布哈林来说，就有一系列关于如何破坏运往莫斯科市场的鸡蛋和蔬菜的供词。在其人民容易天眞地轻信的国家里，此类口供听起来或许不会象我们美国人这样感到荒唐无稽。

斯大林企图通过审讯达到的第二个目的，是想表明被告们因为斯大林坚决执行了他们所反对的各项计划并取得成功而愤怒欲狂。这项策略的第三个目的是要表明间谍活动的危害。随着审讯工作的进展，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他们企图利用布尔什维克的传统神话，借以证明苏联人民正在被可怕的敌人包围着，这些敌人仇恨苏联的种种成就，千方百计想加以破坏。这些审讯明确地告诫俄国人不要同外国人往来。 53

总之，审讯的主要目的是毁坏反对斯大林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无法策动任何反对斯大林的活动。

斯大林的这些目的昭然若揭，但我在法庭上眞假莫辨，而且对于斯大林使用恐怖手段的更深的动机也难以下肯定的结论。事实上，在我将近四十年的外交经历中，唯一无法完成的文件就是一篇关于审讯的分析报告。我深信审讯是一种诬陷，但我无法加以证明；我只能暗示审讯与眞实情况毫无共同之处。尽管我竭尽所能，努力了一个多月，我还是提供不出任何一个有说服力的实例。审讯的过程逐字逐句都公布了，你却无法断定孰眞孰假。永远不可能断定某个声明或某个事件纯粹是捏造的，还是同背后的事实有几分近似之处。总的来说，我认为那些策划和从事审讯的人在每个案件中都试图从某件眞事着手，然后将它渲染扩大到面目全非的程度，以构成被告的罪状。比如，在三个被告相互交换意见的一次聚会上，可能

对斯大林作了一些批评，这就会被说成是企图暗害斯大林的阴谋活动。

布哈林增加了我的混乱，使我更加怀疑这里面有问题。他一般地供认有罪，可是否认具体的罪行。他最后的供词里有几段看来是在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隐晦曲折地控诉斯大林。他谈到心灵的二重性，这无疑是暗示他的话中有话。他还谈到他在监禁期间曾仔细地想过他必须为之而牺牲的事情，并补充说，“一片漆黑的空虚异常清楚地突然出现在你眼前。如果一个人想要毫不后悔地死去，那就没有什么值得为之牺牲的事情。相反，在苏联社会中每一种闪耀着光辉的积极因素给人们的心灵带来新的境界。”表面上，布哈林是在讲他因为对党不忠，已经没有回旋余地，必须忏悔他的罪过。然而，对于熟悉布哈林的风格的人来说，他讲的完全是两码事。“黑暗的空虚”是指斯大林对布尔什维克理想的歪曲解释、暴政和清洗。他的忏悔是表示寄希望于苏联非斯大林的“积极因素”。用这种隐蔽的方式进行抨击，不仅符合布哈林的风格，而且也合乎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54

关于斯大林的更深的动机，任何一种推测我都不以为然。有人说斯大林疯了。我找不到证据足以断定他患了通常所说的神经错乱，虽然一个人把几百万人毫无意义地置于死地，他一定总有点失常。铲除那些可能推翻他的反对者，这似乎是最有道理的推测，但我不能理解斯大林为什么要选择苏联正受德、日两国威胁之际破坏他所建立的官僚机构，消灭红军的领导干部。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认为，斯大林清洗苏联上层人

物中的共产主义忠实信徒，是为了防备有人背叛甚至在他当时看来也是为拯救苏联这个体制所必需的政策。我并不认为斯大林眞正预见到要和纳粹德国做交易，但他经过通盘的考虑，一定认为苏联政府可能要被迫去做一些势必为眞正的布尔什维克所反对的安排，以保卫这个政权。斯大林大概并没有忘却 1918 年布尔什维克左派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激烈反对，因为根据条约，俄国放弃了三分之一的人民以换取同德国的和平。如果斯大林不得不同纳粹德国作交易，他的反对者势必在数量上比当年要大得多，这也是无需太大的想象力就可以预见到的。

由于事后考察的便利和各种证据的积累，特别是有了 1956 年赫鲁晓夫在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清洗审讯纯粹是罗织罪状，出于虚构的；审讯不仅是斯大林布置的，而且是他指挥的；他们对被告施加巨大压力，迫使其签署假口供（布哈林供认罪行，显然是为了拯救他年轻的妻子和儿子）。可是，时至今日，我们还是无法肯定斯大林的基本的动机。

清洗的后果依然阴森森地浮现于俄国。随着岁月的消逝，有些（决非全部）恐怖事件被揭露出来，但对于揭露出来的事情往往只是轻描淡写。不过，许多俄国人对清洗记忆犹新，千百万曾在集中营苦度年月的人，以及成千上万被处决的人的孩子们尤其如此。今天在苏联有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大都是家里有人曾经成了清洗对象的，这就不足为奇了。

55

此外，清洗还有其间接的影响。有一种见解认为，那些继承了权力的人没有被清洗的人那样能干，这话是有点道理的。

几乎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领袖——例如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有渊博的学识。他们是他们挺身起来反抗的西欧文化的产物;然而,他们是西欧文化的儿女。斯大林是唯一在俄国土生土长的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他是格鲁吉亚人，虽然他所受的教育就其范围来说,是属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但与西方基督教文化重视通达人情这一点甚少关联。革命将许多倾向西方的上层和中层阶级逐出了俄国。斯大林的清洗几乎将共产党内继承列宁传统的、具有西方文化基础的知识分子消灭殆尽。目前莫斯科政权几乎百分之百地扎根于俄罗斯传统，这种传统在对待人和社会的态度上有很多方面与基督教的西欧传统截然不同。其直接后果之一是继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的才智急遽下降。固然,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具有优秀的头脑,但他基本上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执政的时间很短。至于赫鲁晓夫,尽管他的有些政策值得赞赏,也不能被认为是个有教养或者有文化的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阿列克谢・柯西金更是等而下之,自不待言。毫无疑问,俄国迟早会出现优秀的领导人;不幸的是清洗消灭了继斯大林之后最适宜于管理苏联的人。结果俄国受到了损失。

第四章　挫折的一年

56

1938年夏，我的任务扩大了。戴维斯调到布鲁塞尔任职，亚历山大·柯克作为代办，负责领导大使馆。这些调动使我这个比较擅长俄语的官员负责撰写政治报告的任务，正当苏联对希特勒的态度处于决定性的时刻，这个任务可谓责任重大。斯大林面临两种选择：他可以联合英国和法国，采取集体安全措施以反对德国，或者他可以寻求与希特勒和解，以保护苏联的西部边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力图探索斯大林意图的趋向。

戴维斯离任后，我工作起来比较容易一些。戴维斯不大信赖僚属的判断，而更多地依靠美国报纸的意见。他花费时间去讨好美国驻莫斯科的新闻记者。他给华盛顿的报告一味表示乐观，从而使我国政府产生误解。他的报告尽管也曾提供许多情报和精明的见解，几乎总是相当肤浅，有严重的偏向。

随着柯克担任领导，大使馆的工作重新作了安排，我们能够定下心来从事日常比较重要的工作。我是一个在政治报告方面未经特殊训练而又比较低级的官员，需要有人指导。柯克曾在许多部门任职，在工作的监督上相当严厉，但也懂得青年人的缺点。他坚持认为工作必须刻苦，并十分耐心地指出报告草稿中的每一个缺点。他谈吐锋利而幽默，并经常使用

这样的语言。我非常感激他领导大使馆那一年给予我的明智的指导。

在1938年，想从莫斯科作出准确的报告是极为困难的。57 苏联政府对于它在内政外交上的做法一直是保密的。苏联官员照例都绝口不谈他们的政府可能做什么或者不可能做什么。在发生重大事件以后，莫斯科也和西方国家的首都不同，从不公布情况介绍，使外国观察家丝毫不知道作出一项决定的理由。此外，共产党政权还控制了所有舆论工具，如报刊、杂志和广播等。到了清洗终止的1938年，上述情况更是变本加厉。实际上，我们同无论是官方或民间的俄国人已无任何接触，因此不可能通过交谈来证实我们对于自己苦心地从报纸上收集到的苏联政策的看法。除了极为难遇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以及外交使团人员内部的闲聊和情报外，官方的报纸和无线电广播成了新闻的唯一来源。

必须记得当年美国的情报机构是简单的。当时还没有从事搜集秘密情报、监听无线电广播、利用侦察飞机和人造卫星拍摄照片、派遣特务潜入外国的中央情报局。华盛顿几乎完全依靠驻莫斯科大使馆提供情报。大使馆从柯克以下的每一个人自然无不很机警地搜集一切可能搜集的情报。在主要负责搜集情报的大使馆人员中，除我以外，只有以费蒙维尔上校为首的陆军武官，而他并无多大助益，因为他对苏联政权的所作所为几乎无不赞同。在大使馆全体人员会议（当时此类会议在美国其他驻外使团还比较少见）上，他常常断然地为清洗辩护，坚持认为苏联政权从红军中清除的是卖国贼和人民公敌，所以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军队。费蒙维尔对戴维斯大使

有很大影响，他们的思想或多或少有共同之处。1918—1919年，费蒙维尔曾在西伯利亚目睹布尔什维克在人民一定程度的支持下进行战斗，从而对作为一个国家的俄罗斯及其新统治者产生了深刻的同情。我相信，从“共产党”这个词的任何一种意义来看，费蒙维尔都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他甚至沒有逢场作戏地想要参加美国共产党。他只是亲俄，在三十年代的情况下，亲俄势必迫使他站到亲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但是，我沒有花很多时间就认识到费蒙维尔的看法是不足取的。

和凯利一样，柯克认为，除非有确凿的事实或第一手资料为根据，外交报告只能是推测性的，而且是具有种种限制的。这样，柯克使我重温了我从凯利那里得来的经验。在莫斯科，58 可加利用的靠得住的情报寥若晨星，因此我的报告力求谨慎小心，避免轻率的说法。按照柯克的教导，我不愿作任何可能导致华盛顿的官员产生误解的假设或臆测。在国务院和白宫官员之间传阅的外交报告，由于过分简单，始终存在着容易引起误解的危险。柯克的指导方针之所以特别正确，是因为我们主要关心的不是苏联的实际力量，而在于判断苏联的意图——斯大林愿意与英国和法国缔结协定，还是愿意与希特勒做交易？

从1938年夏德国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种种要求而开始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我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捉摸不透斯大林的意图。那年夏天，我们发现了一些苗头，看到多年来公开竭力主张采取集体安全措施以反对法西斯的苏联，可能转到决定和希特勒妥协的立场。6月中旬，我听说布拉格的一位记者告诉在莫斯科的美国记者，德国不久将向苏联政府提

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我问德国大使馆的一位反希特勒的朋友(直到第二年，我才了解他反希特勒情绪的激烈程度)，他有什么想法。他说，鉴于希特勒对共产主义和苏联政府的“根深蒂固的个人憎恨”，这类的行动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意味深长的是，苏联外交部准许美国记者通过新闻检查发出报道说，纳粹的任何“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的这类倡议有可能获得成功，不过，倡议的目的必须不是企图破坏“民主阵线”。

在我将这情况报告国务院的第二天，即 6 月 23 日，李维诺夫在列宁格勒发表讲话，更增加了我的疑窦。我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评论说，尽管李维诺夫谴责帝国主义的这个讲话实际上并沒有什么新的内容，但它透露了这样一点，即“苏联并不把它自己看作是当今世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促使世界注意的事实是，如果苏联至今愿意与之合作的那些国家采取不符合苏联愿望的政策，即使这样一点点的合作也可能被取消”。从随后的发展来看，这个讲话可以说是李维诺夫提出的警告，预示苏联有可能同德国作交易，虽然我为了慎重起 59 见，沒有作这样的解释。毫无疑问，苏联感到了孤立，因为英国和法国拒绝了李维诺夫关于采取集体行动去先发制人地对付希特勒的建议。

到了夏末，我听到谣传，克里姆林宫在答复埃杜阿德·贝纳斯总统的要求时向捷克人保证，万一捷克遭到德国攻击，苏联将立即给予援助。事实上，9 月 1 日李维诺夫在国际联盟理事会的一次演说中表示，苏联愿意“和法国一起……采用我们可以采取的办法”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当我们研究这个声明时，柯克和我都认为这里包含的两个条件很重要。一是要

求法国联合行动，象写在苏联-捷克条约上那样。一是援助的方式是"采用我们可以采取的办法"。因为两国当时没有共同的边界，我们不相信苏联能够提供有效的援助。在这危机中间，柯克把费蒙维尔召来，要他从陆军武官的角度冷静地判断一下，如果苏联想援助捷克，它能做些什么。费蒙维尔拿了一张纸条前来复命，纸条上写道，苏联能给捷克斯洛伐克提供的全部援助只是派遣它的四十五个轰炸机中队中的两个中队，即几十架飞机。柯克惊讶地瞧着纸条说，"上校，你不是开玩笑吧，这未免太少了。"费蒙维尔回答说，"这是我认真计算后得出来的数字。"

苏联人往往引用李维诺夫在国际联盟的演说，证明他们为了拯救捷克斯洛伐克，有不惜与希特勒一战的决心。但在1938年，我没有获得可靠的情报，此后也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表明苏联曾经直率和坚定地对贝纳斯承担了义务。

虽然我在捷克危机期间关于斯大林的意图缺乏足够的情报来作出理由充分的判断，可是，我相信苏联是不准备打一场大仗的。在国内，士气不振。我们不能说斯大林在广大群众中间的声誉在清洗期间已经严重败坏。我认为，很多俄国人真正地相信斯大林揭露了一个背叛国家和十月革命的大阴谋，他是揭露和粉碎这个大阴谋的英雄。但是，生活水平是低的，人民渴望改善生活。在党内和知识分子内部，人们对于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要清楚得多，但每个人都极端害怕，不敢流露他们的感情。

尤其重要的是，高级将领在大清洗中遭受杀害的达十分之一，蒙受了很大损失，要花多年工夫才能消除它的后果。斯 60

大林是心中有数的，尽管不能肯定他是否充分了解清洗造成的损失有多大。1939—1940年冬，芬兰战争初期的挫败说明了红军受害之深。后来，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当丘吉尔和罗斯福为祝贺红军胜利而干杯时，我亲耳听到斯大林在回答时说：讲实在的，在芬兰战争中，红军毫无价值——“谁也不行”。

在1938年捷克危机问题上责怪俄国人蓄意欺骗，那是错误的，因为从苏联的政策来看，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布尔什维克把保全捷克斯洛伐克或遏制希特勒作为在俄国达到维护苏维埃制度这一主要目标的步骤，他们无疑是会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另一方面，苏联领导人对于俄国是否将陷于和希特勒孤军作战的境地，心存疑虑。英国和法国对希特勒犹豫不决、对捷克斯洛伐克则施加压力，这就更加火上浇油，加深了苏联的猜疑；伦敦和巴黎公开表示希望苏德开战，落得个两败俱伤，这也起了同样的效果。斯大林无意和希特勒单独作战。

苏联的担忧是出于这样的信念：在重大问题上，资本主义国家将抛开彼此之间的竞争而联合起来以维护它们的经济制度。所以，苏联人早在战前就认为英、法、德可能找到进攻苏联的共同理由。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想法，然而在俄国遭到德国进攻以后，这个观点仍然有人深信不疑。1943年一位俄国人对我说，他和其他许多人以为1941年英国舰队将开进波罗的海，联合纳粹进攻苏联。

9月29日，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是使苏联政府清醒过来的经验。苏联政府不仅不得与闻会议以前的一切外交行动，而且也不能参加会议，因而觉得自己遭到蔑

视。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作何感想，柯克和我在使馆里只能凭空臆测，但他们一定感到沮丧。他们对资本主义阴谋颠覆苏联历来就有一种难以排遣的恐惧心理，现在他们的这种恐惧可能达到了顶点，而这次是以纳粹德国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为依据的。10月31日，我们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表示了我们的看法，并提出了审慎的见解："克里姆林宫至少暂时倾向于等待国外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以便确定它与其他国家单方或共同关系的政策；在事态比较明朗化以前，不会在政策上采取任何明确的态度。" 61

当时，我们风闻已经成为集体安全象征的李维诺夫将被撤职。虽然我们无法核对，可是我和柯克都不太相信。我们估计李维诺夫仍将留任，因为缺乏接替他担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的人才，并且因为他并不制订政策；制订政策的是斯大林。

我们估计错了。1939年春，李维诺夫被撵走了。我们未能预见到的是，虽然英国和法国在慕尼黑会议后已经懂得，姑息希特勒是徒劳无益的，但斯大林却已经得出或即将得出不同的结论——苏联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和德国妥善相处，使苏联不致卷入战争。

慕尼黑会议以后不久，我们在大使馆注意到苏联报纸和广播电台的直接反德宣传有逐渐和缓的趋势。鉴于以前也曾出现过相当平静的时期，我们没有把这个情况报告华盛顿。虽然我仔细地研究报纸并收听许多电台的广播，大使馆却没有系统地密切注视报纸和监听电台的具体安排。直至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中止反德宣传是广泛的，是根据德苏两国政府已

经达成的协议而采取的行动，并且柏林也中止了反苏宣传。如果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秘密协定，我们对于德苏和解的可能性就会有较高的警惕。取消宣传是苏联政府一向甚至拒绝和其他国家讨论的问题，它是一种非苏联的行动，只有在极端必要的条件下才会采用。我由于未能抓住苏联政策的这个动向，至今仍然感到内疚。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由于苏联处境孤立，对美国略表友好姿态。这是我在读11月16日《消息报》的一篇社论时注意到的，那篇社论强调苏联和美国团结一致的重要意义。柯克、格鲁蒙和我在我们合写的分析报告里说，这个情况可能被用来解决某些悬而未决的分歧，例如布尔什维克当权前的借款问题，但我们警告说，"考虑到苏联领导人的历次发言，应该设想到克里姆林宫并非重视在长远的基础上和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真诚的关系，而是为了苏联政策的更直接的目标临时采取的权宜之计。"

62

这份报告在华盛顿传阅时，欧洲事务司司长莫法特批评说，报告人"仿佛认为一个国家在制订政策时，不应将希望寄托于和苏联的持久合作，而应将苏联的友好表示看作不过是应付某种国际危急局面而采取的机会主义行动"。

确实，大使馆提不出什么证据，但纳粹-苏联条约终于证实了我们的看法。

在整个冬季，我们力图探索苏联意图的明确线索而毫无结果。3月，斯大林本人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给了我们某些暗示。当时，世界各国惴惴不安地认为希特勒可能会命令他的装甲部队进攻波兰——它是纳粹威胁

的主要目标——或者接管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部分，或者进攻如瑞士、荷兰等其他一些弱小的牺牲品。斯大林这时却对那些幸而逃脱清洗劫数的党员说，苏联要同所有的国家保持和平，他们的任务是防止俄国被“惯于利用别人当猫爪子的战争挑拨者”拉入战争。他用他也许是最常用的话说，苏联决不参加“为别人火中取栗”的战争。他还谴责西方报刊关于德国觊觎乌克兰的报道，说这是企图毒化气氛和引起苏联在沒有显著理由的情况下同德国发生冲突；他对德国不是向东扩张而是转向西方和海外表示满意。代表大会照例沒有邀请外交使节列席，我们只能从《眞理报》上了解大会的情况。在以后几个月里，我们反复研究了斯大林的演说。

柯克在我协助下拍电报给国务院，就代表大会的初步反应作了扼要的报告。我们指出德国大使馆的成员很满意斯大林谈到国际形势的调子，特别是他谴责某些人挑拨两国之间战争的企图。我曾与之交谈的德国人甚至提出这样的看法：如果斯大林的意见正式提交给希特勒，苏德之间的政治情况可能随之而改善。

斯大林会不会对希特勒采取这样的行动？我们持极端谨慎的态度，认为斯大林的演说“只是根据讲演时国外形势的实际情况”来阐明苏联政策的。斯大林确实说苏联将同并不直接威胁苏联利益的任何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并指出他是把这些利益间接地同苏联边界联系起来的。我们抱着慎重的态度，得出了一个多少有点一般化的结论：“苏联无意为了捍卫别国的利益而卷入对德国的战争。” 63

斯大林发表演说后的第五天，希特勒的军队突然接管了

捷克斯洛伐克按慕尼黑协定被肢解后的剩余部分，因此我们对苏联的政策更加难以理解。苏联报纸对侵略作了一般例行的谴责，莫斯科向柏林提交了抗议照会，但在我们大使馆的人看来，苏联只是故作姿态，并非出于真心。一周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发表公报，否认苏联政府已经答应在波兰和罗马尼亚万一遭到纳粹进攻将给予援助的"谣传"。英国曾征询苏联，如果罗马尼亚受到攻击，苏联将持何态度，公报表示苏联政府一如既往，仍建议召开罗马尼亚、法国、波兰、土耳其、英国和苏联等国家的代表会议。

然而，当英国拒绝召开会议的建议，单方面向波兰和罗马尼亚提出抵御纳粹进攻的保证时，英国大使馆秘书菲茨罗伊·麦克莱恩向我吐露了他的失望情绪。麦克莱恩后来当选为议会议员，战争时期在南斯拉夫和铁托一起，功绩卓著。他认为英国政府白白送掉讨价还价的本钱，而事实上看来也是如此。内维尔·张伯伦在温斯顿·丘吉尔推动下，从对希特勒的姑息政策转变为谋求组织反对希特勒的联合阵线。但英国既然单方面对波兰（传统的"入侵"俄国的"走廊"）作出保证，张伯伦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斯大林了。在没有得到任何报答的情况下，英国实际上已对俄国提供了保证。由于这个行动，张伯伦政府丧失了一切诱引力，否则的话，这种诱引力大概会有助于使苏联相信，它的利益在于反希特勒联盟，而不在于同希特勒妥协。只有这样，斯大林才能指望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分化，并确信它们不致纠集起来进攻苏联。

事后来看，张伯伦的保证显然不是保护波兰，而是毁了这

64 个国家，并导致纳粹-苏联条约的签订。1939 年春，我们驻莫

斯科大使馆出于一贯的谨慎小心，是不会对苏联政策作出这样明确的解释的。在给华盛顿的电报里，柯克和我只指出有迹象表明苏联愿意减少苏德摩擦的可能性，并强调明摆着的情况说，“正是这种苏联对德态度的明显改变，要求我们现今必须加以注意。”我们还确实预言，斯大林将“极端谨慎地”行事。

我们之所以踌躇不决，未能迅速作出结论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掌握的不多一点的情报象往常一样自相矛盾。虽然苏联的对德政策日趋和缓，斯大林却又重新提出希望和英法两国缔结保护东欧其他国家以反对纳粹德国的条约。这次，张伯伦首相和爱德华·达拉第总理给予了积极的响应，但是提出的附带条件之多无疑将使谈判陷于漫无尽期和枝节横生的境地。现在已不难清楚地看出，斯大林采取这个行动目的在于诱发希特勒提出协商的要求。斯大林无求于英国和法国；英法两国加在一起都保证不了苏联西部边界的安全。只有同希特勒达成协议才能做到这一点。可是在 1939 年春，简直没有人能够洞察斯大林所运用的策略。

5 月 3 日，斯大林撤去李维诺夫外交人民委员之职，任命他的忠实追随者莫洛托夫(仍留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接替，甚至在这个时候，我们大使馆仍未能充分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变更是慕尼黑协定以后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行动，最终导致了苏德妥协。我们相信，调动是突然决定的，因为据英国大使威廉·西兹爵士说，宣布调动的几个小时以前，他还曾同李维诺夫谈过话，看不出他将被撤换的迹象。曾和外交人民委员部接触的其他外交使团也未发现任何可能进行

调动的暗示，尽管当时已有德国人要同俄国人接洽的谣传。

柯克和我在一封给华盛顿的审慎的电报里说，撤换李维诺夫“可能是离开集体安全原则的一步，也是走向同德国建立关系的一步”。另一方面，我们的报告又以典型的深于世故的口吻说，“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撤换李维诺夫的目的也许是想使人们、特别是英国人产生苏德即将和解的印象”，以便促使英国对苏联关于建立反纳粹联合阵线的建议迅速作出决定。这个报告还闪烁其词地说，不管撤换李维诺夫的真实原因如何，这次调动“就苏联对外关系而论，具有重大意义，它真正的趋势和征兆一俟事态进一步发展即可分晓”。

当驻法大使布利特听到有关李维诺夫的传闻时，他从巴黎打电话给我。意识到电话可能有人窃听，我们用垒球行话交谈。布利特说，他不知道他的朋友们是否会“吃鸭蛋”。我说很难知道“吃紧时出场的代击员”会干些什么。

由于缺乏具体的情报，我们并没有自认为懂得撤换李维诺夫的全部重要意义。当然，这是大使馆里纷纷推测的问题。考虑到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我们也没有忽视李维诺夫是犹太人这一事实。实际上，大使馆已经注意到，清洗的后果之一是原来担任苏联外交机关重要职务的犹太人都被排除殆尽。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明。在撤换李维诺夫之后，苏联外交机关立即全部改组。大多数的新任官员仿佛只是因为没有外交经验或从未与外交事务有任何关联才获遴选的。在我们大使馆发出的电报里提到的新任官员中有安德烈·葛罗米柯。我相信这是人们第一次在苏联外交界听到葛罗米柯的名字。在此期间，他曾到斯巴索大厦来参加午宴，我想这是

他有生第一次和外国人共餐。十分明显，作为经济学教授的葛罗米柯实际上对外交知识一窍不通。他就餐时侷促不安，显系唯恐礼节不周，有失体统。

当大使馆正在摸索苏联政策的眞实意图的时候，已经调回华盛顿的亨德逊于7月22日在他写的一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备忘录里指出，有关苏联政策的许多议论都是无知之谈。他说，他认为只要德国和波兰互相仇视，势不两立，苏联就可免除来自西方的进攻的危险；并且"由于发生这种变化，苏联对集体安全政策问题已不再抱有深刻的兴趣。同时，指出这一点也是正确的，那就是，如果苏联和英国达成协议，谈判的基础也只能是承认苏联对东欧的霸权，并使西欧的联合在长时期內无法实现"。 66

亨德逊的看法相当准确，但他忽略了另一个可能性：既然得不到来自西方盟国丝毫的援助——因为它们沒有能力援助——波兰将被击溃。我相信，斯大林在考虑应如何避免与希特勒可怕的战爭机器发生冲突时，是非常担心这样的可能性的。斯大林不久作出了最后决定。因为害怕希特勒，斯大林参与了瓜分波兰的可耻条约。我作为外交报道员，经历了第一个年头的挫折以后，终于在1939年能够十分幸运地透过莫斯科的保密浓雾，获悉苏德秘密会谈的详细情况。

第五章　来自纳粹大使馆的情报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有几项十分明智的投资，其中一项是租用莫斯科西面约十七公里的一幢别墅。它座落在通向斯大林的乡间邸宅因而我们给它起了个浑名叫“格鲁吉亚军事公路”的大道上。这是一幢油漆着浅黄色的两层楼圆木建筑物，內设卧室四间、大厅一间，并附有走廊；在走廊上可以眺望平坦田野的秀丽风光。管道系统偶尔供应热水。别墅后面是一间小厨房，地下室的一部分住着一个名叫潘捷莱蒙的奇怪的俄国人，和他同住的是他的妻子，多年来我们竟未觉察到她的存在，也永远不会知道她在这个黑黝黝的洞穴里已经呆了多久。

潘捷莱蒙大约年近六旬，是一个骨瘦如柴、留着两撇异样的小胡子的农民。他穿着传统的农民短上衣和裤子，把裤脚管塞在大靴筒里。他老是肮里肮脏，经常兴高采烈，而且令人作呕地阿谀奉承，对我们点头哈腰，用俄国人通常对绅士的称呼叫我们“老爷”。据人家传说，內战期间潘捷莱蒙曾为不好的一方效劳，打过几次仗。显然是由于农民的狡猾，他才得以保全性命，活了下来。

我们能够证明潘捷莱蒙是狡猾的。他负责照料两匹瘦马。这两匹瘦马是租用别墅的美国人以及德国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和我的朋友、英国大使馆的菲茨罗伊·麦克莱恩三

人共有的——当战争爆发时，这个合伙关系也变得有些紧张起来。在喂马用的数量很大的燕麦上，我们和潘捷莱蒙屡有争论。最后，麦克莱恩(他父亲是英国陆军上校)决定要对付潘捷莱蒙。他搞到一份英国陆军喂养现役军马饲料规定的抄件，每周只按照英国规定的数量把燕麦交给潘捷莱蒙。潘捷莱蒙默不作声，领受了指示。然而，我们很快就注意到马匹日益消瘦下去。潘捷莱蒙和麦克莱恩之间的争斗持续了两个月，前者坚持俄国马需要的燕麦要比英国马多得多，后者则争辩说事实并非如此。最后，当马匹的健康开始受到严重损害的时候，麦克莱恩宣告投降，重新交给潘捷莱蒙不受数量限制的燕麦。我们从来没有发现潘捷莱蒙是在什么地方出手变卖燕麦的。 68

在那枯燥无味的日子里，别墅是我们消遣的主要场所。要想在莫斯科寻找娱乐，那是缘木求鱼。芭蕾舞自然绚丽多采，无如演出的节目千篇一律。(我在莫斯科的岁月里，一定看了五十遍《天鹅湖》；我相信我会跳剧中的每一步。)那里有几家第一流剧院，然而所有演出的戏剧都是俄罗斯古典体裁，完全是老一套，毫无创新。电影则充斥着关于幸福的农民工人和革命的极乐世界的宣传。艾森斯坦的影片不在此例，但是这类影片极为罕见。影片《彼得大帝》、《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给予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不管怎样，电影院总是挤得满满的，空气污浊，到那里去与其说是消遣，还不如说是受罪。

旅行同样是困难重重。当时，漫长的旅途全靠火车代步；旅馆破旧简陋，饭食粗糙恶劣；向苏联当局申请到规定范围以外地区旅行，必须经过一系列繁琐手续；便于在俄国北方旅游

的时期则受到严寒和道路破败等限制。不过，我们还是设法漫游了基辅和列宁格勒。

因为终日无所事事，以及无法同任何俄国人结识，我们只好以很大一部分时间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交游。鉴于苏联的重要性，大多数国家认为派遣额外的外交人员驻苏是完全必要的，因此我们有幸和年龄不同的、聪明而有趣的同行以及新闻记者作伴。我们频频举行宴会，席间不拘礼节，妙趣横生，这在其他国家的首都是不多见的。我们联袂远足野外，打网69 球，在高尔基公园的小路上滑雪溜冰。一年四季每逢周末，我们郊外的别墅就成为聚会之所。夏季打网球，漫步森林；冬季在小山坡或野外滑雪，或者在浇水成冰的网球场上溜冰。我们经常在别墅举行宴会，有时候仆役们穿着溜冰鞋在溜冰场上穿梭滑行，传递杯盏。

德国大使馆二等秘书、通常被称为容尼·黑尔瓦特的汉斯·海因里希·黑尔瓦特·冯·比滕费尔德和他的妻子——一位异常妩媚的巴利伐亚年轻妇女——是外交使团中最负盛名的青年夫妇之一。容尼愉快的茶褐色眸子和悠闲的性格与漫画上蓝眼珠、傲慢自大的纳粹分子大不相同。他们同我们在别墅里一起消磨过许多个周末。容尼是我们共有的两匹马的主人之一，我们时常并肩齐驱，驰骋野外。

容尼和我讨论国际问题的时候，看来始终是很坦率的，但在 1939 年 5 月 16 日，当他从伊朗之行归来向我透露秘密消息时，我仍然不无惊异之感。他是随同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韦尔內·冯·舒伦堡前往德黑兰参加伊朗国王的女儿婚礼，然后独自先行回来的。他回莫斯科的第二天，我们同去别墅

骑马。当我们在花园里等候潘捷莱蒙牵马的时候，容尼告诉我，舒伦堡在德黑兰接到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亲笔信，召他返回柏林，希特勒对他将有所谘询。他说，他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突然改变计划，也不知道希特勒在外交政策上有什么特殊考虑，不过，这显然和苏联有关。他认为有"某种不寻常的事情将要发生"。我当然对此深感兴趣，因此两人一起揣测召回大使的用意何在。容尼认为，这和德国对苏政策的转变有关，至于希特勒的动机如何，他和舒伦堡一样，毫无所知。他相信他很快就能探明原因，因为舒伦堡将在第二天带着德国政府的指示返还莫斯科。应柏林的要求，苏联政府已经约定大使会见莫洛托夫和他的助手V·P·波捷姆金。

容尼还告诉我，一位陆军武官上星期被召回柏林，德国陆军部长问他，有无理由可以认为，从军事上说苏联在采取攻势方面力量比1938年9月强大，或者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陆军武官的回答是否定的。看来柏林似乎是想估计一下，万一德国进攻波兰时，苏联有无进行反击的可能性。但容尼不知道这两个情报相互之间有无关系。 70

我是一个与德国关系并不友好的国家的外交官，而且是负责政治报告工作的，容尼向我吐露机密，使我感到不可理解。从我们的交往中，我知道容尼是反对纳粹的政策的，尽管他很谨慎，从未公开讲过。在议论国际问题时，他素来是很坦率的，而且和纳粹分子不同，在辩论时向来乐意听取反对的意见。在西方国家驻莫斯科的外交使团间，他以聪明爽直著称。总之，他是一位有教养的欧洲人。

由于容尼的声誉，我倾向于认为他的话是可信的。在同刚接替柯克而新任代办的格鲁蒙对这问题进行研究磋商以后，我们发出一份由我起草的电报给国务院，报告舒伦堡的动向，并强调指出，情报的获得是“绝对机密”的。由于迫切希望了解德国的意图，并且当然还想了解克里姆林宫的反应，我同容尼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也并未使我失望。另一次在别墅会晤时，容尼告诉我，里宾特洛甫指示舒伦堡探明苏联是否有可能改善两国的关系。5月20日，我们致电华盛顿如下：

德国大使从德黑兰回柏林后，里宾特洛甫对他说(显然反映了希特勒的看法)，德国政府认为，共产主义在苏联已不复存在，共产国际在苏联对外关系中也不再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认为，德国和苏联之间已经不存在真正的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希望大使回莫斯科后，十分谨慎地向苏联政府转达德国对它并无仇视之意，并尽力查明目前苏联对德苏关系的态度。里宾特洛甫叮嘱大使，转达时务必极端审慎，因为德国同苏联接近的任何一点张扬，势必引起日本的不安，由于德日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希望不致出现这种情况。

71 大使询问，鉴于苏联和英国正在进行谈判，比较明确和直截了当的接洽是否适宜，里宾特洛甫在回答时说，德国政府对英国和苏联达成协议的前景不会感到不安，因为不能相信英国和法国会打算给予任何东欧国家以大量的或真心实意的军事援助。里宾特洛甫接着对大使说，德国愿意由苏联居间调停但泽和横越走廊〔到东普鲁士〕的汽车路问题，而且即使在和波兰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德国也无意全部占领这个国家。里宾特洛甫是口述指示的，他让大使在将上述意见提请苏联政府注意时自行决定所应采取的方式。然而，这给人的印象是，德国政府并未在行动方针上对苏联政府作任何许诺，大使是代

表柏林上层集团转达他们对这个国家〔苏联〕改变态度并保证德国同意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的。不管里宾特洛甫作相反的说明，这里却认为向苏联接洽的目的并非与苏英谈判无关。

关于上述情报，应当强调指出，给予大使的指示是一般性的，不能看作是德国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明确建议，虽然它可能是朝此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但能否朝此方向发展，取决于大使在这里会谈所获得的反应。在这方面，据说驻柏林的苏联大使馆官员、特别是参赞阿斯塔霍夫最近暗示德国外交部官员，目前苏联的外交政策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新上任的外交人民委员部新闻司司长也在这里对一位德国记者发表了同样的言论。

里宾特洛甫的指示清楚地表明，德国人正在力求与苏联和解，以排除象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在两条战线作战这一始终担心的事情。

电报结尾提出要求，对于情报的来源及其出处，务必竭尽全力严守秘密。当然，我也非常谨慎小心。我和容尼谈话时，从来不作纪录。过后，遇有机会才将具体的事实摘记在信封背面或废纸片上。一回到办公室，我就亲手拟成电文。我所以宁愿亲自动手而不采取口授拟稿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从来 72 不敢断定我们的办公室是否被人按上窃听器。这个办法时常引起一些麻烦，因为我的书法的确很难辨认，即使让我自己来看也是如此。我往往和速记员一起对着我自己龙飞凤舞的笔迹发楞。然而，回顾我在这期间草拟的电报，并未发现与事实有严重曲解或重大出入。我可以高兴地说，电报准确地记载了容尼告诉我的消息。当年，我至少有相当高明的记忆力，几乎能够逐字牢记一两天前人们对我说的话。电稿打字后就送

交格鲁蒙，他在上面签字，然后用密码通过正规的商业线路发往华盛顿。（那是最新的情报，不容通过缓慢的外交邮包。）电报按照我们当时划分的最机密的类别送到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手里。国务院里谁该看电报，纯由赫尔决定。在大使馆里大概只有三个人知道我的情报的来源，他们是8月到任的劳伦斯·斯坦哈特大使、格鲁蒙和我的妻子。我们在莫斯科倒是不太担心会泄露机密（尽管当时我们的外交密码并不周密老练），我们担心的是华盛顿有人谈论这件事情，那里是出了名的喜欢闲聊的地方。

我们不得不对驻莫斯科的英法两国外交官们守口如瓶，这多少使我们感到不安。透露情报来源，将冒极大的风险。我们听命于华盛顿的决定。结果是，赫尔在收到这一系列电报的最后一份以后，召见英法两国大使，向他们透露即将签字的纳粹-苏联条约的详细情况。

我们没有发现走漏风声，也未见任何危及容尼安全的迹象，虽然我和他的有些谈话是在德国大使馆进行的。苏联人一定做梦也没有想到任何德国人会把这样性质的情报送给一个美国人。否则，他们必将毫不迟疑地迅即转告纳粹政府，而后者也一定会断然对容尼采取严厉的措施的。

容尼告诉我，虽然意大利和德国结为同盟，对于秘密谈判，意大利大使却被蒙在鼓里。大使奥戈斯托·罗索有几年曾在华盛顿充任外交使节，并且同美国人结婚。大使夫妇在莫斯科交游广阔，曾多次邀请我们参加宴会。罗索是强烈地反法西斯和亲美的，但不幸的是，他在战后被大错而特错地贴上亲纳粹的标签，从此再也没有出任重要的政府职务。

一旦我们获悉德国订出试探计划，要与莫斯科言归于好，接踵而来的问题是，舒伦堡将怎样执行他的使命，苏联的反应如何。在舒伦堡拜会莫洛托夫和波捷姆金以后，过了几天，容尼才把情报告诉我。5 月 22 日，我用电报发出情报:

> 大使陈述他在柏林发现对于苏联的日益友好的气氛以后，询问莫洛托夫是否有可能继续进行已经搁置几个月的经济谈判。莫洛托夫在答复时表示，由于缺乏“政治基础”，他不认为有发展两国经济关系的可能性，但他要求大使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据说，大使的回答是:他作为大使，并不决定政策，对这问题提不出任何权威性的意见，但是莫洛托夫身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也许能够就苏联政府如何理解“政治基础”这一点给予确切的解释。莫洛托夫泛泛地说需要进一步加以考虑，回避作答。
>
> 大使在同波捷姆金主要属于礼节性的交谈中再次说到他相信目前有改善苏德关系的可能性。
>
> 据我所知，大使已将大体上所获得的印象报告柏林，认为莫洛托夫对于改善苏德关系这个笼统的问题故意持保留态度，莫斯科只有在得到德国政府明确的建议以后才会加以认真的考虑。因此，我们相信，能否沿着这条路线继续发展，将取决于德国政府目前是否准备向苏联政府提出明确的建议。据个人的意见，鉴于里宾特洛甫担心有可能影响日本，至少在据说眼下正在进行的德日会谈获致成果以前，德国政府不可能采取这样一个步骤。

所谓“个人的意见”自然是容尼的意见，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尽管莫洛托夫明确地暗示，为秘密妥协提出具体的建议将受到欢迎，柏林却指示舒伦堡不要采取进一步同苏联政府接洽的步骤。虽然容尼对我说过，柏林并未说明给予这种指示的理由，但他一再谈到他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也许是里宾特 74

洛甫希望避免惊动日本。

尽管德国人犹豫不决的原因不明，谈判的迁延却有助于证明黑尔瓦特情报的准确性。如果容尼向我透露情报是施展一种巧妙的手段来迷惑法国和英国，那么，他的情报就没有必要提到柏林命令停止同莫斯科接洽了。

苏联外交政策的方向，仍然是驻莫斯科的外交使团争论不休的问题。一派意见固执地认为，暗示将同德国妥协，是想对英法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态度鲜明地承担义务，以防御苏联西部的边界。而另一派则把苏联想同德国和解的苗头看得比较严重。

意见的分歧也表现在对3月21日《真理报》以半版篇幅刊登的一篇书评的反应中，见仁见智，看法各异。该书是苏联人著的，它预言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将发生战争。而《真理报》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这篇书评则注意到法英两国资产阶级政府可能通过"第二次慕尼黑"实行"叛卖"，只有在英法的人民阵线政府取代资产阶级政府以后，战争才能开始朝向苏联武装力量必然战胜法西斯德国的目标前进。苏联政府发表这篇文章的原因何在，大家都不明白。有的人认为这是用故意向同盟国接近的办法来引诱德国人上钩，有的人认为这是想试探同盟国是否会提出与苏联协作的建议。两种看法都缺乏足以支持其观点的证据。

6月间，苏德两国之间事实上在莫斯科并无活动。德国大使似乎是奉政府之命停止活动的。苏联方面却公开地放出空气，暗示即将开始与英法两国进行的谈判可能产生一项军事协定。斯大林的亲信安德烈·日丹诺夫在《真理报》的一篇

讲话中认为有可能建立一个“反侵略的强大壁垒”。这样的言论出诸于苏联决非偶然；日丹诺夫好象要迫使德国人对谈判明白表态。

在这暂时的沉默期间，我对纳粹和苏联的谈判最终能否达成协议，拿不稳主见。我从容尼那里知道，里宾特洛甫首先关心的是把日本拉入反共公约，并准备牺牲同苏联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但出现在我头脑里的另一个想法是，就我所知，舒伦堡一贯隶属的一派深信德国的前途在于同东欧而不是西欧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并力求与苏联长期实行和解。舒伦堡由于热衷于谋求妥协，越出了给予他的指示的范围。尽管他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倡议，他却仍然同莫洛托夫保持接触，并且对苏联-纳粹条约从未死心。这个条约没有被放弃，而是暂时冻结起来。

75

后来，舒伦堡在又一次回柏林述职后，在6月28日再度拜会莫洛托夫。稍过一两天，容尼为我提供情报，我于7月1日报告如下：

这位大使告诉莫洛托夫，他从柏林回来以后，能够向他保证，德国并无侵犯苏联的意图；作为证明，他指出德国报刊已经完全停止刊载一切反苏的观点和文章；对匈牙利合并鲁塞尼亚的默许也应视为德国对乌克兰并无觊觎之意的明证；此外，与巴尔干国家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则是德国毫无进攻苏联意图的又一明证。关于与巴尔干国家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莫洛托夫表示，这些条约是与第三国而并非与苏联签订的。大使因此问道，苏联政府是否有意与德国缔结类似这样的条约。莫洛托夫避不作答。于是大使说，1926年德苏之间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是仍旧存在的。对此，莫洛托夫回答说，他听到大使

的这种说法，很感兴趣，因为根据德国政府以后签订的一些条约来看，苏联政府对这苏德条约是否有效是有过某些坏疑的。大使说，如果莫洛托夫指的是德意联盟，那末，他可以担保，这丝毫不影响德苏条约。莫洛托夫于是说，废除与波兰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声明已在当前引起人们怀疑这类条约是否有价值。大使对此的回答是，波兰的情况多少有些不同，因为德国政府认为，波兰参与大不列颠的“包围”政策，事实上已经违背与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

76 接着讨论了新的贸易谈判问题，莫洛托夫对大使说，他不熟悉这项事务的细节，最好由德国商务参赞继续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阿那斯塔斯·I·〕米高扬商谈。大使临别时问道，他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即苏联愿意和所有不侵犯它利益的国家建立正常关系，而这对德国来说，也同样适用。莫洛托夫的回答是肯定的。

容尼在将这些谈话告诉我的时候还评论说，莫洛托夫在苏德关系方面仍持保留态度，但对于德国有可能提出政治性的具体建议表示了一定的兴趣。容尼由此注意到会谈有了一些进展。事实上，莫洛托夫已经明显地放弃了政治基础是改善贸易关系的先决条件这样的意见。

虽然容尼继续把苏德会谈的详情告诉我，我仍旧满腹狐疑。我捉摸不透他透露情报给我的原因，可是我没有问他，唯恐他此后闭口不谈。固然容尼和我是好朋友，我们两国可并不和睦，而且我也确实未曾投桃报李，相应地向他透露情报。最后我相信，容尼开头并不理解关于希特勒转变对苏态度的五月电报的全部重要意义，因此当纳粹开始向苏联调情的时候，他碍于我们的友情，觉得不好意思隐瞒。

容尼对他冒什么样的风险无疑是清楚的，但他毫无惊慌不安的样子。他从来不采取搞阴谋的方式，比如防止窃听电

话或窃窃私语。我们所有的讨论完全是很自然的——在我们骑马奔驰的时候，在别墅打网球的时候，或者在围坐着喝茶饮酒的时候。

7月10日，英法两国与苏联谈判互助防御条约的代表团抵达列宁格勒。他们取道水路，引起驻莫斯科各外交使团的物议，结果他们历时两个多星期方才到达。率领代表团的是一位年迈的英国海军上将和一位法国将军。英国大使馆的馆员对级别如此之低的代表团感到吃惊。它本来是应当由法国外交部长和英国外交大臣率领，以证明巴黎和伦敦对于谈判的诚意的。英法的半心半意的态度使谈判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失败的烙印。 77

在这同一天，我报告华盛顿，莫斯科的苏德关系谈判沒有进展，柏林又已指示舒伦堡不要再同苏联政府接洽。当时德国大使馆还在等待关于恢复贸易谈判的进一步指示。但是不到一个星期，容尼告诉我，苏联已定购价值五百万马克的涡轮机。他解释说，一年两个月的交货期表明莫斯科"相当信赖"对德关系未来的稳固性。同时，苏联人也告诉我们，他们将向德国厂商定购大批制造大炮用的钻床和车床，也许还要定购高射炮。华盛顿幷未忽视这些交易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国务院在一篇秘密评论中写道，如果德国人企图进攻俄国，那末，容许这样的交易将是"不可思议"的。评论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认为这些交易为关于德苏和解的情报提供了"若干內容"。

在此期间，我们仍然同英国人和法国人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但我不是被指派来进行联络的官员。由于他们严守秘密，我们从他们那里了解不到什么情况，但是根据我们所得到的

一点消息来判断，会谈显然进展得很缓慢。尽管如此，会谈仍在继续。主要的问题似乎是波兰，或者还有罗马尼亚，不愿让苏联军队在一旦发生战争时为进攻德国而轻易地和毫无阻挡地通过它们的国土。英国和法国则不愿意将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势力范围置于苏联的保护之下，也不愿意强迫——事实上它们也强迫不了——波兰人让与他们自身的权利，因为他们不无道理地认为，那样做的话就无异断送国家的独立。

由于会谈拖拖拉拉，容尼告诉我，德国大使馆的外交官相信，苏联因为怕冒激怒希特勒的风险，将不会同英国和法国签订协定。我就把这番话报告了华盛顿。

然而，当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足以说明德苏正在逐渐接近于缔结一项政治协定，同时又因为我受过凯南和柯克的精心训练，所以对此仍然心存怀疑。不到两个星期，几乎所有这些剩下的疑窦都一扫而光。8 月 5 日，容尼在别墅对我说，舒

78 伦堡在两天前拜会了莫洛托夫。他说，德国人第一次相信莫洛托夫将认真地进行谈判。

德国大使根据来自柏林的指示向莫洛托夫保证，德国并无侵略苏联的意图，也无意破坏波罗的海现状，对于苏联的一切权益，将予以尊重。莫洛托夫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并且询问所谓波罗的海是否包括苏联认为属于它的势力范围的立陶宛在内，大使给予了肯定的答复。莫洛托夫于是详尽地阐述了苏联未能信任德国的根据，把它们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存在着反共产国际公约。

二、德国在远东直接或间接地煽动日本。

三、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显然想把苏联排斥于国际生活

之外，德国拒绝出席有苏联代表参加的任何欧洲会议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舒伦堡声称反共产国际公约实际上并非针对苏联，而是针对英国的。舒伦堡的回答无疑是故弄玄虚的典型外交词令。可是，他的话多少也有些合理的根据，因为希特勒纯粹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断言斯大林政权不再是革命政权，而仅仅是一个大国的政权罢了。所以，这位元首得出结论，苏联人已不再特别热心于传播共产主义制度，并由此推断，反共产国际公约也就失去了它直接反苏的目的。由于英国已成为今天的主要敌人，伦敦才是反共产国际各国的主要目标。这样的解释是蒙骗不了俄国人的，但俄国人为了要达到他们的主要目标——拒战争于苏联国门之外——倒是乐意按表面的意义接受这番话的。

舒伦堡说，德国对发展与莫斯科的良好关系是关切的，但是，如果苏联自己和英法结为联盟，它自然应该预期要承受一份德国针对这些国家的敌意。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政府关心的是与德国关系正常化和改善两国关系。同时，莫斯科将继续推行旨在保证“眞正抵抗侵略”的政策。容尼认为，莫洛托夫明显地接受大使的保证，这说明改善苏德关系有其眞实的可能性，但由于德国过去所推行的政策，苏联猜疑的消除还需要一些时日，或许还要经过冗长而艰难的谈判。莫洛托夫谈到要继续推行旨在保证“眞正的”抵抗侵略的政策，这似乎是暗示苏联仍然在认眞考虑与英法两国签订一项条约，不过要按照苏联的条件签订。苏联和同盟国在慢吞吞地起步以后，此刻他们之间的军事联盟谈判的步子正在加快起来。 79

这时候，鉴于我们从容尼那里获得的有关纳粹-苏联谈判进展情况的消息积累很多，大使馆的上层人员——新到任的大使斯坦哈特参加了进去——已经很可以得出结论，某种重大的事件即将发生，苏德两国完全有可能达成协议。不难想象，我在此期间想从容尼·黑尔瓦特口里探听消息的心情是何等迫切。

关于斯大林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消除他对德国人的意图的猜疑，容尼的估计是错误的。不到半个月，触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桩交易的详细条款就拟定好了。关于这个条约，容尼是在 8 月 15 日德国大使馆为款待各外交使团的年轻人而举办的舞会上告诉我的。我到舞会的时间大约是十点钟，与我同往的有我的妻子和两位客人——当时已到法国充任大使的布利特的机要秘书卡梅尔·奥菲，以及我们驻英大使的儿子、未来总统的哥哥小约瑟夫·P·肯尼迪。我走进房间时，看见容尼正站在墙角，当时他告诉我，舒伦堡没有参加舞会；他得到希特勒亲自下达的极为重要的指示后，正在苏联外交部谒见莫洛托夫。容尼说他自己没有看到指示，但听说这些指示是很接近于满足苏联的要求的。他说，等舒伦堡从外交部回来，他将尽快让我知道消息。我听后万分激动。记得我当时想道，当我在德国大使馆吃着鹅肝馅饼和喝着香槟酒的时候，克里姆林宫正在发生一件大事。我用跳舞、聊天和喝酒消磨时间。我自己留神，不把酒喝得太多。为了要把情报搞到手，牢记在心，然后报告华盛顿，我必须保持头脑清醒。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舒伦堡出现了。这位温文尔雅的、眉开眼笑的东道主刚刚赢得现代外交史上最大的成就之一，然

而神态自若，不露形迹。稍过一会儿，容尼来到我面前，我们 80
走到房间的墙角坐下，共饮香槟。在跳舞音乐声中，他简略地告诉我，纳粹已经同意俄国人的意见，即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应当要有政治基础，并且提出了条约总的精神的要点。

容尼要我第二天走访德国大使馆，那时他就会掌握全部的细节。翌日下午，我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低声对我叙述舒伦堡和莫洛托夫会谈的结果。他说他将于明晨携带会谈纪录全文飞往柏林。我回到大使馆，在同斯坦哈特和格鲁蒙商量后，起草了我们发往华盛顿的电报如下：

昨晚，德国大使拜会莫洛托夫，会谈一个半小时，大使根据他的政府的指示，就德国对苏政策向莫洛托夫作了据说是出自希特勒本人的声明：

在反复申述德国政府无论如何均无侵略苏联的意图，以及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两国之间并无利害冲突之后，声明接着说：德国政府准备与苏联政府预先讨论"东欧的任何领土问题"；由于事态可能朝其他方向发展，以致有害地和不必要地影响苏德关系，德国政府认为两国之间应尽早开始认真的会谈。声明结尾说，德国政府准备派遣一位高级官员去莫斯科会商。据我了解，大使并未留下这个声明的书面备忘录，但他的讲话已由一位速记员逐字纪录。大使接着又说，希特勒要求将他声明的内容提请斯大林本人注意。

莫洛托夫在回答时首先答应立即将声明内容提请斯大林注意，然后接着说，苏联政府第一次相信德国希望改善它和苏联关系的诚意，他告诉大使，苏联政府将"欢迎"继续举行政治会谈，但必须具备能使会谈获致明确具体的成果的合理保证。作为可能达到的成果，莫洛托夫提出：(1)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2)德国方面不再直接或 81
间接地鼓励日本在远东实行侵略；(3)调整双方在波罗的海的利益。

莫洛托夫认为，在派遣一位德国特使到莫斯科这一问题获得明确解决以前，这三个问题应当在预备性会谈上进行讨论。大使拜会莫洛托夫的结果已于昨夜电告柏林，纪录全文则由德国大使馆特派信使于星期四启程送往。

容尼告诉我关于同意签订条约的情报时说，他认为里宾特洛甫很可能是纳粹方面的谈判代表，但他还拿不准，因此希望我的电报（他显然知道我将把情报汇报上去）最好不提这个名字，免得国务院误解。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现在感到很遗憾，因为被任命担任这项使命的正是里宾特洛甫。容尼说，虽然他一直认为有可能签订纳粹-苏联条约，现在却是肯定无疑的了。这个消息使他非常沮丧，因为他知道这意味着马上就要进攻波兰。他说，德国人迫切希望早日签订条约，以便他们的机动部队能够利用秋季的好天气。但是，苏联人一如既往，较为慎重，认为不宜急于派遣特使。

尽管这项消息非常重要，我还是毫不踌躇地认为黑尔瓦特的情报是准确的。我完全相信他是可以信赖的。然而，我没有能够忘记我受过的训练，在解释舒伦堡-莫洛托夫的决定时，说话稍留余地。电报的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

> 虽然现在谈论确实无疑的苏德和解也许为时过早……可以看到，在过去两个半月里，德国大使和莫洛托夫在这里的会谈已经取得了稳步的进展。而且我有一切理由可以相信，苏联政府并未结合目前的谈判，将它和德国的关系的这些发展通知法国和英国政府。

我思想上完全肯定，我们掌握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苏德秘密妥协的根据，相信波兰将成为受害者，但条约毕竟尚未签订，我自然不能在给华盛顿的电报里贸然作出结论。临时变

82

卦是常有的事。姑且撇开这样的可能性不谈，重要的事实倒是苏联宁愿选择和德国缔约，而不愿同英法结盟。

我的电报在华盛顿遭到了怀疑。国务院拟就的一份备忘录表示很难相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苏联会同意与它的死敌纳粹德国缔结一项政治性的或军事性的条约。我认为这种怀疑表明，人们过分信任苏联领导人会始终忠于他们的反法西斯观点，而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首先考虑的是维护苏维埃政权的生存。

不顾国务院某些部门能否同意，国务卿赫尔召见了英法两国大使，把我的电报摘要交给了他们。几年后，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我同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共进午餐，他说由于英国外交部密码室里有一个共产党人，他直到柏林已经宣布以后才接获华盛顿预先警告英国关于里宾特洛甫即将访问莫斯科的电报。我不知道法国是如何接到情报的，但法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由于容尼作为信使前往柏林，源源不绝的情报乃告中断。结果是，在容尼离去和里宾特洛甫于 8 月 23 日到达莫斯科这一个星期里，大使馆得不到一点消息。

苏联政府在同希特勒对立六年之后改变立场，引起了为里宾特洛甫举行的欢迎仪式的极大混乱。俄国人没有可以用来欢迎德国外交部长的现成的纳粹旗子，不得不觅之于一家拍摄反纳粹电影的电影制片厂。这是在莫斯科所能找到的带有卐字的仅有几面旗子。俄国乐队不得不急急忙忙练习《霍尔斯特·韦塞尔之歌》，在莫斯科的一个机场上同《国际歌》一起演奏。确实难以设想还有比这更加显眼的场面。里宾特洛

甫在机场上受到简单的欢迎后，立即被送到克里姆林宫举行谈判，直至第二天凌晨两点钟左右，终于签订了纳粹-苏联互不侵犯条约。

早晨，容尼来访，约我去德国大使馆同他晤谈。经过彻夜成功的谈判和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以后，里宾特洛甫正在楼上[83]酣睡。我的朋友递交给我期限十年的条约条款。他告诉我，在秘密议定书里还包括“一个全面的谅解”，根据这个“谅解”，波兰东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比萨拉比亚被承认为苏联具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范围，而波兰西部将落在德国霸权的控制之下。芬兰未被提及。秘密议定书还规定，如果苏联在德国改变德苏两国之间一些国家的疆域时提出要求，可以得到领土上的补偿。条约本身的一项条款规定，订约双方的任何一方不得参加针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这就使得苏联不能加入英法同盟，德国也不能与日本结为联盟。

当我想起容尼·黑尔瓦特在莫斯科德国大使馆里冒险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不能不感到惊讶。他一定觉得很安全，否则他决不会拿性命当儿戏，这样无所顾忌地吐露机密。不管怎样，他从未发生过任何意外，显然他和我打交道没有走漏过风声。

容尼说，谈判是斯大林亲自掌握的，他对里宾特洛甫毫不隐瞒他早就赞成苏德修好。条约签订后，他为希特勒的健康干杯，说“德国人热爱他们的元首”，并称希特勒为“莫洛杰茨”——俄国俚语“好样儿”的意思。

条约使容尼大为沮丧。他坐在他那嵌板的阴暗办公室里，清楚地预见到这意味着对波兰的战争。他告诉我，他将返

回德国，重新过军队的生活。我相信，他是按照舒伦堡大使的劝告作出这个决定的，大使认为对于具有容尼这样的思想感情的人来说，这是最保险、最稳妥的做法。

尽管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的消息已经普遍传开，英国依然恋恋不舍抱着与苏联结盟的希望，直到条约条款公布后才断了这个念头。斯坦哈特大使在条约公布前几小时致赫尔的电报里颇为伤感地提到英国大使西兹的天真无知，因为他仍然相信莫洛托夫提供的保证，说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仅仅是为了与苏联政府“谈判”，不会很快达成协议，即使可能签订协定，也决不致同苏联、英国和法国的反侵略联盟的精神背道而驰。这是苏联方面纯粹的欺骗。西兹似乎带着几分聊以解嘲的满意，认为里宾特洛甫也可能象英国人和法国人那样受到苏联人的逗弄。看到英国大使如此耳目失灵，斯坦哈特一定觉得为难并深感烦恼的。然而，我猜想他一定和我怀有同感，那就是我们不能为了把行将发生的事情预先通知英国而冒可能损害我们的情报来源的风险。 84

从随后的情报来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显然是瞒着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单独处理同纳粹的谈判的。这种严守秘密的行动说明了正在同英国和法国谈判的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元帅为什么被这消息搞得那样狼狈。英国人告诉我，通常是热情洋溢的伏罗希洛夫在通知他们说，苏联不能订约，因为与德国签订的那个条约不许可这样做的时候，显得愁眉苦脸和侷促不安。这个策略是表明斯大林精明狡猾的一个例子。显而易见，如果伏罗希洛夫相信他是遵循苏联外交政策的真正的方针办事的，他就会给人以真诚的印象。如果人家告诉他，说

他干的是一项隐蔽的计划，那末，他作为谈判者所起的效果无疑将会减弱。

现在我仍然不相信斯大林会同意与英国和法国结盟。即使再三讲也不嫌重复的是，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心目中，苏维埃政权的命运比俄国本身的命运更为重要，并且我也不相信斯大林会信赖英国和法国的意志和力量来对纳粹德国施加充分的军事压力以阻止德国进攻苏联。换句话说，当时英国和法国派遣到莫斯科的使节是否真有成功的机会，也是大可怀疑的。

实际上，正是纳粹的实力以及不同德国签订条约可能招致的后果迫使斯大林毅然迈出步子并签订条约的。他不希望希特勒占领整个波兰，也不乐意看到他的装甲师太靠近莫斯科。何况，里宾特洛甫还答应了他的几乎全部的要求，如果一切进行得很顺利，苏联保证会有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从纸面上看，苏联似乎已经取得了包括波兰东部、波罗的海国家和比萨拉比亚在内的势力范围；而就领土的意义来说，德国人除非再努力争取，实际上是一无所得。但是，德国人确实得到了他们所必不可少的东西，那就是避免腹背受敌地在两条战线作战。

固然，斯大林在争取时间的估计上犯了错误(结果是不到两年)，他总算能够在这个时期尽力改善尚在医治清洗的杀戮创伤的红军。如果纳粹不是在1941年而是在1939年发动进攻，俄国就可能在战争中遭受失败，苏维埃制度也就随之垮台。后来出现的一切证据都说明，斯大林相信德苏条约将经历一个很长时期。德国于1941年6月背信弃义地发动进攻，

85

完全出乎斯大林的意外，也使他大为震惊。英国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次进攻，但在斯大林的眼里，条约是一笔好交易，他认为希特勒为了一个假想的、不现实的威胁而败坏好事，想必是疯了——确实是疯了。

除秘密议定书外，条约于签字第二天在苏联报纸上公布，全世界为之目瞪口呆。俄国老百姓由于受到多年的反纳粹宣传，都感到大惑不解，因为苏联报纸对于行将发生的事情虽曾稍微透露过一点迹象，但这些蛛丝马迹是不会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的。不过，俄国人是易于受人摆布的，而且因为避免了一场战祸，他们也就确实松了口气。有些苏联官员还另有看法，认为斯大林成功地施展了一条妙计。陪送法国和英国代表团到车站的一位英国大使馆官员说，在火车开出车站时，两名被派来送行的俄国人交换了一下眼色，突然扑嗤一声笑了起来。

至于我，我体会到条约意味着纳粹对波兰的进攻，但我不清楚英国和法国将作何反应。我相信当时很多人都不会预见到结果将爆发一场全面的欧战。其时，英法两国合并起来的军事力量被认为和纳粹德国旗鼓相当——我想，斯大林也有这样的看法。对于不到一年工夫即将发生的德国突然袭击法国这一结果，当然不在考虑和讨论之列。

国务院后来表扬大使馆事先对条约的签订发出警报的才干。除苏联和德国外，我们是掌握谈判全部情况的唯一国家，因此罗斯福总统和国务院对震动早有准备。如前所述，华盛顿曾竭力把消息预先告诉英国和法国，但徒劳无益。无论如何，华盛顿没有发表过任何使美国在条约公布后陷于尴尬境

地的声明，也沒有采取过类似的行动。

86 直到大战以后，我才弄清楚象容尼·黑尔瓦特这样一个彻底爱国的德国人何以要冒着生命危险，向我这个虽未完全同希特勒的敌人结盟，但站在敌对方面的国家的代表透露绝密情报的原因。含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容尼解释说，早在1939年春，他就是上层阶级德国人中抵抗运动的积极分子。他曾希望，如果西方国家知道了谈判的情况，它们可能会采取行动以阻止希特勒和斯大林实行妥协，因为他相信任何这样的协定必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尤其希望这个情报或许会被用来激励法国和英国以较为豁达的态度同苏联进行谈判。然而，他自己和我的想法一样，认为同英法两国谈判成功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战后，他有一次直率地对我说，"我们能够同苏联人达成协议，因为我们不必考虑德国国內的舆论而把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东部交给俄国。英国和法国由于它们国內的舆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容尼所属的抵抗运动沒有很好地组织起来，也沒有搞过什么密谋。它在很大程度是一个情感问题。舒伦堡曾明确予以同情，但他不是其中的成员，显然他当时并不知道有那么一个地下组织。我十分敬佩舒伦堡。他是一位老派的德国人——颀长，清秀，蓄着银白的上髭，稍微有点秃顶，彬彬有礼，殷勤和蔼，并且我认为他是非常敏感的。他对苏联了解得极其深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担任第比利斯总领事，他强烈反对1941年的进攻。1944年，他参加反对希特勒的密谋，事情败露后遭到逮捕，备受酷刑，最后被杀害。

容尼·黑尔瓦特在整个战争时期都在德国军队作战。进

攻波兰之前，他回到原先所在的团。这是一个骑兵部队，后来改变为陆军装甲团。他作为一个骑兵，自始至终参与了三个星期的波兰战役，然后被调往西线。他的团是1940年5月10日在西方开始进攻、最后打到比阿里茨的部队之一，一直在法国战役中作战。他作为前线的一个士兵，参加了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的进攻，在前线作战两年。他经历三个主要战役，却连皮肤也没有擦伤，也从未被俘。他几乎被击中的仅有一次是榴霰弹的碎片洞穿他的大衣衬里。 87

最后，容尼被派到负责和德国战俘以及几个较小的同盟国联络的冯·科斯特林格将军手下任幕僚。冯·施陶芬堡伯爵领导政变的时候，容尼正在巴尔干。同盟国的空袭耽误了他回柏林的行程，他在政变失败之后几天才听到有关政变的情况。在波茨坦——他在那里隶属于参谋部——的办公室里，他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有他秘书留下的五张便条，告诉他发动袭击那天，施陶芬堡曾异常迫切地打电话找他。容尼对我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发慌，竟至两腿无力，跌倒在地。他完全懂得，如果盖世太保在这期间，即在发生谋杀希特勒的密谋之后立刻进入他的办公室，毫无疑问，他将被就地处决。

大战以后，容尼回到外交部门，担任西德派驻伦敦的第一任大使。这是一项艰巨的使命，但容尼·黑尔瓦特获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

88

第六章　密切注视德苏合作

纳粹-苏联条约一经签订，我作为大使馆主要的政治观察员的作用也随之改变。我现在面临的任务是调查两个独裁者能够合作到什么程度。他们会真诚地结盟，在经济上军事上互相援助，保证做到共同防御吗？他们会瓜分波兰，然后分道扬镳吗？他们会象英国人满有把握地预言的那样，很快就为了分赃不匀发生争吵吗？他们保证互不侵犯的誓言能够信守多久呢？

从某种意义说，我的任务并不困难，因为在我面前的情况是明摆着的，只要德国保持强大，苏联就决不会毁约。斯大林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一场战争，并且他已经为此做成了一笔漂亮的交易。我心目中的难题在于希特勒是否将严格遵守协定。这个问题只有德国人能够回答，而我却因容尼·黑尔瓦特已经离去，失掉了德国大使馆十分宝贵的情报来源。幸而不久我就在那里得到另一情报来源，那就是大使馆的另一位秘书、格布哈特·冯·瓦尔特，他在战后历任西德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土耳其和苏联大使。他是一个纳粹党人，但不是狂热的党员。他乐于同人们和好相处。同容尼相比，他要沉默寡言得多，从来不给我提供秘密资料，不过，他象外交官通常所做的一样，偶然也把一些事情告诉我。

使我的任务变得麻烦起来的另一个因素是新任美国大使

斯坦哈特对苏联了解得不多。他是一位圆滑的纽约律师、罗斯福的朋友，曾任驻瑞典大使。他瘦高个儿，精力极端旺盛，思想灵活，喜欢追根究底。他爱好虚荣，非常自私，似乎受一种沽名钓誉的强烈欲望的支配，这个特性我后面还要讲到，导致他在报道1939—1940年冬结束苏联和芬兰的战争的和平谈判时走到了弄虚作假的边缘。 89

在1941年1月以前的一年零五个月里，我在比较缺乏情报以及因我妻子怀孕必须三次离开莫斯科的条件限制下，竭尽所能地密切注视着苏德关系。这是一个直到今天还遗留着骚动纷扰、严峻冷酷斑痕的风云变幻的时期。

当时我并不知道在德苏条约即将签字的几天里，苏联政府曾三番五次致电柏林，唯恐希特勒找到什么理由推迟或者取消对波兰的进攻。其实无需担忧，因为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发动了进攻，并且几乎在英国和法国尊重它们对华沙承担的义务和对德宣战之前就击溃了波兰军队。

条约的公布大大地震动了莫斯科的老百姓，他们对于同希特勒妥协的意义深表怀疑，而且被德国人推进的速度弄得心烦意乱。老百姓的焦灼和忧虑通常是无法表达的，但我们偶尔能在莫斯科河对岸的文化休息公园里听到有关舆论的一鳞半爪的消息。共产党派出人员在那里安排“宣传鼓动点”，答复问题。德国发动进攻以后大约十天左右的一个晚上，我听到一位俄国老头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同德国人打过仗，因此对他们的意图极为怀疑，他问那位党的发言人，苏联政府有什么把握可以担保德国人在到达俄国边界之前戛然而止。很清楚，这位老人由于克里姆林宫在上一天宣布局部动

员而感到关注。发言人说，他可以肯定政府在这方面得到过某些保证，但他含糊其词，说得不明不白。他答应第二天晚上对这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翌日晚上他断然地说，苏联政府通过同德国人的谈判，知道德军不会进展到苏联边界。这种答复只能部分地满足老人的要求。

我在评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报告国务院说，苏联政府为了使战争不致在它边界附近发生，也许会采取行动。我难得发表预言，这次却破例地补充说，"因此，可以预料到，为了达到它的目的，苏联政策的趋势将是促使德国很快取得胜利，并在某种情况的影响下，借口要在波兰住有俄国人的地区'恢复秩序'，甚至可能对这个国家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

90

9月17日拂晓，红军开进波兰，占领纳粹-苏联条约划归苏联的地区。我听到传说，当工厂工人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立刻认为红军是开去同德国人打仗的，于是跳上机器，欢呼起来。可是转眼间来了共产党的代表，他们解释说，红军不是去同纳粹打仗，而是去接管苏联认为属于俄国的现已不复存在的波兰的那部分地区的，因为那里的居民主要是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

苏联在波兰的背上戳进一刀，这一行动在纳粹-苏联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里一定早有策划，然而有迹象表明，作出采取行动的决定是相当仓卒的。按照苏联的方式办事，必须经过一番长时间的宣传，例如发表波兰发生"暴动"的报道，"受迫害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提出呼吁等等。引起仓卒行动的原因可能在于德国军队向紧靠着划归苏联的地区迅速推进。大使馆听到传闻说，德国人曾劝告苏联人迅速采取行

动，因为波兰人正在退入划归苏联的地区。如果苏联人不消灭这些波兰人，德国人将自己动手。我无法证明这个传闻是否属实。

然而，我无意中从冯·瓦尔特那里得到关于里宾特洛甫第二次访问莫斯科的一些情报。9月27日，即里宾特洛甫到达的那天，冯·瓦尔特和我正在别墅骑马。他告诉我，对于德国和苏联两国军队之间的分界线，双方一致同意只是临时性的。原先的分界线贯穿华沙中心。苏联建议修改，将分界线移往东面，以维斯瓦河为界。斯大林不想把控制几百万波兰人的难题沾在手上，但他确实希望得到立陶宛。有关远东问题也讨论了，但是冯·瓦尔特没有向我透露详细的情况。他说，会谈具有强烈的反英调子。公报证实了他的情报。公报宣称，如果战争继续进行，英国和法国应对此负责。公报不祥地暗示苏德将结为同盟，它说，苏联和德国两国政府"将共同磋商在万一发生这种事件时应当采取的必要的军事措施"。还签订了一个主要是扩大贸易的协定，由苏联提供原料以换取纳粹答应给予的机器和工业产品。至于波兰，协定规定沿维斯瓦河划分界线，象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由于波兰的西半部并入德意志帝国和东半部并入苏联，这个国家就从地图上抹掉了。 91

尽管德苏在波兰问题上进行合作，英国人仍然不相信和解会持久下去。我主要关心着克里姆林宫的观点，所以认为条约将长期有效——一个由于我不能洞察希特勒的心思而产生的错误判断。我的看法并非绝无仅有。10月4日，斯坦哈特大使致电华盛顿说，"一切迹象似乎都预示苏德合作的长

期性。"

在波兰瓦解以后，我以忧郁的心情注视着斯大林巩固他那面对德国的领土屏障。波罗的海诸国的部长们被召集到莫斯科来听取指示。首先是爱沙尼亚外交部长，他以为他是去讨论改善贸易关系或其他技术性问题的。一个星期天晚上，他正在芭蕾舞大剧院里，突然被命令到克里姆林宫去，莫洛托夫在那里向他提出苏联军队进驻爱沙尼亚的要求。在第二次会见时，提出军队进驻人数为三万五千人。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抗议说，这意味着在那个小国里苏联军队的人数将超过爱沙尼亚。爱沙尼亚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告诉我，当他们正在同莫洛托夫争论的时候，斯大林踱进了房间，他扮演着仁慈的角色问道，碰到了什么困难。听说是军队进驻人数问题后，斯大林温和地责怪莫洛托夫，"唉，唉！莫洛托夫，你对待我们的朋友太过分了一些，"并将军队进驻的人数从三万五千减为二万五千。这就是最后谈妥的人数。对爱沙尼亚人来说，这种谅解的态度证明斯大林是个温和派。对我们美国大使馆的人来说，这是斯大林特有的玩艺儿，他总希望被人看作是春风满面、息事宁人和随随便便的，与他那些顽固、专横和不容易对付的人民委员截然不同。大使馆在给华盛顿的报告里写了一句简短的评语，认为为期十年的互助条约等于是"苏联对爱沙尼亚实行军事保护制度"。

92 不久，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两国的外长步爱沙尼亚外长的后尘，遭到了同样的待遇。整个行动到 10 月底完成，这时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已被牢牢地掌握在苏联的手中。一桩饶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苏联人怂恿立陶宛政府把历来有争执的维

尔纳地区从波兰那里接收过来。再过了一年，在法国于1940年崩溃以后，又对这三个不幸的小国施加最后的一击，它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里，曾经有过短暂的但比较幸福繁荣的日子。它们都被并入苏联了。

10月初，芬兰人也被召到莫斯科进行磋商，我根据我在芬兰大使馆的闲谈中了解到，苏联人在几次会谈时碰到了难关。芬兰人比波罗的海各国人民顽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另方面是因为他们天生的倔强性格。以后在1939—1940年冬的三个月对苏战争期间，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显示了这种秉性。莫斯科要求租借海军基地，把距离列宁格勒不到二十英里的边界后撤二十四英里左右，由苏联占领防守芬兰湾入口处的汉科。苏联将割让卡累利阿的一部分领土给芬兰作为补偿。从苏联的观点来看，这些要求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如果象德国那样一个潜在的敌国和芬兰结成同盟，它就会据有进攻俄国的理想的出击据点。从芬兰的观点来看，这些条件、特别是割让汉科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芬兰将无法自卫。象苏联和波罗的海诸国签订的条约所证明的那样，芬兰人有理由对莫斯科的意图表示怀疑。

在整个谈判期间，我们不断地得到在莫斯科的芬兰代表团提供的准确而又及时的情报。芬兰大使馆参赞赫亚尔马尔·J·普罗科佩是我的朋友和我们的主要情报来源。显而易见，芬兰政府已经断定让美国大使馆充分了解情况是符合它的国家利益的。美国由于芬兰很守信用地偿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借款而对它特别关切。在谈判即将开始的时候，罗斯福总统曾致函苏联主席M·I·加里宁，恳切地表示希望保

93 持芬兰的独立和完整。加里宁的答复是很谦恭的，可是后来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的一次发言里说，美国无权干预谈判。

有一次，我的德国通风报信人冯·瓦尔特对我说，他曾和米高扬谈过话。在谈判的间歇期间，米高扬这个亚美尼亚人用第三者的口吻谈起俄罗斯人，说他曾警告芬兰人，“你们要当心，别把俄罗斯人逼过了头。他们对于世界上的这一地区以及列宁格勒所受的威胁怀有深刻的传统情绪，我只能对你说，我们高加索人想要在政治局里约束俄罗斯人，也是难乎其难的。”这话在我听来兆头很为不妙，但芬兰人却把它当作危言耸听，虚张声势而已。

冯·瓦尔特还告诉我，在谈判期间，莫洛托夫一直把会谈情况通知纳粹大使。德国人在整个会谈期间所持有的看法是俄国人将慎重从事，同时认为斯大林最后将在汉科问题上让步。当斯大林并不让步的时候，德国人要求瑞典人运用他们的影响劝说芬兰人割让这个基地。瓦尔特对我说，德国人还竭力敦促俄国人要温和些。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既然谈判陷于停顿，我可以在11月底离开莫斯科几天了。斯坦哈特曾在斯德哥尔摩当过大使，打算去瑞典访友。我的妻子和我接受他的邀请与他作伴，这样她就可以乘此机会去请教一位医道高明的西方医生诊断一下她的怀孕情况。11月30日，在我们乘坐从里加开出的夜车返还莫斯科途中，收音机扩音喇叭广播了苏联同芬兰断绝关系的消息。第二天，苏军发动了进攻。

我于芬兰战争期间学到的东西，在看透再次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苏联思想活动的基本轮廓方面，对我的外

交训练是大有好处的。越过苏联国境的军队不过是从俄国北部的警备队中抽调出来的未经训练和考验、毫无作战经验的新兵。他们携带标语牌和旗帜，上面用芬兰文写着他们是来解放芬兰人，使他们不再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发动进攻的那天晚上，苏联人在他们占领的一个靠近边界的名叫泰里约基的镇里建立了新的芬兰政府。从建立一个包括重要的苏籍芬兰人奥托·W·库西宁在内的政府来同赫尔辛基的合法政府相抗衡这一点来看，可以清楚地知道，苏联人的意图即使说得客气些，也在于建立一个统治芬兰全境的保护国。精明强干的芬兰人决不欢迎侵略者，他们认识到他们是为祖国的生存而战斗的，因此奋力歼灭了苏联的第一批师团。接连几个星期，苏联人对曼内尔黑姆防线进行轮番的猛烈进攻，均未奏效。 94

俄国所受的影响是很深的，苏联的统治者一定忧虑重重地注意到这种影响。当苏联吃败仗的传闻逐渐渗透到居民中的时候，老百姓普遍为一种束手无策的情绪所笼罩。列宁格勒各医院里充塞着负伤和四肢冻坏的士兵的消息也传遍各地。我们的厨师克劳季娅反映市场和商店里的闲谈，跟我们讲起人们是多么懊丧。虽然苏联人从来不承认吃过败仗，官方公报的调子在对这方面素有经验的人听来却清楚地说明仗打得非常糟糕。收听伦敦英国广播电台播音的俄国人（在那些日子里，谁也沒有想到要干扰广播）听到了整师整师的苏联军队在冰天雪地里被打得落花流水的骇人听闻的报道。这些报道被认为是可信的，因为多年来英国广播电台不是以宣传而是以报道翔实而声誉卓著的。

尽管苏联实行保密，外国观察家却一眼就看到，这场从俄国的全部资源和军事力量来看是规模不大的战争已经造成居民食品供应的紧张。食品到处感到不足；食品店外面排了长队；人们争先恐后地抢购。从这一切愁苦中，我想我能觉察到一种心情：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是恃强凌弱，俄国遭到迎头痛击是罪有应得。

象其他美国人一样，我对苏联进攻芬兰感到极大愤慨。这是毫无道理的暴行。几年以后我才理解，芬兰战争在道义上是理亏的，但也许就是这场战争挽救了苏联，使它不致为德国所摧毁。战争让苏联最高统帅部和斯大林本人看清红军有多大的缺陷。有些弱点是人所共知的；清洗破坏了军队的上层领导。但政府显然相信所谓红军是不可战胜的这一自我宣传。由于芬兰战争，苏联领导人才采取认真的措施来弥补红军的缺陷，所以在1941年遭到德国突然袭击时，军队的情况已大为改善。没有芬兰战争的严重教训，要完成这些改革是不可能的。考虑到1941年苏联的濒于败北，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改革，苏联势必是要被希特勒打垮的。

95 1940年2月，当苏联最高统帅部调动训练精良的新编步兵师和大批大炮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时，情况逐渐表明，芬兰人快要招架不住了。3月，芬兰和苏联签订和平条约。芬兰失掉了靠近列宁格勒的边境地区和汉科，曼内尔黑姆防线被摧毁，芬兰武装部队被裁减。

条约的条款使我感到有点诧异；按照军事的形势来看，条款本来还会苛刻一些。然而斯大林权衡轻重，自有他的打算。英国和法国正在公开地作出计划，准备派遣远征军前往芬兰。

这场战争使苏联耗费不赀。既然所有的主要目标都已经达到，战争自然可以迅速结束。

毫无疑问，芬兰的英勇抵抗降低了苏联的直接目标。建立泰里约基"平房"政府这件事，证明战争并不仅仅是调整边界的问题。其目的是要把芬兰苏维埃化，虽然这个计划随着媾和而告放弃。这是苏芬关系的要害所在，当苏联成为西方国家的盟国时，人们很容易地把它置诸脑后了。

纳粹和苏联共同强占波兰，本来已使美苏关系发生动摇，芬兰战争更使两国的关系产生隔膜。这二次变故给予雄心勃勃的斯坦哈特大使以致命的打击，因为他梦寐以求的是有朝一日能够从他对苏联的交易中抬高自己的身价。芬兰战争进行了几个星期以后，斯坦哈特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和事佬，力求通过瑞典人暗中插上一手，扮演调停人的角色。这个计划很快就碰了壁，因为芬兰人对此一点热情也沒有。不管怎样，当停战宣布时，斯坦哈特拟就一份给华盛顿的电报，捏造了一系列事实，仿佛他在和平谈判中起过重要作用似的。直到最后一分钟，他才决定不把电报发出去。

使我不但对莫斯科抛却一切幻想，而且感到很高兴的是，我在1940年2月从报上看到罗斯福曾在白宫对一个共产党外围组织——美国青年大会——说，"每一个敢于面对现实的人都知道，苏联被一个独裁政权所统治，其专制的程度同世界上任何其他独裁政权并无区别。它和另一个独裁政权结为联盟，侵略了一个对苏联来说无论如何不会有损害的极小极小的邻邦。"总统开始了解到一些有关布尔什维克的冷酷的现实。

罗斯福关于结为联盟的说法是过高地估计了莫斯科和柏 96

林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在战争时互相援助的协定。但是，从大使馆给华盛顿的电报里可以看到有力的证明，苏联和德国是在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降落到低潮的时候才加紧合作的。我们关于"燧石城号"事件的电报从两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燧石城号"是美国的一艘商轮，1939年10月下旬在大西洋被德国袖珍战舰"德意志号"俘获，因为它的一部分货物被认为是违禁的，便被当作战利品没收了。纳粹不把商轮开往德国，而是驶入苏联的摩尔曼斯克港。

苏联外交部完全懂得，根据国际法，作为战利品俘获的船舶只有在气候恶劣、船只损坏或缺乏燃料给养的情况下才准许被带进中立国海港。如果该船在上述情况归于正常后不立刻驶离，中立国必须将被俘船舶连同全体船员和水手一起释放，而将俘获该船的船员扣押起来。苏联人的确扣押了德国押船的船员，斯坦哈特指示我去摩尔曼斯克港和美国船长会晤。但是，苏联当局显然是在德国的压力下改变了主意，开始闪烁其词地说什么锅炉损坏、缺乏合适的航海图和食品作为该商轮进入摩尔曼斯克港的正当理由，并且设置种种障碍来阻止我的行程。苏联人通知我们说：(1)从莫斯科到摩尔曼斯克没有定期班机（露骨的谎言，因为表上载明有定期班机）；(2)每趟班机的座位均已预定一空；(3)恶劣的气候迫使取消所有飞机的飞航。

10月28日，斯坦哈特遵照国务院指示，由我当翻译，打电话给摩尔曼斯克的船舶调度员，向他打听。调度员讲的情况完全同苏联外交部对斯坦哈特所说的以及德国大使馆告诉

我的所谓锅炉损坏、缺乏航海图和其他必需品等情节相反。事情越来越清楚，纳粹将“燧石城号”驶入摩尔曼斯克港的真正原因是害怕被英国军舰捕获。这个事件最后以苏联的滥用法律而告终。苏联顺从纳粹政府的要求，释放了德国的押船船员，同时准许“燧石城号”在它驶入时的同样情况下驶离摩尔曼斯克。于是，“燧石城号”继续航行，驶入挪威的一个港口，在那里，德国的押船船员被扣押，商轮得到了释放。

1940年1月上旬，我对苏德日益加紧的合作的密切注视暂告中断，因为我决定伴送我怀孕的妻子到一个西欧国家的城市去，使她能够在那里乘坐飞机或轮船去美国。这次旅行也将使我有机会到柏林同隶属于当地大使馆的乔治·凯南和到巴黎同那里的大使布利特两人晤谈。同时还可以满足我对“虚张声势的战争”的好奇心。其所以有这样的称呼，是因为德国和同盟国双方都没有发动大的攻势。 97

1月9日夜间，气温下降到零下四十度，阿维斯和我乘坐卧车离开莫斯科。我们到达德国边境时，天气依然是严寒砭骨。我们转乘一辆德国卧车，它停在雪原里的错车线上。这辆车实际上没有暖气，我便去小卖部买了一大瓶纯净的立陶宛伏特加，回到车室，替我妻子盖上毛皮大衣，然后就寝。我们在大约四十个小时后到达柏林。

在走进阿德隆饭店门廊的时候，我们迎面碰见一个德国军官，他是我在莫斯科结识的朋友。他邀请我们一块去喝一杯。我们来到一个酒吧间，埋坐在皮椅子里絮谈旧话。隔了一会儿，他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和走哪条路线返回莫斯科。我说我仍将取道比利时、德国走原路回去，时间在1月13日到

15日之间。他扬起双眉惊异地说，他愿意奉劝我不要这样做，因为他那沿丹麦边界驻扎的团队就要奉命于1月13日前后作好进攻准备。他说以前有过几次惊恐，这次也很难说是否又是一场虚惊，但他认为我应该知道德国有可能在1月13日对西方国家发动一次有充分准备的进攻。

第二天，阿维斯和我离开柏林。火车又一次因大雪和严寒误点，我们到达亚琛的时候，边境已经关闭。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在亚琛过夜，要么设法去比利时，最后我们决定尽一切努力通过边境。虽然我懂得的德语极为有限，我的妻子也只是略胜一筹，我们还是向带领巡逻队的一位年轻德国中尉接洽。我反复向他解释，"我的妻子怀孕"，最后，中尉向98 我们指点了一条穿过边境的途径，尽管这样做实际上是非法的。他劝告我们乘坐一辆德国出租汽车到边界那边约几百码的一家咖啡馆，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去列日的交通工具。这个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当天夜里我们就到达布鲁塞尔。我们下榻于两年前在那里举行过远东会议的旅馆。由于某种原因，旅馆的职员还记得我，尽管餐厅已经休息，仍然为我们烹调了一顿有牡蛎和松鸡的精致晚餐。阿维斯至今还常叨念，这是我们曾经享用过的最美的一顿饭菜。

翌日，我打电话给大使馆，将1月13日的德国军事计划和根据情况所作的全部判断告诉他们。在巴黎，我也把这个情报告诉了布利特大使，大使立即向达拉第总理提出了预告。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法国的两师机械化部队开向边界。这项消息所以受到特别重视，还因为法国人在当天早一些的时候在被击落的一架德国飞机的驾驶员身上搜出预定1月13

日在西线发动进攻的计划。这一天并沒有进攻，但战后缴获的德国文件透露，希特勒确曾把1月13日预定为发动"黄色行动"——进攻低地国家和法国计划的代号——的日期之一。

在我们拜访布利特的期间，他在我们一起玩桥牌时对我说，他认为苏联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与德国结成同盟。我表示不相信苏联实际上已与德国结盟，虽然我同意莫斯科凡事都要博取德国人的欢心这一看法。我承认，如果发生某些变故，苏联人最终可能与纳粹结成事实上的同盟。例如，如果英国和法国眞正干预芬兰战爭，它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同苏联作战的境地。其结果势将迫使莫斯科更向德国靠拢。

在柏林，我曾和凯南作过一次长谈。他对前途的估计颇为悲观，认为德国人正在特别考虑周密地和专心致志地从事进攻西方的准备。也许是受到他的看法的感染，我在德国也感觉到某种表明它正在认眞和切实有效地备战的冷酷的军事气氛。与此相反，法国似乎仅仅稍有触动而已。巴黎实施了局部的灯火管制，但相对地说生活似乎沒有什么变动。德国人的一本正经和法国人的近乎吊儿郎当的无忧无虑的态度，形成令人吃惊的鲜明对照。

99

我本来打算让阿维斯随同布利特大使乘坐新辟的泛美特快航线的客机回去，但亚速尔群岛和葡萄牙的天气恶劣，飞机停航。我于是决定伴她到热那亚，安顿她搭乘美国航运公司的一艘名叫"美利坚号"的轮船。这是该轮在1940年1月从欧洲启程的最后一次航行。在热那亚目送阿维斯登上"美利坚号"后，我取道意大利、瑞士和德国返回俄国。当火车于深夜开进慕尼黑时，我听到高射炮突然爆发的轰鸣和飞机的隆

隆声。飞机没有扔炸弹,我猜想它们扔了传单。在那"虚张声势的战争"的日子里,英国人异想天开,以为下雨般撒一阵宣传品,就当真能够动摇希特勒的政权。

1940年2月初,我回到莫斯科,苏联和纳粹的亲密合作的迹象日益显著,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里。一位名叫弗兰茨·克拉普夫的德方谈判代表告诉我,他们所有的代表无不为斯大林过问谈判中鸡毛蒜皮的问题而感到大为惊讶。有时候,类似五千吨铜这样的问题,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必须得到斯大林亲自批准。这种不让谈判代表作主的做法,是由于斯大林秉性多疑和不信任他的部下。在他看来,要把事情办好,非亲自动手不可。其结果是这位独裁者事务山积,每逢作出决定,也无不迟缓得令人难以置信。

1940年4月,我对苏联外交计划趋势的探索又一次暂时中断,这次是为了返回美国探望我的妻子和女儿。其时欧洲危机正处于暂时的喘息阶段。芬兰战争已告结束,"虚张声势的战争"仍然继续进行。看来这是回趟老家的好时机。

由于苏联和意大利签订的协定对卢布规定了虚假的价值,我从莫斯科到纽约的车船票只花了十五美元。原因是大使馆仍在黑市按六十或七十卢布对一美元的比率换取卢布;而票价则按里拉计算,其官方比率为一点一五卢布对一美元。车船票不仅为从莫斯科到热那亚提供头等火车铺位,而且为到纽约提供乘坐豪华的定期轮船"萨沃亚伯爵号"的头等舱位。

在轮船上,比利时前首相保罗·范·泽兰德不幸反映了流行于西欧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他在我们在吸烟室里小饮时

硬说，他确实知道，德国坦克的钢板挡不住子弹，引擎也完全不管事。至于纳粹在波兰战役中的出色成就，他说其原因与其说在于德国军队的精锐，还不如说在于波兰人的软弱无能。不出几个星期，法国的崩溃就要证明他的乐观情绪不幸而找错了对象。 100

我探望了我的妻子和女儿后，阿维斯留在维拉诺瓦，我再到南卡罗来纳州艾肯去探望我的母亲和妹妹，我呆在那里的时候，纳粹进攻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我还记得当时收听电台评论员H·V·卡顿伯恩的广播，他预言德国的闪电战是要失败的。

在我回到华盛顿这个月里，我和东欧司的官员们就法国沦陷和英国从欧洲大陆撤退对苏联的影响交换了意见。我们总的印象是，克里姆林宫虽然一直指望同盟国和轴心国之间保持平衡，现在却会更加小心翼翼，不去得罪纳粹。希特勒也许很快就能腾出手来对付俄国了。

虽然我处理过一段时期极端敏感的政治情报工作，当我要离开国务院返回莫斯科的时候，我在外交部门地位的低下就显示出来了。我奉命到纽约去取一件密封的东西，随身携带回去。指令要我只身穿越已被战争搞得支离破碎的欧洲而携带到莫斯科去的，是一只褐色旅行箱，它的重量超过五十磅，内藏我们绝密的外交密码副本。我表示反对，指出一路困难很多。在葡萄牙，间谍无孔不入；在法国，德国人麕集，纳粹视美国人若仇敌；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也不和睦。要我保证密码的安全，困难很多。尽管如此，还非叫我这样办不可。

我从纽约乘一艘葡萄牙轮船到里斯本，在那里呆了几天，

偶然碰见来自莫斯科的老朋友埃尔布里奇·德布罗，当时他任总领事馆的领事，主管护照签证。从里斯本，我提心吊胆地坐火车到马德里，再乘飞机到巴塞罗那，然后坐汽车到法国边境的佩皮尼昂。乘坐长途汽车穿过法国这段旅途的情景是令人伤怀的。到处是被遣散的士兵，徘徊彷徨，犹如迷途的羔羊。洁净、繁荣、和平的瑞士则是一首欢乐的间奏曲。半夜稍101 过一会儿，我们的火车开进慕尼黑车站，这时正响起了空袭警报，我听到头顶上飞机的引擎声和高射炮声。这次空袭是真干；我听到了炸弹的爆炸声。不过只扔下几颗炸弹。

我在第二天到柏林，在那里我见到了美国大使馆的一些朋友，特别是凯南。我们共同的看法是，鉴于斯大林力求避免战争，苏联的政策似乎不大可能有什么改变，至于德国人下一步将如何动作，则难以断言，虽然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不列颠诸岛将受侵袭。不列颠之战尚未爆发，预兆却颇为不祥。温斯顿·丘吉尔担任首相大概算是唯一的好消息。凯南为了让我见识一下德国人的高昂士气，带领我到一家音乐餐厅去，餐厅里的艺人高唱“我们开向英国”，附和着这个歌曲的是大声欢呼和啤酒杯在桌上敲打的咚咚声。在柏林的两三天里，我没有听到德国人对苏联有任何评论。

当我到达拉脱维亚边境的达夫戈皮尔斯的时候，我感到仿佛是闯进了红军军营。镇上到处挤满士兵，而且找不到膳宿的地方。我呆在车站里。一天一夜之间，我拎着装有密码的旅行箱没有松手。大部分的时间我和俄国士兵同坐在一条板凳上。有几个小时，我到站长接待室的沙发上躺一会儿。在德国人取得征服法国的胜利以后，苏联人下令增加盘踞在

波罗的海诸国的占领军，这些士兵就是增兵的一部分。我又脏又累，终于登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尽管忧虑重重，我却一直没有碰上丢失密码的危险；没有人想要偷它。

我发现莫斯科比较起来没有什么变化，苏德关系在表面上处于良好的状态。然而，法国的沦陷多半震动了苏联的军事分析家，产生了人们对德国有可能发动进攻的担心。斯大林为了加强俄国的西部边境，把波罗的海诸国、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并入苏联。由于这个行动，大使馆派我到立陶宛的考纳斯去，协助办理关闭那里的美国公使馆事宜。这次的经历是令人沮丧的。到处都是俄国兵，他们整个来说行动是规矩的，但他们嗜酒好饮，喝醉了酒就喜欢吵吵嚷嚷。胆小怕事的立陶宛人眼看着灾难就要临头。在我呆在那里的一周里，我就听说有一些立陶宛人自杀。

有人告诉我，我们驻立陶宛公使欧文·J·诺雷姆牧师之 102
所以被任命为公使，是由于他曾为民主党效过劳。诺雷姆常常在考纳斯的旅馆里宴客，当他感到瞌睡时就自行离席，嘱咐侍者把随后的酒菜算在客人账上，而不算在公使馆账上。他是一个极端狂妄自大的人。1940年初，他到莫斯科访问。他四下看了看斯巴索大厦后说，"当然，我什么时候想要这个职位，就可以在什么时候把它拿过来。"在苏联"接收"以前，诺雷姆有一次到爱沙尼亚去旅行，向外交部长接洽处理战时借款问题。有人告诉我，他有一天和属僚在一起野餐，接到国务卿赫尔的一封来信。他高兴地说，"哦，多妙呀！科德尔来的信。"也不先看一看信里说什么，他就大声地念起来。"我亲爱的大使先生，"据说信是这样开头的，"兹禁止你在任何公开发

言或私人谈话时涉及战时借款问题。战时借款是美国政府的主要问题之一，完全应由华盛顿处理，大使个人不得对此发表个人意见。”

纳粹突然于1940年8月下旬采取行动，调整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之间的边界，这是我们大使馆觉察到苏联和德国发生嫌隙的第一批预兆之一。德国显然没有同苏联磋商或给予通知就把罗马尼亚的一些重要地段转交给匈牙利。苏联人在一份给德国人的照会里用相当冷淡的措词评论巴尔干的事件，以表示他们的不悦。不到一个月，克里姆林宫对德国的另一个行动发愁——德国同意大利和日本签订了一项条约，每一方保证在其他两国中的任何一方受到尚未参战的国家的攻击时予以援助。苏联人心里明白，他们自己被当作靶子；德国人说，他们心目中的敌人是美国。

我和纳粹大使馆秘书冯·瓦尔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在11月上旬告诉我，仍然兼任外交人民委员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将要访问柏林并和希特勒会谈。我急忙致电华盛顿，报告这个消息，因为我知道莫洛托夫的访问是异常重要的。这是苏联史无前例的友好行动。自从斯大林于二十年代末期接管领导权以来，从来没有一位高级的布尔什维克离开过苏联。大约从1918年起莫洛托夫就是政治局委员，他要到一个外国去这一事实，表明斯大林是竭力希望与希特勒保持友好关系的。不是哪里出了毛病需要弥补一下，就是苏联和德国正在走向甚至更密切的合作。冯·瓦尔特说，来自柏林的压力急于要求莫洛托夫对里宾特洛甫两次访问莫斯科进行回访。既然希特勒在欧洲拥有无可争议的霸主地位，德

103

国人感到必须向全世界显示苏德关系的“团结一致”。可是，我觉得苏联对这次访问似乎有点犹豫。一个证据是我偶然得到的一项情报说，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员改变了他们的亲德路线，强调苏联是唯一能够赢得战争胜利的国家。另一个证据来自土耳其大使的情报，他说一位“可靠人士”告诉他，莫洛托夫试图在最后一分钟取消柏林之行，但舒伦堡坚决主张他应完成这项使命。

11月9日那一天，当莫斯科电台宣布莫洛托夫启程前去柏林的消息的时候，英国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正在斯巴索大厦参加宴会。克里普斯对莫洛托夫的出国访问事前毫无所闻，因此怒气冲冲地痛骂了一通苏联政府和苏联官员。在他看来这些官员无异是罪恶的化身。他所以大发脾气，是因为遭到冷遇的缘故。当丘吉尔任命左倾的工党议员克里普斯为驻莫斯科大使时，英国人曾寄予极大的希望。克里普斯没有赢得布尔什维克的青睐，而是被等闲视之——克里姆林宫知道，代表伦敦政府的是保守党。莫洛托夫不愿意接见克里普斯；他的一切事务都不得不同当时已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维辛斯基打交道。

克里普斯感到震动的另一原因是他不敢正视苏联和德国继续合作的可能性。我们在宴会时问他，英国政府对这样的意外事件是否有所准备。他承认他曾一直抱着希望，尽管他在莫斯科遭到挫折，总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俄国人同柏林疏远，拉拢他们向伦敦靠近一些。他停了一下，用一种预料前途不妙的口吻补充说，如果苏联在莫洛托夫访问以后加紧与纳粹合作，那就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大不列颠“有势力

的圈子”可能要催促在反苏的基础上与德国单独媾和。他沒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但显然是指外交部的某些官员。克里普斯担心他的职位维持不了多久。

莫洛托夫的访问无疑是苏德关系的转折点之一。德国人104对会谈抱有莫大希望。冯·瓦尔特在莫洛托夫离开柏林以前告诉我，这次访问虽然不一定会签订新的政治协定，却表明苏联政府“原则上”决定要为更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合作奠定基础。会谈还将全面地讨论苏德关系。

德国当局和“恩克夫德”为保护莫洛托夫采取了特别的安全预防措施。一位和他同行的德国人对我说（可能夸大其词），从苏联边界——当时在拉脱维亚国境——到柏林的铁路沿线军警林立，彼此都能互相看到。

我们从德国大使馆那里获得了关于11月12—13日会谈的零零星星的一般情报。冯·瓦尔特报道失实，他对我们说，莫洛托夫给予柏林的印象极为良好，希特勒以同样的坦率回报俄国人的坦率。11月19日，斯坦哈特致电国务院，报告我那得自冯·瓦尔特的使人误解的情报，接着推断说，“我认为，由于谈判显然还仅仅是预备性的，苏联方面还不会出现任何迅速的进展或过早的积极行动。然而我相信，可以预料在最近的将来苏德合作一定会扩大而不是缩小其范围。”

显而易见，我们首先是沒有了解到会谈并不顺利。元首很不高兴，莫洛托夫则是极端倔强和毫不妥协。这个俄国人完全不理会希特勒的讨好卖乖，包括元首所提出的在德国矛头指向印度洋的时候让苏联分享从不列颠帝国夺取的战利品这一建议在内，而是问起德国屯兵芬兰和罗马尼亚的问题。

可以设想，元首并不了解，在布尔什维克的体制下，连当时是苏联特权阶层第二号人物的莫洛托夫也不能背离斯大林的严厉指示。斯大林对谁也不信任，甚至——或许特别是——信不过跟他最亲近的同僚，莫洛托夫能够和希特勒取得一致意见的范围一定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我往往这样想，如果在这期间希特勒和斯大林直接会谈，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是否会出现另一个蒂尔齐特条约，斯大林象亚历山大一世在 1807 年同拿破仑会谈的情况一样，如果英国拒绝让步，就同意结成联盟去反对英国呢？还是会争吵一顿，不欢而散呢？我比较倾向于认为，从这两个人的性格来看，一项影响深远的协议是不难达成的，这样就可以避 105 免 1941 年德国的进攻。斯大林为了避免战争是会作出重大让步的。

正如后来的情况所证明的那样，莫洛托夫顽固的对抗态度是希特勒决定进攻苏联的一个重要因素。战后，从公诸于众的德国档案中可以看到，希特勒在莫洛托夫离开柏林的第二天就下令加速准备执行“巴巴罗萨计划”——进攻苏联计划的代号。

在莫斯科，我们对于这一切都没有觉察。尽管苏联和纳粹的关系有点紧张，尚未出现任何真正破裂的确凿证据。预兆不祥的日子过不了几个月，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后，这两个国家就要揪扭在一起，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过不了多久，当我呆在东京的时候，日本就要进攻美国，把冲突扩大到世界规模的战争。

第七章　在东京的拘禁

在1940年将近尾声的时候，我奉调去东京任大使馆二等秘书之职。我对这次调动感到有些不可理解，因为我对日本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又不会讲日语，而且我也无意放弃我对苏联问题的专长。直至到达东京以后，我才发现约瑟夫·C·格鲁大使曾要求派遣一位苏联问题专家去密切注视苏联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因为，当战争在欧洲慢吞吞地进行之际，这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变得重要。

在行程十四天的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横贯西伯利亚的快车上，我迫切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观察一下俄国的亚洲部分。即使在当时看来，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也是老式的。车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木制的老牌货，路基也是蹩脚的。但是，同我记忆中1934年第一次乘坐的俄国火车一样，车上倒非常舒服。

同所有的俄国火车沒有两样，俄语叫做“普罗沃德尼克”的列车员整天挨着一只茶炊坐在车厢的一头。旅客要沏茶就向他灌水。我们的“普罗沃德尼克”对旅客照料得十分殷勤周到。他在早晨整理卧铺，在两个星期的旅途中换了三、四回床单，并且随叫随到。车厢是清洁的——沒有达到过分清洁的德国水平，但完全合乎俄国人的标准。那就是，旮旯里会有点儿尘土，但毛巾还是干净的，他们尽量让车厢里的情况还看得

过去。

我随身携带一箱书籍，在车上大量地阅读，特别是有关日本的。我对苏联餐车的供应贫乏早有经验，所以还带了一大箱罐头食品和其他食物，以及酒类和饮料。结果证明大有好处，因为差不多有一半时间，餐车只供应茶和黑面包。

酒还使我的车室多少成了一个社交中心。大多数的晚上，我邀请一些旅客举杯共饮。我们同唱俄国歌曲，东扯西聊，消磨了好几个钟头。同我早先乘坐俄国火车一样，我注意到俄国人在旅途中比在莫斯科心情舒畅得多，也喜欢同外国人交谈，但我没有听到他们对苏维埃政权和生活水平有什么不满。即使走廊里的广播喇叭宣布关系重大的苏德经济协定，旅客对这新闻也绝少议论。

使我很失望的是，我在西伯利亚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根据政府规定，除非在夜里，火车在西伯利亚的主要城市都不停站，并不准旅客走离站台。白天，我向窗外眺望——我在冰凌上刮一个小洞——几乎始终是漫无边际、荒寂单调的雪原。极目所至，差不多渺无人烟。

我浮光掠影地看到了比罗比詹，它是政府划给犹太人居住的地区。在我们接近这个城市时，车上大约七十五名东欧的犹太移民变得异常兴奋。亲共产党人经常拿比罗比詹作为苏联的宽容与仁爱的例子来同希特勒残忍野蛮的反犹太主义相对照。但是，当火车渐渐放慢，站在隆起的月台上的携带机枪的哨兵已经在望的时候，那些移民顿时陷入神情沮丧的沉默。

其实，刚从希特勒那里逃亡出来的犹太旅客是没有什么

可以担心的，那里并不是集中营。在那个时候，苏联政府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是宽大的。俄国人甚至准许波兰和其他被占领区的犹太人假道这个国家去日本和中国——他们希望在那里获得去美国的签证。这个措施拯救了他们，使他们免遭纳粹毒气室的杀害。

我还仔细地观察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它是一个典型的俄国外省的城市，在大部分主要的街道上有许多圆木头房子和堆成大圆丘的雪堆。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缺乏起码的供应和设备，使得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了我不愿多呆的地方。

我和其他大多数火车旅客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上一艘船身四周结了一层灰黄色冰壳的日本轮船。冰的分量很重，以致轮船在驶出港口时明显地倾斜着。在轮船到达日本敦贺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尝到了日本人仇视外国人的滋味。我带的是外交护照，待遇比犹太移民稍为好些。尽管如此，好象漫无尽期的时间上的延宕和日本宪兵队、即秘密警察的态度决不是令人高兴的。最后，经过几乎是空着肚皮的长时间鹄候，我们才乘上到东京去的火车。这时候，我患了严重的感冒。在报告格鲁大使以后，我到帝国饭店住下，过了两个星期才恢复健康。

108

我发觉在东京大使馆的生活和在莫斯科大不相同。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在于格鲁大使与斯坦哈特不同，前者是一位献身于改善美日关系这一任务的十足的专家，从不自我吹嘘。我不能说我成了他的真正亲密的朋友。他稍为有点不喜欢与人亲近，这多少是因为他比他的属僚年岁大得多，同时在性格上他是一个内向性的人。

格鲁的主要助手是参赞尤金·H·杜曼，他能讲流畅的日语。他们两人密切合作，徒劳无功地为解决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分歧而努力。同别的大使馆一样，这里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专家，但是沒有一个人强调专业，不去精神奋发地帮助处理分工范围以外的事情。

我发现日本的气氛对于外交官来说，较之俄国要愉快得多。由于在俄国住过，我觉得人们对日本当局限制外国人过严的抱怨有点言过其实。即使在中国战争时期，外国人在日本享受的自由较之在至少表面上尙处于和平时期的苏联要多得多。当我对任何西方人谈起这一点时，我常常迎来怀疑的瞪视和不信任的微笑。在东京或日本大部分地区是觉察不到限制的，但当我们进入一个特别敏感的地区时，秘密警察马上就自我介绍，亮出身分。他们谦恭地要求看看我们的护照，花几分钟工夫检查一番，然后带着道歉的表情归还我们，请我们朝另一个方向前进。

总而言之，我喜欢日本。这可爱的国家、美丽的山河和有礼貌的人民使我忘却偶然碰到的不愉快事件，甚至压低了我对日本政策的强烈反感。

虽然格鲁大使和杜曼不难同日本的高级官员会晤，我作 109 为低级官员却沒有能够同外务省进行认真的接触。我偶尔也能够见到一些低级官员，然而这些访问毫无成果可言。在东京，外国使馆人员被邀请参加社交活动的机会是很少的。你见面的大多数是外国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过的日子是封闭式的，可是我沒有象在莫斯科那样感到孤独。不管语言隔阂（我学了一个月日语就放弃了）和文化悬殊，在这里对各种问题的

议论倒是比较经常的。有些日本人不赞成他们政府的政策，并且谨慎地谈出了他们的不同看法，但大多数人不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

我因为初到，收集情报大都靠阅读日本报纸的译文，与美国大使馆其他官员交谈，听听人们在美国总会餐桌上和外国人聚会场所发表的言论，以及同其他使馆人员交换意见。

弗兰茨·克拉普夫是我认识的德国大使馆官员，当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他曾在那里参加过经济谈判。我不认识苏联的大特务维克托·索尔格，他是在东京的德国通讯社社长，并且是德国大使奥伊根·奥特少将的朋友。索尔格的情报使苏联政府相信日本不会进攻西伯利亚，从而使得斯大林把西伯利亚师团调往莫斯科，击退德国人在那里的进攻。

在德国对俄国发动进攻以前，我还沒有在苏联大使馆结识到朋友。德国于 1941 年 6 月 22 日对苏联的入侵，使我和整个大使馆大吃一惊。我从来沒有料到希特勒会干这样的蠢事——斯大林也沒有料到。我对希特勒的心理并无所知，但我总觉得，德国人在竭力对付英国的时候，同苏联保持太平无事的关系，要比发动另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好得不可估量。我们曾得到德国军队在苏联边境集结的情报，可是，象别人一样，我认为这是为了迫使斯大林对第三帝国作出大概是经济性质的让步而施加的压力。

我刚听到进攻的消息，就把收音机拨向莫斯科。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正在广播的仅仅是正规节目：报道工人创造的生产纪录，描述“幸福、和平的”苏联人民欢度星期天假日的情
110 景。这时差不多是莫斯科的中午时刻，距离入侵的开始已经

大约八个小时。正在我收听的时候，广播员插了进来宣布莫洛托夫要发表一个重要声明。莫洛托夫在广播中对精神上毫无准备的苏联老百姓说，一场突然袭击已经落到他们头上。他结结巴巴地强调说，纳粹沒有提出“不管是什么样的要求”就发动进攻——这表示如果希特勒提出要求，他是会能够得到让步的。莫洛托夫的声明最后以当时听起来有点空洞的“胜利属于我们”这一希望宣告结束。

由莫洛托夫而不是由斯大林向苏联人民宣布战争的爆发，这是可以预料的。斯大林不想为了在他看来一定象是世界末日的局面承担责任。后来在7月初，斯大林向全国发表演说，比较确切地说出了苏联军队遭受的一系列挫折。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的演说不是按照共产党的方式对“同志们”而是对俄国的公民们讲的。

德国的进攻使得在东京的许多事情起了变化，尤其是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在进攻以后的时期里，我认识了雅科夫·A·马立克，他后来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和驻英大使，幷两次充当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是乌克兰人，相貌颇为和蔼而又有点狡黠。在战争的冲击下，我们成为比较要好的朋友(同苏联官员的一切友谊都是相比较而言的)。我们常常到“天麸罗”酒吧就餐，在头戴白色高帽的厨师用大量的油烹炸小虾、鱼和大海虾的过程中讨论战局。象所有的俄国人一样，马立克为军事形势担忧，但至少在我面前，他完全按照苏联官方公报的说法，坚持认为苏联军队是有计划撤退的，到了适当的时机，就会实施有力的反击。当时除了战争以外沒有其他话题。

随着夏季变为秋季，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日益紧张，以致我

们的行动也受到越来越严厉的限制。格鲁作为外交使团的首席代表，不得不处理发生于日本人和外国人之间的不友好事故，因此我通常被要求从旁协助。日本人总是赔礼道歉，但并不采取行动。

1941年7月，当美国冻结日本人在美国的所有资产，禁止向日本输出某些商品，作为对日本侵略印度尼西亚的反应的时候，战争似乎已迫在眉睫。进口的断绝迫使日本面临三种选择。一个办法是放弃对亚洲大陆的一切帝国主义方针，从印度支那和中国撤退，同美国妥协，以便保证恢复石油进口。第二个办法是接受缓慢的绞杀。第三是打仗。

111

1941年，战争在我看来似乎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还希望有可能达成一项协议。近卫文麿首相曾建议同罗斯福总统在阿拉斯加会谈。总统很感兴趣，因为他一向喜好个人外交。可是，由于美国政府内部存在着亲华情绪，这个想法终于成为泡影。在那些日子里，美国人相信日本人天生是邪恶的，中国人天生是善良的。中国对日本的侵略已经抵抗了多年，人们对中国有莫大的同情，这一点限制了罗斯福与东京谈判的能力。

这种努力没有完全放弃。就在近卫于10月下台之前，格鲁同他举行过几次很有意思的会谈。因为日本官员害怕黑龙会分子(黑龙会是极端国家主义者的一个反动组织，在陆军军官中有为数众多的会员)，会谈是在极端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没有参加同近卫的会谈，但格鲁不断把情况告诉大使馆官员。会谈最后产生一项计划，根据这项计划，日本将从印度支那以及华中和华南的部分地区撤走，但仍保有满洲，并在

某种程度上还要留在华北。这个计划为维护和平提供了一个眞正的机会,但两国的舆论使它不可能被采纳。

格鲁大使和美国政府之间的意见分歧提醒人们注意到外交汇报工作上的一个问题。外交官身居海外,不受美国舆论的影响,他们经常会把外交事务的问题看作仿佛是存在于眞空似的。那些在华盛顿为政策负责的人却逐日深刻地体会到美国舆论的力量和重要性。我冷静地观察,对于格鲁大使的意图似乎是有很多话可以为之申辩的。另一方面,就美国舆论和承认舆论对于政府的决策所起的重要作用来说,格鲁的企求简直是毫无希望的。权衡利害,秘密妥协对于美国也许是件好事,但考虑到美国舆论的状况,现在来推测它的后果是无济于事的。一旦谈判决裂,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我来到东京之前,一个喝醉了酒的日本海军军官曾对秘鲁大使馆的陆军武官说,如果太平洋爆发战争,它将从日本 112 对珍珠港的袭击开始。这位秘鲁人告诉了美国大使馆,大使馆又报告了华盛顿,在那里想必是把情报归入档案,未予重视。我相信这是美国大使馆搜集到的唯一暗示日本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不过,格鲁本人曾于11月17日发了一份颇有先见之明的电报给华盛顿,指出日本的传统是先实行军事进攻,然后宣战。他还指出,大使馆人员不能随便到这个国家的各地走动,因此无法报告任何有关军事行动的准备情况。

因为我们对于可能发生战争这一点在精神上已经有所准备,袭击珍珠港事件在日本的美国人之间引起的震动远不如华盛顿官员那么厉害。一位能讲日语的大使馆官员和我一起从寓所乘车去上班的时候,司机说,他听到英国舰队同日本舰

队在太平洋海战的消息。他补充说，"也许靠不住，只是东京电台这么说。"当我们快到大使馆的大门时，我听到报童的铃声。我们买了一份薄纸印的号外，我的同伴翻译出来的消息是，日本舰队同美国和英国的舰队进行海战。

在大使馆院子里，雇员们正忙于在铁桶里焚烧我们的密码和重要文件。我到了办公室，被派去帮助焚烧文件。几小时以后，警察来了。我们以为他们是来搜索密码的，但出乎意外，他们根本不想制止焚烧。他们只是搜查收音机，因为他们怀疑收音机可能被用来向飞机发信号。他们沒有搜查到我们安在汽车里的收音机。在我们被拘禁的期间，我们常常用这架收音机收听英语广播，虽然多数时间收听不到。

日本人在兴奋之余，忘记了掐断通向太平洋彼岸的无线电话。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我们仍能与国务院通话至少达十二小时，从而对空袭造成的损失稍为有所了解。

当我们在焚烧文件的时候，外务省一名级别比较低的官员前来大使馆念了宣战书。

我奉命协助查明大使馆全体人员是否安全迁入大使馆馆址。我们被允许在一名日本人的伴同下到寓所去收拾一些私人的东西。

我还被指定去查核在东京的美国商人和其他美国人的状况。我不能离开馆址，只好依赖电话。但大多数电话无人答话。后来，我从瑞士人那里获悉，许多美国商人、记者和旅行者已被日本人拘禁起来了。

113

大使馆仆役的无可指摘的态度使我深为感动。他们的态度也许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封建遗风。这些仆役非常温和、卖

力和忠顺，同袭击珍珠港以前毫无区别。在整个拘禁时期，他们始终和我们呆在一起。

当战争爆发的消息刚传来的几小时之内，我们忙忙碌碌，多数人体会不到事变的全部意义。直到大使邀请我们到他的住所喝酒，大家开始谈论起来的时候，事变的全部影响才使我们感到震动。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笼统地体会到美国所面临的漫长而艰难的战斗——国内的牺牲、生命的毁灭以及象英国和苏联已经统计的那种伤亡名单。

格鲁非常颓丧，觉得他十年出使日本，结果归于失败，虽然他确实没有任何理由为所发生的事变而责备自己。他很愤慨，但就我所知，他决不一味想对国务院或政府的任何人横加指责。在长期的被拘禁的日子里，他仅有的一次发怒——的确，这是我目睹他发怒的仅有的一次——发生在日本人企图利用大使馆的门口拍摄宣传电影的时候。一天早晨，我们注意到有一大帮人簇拥在大门外。一辆汽车开到了大门口，车里走出一些打扮成日本海军上将和陆军将军的演员。他们把一块写着“我们美国人向日本的帝国之鹰投降”的大牌子挂在大门上。然后他们想把大门打开，仿佛他们要走进使馆。格鲁火冒三丈，把外务省派来专为我们同外界联系的联络员叫来，对他斥责这种粗暴地侵犯外交特权的行为。这个日本人马上命令电影公司的人撤走。

我和大多数高级官员一起住在大使的官邸里。这是一幢座落在小山顶上的舒适的建筑物，格鲁夫人把它装饰布置得十分漂亮。馆址占地两英亩左右。大使馆和大部分馆员住的公寓式建筑物位于山脚下。

我们每天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凑。有学习外语和其他学科的课程，也有文娱活动的时间。我们把馆址平地上的花园改成击球入洞的高尔夫球场。我们想出各种办法使球洞变化多样，包括从汽车库的屋顶上击球，越过一幢公寓式的建筑物。房屋管理人、一位退役的海军下级军官抱怨高尔夫球员在我们被拘禁的六个月里打破了九十九扇玻璃窗。一天，有人打了一个曲线球越过围墙飞向街去，恰好击中了一个德国大使馆人员的脑袋。于是，看守馆址的日本宪兵跑来埋怨，要求我们尽量谨慎一点，但我们因为击中一个德国人而感到一定程度的满足。

114

1942 年 4 月 19 日中午，我们听到炸弹爆炸声，接着是高射炮声，然后响起了空袭警报。我们最初以为这些声音是防空演习的一部分。（上一天，日本宪兵关照我们，第二天晚上大使馆不得漏出一点灯光，因为他们将在全东京进行一次认真的防空演习。）接着，我们看见一架飞机在砰砰的高射炮火尾追中在不超过五百英尺的低空掠过地面。一位陆军武官认出这是美国的 B-25 轰炸机。

空袭过去后，日本人声称击落美国轰炸机多架，并在东京的一个公园里展出了一些残骸。可是，他们出了点儿差错。飞机上的标志“U. S. A.”的“S”被搞颠倒了，证明这些残骸是骗人的玩艺。

我们无法判断空袭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一位专为大使馆人员医治小病的日本女医生在空袭以后的那天早晨告诉我们，一所医院的厢房被炸毁，当时她正好在这医院里。这个消息后来证明是确实的；事实上，这架轰炸机是率领这次空袭的

詹姆斯·杜利特尔将军指挥的，他把目标看错了。

在空袭以后的几天，我们注意到东京上空出现了更多的日本零式战斗机，但我们同这城市的其他地区隔绝，很难觉察到空袭对日本人的影响如何。他们一定沒有预料日本本土会受美国飞机的袭击。硕果仅存的英文报纸《广告报》的一篇报道说，这些轰炸机是从中国自由区起飞的。

我们所有的消息都要靠敌人提供，但当日本人撒谎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还是能够觉察出来的。在最初的那些日子 115 里，日本人沒有必要捏造消息；他们一切都很顺利。然而，我们不相信日本人对珊瑚岛第一次战役的描述。把吹嘘胜利的肤皮潦草的话语同攻陷香港、新加坡和菲律宾时绘声绘影的细致描述相对照，不能不引起我们怀疑。

瑞士和日本政府关于交换侨民的谈判花了很长时间。日本人拒不允许任何外国船只——不管它是否来自中立国——进入它的领海。最后选定葡属东非的洛伦索马贵斯为交换侨民的地点。1942 年 6 月 20 日，我们在横滨登上"浅间丸"。轮船已经启航，接着就因为对美国旅客名单有些争执，夜间在港內抛锚停泊。这次延宕使那些曾经身受日本人虐待的人大为恐慌。美孚石油公司东京负责人基思·迈耶斯曾被单独囚禁在一小间牢房里达四个月之久，他说，如果有可能重新落入日本人的手里，他宁可跳海自杀。我们有些人注意照顾他，寸步不离，直到"浅间丸"终于重新开航为止。我们从横滨到纽约一共花了两个多月。

回到纽约几个月之后，我们听说有一位年轻的美国潜水艇艇长告诉格鲁，一个重雾弥漫的早晨，他在中国海从潜望镜

里发现一艘他认为是满載的日本运输轮。当他刚要下令发射鱼雷的时候，迷雾消散，他看到了船舷上瑞士的十字徽，这是拥有安全通行证的标志。这位艇长说，他的潜水艇沒有得到华盛顿事先通知当时在中国海的日本船上有美国人。他对格鲁说，“要不了几秒钟，就会拦腰给你两发鱼雷。”

一位海军武官和我负责为旅客分配舱位。姓名栏里有的只塡姓氏而沒有名字，因此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性别或年龄。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把一个海员从修女的房舱里请走，不过一般还沒有出大问题。我们到达洛伦索马贵斯时，发现沒有人出力办理转船手续，即替我们轮上和一艘来自中国的轮船上的旅客分配好“格里普斯霍姆号”的舱位。那位海军武官和我自告奋勇承担了这项任务，但却遭到航运代理人颇为轻蔑的拒绝。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事情。结果是轮船启航后至少两

116 天两夜陷于一片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最后，每个人总算得到了安置，而这是在把那些被奇怪地分配在一起的同舱人重新分开以后才办到的。

我们在中午左右登上“格里普斯霍姆号”，我们看到了我曾见识过的一种最豪华的瑞典大菜。每个人谅必对此深有感触；正如我们多数人经历过来的，一直都是食不果腹，目睹此情此景，无不感慨系之，有的人竟失声痛哭起来。

在“格里普斯霍姆号”上大约有六、七十名新闻记者。每个人都想寻找个地方写作。少数运气好的人在图书室找到了桌子，但这里也同所有房间一样，挤满了旅客，喧闹不堪。约瑟夫·艾尔索普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向服侍男客舱的仆役借用一间盥洗室，在两头中间横搁一块木板，然后坐在便

桶上，在一片谧静的环境中写作起来。乔曾为正在援助蒋介石大元帅抗日的陈纳德飞虎队雇用。他冒充为合众社记者，以便获得遣送回国。乔还是象往日那样温文尔雅，并且经常在甲板上举行鸡尾酒会。他的在场为我们增添了极大的愉快。

这次航程的另一特点是一位花边商人为军人的利益——他大体上是这么讲的——而发起的掷双骰赌博。赌博半夜起在甲板上进行，大约有七、八天（上船后第一个星期）之久。这掷双骰赌博很大程度上是以在上海的商人经日本当局批准携带出境的成卷钞票为基础的。谁也说不上这是什么原因。口袋里塞满了许多零钱而又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商人们就把掷双骰赌博搞成大输大赢的赌局。当一个来自沉没于上海港外的"哈里森总统号"上的水手同一位商人发生殴斗的时候，传教士们请求船长制止赌博，船长就照着办了。

一位从日本来的监理公会主教试图组织一种和解联谊会，这近乎是唯一的政治活动。他的理论认为，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的行动太轻率，他指名要为以格鲁为首的美国大使馆主要官员祈祷，因为他们错误地支持了战争。这位主教的活动使得他在我们到达纽约的时候在埃利斯岛遭到短时期的拘留。

我的妻子和母亲与我在纽约的一家旅馆里会面，然后一起去阿维斯的母亲在维拉诺瓦的家。在与华盛顿取得联系后，我得到一个月的休假，我们到新英格兰作了一次愉快的旅行，由于汽油配给限制了私人汽车的使用，我们乘坐火车和公共汽车。返回华盛顿后，我在那里的乔治城购置了一幢房屋，

117

并且获得了升迁，从而实际上结束了我外交生涯的见习阶段，并有机会再与苏联直接接触。

第 二 部 分

在总统手下工作

121

第八章 第一次莫斯科会议

我新任欧洲事务司俄国处副处长，能够与许多对俄外交老手共同工作，感到异常愉快。俄国处处长是洛伊·亨德森，在 1934 年布利特任美国驻苏大使时，亨德森任大使馆内的首席政治报道员，从那时起我就很尊敬他和喜欢他。俄国处内的其他工作人员还有 G·弗雷德里克·莱因哈特，此人 1940 年曾驻莫斯科，以后任驻越南、埃及和意大利大使。还有埃尔布里奇·德鲍，以后任驻越南大使。

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是在逐日的基础上了解苏联的事务，不断向亨德森汇报。我很快就弄清楚，五年前把我卷入的那种在对苏政策上的斗争仍然存在。虽然国务院在 1936 年改组过，引进了一些带有新思想的比较年轻的人员，但是俄国处对俄国人仍然是存有戒心的。从亨德森算起的专家都有这样的看法，即虽然苏联当时是个盟国，美国却必须密切注意它的动向，因为它的最终目标是与美国的最终目标相冲突的。当时并无妨害对敌作战努力的企图，更无阻挠对苏援助的打算。我们都很敬佩俄国人的英勇战斗，我们担心的是未来。

罗斯福与其主要助手哈里·霍普金斯所关心的事情大部分是那时所面临的问题。这就是说，他们集中精力于各种军事决策，因为那时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击退纳粹德国的进攻。白宫竭力想向苏联人证明美国是个名副其实的盟邦，所以它

认为国务院对于各种政治问题的担心是有点扯后腿的味道。

当时还有一种感觉：认为外交部门并不同情罗斯福的新 122
政哲学，外交官办事松劲，往往只注意细微末节而不注意问题的内容广泛的性质。

实际上，这是一位政治领导人试图拖着一班审慎的官员迈步前进的典型例证。象以前的伍德罗·威尔逊和以后隔了几任的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罗斯福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把对外政策的各种决定集中由白宫来做。由于各种决策大部分是军事性质的，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认为无需同国务院商量。后来，他们改变了主张。

霍普金斯的谈吐是很尖刻锋利的，他也有些看不起国务院。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42年秋在一位朋友家里的宴会上。我的妻子紧挨他坐着。霍普金斯朝我点点头，问我妻子坐在桌子对面的是不是她的丈夫。当我的妻子作了肯定的回答时，他说他知道我是"俄国问题的专家之一"，并问她我是否能讲俄语，她说，"是的，他能讲。"霍普金斯没有泄气，对她说，"当然喽，你不曾想要学习俄语吧。"我妻子有点生气，回答说她确实学过，并且学得很好。后来，就在这次餐桌上，霍普金斯又盘问我对苏联的看法。他鲁莽地问我是不是国务院中反苏小集团中的一个成员。我回答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反苏小集团，这时他就发表长篇大论，谈起俄国人在这次大战中表现得多么出色。我反驳说，俄国人仗打得好完全是事实，但不应当忘记苏联的其他方面，尤其是他们反对自由的方面。我以后了解到，这是霍普金斯向一个人进攻的手法之一，用以查明这个人的政治观点如何。

霍普金斯有很多敌人，象他那样同总统十分亲近的人本来也难免这种情况。他以容易激怒闻名，事实上也是如此。有人说他很傲慢，这倒不然。人们还说他有政治野心。有一个时候，他在罗斯福的赞同之下确曾想要充当总统，但在我遇见他时，他已放弃了自己的政治野心，认为他是不能脱离罗斯福单独去扮演一个角色的。

霍普金斯忠于罗斯福，但他清楚地了解这位总统的弱点。当我逐渐了解霍普金斯，看到他对罗斯福极为忠诚，每天从病榻上挣扎起来去帮助总统时，我便对这个才气横溢、喜怒无常的人油然产生了不可动摇的敬爱之心，因为他的确是把他的一生献给他的国家了。可是，我起初并不大喜欢他，那时他怀疑我在国务院有背景，联珠炮般追问许多问题，想探测我对苏联的态度。

123

那时，纳粹几乎占据了苏联在欧洲部分的全部国土。他们正在敲打列宁格勒的大门，当他们从莫斯科被击退时，他们又准备对斯大林格勒作最后的攻击。德国潜艇所造成的损失是惊人的，英国人不得不停止对于驶往摩尔曼斯克的船只的护航工作。在地中海，隆美尔率领的非洲军团正逼近开罗和亚历山大。对于俄国人英勇抗战的崇敬感情遍及整个美国，甚至一向对莫斯科抱怀疑态度的新闻界也倾向于改变口气了。

正是在这个时期，那部奇怪的电影《出使莫斯科》拍摄出来了。影片所根据的是别人替约瑟夫·E·戴维斯写的一本书，叙述 1936—1938 年他担任驻苏大使时的情况。为了协助拍摄这部影片，从莫斯科派来两名苏联技师，在他们的帮助

下，把片子拍成了历来上映过的宣传色彩最浓的影片之一。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内部放映时，我们从影片上找到了六十七处与事实不符的错误。影片的宣传意图异常露骨，甚至在全国对苏联人民表示同情的情况下，这部影片也是失败的。1943年，戴维斯在克里姆林宫放映该影片，使苏联领导人感到很窘，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

俄国人正在肩负着如此沉重的负担，这一事实使我们在对苏关系上感到内疚。美国的官员总是对苏联人解释西方盟国的意图，想要使他们放心，英国的官员也是如此。这种解释往往做得太过分，反而产生相反的效果。苏联人的怀疑使得双方的关系有点暧昧。永远不应当忘记的是，在整个大战期间，苏联从来不允许盟国——不论是美国还是英国——的任何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前线。

希望抚慰苏联人的最明显的例子，是1942年6月罗斯福总统与莫洛托夫会谈后关于发表公报的措辞问题。当时我还没有从日本回国，但我看到了国务院官员的一份报告书。莫洛托夫坚持公报中的措辞必须造成这样的印象，即美国已经承担义务，要于1942年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俄国人在东线所受的压力。公报草案包含如下的一段话："在会谈的过程中，关于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双方已经完全取得一致的意见。"在亨德森看来，这似乎是允 124
许了我们实际上办不到的事情，因此也不打算这样做。这不仅是承担过多的义务，而且是虚伪地承担过多的义务。亨德森建议修改公报，把话改为美国了解开辟第二战场的必要性，在条件许可时立即付诸实现，或者用一句但书来加以说明。

但罗斯福和他白宫的顾问，可惜也包括霍普金斯在内，都急于想讨好苏联人，公报就照草案发表了。莫洛托夫在取道伦敦回苏联时，取得了同样的成绩，英国人签署了一项写有“于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字样的公报。8月间，丘吉尔不得不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解释西方盟国事实上不可能在那一年开辟第二战场的理由。西方盟国正在打算进攻北非，而横渡英吉利海峡到法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几乎要到两年以后才出现。

我总认为，对克里姆林宫承担过多义务的主要原因是担心红军可能垮台，布尔什维克政权会投降或与希特勒妥协。政府中有些人认为，即使是根据虚拟的前提作出的鼓励，也会坚定苏联人的抗战意志。如果当时苏联人了解这个可悲的真相，他们的失望一定是太大了。我们所以过分乐观地作出鼓励，一部分也要归咎于俄国人对战争前途的悲观看法。莫洛托夫显然把苏联的局势描绘得漆黑一团——他几乎说过，如果不开辟第二战场，俄国人就只好撂下挑子不干了——因此罗斯福当时一定感到有必要表现出答应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姿态。对情况作出不切实际的估计，其效果是加深苏联的猜疑，认为西方盟国的政策是要让俄国尽量流血，达到奄奄一息的地步。现在不可能确定，苏联的猜疑是实有其事还是捏造出来的，但我们的乐观态度肯定使我们自身受到了损害。我相信，对俄国人采取直言不讳的政策，只说明我们能办到的事情，这样做或许可以避免苏联以后的猜疑，虽然我并不幻想我们与苏联之间的基本分歧能够得到解决。

在政府部门中，不只是我们这些国务院的官员感到难于

满足苏联人的要求。租借协定是美国据以向其盟国运送援助物资的方案，执行租借协定的官员也有一些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克里姆林宫曾经派了一个采购代表团前来美国，要求尽快地提供最大数量的军用物资，并把它送往前线。大部分的交涉是同租借协定事务管理署进行的，但最初是国务院的一个机构，后来因为涉及军用物资，转归国防部管辖。就民用 125 物资来说，它又成了一个独立的机构。

执行租借协定的官员告诉我，苏联的采购代表团经常催逼他们，摸他们的底，使他们穷于应付。俄国人的一举一动看来好象他们认为美国方面在拒绝一项要求时都是出于恶意，并无正当的理由。执行租借协定的工作人员常常花几个钟头去解释某些物资项目何以在当时无法达到所要求的数量。我认为苏联人采取了有点故意狮子大开口的策略，他们所抱的态度是，既然他们在欧洲承担全部的作战任务，美国人就应当充分供应红军所需要的一切物资。

亨德森在国务院悄悄地领导着反对对苏联人过分讨好的斗争，又过了一年。他是个极其高尚而绝对不为恶习所腐蚀的人。他心直口快，但这种作风并不使他很得人心。亨德森的建议被上级一次又一次地批驳了之后，他在 1943 年便要求免去他的俄国处处长的职务，我被任命接替他的工作。亨德森辞职以后，研究对苏政策的部门便少了一个创始人，他为国务院做的工作与任何已经去世的或还活着的外交官相比，毫无逊色。

在二十年代后期，共有六名专业人员研究俄语，我是第一个得任国务院处长职务的人。

这项变更并沒有使俄国处对苏联的看法发生根本的变化。我和亨德森一样，也认为我们同苏联人打交道是从感情出发，而不是以现实为基础的。然而，我倒不象亨德森那样强烈地要求改变对苏政策，因为在那样的军事局势之下，我当时看不出、现在回想起来也看不出我们还有其他的方针可以遵循。由于我的经验，我了解一些苏联的眞实性质，知道它的领导人受一种不但与民主政府的每一项主张格格不入而且明确抱有敌意的哲学的激励，并照此办事。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觉得几乎不可能使别人相信，颂扬俄国军队卓绝的英勇气概和俄国人民不容置辩的壮烈行为，就是蒙住美国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危险性。

事实上，我也很少劝人相信我的看法，虽然我强烈地反对美国共产党人所说的某些废话。由于世界的命运取决于苏德战争的结局，我无意强调苏联体制的可憎的部分。恰恰相反，我完全同其他每一个人一样，竭尽全力帮助我们的陷于苦战的盟国。在大战期间，我对苏联的态度经常是这样暧昧不明的。

126

不应当低估大战期间苏联对美国的宣传所起的影响。这种宣传不是专门针对美国的；它是总的产品的一部分，但在美国却有不少情愿帮助苏联做宣传的人们。他们当中有些人或许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他们是眞正的共产党人，热衷于利用当时的局势来宣传共产主义；另有一些人那样做，是出于对努力作战所表现的普遍热情，以及对红军业绩的感谢心情。有些人的这种情感异常强烈，甚至你只要一提俄国天气寒冷，都会招来反苏的指责。一天晚间，在一个吹捧俄国人的集会上，

我在莫斯科就认识的英国大使馆年轻官员约翰·拉塞尔说，“这个城市里有些人认为，斯大林格勒的保卫战可以证明苏联沒有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的机构。”

有一天，我同英国大使馆的另一位馆员艾赛亚·柏林谈起，关于苏联问题的讨论关键不在于苏联是怎样的国家，而在于那些发言人的态度。我们想出一个含蓄的比喻来形容苏联的同情者。我们认为苏联的共产主义是一列火车，车上的司机和司炉确切知道火车前进的方向，他们负责把火车开到目的地。他们是领有党证的共产党员。列车员和制动手也知道这列火车开往哪里，但他们沒有参加共产党，所以不能影响列车的方向和速度。他们不向共产党交纳党费。旅客坐在这列急驶于田野间的火车上是很愉快的，火车开往的方向他们是一般表示赞成的，他们是共产党的同路人。簇拥在火车各个门口的是那些为共产主义所吸引、但有怀疑的人；每当火车向右方或左方急转弯时，总有些人掉下车去。最后的一类人是睡眼惺忪的人们，他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站在路轨边上，挥动着手帕和帽子，愉快地看着这列火车开走。他们不知道这列火车开往何处，但他们喜欢看到火车奔驰的情景。

在我就任俄国处处长不久以后，事情发展得很快。盟国的军事局势有了光明的前途，因为一则美英在北非的战役取得了胜利，二则 1943 年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大败德军，三则随后俄国人在库尔斯克的一次主要战役中粉碎了德军的抵抗，但这次战役世人知道得不多。当意大利在 1943 年夏季投降时，我们在国务院的这些人认为这是同莫斯科讨论战后世界 127

的形式的适当时机了。战争的最后结局已经毫无疑问。经过一些商谈之后,华盛顿和伦敦建议召开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莫斯科同意了。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被列入美国代表团的名单。

当我们抵达莫斯科时,赫尔在第一次会谈后告诉我,除了我充任对苏外交政策的顾问外,他还要我给美国代表团当翻译。他说,英国的翻译无法同时为两个代表团工作。我对赫尔说,我已经有两年不经常讲俄语了,对俄语也没有下过苦功,但我当然愿意尽最大的努力。

实际上,我的工作搞得挺好,不过很累。在所有的会议上,我不但要为赫尔和美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当翻译,而且还得做笔记,把每天的会议整理一份纪录,以便用电报发给华盛顿。在那些日子里,我多半是过了午夜很久以后才把工作搞完。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开始认识了美国新任驻苏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以前我只见过他一次。他对各种问题有他自己的看法,有时很固执,他不是世界上可以与之共事的最平易近人的人,但我相信每一个同他共过事的人在分手的时候都敬佩他献身公职的精神和全神贯注地从事工作的能力。我不能说他真正地充分了解苏联体制的实质。他不擅于阅读有关意识形态的书籍。在评定某一问题的策略性质和了解苏联人在某一特定情况下的意图方面,他是很有才干的。但他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把他敏锐的观察结果与苏联对全世界和各资本主义国家总的意识形态上的态度联系起来。结果,他有时候确实没有看到较为广阔的前景。从 1943 年莫斯科会

议之后，我同哈里曼有了密切的接触。我们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也有意见一致的地方，不过我愿意指出，我们的任何意见分歧并未丝毫影响我们的友谊。

作为翻译人员，我和国务卿赫尔要比在通常的情况下接触得多些。在此以前，我不大了解他。1943 年莫斯科外长会议是他毕生事业的高峰。这是俄、英、美三国第一次具有重要 128 意义的会议。会议讨论了许多问题，但重要的决议是：(1)成立欧洲诸询委员会，来拟草德国和欧洲其他敌国的投降条件；(2) 苏联在原则上同意设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以维护未来的和平。

在四国声明中包含着参加一个世界组织的约定（中国没有派代表参加会议，但被邀请签署这个声明)。固然声明里没有谈很多实质性的问题，却也表示出在战争结束时不容忽视的国际合作。美国的新闻界和政府官员充满着乐观的情绪来欢迎这个声明。它被看作是苏联愿意在战后真正成为一个忠实朋友的迹象。

许多处理苏联事务的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苏联是否会认真考虑参加一个象联合国这样的世界组织？我们认为，苏联对于世界政治和社会组织的看法不仅与我们的看法截然不同，而且与其他国家的看法背道而驰。很难看出会有什么共同点。因此，当我们最初把建议草案提交给苏联人的时候，我们是怀着几分疑惧的心理等待他们的反应的。结果使我们又惊又喜的是，俄国人似乎很赞成这个计划。如今回顾起来显然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觉得要想监视和约束盟国，特别是想要防止它们合起伙来反对苏联，唯一的办法是在开头就了解

它们的一切考虑。苏联的这种论据在以后讨论联合国宪章时，就要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赫尔还说，斯大林向他保证，苏联决定参加太平洋战争。这一未经请求而作出的声明是在我沒有参加的一次宴会的谈话中说出来的。赫尔对我们中的几个人谈过这件事，并且在他的回忆录里仍然说斯大林承担这项义务是沒有交换条件的。然而，我们把赫尔的话仔细研究以后，便对斯大林的意图产生严重的怀疑。赫尔并未引用斯大林的原话，当时也沒有问斯大林，苏联参加亚洲战争的条件是什么。这位独裁者沒有提起任何条件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心目中沒有条件。

虽然赫尔在战争的大部分岁月里担任国务卿，人们对他十一年公职的怀念主要在于他一心一意地提倡减低关税率。129 我并不认为他可以称作一个伟大的国务卿，因为他对世界上的政治潮流了解得很有限。他不懂得世界事务中的强权概念，并且按照美国的传统摒弃这个概念。他把敌人看成是酒店中的臭流氓，这种看法后来成为他同一切独裁者打交道时的基本看法。他们都是坏人，要想天下太平和保持正派的作风，就得制止他们为非作歹。

他不是罗斯福宠信的人物，虽然罗斯福对他在美国民主党内的政治影响是有一定的尊重的。赫尔太杂乱无章，太不谨严。总统喜欢同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打交道，因为韦尔斯也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格罗敦学院，而且出身于东部的世家。结果，韦尔斯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夺走了国务卿的许多职权，赫尔就沒有参加任何最高级首脑会议。这种情况使我们在国务院工作的许多人感到泄气，我们对此很不愉快。

赫尔是田纳西州山区人，当他激怒时，特别是当白宫不通过国务院而直接采取行动时，他的言辞常常很粗鲁。他的大弱点是在思想上过分尊重总统的职位。他似乎沒有理解到，罗斯福希望他的下属积极主动地向他提出各种看法，通过电话或亲自同他讨论问题。如果你始终保持沉默，罗斯福的脑子里就不会想到你了。有一次我在赫尔的办公室里，他指着电话机对我说，“如果总统想和我谈话，他只要摇个电话，我就会急忙跑去的。我可不该去打搅美国的总统。”

既然有这样的弱点，又如何解释赫尔在1943年的会议上取得的成功呢？他在对待苏联人方面难道有什么特殊的方法，而他们也眞的喜欢他吗？沒有很多社交活动，但我还记得赫尔在一次宴会席上说的一句使在座的人非常满意的话，那时他说，他很想把轴心国的头头押到临时军事法庭来审判，第二次早晨把他们统统枪毙。不能说赫尔受了苏联人的欺骗；他对于苏联的最终目标并不是盲然无知的。就在我替他当翻译以后，他对莫洛托夫讲了一句毫无意义的话。事后我很有礼貌地对赫尔说，我怕我当时沒有能够把那句话的意思翻译给莫洛托夫听。国务卿对我眨了眨眼说，“就是打算把话说得稀里糊涂。”

1943年莫斯科会议取得成功的眞实原因在于军事局势 130 大为改善，暂时消除了对军需供应这一棘手问题的压力，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减轻了苏联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压力。我们在10月初抵达莫斯科时，俄国军队正在几乎从列宁格勒到黑海这条漫长的战线上全力推进。最少有三次在莫斯科的红场上空施放焰火来庆祝某些俄国城市的解放。由于军事上获得胜

利，苏联人虽然还在催促开辟第二战场，却能够等待预定在下一个月召开的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会议来讨论解决。

在莫斯科会议上，我第一次有机会晤见苏联的两位主要谈判人员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斯大林已经接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但莫洛托夫还保留他的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维辛斯基是莫洛托夫的主要助手。我以前见过这两个人的活动——莫洛托夫在1939年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维辛斯基是在1938年清洗审判布哈林时担任检察官。但我从来没有同他们谈过话。

这两个人在莫斯科会议上看来都有点可笑。如果我记得不错，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人才第一次穿了他们的外交礼服办理公务。这种礼服是黑色的，饰着金边，在腰带上佩有一柄短剑。在我看来，这种礼服很象希特勒的精锐部下冲锋队员的打扮。俄国人对于他们的新礼服是很自豪的。当然，我上面这种想法是没有说出口来的。到大战结束时，苏联的外交官就难得穿这种礼服了。我猜想，他们开始听到外国人的挖苦批评，便悄悄地放弃了穿这种礼服的念头。

象几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一样，莫洛托夫也是个神秘人物，他在这次会议上也保持着这种神情。他显然想表现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但他很少展露笑容，在大多数的会谈中面部没有表情，莫洛托夫是一位小心谨慎，冷静稳重的谈判者，一位典型的有才智的苏联官员，这是他最初给我的特写镜头式的印象。这种印象在我以后与他有更多的接触时格外深刻了。在以后的十几年当中，我曾同他晤谈过许多钟头。

维辛斯基比莫洛托夫要活跃得多，但不如莫洛托夫那样

受人欢迎。每当我窥视他的灰色的眼睛时，我就不禁想起那位检查官在审判布哈林的案件中恐吓被告的可怕情景。作为谈判者，维辛斯基有时候跟人软顶硬磨，但他喜欢谈论在战争时期结成的友谊将如何持续到和平年代中去。有一次，维辛斯基同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迪恩少将和我谈话时说，他认为美、英、苏在战后能够继续合作。他把过去的纠纷归咎于沙皇俄国和英国的侵略政策。“现在一切都改变了，”他说，“派代表在这里出席会议的三大国都拥有足够的国土、人口和资源。苏联政府对其境外的任何土地都不感兴趣，因而在三国最密切的合作道路上并无任何真正的障碍。”然而根据我对苏联的认识和对维辛斯基过去历史的了解，我认为他的话是言不由衷的。 131

对我来说，莫斯科会议最难忘的一点是我第一次同斯大林见面。以往在红场游行或者最高苏维埃开会时，我在相距大约五十到一百码的地方见过斯大林，但我从来没有同他交谈过。当赫尔到克里姆林宫去商谈三巨头会议的地址时，他带我去当翻译。在斯大林办公室外面的房间里，波斯克列比舍夫将军接待了我们，在以后的几年里我还要多次碰见他。他个儿不高，脑袋挺大，脸上的表情有点奸险，后来证明这恰好反映了他的性格。在那没有什么陈设的朴素的外屋里等了几分钟以后，我们被引进斯大林的办公室。这个房间至少有三十英尺长，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办公桌，在我们进入的时候，左边还放着一张铺有绿色粗呢台毯的大桌子，墙上挂着列宁和马克思的像，还有俄国伟大的军事领导人如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像，斯大林从他的办公桌后面走过来迎接我们。

他的身材肥胖魁梧，走起路来有些笨重，象一头小熊似的。他很安详地和一点不摆架子地同我们握手，摆摆手让我们到那铺有绿呢的大桌子边上就座。

斯大林的容貌和他的照片完全一样。他的脸黑黝黝的，嘴唇上面留着一抹浓密的胡子。他的大多数照片是从较低的角度拍摄的，使人产生一种身材比较高的错觉。其实他很矮，只到赫尔的肩膀那么高。他的头发完全灰白了，大战前他的头发基本上是黑色的。他的脸上有一些麻子，牙齿不整齐而且有点发黄。当他点香烟时，我注意到他的左臂有点不太正常。他的眼睛有点发黄，当我斜过眼去多次很快地对他进行观察时，我觉得他的下眼睑比一般高加索人生得朝上一些，较多地掩住了眼球。我最初的印象是，如果他穿上中国的长袍，他倒可以成为中国古画中的人物了。

斯大林背靠墙坐着，他的翻译V·N·巴甫洛夫坐在他的

132 左边，这位翻译我以后跟他搞得很熟。赫尔坐在斯大林的对面，我坐在赫尔的左面。短短的谈话多少带有普通客套的味道。宾主相互问候后便简略地讲了讲当时的军事情况。然后赫尔提出了他这次访问的真实目的，即商定与罗斯福和丘吉尔会谈的地点。赫尔竭力要求选定伊拉克的主要海港巴士拉，因为罗斯福可以乘船到那里去，并且详细地解释了总统不能同华盛顿割断联系的理由——宪法要求总统在一项法案通过后十天内加以执行。斯大林只是模模糊糊地懂得美国的宪法精神，在我看来他显然抱有怀疑。

斯大林也说明一个与总统的要求同样有根有据的理由，虽然这决不是他全部要说的话。由于他亲自指挥苏联的军事

行动，他不愿同他的部队脱离接触，所以会议的地点总必须在交通线由苏联控制的地区。这项要求严格地限定了可以举行会议的地点。但他很有礼貌地说，他将考虑巴士拉这个地点，结果怎样等以后通知我们。显然，赫尔没有说动斯大林，而如果要举行会议的话，地址就得由斯大林来选定。

以后几天，在毫无结果地又交换了几次意见和提出东地中海其他地方的建议之后，最后双方同意在伊朗的德黑兰举行会议，虽然总统和他的顾问对于宪法所牵连的问题仍然有些顾虑。

莫斯科会谈快结束时，赫尔通知我，叫我到德黑兰去充当总统的翻译。我被选中的原因和过程可以说明运气对一个人的经历产生多大的作用。1942年莫洛托夫化名“布朗先生”来到美国，罗斯福选用哈佛大学俄语教授塞缪尔·克罗斯充当他的翻译。克罗斯教授的工作显然搞得很出色，但是当他回到坎布里奇不久后，白宫就听说他举行招待宴会，把莫洛托夫对总统说的话和总统对莫洛托夫说的话都宣扬了出去。在战争期间透露这种消息，就可能给敌国提供极为宝贵的军事机密。罗斯福当然非常恼火，他把霍普金斯叫进办公室，叫他在政府部门物色几个俄语翻译，他们既遵守纪律，又诚实可靠，不会把他们听到的消息到处乱讲。霍普金斯经过调查，提了两个人的名字——乔治·凯南和查尔斯·波伦。当时凯南在里斯本担任驻葡萄牙代办，他正在那里磋商在亚速尔群岛建立军事基地这一敏感问题，所以不予考虑。于是我便被选定在莫斯科会议上接受考验。等我顺利地考试及格以后，赫尔才告知我，我已受过一次秘密的考查，以确定我是否能在德黑

133

兰充当总统的翻译。赫尔对我的工作相当满意，于是他在德黑兰会议之前把我调往莫斯科大使馆，临时担任一等秘书。在以后几个星期，当哈里曼同莫洛托夫和其他苏联官员为筹备三巨头首次会议而举行各种会谈时，我给他当翻译。当我们搞熟之后，哈里曼便敦促国务院（我过了好久以后才知道）把我提升两三级，担任第二把手——大使馆参赞。国务院拒绝了他的申请，我想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不赞成过早地提升外交部门的正规人员，即使在非常时期。这样的提升结果使一个官员在较为年轻的时候就身居高位，以致在他有机会担任其他职务时，人们就会嫌他级别太高。那时他必须接受降级或提早退休的待遇。

最后，在 11 月，德黑兰会议的一切筹备工作业已就绪。由于命运的偶然安排，我的政治生活已经根本改变。我已经跳过了那种使国务院不能与白宫的决策有所接触的障碍。不过几个星期，我从远离美国外交政策主流的一个坐办公桌的普通工作人员，变成一个在美国从未进行过的最有决定性的外交谈判中的参与者了。

第九章　德黑兰会议

134

1943年11月21日，哈里曼在我以及另外一些美国人和英国人的陪同下，搭乘美大使专用的飞机启程，这架飞机是他保留在莫斯科的经过改装的B-25型轰炸机。一路平安无事，直到临近斯大林格勒时驾驶员对我们说，一个引擎发生了故障，必须着陆。当驾驶员和机械师修理有毛病的引擎时，我们被迎接到共产党总部，这是那满目疮痍的城市中唯一经过修理的建筑物。我们在那里进了一顿备有大量伏特加酒的丰盛的午餐。1943年，俄国人在宴会中大量供应伏特加酒而不加限制。以后西方报纸刊登了有关俄国人在大战中酗酒的消息，他们才有所限制。苏联人在许多情况下是不理会世界新闻舆论对他们的批评的，然而，如果报刊上说他们不文明，他们倒是很敏感的。

午餐后，传来了引擎不能迅速修复而我们必须在斯大林格勒过夜的消息。我们的主人便组织了一次汽车旅行，去参观战场。老实说，这次参观我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英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团长格法尔德·马特尔中将（他也和我们在一起，也有点醉醺醺了）说，“这景象没有维佩那么惨。”不消说，他是在法国伊帕尔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

参观后，我们返回预备在那里过夜的共产党总部，发现俄国人非常好客，已经准备了豪华的酒席。这桌酒席一直吃到

135 深夜，我还记得我唱了一支俄国歌，名叫《斯青卡·拉辛》，结果俄国人听了很高兴。这支歌是在其他美国人敦促下唱的，內容涉及到十七世纪农民起义的一位哥萨克英雄，他把他的波斯女朋友扔进了伏尔加河。当我就寝时，有一个脸长得象干苹果似的俄国老太婆过来帮我脱衣服。我确已醉得需要有人帮助，但还不肯让她动手。“别不好意思，小伙子，”她用俄语说，“我们总是这样服侍男宾的。”显然，她沒有忘记革命前的年代。

我们在第二天中午终于飞抵开罗。在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商谈亚洲战争的时候，我漫游了开罗市。

在开罗，我得知霍普金斯关于我对莫斯科所抱的审慎态度仍然有些怀疑。他仍然有点瞧不起国务院，把外交官员称作“追求女同学的男学生、带有脂粉气的男子——而且通常是孤立主义者”。我们作过一次长谈，他又想刺激我，但我捺住了性子，向他解释了国务院官员必须忍受的种种不利条件。我的这番议论一定打动了霍普金斯，因为此后我们相处得很好。不到一年，他把我带进了白宫。

我们在 11 月 27 日星期六从开罗动身。我坐在紧跟着总统座机的第二架飞机上。在德黑兰以南约五英里的加尔·莫尔盖飞机场着陆后，我们驱车沿着一条沒有军警保护的公路进入德黑兰市，在我们抵达市区时，公路两旁才有许多人站着。俄国人和英国人象美国人一样，都为伊朗人的松懈的保安措施感到担心。

原定的计划是请总统下榻美国公使的官邸里。但是，如果这样安排，罗斯福就要每天乘车经过毫无保卫的几条街道

前往彼此相距不远的苏联大使馆和英国大使馆。在罗斯福搬进美国公使官邸不久，莫洛托夫便告诉哈里曼说，苏联情报人员已经发现，在亲纳粹的伊朗人和纳粹特务分子中间正在策划一项阴谋，想要暗杀参加这次会议的三巨头或其中的一个。所以斯大林建议罗斯福迁入苏联使馆大院内的一所单独的楼房，那里有苏联警卫人员严密保护，可以安全地举行会议。丘吉尔倒并不害怕；近在咫尺的英国大使馆有一团印度兵守卫着。

我对那个阴谋是怀疑的，但罗斯福毕竟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在 11 月 28 日搬进苏联政府指定的那座楼房。它楼下有三、四个大房间，还有供总统的菲律宾籍佣人和许多特工人员住宿的地方。我被安置在德黑兰市郊阿米拉巴德区的美国军营内。 136

我发现美国政府沒有准备人员在会议席上作记录，感到很吃惊。最后，由美国军营派来四名具有速写技术的士兵。他们不参加会议，由我根据笔记口授他们写成会议记录。

沒有人员组织会议、规定时间表或处理这次会议的许多技术性的准备工作。而且，罗斯福关于将要讨论的问题沒有介绍情况的文件。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罗斯福的这种不拘形式的工作方法。他不愿意受任何条条框框或者规章制度的束缚。他宁可根据临时想到的念头而不愿按计划办事。

美国的代表团人数很少。因为德黑兰会议主要是讨论军事问题，就罗斯福总统来说，他沒有必要约请国务卿或国务院的任何高级官员参加。从莫斯科赶来的哈里曼大使和我是出席此次会议的仅有的国务院工作人员。我完全是个翻译和摘

记员，没有时间搞旁的工作。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军事参谋班子，由总统的参谋长威廉·D·莱希海军上将和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率领，当时一般认为马歇尔就要率军入法国作战。苏联代表团的规模甚至比我们还要小。英国代表团里军事方面的人员也很多，但英国人还带来了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

想到要在如此重要的外交谈判中当总统的翻译，我有些紧张，这是可以理解的。莫斯科会议给了我很好的锻炼，但这次会议是最高级会议。在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第一次会晤之前，我有几分钟同他在一起，我便提出了某些有关翻译工作的问题。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我问他是否可以记住把他的意见分在几个简短的时间里来谈。我向他指出，如果他的话讲得很长，听他发言的俄国人因为不懂他的话，势必失去兴趣。另一方面，每次不超过两三分钟的简短谈话可以抓住他们的注意力，也使我的翻译工作容易搞得多。罗斯福理解了我的意思。我现在必须指出，他是一位很容易给他做翻译的演说家，因为他把话分成小段，从各方面照顾我的辛勤劳动。丘吉 137 尔可不一样，他往往忘乎所以地侃侃而谈，不大照顾他那活泼的、矮小而有点秃顶的、优秀的翻译阿瑟·H·伯尔斯少校，有的时候丘吉尔会一口气讲上五六分钟、甚至七分钟，可怜的伯尔斯少校便用铅笔拼命在纸上记，竭力想尽量多记下一些话来把那长篇大论译成俄语。

总的说来，会议的各方都是按照同一的办法进行翻译的。罗斯福总统用英语发言，我先作笔记再译成俄语。然后总统再接着说。斯大林和丘吉尔也跟着这样做。使用这种办法的

根本原因是，大家相信发言人自己带的翻译总比倾听发言的那位领导人的翻译更能理解他的话。如果对方的人员来翻译，他就可能被指责为歪曲了原话的意思。而且，不论翻译人员对某种外语多么精通，对方总会用一些很难译出其确切含义的俗话。

在华盛顿，我在盛大的外交招待会上见过罗斯福，但我的接触只限于简单地握握手和交谈几句而已。德黑兰会议使我第一次有机会在眼前对他仔细进行观察。除了偶然发过一次小病外，他似乎非常健康，毫无倦容，总是把那俊伟的头昂得高高的。他显然是这次会议上的超群人物。我发现他心情愉快，能够体谅别人，他亲自同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接触使我们相处得很融洽。

显然，当罗斯福和丘吉尔私下会晤时是用不着我的，所以他们讨论问题我都不在场。由于罗斯福不喜欢留下记录，这些谈话美国方面都无记载可考。丘吉尔却花了很大气力根据对谈话的回忆作出完整的记录，最后在他叙述大战的著作中把它们报道出来了。

在德黑兰，罗斯福每次与斯大林会谈时我都在场，以后在雅尔塔会议时也是如此。我把他们的会谈写成记录，供白宫和国务院参考。当讨论的内容涉及军事问题时，美英联合参谋长也就会谈的过程作了记录。他们的记录关于某些军事问题写得多些，省略了其他方面的某些谈话。我一个人作笔记，而军事首长却有几个记录员，尽管这样，他们还是遗漏了许多比较重要的问题。和我们一样，苏联的会议记录也是由翻译做的。他们主要的翻译是巴甫洛夫，他是斯大林的私人秘书。

138 有时，由V·M·别列日科夫代替巴甫洛夫。苏联所公布的德黑兰会议记录远不如美国方面的完整。显然，苏联人把不符合苏联方针的话语删掉了。

开会而没有记录是危险的。共同写下会议的记录和议事录，可使问题简单化，因为所决定的事项或所谈的问题可以立刻象双方理解的那样记录下来。在战时召开的会议上，大多数没有写下议事录。各写各的记录。当罗斯福和丘吉尔彼此交往时，这种疏忽是没有什么害处的。但苏联人很注意文字，常常煞费苦心地起草任何协定的实际文本。后来我们发现，他们甚至可以把概括性的词句或者根本不存在的词句解释为包含一项默契。所以，在同苏联人打交道时，写下说过哪些话或没有说过哪些话的清楚记录是重要的。

我在德黑兰的工作是我曾经做过的工作中连续几天最艰苦的阶段。在整个下午担任翻译之后，我要在晚饭前挤出时间把写的笔记尽量口述给军队派来的速记员。在宴会和晚间会议上我又要当翻译并写笔记。然后我还要从大会议室走到一个供我们办公用的小房间，边口述边改正笔记，一直搞到凌晨三、四点钟，这时我才坐汽车返回军营，抓住几个钟头睡一会儿，而在早晨八点半钟吃过早饭又要赶回去继续工作。这样的差使我连续干了四天。*

虽然我这样忙着搞记录，四天的会议却给了我品评三位领导人的好机会——了解他们对重要问题的看法，摸清他们

---

* 在会议快结束时，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表扬信给我，信内说，“你已经十分流畅地把我的原话和我的意图翻译出来，以致我觉得斯大林大元帅已经完全明了我的意思了。”

的人格的力量，注意他们互相产生的影响。我曾因不同意白宫的对苏政策而以“现实主义者”自命，却在这次会议上有机会直接看到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彼此打交道的情况。

尽管会议的主要目标很重要——决定怎样采取给予希特勒最后的致命一击的军事行动——会议却很不正规，有点紊乱。有时两位领袖私下举行会谈，话题会涉及全世界的范围。午餐和晚宴表面上看来是祝捷的宴会，席间的笑声中却往往被插进一些由于意见分歧和不信任而发泄的讽刺话。有时也举行全体会议，但也只是名义上的全体会议罢了。显然是按 139 照罗斯福的坚决主张，沒有正式的议事日程。关于近三十年前的德黑兰会议，纵然我研究了记录以后，唤起许多回忆，这却主要只是一点印象而已。

11 月 28 日，是伊朗的一个美丽的星期天，晴空碧宇，阳光灿烂，气候温和。下午三时斯大林穿着一套朴素的卡其布制服(他是苏联的大元帅)，胸前佩着星形列宁勋章，从苏联人的地段，走到美国人住的别墅来和罗斯福会谈。有一位年轻的美国军官出来迎接，把斯大林护送进罗斯福的房间。门关上后，霍普金斯、哈里曼和站在门外的其他一些人神情有点激动。他们注意到那位护送的军官沒有出去，以为他打算在会谈的时候也留在室内。我现在还不认为这个军官有这样的想法；他仅仅是不知道还要叫他做些什么。当我告诉他不必再逗留时，他便离去了。

罗斯福和斯大林握了手，这时，穿了一套蓝色便服的罗斯福坐在装有轮子的椅子上对斯大林说，“见到你我很高兴。我早就想同你见面了。”斯大林在表达了他乐于会见总统的客

套以后，说是由于军务繁忙，迟迟没有实现。

这次主要是互相认识一下的会见，谈话很快地从一个题目转到另一个题目——俄国前线的军事形势(斯大林说，形势不太好)、中国(斯大林以相当蔑视的口气谈到了蒋介石)和叙利亚。当时叙利亚是涉及戴高乐临时政府的冲突场所（罗斯福把危机的产生归罪于戴高乐)。

斯大林也批评了戴高乐，说这位将军是不现实的，因为他只能代表象征性的法国的灵魂，而眞正的、实际的法国正在贝当的领导下干着帮助共同敌人——德国——的勾当。斯大林说，戴高乐在行动上表现得好象他是一个大国的元首，而事实上他只指挥着很小的一点力量。

要正确地估计斯大林为什么会对戴高乐抱有反感，当时是很困难的，就是在今天也并不容易。我认为一部分原因是，感到象法国这样很快就垮台的国家是不值得尊敬或体谅的，这是一个人的自然反应，斯大林也会这么想。由于我对苏联140 事务积有一些经验，当我倾听斯大林谈话时，我就不免感到怀疑，认为他也许还在想着别的什么事情。他预见到法国会重新变成一个强大而健康的国家，阻碍苏联在欧洲实现它的野心。

总的说来，总统同意斯大林对法国的看法，并且说，他认为年逾四十的法国人，尤其是参加过贝当伪政府的法国人，都不应被容许再担任法国胜利后新政府的职务。总统说，丘吉尔首相相信法国会很快地恢复它的强国地位。他不赞成这个看法，因为他觉得还需要多年的眞诚劳动，法国才能被重新证明为世界上的一个重要国家。

总统接着说，他没有建议让盟国流血牺牲以恢复法国对印度支那的统治权，因为经过一百年的殖民主义统治以后，那里居民的生活比以前更坏了。他说，蒋介石曾经告诉他，中国对印度支那并无野心，印度支那人民对于取得独立还没有作好准备，但在对日战争结束后应该无条件地准许他们独立。罗斯福说，他同蒋介石在开罗讨论过对印度支那实行托管的可能性，让那里的人民在一定时期内，也许是二十到三十年，为独立作好准备。

罗斯福关于印度支那的言论反映了他的两种根深蒂固的看法，这两种看法在以后几年里我听他讲过好多次。第一是他强烈地憎恨殖民主义。在有记录可查的多次场合，他反对殖民统治，其结果往往是激怒了英国人。第二是他几乎热烈地强调托管制度的优点。这是他经常为那些尚未准备独立的殖民地提出的解决办法。

斯大林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是狡猾的。他一般地同意，法国由于同德国狼狈为奸，应该受到惩罚，但他没有象罗斯福那样说得斩钉截铁，要把印度支那从法国的手里拿走。事实上，斯大林在德黑兰的目的是一门心思地想证实两个西方盟国是否会贯彻头一年夏天在魁北克作出的决定，于 1944 年春攻入法国。

总统接着谈到了印度，他说已经下定决心，最好是不要同丘吉尔讨论印度的独立问题，因为后者没有解决的办法，只是建议把问题拖到战争结束以后再谈。在顺便提到的时候，总统说他希望有一天能同斯大林大元帅讨论印度问题，但他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从“基层”起实行改革，多少有点按苏联

的方针。

141　这种把苏联的方法说成是从"基层"搞起的提法，明显地表明罗斯福对苏联的无知。他无疑地把布尔什维克政变看作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他不了解布尔什维克是在无政府时期夺取政权的少数派。这场革命是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而不是在此以前发生的，它所依据的是布尔什维克少数派的意识形态，不符合俄国大多数人民的要求。

斯大林说，他认为印度问题是复杂的，各等级之间的文化水平大不相同，并且互相没有联系。他指出，从基层开始改革就意味着革命。

由于三位领袖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即将开始，谈话就到此结束。*

德黑兰会议的第一次正式全体会议是下午四点在苏联大使馆的会议室内举行的。室内的布置太闷，不适合当时很暖的天气。屋子是相当大的，但摆了些大椅子和一张铺有绿色

* 关于这第一次会议，有两项记载说我当时没有在场。在1968年出版的一本名叫《德黑兰》的书里，苏联的助理翻译别列日科夫说，他是在场的唯一翻译，并说罗斯福决定不带我去而与斯大林会晤。毫无疑问，我是在场的；美国方面的记录可以作证，白宫的工作日记也能说明问题，并且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罗斯福讲的头几句话。我把那些话摘记了下来，以后它们出现在美国的正式记录中。奇怪的是，别列日科夫书里记载了罗斯福的同样几句话。我无法解释别列日科夫作这种不正确的报道怀有什么动机，但可能是他信赖了埃利奥特·罗斯福所写的《目睹其事》那本书，在这本书里，埃利奥特引用了他父亲的话，大意是说，总统为了对斯大林表示信任，在开第一次会议时没有带自己的翻译。总统有时候喜欢加枝添叶，可以设想，他希望表现出他多么愿意表示对斯大林的信任，而实际上没有把真实的情况讲给他儿子听。埃利奥特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第一次会面的第二天才赶到德黑兰的。至于说到别列日科夫，他写这段与事实不符的故事，一定是打算抬高自己的身价。实际上，在第一次会议时别列日科夫不是俄国方面的翻译，而是巴甫洛夫。

厚呢的圆桌。窗上挂着窗帘，墙壁上面悬挂着花毡。每一国有四个人坐在圆桌旁边。哈里曼坐在罗斯福的右面，我坐在罗斯福的左面，霍普金斯坐在我的旁边。同斯大林坐在一起的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巴甫洛夫。丘吉尔带来了艾登、战时内阁副秘书伊斯梅勋爵和翻译伯尔斯少校。会议室由苏联的秘密警察担任警卫。（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英、美两国的特工人员是不到会议室去的。）

在会议举行之前，丘吉尔和斯大林一致同意推唯一的国家元首罗斯福主持第一次正式会议。当会议开始后，气氛非常松懈，看不出世界上这三位最有力的人物可能会对涉及千百万人的生命与财产的问题作出决定。沒有那种在重大场合常常表露出来的紧张情绪。罗斯福的几句开场白是讲得很轻松的。在三巨头中，罗斯福最年轻，他欢迎了比他年长的斯大林和丘吉尔。丘吉尔最善于辞令，他说道，“人类的前途掌握在我们手里。”斯大林作为主人，欢迎了他的宾客，然后说，“现在让我们来谈正经工作吧。”罗斯福回顾了美军在太平洋所作的努力，然后转到中心问题——盟军进攻法国北部的日期，这一行动的代号定为“霸王”。罗斯福说，“霸王”行动不应当被次要的问题所推迟。 142

斯大林对于“霸王”行动暂时沒有发表意见，他“欢迎”英美军队在太平洋所取得的“胜利”，并因苏联忙于在欧洲作战而未能参加对日战争表示遗憾。他说，如果土耳其能够参战，那将是有帮助的。

丘吉尔不仅掩盖了他要推迟“霸王”行动的心情，而且说英国和法国决定要在 1944 年 5 月至 7 月调遣一百万大军登

上欧洲大陆。斯大林建议在进行“霸王”行动之前两个月，先派军队进攻法国南部，促使德军从法国北部调走，从而保证横渡英吉利海峡行动的成功。罗斯福赞成这个主意，建议随行的军事参谋人员在第二天制定进攻法国南部的计划。

丘吉尔的眞实心情这时开始流露出来了。他说他个人赞成在执行“霸王”计划的确切日期上有一些灵活性，建议让军事人员在第二天早晨考虑各种可能的方案。斯大林第一次有点暴躁，不满意地说，他没有料到要讨论技术性的军事问题，也没有带军事参谋，不过伏罗希洛夫元帅可以尽力来搞。他说了这些话，第一次全体会议便结束了。

当我赶到办公室去向一位速记员口述我的笔记时，我回想起斯大林发言极为流畅，在选用词句时毫不迟疑的情况。他的俄语在声调结构方面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口音的东西，他的格鲁吉亚口音在我听来倒不算特别明显，虽然后来有人告诉我，一些有教养的俄国人觉得他的口音有点刺耳。我觉得斯大林很能体谅他的翻译，十分注意他每次讲话的长短。他话讲得从容，从来不提高嗓门，在用词方面总是力求表达出某种程度的谦虚精神。

143 当我回到华盛顿，多次见过斯大林的一位老革命者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问我，斯大林是否对外国人露出笑容。当我回答说，“是的，确实露过笑容”时，他说这是新鲜事，因为斯大林对俄国人向来没有笑容，说起话来是粗暴刻薄的。在德黑兰，斯大林用了“据我看来”，“我可能讲得不对，但我认为”和“我相信”等词句，沒有一点专横的独裁者气味。我注意到他只有一次改变了这种脾气，那时我带着罗斯福的一项要求

从背后走近他。我干扰了他对最后公报俄文本的研究，并且他很倦了。他没有转过身来，只是偏了脑袋朝背后嚷道，“老天爷，让我们把这工作干完了吧。”接着他转过身来，看到插进去要同他说话的不是俄国人，而是美国总统派去的使者，这时我第一次看见斯大林有些发窘了。其实他不必发窘，因为我并没有把他生气的话讲给总统听。

那天晚上，罗斯福总统请客吃他的菲律宾厨师做的牛排和烤土豆。罗斯福亲自调配了晚餐前喝的鸡尾酒，这礼节是他喜欢搞的。罗斯福对他自己调制的酒很得意，这种酒确是我从来没有尝过的。他把大量甜的和不甜的苦艾酒倒进放有冰块的酒壶里，再加入一点杜松子酒，然后很快地把这混合酒搅和，把它倒出来。斯大林接过酒杯喝了，等到罗斯福问他酒味如何时才发表意见。这位独裁者说，“嗯，不错，可是它把胃搞得凉冰冰的。”

在晚餐席上，话题从法国开始又很快地转到德国问题上去了。据我看来，斯大林正在玩一套口是心非的手段。他似乎赞成肢解德国并对它采取最苛刻的办法以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我没有记下来，但我获得的印象是，斯大林故意把问题说得过分一些，借以试探西方盟国准备走得多远。以后的许多事件证明，他当时正是这样做的。在会谈中，总统提出了进入波罗的海的问题，但由于翻译中的错误，斯大林认为总统指的是波罗的海国家。*斯大林说，如果他理解这个问题，他是赞成保证船只自由出入波罗的海。

---

* 根据我的笔记，这个错误是苏联翻译人员造成的，但这一定是我的错误，因为我正在替罗斯福当翻译。

罗斯福好象要说什么别的话，这时，不过一霎眼的功夫，罗斯福的面色突然发青，豆大的汗珠开始从他脸上掉下来；他用一只哆嗦的手按着他的脑门。我们都大吃一惊。总统没有说明什么病痛，我们谁也没有觉察出任何不舒服的迹象。霍普金斯立即用一张带有轮子的靠椅把总统推回他的房间，由白宫医生罗斯·Γ·麦金太尔海军少将赶快作了检查。霍普金斯回来报告说，不过有点消化不良，大家这才松了口气。总统整个晚上都躺在床上，没有回到餐厅里来。第二天早上霍普金斯告诉我，他当时很为罗斯福担心——我也是这样——直到医生诊断为急性消化不良，才放下心来。

在罗斯福回去休息后，丘吉尔提出了波兰问题，一面用三根火柴比划着他希望波兰国界将如何划定。他把三根火柴都从东往西挪动，并说事情应当这样办——这就是说，新波兰的大部分国土应从德国割让出来，苏联应当保留它根据纳粹-苏联条约夺取的领土。

斯大林接着问到无条件投降的原则，这个原则是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所竭力主张的。斯大林大元帅争辩说，无条件投降只会起到使德国人团结一致的作用，而具体的条件，不管多么苛刻，会明确告诉德国人，要想结束战争，他们必须接受什么条款，从而促使德国早日投降。*

第二天，11 月 29 日，罗斯福的急性消化不良症似乎已经完全好了。总统象往常一样机敏。罗斯福和斯大林又举行了秘密会谈，主要是讨论军事作战。谈话很快就转到罗斯福想

* 这段话是英国人和我们自己有争论的话题。英国人坚持说总统当时在场，而我那速记下的、不久以后经过誊写的笔记却写明总统已经去休息了。

要建立一个总的世界组织而不是单纯建立一个欧洲组织的计划。总统概述了一个包括三部分的机构。由各国组成的一个团体将提出沒有约束力的建议。第二个团体将是一个执行委员会，它可以提出解决爭端的办法。由四大国组成的第三个团体将拥有实施各项决议的权力。斯大林不相信小国会喜欢这第三个团体,建议设立一个欧洲委员会和一个远东委员会，或者设立一个欧洲组织和一个世界性组织。

罗斯福说，他认为有两种办法可以对付和平可能受到的威胁。如果威胁是由一个小国的革命或某些事态的发展引起的,那就可以使用隔离的办法,即封锁国境和实行禁运。如果威胁比较严重，作为警察的四大国可以对那个国家递送最后通牒,而如果遭到拒绝,则有权采取军事行动。有趣的是,总统谈到了“由一个小国的革命或某些事态的发展引起的”那种破坏或威胁该国领土完整的可能性。罗斯福的这点先见之明预料到在战后年代美国由于共产党的行动而必须加以处理的许多问题。对于罗斯福有关这一点的看法，斯大林沒有提出疑问。 145

虽然斯大林总是小心翼翼，不愿一口答应参加任何一种具体形式的组织，他对于建立一个世界组织的总的想法却从来沒有表示反对。显而易见,斯大林觉得,如果苏联能够杜绝它所不喜欢的行动,不会被迫采取任何违反其意愿的行动,那么,置身于任何世界组织之外将比参加那个组织危险得多。

当我们参加第二次全体会议时，德黑兰会议几乎陷入一次危机；存在着会议是否会成功的实际问题。在几小时前举行的军事首脑会议上,英国人最初有点迟疑,后来终于又提出

一些理由，反对为“霸王”计划规定日期。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苏联和美国赞成在1944年春实施“霸王”计划，而英国则提出主张，由于在地中海作战，可能要推迟攻入法国的日期，考虑到这个问题性质重大，各方面在讨论时态度都比较慎重。

斯大林竭力要求在5月份实施“霸王”行动，他说，“我不管日子定在5月1日、15日或者20日，但有个确切日子是重要的。”虽然苏联人对于“霸王”行动抱有强烈的兴趣，斯大林说话的语调却是平静的。这是他的典型表现。斯大林偶尔拿出预先准备好的文件读几句，但大部分时间他发言是没有提纲的，边谈边用红铅笔随意在纸本上画几个狼头，并且常常以体谅的态度停顿一下，让翻译能够把他的话译出来。他从来不表现出激动的神情，也很少打手势。斯大林难得同他仅有的两个顾问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商量，他安详地坐着，手中夹着一支烟卷，聚精会神地参加讨论。

丘吉尔谈话时常常停下来重新点燃他的雪茄烟，他说，他认为各方面对这问题所持的观点并不象表面上那样相距很远。他说英国政府急于想尽早地开始“霸王”行动，但不愿仅

146 仅为了避免推迟一两个月而忽略在地中海采取军事行动的大好机会。当丘吉尔进一步阐明他的论据时，我注意到他有一种明显的讲话方法。他往往开始讲一句话，然后重复一遍，有时重复两三遍，直到发言的整个轮廓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为止。接着他就会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有些华丽的词藻可以同他在公开演说时用的词句媲美。

当丘吉尔发完了他的议论时，斯大林凑过身去，说他想提

一个考虑得不太周到的问题："英国人对于'霸王'计划是否眞有信心，还是你们只是口头上说说，用来安慰俄国人呢？"丘吉尔皱着眉头，咬着他的雪茄烟回答说，如果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开列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英国政府就有责任把它的每一点力量都投到英吉利海峡的对面去。"他幷沒有详细说明他这种比较含糊的话语，但建议由英美军事参谋人员在第二天早晨开会，拟定一份共同的意见书，提交会议讨论。说得轻一些，斯大林的直截了当的问题使丘吉尔很伤脑筋。

在当天晚间的宴会上，斯大林是友好的东道主，但他沒有放过讽刺丘吉尔的任何机会，隐隐指出丘吉尔私底下对德国抱有好感，希望缔结一个宽大的和约。丘吉尔当时沒有认眞地发怒，也沒有把斯大林的嘲弄一笑置之，而是采用一种悲叹的语调，好象承认他有罪似的。这种表情当然不是丘吉尔所最擅长的。

我不喜欢总统的态度，因为他不但支持了斯大林，而且似乎还很欣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舌战。丘吉尔眞正受到了斯大林的窘迫，这时罗斯福是应当起来帮他的密友和同盟说话的。当然，罗斯福的论点确是偏向斯大林的一边，所以实际上这种反丘吉尔的态度是有理由的。罗斯福从来沒有在我的面前解释过他的态度，但他显然认为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以避免合起伙来同俄国人对抗，而在我看来，这是由于罗斯福对布尔什维克缺少了解而造成的根本性错误。俄国的领导人经常料想幷认识到，在想法和观点方面，英国与美国之间比起其中任何一国同苏联之间必然要接近得多。罗斯福想要表示他同丘吉尔异趣的这种企图是明显的，他骗不了人，而且多半引起了斯大

林的窃笑。

147 斯大林和丘吉尔的舌战大体上是很辛辣的，记录上却写得很呆板。例如，斯大林说他高兴的是丘吉尔从来不是一个“自由党”。记录沒有表达出斯大林所使用的轻蔑语气。翻译总有它的局限性。由于沒有多少时间来推敲词句的声韵或文采，翻译人员常常丢失原话的优美韵味。另外，这三位领袖通常都怕引起误会，并且感到他们拥有强大的权力，不肯在语言上勾心斗角。当他们忘乎所以，插进一些幽默话时，结果就会造成灾难。斯大林说过，应当消灭五万名或者甚至十万名德国军官，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斯大林说的话是认眞的。实际上，斯大林说这个话一半是开玩笑的，他露出讥讽的笑容，还挥了一下手，表示这是对丘吉尔的嘲弄。我不相信他有实行这句话的意图。斯大林处死了成千上万的俄国人，他对于处决五万名德国军官是不会在道义上产生反感的。但他认识到，如果成千上万的人仅仅由于被控曾在德国总参谋部任职而遭到杀戮，他在世界上和在战后仍将成为重要国家的德国的政治影响势必受到损害。

不幸的是，丘吉尔把斯大林的笑话当作眞话，他感情激动地宣布，虽然战犯罪有应得，他却决不赞成把那些为祖国而战的普通军人处以极刑。罗斯福学着斯大林的开玩笑的口吻说，为求符合他在会议上的地位，他愿意提出一个折衷办法——应该处决四万九千名德国军官。这无疑是一句笑话，而且是并不高明的笑话，但许多作者一本正经地把这当作眞话。

这次俄国人的宴会象我在莫斯科吃过的许多顿饭一样，食品的数量多得难以置信。开头是冷盘小吃，然后是热气腾

腾的甜菜汤、鱼、各种肉类、凉拌菜、蜜饯、水果、伏特加酒和葡萄酒。斯大林喝了极少量的伏特加。如果人们想起斯大林生于盛产葡萄酒的格鲁吉亚，那么，他更喜欢喝葡萄酒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从斯大林公开露面的场合来看，他不是一个好喝酒的人。传说斯大林常常寻开心地把他的助手灌得酩酊大醉，但我绝对不会相信斯大林本人也往往是喝醉了的。

在宴会席上斯大林的座位后面站着一个魁梧的俄国人，他身高约六呎四、五吋，生得十分结实，穿着俄国侍者的那种白罩衫。当会议结束，我替罗斯福总统把雪茄烟和小礼物分 148 送给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工作人员时，我决定送一条美国烟卷给那个"侍者头儿"，这在战时肯定是一件受欢迎的礼物。当我手里拿了一条香烟走进室内时，我发现那个"侍者头儿"穿了一套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少将制服。我退了出来，沒有表露出我打算送一条香烟给保安警察的一位少将。

在俄国人举行了宴会以后——后来我才听说——霍普金斯到英国大使馆去会见丘吉尔，告诉他说，他想推迟攻入法国的打算越来越吃不开了。霍普金斯说，美国关于渡过英吉利海峡进行突击的重要性的看法已经牢固地确定了好几个月，苏联的看法也同样是坚定不移的。在劝说丘吉尔爽爽快快地让步的时候，霍普金斯强调指出，首相是沒有什么办法了。至今我还不清楚霍普金斯是否按照罗斯福的指示去见丘吉尔的。我不了解罗斯福同霍普金斯或哈里曼谈话的情况。但那时罗斯福越来越信任霍普金斯，实际上把别人都排除在外。在德黑兰，霍普金斯的影响是很大的。

究竟是霍普金斯的访问还是别的事情起了作用，现在不

得而知，但丘吉尔显然在那天夜里作出了决定，因为在第二天（11 月 30 日）一早，英国人宣布他们没有异议，并由两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在明年 5 月开始“霸王”行动，同时对法国南部实行支援作战。在罗斯福寓所的午餐席上，总统宣布他和丘吉尔已经批准了进攻计划，而斯大林除表示满意以外，答应红军将同时发动攻势。

斯大林对西方盟国实行“霸王”计划的诚意有所怀疑，其原因之一是还没有任命最高统帅。斯大林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听说最高统帅人选尚未确定，便发牢骚说，“那么这些军事行动还会有什么结果？”在暴露其个人独裁的言论中，斯大林谈起苏联试行过委员会制，但发现这种制度行不通。他说道，归根到底，必须由一人负责和由一人作出决定。显而易见，斯大林担心英国人又会想出别的点子推迟攻入法国的日期。

149 据我了解，在德黑兰会议上，从来没有人提到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有可能被任命为最高统帅，虽然马歇尔将军倒有人提过。马歇尔将军正在成为传奇式的人物。如果我记得不错，斯大林在某次会议上曾亲自祝贺马歇尔将充任未来的“霸王”行动的司令。马歇尔也很想担任这项职务，他告诉斯大林说，还没有作出决定。会议开过不到一个星期，罗斯福通知斯大林说，已选定了艾森豪威尔担任最高统帅。

由于“霸王”行动的争论已经解决，丘吉尔便想诱使斯大林讨论远东问题，但这位俄国人不愿意。当苏联人被德军紧攻时，他们竭力想避免让日本人有参加对他们作战的任何借口，这是可以理解的。

晚上，英国大使馆举行盛大宴会。那天是丘吉尔的六十九岁寿辰，还可能代表着英美苏三国在战时密切合作的高潮。宾主热烈地频频祝酒。餐桌的布置富有英国人的优雅的特点。雕花酒杯和银制餐具在烛光下闪闪发亮。虽然三位主角饮酒比较少，伏特加和其他烈性酒却消耗了很多。甚至在这种充满热情的气氛中，斯大林也没有放过挖苦丘吉尔的机会；他把总统和首相都称作“我的战友”，但他又加上一句：“如果我有可能认为丘吉尔先生是我的朋友的话。”

有一次，罗斯福给英国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祝酒。斯大林说，他在参加祝酒之前想先说几句话。他带着微笑说，他承认这位将军颇有才干，但他感到遗憾的是，艾伦爵士对俄国人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他为这位将军的健康喝了酒，说他希望艾伦爵士“会开始更好地了解我们，发现我们毕竟并不是那样坏的”。

当时英国人有点惊慌，因为他们知道艾伦爵士是个脾气暴躁的爱尔兰人，怕他会怒气冲冲地对斯大林的无缘无故的侮辱进行反击，从而有可能破坏宴会上的友好气氛。布鲁克将军先等了一会，想必是要使他自己的脾气冷静下去，然后站起来，谈到英军使用假坦克和假飞机去欺骗德国人的掩护计划。接着艾伦爵士把脸转向斯大林说，由于在战争初期苏联采用了与德国合伙这种他称之为出色的“苏联掩护计划”，他可能对俄国人作了错误的判断。斯大林冷淡地插嘴说，“那是 150 可能的”，我们大家笑了起来，一部分是由于这位独裁者高高兴兴地接受了那句挖苦话，我们都松了口气。艾伦爵士又愉快地说，他的真实愿望是同俄国人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斯

大林说，“这是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会实现的。”*

斯大林在另一次祝酒中说，正是由于美国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尤其是在发动机方面，最后胜利是确定无疑的了。他还说，无论俄国或英国都不能生产那么多的发动机。这是一句难得听到的赞辞，俄国领导人从来不公开说这种赞辞，在战后双方的伙伴关系拆散时，私底下也避免再说这种话。

在整个宴会席上，还谈论了许多有关各国政治局势的问题，丘吉尔定下调子说，他觉得英国的总的局势正在变得“有点粉红”。斯大林热烈地欢迎这句话，说“这是国家健康的迹象”。丘吉尔不愿甘居下风，他说，如果这个过程不是进行得太过分，以致引起消化不良，他并不反对。

罗斯福在晚宴结束时祝酒，把这种政治色彩比作彩虹：“虹有很多颜色，各不相同，但它们混合成一条灿烂夺目的彩练。我们各个国家也是如此。我们有不同的习惯、哲学和生活方式。我们每一个国家都按照本国人民的愿望和理想来拟定我们处理各种事情的计划。可是我们在德黑兰会议上已经证明，我们各国的不同理想是可以汇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团结一致地为我们自身和全世界的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所以，当我们离开这次历史性的聚会时，我们能够在天空第一次看见传统的希望象征——彩虹。”但是，在不多几年里，这些高尚的、感动人心的话语就要被证明与事实完全相反，想起来真有点心酸。这些话现在听起来有些天真，但确实表达了罗斯福对世界未来的希望，就拿我来说，即使当时有很多怀疑，却也有同感。

* 这段对话在官方记录中被略去了。

第二天，12月1日，在罗斯福寓所的午餐席上，丘吉尔劝告斯大林对于参加德国对苏作战的芬兰宽大一些。斯大林回答说，他认为芬兰人对俄国居民象任何一股德国部队一样凶狠残暴，但他觉得，任何为了自身的独立而英勇战斗的国家都是值得尊重的。这也许就是苏联人没有象在东欧那些国家一样占领芬兰的真正原因。他们认识到占领芬兰并不是容易的事。无论如何，斯大林同意对芬兰签订较为宽大的和约条款，英国和美国当然也有几分功劳。 151

那天下午，在举行最后一次正式会议之前，罗斯福又一次使我感到吃惊。在同斯大林私下会谈时，他告诉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说，他希望简单而坦率地谈一个有关美国国内政治的问题。罗斯福指出，1944年就要举行总统选举，他个人不想再度参加竞选，可是，如果战争仍在进行，他也许就不得不这样办。他接着说，美国大约有六、七百万波兰血统的美籍公民，他不愿失去他们的选票。所以，虽然他本人同意斯大林认为应把波兰的国境线向西移动这一总的看法，他却希望斯大林理解他不能在德黑兰或第二年冬天的任何会议上参加讨论这些安排的苦衷。这是我或据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美国人第一次听到罗斯福想竞选第四任总统。哈里曼是在场的唯一另一个美国人；莫洛托夫和巴甫洛夫同斯大林在一起。

斯大林回答说，既然总统已经把问题解释清楚，他也就明白了。我怀疑他是否真正理解美国政治的微妙性，但他能够避免就波兰问题同罗斯福展开一场大辩论，一定是感到快慰的。

我总是闹不清楚，不知道罗斯福为什么决定如此坦率地

同斯大林谈起他与美籍波兰选民的问题。他可能是想给自己找出理由来反对波兰国境解决方案中的某一部分。或者他可能是在表达他当时的眞实心情。我倾向于后一种解释。

在这次会谈中，罗斯福和斯大林还讨论了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国家的问题。总统指出，美国有一些出身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公民，所以这些国家的独立对美国人说来是个道义问题。他感到美国舆论将要求在采取行动之前让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国家的人民先表示自己的愿望。在讨论中间，罗斯福开玩笑说，当苏联军队重新占领那些国家时，他也不打算同苏联打仗。

在这次会谈时，斯大林说他经过一番考虑，同意罗斯福的意见，即新的国际组织应当是世界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

在那天晚上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罗斯福按照他对斯大林说过的话，沒有参加有关波兰问题的讨论。当丘吉尔和斯大林商量这个问题时，我看见英国人和俄国人正在根据一张从伦敦《泰晤士报》撕下来的波兰地图进行研究。因为我们带来了许多附有各种地图的有关波兰问题的书籍，我便请示总统是否可以把其中的一本书借给斯大林和丘吉尔，便于他们讨论问题。经过罗斯福批准，我便拿了一本给斯大林，他看着书中的一幅地图，问我分界线是根据什么资料划出来的。地图标出了波兰东部各民族居住区的分界线。我告诉大元帅，就我所知，唯一可以得到的资料是从波兰方面来的。斯大林哼了一声拿起他经常带着的红铅笔，多少有点轻蔑地在地图上划出哪些地区应当归还给波兰，哪些地区应当由苏联保留。

152

在他们讨论的过程中，斯大林和丘吉尔实际上对波兰的未来国境线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国境包括东面的寇松线，只是象斯大林所指出的那样有些改动，西面则包括奥得-尼斯线。换句话说，新的波兰将把波兰东部的地区割给俄国而取得德国东部的某些部分作为补偿。这项完全是口头上的协定以后导致另外一些纠纷，因为存在着两条尼斯河，一条东尼斯河和一条西尼斯河，当时他们没有讲明是哪一条。丘吉尔和斯大林所同意的划分就是现今仍然存在的那种分界。

罗斯福在前一天与斯大林私下会谈时，说他为了竞选的缘故不能对波兰问题采取任何立场，这是罗斯福犯的大错误，更不必说他错误地向斯大林暗示，美国将不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采取什么行动了。由于前一天罗斯福给自己规定要在讨论波兰问题时保持不必要的沉默，他虽然没有明言，但已经是默认丘吉尔和斯大林关于波兰疆界的协议了。不消说，关于波兰政府的问题后来在雅尔塔会议上引起剧烈的争论，然而，在德黑兰会议上这个问题并未发生。

第二天，即12月2日，当罗斯福即将离开阿米拉巴德军营时，海军上将莱希、霍普金斯和我坐在一辆吉普车上，等着给他送行，这时我想起总统拒绝正视波兰问题这件事。在漫谈苏联在欧洲的目的时，我赞成抱一种悲观的看法。海军上将莱希坐在吉普车的前座，他转过头来带着讽刺的微笑对霍普金斯说，“得啦，哈里，我只能说，我们现在有了好朋友啦。” 153
但罗斯福这时神态非常乐观，兴高采烈地飞往开罗，同丘吉尔和土耳其总统伊斯麦特·伊诺努开另外的会去了。哈里曼和我飞回莫斯科，飞机遇到大风雪迷了路，最后沿着铁道线飞

航，在夜色苍茫中平安到达。

哈里曼大使和美国大使馆中的其他一些人倾向于夸大同苏联取得各项谅解的基本性质，把这些谅解说成是谈判桌上三巨头的"伟大"所致。我认为，我们已经达成了牢靠的军事协议，然而，除了有关波兰东部国境问题英苏达成了协议之外，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完全悬而未决。关于当时斯大林是如何盘算的，有许多令人不安的迹象。肢解德国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倾向。关于苏联想要取得不冻港，也有概括的讨论。可以明显看出，苏联希望在战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波兰国家。关于苏联参加亚洲对日战争将要求何种交换条件，也有些蛛丝马迹可寻。还有苏联同意建立一个世界性组织。回顾起来，在德黑兰会议上就有雅尔塔会议的许多先兆。这些想法刚刚露头，又是非正式提出的，因此没有形成决定。尽管有些修订历史的学者试图根据记录强作许多解释，但雅尔塔会议上的各项协议大致与德黑兰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相符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在德黑兰会议上对这些问题没有作出决定这一事实。

在我们回莫斯科不久，我给哈里曼大使一份备忘录里，我那基本的审慎态度占了上风，我指出了我认为斯大林对于由苏联支配的战后欧洲可能实行的计划：

> 德国将被分裂，并保持其分裂。东欧、东南欧以及中欧各国不会被允许集合起来组成任何联盟或联合体。法国在国外的殖民地和战略基地将被剥夺，并且不会被允许保持任何可观的军事设施。波兰和意大利将大致保有与目前大小相仿的领土，但不大可能被允许维持任何较大的武装部队。结果是苏联将成为欧洲大陆上唯一重要的

军事和政治力量。欧洲其余各国将被削弱到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处于无能的地位。

然而，毫无疑问，德黑兰会议是战时三巨头会议中一次最成功的会议。总的来说，气氛是好的，三位领袖的互相信任和乐观态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鉴于在德黑兰会议上所作的军事决定导致了德国的战败和投降，他们的互相信任是完全有道理的。研究苏联政策的一位现实主义者总会有些怀疑，但有时候他是抱有希望的。 154

第十章 进入白宫

德黑兰协议并没有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开辟一个友好的时代，这在一个月中发生的两起事件可以得到证明。一件涉及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将军，另一件涉及苏联通讯社即塔斯社。多诺万已经到了莫斯科，想在那里设立战略情报局的一个分支机构。他要及时前往地中海，赶上盟军在安齐奥登陆的行动。因为我已接到调回华盛顿的命令，多诺万和我便决定一起动身。哈里曼大使请我们坐他的由轰炸机改装的专机，但当多诺万向苏方要求核准飞机离开时，苏方告诉他，这架飞机是供美国大使个人专用的，其他任何官员不能使用。因此，苏联人拒绝提供为飞行所必须的气象预报。

多诺万是一位面孔红彤彤的、好斗的爱尔兰人，他不肯就此罢休。他对哈里曼说，“艾夫里尔，如果你把这事交给我办，我会让你看看该怎样对付俄国人。”他谈到他任纽约州罗彻斯特市市长时，对付美籍斯拉夫人的经验，指出所需要的是坚定的手腕和顽强的意志。多诺万带了我当翻译，同哈里曼的驾驶员一起到停放专机的军用机场去。我们到机场时大约是晚上十一点钟，见到了苏方的一个武装警卫员。按照多诺万的指示，我说明他是一位美国将军，要见值班军官。在手忙脚乱地打了几处电话后，一个受惊的哨兵领我们去见值班军官——一位瘦脸的年轻上尉。多诺万向他说明了来意。他

说，他认为不让一位美国飞机驾驶员看气象预报是不友好的 156
行为，他作为美国的将军，必须坚持做到这一点。上尉深恐违反上级的命令，但多诺万将军的强硬要求使他软了下来，他便带我们的驾驶员走进气象室看了以后几天的预报。

在回大使馆的路上，多诺万对我非常亲切，他说，"你们这些国务院里的人员真是不够坚强。你们不懂得应该怎样去对付斯拉夫人。你看到了我们这次直接行动的结果。"我沒有吭声。第二天早上我们得到通知，苏联当局已把哈里曼的专机从飞航设备优良和服务周到的军用机场迁往各方面都差得多的莫斯科民用机场去了。艾夫里尔和我都讲究礼貌，沒有去挖苦多诺万。问题最后是按照唯一可能的办法解决的，哈里曼大使写一封信以个人名义向莫洛托夫提出了请求。

在我回到华盛顿后，塔斯社发了一条开罗电头的新闻，指控英国派代表同纳粹在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区秘密会谈。人们问我对此有何想法。我们知道塔斯社在开罗并沒有通讯记者，所以这条新闻必然是在莫斯科编造出来的。直到今天，我还摸不准它的意图何在。可能是经常多疑而且善搞阴谋的斯大林认为，丘吉尔竭力拖延，迟迟不肯规定开辟第二战场的准确日期，背后总有阴谋。是否俄国人真的听到了在西班牙有某种秘密会谈的传说，我们不得而知。

我在华盛顿的生活比起德黑兰会议之前是大不相同了。我已不再是外交界碰巧会讲俄语的一个下级官员。我或多或少处于你可以称之为参与白宫"內情"的地位，虽然并不怎么了不起，总统和霍普金斯都了解我，因此我逐渐能够参与许多零零星星比较机密的事务，尤其是同苏联的关系方面。一位

与联邦调查局有关系的朋友告诉我，有人窃听我的电话，我想这是因为我参与机密，包括开辟第二战场的大概日期在內。显然，我沒有把攻入法国的日期告诉任何人，我的妻子也很有纪律，从来不问有关德黑兰会议本身的问题。有时我们应邀去白宫参加社交活动，更重要的是总统征求我一些有关苏联问题的意见。

157 在我回华盛顿工作不久，莫斯科给国务院送来一份照会，询问1943年初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谈时商定的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原则是什么。克里姆林宫重申了他们在德黑兰提出的论点，认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会给纳粹宣传家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愚弄人们对前途未卜的恐惧心理，从而加强德国人的战斗意志。赫尔被这个论点说动了，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回答说，莫斯科这一论点确实有点道理。在赫尔建议下，我起草了一份备忘录，经他签字送给了罗斯福。这份备忘录是支持苏联的建议的，文中写道：

> 按我理解，苏联政府认为，给加于敌国的投降条件作一些明确规定，不管它们是普通的还是苛刻的，将使敌国不能利用这种宣传上的方便，因此可以削弱敌国军队和人民的斗志。鉴于苏联关心这一问题，总统是否赞成同苏联和英国政府进行讨论，探讨一下是不是需要对各个敌国无条件投降的条件作一些公开说明，以利对敌宣传？

罗斯福的回答是断然拒绝这个建议。他指出，他最近在一篇演说里已强调说明“我们不想摧毁德国人民”。他还举出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向格兰特将军投降的事例，作为无条件投降的“最佳定义”，当时，格兰特将军曾准许南方的军官保持马匹和佩剑。在实际的历史事实中，

格兰特在阿波马托克斯并未要求"无条件投降"。只是1862年在唐奈尔森要塞战中，格兰特才警告S·B·巴克纳将军说，在黎明时他将攻击南军的防御工事："我的条件就是要求你无条件投降。"罗斯福把南北战争的历史稍微记错了一些。无论如何，我们无力改变据我看来是大战中的大错之一。如果罗斯福不坚持要敌国无条件投降，战争可能会提早结束，成千上万的人也许可以免于死亡。

当盟军顺利地攻入法国，德国已经动摇时，罗斯福这项政策的愚蠢很快地就显现出来了。德国陆军军官中间反对希特勒的活动达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失败了，但是，如果这些军官能够有希望求得更为宽大的投降条件——盟军不再坚决要求无条件投降——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战争的期间也许可能大大缩 158 短。此外，盟军攻入德国本土时德国国内已无政府存在这一事实，使德国的分裂几乎成为不可避免。如果柏林能够成为磋商某种投降条件的谈判对象，那就可能还会有一个政府出来办理这件事情。当然，斯大林可能是想方设法要迫使德国分裂，但德国全境如果存在一个政府，斯大林的这个打算就会难以实现得多。十分可能，德国不会象今天这样陷于分裂。

提出无条件投降的原则的责任，几乎完全应由罗斯福总统承担。他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公开作了宣布，表面上是因为他和丘吉尔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消息告诉新闻界。照丘吉尔的说法，他对这项宣布感到吃惊。固然，他当时没有反对，但后来伦敦和华盛顿交换过照会，英国政府问起那个原则的确实性。那时，要求敌国无条件投降，确有使人不

能忘怀的历史性原因。一个自由派的德国政府，曾承担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责任。纳粹党人已经使德国人民相信，当年军队没有战败，而是被社会党人和犹太人叛卖了的。罗斯福还强调另一个理由——要求敌国无条件投降是使盟国紧密团结的必要手段。由于三个盟国的国家利益差别很大，而且主要是由于苏联和西方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鸿沟，一方始终有可能受到引诱，背着另一方进行特殊交易。如果盟国的三方面都坚持敌国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单独媾和的机会即使不是完全没有，也将大为减少。我认为这就是罗斯福当时的想法，虽然我从未听他谈过这个问题。如果这是罗斯福的本意，他一定曾担心斯大林同德国作另一笔交易，因为，就我所知，伦敦和华盛顿是没有单独对德媾和的想法的。

6 月，美英盟军在法国北部登陆作战，这就大大地改善了对苏联的关系。斯大林发表文告，颂扬不遗余力，并拍给罗斯福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苏联的新闻界本来几乎总是不愿相信美国或英国的，这时却用大量篇幅报道盟军的进展。

由于结束战争不过是时间问题，罗斯福决定加紧筹设一159 个世界性的组织。他根据担任总统的经验，知道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非常浓厚，所以他对战后时期不抱任何幻想。他要在美国舆论反对另一次大战的情绪正处于高潮时行动起来。

丹巴顿橡树林会议是在 1944 年 8 月 22 日开始的，这次会议有助于给 1945 年在旧金山通过的联合国宪章打下基础。我被派在代表团担任苏联问题顾问，但我没有参加所有的决议、磋商和会谈。我一般的了解进行的事项，但我在丹巴顿

橡树林一星期有几次至多只呆半天。我参加了会议的正式开幕和正式闭幕，在同苏联代表团进行的关键性讨论会上我常常在场。

在丹巴顿橡树林会议上,除了两个问题以外,解决了所有有关联合国组织问题。沒有解决的是安全理事会的投票程序问题，以及苏联强烈要求接纳它的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全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经过雅尔塔会议和同莫斯科多次磋商,才获得解决。

安理会投票权之所以极关重要，是由于苏联人确实下定决心要捍卫他们的主权，防止国际的或其他性质的机构在其他国家意见的压力下使苏联不能实现它的政策和愿望。因此，苏联人不仅要在安理会有人因和平遭受威胁而建议采取行动时享有否决权，而且还要求有权阻止这类问题和程序问题的讨论。美国国內也有很多意见，反对参加那种在某种情况下能够把它的意志强加于美国的组织。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同俄国人一样,是贊成享有否决权的,虽然我们不愿让它被用来压制辩论或阻碍程序问题的讨论。

关于另一个未达成协议的主要问题，乃是苏联在丹巴顿橡树林突然提出要让它的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作为独立国家参加联合国，这使我们大吃一惊。克里姆林宫为什么提出这个要求,其动机还完全不清楚,但它显然是要在联合国大会中增加苏联方面的票数。苏联人了解到，他们的意识形态体系与其他国家沒有什么共同之点,因而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联合国实际上将处于孤立地位。但是，把仅在名义上独立的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吸收参加的建议，在丹巴顿橡树林会议上除苏联

160 以外的各国代表看来，似乎是对联合国这一概念的嘲弄。英国人在那时同样反对苏联的计划，虽然他们后来改变了看法。罗斯福总统甚至对国会的议员说，如果俄国人坚持这一提议，他将提出反要求，让美国的四十八个州都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

虽然这两个争论的问题始终沒有得到解决，丹巴顿橡树林会议却解决了有关建立联合国的一些次要问题。如果沒有丹巴顿橡树林会议，那就不会有旧金山会议，也不会有联合国。而且，在这次会议上成功地规定出联合国宪章的大纲来，这无疑地使人们抱有希望，认为在大战后的世界中同苏联合作是可能的。我们这些心存怀疑的人大部分保持缄默，因为我们沒有确实的证据可以支持我们在本能上觉得前途尚有麻烦这一想法。但是我象有些人一样，热烈地希望联合国成为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机构。

直言不讳的一位苏联问题专家是当时已经退休的前驻苏大使布利特。布利特在《生活》杂志上撰文说，同邪恶的、无神论的苏联是不能达成任何切实可行的协议的。他甚至希望尽快地同苏联打仗，而据他说这是大多数美国人的共同希望。出席丹巴顿橡树林会议的苏联人看了这篇文章后所表露的情绪是忧虑多于愤怒，他们问我，布利特在美国有什么影响，他的感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全国人民。我竭力劝俄国人对这一点放心，但他们仍然感到不安。

还有一个人在 1944 年中对美国人和俄国人都表示怀疑，他就是我的朋友和同我一起专门研究苏联问题的乔治·凯南。凯南越是深刻地考虑到战后的世界，就越来越感到沮丧。

他比大多数美国外交官更带有知识分子的气味。他原来派驻英国，这时从英国回来，他对那里美军的行为非常吃惊——尤其是，他们看低级趣味的书籍，满口脏话，一味追求性的刺激。他怀疑美国是否还能保持世界强国的地位。与此同时，凯南也预见到苏联要攫取东欧的大部分。我对他说，我同意他对苏联的怀疑，但是我认为，如果他对这次大战的前景看得更开阔一些，他就不会这样悲观了（显然，霍普金斯和罗斯福对我是有影响的）。当时他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我劝他接受这一任命。

161 凯南任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的第二把手不久，就想对斯大林施加压力，因为这位独裁者对华沙地区波兰地下军的起义抱有不正确的态度。这次反对德国人的起义是由博尔将军的部队根据在伦敦一个分裂出来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指示发动的。由于红军接近维斯杜拉河，莫斯科的无线电广播也号召波兰人起来反抗。然而斯大林不但使红军按兵不动（他解释说是因为军需物资缺乏），而且还拒绝盟国的军用飞机在俄国境内降落，这就阻止了英美对于被围困的守军进行空投接济，以致博尔将军的部队终于被歼灭。我们现在很有理由可以猜测，斯大林不愿帮助博尔将军的非共产党军队，所以他没有支援华沙的起义。如果在英国的波兰流亡政府所领导的军队取得了成功，斯大林打算建立一个由苏联控制的波兰政府的计划就会碰到麻烦。

凯南认为当时应当通知莫斯科，除非他们着手援助波兰人，或者至少是准许西方盟国空投接济物资，否则盟国就要断绝对苏联的援助。这样的威胁本来是完全不现实的。我并不

认为苏联会屈服于这种压力。他们肯定不愿派遣军队去为华沙解围。也许他们会允许空投接济，但仅仅这些空投并不能挽救博尔将军的军队。波兰情况的结局不会有什么两样，但整个谈判的进程将有所改变，也许变得更糟。

这个时期对于克里姆林宫的行动表示忧虑的最强烈的呼声还是发自英国首相丘吉尔。当苏军开进东欧时，丘吉尔担心莫斯科将凭借其武力而建立的政治结构。他怂恿罗斯福同意与他本人和斯大林早日举行会谈，讨论战争结束后所引起的各种政治问题。罗斯福表示拒绝，说他必须等到11月举行大选并在第二年1月他再度就任总统后才能考虑这个问题。有过一些报道说斯大林故意推迟会议，以便他的军队在东欧控制尽量多的地区，这一指责并不正确。档案的记录表明，正是由于美国人的种种考虑，雅尔塔会议才延至1945年2月召开的。

10月初，丘吉尔决定他不能等到明年2月了。苏联人正在抱着明显的战后意图而采取军事行动，斯大林不是把全部压力施加于中心目标德国的头上，而是向两个次要的目标——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分兵进击。丘吉尔决心单独前往莫斯科，并以此决定通知了罗斯福。

162 10月4日，当我正坐在国务院我的办公室内时，霍普金斯打电话给我，他以惯常的认真口气对我说，“奇普，请你赶快跑来一趟。”我发现霍普金斯坐在他的白宫办公室里，一条腿骑跨着椅子的扶手。他把丘吉尔拍发给总统的电报交给我，电报上说丘吉尔和外交大臣艾登感到有必要去访问苏联。霍普金斯又把罗斯福亲自起草的回电给我看。回电仅仅祝愿丘

吉尔访问"顺利",并说他完全理解必须作这次访问的原因。

霍普金斯问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我说，我确实有些想法，因为让丘吉尔在同斯大林打交道时代表我们说话是危险的。实际上，罗斯福是在让丘吉尔代表我们说话了。这种行动可能会取消关于欧洲大陆、尤其是巴尔干半岛的未来的和平协议的很多內容。

霍普金斯和我并非不信任丘吉尔，但这位首相关于有些问题的看法与罗斯福的看法不同。霍普金斯在前往作为总统电讯交通中心的白宫地图室时偶然看到了罗斯福的这封回电稿，他便把它扣了下来。霍普金斯指示我拟草拍给丘吉尔和斯大林的、表达我国政府对局势看法的电报,并要求在他谒见总统回来以前把电稿拟好。我找到一位速记员，立即拟好两份电稿,一份拍给丘吉尔,另一份拍给斯大林。拍给斯大林的电文如下:

> 你自然了解,在这次全球战争中,差不多沒有一个政治或军事问题是美国所不关心的。我坚决相信,我们三个人、而且只有我们三个人才能找到办法来解决那些还沒有解决的问题。就这个意义来说，我虽然赞赏首相要求会晤的愿望，却宁愿把你同丘吉尔即将举行的会谈看作我们三人会谈的前奏……

拍给丘吉尔的回电,与拍给斯大林的一样,问他能否在会谈时准许哈里曼列席作观察员。接着罗斯福告诉首相:

> 当然，艾夫里尔并不能为美国承担责任——我不能准许任何人事先为我承担责任——但他可以使我充分了解会谈的情况……

要求让哈里曼作为观察员列席会谈,似乎是很自然的,因

为这次会谈预定只是作为所有三人第二次会议的前奏。在整163个战争期间，英国人和美国人始终象一个球队那样采取军事行动。有共同的计划，有混合部队，也有联合参谋部。在东部的战线上，苏联是完全不同西方盟国商量而独自处理他们的军事问题的。因此，虽然后来修订历史的学者提出为什么盟国不邀请苏联观察员列席魁北克会议和罗斯福-丘吉尔的其他会谈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我看来是文不对题的。据我所知，克里姆林宫从来沒有要求派遣观察员。

当我正在起草电报时，霍普金斯发现总统正在刮脸。霍普金斯指出了我们在“祝愿”电文中所看到的危险。罗斯福由于了解到他所犯的错误，多少有些激动，指示霍普金斯不要把电报发出去。当霍普金斯告诉总统，他已擅自扣下原拟的回电时，总统感到宽心了。

丘吉尔沒有答复。10月8日，斯大林打来一封电报：

> 你10月5日的电报使我有点迷惑不解。我原来以为，丘吉尔先生是按照你们在魁北克达成的协议前来莫斯科的。然而，现在证明我这个猜想似乎与实际情况不符。

显然丘吉尔已经告诉斯大林，说他能够代表罗斯福，因为他从最近在魁北克同总统的会谈中知道了总统的想法。我们的电报肯定使斯大林心存戒备。丘吉尔沒有复电，表明他对会谈的进程有他自己的看法，并且不喜欢哈里曼列席。

实际上，哈里曼在莫斯科会谈中并非每场都列席，包括至今仍保守秘密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内。在那次会谈时，丘吉尔在一张普通的纸上写了一些话，隔着桌子递给了斯大林。他

列出英苏双方将在东欧占有势力影响的程度(在此次交涉中，看来丘吉尔把美国算在英国一方了)。丘吉尔提出:在罗马尼亚，苏联的势力影响为百分之九十，英方为百分之十;在保加利亚，比数为七十五对二十五，苏联占优势;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各为五十对五十;在希腊，英方占百分之九十，俄国占百分之十。斯大林用蓝铅笔在写着关于罗马尼亚的比数的边上划了一勾，表示同意，然后把那张纸交给丘吉尔。后来，看到过那张纸的一个英国人告诉我，斯大林只核定了对罗马尼亚所作的安排。但现在一般人都认为斯大林接受了这整个一笔无耻的交易。

这个安排除了无耻以外，也是不现实的。甚至在旧时代的外交活动中，也很难用百分比来表示两个或更多的强国对某一国家的控制程度。同苏联搞这样的交易是荒唐可笑的。即使在一个联合政府中，由共产党人所控制的部门数目有限，但他们将继续企图扩大他们的势力。一位同共产党部长们共事的非共产党总理，将好比一个力图保持半怀孕状态的妇女一样。 164

现在也沒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协议曾对东欧产生什么影响。我后来听说英国外交部已经把这个协议改写成训令电文，发给英国驻东欧各国的使节，但我从来沒有能够证实这一报道，并且看来也不大可能有这样的电文。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国人和俄国人之间或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都未提起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英国人和俄国人是否又谈到这一协议。有人对我讲，总统在动身前往雅尔塔之前是了解丘吉尔和斯大林的默契的。国务院里沒有人知道这件事;我也不知道。

罗斯福携往雅尔塔一份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起草的备忘录，文中强烈反对把划分势力范围作为保持和平的实际手段这种概念。美国当时和现在都认为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在本质上是不道德的,它不会促进国际间的友好关系,而只会助长各国之间的摩擦。在涉及苏联时，我们只需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忘记列宁为灾害性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作辩护时说的那句话。根据 1918 年签订的那个条约,布尔什维克党人割让了很多的俄国领土。列宁指出，在技术上把共产党和政府区别开来是有好处的。他说明，政府已经签订了这个条约并将予以遵守,但共产党沒有签订,所以不承担遵守的义务。在同苏联商定划分势力范围时，这句名言将是一个极严重的障碍。

在美国,除了把划分势力范围看作不道德之外,还有另一个反对的理由。我们国内存在着几乎来自欧洲各国的人。如果同意把东欧各小国交托给苏联，那就一定会在美国各种族集团中间引起强烈的反对。

无论在口头上或书面上拒绝就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进行165 磋商，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国不承认苏联在东欧各国实行着高度的控制并享有很大的势力。这是现代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如果对此提出挑战,那就是要求人们愿意考虑对苏进行战争。

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国和苏联关于巴尔干半岛究竟达成了什么协议，始终有点弄不清楚。我认为沒有什么正式的协定，但有过丘吉尔写下双方势力影响的百分数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更早一些——我相信是在 1943 年——科德尔·赫尔曾经竭力反对英国和苏联在巴尔干半岛就军事合作作出安

排，虽然罗斯福对此似乎表示赞同，最后，赫尔勉强同意，如果这种合作只在战时实行，那将是可以容许的。

当雅尔塔会议的准备工作接近完成时，我被提名以国务卿特别助理的名义，担任国务院和白宫之间的正式联络员。这个任命是霍普金斯提出的，因为他已开始认识到，总统需要有国务院不断地提供意见。由于盟国军队节节取得胜利，对外政策的中心问题越来越带有政治性而较少带有军事性了。国务院因为往往不知道事态的发展趋势，提不出专门性的意见来。总统与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往来电报都由白宫地图室掌握。许多电报的副本没有分送到国务院。尽管霍普金斯一向对国务院的工作有所怀疑，他却知道它在处理战后的各种问题上是能够作出贡献的。白宫将保留其决策的权力，但通过我这个联络员，可以听取国务院的专门性意见。

我丝毫没有这样的意思，认为霍普金斯感到罗斯福因健康的关系不适于作出决策，因而需要听取国务院的意见。当美国和其他各国交往而需要计划并拟定各种协议时，有许多细节是国务院能够协助解决的。此外，罗斯福在举行极为重要的会议时往往不作任何正式记录，霍普金斯对此感到不放心。他希望我在雅尔塔完成的职责之一是写下一份记录。

只要科德尔·赫尔仍然担任国务卿，那就不可能设立同白宫联络的职务。赫尔显然不愿别人分享他作为国务卿的特权和同罗斯福的接触，尽管这种接触不很经常。他是不会欢迎从国务院中选任一名职位较低的官员去同总统作定期的联系的。1944 年 12 月，赫尔因病辞职，罗斯福提升副国务卿小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接替，这时我才有被任命的可能。斯 166

退丁纽斯只担任了六个月的国务卿。我幷不十分了解为什么他会得到这项任命，但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罗斯福打算利用霍普金斯作为他在外交事务中的主要工具。斯退丁纽斯对于历史知识了解得很少，但在处理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对外援助问题时表现出很好的才干，他可以用他的时间致力于改组国务院。他的溫和性格也是他有利的一面，因为他看来不会引起很多的麻烦。他不会想要反对罗斯福或霍普金斯打算做的任何事情。这些是不容忽视的有利条件，因为霍普金斯想在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成为有力的人物。

斯退丁纽斯是一个相当天眞的正派人。他所有的动机都是正当的。他肯定不是阴谋家，不是好勇斗狠之辈，不是政客。他具有明快而坦率的性格，以童子军般的热情从事工作，这就使他在旧金山会议上推动联合国的工作时起了作用。但他也犯过一些处境困难的错误。就在联合国的成立大会召开之前，他对波兰大使说，他很高兴地等待着在旧金山同他见面，但这位大使是代表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因而遭到苏联的反对，沒有能够参加会议。当时这位大使冷淡地说，他幷不认为会有这样的机会。这可把斯退丁纽斯窘住了。

在通知我就任联络员职务时，斯退丁纽斯对于这个工作沒有给我什么指导。他只是简单地叮嘱我要让国务院了解白宫的动态，幷把国务院专家的意见带往白宫。在白宫，我主要是同霍普金斯接触，但我也常常见到总统。在国务院，主要由斯退丁纽斯给我指示。

在我担任新职期间，我在国务院有一间办公室与国务卿同在一层楼上，但我大部份的时间是在白宫东头一间小办公

室内与霍普金斯一起度过的。我到白宫去时，带有一些畏惧心理，认为我是正在进入一个怀有敌意的地方。但我发现白宫的官员在期待着知识渊博的意见。以前我们不大知道海军上将莱希对待外交官员或国务院官员的亲切态度，但他倒是容易接近的和乐于接受意见的。我们关于世界的前途、尤其是关于欧洲和法国的未来，进行过多次饶有趣味的讨论。我被准许进入白宫的地图室。有关军事战略的电报我是看不到 167 的,但我看到一切关于外交关系的电报。

因为我是白宫的一名助理人员，我得以同为数不多的其他人员参加 1945 年 1 月 20 日罗斯福充当第四任总统的就职典礼。总统未戴帽子，在那飘着雨雪的寒冷日子站在白宫南面的门廊上讲话，这时他显然是很倦乏了。疲劳似乎是很自然的，因为他肩负了长期战争的重担。我当然沒有从他疲劳的面容上看出死亡的征兆。在简单的仪式结束以后，我们到里面去喝酒庆祝。我同罗斯福握了手，祝愿他在新任期间一帆风顺。

我有时被吸收参加总统讲话稿的写作班子，因为有些关于外交事务的段落需要我提出一些建议。在 1945 年总统的国情咨文中,我得以写进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我现在还认为是美国人民应当领会的。这就是权力并非总是坏东西的想法。美国人一般觉得强权政治以及与权力有关的任何东西基本上都是不道德的。我在这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写进了如下一段文字,虽然以后一再改稿,这一段仍被保留了下来。它是这样写的:

在未来的世界中，象“强权政治”这一名词所指的权力的滥用一

定不会成为国际关系中起支配作用的因素。这是我们已经表示赞同的许多原则的核心。我们不能否认权力是世界政策中的一个因素，正如我们不能否认它在国家政治中作为一个因素而存在一样。但是在一个民主世界中，正如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一样，权力必须与责任联系起来，并且必须在公共福利的范围内为它自己辩护，证明它是有理由存在的。

罗斯福在就职后不久，就派遣霍普金斯去欧洲搜集那种在雅尔塔会议上可能有用的情报。在伦敦，他要缓和一下丘吉尔的不满情绪。因为斯退丁纽斯批评了英国干涉意大利的政治，首相非常恼火。丘吉尔拍了一封怒气冲冲的电报给总统，质问国务卿怎么会这样看待他正在干的事。丘吉尔还因为美国舆论批评他热中于使英国保留它的殖民地而生气。他的这种热中情绪反映在他的言论中，说他并不是“为了主持英帝国的破产清算”才担任首相职务的。

霍普金斯要求我同他一起去。正是在这次访问伦敦、巴黎、罗马、那不勒斯和马耳他的过程中，我才逐渐敬佩霍普金斯的。在长途飞行期间，我们谈到了很多东西，我开始看出，虽然霍普金斯只是依稀认识到意识形态因素在苏联人的思想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对外交事务却具有丰富的常识。他对自己的看法很客观，这种特点在那些接近政府首脑的人身上是很不寻常的。

霍普金斯因患慢性结肠炎而深感痛苦，但他从来不诉说他的病情。在把我们从亚速尔群岛载往伦敦的军用运输机上，我们驻亚速尔群岛空军基地的将级司令官开始同霍普金斯谈到他的士兵患性病的比率很高。那位将军解释说，问题

在于士兵们常常同妇女在田野闲逛，不去找性病防治机构。他想在田野附近设立一所伪装为阅览室的妓院。士兵们在与葡籍妇女幽会的前后可以在那里由医务人员进行检查。将军以为他这个想法很聪明，问霍普金斯认为如何。哈里放声大笑，说他担保全国基督教理事会将赞同这个想法。

在伦敦，霍普金斯顺利地安抚了丘吉尔的受伤的感情。与此同时，我深入英国外交部的下层同各种官员会谈，其中的一位是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他对我说了一个关于联合国接纳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问题，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印度曾经侥幸被接纳进国际联盟，因为那时印度还沒有独立的迹象。但英国政府觉得英、印两国的舆论都希望印度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卡多根认为只有苏联会提出反对意见。卡多根说，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准备与苏联作一笔交易，不是接纳苏联的所有十六个加盟共和国，而可接纳其中的三、四个，作为接受印度的交换条件。我告诉他，这不是我们的看法，总统已经明白表示他强烈反对会员国的多重性。卡多根说，"好吧，你们就得自己去进行那场斗争了。我们不会设法阻拦你们，但我们是不会同你们站在一起的。"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斯退丁纽斯，并在雅尔塔告诉了总统。正是因为英国人沒有能够同我们一起反对接纳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那笔交易终于获得成功。

我在伦敦所进行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同波兰流亡政府前领导人斯坦尼斯拉斯·米科拉伊奇克会谈，因为罗斯福总统对 169 他很重视。这次会谈是由美国对各个流亡政府所派的大使馆内第二把手 H·F·阿瑟·舍恩菲尔德安排的。我们到了波

兰驻英大使馆，坐在前面的会客室里眺望着伦敦市的阴暗景色，那时伦敦正遭到导弹的前身、纳粹的V—2型火箭断断续续的袭击。米科拉伊奇克身材矮胖，圆圆的面孔，亚麻色的头发，他那豪爽的表情反映了他的农民出身的特征。他很通情达理，态度安详而坦率。我沒有向他提出我自己的任何建议，也沒有怂恿他对其成立波兰临时联合政府的计划抱成功的希望。我只是答应把米科拉伊奇克的看法转达给罗斯福总统。

当时的问题是，虽然苏联人已经同意把他们伙同纳粹消灭掉的波兰国家重新建立起来，他们却与流亡政府断绝了关系，正式承认了设在卢布林的由亲苏份子创立并由共产党人把持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波兰的合法政府。与谁将统治这个国家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是划定其疆界的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在德黑兰会议上，虽然罗斯福沒有参与其事，丘吉尔和斯大林却已实际上同意把波兰的国境向西移动，从而使苏联取得了它在签订德苏条约时所占据的波兰国土，并从德国割出一大块土地给予波兰作为补偿。

1944年10月，米科拉伊奇克与丘吉尔一起到莫斯科去商谈有关波兰的全部问题。这次会谈以失败告终，这主要是因为米科拉伊奇克不顾丘吉尔的强大压力，拒绝放弃苏联打算吞并的那么大的一片国土。波兰流亡政府的主张之所以不可能实现，是由于波兰的国土几乎全部被红军占领，卢布林委员会正在开始经管这个国家。米科拉伊奇克在与我会谈时说，西方列强应当尽一切努力防止在会议上不对战后波兰问题作出决定。他说，几乎任何的妥协都比根本达不成协议要好得多，因为那样就只会导致他所最担心的后果，即由苏联完

全支配波兰。因此他建议西方盟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计划，设立一个由留在波兰和逃亡国外的一些著名波兰人士组成的政府委员会。这将是在举行自由选举以前的波兰临时政 170 府。在谈话以后，我们把他的意见用电报发往巴黎。我把文件带到雅尔塔去交给了罗斯福。

在英国住了几天以后，我们飞往巴黎去见艾森豪威尔将军。他住在市郊一所名为棕色大楼的房子里，这是一位酷爱拿破仑遗物的英国人的家。大楼的一边是仿照拿破仑在沙漠中所住的行军帐篷盖成的，整个大楼散放着拿破仑的纪念品——武器、书籍、图画和瓷器。艾森豪威尔兴致很高，但对德军去年12月的大反攻还感到有些余悸，那次大反攻曾引起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担心盟军会土崩瓦解。

在巴黎，霍普金斯同戴高乐作了一次长谈，因为后者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批评意见不少。霍普金斯竭力向他保证，我们对法国的政策一如既往——极端友好，并尊重法兰西共和国的利益和前途。戴高乐不想听这套话。因为雅尔塔会议没有邀请他参加，他正在感到痛心。

霍普金斯在巴黎举行的会谈和午宴，我都没有参加，因为他主要认为我是一位苏联问题专家。但是，我却同我们驻法大使馆的许多工作人员以及我早先认识的一些法国人士就法国的总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多少了解了一些戴高乐的各种观点的轮廓。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军事问题的时候，实在不可能让戴高乐参加。英国和美国在欧洲约有八十六个师，在任何特定时间内法国所能召集的兵力充其量不过三个师，另外有两个师的预备队。显然不可能让一个在军事上确实并无重

大力量的国家与肩负大部分战斗重担的国家享有同等的发言权。戴高乐当然不会同意这种观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霍普金斯认为也许可以采取一种折衷的办法，让戴高乐参加雅尔塔会议中的政治性商谈而不参与军事决定，并且他把这项解决办法暗示给当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乔治·皮杜尔。霍普金斯说，罗斯福总统并未授权他提出这个建议，但他认为，如果戴高乐没有异议，总统是会接受他的建议的。霍普金斯觉得他非常了解罗斯福，可以放手提出这种办法，皮杜尔同意把这个办法转告给戴高乐。

第二天早上，我们飞往罗马，霍普金斯在那里谒见了教皇庇护十二世。午后我们飞往那不勒斯同斯退丁纽斯和参加雅尔塔会议的国务院其他人员会齐。在德黑兰会议上讨论政策问题时国务院没有人参加发言，只有哈里曼发表过一些意见，这次雅尔塔会议上却有国务院的许多有关人员参加。

171

有国务院的人员参加，这就意味着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较好。我们已经替总统准备了许多"黑皮书"，内容包括雅尔塔会议上将要讨论的各项问题。在我动身前往欧洲访问之前，我也参加过这类书籍的编写工作。在那不勒斯，我看到了这些"黑皮书"的最后成品。书中对于可能要提交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都作了充分而透彻的分析，并对美国的立场作了详细的介绍，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翌日，即1月31日，我们乘坐一架飞机，飞往马耳他。美国代表团人员被留宿在停靠码头边上的英国巡洋舰"天狼星号"上。第二天我们专门同英国人就会议的各项问题进行讨论。我参加了大部分的会谈，但不是全部，因为舰上的地方很

窄。双方关于所有主要的问题都取得了几乎完全一致的意见。据我看来，英国人对苏联所抱的态度比美国人要现实一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国人已经就欧洲各国的领土问题、首先是波兰的领土问题不断地同苏联积极进行交涉。外交大臣艾登有一次建议我们审慎地开一张单子，列举哪些问题是要求苏联同意的，另外再开一张单子，列举我们准备付出的代价。我们始终没有照办。什么原因呢，我现在可记不起来了。

丘吉尔在1月30日清早就来到了；罗斯福在2月2日上午9点半钟左右抵达。美国总统进入瓦莱塔港的情景是令人难忘的。阳光在波浪上闪耀着，微风吹拂着挂在许多英国军舰和城墙上的旗帜，这时"昆西号"重巡洋舰缓缓地驶进港口。罗斯福肩上围着黑披肩，端坐在甲板上，接受英国军舰上的礼炮致敬和聚集在码头上的观众的雷鸣般的欢呼。他眞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然而，当我登上"昆西号"军舰时，罗斯福身体的外表使我感到吃惊。他的健康状况比我不到两星期以前看到他时显著地恶化了。他不只是虚弱和极度倦乏，而且看来他面带病容。虽然罗斯福在航海途中过了较为悠闲的一个星期，他可以得到休息，但我从未见过他的气色这样差。每一个人都注意到 172 总统的健康状况，我们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开始议论起他的健康的基本情况来。但是，当我注意到他的疾病并未影响他的讲话时，我宽心了一些。

罗斯福拒绝讨论有关雅尔塔会议的策略性或实际性问题，这使英国人有点焦急。这种拒绝可能是出于罗斯福的总

的愿望，想要避免发表明确的意见，而宁愿根据他所获得的情报和双方的态度，在谈判桌上临时确定自己的看法。这种拒绝也可能是由于罗斯福仍然坚持自己的一贯做法，不给斯大林有任何借口说西方盟国正在合伙对付他。在动身去欧洲以前，我曾告诉总统，同英国人事先进行磋商，不会影响苏联的政策。罗斯福当时的答复是有点含糊的，但他的确说过他不愿引起斯大林的怀疑。

总统拒绝同英国人作广泛的讨论，可能是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他可能是为了雅尔塔会议而事先节省精力。在马耳他举行的英美会谈，我参加得不多，但我见过罗斯福多次，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即尽管他的健康状况显然不够正常，他的智力和心理状态却肯定沒有受到影响。他是倦乏的，但遇到重大时刻，他的头脑还是敏锐的。我国的领导人是带病参加战时最重要的雅尔塔会议的，但他工作起来还是效率很高的。我当时这样相信，现在仍然这样相信。

第十一章　雅尔塔会议

我们是半夜从马耳他起飞的。虽然我们没有战斗机护航，我们仍然飞越了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所有这些国家都有一部分被轴心国的军队占据着。我们中午在仓促修理好的萨基机场着陆。丘吉尔比总统晚二十分钟抵达。

莫洛托夫领了一群人欢迎我们，之后，我们被延入室内进餐，餐桌上备有伏特加酒、香槟酒、咸鱼子，熏鲟鱼和黑面包等。我们乘汽车行驶了八十哩，越过高山前往雅尔塔，途中天气不佳，阴云低垂，飘着夹有小雪的雨。至少有两个师的苏军在公路两旁站岗，每个士兵可以看见另一个士兵，整个八十哩的路上都是如此。当总统的汽车驶过时（我和斯退丁纽斯在第二辆车上），士兵们——其中许多是妇女——立即致以俄国式的敬礼，即右臂迅速向前推动手中的步枪，与身体成三十度角。这种敬礼重复几千次，是很动人的。汽车跑了约五个小时。虽然在这乡间大部分无人居住，我们还是看到了战争破坏的残迹——掠夺一空的房屋和烧坏了的纳粹坦克。我相信，罗斯福乘车看到这些断垣残壁，使他加深了对德国的仇恨。“我比一年前更嗜杀了，”当总统与斯大林碰头时，他这样说。

下午六时左右我们抵达雅尔塔。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我们立即被送入白色花岗石造的利瓦季亚宫，这是从前沙皇的

避暑行宫。十月革命后，它已变成结核病人的疗养院。该宫174被用作三巨头会议的会址，同时也是美国人的宿舍。总统专用的一套房间有一间客厅、一间餐室(以前沙皇的枱球室)、一间卧室、一个在宫中唯一的私用洗澡间，还有两三间屋子作为秘密警卫人员的住处。我们其余的人都住在为开这次会议而新粉刷的楼上房间里，多半是两人一间。俄国人作了很大的努力使我们生活过得舒服。他们从莫斯科用火车运来了三家旅馆的人员和设备，修复了德国人连管道装置、门把和门锁都拆走了的利瓦季亚宫房屋。英国人被安排住在离海岸十二哩的伏龙佐夫别墅，俄国人则住在离利瓦季亚宫约六哩的科雷斯别墅。科雷斯别墅以前是据说暗杀过拉斯普金的尤苏波夫亲王的产业。

这里与德黑兰不一样，因为会议是在俄国的土地上召开的，保卫工作没有问题。全体会议是在行宫的大跳舞厅內举行的，各进口处的周围和其他一些地方都审慎地布置了卫兵。罗斯福的秘密警卫人员的举止和行动更引人注意。丘吉尔照例只带一个警卫员，他在任何时候都不显眼。发生过一场虚惊。斯大林在开完会以后出去乘车的路上，急忙地走进了男厕所，可是他的警卫没有注意。我走到外面去等他。过了一两分钟，两名苏联警卫叫喊着冲出来，“斯大林在哪里？他到哪里去了？”我告诉他们斯大林在厕所里，他们才镇静下来。

头一夜我睡得很好，第二天是2月4号，我起身后略进饮料，即去公共餐厅吃早饭。一个服务员向我奔了过来，我认出他是战前我们在莫斯科雇用过的人员。我们曾经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维尔尼·斯卢格”，俄语的意思是“忠实的仆人”。

他热情地向我问好，无愧于他的绰号。从那时起他总尽量给我弄到我所需要的东西。他甚至在我房间里放了几听鱼子酱和几瓶伏特加酒。

上午十一点，美国代表团的高级人员开了一次会。罗斯福看来比在马耳他时身体好得多了。在总统讲了几句适当的开场白以后，大家就对雅尔塔会议的议程进行广泛的讨论。沒有谈到很多实质性的问题。我们意识到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将经历一些困难的时间，所以大家在讨论时都很认眞。我并不很乐观，我觉得其他的美国人也是如此。

我头脑比较冷静，一部分是由于我在抵达雅尔塔时收到了乔治·凯南的一封长信。他在六个月以前被派往莫斯科任驻苏大使馆的参赞，对欧洲的前途非常悲观。他简直看不出在战后的欧洲有同苏联合作的希望。在盟军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人们发表了许多乐观的看法，凯南对此提出异议。他预见到西方盟国需要欧洲各国保持稳定和独立，而苏联则打算往西推进，这中间不可避免地将产生矛盾。他雄辩地作了如下的论证： 175

> 我知道这次大战的各种实际情况，也了解到我们的力量很薄弱，如果沒有俄国的合作，我们就不能取胜。我认识到俄国的战争努力是很巧妙和有效的，它必然要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东欧和中欧的其他民族以获取它的报酬。
>
> 但是尽管有这样一些情况，我看不出我们一定要支持这种政治纲领的理由，因为它同整个大西洋共同体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并且也会危害我们需要在欧洲确保的一切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能同它达成一项体面的、明确的妥协——干脆把欧洲划成两个势力范围——

我们不去干涉俄国的范围，也不让俄国人干涉我们的范围呢？那将是我们为自己和欧洲的朋友们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并且也是我们战后为了在尊严和稳定的基础上恢复生活而能够采取的最正当的办法。

可是我们计不出此，反而做了些什么呢？虽然很明显，战后的实际情况当战争尚在进行时就已逐渐形成，我们却一贯拒绝表明我们在东欧和中欧的利益和愿望是什么。我们已拒绝为俄国的扩张和俄国的责任规定出任何界限，从而使俄国人感到为难，经常疑虑他们自己是否讨价太少或者我们的办法是不是一种陷阱。

除了“瓜分欧洲”之外，凯南还建议下列各点作为替代的方案：

1. 把成立联合国的计划“尽可能迅速地和悄悄地”埋葬起来，因为创立一种国际组织的唯一实际效果将是让美国承担义务，去保卫一个“膨胀的和有害的俄国权力范围”。

2. 应使美国人民纠正其“带有危险性的错误印象，即认为世界的安全将有赖于我们承担某种正式的一揽子义务，在一些法律文件规定的情况下使用美国武装力量”。美国必须保留其决定在何处使用武装力量的权利。

176

3. 美国应当把东欧和东南欧一笔勾销，除非它决定要“奋斗到底”，以其全部的物质力量和外交力量去反对俄国人对上述地区的支配权。

4. 美国应“承认德国之被完全分割为既成事实”，并开始同英、法协商，以便成立一个包括西德各州在内的西欧同盟。

因为我很忙，我只能匆匆地写一封复信：

我不能说我对你的信已经给予应有的注意，因为根本没有时间。

如你所知，你所阐述的意见有很多地方我是赞同的。你应当知道，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显然是在奉行着一项冒有不少风险的政策。可是，你曾否认眞考虑过另外的办法？你所提出的“建设性建议”是非常天眞的。从抽象的观点看来，它们大概是最合适的方案。但作为实用的建议，它们是完全不可能办到的。那样的外交政策在民主政治下是行不通的。只有极权主义国家才会制订并实行这样的政策。而且，我根本不相信在这次战争中我们有任何时间能够认眞地做出与我们做过的事情截然不同的事情来。谈到我们那时所掌握的可以施加压力的手段是很容易的。但始终存在着这样简单的事实：如果我们想要打败德国，我们甚至决不能试图把苏联军队拒之于东欧和德国本身以外。我无论如何想不明白，你所沒有得到的一纸条约竟会被你看作比你确已得到的那些条约更为现实一些。这难道不是实际问题而并非几纸条约的问题吗？或者是我们的伙伴打算克制他们自己，或者是他们不去克制。我认为正如英国人所说的那样，答案还不清楚。但显而易见的是，苏联是要作为世界上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这里留下来了。同他们争吵是很容易的，而我们总是会同他们吵起来的。

我这样很隐晦地对凯南说的是，象通常一样，我在总的方面同意他对当前局势的分析，但我认为他的结论并不中肯。我还记得当时我强烈地感到，如果放弃联合国的组织，那将是极大的错误。虽然我怀疑一个世界组织是否有能力防止大国的侵略行为，但我觉得它能使美国过问世界事务，而不必象凯南所认为的那样，在我们不愿意使用武力的时候去承担使用武力的义务。

至于凯南所谈到的瓜分德国、由苏联支配东欧、把欧洲大陆划分成两大势力范围的总的想法，我就不能同意了。在我看来，如果不是减轻我们的责任，而是承认苏联的势力范围， 177

那就等于是私自和解刑事案件。任何正式的甚或非正式的给苏联在东欧划出势力范围的企图,在协议传出以后,立刻会在我国波兰裔和捷克裔的公民中间引起后果堪虞的大吵大嚷。

我比凯南抱有更多的希望,认为雅尔塔会议可能产生某种切实可行的协议。所有的问题都将经过三位领导人讨论。我并不以为我当时存有幻想,觉得战争的结束将迎来西方盟国和苏联感情融洽的时代。象凯南一样,我对苏联的深刻了解不允许我相信这一点。与此同时,我同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的经常接触以活生生的政治事实锻炼了我,使我对布尔什维主义抱有现实主义的看法。虽然前途似乎毫无希望,美国却必须竭力与苏联相处下去。美国人民已经打过一次漫长而艰苦的战争,至少应该努力去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如果这番努力竟然失败,那也就不能埋怨美国沒有竭尽力量了。

总之,一个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考虑到国内人民的情绪、信念和目标。由专家们最审慎地想出来的计划,纵然在理论上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也会由于得不到广大公众的支持而陷于失败。外交事务的优秀领导人根据专家的意见制定他的政策,并创造一种使舆论予以支持的气候。

罗斯福富于政治头脑,他去雅尔塔参加会议时是深切理解美国的舆论的。由于欧洲的战争已近尾声,美国希望苏联协助最后的对日作战。因此,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使斯大林就参加亚洲战争的时间和范围具体作出决定。罗斯福也知道,在战争期间只能暂时赢得美国公众对一个国际组织的支持,但他认为参加国际组织是防止美国倒退到孤立主义中去的唯一办法。所以,他的另一个主要

目标就是求得关于建立联合国的一致意见。其他的重要问题，主要是东欧和德国问题，必须对照罗斯福的两个意义十分重大的主要目标来考虑。

罗斯福的目标自然是以美国为出发点的，丘吉尔的目标是在传统上属于英国式的目标：维持大英帝国的局面，防止欧洲被一个强国所支配，而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个强国就是苏联。这些目标可以解释丘吉尔为何反对肢解德国，并竭力帮助法国恢复它在欧洲大陆上的主要地位。丘吉尔的外交作风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在下议院的辩论经验为基础的。他的论点总是罗列很多理由，但往往依靠感情的力量来打动人，而这是使斯大林颇为扫兴的。丘吉尔显然对波兰抱有深厚的感情，是英国对德宣战的原因，并且他运用他在议会中练就的一套辩才和技巧来为他所追求的目标辩护。从丘吉尔的主要顾问外交大臣艾登以下，英国代表团的成员一般都了解他们手中的有关文件，并为各种讨论作了很好的准备。 178

对斯大林来说，他的目标决不仅仅是人们可以理解的那种防止德国在恢复以后对俄国发动第三次侵略的目标。斯大林是个布尔什维克，他的主要目标是保护苏维埃制度。因此他觉得他不能依靠资本主义的英国或美国去帮助他，尽管它们在战时的当前利益是一致的。斯大林也不能仰仗某一国际组织去取得莫斯科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在这个组织里苏联将肯定处于少数。苏联必须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苏维埃制度，这就意味着要在整个东欧地区建立卫星政府。斯大林是一位精明而老练的谈判者。他总是镇静自若，在语气和态度上几乎总是很有礼貌的。在防御性的外交谈判中他尤其熟练和富有

成效。当讨论的问题涉及苏联控制下的地区如波兰和巴尔干半岛东部各国时，他表现出他是一个不大顾事实而善于采用推托和拖延战术的能手。关于各项主要问题，他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可是他常常毫不犹豫地引述一些丘吉尔和罗斯福（更不用说我们了）深为怀疑但又无法反驳的事件和行动。在讨论他所控制不了的问题时，斯大林的技巧就不那么高妙，他也不竭力想兜售他的观点了。他的忠实追随者莫洛托夫给了他很好的支持。

罗斯福同丘吉尔和斯大林有时发生争论，有时又进行磋商，他象在德黑兰会议上那样，仍然相信在遇到难题时可以临时找出解决的办法来。然而他这次除带了许多军事顾问外，还带了国务院十几名官员作为依靠的力量。当会议进行时，罗斯福显然并未象应有的那样用心钻研“黑皮书”，但它们对他无疑地是有帮助的。

罗斯福的主要顾问仍旧是哈里·霍普金斯，他当时身体很不好（会议期间体重减轻了十八磅），并且往往把某些事情179 误认为苏联的退让，准备相应地作出让步。

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名义上是美国代表团的第二号人物，罗斯福却只请他去执行实际的任务，例如同英国外交大臣和苏联外交部长解决各项问题。斯退丁纽斯具有想要做好工作的典型美国人的实干作风，他有时感觉不出政治上的微妙之处，但他勤恳而忠实地执行罗斯福的指示。代表团中第三号的主要人物是哈里曼大使，他以前已在莫斯科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斯大林商谈过。国务院其他官员，包括我在内，偶然也单独会见罗斯福。

我的职务是给总统当翻译和顾问。几年以后当我被提名任美国驻苏大使时，我当年的职务成为争论的问题。这次翻译工作给我的压力比在德黑兰会议时要小得多。我在离华盛顿时已讲明必须为我配备充分的速记员，以便记下我口述的话。在所有的时间内我仍旧是罗斯福的官方译员，并且在所有的全体会议上我都担任美国的官方记录员。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英美联合参谋部人员也作了记录，因为这次会议专门讨论军事问题。对于宴会上的谈话以及罗斯福同斯大林的所有私下会谈，我都担任美国方面记录员。*由于事先作了较好的安排，并且因为我与罗斯福、霍普金斯和斯退丁纽斯相知有素，我参加了多次有关政策问题、尤其是有关德国和东欧问题的讨论。

雅尔塔会议一共开了八天，在组织方法上，三巨头对每个问题都沒有进行有条不紊的讨论，也沒有作出具体的决定。他们只是把问题提出来，讨论了一下，然后交由外长或军事首脑去处理，或者干脆把问题搁下，过了几个钟头再谈。三位领袖每天下午四点开全体会议，而外交部长和军事首脑则在每天早晨开会。此外，三巨头中的任何两位还私下举行会谈，在午餐和晚餐时他们三位还坐在一起进行讨论。

从这种杂乱的程序中竟能产生出协议，眞是一件奇事。但是这种经常把一个议题转到另一议题的办法使大家心平气和。尽管有些困难和令人失望的地方，会议始终保持愉快的气氛，这却是事实。在2月4日第一次全体会议前罗斯福和

* H·弗里曼·马修斯和阿尔杰·希斯在全体会议上记录了某些谈话，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爱德华·佩奇在外长会议上担任记录员。

180 斯大林举行首次私下会谈时，这种友好的感情是很明显的。这两个领袖象老朋友一样互相问候，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确实是老朋友，因为他们在德黑兰一起开过会，在那一年互通了许多函电。总统满面含笑，抓住斯大林的手热烈地摇动着。斯大林平时很少露出笑容，现在也微笑着表示很高兴同罗斯福再次见面。我是在房间里的唯一的另一个美国人。莫洛托夫和巴甫洛夫同斯大林在一起，巴甫洛夫担任翻译。谈话从讨论军事形势开始。总统提起，他在横渡大西洋时打过几次赌，认为红军将在美军攻入马尼拉之前攻入柏林。斯大林大元帅回答说，他可以肯定，在他攻入柏林以前，美军将先攻入马尼拉，因为在奥德河战线上发生激烈的战斗。斯大林的这句话至少是与一位苏联元帅回忆录中的说法相反的，那位苏联元帅说，斯大林因考虑到西方盟国的军队进展较慢，故意按兵不动，沒有向柏林长驱直入。如果这是他的意图，他当然会告诉西方盟国，借此表明功绩的。他也许是确实推迟了攻克柏林的日期，但其原因是政治性的——使红军得以攻占东欧的其他地区。

罗斯福始终兴致很高，他提到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讲过的关于将要处决五万名德国军官的笑话，并希望他再致这样的祝酒辞。总统还谈起那个曾使丘吉尔非常恼火的笑话，并补充说英国人打算“保持住他们的蛋糕，还要把它吃掉”。这些话语显然是想用另一种方法向斯大林表明，美国并未采取和英国联合起来同苏联谈判的立场。

这两位领袖在走进行宫的大跳舞厅以前才停止谈话，在大跳舞厅內，只简单地陈设着一张大圆桌和许多椅子。雅尔

塔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专门用来作军事报告，所有的报告都是乐观的。总统说，他怀疑苏联人民对于红军攻进德国所表现出来的欢乐心情是否超过英美两国人民。斯大林指出，红军曾比预定时间提前发动冬季攻势，以帮助减轻英美军队因受阻于德军在阿登山区的反攻而承受的压力。他说，即使英美不来催促，俄国人也是要这样做的，因为这是“我们作为同盟国的义务”。丘吉尔说，他没有打算同斯大林讨价还价，因为信得过斯大林，知道他一定会采取正确的行动的。

当天晚上，由罗斯福作东，在利瓦季亚宫设宴。席上有鸡尾酒，但不象在德黑兰，总统没有在酒里搀其他的饮料。在这晚上的大部分时间，谈话是轻松愉快的，但在将近结束时，话锋转到战后保持和平的问题。斯大林已经表明他的观点，认为三大国既然肩负了这次战争的重担，就应负起和平的责任，并且明白表示他反对较小国家享有能用任何方式抵拒大国愿望的权利。罗斯福倾向于同意由各个大国写出和平条约。丘吉尔则援引了一句诗：“雄鹰应当容许小鸟歌唱，且不问其缘何纵声啾唱。” 181

当领袖们开始讨论在各国之间是否可以持有不同意见的权利时，维辛斯基转过身来对我说，他认为美国人民应该学会服从他们的领导人，而不去追问领导人嘱咐他们去做的事情。我带着一点讥讽的口气回答说，我希望看到他到美国去把这番话对美国人民讲。维辛斯基咧开嘴笑着说，他乐于这样去做。

后来，当我陪送丘吉尔和艾登走到门口时，他们发生了争论。丘吉尔说，他大体上倒是同意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即小

国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但它们在重大问题上不应有发言权。艾登说他不同意，并且表示他准备在任何时候到下议院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要求投票表决。丘吉尔沒有回答艾登的话，而是侧过身来用他通常带着咆哮的声调对我说，他不懂得美国所主张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投票程序的方式。他说他沒有时间去仔细阅读我们说明立场的文件，不知道我能否把美国打算做的事情简明扼要地告诉他。由于我吃了丰盛的晚餐，又照例喝了一点酒，我便有勇气告诉首相，我们的妥协性建议使我想起了关于南部一个种植园主的故事。这个种植园主在圣诞节给了他手下的黑人一瓶威士忌，问他喜欢不喜欢这种酒。当这个黑人回答说恰到好处时，农场主问他指的是什么。黑人回答说，如果那瓶威士忌味道再好一些，主人便不会送给他，而如果酒味再坏一些，他就不会喝它。*

182 在以后的几天，出现过不痛快和愤懑的时刻，但彼此友好的总的气氛却一直延续到斯大林招待的最末一次晚宴。在一次祝酒时，斯大林提议为丘吉尔首相的健康而干杯，并且说他是"全世界最勇敢的政界人物"。斯大林指出，当欧洲其他国家都匍伏在希特勒面前的时候，英国独自屹立着抗击德国的兵力。饶有趣味的是，斯大林沒有为纳粹-苏联条约辩解或表示歉意。最后他说他认为"一个人的勇气对全世界的未来历史显得如此重要的，几乎还史无前例"。斯大林还提议为总统的健康干杯。他说，他和丘吉尔作出决定是比较容易的，

* 英国人的记载中谈到一段情节，即在罗斯福所设的晚宴席上，当他用"乔大叔"这个绰号称呼斯大林时，斯大林当时有点着恼，但在我的笔记里没有提到这件事。可能我碰巧离开餐厅，可是我不记得有这件事情。在罗斯福和丘吉尔互通的电报中，他们往往用"乔大叔"称呼斯大林，或者干脆用"U.J."两个字母。

因为他们为了本国的生存而战斗。他说，但是还有第三个人、即罗斯福，“他的国家并未受到入侵的严重威胁，但也许由于抱有更广泛的民族利益感，即使他的国家并未遭到直接的危害，他还是首先创议采取一种手段，使全世界都能动员起来去抗击希特勒。”他所说的那个手段是指美国的租借法案。

这种友好的感情也往下传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在这次宴会席上，斯大林讲了一句他所特有的半开玩笑的话。他建议为那些“当我们自得其乐时还在辛劳工作”的人干杯，并举杯祝愿翻译人员身体健康。翻译人员悄悄地商量一阵以后，推我出来致答辞。我已经喝了几杯伏特加酒，精神振奋，便改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几句话，提出这样的口号：“全世界翻译工作者，联合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你们的老板。”最初是短暂的沉默，接着斯大林哈哈大笑，站起来绕过餐桌，同我碰杯，祝贺我的“机智”。

在这种友好感情的表面现象之下，三位领袖正在就战后世界的形式展开激烈的斗争。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达成的决议固然在当时几乎普遍地被颂扬为巨大的成就，最后却受到最初来自右的方面、以后来自左的方面的猛烈攻击，因此雅尔塔会议无疑地是美国历史上最引起争论的一次会议。从我站在罗斯福身旁的地位，我目睹了他同苏联人交换意见的几乎所有的重要会谈。

以下是我所见到的当时各种问题发展和解决的经过。

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罗斯福总统首先展开关于德国问题的讨论。我感到他健康状况可能会影响他的思路，这里就 183 是一个例证。总统漫谈了他所了解的1886年的德国，那时半

自主的小邦如达姆施塔特和罗滕堡很是繁盛。他说，后来柏林政府使德国实行中央集权化，是全世界遭受祸害的根源之一。对于罗斯福的这种漫谈式的、不得要领的言论，苏联领导报之以有礼貌的淡漠态度，英国人感到有点厌烦。丘吉尔摆弄着他的雪茄烟，艾登把眼睛凝视着远处。如前文所述，英国人和我们在场的每个人一样，在马耳他岛就对总统的健康有点担忧，从这方面来说，他们一定已经注意到他讲话的空泛了。

关于把德国分裂成几个小国的问题，讨论时没有得出结果。我的印象是，三人中的任何一个并不真心想这样做，斯大林更是非常谨慎。虽然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倾向于肢解德国，在雅尔塔会议上他却确实希望让别人来对这个想法充分负责，以便战后苏联在德国作宣传时可以利用别人的观点。我不能说我在雅尔塔会议时就看到了这一点，但在战争结束，斯大林向德国人民保证，说他从来不想分裂德国时，他的心愿就很明显了。

对于肢解德国的问题，罗斯福的真正的看法如何，现在还是一个谜。毫无疑问，他在德黑兰会议上是考虑过把德国分裂成几个小国这一想法的。在雅尔塔，罗斯福说他仍旧认为把德国分成五个或七个小国是个好主意，但在展开讨论时，看来他对肢解德国的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了；他不过是口头上谈谈这个逐渐消逝的想法而已。

甚至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也对肢解德国的说法表示赞同。在雅尔塔，他“原则上”支持这种想法，但他觉得欧洲需要有一股力量来抵消苏联的势力，实际上是赞成让一个统一的

德国以及法国来担当这项任务的。

最后，三巨头决定把这问题交给由外交大臣艾登和苏美两国驻英大使组成的委员会去解决。这个委员会从来没有开过会。

三巨头还必须决定是否要给法国划出一个驻德占领区来。丘吉尔竭力主张给法国划出一块占领区，并让法国参加盟军管理德国的委员会。他向斯大林保证，这个计划将不影 184 响苏占区，因为法国占领区将从英、美占领区划分出来。总统一开头就说他赞成接受法国提出的享有占领区的要求，但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认为法国不应参加管制德国的机构，以免其他国家也要求担任同样的任务。于是斯大林企图抢先把问题决定下来，他说他感到大家已经一致同意从英美占领区划出一块作为法国占领区，但法国不得作为管制委员会的成员国。这个说法当然是不正确的；它并不代表首相的观点。但是在会议记录中我却找不到有谁对斯大林的说法提出任何异议。

在强调法国参加对德占领的重要意义时，丘吉尔说美国将在欧洲保持驻军多久还是个问题，并探询罗斯福的意见。总统回答说，他认为美军驻在欧洲的时间将不会超过两年很多。他接着说，凡是旨在保障和平的合理措施，他觉得都可以在国会和全国赢得支持，但他并不认为在欧洲驻扎大量美军的措施也会得到这种支持。

有人批评罗斯福总统的这个说法，认为它直接有利于斯大林的行动，后来斯大林在东欧发动侵略时，就是认定美国不会干涉的。然而我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用来支持这种看法。所有参加雅尔塔会议的人以及任何肯花费时间去阅读一下会

议记录的人都很清楚，罗斯福当时的发言根本涉及不到以后发生的情况，即德国分裂为二，其境内驻有苏联和西方盟国互相对峙的占领军。总统所谈的，倒是关于遵守一项和平条约的、仍然团结一致的盟国在德国某些地方实行半永久性占领的问题。他是在估计美国国会和人民能够在多长的时期内继续支持美国军队永远驻在德国以防军国主义复活的想法。当然，后来当国会看到欧洲有被苏联控制的危险时，它就强烈支持美国军队无限期地留驻在德国了。

在第二次正式会议之后，霍普金斯、欧洲司司长H·弗里曼·马修斯和我企图劝说总统，把德国的一个区域交给法国而不让它在管制委员会中占有一个席位是行不通的。*我们也185 向总统指出，如果没有法国参加而要想管理德国，这在政治上实际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国是德国的世仇和邻邦，又是我们最悠久的朋友。

有些关于雅尔塔会议的记述错误地认为罗斯福曾强烈地反对把德国的一个地区交给法国管制。事实不是这样。他只反对法国作为德国境内管制委员会的一个拥有充分权力的成员。在这一点上，他对戴高乐将军的个人情绪和如下一种信念可能起了影响：他认为，就象在其他许多场合所发生的那样，有法国参加进去，只会在委员会中产生混乱和争论。斯大林认为，如果把法国放在委员会里，别的国家就会开始要求享受同样的地位，他的这种看法也可能影响了罗斯福。

在我们的会议结束时，罗斯福似乎改变了看法，虽然他只

---

* 在我的记忆中，这次会议在全体会议之后而不是如官方记录所说的在全体会议之前举行。关于这次会议，没有正式叙述。

答应重新考虑。后来，他在一次正式会议上说，经过适当的考虑，他已经得出结论，法国应该在管制委员会中有一个席位。这时，斯大林把双臂举过头顶，说“斯达尤斯”，这在俄文是表示“我投降”的意思。*

斯大林接受法国作为一个有充分权力的占领国，这是出人意外的。在会议的第一天，我担任斯大林和总统私人会谈时的翻译，在会见时斯大林对戴高乐和法国人有不好的看法。当这个问题最初在会议上提出来，要在德国管制委员会中给予法国一个席位时，我们也遭到反对。但是当罗斯福转到丘吉尔的立场上时，斯大林如果再这样做，就沒法不遭到法国的敌视了。

斯大林接受了法国，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使罗斯福更加相信他对这位独裁者有巨大的个人影响。沒有一个西方的代表提出斯大林对法国占领区的让步是否应当给以报偿的问题。斯大林可能是从策略手法上去考虑的。当他看到他对某一爭端不能取胜时，他有时就让步，希望以此影响西方的谈判者。实际上，斯大林答应让法国参加，可能影响了罗斯福对德国赔偿问题的态度。

到雅尔塔去参加会议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沒有作出向纳粹德国索取赔偿的明确计划。当讨论这个问题时，两国都同意受害最烈的苏联理应得到大部分赔款。显然，除非对于德国国内遭受破坏的程度有了一点眉目，甚至开始考虑那个国 186

* 从后来关于盟军进入柏林问题发生的多次危机来看，应当指出，在雅尔塔会议上没有讨论有关占领这个城市的计划。会议只批准了把这个国家划分为几个地区和这座城市划分为几个区的欧洲顾问委员会的计划。

家所能支付的赔款数额也是滑稽可笑的。而且，丘吉尔和罗斯福都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从协约国、特别是美国取得的贷款占德国所付出的赔款的很大一部分。这样一来，不是战败国而是战胜国出了钱。苏联要求大国首脑同意给它一个规定的赔款数额。雅尔塔会议曾围绕着这个问题发生争论。

讨论的结果是设立一个赔款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上，英国人不同意规定明确的数额。美国最后同意把苏联如下的提议作为委员会“讨论的基础”：德国应付赔款二百亿美元，其中半数付给苏联。我反对这个让步。罗斯福所以同意，是因为他收到霍普金斯的一张便条，说俄国人觉得我们是在偏袒英国人来反对他们。委员会没有解决赔款问题。它开了许多次会，但不能议定一个具体的数额。这个问题最后是在波茨坦会议上解决的。

会议的第二天，外交部长们在午餐时讨论了赔款问题。莫洛托夫表示希望美国给莫斯科提供长期贷款。在雅尔塔会议以前，他于1月间就在给哈里曼的一份照会里提出这个问题。这个照会要求美国贷给苏联六十亿美元，年息二厘，十五年后开始偿还，三十年还清。这笔款项将用来在美国购买工业品。从照会的语气来看，似乎不是苏联向美国要求帮助在战后重建国家，而是苏联帮助美国解决它的失业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上，斯退丁纽斯告诉莫洛托夫，美国愿意在任何时候讨论这个问题。几乎谈判了一年，始终谈不拢来，这部分是因为所提出的年息二厘的利率低于当时的利率年息二点三七五

187 厘。这些情况是值得指出的，因为有些历史学家曾经大肆渲

染，说美国在战后没有给莫斯科贷款。

雅尔塔会议上最困难的问题是波兰。苏联人知道，既然他们实实在在地控制了波兰，他们归根结蒂就能在波兰为所欲为。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英国和美国非常注意波兰。西方的目标异常简单——即使波兰人选中了共产主义政府，他们也有自治的权利。因此苏联外交的任务是继续抓牢波兰，同时又不和西方国家公开破裂。在这方面，斯大林表现了高度的机智，他对这个问题的地理因素有广博的知识（如边境的位置），并顽强地击退西方国家为成立真正民主政府创造条件的种种努力。

每当斯大林在他的椅子后面来回踱着以解释他的论点时，问题就一定是相当重大。他的卓越的辩论才能突出地表现在波兰问题上面。当罗斯福说他要求波兰的选举象凯撒的妻子那样纯洁时，斯大林说，"人们说她纯洁，但事实上她有她的罪过。"

新波兰的疆界虽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却不成为一个困难问题。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大部分。总统想把里沃夫及其附近的油田还给波兰，但斯大林不同意。丘吉尔重新考虑了他在德黑兰会议上匆匆忙忙地放弃德国土地的问题。他仍然赞成把波兰的边界往西移动，但他指出，如果这只波兰鹅填满了那么多的德国饲料，因而消化不良，那将是可惜的。斯大林不理睬这个论证，说在有关地区的大部分德国人在红军推进时已经逃跑了。

真正的争论是关于举行选举以前统治波兰的政府的组成问题。斯大林坚决要求伦敦和华盛顿承认他在卢布林建立的

临时政府，撤销设在伦敦的反共的波兰流亡政府。美国和英国提出的建议则要求成立一个新的暂时的政府，包括农民党领袖米科拉伊奇克（我同他曾在伦敦会谈过）、国外其他温和188 的波兰人以及卢布林政府的成员。我们反对把卢布林集团作为唯一的代表，因为它纯粹是苏联一手炮制的。

波兰问题是到2月6日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才讨论的。总统以我给他的米科拉伊奇克的备忘录为依据，提出可以建立一个由卢布林和伦敦两地的波兰领袖组成的委员会。当时丘吉尔强调波兰对英国多么重要，英国就是为了帮助波兰才参战的；他吁请斯大林宽宏大量，接受一个让波兰独立的解决办法。这位英国首相问是否可以在雅尔塔成立一个新的波兰政府。

吁请斯大林宽宏大量，从表面上看，这不是一个坏的策略。它奉承了斯大林的权力感，给他以显示豁达大度的机会。但在这件事情上，它沒有发生作用。斯大林在回答时说，他懂得波兰对英国来说，是个有关颜面的问题。但他指出，对苏联来说，波兰不仅是个颜面问题，而且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在三十年的期间，它两次成为侵略的走廊。他坚决拒绝减少对卢布林政府的全力支持。对于丘吉尔的由三大国建立一个新波兰政府的建议，斯大林机敏地回答说，“人们把我称作独裁者而不称作民主主义者，但是我有足够的民主主义感情，我拒绝在不征求波兰人的意见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波兰政府。”

那天在我们离开会议桌的时候，美国人和英国人面临着在波兰问题上竭力进行挽救的艰巨任务，能挽救多少算多少。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简单的事实：红军占领了大部分波兰

国土；斯大林有力量推行他的意志。但是总统也不肯轻易罢休。那天夜里，他指示我起草一封给斯大林的信，把米科拉伊奇克的意见归纳到信里去。我写了这封信，经过稍稍改动以后，就送给斯大林。信里写道：

亲爱的斯大林大元帅：

关于我们今天下午的会议，我考虑得很多。我想十分坦率地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

就波兰政府来说，我十分不安的是三大国对于波兰的政治结构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我看来，你们承认一个政府，我们则和英国人承认在伦敦的另一个政府，这会使我们大家在全世界处于不利的地位。我相信这种事态不应当再继续下去，否则它只会使我们的人民认为我们之间有了裂痕，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情况。我也下定决心不让我国和苏联之间产生裂痕。我们之间的分歧肯定是有办法可以消除的。 189

你今天的谈话，特别是当你的军队向柏林突进时你决心要保证后方的安全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你不能容忍，我们也决不容许会给你的军队制造这种麻烦的任何临时政府存在。我希望你知道我对此是十分注意的。

当我告诉你，我们国内的人民对于他们认为我们在战争的紧要阶段发生分歧这一点是抱有批评态度的时候，你必须相信我的话。他们实际是说，如果在我们的军队聚歼共同敌人时我们还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们将来对于甚至更为紧要的事情怎么能够互相谅解呢。

我必须对你表明，我们不能承认象现在那样组成的卢布林政府；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公开的、明显的分歧，全世界将认为这是我们在这里所进行的工作的可悲结果。

你今天说你准备支持任何多多少少有成功机会的解决这个问题

的建议，你还提到有可能把卢布林政府的几个成员带到这里来。

我体会到我们对于解决这个问题都抱有同样的焦急心情，我愿意把你的建议扩大一些，认为可以把卢布林政府的贝鲁特先生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先生以及下列波兰人中的两三位立刻请到雅尔塔来，据我们所知，这些人在组成一个我们三方都能予以承认和支持的新的临时政府时是需要的：克拉科夫的萨皮亚哈大主教、文岑提·维托斯、祖尔洛夫斯基先生、布耶克教授和库泽巴教授。如果由于这些波兰领袖来到这里，我们能够同他们一起商量出一个波兰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无疑也将包括来自国外的一些波兰领袖如米科拉伊奇克先生、格拉布斯基先生和罗默先生），那么美国政府以及我想一定还有英国政府就会准备同你一起考虑它们断绝同伦敦流亡政府的往来、转而承认新的临时政府的条件。

我希望我毋需向你保证，美国将永远不会支持在波兰境内的任何敌视俄国利益的临时政府。

不消说，由于我们同这里的波兰人会谈而能够组成的任何暂时的政府将保证尽早在波兰实行自由选举。我知道这是完全符合你想看到在战争的混乱中出现一个自由而民主的新波兰这一愿望的。

190

你的最诚恳的

弗兰克林·D·罗斯福

我们提到美国公众对于美国和苏联在波兰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反应，其目的在于向斯大林指出情况的严重性。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把这段话加进去也许是一个错误，因为斯大林把我们搬出美国舆论的做法看得毫无意义，就象他自己把提起最高苏维埃的意愿这一点看得毫无意义一样。

第二天，即2月7日，在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巧妙地拒绝了罗斯福的建议，并让莫洛托夫介绍作为波兰问题最

后协议基础的苏联计划。这个计划规定把波兰流亡集团中的若干民主派领袖增加到卢布林委员会中去，扩大的临时政府应尽快举行选举。固然，如果不写上保证条款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计划，但我们从中看到一种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的因素。在第二天的反建议中，美国要求成立一个由三大国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邀请波兰国内外的领袖在莫斯科开会，组织暂时的全国团结政府，然后由这个政府实行自由选举，产生永久的政府。虽然莫洛托夫表示尊重这项建议，但他巧妙地删去它的主要之点，又修改其他几点，以致沒有剩下什么实质性的內容。

根据罗斯福的建议，波兰问题被移交给外长们处理，由他们制订出妥协方案的细节。当我确实了解到罗斯福和斯大林不举行会谈的时候，我偶然也作为一个旁听者参加外长会议，2 月 9 日我就非正式地参加了这种会议。我沒有给斯退丁纽斯当翻译，却帮助他起草了一个文件。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这个文件是过分迎合莫洛托夫的要求了。文件建议把卢布林集团改组为以所有民主力量（包括波兰国內外的民主主义领袖）为基础的“有充分代表性的政府”。这个草案要求三大国的代表负责检查自由选举的举行。

不出所料，莫洛托夫反对美国草案中要求成立“有充分代表性的政府”这种提法，他认为这是抛弃卢布林政府。他的措词是“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进行改组，其含意是，卢布林集 191 团确实是民主的，但应当更扩大一些。他还希望在被允许参加选举的党派前面加上形容词“非法西斯的和反法西斯的”。他还主张取消三个同盟国家监督选举的责任。在美国代表团

的一次会议上，我提请人们注意，“反法西斯”这个词含义太广，因为任何反对在波兰建立共产党政府的人很容易被称为“法西斯分子”。这句话被修改为“所有民主的和反纳粹的政党”。

那天晚上，在斯大林别墅召开的外长会议上，关于波兰问题的一套原则最后达成协议。在争执得很厉害的这个关于波兰的最后协定中，主要的章节如下：

> 由于红军全部解放了波兰，波兰已出现了新的局势。这就要求所成立的一个波兰临时政府具有比最近西部波兰被解放以前更广泛的基础。现在在波兰行使职权的临时政府应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进行改组，把波兰本土和国外波兰人的民主领袖都包括进去。这个新政府应命名为波兰全国团结临时政府。
>
> 莫洛托夫先生、哈里曼先生和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美国和英国驻俄大使]受权首先在莫斯科同目前的临时政府成员以及波兰国内外的其他波兰民主领袖会谈，以便按上述方针改组目前的政府。波兰全国团结临时政府应当保证尽早在普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举行自由的、不加限制的选举。在这些选举中，一切民主的和反纳粹的政党都有权参加并提出候选人。

这些章节的含义即使今天根据已发生的实际情况重新阅读一下，也是很清楚的。但是它们还不够明确，有仓卒写成的迹象。甚至没有提到波兰国内外非卢布林派波兰人的人数。对我们在雅尔塔的人来说，“首先”一词是写得够清楚的了，现在也仍然是如此。但哈里曼、克拉克·克尔和流亡国外的波兰代表们不久就发现，苏联人把“首先”一词解释为莫斯科的谈判只应由卢布林政府成员参加，而并非象英文本清楚地指

192

明的那样，第一次会议应在莫斯科而不是在华沙举行。我并不认为苏联人把“首先”一词放在协定中是为了后来要加以曲解。我倒是认为俄国人在后来研究文本时发现这个措词有他们可以利用的漏洞。我们沒有看出漏洞，这又一次足以证明西方盟国在同苏联打交道时往往疏忽大意，而对苏联人来说，甚至末了一个逗点也是有意义的。我们唯恐别人说我们在那里拣芝麻，不肯为了捍卫一个立场去仔细地注意那些小地方，这样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第二天，在一次外长会议上解决了最后一个问题：美国撤回它所提出的由盟国监督选举的要求。我相信，斯退丁纽斯从总统那里获得了让步的指示。我当时不在场，因此不知道会谈的细节。

人们批评罗斯福，说他在雅尔塔会议上沒有给波兰做更多的事情。我不能同意。他和丘吉尔由于渴望避免分裂而作出的让步也许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个协定固然不象西方所希望的那样，在我们看来却是可以接受的，尽管我们多少还有一些疑虑。如果协定被充分遵守，那么可以设想，波兰今天还会是一个独立国家。

我不敢说我知道罗斯福心中是怎样想的，但是从他在雅尔塔的言行来看，我认为他已经竭尽全力帮助了波兰人。他的行动不是出于对伦敦波兰人的任何同情（虽然他见过米科拉伊奇克，并且钦佩他），也不是要想在华沙树立一个反苏政权。波兰遭到纳粹的蹂躏和残酷对待，后来又眼看要受苏联的统治，他只想给波兰人民以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利。他有国内政治上的考虑，即考虑美国波兰人的强烈情绪，又有他的外

交目标，即认识到苏联具有保护其西侧的决心而谋求盟国之间的团结。他想求得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这个妥协方案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斯大林所坚持的要求超出了免受攻击这一范围；他要在波兰建立对生活各方面进行权力统治的苏维埃制度。红军给予斯大林以实现他的愿望所需要的权力，因此他不顾他在雅尔塔会议上所作的诺言。斯大林把所有的牌握在手里，并且打得很好。我们最后只好放弃一切。

193 另外有一个题目也涉及我们同东欧的关系，这就是美国所提出的欧洲解放区宣言。国务院准备的草案要求三大国对于已被解放的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协商，以便保证建立民主的政府。出乎意料，当罗斯福总统于2月10日提出这个建议时，斯大林只表示有一点需要修正。他所加的一条是：需要支持"这些国家中积极参加斗争以反对德国占领的人们"。我们认为加上这类东西是极大的错误，因为这就会使苏联人有机会去支持他们自己的追随者并排斥别人。斯大林的修正案被推翻，他并没有就这一点进行争论。

宣言被通过了。如果苏联按照宣言办事，东欧的面貌本来可以大为改观。几乎所有针对苏联东欧政策而提出的抗议都涉及宣言中的某一条。苏联的一切行动，从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不到一星期维辛斯基便强迫罗马尼亚成立一个由共产党人掌握实权的政府开始，到苏联在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一系列动作为止，连表面上都没有同英国或美国进行任何磋商。我常常感觉奇怪，不知道斯大林当时为什么同意这个宣言。

关于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表决程序的协议倒是雅尔塔

会议上一个实在而持久有效的决定。理事会中的常任理事对行动计划可以行使否决权，如果没有一个限制行使这种否决权的协议，那就不会有联合国，因为苏联人甚至会不让讨论有关苏联的重大问题。

苏联人当然关心如何在这世界组织的决策机构中保障他们的地位。他们不放心的是，经过了解以后，美国提出的这套办法是否能充分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且，我认为斯大林还没有充分研究我们所提出的建议的运用方式，他想听听总统的解释。我们的这套办法实际上是由斯退丁纽斯作了介绍的。他根据准备好的文件，在雅尔塔会议上很好地阐明了我们的全部观点。苏联人在接受我们的建议时，大概已作出这样的结论：投票计划对于苏联没有多少危险，因为对于所有实质性问题，仍然可以行使否决权。

莫洛托夫在接受美国计划后，立即宣布苏联不再要求让所有十六个苏联加盟共和国都进入联合国。进去三个或两个就可以了。他提到乌克兰、白俄罗斯(别洛露西亚)和立陶宛。虽然苏联无条件地接受了表决方式，莫洛托夫却显然想利用由此而产生的好感使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得以进入联合国。罗斯福起先反对苏联的建议，因为它破坏联合国中每一个会员国只有一票的原则。但是丘吉尔口若悬河地为苏联辩解，说他的心已经飞向伟大俄国的人民，因为他们流着血还把那些暴君打翻在地。他建议至少要让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加入。丘吉尔的反应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想把印度也弄进联合国。 194

第二天，即 2 月 8 日，阿尔杰·希斯让美国代表团传阅一

份备忘录，题为"反对把任何一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包括在发起会员国之内的论据"。希斯作为国务院的特别政治事务处副处长，从事制订世界组织计划的工作已有若干时日，但尽管这样，我个人对他并不熟悉。在雅尔塔会议上，他的稍稍有点扁塌的面孔总是板着的。他不喜欢凑热闹，而是似乎带有一股傲气，和同事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从来没有同他作过任何重要的谈话。好几年以后，希斯由于否认他把秘密情报传递给苏联，终于被判处了伪证罪。他的备忘录居然提出了推理严密的论证，他根据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并非国际惯例中的主权国家以及并未在联合国宣言上签字这一事实，反对接纳它们。从后来希斯被控在雅尔塔为共产党人服务的案情来看，这份备忘录倒是很有趣味的。

罗斯福总统同阿尔杰·希斯的关系，是许多批评罗斯福的人进行评论、歪曲和玩弄彻头彻尾虚伪手法的题材。我不相信罗斯福早已认识希斯。他可能在国务院的官员为了某一问题被召到白宫去的一群人中见过希斯。我知道罗斯福在雅尔塔初次见到希斯是在第一天早晨美国主要顾问开全体大会的时候。总统那时当然跟希斯握过手。但是我能够肯定地证实，在整个会议进程中罗斯福绝对没有单独见过希斯。我这样说是有把握的，因为我是罗斯福的翻译，为了预防斯大林临时提出会谈的建议，我必须经常呆在总统身边。希斯出席较

195 大的会议，但他从来也没有参加总统同斯大林或丘吉尔的秘密会议。我几乎每天以这样或那样形式同希斯有一般的接触。我能够说，除了有关他在代表团中负责的联合国的事情以外，希斯在任何其他问题上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意见可以

提供。

最后，罗斯福不无勉强地同意让苏联的两个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作为发起国加入世界组织。国防动员署署长詹姆斯·F·贝尔纳斯想起参议院中关于国际联盟的辩论，担心国会对苏联拥有三票、英国及其联邦成员国拥有六票这一事情的反响，因此他在雅尔塔会议之后劝说罗斯福写信给斯大林和丘吉尔，要求他们支持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拥有三票的表决权。两人都同意了。当美国拥有三票的想法在华盛顿泄露出来时，公众大加嘲笑。美国政府放弃了这个要求。罗斯福只是想抵消苏联的三票，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罗斯福还有其他动机。我相信，罗斯福在这些争论的日子里身上有病，弄得精疲力竭，他的确做了一件错事。

由于欧洲的战争将近结束，罗斯福迫切想同斯大林谈谈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1943年斯大林在莫斯科说过他将在适当的时候参战。他当时对赫尔国务卿说的这番话是一般性的，他没有提到参战的条件。在德黑兰，斯大林告诉与会的人“一旦德国被彻底打败”，苏联将与盟国一起对日作战。虽然我在德黑兰会议记录中找不到这句话，我清楚记得斯大林告诉过罗斯福，他将在适当时刻为参加对日作战而提出他的“要求”。在1944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后来又在12月中，斯大林开列出他的“要求”。当时在场的哈里曼把这件事情完完全全地告诉了罗斯福。因为我当时没有担任对白宫的联络官，我不知道斯大林的观点如何，但它们基本上和他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的并无不同。

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盟国军队正逐渐迫近德国，这是向苏

联提出这个问题的良好时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5年1月23日的一份文件中强调说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重要性。我不知道美国在对日战争中需要苏联军队协助的详196情，但我确实知道苏联的帮助是十分重要的。在马耳他和雅尔塔，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一致认为在德国战败以后，太平洋战争还将持续十八个月。这一估计是在原子弹第一次试验成功以前作出的。也应当记住，美国当时已有对日本本土岛屿进行两次大规模两栖登陆的计划。当时的估计是，如果苏联在这些登陆行动以前参战，美国可以减少二十万人的伤亡。现在大家相信，这个估计是大大夸张了的。但是根据我在雅尔塔所听到的以及后来我所知道的情况来看，罗斯福力求苏联参加亚洲战争的原因之一是要拯救几十万美国人的生命，因为据他的军事专家估计，如果苏联不参战，这些美国人就要丧命。

2月8日，斯大林和罗斯福在第二次私人会谈时讨论了亚洲问题。斯大林提出了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问题。总统说，哈里曼已把10月间同丘吉尔会谈的内容都告诉他了，关于把萨哈林岛南半部和千岛群岛归还俄国这一条件，他看不出有什么难办之处。

如果总统在会下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或者我们这些人中有一位对远东的历史较有研究，那么美国也许就不会把整个千岛群岛那么轻易地给予斯大林了。总统显然认为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都是1904年战争中被日本抢去的，因此俄国只是收回先前被抢走的领土而已。正如国务院顾问乔治·H·布莱克斯利在雅尔塔会议以前提出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的那样，

日本在1904年战争中只攫取了南萨哈林；它早在1875年根据同俄国签订的通商航海条约就已取得了千岛群岛。

总统提醒斯大林，他们讨论过苏联的另一个条件——给苏联一个远东的不冻港——并且他提到可以使用满洲铁路的终点大连。罗斯福还说，他还没有机会同蒋介石讨论这件事情，因此他不能代表中国人说话。他提到两种可以实现这项目标的办法：向中国人租借或者建立一个国际自由港。

斯大林对总统的建议没有发表意见，但提出了第三个条件——让苏联人使用属于中国的满洲铁路。总统再度指出，他没有同蒋介石谈过这个问题，他说这里仍然有两种方法：直接租借或者设立共同委员会。 197

斯大林说，显而易见，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以向人民说明苏联为什么参加对日战争。他解释道，人民懂得对德战争，但是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俄国要对一个未曾攻击他们的国家作战。他说，另一方面，如果这些政治条件都得到满足，那么人民就会知道这与国家利益有关，同时也就比较容易去向最高苏维埃解释这项决定。这种把问题推给最高苏维埃，仿佛表明它真是俄国的最高主宰的做法，是斯大林常用的一着棋。实际上，最高苏维埃没有任何权力。谁都知道，苏联的全部权力都在斯大林手中，但是出于礼貌，在雅尔塔会议上谁也不去戳穿他。

于是，总统第三次又说他没有机会同蒋介石商谈——显然他这样做已经感到厌烦——并指出在同中国人说话时经常会遇到的一个困难是缺乏安全，对他们说的任何事情在二十四小时内就弄得满城风雨，举世皆知。斯大林同意这个看法，

并说他认为现在沒有必要去告诉中国人。他建议这些条件要用书面纪录下来，总统表示可以做到。

我沒有参加哈里曼同莫洛托夫的谈判。我只见到协定的最后文本，那是总统在他同斯大林末了几次会谈中的一次批准的。协定规定"德国投降后二至三个月"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是：外蒙仍然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萨哈林岛南部"还给"苏联；大连港国际化；旅顺口租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苏中合办的公司经营，"不言而喻，苏联的突出利益应得到保障"；千岛群岛"移交给苏联"。

这样，由于美国人的疏忽大意，苏联获得了日本不是用武198 力而是通过和平条约得来的千岛群岛。而且，哈里曼-莫洛托夫协定沒有列举构成千岛群岛的那些岛屿的名称。当苏联后来于1945年参加亚洲战争时，红军把日本坚持不包括在千岛群岛而是包括在历来属于日本的北方领土的另一岛群中的四个岛屿也攫为己有。直到1972年莫斯科才同意就归还这些岛屿的问题进行谈判。

我怀疑莫洛托夫是否存心不在协定上详细说明千岛群岛。但是协定还有另一个不确切的地方，这肯定是由于苏联捣鬼——把苏联在满洲的权利说成是"突出的"——而产生的。这个词日后被苏联人用来在满洲获取一种在美国谈判者的心目中肯定沒有承认的地位。在我们看来，"突出"这个词完全是从苏联人方面来的。它不是惯常在美国外交文件上出现的那类字眼。选词不当，结果使苏联人在满洲所主张的各式各样的利益和地位有了合法的根据。

固然协定上的用词含糊不清，关于苏联参战的协定的主

要错误还在于：从原子弹在日本的破坏效果来看，这个协定结果变成是完全不必要的。不过我仍然认为，即使沒有雅尔塔协定，中国人也不会从俄国人那里得到较好的条件。

对雅尔塔协定的中肯的批评是：它是背着我们中国盟友订立的。虽然罗斯福几次提到他必须同蒋介石商量，事实仍然是，中国人不知道、也沒有批准签订这个协定。我不信战争到了那个阶段，日本人还敢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但是美国人和俄国人似乎都觉得重庆不会保守秘密，怕它把消息泄漏出去。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因此也不知道这个理由是眞的还是为了要在中国人背后搞交易才杜撰出来的。这个协定保持极端的机密。除了斯退丁纽斯、哈里曼和我，国务院的代表中沒有一个人知道。

三个月以后，即在5月间(原文如此。——译者注)，还沒有把雅尔塔协定的条款通知中国人，罗斯福总统就死了，杜鲁门继任总统。杜鲁门把条款念给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听，那时他正在去莫斯科同俄国人开始谈判的途中。杜鲁门叫我也 199 参加会见。宋是聪明人，他懂得签订这个协定时超越一切的战略上的考虑。我获得的印象是，他把这个协定看作给中国人设置的樊篱，以防止克里姆林宫提出甚至更多的要求。它确实起了这样的作用，他在莫斯科谈判时就援引了协定的条款。至于罗斯福在签订协定前沒有同中国人商量，宋圆通地接受了杜鲁门关于军事秘密重要性的一般化解释。

在雅尔塔会议上，肯定会招来非议并且也许比别的任何协定使美国和英国在道义上更加感到痛苦的另一个协定，是我国军事代表商定并由罗斯福签字的关于遣返一国军队占领

地区内的另一国公民的协定。我们的军事领导人认为，如果沒有这样的安排，一旦我们不强迫不愿回国的俄国战俘返回苏联，苏联就会找到借口，留下曾被送往波兰和东德某些地区战俘营中的、后来又落入苏军手中的成千上万名美国战俘。有人认为，这种使苏联人失去推迟释放美国战俘的借口的做法是精明的。我心里总觉得，在协定的执行上已经越出了原文所规定的条款。协定的主要章节写道，“被美国指挥的军队所解放的苏联公民和被苏联指挥的军队所解放的美国公民，在被解放以后，将被毫不迟延地同敌方战俘分离开来，幷被分别安置在军营或集中地点，直到他们在双方当局所同意的地点，被移交给相应的美国或苏联当局。”

这个协定中沒有要求把那些不愿回国的苏联公民强迫遣送到苏联去。然而这正是在德国所发生的情况。在德国投降后大约六个月的期间，一列车一列车的苏联公民（男人、妇女和孩子）被遣返苏联，有时他们猛力抵抗，不肯回去。遣返工作是完全由美国和英国军方决定的。1946 年春天，强迫遣返的做法才算停止。那时所有美国的战俘都已离开苏占区，莫洛托夫想搞些名堂也无能为力了。

雅尔塔会议的最后时刻与其他的会议相似。我们代表团

200 成员之间对最后公报的措辞意见纷纭，火气很大，争吵不休。我被深深地卷了进去，因为我要从俄文译成英文幷从英文译成俄文。我们于午夜结束工作，然后挤进汽车，行驶八哩回到萨基的飞机场。我不知道那时是否有人在认眞地思考整个的会议或评估它的成败。虽然在波兰问题上我们有沮丧情绪和一点悲哀，总的心情还是好的。

三位领袖每人都达到了他的主要目的。罗斯福得到斯大林关于开辟对日作战第二战场的保证，同时斯大林又接受了使联合国得以开展工作的那种表决方式。这些似乎确实是巨大的成就。有了苏联的帮助，美国在最后攻击日本时就可以避免大量的伤亡。关于联合国，这个协定意味着罗斯福显然已经避免重犯威尔逊所犯的错误，即等到战后孤立主义情绪回潮时才去解决这个问题。丘吉尔也达到了他的目的，他把法国扶植起来，在大陆上树起一个同苏联保持平衡的力量。斯大林抗拒了西方盟国想要改变他对波兰的控制权的努力，这就保证了他对东欧的统治。他在亚洲又作了一笔有利的交易。

在每件事情上，任何人当时都不易把所得的结果看作是胜利还是失败。在我们看来，这些协定毋宁是各国不同立场之间的现实主义的妥协。斯大林在最后同意法国作为对德的一个占领国时，是作了真正的让步的。每个国家都改变了有关联合国的态度。美国和英国在波兰问题上作了大量让步，但是，三方面最后一致同意的计划如果付诸实施，本来也能产生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

一句话，当我们离开雅尔塔时，对于战后在政治问题上同苏联真诚合作，我们还是抱有希望的。我第一天在雅尔塔读到的凯南的悲观估计还不能证明是正确的。到了斯大林拒绝执行他关于波兰的约定，不理睬欧洲解放区宣言，并采取其他一些行动时，我们同苏联合作的希望才宣告破灭。

然而，即使事后回顾能把问题看得清楚一些，我也不相信当时西方盟国能够轻易地放弃同苏联取得谅解的企图。我也

不相信我们能够通过更加努力的讨价还价，同斯大林做成一201 笔更好的交易。划分势力范围肯定不是一种办法。毛病不是出于雅尔塔协定，而是出于深刻得多的根源。不管在雅尔塔会议上是否说过什么话，是否写出什么文件，是否取得什么一致的意见，只要斯大林确定了方针，就没有任何办法能使战胜国的联盟免于分裂，使冷战免于出现。

然而，在美国外交人员的心中，希望不是一下子就破灭的。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多次横渡大西洋，徒劳无益地谋求同克里姆林宫达成谅解。

第十二章 白宫的变化

202

我在萨基同总统和霍普金斯乘“圣牛号”飞机飞往埃及，一路没有多说话，我们都筋疲力尽了。我们在苏伊士运河区着陆，“昆西号”巡洋舰就在运河区的大苦湖等待着。罗斯福认为他在大苦湖停留是会晤中东的统治者们的极好机会。他邀请几个阿拉伯的元首前来用膳，甚至派“墨菲号”驱逐舰去吉达港迎接沙特阿拉伯的伊本·沙特。在伊本·沙特登上“昆西号”之前，就在议定书中规定国王的一行包括王家星相学家、一名专管供应咖啡的侍者，以及“九名杂差的奴隶、厨师、脚夫和厨房帮手”。这些阿拉伯人拒绝到“墨菲号”的甲板下面去。他们大多数过去没有坐过船，有的甚至没有见过海。国王几乎全程都坐在甲板上的一把大的镀金圈椅中。这些穆斯林不吃船上的食品，他们当着看得入迷的舰上官兵在船尾突出部分宰了一只羊。还有一个虽然不那么壮观但更令人吃惊的场面是阿拉伯人想在随时要开动的弹药升降机旁摆出火盆煮咖啡。

当“墨菲号”驶近的时候，三位海军上将和美国总统都在“昆西号”的舰桥上。伊本·沙特坐在他的圈椅上，由赤脚的努比亚族士兵拿着出鞘的大刀护卫着。这个情景是很壮观的。只是“墨菲号”舰长在靠拢时没有搞准确，船舰没有平稳地靠近“昆西号”，它的船头把巡洋舰擦撞了一下，不得不缓缓

退回，再靠一次。在两条船最后靠拢以后，伊本·沙特庄严地
203 身穿下摆飘动的长袍走上跳板，但显然有点跛，大概是由于在阿拉伯的互相残杀的战争中负过伤。他向坐在转椅上的总统问候，两人一同进入船舱，一面进餐一面会谈。

因为霍普金斯病得出不了船舱，我被总统找去参加会谈。会谈由我国驻沙特阿拉伯公使威廉·A·埃迪上校作翻译，內容大部分是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的犹太复国运动的。

总统是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者。2月10日在雅尔塔的一次宴会后，罗斯福问斯大林，他支持不支持犹太复国运动。斯大林谨慎地回答说：原则上支持，但他认为解决犹太人问题是困难的。苏联在比罗比詹建立犹太人家园的尝试失败了，因为犹太人散布到别的城市去。他说，有小小的几群犹太人在农业方面搞得不错。罗斯福当时就提到，他在雅尔塔会议以后要去会见伊本·沙特。斯大林问他打算给这位国王什么东西。总统微笑着回答道，他想他也许只能让渡给伊本·沙特一样东西，即美国的六百万犹太人。斯大林再一次说，解决犹太人问题是困难的。他把犹太人叫做"掮客、奸商和寄生虫"，并且开玩笑地说，"犹太人不能住在雅罗斯拉夫尔"——一个以商人的精明而出名的城市。罗斯福微笑了一下，但沒有回答。*

在同伊本·沙特会晤时，总统希望阿拉伯各国允许大约一万名犹太人从东欧和德国这个发生麻烦的地区迁入巴勒斯坦。伊本·沙特就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基本态度发表了一篇

* 在正式公布的文本中，这段谈话被删去了。

冗长的谈话。他否认闪族的两个分支之间在中东有任何冲突。整个情况之所以发生变化，是由于从东欧来的移民的技术和文化程度比阿拉伯人要高。沙特国王说，其结果是阿拉伯人在经济上很难生存下去。他说，虽然这些精力充沛的欧洲人是犹太人，但这不是发生麻烦的原因，原因是他们有较高的技能和文化。

总统为在希特勒的统治下遭受很多苦难的犹太人说了不少好话。伊本·沙特严肃地回答说，其他国家远比阿拉伯国家更有力量帮助犹太人，他不懂为什么偏要阿拉伯人去为希特勒赎罪。他说，"阿拉伯人宁死也不愿把他们的土地让给犹太人。"

总统向国王保证，他不会采取敌视阿拉伯人民的行动。罗斯福说，就美国的政策而论，不可能阻止国会中发表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演说和决议或在报刊上发表这类文章，但他强调指出，作为美国政府的最高行政官员，他制订他自己的外交政策。 204

伊本·沙特的平静而有说服力的声明对罗斯福产生深刻的影响。当总统回到美国，向国会发表演说时（他第一次坐着讲），他离开了事先写好的讲稿说，"关于阿拉伯问题，我从同伊本·沙特的五分钟谈话中了解到的整个问题，穆斯林问题、犹太人问题，比我从两三打来往函件中了解到的还要多。"美国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们唯恐总统转而采取支持阿拉伯人的政策，赶往华盛顿。他们得到了总统仍然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保证。

当"昆西号"在亚历山大港加添燃料时，戴高乐打来一个

电报，拒绝罗斯福要求同他会谈的邀请，这使我们吃了一惊。在雅尔塔，霍普金斯收到巴黎的电报，说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已经决定不向戴高乐将军提起有关只参加会议的政治讨论的事情。皮杜尔相信他一定会生气地拒绝。但是他转达了总统希望同将军在地中海岸法国海港会晤的邀请。戴高乐回答说，他很喜欢同总统在"法国土地上的任何地点"会晤。皮杜尔承认，这个答复使他非常惊讶。我们都很高兴，替总统打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给戴高乐，赞成他的想法，对他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地中海岸来会晤，表示感谢。总统建议在阿尔及尔会面，因为当时阿尔及尔是法国的一个主要部分。他还邀请戴高乐同他一起用膳，在用膳时他将把雅尔塔会议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他。

但是，当我们到达亚历山大港时，我们收到戴高乐的电报，突然拒绝了总统的邀请。罗斯福十分恼火。他把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召来，就戴高乐拒绝会晤这件事口授了一个简短的、侮辱性的声明提要。当霍普金斯看到这个提要时，他叫厄尔利回复总统，说这样的公开声明将招来法国人民和戴高乐的敌意。厄尔利回来说，老板的"牛劲"又发作了，他坚持要照原来写成的那样发出声明。霍普金斯于是侧过身来对我说，"奇普，你去看看，有没有办法把总统扭转过来。"我不愿去；我说，既然他和厄尔利都办不到，我也难以改变总统的主张。但霍普金斯坚持要我去，我也就去了。总统坐在他的舱里，正在摆弄他所搜集的邮票。我提出和霍普金斯相同的理由，即难以只攻击戴高乐而不伤及法国。总统说道，"不，不，看来你不懂得，美国通过它的总统已经遭到了侮辱，这是需要

205

适当的回敬的。”我们谈了很久，最后我说，“我们大家都不会否认，戴高乐是历来牢牢掌握一个小局面的最难对付的大混蛋。”由于某种原因，这句话逗乐了总统。他的疲倦的眼睛突然发亮，他的脸上绽开了他那著名的微笑。他以其特有的风度把头往后一仰，笑着说，“啊，你们去干吧，你同哈里试着去起草吧。”我回到霍普金斯那里。我们写出一个声明，说总统对于戴高乐不能同他会晤感到遗憾。这个声明避免采用辱骂的口吻，只是表示了遗憾。

在阿尔及尔，霍普金斯和我都离开了“昆西号”。霍普金斯病得很厉害，不能考虑坐海船回国。我后来从乘船回国的别人那里听到，因为哈里和我都走了，罗斯福有些不大乐意。我心里从来没有想到，总统会要我留在船上。罗斯福没有对我提起过要我留下，也没有人建议这样办。我总认为我的职责是保持总统在霍普金斯的协助下与国务院之间的联系，我是这样解释我的职务的，实际上也确是这样。我从来不认为我自己是罗斯福的亲信。至于霍普金斯，无疑他需要休息。他在雅尔塔消耗了那么多的精力，他作为总统的最亲信的顾问能否继续起先前那样的作用，是大可怀疑的。

罗斯福也精疲力竭。他多年的亲密朋友埃德温·M·沃森少将的病也使总统郁郁不乐（沃森在回国途中死在“昆西号”上）。虽然罗斯福气色不佳，但是在我能记起的那些人中或者在后来同我交谈过的那些人中谁都不认为当时他的病已处于危险状态。因此，我根本没有想到我应当留在总统身边，而不去伴同显然处于病中的霍普金斯。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总统也许是要我同他的特别顾问、塞缪尔·I·罗森曼法官 206

继续写他向国会所作的报告。罗森曼是在亚历山大港登上“昆西号”的。我曾经帮助罗森曼写了几天这个演说。

霍普金斯和我从阿尔及尔飞到马拉喀什。我们住在一所按照摩尔人的风格建筑的华丽别墅中，有池式澡盆，四周景色优美，还有露天餐厅。霍普金斯沒有离开别墅，从事休息。我同驻在附近的几个美国兵一起打了一天猎。我们沒有找到野兽，但山景非常雄伟。三、四天后我们离开马拉喀什，飞往亚速尔群岛，那里有总统座机“圣牛号”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平安地飞到百慕大，又住下来让霍普金斯获得更多的休息。不管怎样休息，霍普金斯还是病得很厉害，我们一到华盛顿，就立即用飞机把他送往梅奥医院。他到罗斯福于4月间逝世时才出院。

由于霍普金斯不在，我每天通常在午前到白宫去。我到地图室去看电报，顺便去看莱希海军上将。我同莱希的谈话有一个固定的格式。他常用一些辛辣的词句挖苦戴高乐将军，然后走近挂在墙上的地图，指出法国的重要地理位置，这一点他比我清楚得多。莱希是一个并不炫耀自己的政治敏感的军人，他接着总是无可奈何地承认，我们必须注意我们同法国的关系。

我一直忧虑着罗斯福的神态。在许多人看来，他显然是个病人。他的两手颤抖，几乎连电报都拿不住。他的疲乏和倦意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当他必须接见国会领袖和其他各界知名人士时还能勉强打起精神。但是我不曾想到他已濒临死亡。虽然我每天在白宫，我却沒有一个足够亲密的人可以同他谈谈总统的健康情况。霍普金斯住在梅奥医院，我同莱希

的关系还没有亲密到可以提出这种敏感话题的程度。如果同罗斯福比较亲密的人已经考虑到如何对待总统疾病的问题，他们也没有同我谈过。

由于罗斯福总统已逐渐失去集中注意的能力，他的一般精力也逐渐衰退，他不得不比通常情况下更多地依赖于他的顾问们的忠诚和良好的判断。我很遗憾，但我必须说有些人确实利用了他的这种情况。例如，美国政府中就有一位官员（据说是当时的副国务卿纳尔逊·A·洛克菲勒）送给罗斯福 207 一份备忘录，认为应当邀请阿根廷作为联合国的一个发起国。这件事情现在几乎已被忘却了，但它是直接违反我们的雅尔塔协定的。根据这个协定，只有向德国宣战的国家才可以作为发起国。阿根廷是不够资格的。罗斯福没有充分理解其内容，就在这份备忘录上签了字。

在这个时期，我负责起草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和丘吉尔的关于履行雅尔塔协定的许多文件。我往往自己拟稿，或者拿回国务院，让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官员也参加拟稿。文件很多，因为同盟国中已逐渐发生裂痕。说得温和一点，苏联没有在波兰问题上按照雅尔塔协定去做。他们很少或完全不理睬哈里曼大使或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这两人是负责帮助扩大卢布林政府的基础的。与此相反，苏联人却正在巩固他们自己的华沙政府。也看不出他们答应要做的早日进行选举的迹象。

哈里曼从莫斯科打来电报，说苏联拒绝实行雅尔塔协定。1945 年 3 月 6 日，他把他向莫洛托夫提出的要求电告斯退丁纽斯：

今晚我们在波兰委员会的会议上又白白讨论了三个小时，多半重复了上次会议上出现的同样的争论……克拉克·克尔和我提出的每一论据都被置之不理。例如，我告诉他[莫洛托夫]，如果总统获悉莫洛托夫反对我们去拜访在莫斯科的具有代表性的波兰民主领袖因而阻碍了委员会工作的进展，我知道他将大为震惊。我指出，斯大林大元帅曾同意邀请萨皮亚哈和维托斯去雅尔塔，我不懂为什么莫洛托夫现在抛弃他的主张。他回答道，公报是委员会工作的"锚"，雅尔塔会议上的其他谈话都是沒有意义的。

我在雅尔塔收到的凯南的信中提到的怀疑，现在看来是有确实根据的。不管罗斯福怎样努力同莫斯科搞好关系，斯大林的行动同凯南所预测的和我所担心的丝毫不爽。我觉得泄气，但我仍然不赞成凯南的意见，即认为我们应当放弃东欧，不再谋求同苏联合作。毫无疑问，我们曾经主张与苏联毗邻的民族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我们曾经尽力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208

我们向莫斯科提出一连串的抗议，英国人也这样做了。例如，我于4月1日替总统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表示我们关心有关波兰问题的协定的命运，并指出我们的意见不一致将产生什么后果。这封信先交给丘吉尔，征求他的同意，他立即表示赞成。实际上，他还告诉总统，他已召开了一次战时内阁的特别会议，以便使内阁全力支持这个"严肃而重要的"函件。

尽管罗斯福政府在其最后的一些日子里就波兰问题发出了多少函电，沒有引起苏联方面注意的丝毫迹象。相反，斯大林突然告诉总统，莫洛托夫将不参加旧金山的联合国成立大

会，这无论如何总是对联合国表示冷淡。

波兰只是苏联在那里象一个敌人而不是盟友那样行动的地区之一。在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其他地方，苏联人也在表明，欧洲解放区宣言根本沒有什么价值。

苏联对西方的怀疑在第二战场开辟以后已经消除，现在却又重新出现，并且更为厉害。驻意大利的德军司令阿尔贝特·克塞尔林格元帅向美国战略情报局驻伯尔尼的代表艾伦·杜勒斯表示，不管德国本土的德军主力部队如何，他想单独谈判在意大利的德国军队的投降问题。英国人同意让艾伦·杜勒斯继续进行这件事情。盟国方面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莫斯科，并且提出保证，一旦考虑实际的投降条件，将请苏联代表参加。最初的接触是完全试探性的，当然也是很秘密的。盟国方面唯恐在这一时刻就让苏联参加，整个努力就会落空。在战后的气氛中，这个决定可能会遭到批评，但在当时看来，它是正常而明智的，因为这牵涉到驻意大利德军的投降这样一件大事。西方盟国认为扩大同盟国参加的人数从而改变谈判的整个探索性质是太冒险了，这在我看来是有道理的，是可以理解的。斯大林却不满意我们的保证，他发来了一个函件，我想这比几乎其他任何文件更使总统忿怒和懊丧。斯大林坚持说，有理由可以相信，美国同德国正在搞某种秘密交易。他甚至说，“我的一些顾问觉得难以解释英美军队何以在德国进展神速，除非同纳粹有什么暗中协定。”这是对美国的直接侮辱。

209

罗斯福十分恼火。这是我见他少数几次发怒中的一次。他坐在白宫中他的办公桌旁，两眼发光，满脸通红，因他竟然被指控背着斯大林同德国人搞交易而怒气冲冲。我帮他起草

回信。在给斯大林的回信中，总统断然地但不失体面地驳斥了同纳粹勾结的暗示，并说他不敢相信有人会听信这种顾问的话。他说，如果斯大林继续听信这些顾问，美俄关系的前景就不容乐观。斯大林的回答是很有特色的。他说他的顾问一定是得到了错误的情报，但他得到了总统的信以后也就放心了。这次信件的来往恰巧是在罗斯福动身去温泉之前，它给他敲了丧钟。罗斯福不久就死在温泉。他写给外国领导人的最后一封信是给丘吉尔的，他在信里说，不管发生什么困难，西方同盟一定要继续存在下去。

1945 年 4 月 12 日午后，罗斯福逝世的消息传到华盛顿。国务院中有人递给我新闻专线上的一个急电。我奉命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哈里·霍普金斯。我打电话到梅奥医院找他。电话的那一端在听到消息后沉默了很久。然后霍普金斯说，"我想我最好还是马上去华盛顿。"

罗斯福之死使俄国人深感悲伤。当哈里曼大使正式向克里姆林宫传递这个消息时，他发现斯大林心绪很乱。沒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做作。斯大林的确是尊敬罗斯福的。我在战时几次会议中的若干场合都见到这位大元帅对总统流露出眞实的感情。他很少同罗斯福争辩，他在拒绝罗斯福的要求时经常表示歉意。我认为斯大林是把罗斯福看作一个眞正信仰民主自由主义的人而予以尊敬的。斯大林显然不同意甚或不懂得民主自由主义，因此他根据他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办事。但是两者比较起来，我认为他对罗斯福比对丘吉尔更为尊重。斯大林并不把罗斯福看作是象丘吉尔那样一个难以对付的或者顽强的对手，这是可以想象的，但他确实尊敬总统。

斯大林向哈里曼表示他的哀悼，然后问起苏联能够做些什么事情以表示对罗斯福的感激。哈里曼立即回答说，斯大林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收回他的决定，派莫洛托夫参加旧金山的联合国大会。他解释道，这样就表示苏联关心那个日后会成为罗斯福最伟大的纪念碑的机构。斯大林爽快地同意了。 210

无需由我来指出弗兰克林·D·罗斯福的重要性。他是一个不朽的世界人物。罗斯福同外国领袖们打交道时所以具有力量，是由于他在全世界享有极大的名望，即使在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国家内也是这样。但是我不能说他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他喜欢建立非正式关系，但这种关系仅仅在结构上是非正式的。他讨厌通常意义上的礼节，但是只要有人稍稍不对美国总统表示通常应有的尊敬，他就马上感到不高兴。他身上经常带有总统的尊严。甚至霍普金斯也总是对总统恭敬而小心谨慎。罗斯福是以他身为总统这一事实去影响人家的。在白宫同他长期在一起工作的人们中，有人确是真正爱戴他的，但不是出于个人喜爱这种人类天性上的感情。

在对外事务上，罗斯福的工作只能说还过得去。他在国内政治中通常使用得很完善的那些方法和技巧*在对外事务中并不适用。他依靠的是他对事物的本能的理解（这点是好的），以及他给问题找解决办法时所表现出来的随机应变的天才。在国内事务中，所有因素都处于国家的同一体系之内，因

* 我在从亚历山大港到阿尔及尔去的“昆西号”上同罗斯福一面吃饭一面闲谈。他大发牢骚，把参议院说成是干不出好事的、光会拆台的一伙人。我听了大吃一惊。他没有举出任何参议员的名字，但是他表示，如果要在美国政府中做些什么事情，唯一的办法是躲开参议院。

而各种反应都具有相似的型式，在这样的场合，这种技巧是有效的。在对外事务中，特别是在同苏联领导人打交道时，这种作风就意味着缺乏精确性。我曾经指出过，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

如果总统对历史有更深邃的知识，能更好地理解外国人民的反应，那就会对他很有帮助。如果他能象如下所说的那样去做，他也就会得到很多助益：更多地研究美国专家给他准备的情况介绍，更多地注意细节，不是那么拘泥于美国人的信念，认为别人都是“善良的”，只要你对他好，他总会作出正当而体面的反应。

211 至于苏联人，我想罗斯福并不能真正体会到那条把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想法和一个非布尔什维克、特别是美国人隔绝开来的巨大鸿沟。他认为斯大林多多少少用和他相同的观点看待世界，认为斯大林在战时的历次会议上表现出来的敌意和不信任，是由于革命后多少年来苏联被别的国家撇在一边的缘故。他不懂得斯大林的敌意是以深刻的思想意识的信念为基础的。罗斯福从来不曾充分领会到苏联和美国之间有一条鸿沟，一条不能逾越的鸿沟。

在罗斯福当政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会不会比杜鲁门当政下好一点呢？这是一个难以弄清的问题。克里姆林宫当然非常尊敬罗斯福，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知道他在整个西方世界是一个多么强有力的人物。因为俄国人总是看重权力的，不管这种权力的来源如何，这就可能使斯大林在同罗斯福打交道时比同杜鲁门打交道时较为谨慎。罗斯福有巨大的威信，他又以公平地对待斯大林而闻名，所以他比起杜鲁门来本来

能够对苏联采取一条坚定得多的路线——我相信他是会这样做的——而且这条路线也能在更大的程度上被群众所接受。杜鲁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同苏联的战时争执都是保密的，群众不知道。有些历史学家就把美俄失和错误地归咎于杜鲁门，认为他把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搞糟了，甚至有的人还说美国没有执行雅尔塔协定。

我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即使罗斯福活到他第四届任期之末，欧洲的地图将仍然同现在一样。如果从战时历次会议和战后我们同苏联打的交道中可以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苏联人要保持任何一片他们军队所占领的土地（奥地利成了例外）并把他们自己的制度在他们军队的后方建立起来，不管美国总统是谁。

罗斯福在同丘吉尔打交道时也有严重缺点。他并不总是在关键时刻支持这位首相。由于不用翻译，他很随便，难得保存谈话纪录。然而，他们还是一对好搭档。

我把罗斯福作为一个外交家来评论时，我并不是说他在对外政策上犯过许多大错误。他曾使美国摆脱它的孤立主义。比起大多数其他美国领导人来，他早就看到希特勒的威胁。如果没有他，就不可能有联合国，而联合国虽然软弱，却毕竟可以成为世界事务的一个有用论坛。我认为，他最大的一个错误是他坚持无条件投降的原则。我已说过，这条原则使德国人相信他们必须打下去，从而可能拖长了战争，并且提出这个原则，也使盟国可以与之谈判并防止德国分裂的政府难以成立。 212

罗斯福的另一个严重错误是不让副总统杜鲁门参加历次

战时会议和一般的对外事务。罗斯福在美国对外政策方面有巨大贡献，但他没有在实际工作上去训练他的可能继承人。这个错误由于媾和的工作很快就落在新总统身上而变得更为严重。在罗斯福死后不到一个月，即5月7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了。我们在国务院的人也象所有美国人一样，担心这个"密苏里来的矮小的人"能不能对付局面。杜鲁门当总统以前我没有见过他。他是一位不常出面的副总统。他会见罗斯福的次数比我还少，他对美国外交事务也知道得比我差。他闻名的一点是他当参议员时调查美国战争努力的结果这件工作做得很出色。美国人在几个月后才发现他们的新总统是有决断的。莫洛托夫了解杜鲁门的品质要快得多。

在莫洛托夫前往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大会到达华盛顿之前，杜鲁门在白宫召集高级外交和军事顾问讨论关于雅尔塔协定的问题，特别是讨论总统同这位苏联外交部长(苏联已采用更带有西方色彩的名称以代替人民委员）谈话时应当谈些什么。马歇尔将军要求谈话的内容切不可妨碍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议。这里必须指出，当时是4月下半月，还没有成功地进行原子弹试验，人们仍然担心在按照计划攻入日本本土各岛时会不会伤亡太大。艾夫里尔·哈里曼领导的其他顾问中的大多数，包括我在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杜鲁门)，认为总统应当让苏联人明白了解，美国对于他们在东欧漠视雅尔塔213 条约的做法是并不高兴的，他决不会对此无所作为。会议结束后，总统要求斯退丁纽斯的欧洲政治顾问詹姆斯·邓恩和我留下来。总统告诉我们，他决定在他同莫洛托夫会见时按照大多数人的劝告办事。他的确这样做了。

当莫洛托夫到达华盛顿时，杜鲁门到布莱尔大厦作礼节性拜访。这只是一种客套，没有讨论正经事务。我是总统的翻译。第二天，莫洛托夫到白宫的椭圆厅拜访总统。莫洛托夫开始讨论问题，问总统说：他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继任者，是否准备信守美国所签订的关于苏联参加远东战争的秘密协定，特别是美国所承担的这样一些义务，即劝说中国人给予莫斯科以某些在满洲的权利并迫使日本割让1904年战争中得到的领土。杜鲁门总统立即向莫洛托夫保证，他当然要承担雅尔塔协定中规定的一切义务。但是杜鲁门很坚定地补充说明，苏联自愿签订协定，给东欧各国以建立民主制度的机会，可是什么时候实行这项协议，美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莫洛托夫插口笼统地说了一句：波兰人曾经一直设法反对红军。杜鲁门坚定而干脆地说，他对宣传不感兴趣，他只希望莫洛托夫把他对于苏联政府没有履行雅尔塔协定的忧虑告诉斯大林。莫洛托夫的脸色有点发白，他想把讨论拉回到远东问题上去，但杜鲁门止住了他，说道，"莫洛托夫先生，我们谈完了。如果你把我的看法转告给斯大林元帅，我将很感激。"既然下了逐客令，莫洛托夫很快就告辞了。当我翻译杜鲁门的话时，我多么高兴啊！这些句子也许是战争期间一个美国总统第一次对一个苏联高级官员说出来的尖锐语句。

然而，即使这样，我也认为杜鲁门总统只是说了罗斯福如果活着也要说的话。罗斯福的手法也许不一样，他的态度可能具有更多的外交气派，也较为圆滑，但是我在他临死前几天最后见他时，他也不想对苏联进一步破坏雅尔塔协定的行径采取不理的态度。当时杜鲁门对莫洛托夫的强硬谈话不能发

表，因为战争仍在进行。如果美国和苏联之间显出严重分歧，那么美国人和别国的人都是会大吃一惊的。

214

下一天，莫洛托夫飞往旧金山。我陪同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参加联合国大会，在他同莫洛托夫会谈时担任翻译。大部分讨论都是关于苏联的，其中包括使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成为这个世界组织的最初成员国的问题。按照雅尔塔协定，执行联合国会议的实质性工作的协调委员会准许它们加入。

莫洛托夫接着又竭力想让委员会把苏联的仆从卢布林集团也指定为成员国，虽然关于波兰政府还沒有达成任何协议。争取联合国支持苏联人控制的波兰政府这一企图遭到了反对，我想这是战争期间一个同盟国政府公开反对苏联动议的最早的一次。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亨利·斯巴克说，苏联外交部长在世界历史的这个阶段居然把国际舞台上可能是最微妙(他用法文烫手一词)的问题带进刚组成的会议中去，特别是刚刚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上对苏联作了让步以后，他感到惊讶。

会议刚完，我到我所住的费尔蒙特旅馆的酒吧间去，看见捷克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在喝威士忌酒和汽水。他问我，“波伦，对这些俄国人该怎么办？”沒有等我回答，他接着说，“眞象晴天霹雳，我收到莫洛托夫的一张条子，说捷克必须投票赞成苏联的提案，否则它就会丧失苏联政府的友谊。”他停顿了一下，又提出一个本身已经作了肯定回答的问题。“对于一个想同它保持友好的国家，这算是什么做法？”他满腹牢骚地评论苏联粗野的外交手法：“即使你跪下，俄国人还认为不够。”不消说，捷克斯洛伐克在波兰问题上投了莫斯科的票。但

是提案没有通过。

在旧金山会议期间，艾登和斯退丁纽斯都问莫洛托夫关于被克里姆林宫请往莫斯科的波兰十六名地下工作领袖的下落。这些人是被请去商讨如何组织政府的，后来都失踪了。莫洛托夫答应查询一下。有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在旧金山的苏联领事馆设宴招待一些代表。我和斯退丁纽斯一同进去，他象通常那样含着微笑向莫洛托夫问好。在他们握手的时候，215 莫洛托夫说道，“啊，斯退丁纽斯先生，顺便告诉你，那十六个波兰人都被红军逮捕了。”他随即转过身去打招呼，“喂，艾登先生。”斯退丁纽斯被搁在一边，脸上还没有收起他的微笑。

哈里曼对苏联人的这种总的行为感到担心和愤慨，他接见一些美国记者，婉转地提出这样的看法：苏联和美国的目标犹如南辕北辙，要说将来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这是不现实的。当时亲俄的情绪非常强烈，以致有些记者都大为愤慨。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沃尔特·李普曼就曾退出招待会。雷蒙德·格拉姆·斯温在广播中说，那些在我们对苏外交的最终目标上丧失信心的外交家是要不得的。

哈里曼和我在飞返华盛顿途中就如何恢复苏美友好关系的问题讨论了很久。欧洲的战争刚结束，有些事情必须赶紧办。我稍稍犹豫地说，如果罗斯福还活着，他毫无疑问是会考虑派哈里·霍普金斯去访问斯大林的。我所以犹豫，是因为我不愿使哈里曼认为他自己作为大使，不能处理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哈里曼赞成这种想法，说他回到华盛顿以后马上就去见杜鲁门，提出这个建议。但是，我们先去找霍普金斯，他住在乔治城的一所租赁的小房子里。他躺在床上，因病而形

容消瘦。然而当我们提到有可能请他作莫斯科之行时，他显得很热情。哈里曼后来就把这个意见向总统提出，总统立即给斯大林打去电报。斯大林接受了建议，访问就这样安排好了。杜鲁门所以同意让霍普金斯去，其理由之一是我们想在下一次三巨头会议之前先单独会见斯大林。这个会议还没有规定日期，但正在酝酿之中。

斯蒂芬·厄尔利向杜鲁门建议，作为一个配合的行动，总统应让约瑟夫·E·戴维斯去访问丘吉尔。厄尔利当时已准备辞去白宫新闻秘书的工作，到普尔曼公司任职，而戴维斯则是该公司的董事。戴维斯的访问从表面看来是让丘吉尔也知道新总统的一些看法。但霍普金斯告诉我，戴维斯的使命还有另一个动机。其目的是去缓和这样一种意料之中的指摘：杜鲁门在盲目地追随罗斯福的政策，包括使用罗斯福的最亲密的人手在内。霍普金斯是受到很多指责的，有人说他对罗斯福起过有害的影响。是否真有这样的目的，我不知道。戴维斯到伦敦后，他的亲苏观点终究激怒了正在准备大选的丘吉尔。对于苏联在欧洲的行动，丘吉尔深感失望；对美国的反应，他可能同样感到担心。他不认识杜鲁门，不能对他作出判断。他认为戴维斯带有感情色彩的对斯大林的看法是危险的绥靖主张。丘吉尔一再强烈地要求杜鲁门让美国军队占领尽可能多的土地，以便取得对苏谈判的最强有力的地位。

斯大林懂得军事之后就是政治，他也毫不踌躇。他正在浪费成千上万的红军生命，急于占有尽可能多的土地。丘吉尔于5月12日致杜鲁门的一封信中指出苏联占领的范围和对苏联政策的重大疑虑。他说，莫斯科的赔偿计划将允许无

限期地占领德国。在同一封信内，他说苏联占领区内"已拉下了铁幕"。我认为，这第一次使用的名词直到今天还正确地形容着苏联的行动。

还在摸索中的杜鲁门，被相互矛盾的劝告弄糊涂了。在同莫洛托夫的那次强硬谈话以后，他又想缓和同苏联人的关系，拒绝了丘吉尔在外交上的强权政治观点。他完全让艾森豪威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军队行动的问题。这一决定可能是错误的，但它是按照美国指挥战争的传统办事的。虽然沒有征询我的意见，但我当然不会反对总统在战争结束时把美国军队撤回到我们在德国和奥地利的驻区这样一个决定。我认为，如果按照丘吉尔的劝告留在萨克森和图林根的苏军驻区的阵地上，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种强硬的立场将永远给克里姆林宫以这样一种口实，说战时发展起来的关系已经被美国破坏和抛弃掉了。而且，我们将实际上丧失整个奥地利，因为红军部队占领了该国的大部分。

丘吉尔反对斯大林和杜鲁门在三巨头会议前先举行会谈，但他自己又不想同总统会晤。在5月15日的白宫会议上，总统问我，如果他先同丘吉尔会见，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会不会受到损害。象罗斯福一样，杜鲁门也不愿使斯大林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华盛顿和伦敦联合起来对付莫斯科。我把我曾经对罗斯福讲过的话告诉杜鲁门：苏联人认为英国同美国接近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表示西方团结的这种会谈可能会使斯大林更讲道理一些。 217

杜鲁门认为应当重视这样一点：既然头两次会议的地点是为了讨好斯大林而那样选择的，下次会议就应由这位苏联

独裁者来“移樽就教”。因此，杜鲁门反对在德国开会而提出阿拉斯加。他问我的看法。对于我当时的回答，我现在觉得很诧异。我说最好选一处同莫斯科交通方便的会址，不管是德国还是别处。我解释说，我们曾在雅尔塔参加会议的人都“感觉到，苏联之所以没有执行在那里签订的协定，大都是由于斯大林回去后遭到苏联政府内部的反对”。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华盛顿是很流行的。在战时气氛中，我也随波逐流了。

我当然知道政治局并非象人们所设想的那样是占统治地位的委员会。在斯大林作出决定之前，政治局曾经进行讨论，其中有些委员比其他委员主张采取比较强硬的路线，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没有理由可以认为，斯大林听从了这一派的话而不听从另一派。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说明，政治局中的其他成员能把斯大林顶回去。他作出了种种决定。

据我看来，对于苏联在战后所以采取不妥协态度的一种比较可信的解释是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之后改变了他自己的想法。他认识到，如果执行雅尔塔协定，其结果必定是在波兰失去共产党的权力，因为波兰人民将投票反对共产党候选人。斯大林很少听到关于舆论的确实情报。在雅尔塔，他很可能相信波兰人是把红军作为解放者来欢迎的。当他同被他派往红军中去的波兰共产党人谈话时，他们很可能审慎地向他说了实话：波兰人是反俄的，尤其是反苏的。这就意味着，如果实施雅尔塔协定，波兰共产党人就不能统治波兰。斯大林知道了这一点，就毫不犹豫地破坏这个协定。

霍普金斯同总统谈话时我没有在场，因此我说不准关于莫斯科之行他得到了什么指示。在我同霍普金斯后来的一些

218

谈话中，我才知道他是去探听斯大林的想法，去了解什么事情使这位独裁者感到为难的。特别是，霍普金斯要试图重新推动已经停顿下来的有关波兰的谈判，以便获得符合雅尔塔协定的解决办法。此外，他要力图告诉斯大林，他在欧洲所走的道路将导致怎样的后果——联盟的破裂。霍普金斯要求我陪他去。他还带了他那娇媚的妻子路易丝。

从5月后期开始，我们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几乎连续地会谈了十天，有几次会谈长达四小时。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观察这位苏联独裁者的最好机会。我从2月份的雅尔塔会议以后没有见过他。他的态度似乎比过去还更温和并好商量一些。他显然越出常规地对霍普金斯极为客气，这不仅是因为他尊重罗斯福的顾问，而且也因为他想向新总统稍稍表示一点礼貌。

在我们一方，作为总统特使的霍普金斯是主要发言人。哈里曼大使给霍普金斯以强烈的支持。我忙于翻译，很少参加谈话。莫洛托夫同斯大林一起参加会谈。我那在战时几次会议上的苏方同行巴甫洛夫担任翻译。会议是轻松的、非正式的，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内举行。俄国人坐在一张通常铺了绿色厚呢的桌子的一边，我们美国人坐在另一边。偶然有一个仆人端着茶和点心进来。

会谈充满着友谊，但是没有结果。霍普金斯指出，如果苏联继续在东欧、特别是在波兰咄咄逼人地采取行动，那么美国的舆论将对美苏关系起重大影响。他巧妙地提出这些论点，避免过分刺激斯大林的情绪。他详细地说明罗斯福总统曾花了多大力气去说服美国人民，使他们相信苏美的良好关系不

仅是极为需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霍普金斯指出舆论对任何一个美国政府的影响，客气地但毫不含糊地警告斯大林，最近苏联的行动、特别是在波兰的所作所为是无助于制造美苏之间良好关系所必需的那种气氛的。

斯大林的手法同他在德黑兰和雅尔塔所使用的一样。他表面上很好说话，但实际上是寸步不让。他是一个熟练的辩219论家，不去理睬那些不利于他的论证的事实，而硬拉一些别的事实去支持他的立场。

有一次，斯大林失去了警惕心，显露出关于信守诺言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观点。霍普金斯问苏联是否准备尊重参加远东战争的雅尔塔协定。斯大林暴躁地回答道，"苏联总是说话算数的。"然后他压低了声音，补充了一句，"除非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巴甫洛夫正想在翻译中删去最后那个短句，这时我用英语对他说，"巴甫洛夫，我认为还有一句话呢，"他才急忙喃喃地译出斯大林的附加条件。我想斯大林并没有了解我们所交谈的那句短短的话的意义。完全可以这样说，我认为当时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掌权的人会如此坦率地承认他的政府是依据这种原则办事的。斯大林的特点是在有些事情上他想表现得非常诚恳，在另一些事情上则用欺蒙作为外交武器，或者如戴高乐后来所说的，他往往使用"狡计"。

霍普金斯的访问没有改变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计划。到6月初我们的会谈终止时，一切征象表明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解决。霍普金斯要求斯大林按照雅尔塔协定扩大华沙政府，保证在波兰的民主自由，释放被关押的十六名地下领袖。斯大林的口气是讲情理的，但实质上却不然。他表示愿意让非

卢布林政府的波兰人占据波兰内阁二十个位置中的四个或五个。当然，民主自由将扩大，但不给“法西斯分子”。至于十六名地下领袖，斯大林说他们有罪，但他们大概不会得到严厉的判决。（其中许多人死于监狱。被释放的六、七名中，有的在波兰重遭逮捕，有的逃往西方。）

在霍普金斯回到华盛顿后不久，杜鲁门和丘吉尔就在波兰问题上放弃了原来的主张。他们撤销对伦敦流亡政府的承认，而承认了卢布林政府。实际上也没有其他办法可想。卢布林政府治理着波兰，虽然是根据苏联的训令治理的。最后，米科拉伊奇克和少数几个在伦敦的其他波兰人想给苏联的计划多少带去一点民主；他们参加了华沙政府。他们得到几个次要的职位，随后不得不逃亡。这样斯大林就完成了他对波兰的统治。

在讨论德国问题时，霍普金斯问斯大林什么时候他委派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苏联官方代表。他指出，美国已委派艾森豪威尔将军，英国委派了伯纳德·蒙哥马利元帅。斯大林说，他将委派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但后来他强调指出，苏联政府的政治权力完全控制着军事力量，因此当时在柏林的维辛斯基将真正代表莫斯科。 220

关于希特勒，斯大林怀疑他还没有死。“据我看来，希特勒没有死，而是在什么地方躲起来了。”他丝毫不提可以支持他的论点的任何确切事实。我想他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将来可以用以指控某个国家窝藏希特勒。这个猜测也许看来有些牵强，但是根据我们现在对于斯大林的了解来看，这样的动机同他转弯抹角的心思不是不相符合的。

我们在莫斯科时，霍普金斯收到杜鲁门和斯退丁纽斯发来的电报，叫他向斯大林提出苏联人在旧金山就雅尔塔协定所规定的表决方式的解释制造困难的问题。对美国人、英国人和任何一个光明正大的人来说，雅尔塔协定所规定的是，只有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采取实质性行动进行表决时才能使用否决权。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已经解决了的。但是苏联人却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坚持在把议题提上议事日程和进行讨论方面也适用否决权。霍普金斯对联合国的事务不太清楚，他在听取了充分汇报以后，由哈里曼和我陪同到克里姆林宫去。当霍普金斯在哈里曼的出色的协助下说明这件事情以后，斯大林转向莫洛托夫粗暴地说道，"莫洛托夫，这是干什么的？"（斯大林从来不用通常俄国人用名字和父名称呼人的方式，而总是用姓。）莫洛托夫回答说，事情的开端是重要的，因此一个国家起初就应当享有同末尾时一样的权利。斯大林听了以后说道，"莫洛托夫，这是毫无道理的。"他然后告诉霍普金斯，乍听起来他觉得我们对雅尔塔协定的解释是正确的，但是他想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霍普金斯坚持说，旧金山会议的情况相当紧急，因此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斯大林说，如果他现在的观点确定下来，当晚就会发出电报。那天晚上，电报果真发出去了，改变了苏联的立场，会议在安理会的表决这一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结果，联合国宪章的通过得到了保证。

221 如果没有顺利地引起斯大林的注意，苏联人会不会改变他们的立场是值得怀疑的。我认为斯大林作出那样的反应，不是由于霍普金斯的私人影响，而是由于他相信美国的立场是确实符合雅尔塔协定的。在雅尔塔会议上，他自己提出许多

关于联合国表决程序的问题，只要苏联能够否决议案，他可以听任随便什么人去谈论问题——“那种权利没有多大价值”。可能斯大林不知道莫洛托夫是要扩大雅尔塔协定关于表决方式的解释，因为有证据可以表明，斯大林不大关心联合国的事情。

当我们在莫斯科时，苏联当局对霍普金斯夫妇的过分的殷勤招待是异乎寻常的。霍普金斯夫人去苏联的主要目的是照顾她的丈夫，她却成了很受关注的人物。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她坐在米高扬的旁边，她表示想带一些俄国的东西、可能是一些乌拉尔的宝石回国。第二天，几个俄国人开了一辆卡车到美国大使馆，载来了各式各样的毛皮。他们在会客室的地板上和家具上摊开白狐、蓝狐、银狐、红狐、貂、紫貂等各种皮张。此外，还有乌拉尔的宝石、高加索的织锦和苏联其他地区的织物，眞是琳琅满目。俄国人告诉霍普金斯夫人，只要她说一声，这些东西就都是她的，是米高扬送给她的礼品。哈里说他不会准许她从任何一个外国政治家那里接受这样贵重的礼物。霍普金斯记得太清楚了，在战时，他的妻子接受了比弗布鲁克勋爵送的珠宝，风声传出后在美国引起了一片责难声。霍普金斯告诉她，她只能接受米高扬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作为尊重的表示。她拿了一块小小的较次的乌拉尔宝石，无可奈何地把其余的东西都退了回去。

路易丝·霍普金斯给苏联的元帅们留下异乎寻常的印象。她并不美丽，但潇洒动人，颇有机智。在每次招待会上，制服上挂满勋章的元帅们都围着她，水泄不通，几乎看不见她的人影儿了。在赞美她的人中间有谢苗·布琼尼元帅，我于

1934 年曾在火车上同这位老资格的军人谈过话。他胸前有那么多的勋章，路易丝·霍普金斯硬是说他把勋章一直挂到背上去了。

6 月 7 日我们飞往柏林。我们得到斯大林的允许在滕珀尔霍夫机场降落。它在一座仍然被红军完全占领着的摧毁了的城市中。我们巡视了到处散发着死亡气息的颓垣断壁，视察了希特勒在那里自杀的地下室（柏林的俄国人并不怀疑希特勒的死亡），然后同朱可夫元帅吃了一顿便餐（食物简单，伏特加喝得很多），讨论了关于未来的三巨头会议的各种安排。柏林附近的波茨坦最后被选定为会议地址。

222 我们到了法兰克福，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处过夜。欧洲战争刚刚结束，艾森豪威尔对俄国人仍然抱着热情。他在言谈中尊敬朱可夫，把苏美关系的巨大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第二天我们同美国军人开了一系列会议。卢修斯·D·克莱将军刚被任命为艾森豪威尔处理德国事务的副手。他提出了一种当时我听到过不知多少次的理论：同苏联人处好关系的关键在于以信任换取信任。当我们离开我们开会场所的法本公司大楼时，我告诉克莱，不到几个月，或者可以肯定说不到一年，他将成为美国政府中反对苏联人最为强烈的官员之一。我的预言是确切的。不管谁对苏联人开始抱有那么多的幻想，到头来总是完全大失所望。

总的说来，霍普金斯给军人们描绘了一幅有可能同苏联人合作的比较乐观的前景，但他并不象有些观察家所报道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无限的乐观情绪。我比霍普金斯较多怀疑。我告诉他，苏维埃制度的本质使发展正常关系成为不

可能，即使它同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打交道时也是如此。在离开莫斯科时，后来又在横渡大西洋时，霍普金斯同我私人谈话中第一次开始对于同苏联进行真正合作的可能性表示严重怀疑，说他认为我们的关系将变得险恶。他的观点主要是以苏联国内沒有自由为依据的。他认为，在牵涉到第三国的事务时，美国对自由的信仰可能会引起同苏联的重大分歧。

但是，霍普金斯仍然认为德国军国主义比苏联更为危险，必须竭尽一切努力使这一具体的威胁不再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指出德国已经彻底摧垮了，它的复活是不能想象的。我不能相信有人会这样傻，让它重走1933—1939年的老路。

霍普金斯的使命并沒有什么结果，虽然它表明美国准备竭力保持同苏联的友谊。回想起来，我倒倾向于认为这次使命也许是错误的，虽然我曾协助进行。霍普金斯与上届总统关系较深，他在杜鲁门那里沒有享受到在罗斯福那里的同等地位。斯大林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他对于权力在谁手中是能作出精明的判断的。毫无疑问，霍普金斯对斯大林沒有什么影响，除了关于联合国的表决程序这一问题以外。

223

霍普金斯支持住了往返莫斯科这段旅程，但是一回到美国，在向杜鲁门作了汇报以后，他就住进梅奥医院。莫斯科之行是他执行的最后一项公务。

我从苏联回来以后，就返回旧金山参加把联合国宪章从英文译成俄文的工作。这个工作是辛苦的、有趣的，也是要求很严格的。

在选字和字义方面有分歧。有一次，一个为会议工作的

白俄和一个在满洲学会俄语的中国人发生了争论。这个会议工作人员说那中国人建议使用一个实际不存在的俄文字。他们查了三、四部大俄文字典，找不到这个字。这个会议工作人员说，“这个字并不是合法存在的。”那个中国人笑迷迷地回答道，“干吗要放在字典里呢？谁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中国人有一次在旧金山同“一个极迷人的妇女”玩了整整一个下午之后晕倒了。他不得不被人抬出会议室。顺便提一笔，蒋介石政府发给它的驻外官员寻花问柳的特别津贴。

旧金山市招待得十分周到，参加会议的人既努力工作，也尽量从事娱乐。我在工作了十七小时以后，还满不在乎地到一所乡间别墅去过活跃的周末：游泳，打网球，参加通宵的晚会。这些日子是怎么过下来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感觉惊奇。我猜想我们的幽默感使我们能顶得住。就在这个乡下地方，一个英国政治家问有没有多余的游泳衣他可以借来游泳。女招待员说道，“噢，到洗澡房里去找，那里有的是。”一会儿这位英国贵族出来了，在游泳衣外面挂上吊带。当他走向那群吃 224 惊和对他笑着的客人时，他说，“我想不出拿它怎么办。它是放在肩上的么？”

我回到华盛顿时，正好赶上参加詹姆斯·贝尔纳斯宣誓就职国务卿，以接替斯退丁纽斯。虽然斯退丁纽斯的才干是没有问题的，杜鲁门总统总觉得他自己对在民主党内地位还比他高的贝尔纳斯欠了一笔政治债。贝尔纳斯在 1944 年大选时有可能成为副总统候选人，但由于自己不干或者被罗斯福推开而让位给杜鲁门。这样就产生总统和贝尔纳斯之间后来变得不大美满的关系。也因为这种关系，几天之后我被调离了白宫。

第十三章　波茨坦会议

225

在贝尔纳斯担任国务卿以后，我就不作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的联络工作了。贝尔纳斯告诉我，今后他将直接同总统打交道。我仍然是国务卿的特别助理，但是我不再被要求去作联络工作。因为我自己牵涉在内，我沒有这样说，但是我觉得这一变动是错误的。杜鲁门并不详细了解华盛顿和盟国之间的战时关系，因此他比罗斯福更需要国务院的专门知识。杜鲁门总统和贝尔纳斯国务卿之间的会晤不是经常的，他们见面的时候无法讨论所有的问题。有了联络官，他就可以帮助处理国务院和白宫之间必然要发生的日常问题。

在贝尔纳斯被任命以前，我不大知道他，虽然我在雅尔塔会议上见到过。据我看来，挑选他当国务卿是合适的，因为他在以前的各个岗位上都干得很成功。他担任过美国参议员、最高法院的陪审推事和战争动员局局长。我不久就喜欢贝尔纳斯了。他为人和气而坦率。在我们去欧洲企图弥补同苏联的裂痕的几次旅行中，他是良好的旅伴。

第一次求得相互谅解的尝试是在波茨坦的三巨头最高会议上。美国代表团于1945年7月7日星期六早晨从诺福克乘重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出发。在旅途中，总统同贝尔纳斯、莱希海军上将、本杰明·科恩（当年的新政法案起草人，被贝尔纳斯任命为国务院顾问）、欧洲事务司司长弗里曼·马修斯

226 和作为苏联问题专家的我每天商谈。所讨论的大部分是关于管理战败的德国的问题。国务院准备了关于在占领初期如何对待德国、我们努力的目标、我们希望出现怎样一个国家等问题的情况介绍文件。财政、经济、政治和安全保卫方面的许多细节都在旅途上同总统进行了讨论。

波茨坦会议主要是由于丘吉尔的努力而召开的。丘吉尔对于红军的挺进愈来愈感到不安。他主张这个会开得愈早愈好，因为苏联每一项成功都增加他的忧虑。当会议被推迟到7月16日召开时，他深感失望。这次会议旨在讨论由于盟国的胜利而产生的迫切的欧洲问题。它将不讨论对德和约（没有人想重犯在凡尔赛匆促地起草条约的错误）。议事日程上的主要问题是德国的行政管理、苏联在巴尔干各国的行动、奥地利的占领、波兰的东部边界（虽然已有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的谅解，这个边界并没有最后划定）和在亚洲的战争。

杜鲁门作为一个新起来的世界领袖，面对着象丘吉尔和斯大林这样威风凛凛的人物，自然有些胆怯。但是他利用了“奥古斯塔号”舰上的会议来吸收知识，提出有关的问题。他很少象哲学家那样去思考世界的未来，而宁可去探索实际可行的问题。在我们的会议上，杜鲁门很少聊天和说笑。他谈的都是公事。

总统在休息时也打扑克，但我不是他的亲密圈子里的人，因此我没有打。他也在这条大船上巡游，有一个下午他在食堂里同水兵们共进午餐，另一天他观看了“奥古斯塔号”的射击练习。在放排炮时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国务卿站在一座三联炮塔上。两尊炮发射得很好。第三尊冒了一下烟，炮弹从炮

口射了出去，落在离舰约一百码的水中。实际上，这沒有什么危险，因为炮弹沒有装上弹头。

我们于星期天（7月15日）到达安特卫普，然后飞到法兰克福。在那里，由P-47战斗机护卫着，我们飞往柏林。总统住在柏林郊外波茨坦的巴贝尔斯贝格区格里布尼茨湖湖边的一所庄园房子里。这座“小白宫”（它很快就获得了这个名称）227 是一所三层楼灰泥抹的住宅，过去是德国电影界的头目居住的。苏联人已把这所房子刷新了，但是，正如白宫日志所抱怨的，“浴室和洗澡设备完全不合用。”窗戶上沒有窗纱，蚊子是一个问题。马修斯和我合住一层楼的一个房间。伙食是由美军供应的，是通常的军队伙食加上几样好菜。

英国首相住在离总统两个街区远的地方。斯大林也住在巴贝尔斯贝格，离我们约一哩，就在由小白宫通往塞西林霍夫宫的路边。全体会议是在这座王宫中开的。俄国人在王宫花园里种的红天竺葵组成一个二十四呎的红星。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住在柏林的苏区，虽然这个区里也到处驻扎着美国和英国的宪兵。大部分保安部队都是具有东方人面型的戴着绿色军帽的苏联边防军。我后来听说，斯大林从中亚细亚调来一个师作为会议期间他个人的卫队。

波茨坦会议与以前两次战时会议不同，在语调上、作风上和实质上都是不同的。首先，欧洲的战争以全面的胜利而告结束。太平洋战争已接近尾声，虽然这时苏联还沒有参加。甚至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前，日本显然已不能象雅尔塔会议期间联合参谋长会议所估计的那样再支撑十八个月。因此，会上就有一种不慌不忙的感觉，由于精神上沒有压力，这

就更便于自由地交换意见。

波茨坦会议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不象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那样绝对保密。会议的第二天，斯大林觉得仿佛听到丘吉尔说院子里有新闻记者时，吃了一惊。当丘吉尔指出记者们在院子外边时，误会才消除了。

对参加者来说，有同样的一系列圆桌会议，同样一些宴会，同样的外表上的友谊——还有同样的心情紧张的暗流。

但是，代表团大得多了，这就是说，工作量分配到更多人的身上，我们有更多的余暇时间。我们大都忙于准备关于各个问题的文件和讨论。

我的作用比起在德黑兰和雅尔塔已大为改变。我曾愈来愈成为罗斯福总统和哈里·霍普金斯的亲信，而我却根本沒有接近杜鲁门总统或贝尔纳斯国务卿。固然我在正式会议上以及在杜鲁门同斯大林作非正式会谈时担任杜鲁门的译员，我却不象前两次那样卷到会议的事情中去。我沒有遭到靠边站的待遇或被忽视，但我沒有参加杜鲁门和贝尔纳斯的大部分密谈。这种变化既不使我感觉诧异也不使我生气。看来不可避免的是，我不应当从我刚遇到的人那里得到象我共事较久的人所给予的同样的信任。我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翻译，偶然也参加一些实质性讨论。

由于我地位的变化，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规定项目以外的活动。有时候，我在晚上以打扑克或掷骰子作为消遣。有一天晚上，我到柏林开着的唯一的夜总会去。大厅里挤满了三国的士兵，大都喝得醉醺醺的，并且都是全副武装。有些俄国兵肩上挂着冲锋枪；有些美国兵挎着短枪。我们认为，我们

正在柏林，这种情况是危险的。在会议结束以前，这个夜总会就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士兵发生冲突而关闭了。这种在表面现象下潜藏着的敌意不只限于士兵才有，我从波茨坦的各代表团中也觉察到。虽然每个人在外表上很和气，但双方都保持着某种保留态度，这是根本上互不信任的表示。

三巨头中还有了两个新领袖——杜鲁门和一星期以后由于英国大选中工党胜利而代替丘吉尔当了首相的克莱门特·艾德礼。杜鲁门是最受人注目的。人们必然要把他同罗斯福相比，而且这位不出名的总统比起那位已故的巨人来必然是不利的。杜鲁门的作风完全不同。罗斯福随机应变，杜鲁门则牢不可破地站在事先决定的立场上。罗斯福在发表议论时，往往插进一些题外的话，杜鲁门则干脆而中肯。罗斯福同丘吉尔和斯大林都热情友好，杜鲁门则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新总统在第一次同斯大林进行私人会晤时，试图讲一点"乔大叔"的笑话，但是它没有引起那位独裁者的一丝笑容。

除了总统以外，美国代表团还有其他的重要变动。贝尔纳斯从来也没有担任过重要的外交职务。科恩虽然聪明，干 229 这种工作也是新手。从总统起，美国代表团一直在摸索前进。但是我不认为我们的政策受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苏联人绝不让步，我们实在无能为力。

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的个人目标是很简单的。他想向斯大林证明他是独立自主的，是一个真正的领袖，牢牢地掌握着美国政府。他拒绝了丘吉尔关于尽量多占领敌方领土的劝告，说明他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跨出了一大步。杜鲁门坚持按照盟国管制委员会前已达成的分区协定办事。但杜鲁门象

罗斯福一样，总想从雅尔塔协定对东欧的民主保证中尽量捞到一些东西。而最要紧的是他想确实知道克里姆林宫将会按照协定参加对日作战。

丘吉尔这匹老战马在他对苏联的态度上已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在德黑兰，他称呼过"伟大的斯大林")。象他以前的那些英国领袖那样，他不要别的强国去支配欧洲。他担心美军迅速调往亚洲将会让苏联席卷欧洲大陆。并且他从苏联的赔偿要求中看到一个将成为英国负担的变得赤贫的德国。丘吉尔忧心忡忡，因此，如果苏联不同意把波兰和德国之间的边界往东挪动一些，他就准备退出会议(这是他在回忆录中说的，而就我所知，会上没有提过)。

斯大林已经把东欧紧紧抓在手中，他是拿着一张长长的购货单到波茨坦去的。他的主要要求之一是打破赔偿问题上的僵局；俄国需要赔偿去恢复它被毁的工业和城市。有迹象表明苏联这时还没有决定要分割德国。但是他们闭封苏占区和不许盟国管制委员会在他们地区内活动的做法引起一些疑虑。可是还不能肯定他们已决定要夺取德国的东部各省，把它们给予波兰，并使整个区域苏维埃化。看来，在波茨坦会议时，斯大林仍然认为有可能出现一个在强有力的军事和经济限制下避免军国主义复活的统一的德国。

斯大林也想确切知道美国新总统是否同意为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而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的价格。本着在他以前的
230 那些沙皇的精神，他希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得到一个基地，并且有权通过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土耳其海峡。写进这个单子里的，还有一个要求：由苏联代管意大利的殖民地。斯大林显

然抱有这样态度:“要求一下有什么害处?”

既然苏联有那么多的希望和担心的事情，斯大林当然就要估量杜鲁门，杜鲁门也必须去估量这位苏联独裁者。正如他往往对外国人所做那样,斯大林表现出谦逊的样子,以便使杜鲁门相信他不是举世闻名的不易撼动的磐石，而实际上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

在到达后第二天，杜鲁门同丘吉尔在小白宫私下会晤。我沒有在场，但我后来听说谈得很顺利。杜鲁门向丘吉尔保证,他打算继续推行罗斯福的政策,首相作了适当的回答。

第二天,斯大林在莫洛托夫和巴甫洛夫陪同下,拜访了总统。贝尔纳斯也在座，我当翻译。斯大林比几个月前同霍普金斯会谈时显得疲乏，也苍老了一些。他看来很谨慎。即使杜鲁门讲的笑话和贝尔纳斯提起的斯大林工作到深夜的插话都沒有起什么作用，这次会晤还是为这两位领袖间的关系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如果说罗斯福沒有能够使这位缺乏幽默感的独裁者透露他的眞实思想，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则是沒有这样的机会。

但斯大林倒是很欣赏——至少他这么说——杜鲁门关于有话直说的保证。总统说他不是外交家。他建议同斯大林直接打交道,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要旁敲侧击。斯大林说,他认为苏联将经常设法“迎合”美国的观点。谈话涉及第一次正式会议议事日程上的许多问题。斯大林走后，杜鲁门说他对于同斯大林的第一次谈话是满意的。

顺利的开端,加上杜鲁门已在事先作了准备这一事实,无疑地提高了总统的信心。杜鲁门生性有点自信，在会议上他

总是表现出比别人富有经验的领袖那样的姿态。

由于在波茨坦会议上他们很少征询我的意见，我的作用只限于翻译和观察。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领袖们在会议上怎样处理各个主要问题，我有如下的看法。

人们不指望波茨坦会议解决缔结和约的问题。它只设立了一个各国外长委员会去起草条约，供和平会议作最后的考虑。第一项任务将是起草对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条约。以后当德国建立了政府时，委员会还将准备一个对德条约。美国提出的计划是规定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成员国组成这个委员会。大家都同意这个基本意见，认为不先准备好条约就召开和平会议是浪费时间。但丘吉尔说，中国虽然是安理会的成员国，却无补于决定欧洲问题。莫洛托夫支持丘吉尔的意见，主张只有那些同一个敌国签订停战条约的国家才得参加起草和平条约。这个主张看来有些专断。这样，虽然自由法国军队在战时与盟国并肩作战，由于维希政府没有签订停战协定（因为它没有宣战），法国就不能参加起草。最后达成了一项妥协办法。法国可以参加讨论对意大利的条约；在其他情况下，只有签订停战协定的国家才可以参加。会议以后，中国人被允许参加对巴尔干各国的和平谈判。

231

奥地利不包括在应当签订和平条约的那些敌国之内，因为奥地利不被看作一个敌国。（会议还未结束，斯大林就下令他的军队撤出而让西方军队进入在奥地利的西方军队驻区。）波茨坦会议设立的条约起草机构是成功的。虽然委员会遇上困难，没有考虑对德条约，但它为起草和平条约的问题铺平了

道路。

会议的主要正式工作是德国问题。必须记住，战争结束了才三个月左右，全世界的人心对纳粹的残暴、特别是对待犹太人的手段依然感到毛骨悚然。在波茨坦的任何盟国官员都沒有怜悯之念，沒有人想宽恕德国人。但是，西方官员中也有人强烈意识到，在国际事务中单单采用惩罚是沒有用处的。

双方已经不再考虑肢解德国。西方盟国现在坚决地想把德国人民最后统一起来。虽然斯大林公开声明反对肢解德国，我却认为他在波茨坦会议时还沒有决定是否要支持统一。

最后的协议沒有提到要建立一个全德政府，而是规定德国的全部行政管理应由四个占领国的代表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担任。但是一些经济原则却规定，虽然德国经济应当分散，避免过度集中，但在占领期间德国应被看作是一个经济单位。协定要求设立某种形式的中央行政机构，特别是在财政、运输和交通方面。 232

赔偿和波兰边界问题在会议中花了不少时间。关于赔偿的讨论是无休无止的、曲折的、复杂的和混乱的。苏联人明确地要求赔偿纳粹军队所造成的破坏，但他们沒有提出理由来说明他们能够勒逼德国拿出二百亿美元赔款的论点。这个数目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但是沒有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作为“讨论”的基础的。在同英国和苏联的代表在莫斯科开会讨论三十七次以后，美国政府得出结论，认为苏联的要求是沒有根据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打定主意决不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落入圈套，替德国人向别的国家支付赔款。当参加会议的人还在讨论一般原则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苏联人已经开始在苏占区、在指定给美国管理的地区和在柏林拆走德国工厂的机器和设备。英美小组就苏军人员在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拆迁工作的规模作出详细的报告。这些东西都不是军事战利品而是工业设备。

贝尔纳斯国务卿突破了僵局，促使达成一个可以说是关于赔款的协定。他在7月22日同莫洛托夫会谈时，使用了从参议院议员休息室学到的一种策略，迫使苏方让步。他把赔款同德国与波兰的边界问题联系起来，告诉苏联人不能两者兼得。他说，把1937年德国的一大部分移交给波兰管辖以后，如果按苏联计划支付赔款，那就会使英、法占领区遭遇严重困难。德国东部生产西部所需要的原料。他也指出苏联人已经搬走了德国的大量设备。贝尔纳斯说他希望把事情说清楚：美国不会出钱去支付德国的赔款。

233

然后贝尔纳斯巧妙地提出他的主张。他建议考虑一下，根据这种情况，是否可以由每个国家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取得赔偿。他说，鉴于苏占区主要是农业区，而波兰取得的地区有煤矿，如果克里姆林宫想从英占区或美占区取得工业原料或设备，它可以用西部需要的粮食或燃料来交换。贝尔纳斯甚至能够用斯大林的话来支持他的论据，因为前一天斯大林曾说过，如果英国人想从西里西亚得到煤，他们可以用别的货物交换。此外，苏俄还可从西部各占领区得到德国和平经济所不需要的工业固定设备的百分之十。莫洛托夫遇上这套政客惯弄的手段，虽然满心不愿意，也只好在赔款方面作出让步。因为对苏联来说，波兰-德国边界比较重要。他说苏联将考虑降低它的二百亿美元赔款的要求，并且终于没有提出一定的

数目。最后的协议是按照贝尔纳斯的计划达成的。

实际上，贝尔纳斯只是根据苏联政府单方面的行动所产生的现实情况办事。苏联政府觉得再也弄不到更多的东西了，因此它接受了贝尔纳斯的切实的建议。这个计划背后沒有美国的私底下的动机，沒有想要保护美国工业利益或经济利益的目的。它只是为了要保证不使德国由于苏联的赔款要求而陷于赤贫，因而成为美国纳税人的负担。它也认识到不能使德国成为欧洲中部的一个穷困的地区。

附带提一下，把设备运往苏区的事情沒有实现，因为苏联人不能或不愿从他们所占领的地区拿出相当数量的粮食和原料。

关于赔偿问题的决定是不是几十年来造成德国分裂的一个原因，我不知道。当时看来并不是这样，我不知道那时还能求得其他任何良好的解决办法。

在会议的某个时候，苏联人试探性地提出把鲁尔区国际化，归四国管制。这个建议被拒绝了。英国人管制着鲁尔区，234 他们不愿给苏联在该区有否决权。莫斯科无疑地是会使用这种权利，使德国经济瘫痪并把西部德国推向共产主义的。苏联人所以沒有坚持他们的鲁尔区计划，我想主要是由于他们正在考虑怎样撇开盟国，单独管理他们所占领的地区。他们感觉到他们的鲁尔区计划和苏联在自己所占地区的目标是不相容的。

波兰西部边界这个老问题又出来了新花样。波兰政府的代表在波茨坦为自己辩护。其中有米科拉伊奇克，他已最后参加了苏联控制的政权。丘吉尔先前同意把波兰的西部疆界

深深推入德国，犯了大错误，现在想纠正这个错误，说把这些地区划出去将严重地妨碍把德国看作一个经济整体这样一种可行的做法。部分地由于波兰人、特别是米科拉伊奇克（他想证明他象他的对手共产党人一样也是主张民族主义的）的努力，最后在波茨坦会议上同意把有争论的地区在缔结和约前暂归波兰管辖。西方盟国沒有别的办法；波兰在莫斯科的庇护下已经在管理这个地区。西方盟国再一次默许了那种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波茨坦会议上，美国试图重新强调雅尔塔会议上签定的欧洲解放区宣言仍然有效。这是三国签订的保证在东欧建立民主制度的文件。我们指责苏联人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违反了这个保证。克里姆林宫否认这一指责。为了转移题目，莫洛托夫猛烈地攻击在英国势力范围内的希腊。

波茨坦会议上最尖锐的交锋发生在讨论巴尔干半岛各国的问题的时候。丘吉尔谈到英美代表在苏联所控制各国的情况时说，“他们被围上铁幕”，从而再次使用了这个后来非常出名的字眼。斯大林回答说，这“都是神话”。在讨论时，莫洛托夫和艾登都发怒了。

有一次，斯大林要求在关于巴尔干各国问题的建议中删去“负责的和民主的政府”这些字眼，因为这种措辞将污辱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政权。斯大林还说，“如果一个政府不是法西斯的，它就是民主的。”在波茨坦会议上，沒有什么题目比关于巴尔干各国的民主性质和关于欧洲解放区宣言执行情况的讨论更加暴露出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的鸿沟了。235 斯大林把所有这些地区紧紧地掌握在手中，他不允许这些国

家的苏维埃化受到干涉，利用委婉的语句避免争论。

最后的协议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所采取的形式是写信给匈牙利管制委员会，而该委员会则被看作是巴尔干各盟国管制委员会据以修改其组织形式的范例。莫斯科从来也沒有按照这个协议办事，它阻挠盟国试图影响匈牙利的各种努力。

斯大林一面巩固他对东欧的控制，一面还想求助于他的战时伙伴，达到几世纪来沙皇念念不忘的一个目的，即进出地中海。波茨坦会议前几个月，苏联曾要求土耳其归还1921年苏维埃国家羽毛未丰时被夺去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部分土地。此外，苏联想在管理土耳其的各海峡方面有主要发言权，它还想在土耳其各海峡或在达达尼尔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土耳其已予以拒绝。

丘吉尔感到有些不安，因为他在德黑兰会议上曾自动提出苏联人理应在这地区有一个基地。但是他指出苏联的建议超出了他在1943年的主张。斯大林承认这一点。

关于达达尼尔的要求使杜鲁门有机会把他心里藏着的想法说出来，即把邻接两国或更多国家之间的水道国际化。他解释说，各国之间的许多纠纷是从关于水道的分歧意见产生的，因此这些水道应当置于某种形式的国际管辖之下。对于这个节外生枝的意见，丘吉尔表示不耐烦，而斯大林则对此嗤之以鼻，但也未反对。两人对这问题都沒有讲很多话。沒有人同杜鲁门争论，说他对水道国际化这个原则问题的看法是不对的，但我非常怀疑，是否有谁会对它的成功抱有丝毫希望，所以他们尽管客气地听着，并不感觉多大兴趣。杜鲁门恳请斯大林支持他的建议，但在波茨坦会议上这个想法沒有起

什么作用。总统对于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似乎还能冷静处之，虽然他偶尔也谈起这是一个好主意。他对于建议被否决，看来并不生气。

苏联人对土耳其的要求沒有达到目的。随后两年内苏联对土耳其不断施加的压力使总统于1947年宣布杜鲁门主义以支持那些受苏联威胁的国家。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放弃了对土耳其的要求。

236 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已同意参加对日作战，到波茨坦会议时苏联采取了第二个步骤，通知东京取消苏日之间的中立公约。关于协同的军事进攻问题，有其他许多细节尙待制订，所以在会议的最初几天，军事首脑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讨论亚洲战争问题上。日本人已经知道战败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在莫斯科试探过和平谈判的可能性，这些试探中有些我们已经得到通知，有些还沒有告诉我们。

7月18日，在斯大林的别墅举行的一次私人会谈中，斯大林隔着桌子把一张纸条推给杜鲁门，他说这是他从日本人那里收到的。他征求杜鲁门关于应当怎样回答的意见。函件表示想派遣近卫公爵去莫斯科讨论媾和的可能性。斯大林说他的想法是对建议置之不理。他给杜鲁门看了答复的草稿。答复中说，近卫公爵的访问牵涉一些问题，也许日本人还是等一等看看事态的发展如何为好。杜鲁门赞成这样回答，信就发出去了。

这不是苏联人第一次把日本人的信件告诉我们，但是我们通过斯德哥尔摩和安卡拉的情报来源，知道有些事情是苏联人沒有告诉我们的。苏联人在什么情况下把这些信息传递

给我们，似乎沒有具体的规定。斯大林透露了日本人的建议，给杜鲁门和贝尔纳斯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他们把这看作是苏联人也许准备光明正大地同美国打交道的一种表示，虽然是一种微弱的表示。实际上，斯大林的行动不是沒有利己目的的。这样做对他也是有利的，因为他当然不想为日本的媾和铺平道路。苏联把答应参加对日作战看作奇货可居，一旦对日媾和，那就会使它失去盟国所承允的高昂代价。

会议开始后不久，杜鲁门就接到华盛顿发来的电报，透露美国已经爆炸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颗原子弹。我仅在几个月前才从同霍普金斯的谈话中初次听到关于原子弹的研制计划。哈里曼和我坐在霍普金斯的病榻旁边，探问他能不能去莫斯科。在谈话的过程中，霍普金斯提到那种“大炸弹”，讲起了制造这种炸弹的进展情况。他沒有使用“原子弹”这个名词，但在我看来他指的显然就是原子弹。

在乘坐“奥古斯塔号”军舰横渡大西洋去参加波茨坦会议的途中，莱希海军上将和我曾谈了不少关于曼哈顿计划的事情。他觉得那些“长头发的学究们”骗了美国政府大约五十亿美元，因为这种炸弹结果可能只同线状火药（一种普通的无烟火药）差不多。大多数的军人对原子的威力抱着比较现实的观点。

237

在爆炸试验成功后三天，杜鲁门同他的顾问们和丘吉尔（英国人参与这个计划）商谈以后，决定最好还是把消息告诉斯大林。杜鲁门说，他将在会议休息时踱到斯大林身边，漫不经心地告诉他。他解释说，他要尽可能地做得非正式的和随便的样子。他叫我不要象通常那样陪伴着他，因为他不想就

这一发展表露出其中有任何特别重要的东西。因此只有俄国翻译巴甫洛夫把杜鲁门的话译给斯大林听。我没有听到谈话，虽然杜鲁门和贝尔纳斯都说我当时在场。

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告诉斯大林，美国有“一种具有不寻常破坏力量的新武器”。显然，总统没有告诉斯大林这种武器是原子弹，那位苏联领袖并没有追问或表示任何特殊的兴趣。他只点了点头，说了几句话。杜鲁门写道，“他只说他听了觉得高兴，希望我们将用它来好好对付日本人。”我在房间的另一头仔细地观察总统透露消息时斯大林的面部表情。斯大林的反应是若无其事，以致我心里怀疑总统的话他是否听懂。我这样低估这位独裁者，说明我对他还了解得不够。若干年之后，朱可夫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就在那天夜里，斯大林下令发电报给俄国那些研制原子弹的人，叫他们加紧工作。*

波茨坦会议后我在乘飞机回国时，曾同我的一个亲密朋友卢埃林·E·汤普森作了长谈。他当时在伦敦美国大使馆，后来出任驻莫斯科大使，是我国最出色的外交家之一。我们讨论了原子弹，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利用原子弹所带给我们的安全和威力去同苏联建立一种稳定良好的关系。我们感觉到并非常担心美国和苏联之间可能发生冲突。在我们看来，显然哪里有苏联军队，哪里就会强行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的、凭权力实行控制的苏联制度。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除非有

238

* 虽然一年以后，到 1946 年秋天，斯大林还承认苏联仍然没有掌握原子弹的“秘密”，但苏联在核研究方面的进展是异常迅速的。1947 年 11 月 6 日，莫洛托夫就说“苏联知道原子弹的秘密”。1949 年 8 月 29 日发生了苏联第一次原子爆炸。

人采取危及苏联国家和苏维埃制度的措施，苏联不会作出反应。我们设想我们可以采用的种种方法，从向苏联提出一个要求他们撤回国内的直截了当的最后通牒到施加各种不同程度的压力。每种想法都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如美国舆论，或者如果莫斯科干脆回答一个"不"字，我们怎样办。我们认为苏联最自然的反应可能就是干脆一个"不"字。如果那样，我们将同苏联打仗呢还是放弃我们的打算？沒有多少年外交经验的人也会懂得，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在內，要作这样性质的虛声恫吓是太冒险了，并且也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不象有些观察家所猜测的那样，关于原子弹和在广岛、长崎上空投下最初两颗原子弹的消息沒有立即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7月24日，在杜鲁门把炸弹的事情告诉斯大林以前，红军的A·I·安东诺夫将军就在波茨坦的三方军事会议上说，苏联军队准备在8月后半月出兵。但是，原子爆炸可能加速苏联的军事行动。第一颗原子弹是8月6日在广岛爆炸的；苏联于8月9日即在长崎投第二颗原子弹时进攻。甚至在日本人求和以后，苏联军队仍继续推进，仅仅为了政治目的去占领土地。

远在1944年，我就对苏联怎样参加太平洋战爭有些看法。在魁北克会议（我沒有参加这次会议）以前，我写了一个备忘录说苏联将在有利和准备好的时刻参加对日作战，到了那个时候，不让参加也不成。备忘录指出，在欧洲战爭中我们军事上依靠苏联，它仗打得最多。在太平洋，我们负起了战爭的重荷，因此我们不应当要求苏联参加。在波茨坦会议上，我向贝尔纳斯提起我的备忘录，并且表示这样的希望：不

要低声下气地乞求苏联帮助，特别是在胜利已经在望的时候。我们只须注意雅尔塔协定就行了，根据这个协定，苏联已作出参战的保证。我想贝尔纳斯是同意我的意见的。因此，当杜鲁门总统写信给斯大林要求苏联参战时，我心里觉得烦恼。

239 波茨坦会议的最后协定重申了雅尔塔会议上关于亚洲战争的决定，把日本的领土和在中国的权利给了苏联人。

在波茨坦，杜鲁门虽有一些不利条件，仍然干得不错。问题是新的，他既没有同斯大林打过交道，也不了解苏联外交家的手法。但是总统研究了情况介绍，听取了顾问们的意见。在辩论中他从来没有被击败，也没有被对方逼得窘态毕露或茫无所措。他碰巧遇到斯大林在这次会议上使用的策略并不特别狡猾。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没有想要向对手耍手腕，或是用一些诡诈的措辞使对手上当。他们对于红军所占地区的问题只是顽强地坚持一种主张。因此，杜鲁门总统缺乏外交经验这一点没有成为真正不利的条件。这里，技巧或精明的外交手腕都没有施展的余地。

如果罗斯福活着，波茨坦会议会是另一种样子吗？罗斯福对于他同斯大林缔结的协定抱有一种个人的感情。对于苏联不顾协定的行为，他无疑地会比杜鲁门更加生气。但是除了这一点、即他的个人反应以外，我不认为如果罗斯福在场就会有所不同。斯大林是不可能被个人感情所左右的。

如果丘吉尔仍然是首相，欧洲的地图会不会两样呢？答案仍然是不会（即使丘吉尔退出会议），因为在双方有意见分歧的地区，例如波兰，苏联掌握了全部权力。

对于丘吉尔的落选，我们都大吃一惊。新首相克莱门特·

艾德礼在大选前就参加了波茨坦会议，但只是英国代表团中一个显然是次要的成员。有一天晚上，艾德礼在宴会上亲自告诉我，他不认为工党有机会在议会中得到多数。他希望争取足够的席位能迫使丘吉尔政府倾听工党的观点。

大选那一天，我同英国第十一骠骑兵旅的一位上校一起吃饭，他是我妻子的一个表兄弟。我们吃完饭坐在餐厅里从无线电中听投票结果。当显然工党已经获胜时，军官们都感到沮丧。他们阴郁地推测，一旦社会党人掌权，沒有一个象丘吉尔那样有才能和力量的人来指导帝国事务，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我只是听着。

直到那时为止，在我的印象中艾德礼只是一个机动的玩具，当丘吉尔把它上了弦，放在桌上时，它会象预期的那样动作。当艾德礼作为英国代表团团长回到波茨坦时（丘吉尔呆在英国），他仍然象先前那样谦逊和平易近人，但是他显示出我先前沒有见过的那种力量。然而在那个时候，大多数协定已经商妥，艾德礼不想把事情搞乱。 240

我沒有听到斯大林关于英国政府变化的直接评论，但是他一定感到惊愕，因为他谈到工党时总表示轻蔑，对工党能否组织政府，表示怀疑。工党领袖们对斯大林也不抱幻想。艾德礼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甚至在波茨坦也不隐蔽他的反共情绪。

固然在波茨坦会议上作出了一些决定，有些后来起了作用，有些沒有，但这次会议不能被认为一次重要的会议。双方的大部分政策路线在会议前已经制定了。在波茨坦会议之后，要想劝使苏联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个通情达理的、愿意

合作的成员，已经办不到了。两种体系之间的矛盾太大，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对情绪太深。对我来说，战时同盟的解体意味我担当的角色的改变。以后若干年内，我将作为国务卿的顾问，参加华盛顿的许多次会议和在伦敦、巴黎、莫斯科的几十次会议，力图协助拟定解决劫后欧洲的许多问题的办法，首先是要防止冷战爆发为真枪实弹的战争。

第 三 部 分

在国务卿手下工作

第十四章　贝尔纳斯，被人低估了的国务卿

在 1945 年 8 月我从波茨坦开会回国不久，我和我的妻子前往缅因州作短期休假。在飞往班戈的飞机上，坐在一起的一位旅客把日本投降的消息告诉了我们。象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从来沒有怀疑西方盟国将在战争中获胜，即使在法国崩溃，纳粹军队长驱直入苏联，珍珠港事件后的黑暗日子里，我也是如此。但胜利带来的欢乐却被未来的阴暗预兆所冲淡。波茨坦会议沒有成为一次令人鼓舞的会议，我可以看到前途的各种艰难险阻。

我们预定和我们的朋友、住在缅因州西南港的尼古拉斯·勒丁顿一家欢聚一个星期左右。哈里·霍普金斯和他的夫人（勒丁顿夫人的姐妹）已经在他们那里了。自从我们于 6 月间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我一直沒有见过哈里，我们有许多话要谈。他身体很虚弱，但急于想听听有关波茨坦会议的情况。我把我的日见增长的担忧告诉了他。哈里象往常一样，关于对苏联的政策总是比我较为乐观。他抱定一个中心思想，认为美国、苏联和英国三者之间的良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因素，必须尽一切力量去增进这种良好的关系。我指出了我们在波茨坦会议上所碰到的一些问题。他沒有表示异议，但他仍然坚持他的主题，希望杜鲁门政府或多或少从同样的角

度看待世界形势。哈里倾向于抛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认为耐心地和审慎地同莫斯科打交道是这一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夕阳斜照下坐着喝酒是很愉快的。此后我就沒有再见过霍普金斯。他从缅因州前往纽约，此后不久就进了医院，于1946年1月29日逝世。 244

如今要说明哈里·霍普金斯对于历史的影响有多大，是不容易的。他对罗斯福的影响完全是个人性质的，因此它起伏不定，完全要看罗斯福的心情如何。有时他得到罗斯福的充分信任，但有时又由于某种并不明显的原因，他被抛在一边，甚至几个星期见不到总统。霍普金斯成了辨别总统情绪的能手，直觉地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提出建议，什么时候保持缄默。毫无疑问，在整个战争期间，比起任何其他顾问来罗斯福更多地依靠霍普金斯。

两人之间的感情很少有明显的表露。我只有一次看见过罗斯福表示他对霍普金斯的欣赏，那就是在德黑兰。在大家按照丘吉尔的建议对霍普金斯祝酒以后，罗斯福探过身去向餐桌对面他的忠实的助手说，“亲爱的哈里，沒有你我们将怎么办？”

霍普金斯基本上是一个善于调解的人——他安抚发怒的丘吉尔或劝说不肯同意的斯大林。英国人非常尊敬他，丘吉尔把他称为“事由勋爵”，因为他具有抓住问题中心的特殊才能。可是他也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尊敬，因为他坦率诚实，不肯采取外交上的欺骗手段或者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沒有人比他更尽力于保持战时的同盟友好关系了。

斯大林大元帅有一次当我面说过，霍普金斯是他对其推

心置腹地(po dushe)交谈的第一个美国人。但这种关系并没有使苏联的对外政策改变很多。在谈论任何个人对斯大林或苏联的制度能起什么影响的时候，必须经常记住，苏联人所感受的任何私人感情从来没有影响过他们一心一意想要达到他们的目标的心念。

在对事务作判断时，霍普金斯是机警、冷静和实事求是的。他犯过一些错误，尤其是在他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看法方面。然而他比我所遇到的其他任何公职人员都更加愿意承认错误。或许由于我对他抱有好感，我的看法有些偏颇，但毫无疑问，霍普金斯对于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少贡献，仅就这一点来说，他是值得美国人民感谢的。

我刚从缅因州回到华盛顿，立刻就埋头于各国外长会议第一次会议的准备工作，这个外长会议是在波茨坦会议上就安排好了的。我作为贝尔纳斯的特别助理，没有正规的办公任务；我被派定根据形势发展处理一切有关苏联问题的工作。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所有的形势发展都与苏联有关，所以我和贝尔纳斯经常接触，陪他出席各种会议。贝尔纳斯往往向我问起有关苏联和战时各项协定的见闻。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过去，我们彼此更加了解，因此他虽然不是经常，有时也征询我关于其他政策问题的意见。

国务卿贝尔纳斯和国务院派遣的代表团乘坐“伊丽莎白女王号”轮船前往伦敦出席外长会议。这艘船还带有运兵船的样子，我和艾德莱·E·史蒂文森合住一间原来设计可容五、六十名军官的大舱房。史蒂文森担任过组织联合国的筹备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我还是初次和他相逢，我们一

路谈了许多话。自然，我们的主要话题是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史蒂文森给我的印象是，他的头脑清新而灵敏，对于世界问题的看法有独到之处。他的想法的一个方面特别显著，而且令人不安。他并不否认我们面临的任务的严重性，然而他所关心的不是问题的现实状况，而是它对美国人的心理上的影响。他担心强烈的反共情绪的滋长会妨害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说的话值得深思，正如麦卡锡时代后来所表明的那样，但他的观点会产生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那就是看轻美苏关系问题的严重程度。

外长会议的第一次全体大会在伦敦的兰开斯特大厦举行。我们第一次领教到莫洛托夫具有使会议遭受挫折和拖延时日的特殊才干，以后在巴黎、莫斯科和伦敦的各次会议上我们对于莫洛托夫的这种行为是太熟悉了。波茨坦协定已把对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等国的和平条约的准备工作列为外长会议的第一桩任务，随着则要准备对德国和奥国的和约。波茨坦会议并没有把对德奥的和约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的意图，美国方面肯定没有这种意思。但是，苏联人却甚至拒绝讨论对德和约或对奥和约。

克里姆林宫的这种阻挠是会议上最重要的事态发展。这里再一次透露出苏联的对德政策，不管透露得多么轻微。看来苏联人好象就要封闭他们的占领区，阻止把德国当作一个经济整体的任何举动。总之，伦敦会议已经使人可以约略看出德国分裂的预兆。 246

会议上讨论了对意和约，但因的里雅斯特市的缘故，没有达成协议。这座城里住的是意大利人，周围是南斯拉夫人。

我们本来认为，对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和约不会耗费时间，但在会议将近结束时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莫洛托夫忽然声明苏联认为法国虽然原来是外长会议的成员国，但无权参加讨论。这一声明是突如其来的。固然波茨坦协定没有象起草对意条约那样特别规定法国在起草对巴尔干半岛各国和约方面的任务，但直到会议将近结束，苏联人从来没有反对法国代表参加各次会议。其中的原因是不难找到的。苏联人曾经认为，既然法国政府内部有共产党人担任着重要职务，在苏联同英美发生争议时，法国政府就会倾向于支持苏联方面。但在伦敦会议上很快就看出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法国仍然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并据此指导它的政策。这种立场使苏联人感到吃惊和愤怒，于是他们决定提出一个技术性问题。他们援引事实，说明法国早在1940年即被打败，并非对巴尔干半岛各国停战协定的签字国，所以根据波茨坦协定的条款，它在技术上没有资格参加外长会议关于和约的审议。

当莫洛托夫提出他的强词夺理的论点时，他变得非常武断和不合情理，以致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不能再保持沉默了。在对新闻记者保密的一次会议上他说，他"从来没听到过"任何论点象莫洛托夫提出的那样与希特勒的哲学如此相似了。当这句话被译出来的时候，莫洛托夫极为震怒——或者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说，有些国家早在苏联人之前就同希特勒合作过，而现在竟把他的国家比作希特勒的德国，他不能再坐下去听这种话了，于是，等不到翻译人员把他的话译成英语，他就站起身来要离开会场。当贝文弄清楚了莫洛托夫的答话，又看见他朝门口走去时，他连忙说，"哦，我并非有

意要冒犯你，我愿意把话收回。”因此，苏联代表团中的一位助理人员便拉拉莫洛托夫的上衣的后摆说，“他已经收回他的话了，他已经收回他的话了，”于是莫洛托夫又转身回来。

如果莫洛托夫离开了会场，外长会议无疑地就会破裂，对先前那些敌国的条约就会延期研究。其结果可能要引起英国和美国舆论界的广泛批评，说我们对苏联人太粗暴。 247

当争论继续不休时，贝尔纳斯断定再谈下去是沒有用处的了。他劝当时的会议主席中国外交部长宣布会议结束。他照例自行其事，既不征求总统的意见，也不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作长时间的讨论。

在乘飞机回国的途中，贝尔纳斯很关心他自己的立场。他不知道美国舆论能否容忍他认为必要的这一对付苏联的行动。他也不知道美国人是否充满了亲苏情绪，会指摘他断送了争取世界和平的大好机会。后来他发现美国新闻界几乎毫无例外地赞许他的行动，他才如释重负。返美后不久，他发表了一次演说，讲到美国对苏联的态度必须从先忍耐后坚定改变为先坚定后忍耐——这一观点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阿瑟·范登堡所持的观点十分相似，因此这篇演说被人称为“第二范登堡协奏曲”。

12月，当我在南卡罗来纳州艾肯市探望我的姐妹和母亲时，我接到了贝纳尔斯打来的电话，命令我返回华盛顿。我们就要去莫斯科。这次旅行显然是贝尔纳斯想出来的主意（他事先可沒有和我讨论过），想借此打开外长会议上出现的僵局，并和苏联人讨论其他分歧的意见。我赶回华盛顿，从部队里领了一套冬天服装（从那以后我一直穿这套服装去打野

鸭），就陪同国务卿贝尔纳斯、科恩、马修斯和其他一两个人横渡大西洋。

我们必须途经巴黎，这就引起了一个很微妙的问题。贝尔纳斯没有建议让法国派代表参加会谈，戴高乐对于遭受排斥是很感愤慨的，尤其因为英国人已经接到邀请。贝尔纳斯认为，既然法国应否参加讨论和约的机构尚成问题，那么，在去莫斯科以前，最好不同法国人搅在一起。我不能肯定他的见解是否正确，但这是他的决定。为了避免在巴黎过夜，当我们在那里着陆时，我们就立刻转乘一架较小的飞机，在大雨滂沱中飞往法兰克福，在那里我们掠过一群小山，降落在湿淋淋的机场上。我们在克莱将军那里过了夜。他那时已接替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占领军总司令兼德国的民政长官。

248

第二天，我们换乘我们飞渡大西洋的原来的专机前往柏林。飞机驾驶员缺少在欧洲飞行的经验，但飞机上有一位俄国领航员和无线电通信员。当我们离开柏林时，美军气象人员警告我们，说有一个锋面已经迫近莫斯科，但它虽向莫斯科方面移动，当时尚未到达。驾驶员由于具有他本行业的乐观主义和缺少经验，说道，“好吧，我们飞到莫斯科，它就已经消失了。”我们的飞机就这样起飞了。当我们接近莫斯科的时候，我们碰上了一场大风雪。我坐在驾驶员的舱房内，为驾驶员和苏联领航员当翻译。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而看来我们的飞机只是绕着莫斯科打转。最初我们在莫斯科以西约五十哩，后来飞到北面，再飞到东面，最后飞到南面。领航员对无线电通信员生了气，问他为什么不能在规定的波长上与莫斯科连络好。无线电通信员耸耸肩膀，把他的耳机转向外

面，使我们能够听见耳机中的声音。他说，“如果他们在那个波长上播送华尔滋舞曲，那也是我的过错？”最后，我们冲开了夹雪的云层，正好在天黑之前降落到莫斯科附近的伏努科沃机场上。维辛斯基迎接了我们。他看来很激动，不断问我们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我们无话可答。

大约在我们抵达莫斯科的同时，英国人也乘火车来到了。贝文有些恼火，因为这次意外的会谈是由国务卿贝尔纳斯发起的，事先没有同英国人认眞商量，但他的愤懑情绪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贝文是有理由发火的。这次会议临时匆匆召集，事先完全沒有组织好。有些事项未经充分准备就列入议程。贝尔纳斯本人有不规则的工作习惯，他办的外交政策很多是从他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他并未象应有的那样很好地利用国务院提供的各种便利条件，并且象罗斯福那样，往往过分随机应变地处理一些极关重要的问题。我看不出在那种情况下会谈能取得很大成就。

当克里姆林宫提出他们不再反对法国代表参加考虑对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和约时，我们都感到诧异。苏联人究竟为什么一反他们在伦敦所持的立场，我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可能是苏联同法国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也许莫里斯·多列士这位法国共产党领袖已经告诉他们，不能仅仅因为法国不是对巴尔干半岛各国停战协定的签字国这一单纯技术问题而把法国排除在考虑起草和约的会议之外。无论如何，莫斯科终于决定让法国充分参加有关和约的讨论。外长会议的全体会议规定在 1946 年 4 月召开。 249

关于如何保证巴尔干建立民主政权的问题，这又是令人

发愁的老经历，因为这就要试图同苏联人就他们所完全控制的地区展开争论。我们并未取得任何进展，即使贝尔纳斯不顾美国代表团几乎所有成员的劝告而签署了一个协议，同意不要求把两个完全有权取得席位的人安插在保加利亚政府里。贝尔纳斯这样做是为了更便于支持在保加利亚成立联合政府。这是一个错误，但他并未引起严重后果。

莫斯科会议的另一个表现是美国第一次试图同苏联人就控制核武器的问题作某种安排。为了便于这方面的讨论，贝尔纳斯带来了与发展原子弹直接有关的詹姆斯·B·科南特博士。我们的建议的基础是艾奇逊-利连撒尔计划，这一计划提出把核武器的生产国际化。这是个很好的计划，但苏联人不同意。即使美国愿意放弃对核武器及其制造的一切控制，我们仍然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制造原子弹技术知识的国家。苏联人不能容许我们保持那种垄断。他们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

直到莫斯科会议时为止，苏联曾公开地贬低原子弹的重要性。斯大林已发表过一篇声明说原子弹不过是一种吓唬神经脆弱者的武器。会议期间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宴会上，莫洛托夫根据这一方针对核武器采取了嘲笑的态度。在祝酒时，莫洛托夫说科南特博士可能在他的背心口袋里放了一小块可裂变材料。斯大林站了起来并且安祥地说，原子裂变是很严肃的事情，不应拿来开玩笑。他称颂了美国和英国的核物理学家所取得的成就。就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厅里，我们看到斯大林并不同他的第二号人物商量，突然改变了苏联的政策。丢了面子的莫洛托夫并没有改变他的表情。从那以

后，苏联给予原子弹以应有的认真考虑。

贝尔纳斯提出了苏联在伊朗北部阿塞拜疆地区建立了傀儡政权的问题。原来的1941年英国-苏联-伊朗协定规定英国和苏联的军队在战争结束六个月后撤退。照苏联人的解释，这六个月应当从太平洋战争结束时算起，从而可以多出三、四个月的时间，用来帮助建立一个亲共产党的政权。苏联的主张在法律上讲是正确的，西方盟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 250

贝尔纳斯决定把西方盟国的意见直接向斯大林陈述，于是我们便在一个雪夜去克里姆林宫讨论这个问题。贝尔纳斯告诉斯大林，说他不能理解象苏联这样一个幅员如此广大、实力如此雄厚的国家，刚从历来最大一次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怎么会对南方弱小而沒有武装起来的邻国感到不安。斯大林当时似乎有点无精打彩，承认苏联沒有理由要担心来自伊朗的武装入侵，但比较详细地谈到了渗透的危险，尤其是破坏分子可能潜入巴库油田，进行破坏。他的论点十分脆弱，眞正的原因又异常明显，因此贝尔纳斯在最后结束谈话时说，伊朗的局势问题显然会在下一个月在伦敦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会议上摆出来，那时美国可能会很容易地站在反对苏联的立场上。贝尔纳斯补充说，如果出现这样的变化，那将是不幸的。斯大林只是耸耸肩膀说，“这不会使我们脸红的。”在我们乘汽车从克里姆林宫回寓所时，贝尔纳斯说他预见到在伊朗问题上势必发生眞正的麻烦。

在这次去莫斯科的简短访问中，另一个被谈到的问题是朝鲜。虽然在战时历次召开的会议上已为大家所理解并在波茨坦会议上重新加以肯定，朝鲜应该是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国

家，但苏联人却一直阻挠在全朝鲜组织一个单一的政府。在贝尔纳斯一再敦促下，斯大林同意参加发布一个公开宣言，由三大国为朝鲜成立一个托管委员会，直到朝鲜本身可以成立一个独立生存的共和国为止。我们多少有点为这一发展所鼓舞，很天真地相信各种困难都将消失，我们可以着手组织一个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举行自由选举的临时政府。我们当然非失望不可。

在会议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我们不象过去参加其他会议时那样，定期地向总统汇报。我问贝尔纳斯是什么原因。他厉声说，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向总统汇报，什么时候不要。他那

251 样顶了我，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等我们回到华盛顿以后，我们才知道白宫因为贝尔纳斯没有充分汇报会议的情况而很不高兴——海军上将莱希也发了火。贝尔纳斯甚至作出安排，要向全国进行无线电广播，向人民报道他去莫斯科的情况，而并未将他的发言稿全文事先交给白宫审阅并取得支持。这个争论解决了，但这样的工作方法终于使贝尔纳斯在不到一年辞去了国务卿的职务。

当我们刚刚回到华盛顿不久，就有必要向后转，前往伦敦，这次是去出席 1946 年 1 月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会议的。正如贝尔纳斯所预言过的一样，美国因反对苏联军队驻在伊朗以及苏联在那里的种种活动，在这个战后的重要问题上第一次同苏联决裂。这次会议以陷入僵局而告结束，但这个问题肯定是要再出现的。*

---

*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出席了伦敦会议，他不是作为政府的代表，而是作为共和党的代表参加的。在会议期间，他看到了联邦调查局关于阿尔杰·

固然我们往往很难断定外交形势发展的动机，但如果涉及狭义的国家利益，那也就不难推断。就伊朗的问题而论，美国的全部动机是不容易写在纸面上的。当时无疑地有一种想法，认为在这提交安理会处理的第一个重大问题上，美国应当表明，一个大国必须联合其他国家采取集体行动去反对一个顽固不化的大国。苏联在伊朗的行动明显地破坏了联合国的原则。如果联合国不能顺利地通过这次考验，它在刚成立不久就会变成一个徒有虚名的机构。

固然伊朗问题可以看作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原则问题，我们作出决定时却也曾从实力上加以考虑。我们是在远离美国正常国家利益的地区坚持我们的立场，因为我们了解到，如果不这样办，那我们就势必要在某个离我们海岸近得多的地方坚持我们的立场。

有些实际的差别使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采取行动，而并未在东欧这样做，虽然东欧问题也同样是原则问题。苏联在东 252 欧和东德借助于红军的力量扶植了傀儡政权。伊朗在大战期间是一个事实上的盟友，它不仅不依存于莫斯科，而且是这个案件的原告。我们对于原告的指控不能置之不理。

在纽约召开的安理会第二次会议上，这个争端达到了严重关头。问题的是非曲直已经毋庸置疑了。苏联人的罪名是

希斯的几份报告。尽管有这些报告材料，他仍在当年的下半年支持希斯被提名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委员会的主席。虽然那时我没有看到联邦调查局这些报告，贝尔纳斯却在 1946 年 3 月把它们给我看了。那时希斯刚从国务院辞职。我仔细地审阅了档案，其中除有惠特克·钱伯斯指控希斯为华盛顿一个共产党小组的成员而缺乏旁证的陈述材料外，我没有发现什么东西。我向贝尔纳斯提过，这个指控没有旁证可凭。我还补充说，这一指控如果属实，情况就很严重，并不仅仅是逢场作戏地侈谈共产主义了。

直接破坏了他们所签署的从伊朗国土上撤出苏军的协定，并企图在阿塞拜疆建立傀儡政权。他们面临着安理会所有其他成员国在世界舆论支持下联合一致的反对。他们在暂时退出会议厅以后(我向贝尔纳斯说过，他们是会这样干的)，他们终于见风使舵地在这个问题上屈服了。关于在1946年9月从伊朗撤出苏军的决定，是联合国一次明显的胜利。

接着产生了是否应当把伊朗事件保留在议事日程上直到苏军完全撤退为止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把这事件丢开，那是荒谬可笑的。美国代表团中也有一些人不同意。结果，国务卿贝尔纳斯被说服把伊朗事件保留在议事日程上。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韦·利告诉我，我们应当相信莫斯科，不再讨论这个问题。

美国国内有一些人反对我们坚决支持伊朗的立场。在安理会作出决定以前的一次宴会上，沃尔特·李普曼对贝尔纳斯决心为伊朗事件抗辩的行动抱批评态度，指出大国之间的任何对抗在理论上都包含着战争的危险性。我大致谈了谈美国政府就避免对峙局面所做的一切努力，并说战争是极不可能发生的。在以后的热烈讨论中，李普曼夫人支持她丈夫的观点，插口说道，“好啦，奇普，我只能说，在你们的战争中我是决不去当护士助手的。”

我们在美国国内没有住多久，过了不多几个星期就又飞渡大西洋了。这条航线我已经非常熟悉。这次我们去巴黎住了半年，从4月到10月，在这期间，外长会议起草了对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和约，讨论了对意大利的条约。

在这次会议上，我为贝尔纳斯担任了新闻发言人的工作。

他觉得有必要把美国的立场通知新闻界，因为其他代表团正在对记者们透露消息。在每次会谈之后，贝尔纳斯都简略地告诉我，什么话应当说，什么话不应当说。我几乎总是把秘密会议上的情况大致对新闻界谈一些，但很少透露会议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

253

在贝尔纳斯抵达巴黎后不久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的谈话，我沒有对新闻界讲出来。他邀请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到默里斯饭店的他的房间里去。我们这边有现任国务院顾问本·科恩和我自己。当我们进餐时，莫洛托夫竭力埋怨美国在伊朗事件中所持的不友好态度。他坚决认为，苏联超出协议所规定的期限在伊朗驻军是小事一团，不应损害美苏之间的关系。他沒有打算否认苏联的行动是非法的。贝尔纳斯解释说，旣然美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过字，而联合国宪章是旨在保障弱小国家的，他身为国务卿，就不能设想在紧要关头背弃伊朗人。

几个星期以前，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市发表过一篇演说，其中谈到苏联的“铁幕”。莫洛托夫在席上也对丘吉尔的这篇演说加以指责。莫洛托夫说，丘吉尔号召大家行动起来遏制苏联，这引起了苏联人的愤慨。当他正在痛骂丘吉尔的时候，平素向来是和蔼可亲的科恩打断了他的话，发表了一通称赞丘吉尔的勇气的言论。科恩指出，如果沒有这位英国战时的领导人，我们也许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在巴黎，有一大部分时间是用来解决的里雅斯特问题的。前面已经指出，亚得里亚海边上的这座城市的居民以意大利人居多，但它周围是南斯拉夫人的土地。南斯拉夫人非常强

硬地认为的里雅斯特应当划归南斯拉夫，而意大利人当然想保留这座城市。在那些日子里，苏联同南斯拉夫亲密无间。莫洛托夫在巴黎会议上争辩说，的里雅斯特从经济上和历史上看都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而那里的意大利人应当被看作是受外族包围的一个少数民族。我们那时是支持意大利的，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城市应当属于绝大多数居民的祖国。尽管报纸上有许多报道，都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美籍意大利人在这个问题上施加了政治压力。这样的压力也许有过，但那时铁托完全倒在苏联一边这一事实，使得我们对意大利人的支持在美国国内深得人心。

当我们在巴黎争论时，我们派出一个委员会到亚得里亚海岸去调查现场的情况。美国的代表是菲利普·莫斯利博士。我们选他不仅因为他是苏联问题专家，而且因为他能说的里雅斯特外围地区所通用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苏联代表不会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这样，莫斯利就能够同南254斯拉夫人交谈，而苏联代表则不能。该委员会回来以后写了一份忠实而客观的报告，提出证据说明的里雅斯特的居民愿意成为意大利的一部分。苏联代表折服于证据的无可争辩的性质，或者他的上级没有给他确切的指示，因此他附和了多数代表的意见。莫洛托夫抨击这份报告，说委员会无权作出看来会使外长们产生偏见的建议，而只有外长们才能作出判断。他说，委员会是被派到的里雅斯特去搜集事实的，不是去得出任何结论的。

在那些日子里，苏联人不断地强调在苏美之间有必要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坚决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携起手来。正如

我国有些人士在战时已经预先告诫的那样，问题在于布尔什维克党人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国界得到合理的保护；他们要把他们的控制权延伸进地中海并朝西方伸入欧洲。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愿退让的。有一天，曾任派驻伦敦的法国和其他流亡政府的苏联大使鲍戈莫洛夫对我友好地说，“我眞不理解你们美国人。你们一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人，可是你们在这里却不准备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作交易。”我回答说——可能带着一点傲慢的口气——美国将永远不以人类的命运作交易。

的里雅斯特争端迁延不决。最后，美国代表团中的两位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和阿瑟·范登堡（特别是后一位）以及贝尔纳斯一起想出了一个使的里雅斯特国际化的计划。苏联人接受了这个想法，但后来在讨论工作细节时，他们又提出一些足以破坏国际化原则的建议——例如要求把该城包括警察在内的各项市政直接置于南斯拉夫的控制之下。苏联的建议实质上是把该城市移交给南斯拉夫，不过披上一层薄薄的伪装而已。我们加以抵制，但也做了一些让步。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不能达成协议，因为南斯拉夫人显然极力反对。结果，在巴黎会议上未能签订对意大利的和约。

对巴尔干半岛各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条约沒有出现什么大问题。*由于这些条约已经起草就绪，各国外长便同意在 1946 年 7 月 26 日召开一次会议，以便签订和约。有一天下午宣布了这个日期，全球的新闻界都发布了消息。第二天早上，当各国代表聚集一堂来审定批准一 255

* 由于美国并未向芬兰宣战，在起草对该国的和约时，美国没有参加。

份将由东道国法国发给其他国家的请帖的全文时，苏联人拒绝批准。于是又匆匆召开了一次外长会议，在长达四小时的会议中，莫洛托夫回答了别人提出的关于拒绝批准请帖草稿的每一个问题，说苏联代表团决不允许外长会议变成一个专盖橡皮图章的机构。然而，在讨论时，大家弄清了克里姆林宫转变态度的真实原因。莫洛托夫出了纰漏，他在同意会议的日期之前没有就议事程序的规定取得一致意见。苏联人知道他们在会议中将处于少数，因此他们要求在作出每项决定时他们都有否决权，以便保护苏联的立场。莫洛托夫从莫斯科收到了措词严厉的指示，要他纠正错误。

维辛斯基独自微笑着坐在一旁，欣赏着莫洛托夫的窘境。由于会议没有进展，外长们就休会去进餐。贝文在进餐时喝了不少酒，他看到会议遭受挫折，越来越生气，带着要吵架的神气回到会场。当莫洛托夫攻击英国在国际事务中过去所犯的罪恶时，贝文突然站了起来，两手紧握拳头，冲到莫洛托夫跟前说，“我对于你这一套领教得够了！领教得够了！”看来在这一瞬间，英国的外交大臣和苏联的外长几乎要挥拳动武了。但保安人员跑了过来，而主持这次会议的贝尔纳斯则以他带有卡罗来纳口音的低声和气的语调进行调解，一场风波总算结束。最后，我们在有关议事程序的规定问题上作了让步，因为唯有这样做，才能使苏联人回到谈判桌上来。

那年的秋天，当各国外长在纽约再度聚会时，贝尔纳斯运用他那政治谋士的手腕解决了的里雅斯特争端。有一天贝尔纳斯来找我，以其特有的风格——显然他已下了决心——对我说，“快点，奇普，咱们一道去见莫洛托夫。我想出了一个主

意。"我们到了里茨饭店里的莫洛托夫的房间。贝尔纳斯对莫洛托夫说，"在考虑了整个问题以后，我确实认为我们大家所应做的最明智的事情就是老实承认失败，解散这次会议。"他说，他认为的里雅斯特问题实质上不难解决，对这个问题继续争论不休和僵持不下，那就只会损害有关各国的名誉、特别是参加会议的外长们的名誉。然后，他以柔和的语调补充说，他对于莫洛托夫的确抱有很大的同情。没有谁能显得对南斯拉夫人更加关怀备至了。就贝尔纳斯所能看到的情况来说，南斯拉夫人完全辜负了这番努力。他认为莫洛托夫有十足的理由不再想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达成协议。 256

莫洛托夫的反应是很有特色的。他开始有点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象他稍有激动时经常可以看到的那样，然后说道，"不，不，贝尔纳斯先生，不要匆忙地采取行动。等到今天下午开会，你就会看到形势的发展了。"当我们乘电梯下楼时，贝尔纳斯说，"嗯，我希望这一手能发生效力。"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莫洛托夫作了许多让步，就象从一手纸牌里一张张打出来似的。几乎所有悬而未决的争点都以合理的方式达成了协议，最后对意大利的和约拟定了，签字的日期也规定下来了。

贝尔纳斯的策略所以能发生效力，是因为苏联人根据经验知道，贝尔纳斯不是虚声恫吓的，如果的里雅斯特的局面依然如故，那么，在大部分地区被西方占领的情况下，南斯拉夫人就可能丧失取得对该地区的控制权的一切机会。而一旦实行国际化，还有可能在那个框框内取得较为有利的结果。

1947 年 2 月，贝尔纳斯辞去了国务卿的职务。他提出的

理由是想重新去过那种无官一身轻的生活。虽然我并不充分了解详细的情况，但我知道眞正的原因是他在执行外交政策的方式上同杜鲁门有分歧。我总觉得他们的不和开始于1945年举行莫斯科会议时贝尔纳斯未能就会议情况按时作详尽的汇报。贝尔纳斯的个人作风是喜欢单干，局限在顾问人员的小圈子里(我想我自己也可算他的顾问之一)讨论问题。这样他就不能充分发挥和利用国务院的人才和专门知识。而且，他沒有同总统作日常的亲密商谈，象霍普金斯同罗斯福，以及后来的国家安全顾问同其他的总统那样。贝尔纳斯的个性很强，他要求有独断独行的自由。这种方法不可避免地同杜鲁门关于总统拥有特权的强烈看法发生冲突。我们还必须记住，贝尔纳斯在美国民主党內的地位要比杜鲁门高得多。虽然我沒有听到贝尔纳斯提起这个问题，但他总感到罗斯福在1944年应当提出他而不应当提出杜鲁门充当副总统候选人。在这样一些情况下，贝尔纳斯便相信他作为国务卿是应该享有独立地位的。

贝尔纳斯惯于说幽默话来缓和紧张的气氛。有一次，当257 我们在气候很恶劣的条件下乘飞机接近亚速尔群岛时，他说，“伙计们，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接着他说有一架飞机载着美军联合后勤组织的一队女演员和几名士兵，在飞抵非洲上空时遇到了一场大风暴。飞机摇晃得很厉害，机上人员把降落伞发给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一个乘客。每一具降落伞上附有一张用法说明书，那是为士兵们写的。说明书上有一条需知项目说，在跳伞将近着陆时，应当用左手紧拉住降落伞上绳索，用右手护住阴囊。一位从南卡罗来纳州来的青年姑娘看了这

一条后，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办，但过了片刻，她就挨近一个大个子的中士说，“大个儿，我要站在你身边。”

每逢贝尔纳斯到国外出差，我都陪着他去，出席他所参加的每一次会议。在他担任国务卿的全部任职时期，除了他在国内偶然参预纯粹国内事务的时间以外，我都在他身边。

在贝尔纳斯任国务卿时，他做的工作超过他所得到的评价。他必须对付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困难的阶段。他必须从战时的联盟关系转而采取果断地对付新出现的苏联威胁的政策。

贝尔纳斯必须具有极大的勇气才敢宣布结束伦敦的外长会议，因为他这样做或许要承担破坏美国与苏联在战时的盟友关系的重大责任。他决定用美国的全部力量来为伊朗撑腰，这也是需要有勇气的，因为伊朗是毗邻强大的苏联的一个弱小国家。当贝尔纳斯就任国务卿职务时，他的目的当然不是要同苏联对抗。

贝尔纳斯的后任乔治·马歇尔发现道路甚至更为崎岖，因为斯大林对西方加强了他的压力。对我来说，换了上司意味着在对苏联的冷战斗争中我将担任一个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258

第十五章　马歇尔，一位杰出的国务卿

当乔治·C·马歇尔在1947年1月就任国务卿时，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召见国务院的主要官员，听取他们对于美国所面临的外交问题的看法。轮到我去见他的时候，我相当详尽地论述了美国对苏联的关系，着重指出了苏联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和大国实力因素。马歇尔仔细地听取了我的意见，并没有作出评论，只是表示了谢意。他不准备接受任何人、特别是他还不太了解的人的看法，并且他对于国务院的官员也还并不熟悉。

当时外交部门对于任命一位军人来当国务卿，是很感到不安的。马歇尔的名誉极好，然而国务院里工作人员的情绪不高，因为贝尔纳斯曾经忽视他们所起的作用。他们普遍地担心马歇尔将军会执行严格的纪律和办公制度，以致他们的看法无法上达。

谁都知道罗斯福没有指派马歇尔担任进攻欧洲的总司令这件事情，虽然他想担任这项职务，人们也一致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一般还不大闻名的是，马歇尔具有善于应付比较难于共事的人这样一种品质——这种品质将在他担任国务卿时发挥很大作用——这也是罗斯福决定把这位将军留任陆军259 参谋总长的原因。马歇尔不但善于激发其他军种的参谋长的

勤奋精神，还能处理好往往成为问题的与英国人的关系，并且擅长同国会打交道。

我第一次与马歇尔相见是在德黑兰，他把盟国的军事形势分析得非常清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参加过多次他也出席的会议，每次都加深了我对他的钦佩。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夕，我作为东欧司司长，前往苏联大使馆参加葛罗米柯将苏瓦洛夫勋章授予马歇尔的仪式。这种勋章是苏联授予外国人的最高军事勋章。从马歇尔的平静安祥的面部表情上谁也看不出那时即将进行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他没有回到他的办公室，而是到弗吉尼亚州利斯伯格城的老家去了。过后，我问到他在那个晚上的行动时，他说，“噢，关于盟军登陆，我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了。最好自然是回家好好休息一夜，准备应付第二天早上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第二天早晨发生的情况是，当他还睡着的时候，一位上校急急忙忙地来到利斯伯格，带来了艾森豪威尔报告盟军正在诺曼底登陆的电报。这位赶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上校坚持要把马歇尔喊醒，让他看这封急电。当马歇尔夫人表示反对时，上校最后拿出电报来给她看。马歇尔夫人是很了解他丈夫的，于是就问道，“那么你想叫马歇尔将军做些什么事情呢？”她丈夫的睡眠没有受到打搅。

马歇尔不久就赢得了国务院几乎所有重要官员的爱戴。他使人感到他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他的人格感染了全体外交人员。在他的领导下，正如几年后在赫脱领导下那样，国务院的工作效率很高，这是我在外交界几乎四十年里所看到的。确实，马歇尔手下有几个很优秀的助理国务卿——先

有迪安·艾奇逊，后有罗伯特·A·洛维特。同样确实的是，因为贝尔纳斯不注意调动国务院的积极性，马歇尔接任以后需要采取富有同情心的行动。在马歇尔领导下，所有高级官员都被征询意见，所以当决定外交政策时，大家不会茫无所知。在此以前或在此以后，我没有见过国务院的工作是这样条理分明的。

在我们就苏联问题谈过话几天之后，马歇尔便要求我留下来给他当特别助理。我很快地发现这位新国务卿比贝尔纳斯想要得到更多的情报和建议。我们商量过很多问题，到了初夏，我们的关系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他请求杜鲁门任命我为顾问，而这个职位是要经过国会批准的。这项任命并未使260 我的任务有很大改变；在对苏联政策方面我仍然是马歇尔的主要参谋，我陪同他出国并在他同俄国人作私人谈话时给他当翻译。

我的工作之一是处理新闻界的许多质询。我坚决认为应当把真实情况告诉新闻记者，但我也同样认为，把各种会谈和我国政府的立场过早地和部分地透露出去是有害的。这样的透露会使报纸上出现醒目的大标题，但它们对读者和国家都不会有什么好处。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限制新闻界，只准他们去找少数预先选定的人员，以防止泄漏，那将引起不满，并且也是行不通的；如果缩小秘密文件的传阅范围，则又将妨碍国务院的工作。我建议规定出国务院所有官员都应遵守的六条“守则”，以防止透露消息而使美国政府处于尴尬境地。它们是：

1．不要谈论美国政府正在同另一国政府实际进行的任

何谈判或讨论的性质或现状。应该坦率地告诉记者，不能谈论正在谈判中的任何问题，而不是企图给以闪烁其辞的回答或避不答复问题。

2. 不要谈论国务院或外国政府的人物或个人。新闻界总是渴望获得一些可以用来撰写报道的人名。如果告诉新闻记者，说国务院的“某某”官员或者外国某一官员或外交官说过“这样那样的话”，那么这位新闻记者就已经找到基本材料，可以用来写出一篇引起麻烦的报道。

3. 不要把全文尚未公布的电报或官方文件的本文出示新闻记者。

4. 不要在任何情况下企图预测美国政府对于某一局势尤其是对于有可能发生的假设的局势将采取什么行动。

5. 不要仅仅因为某一记者装出已经掌握某种机密消息的样子，就上当受骗，贸然去证实或谈论这个消息。

6. 不要谈论国务院内部或国务院与美国政府其他机构之间的意见分歧。

这样的守则仍然容许保有向新闻记者介绍当前动态的大量余地，虽然我相信，除非把一切事情统统透露出去，记者是不会满意的。

马歇尔将军接任国务卿，正是在“冷战”开始的时候，或者说得更精确些，正是在“冷战”这一名称为新闻界所接受的时 261 候。过不了几个星期，英国即向美国递交一份照会，说英王陛下政府已经得出结论，它不再能承担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义务，此后只有美国才能胜任。助理国务卿艾奇逊主持的一个高级委员会（我断断续续地参加过）一致赞成提出建议，由美

国承担英国的传统任务。

这时希腊正在进行着激烈的内战。共产党统治下的一些国家正在积极地供应并且可能还在指挥着希腊北部的共产党叛乱分子。斯大林的态度有点犹豫不定，这或许是因为他同丘吉尔作了划分势力范围的安排，但更加可能的是因为他感到，如果不发动一场较大的战争，成功的希望是渺茫的。但是，委员会却认为希腊可能会共产主义化，从而在根本上打乱该地区的力量对比，最后造成一种危害美国安全的局势。这种推断是有道理的。在 1947 年，全世界的每一个共产党不仅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组成的，而且是莫斯科政策的驯顺工具。因此，如果在雅典建立了共产党政权，那就意味着苏联的控制将延伸到地中海东部。与此相关，苏联人还正在对土耳其施加强大压力，要求在土耳其海峡取得一处基地。

杜鲁门总统在他的顾问们的充分支持下作出决定，美国应当帮助希腊和土耳其以维护它们的独立。问题在于从哪里入手。马歇尔将军同我离开了美国前往莫斯科去参加一次外长会议，这时杜鲁门给国会的咨文尚未写成。当我们抵达巴黎时，我们才收到了总统给国会的咨文全稿，其中提出了杜鲁门主义。咨文里并未点出苏联的名字，但毫无问题，这个主义的基本目的是想制止苏联利用颠覆手段去暗中破坏自由国家。在马歇尔将军和我看来，这篇讲稿所写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浮华辞句似乎太多了一些。

马歇尔和我都感到杜鲁门写进了过多的好听的废话。马歇尔把我们的看法用电报发回华盛顿。他得到了复电，内容说根据行政部门考虑的意见，包括杜鲁门的意见在内，如果不

着重叙述共产主义的危险，参议院就不会批准这个主义。

在莫斯科，我们住进斯巴索大厦，在美国驻苏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中将那里作客。史密斯情绪不大好。在 262 我们抵达后不久，他找了一位俄国理发师给他理发。史密斯以为理发师问他是否要用一些生发香水，他作了肯定的回答。那个俄国人实际是问史密斯是否要用一些染发药水，并给他用上了红褐色的染料。史密斯一照镜子，便高声咒骂起来，声音之响，我们在斯巴索大厦的所有的人都能听到。尽管冲洗了几个钟头，史密斯的头发在我们逗留莫斯科的期间还带着明显的粉红色。

我们在莫斯科住了六个星期，同各国外长讨论德国问题，但是会谈屡遭挫折，并无结果。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叙述西方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苏联的阻挠战术。

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宴会上，莫洛托夫说他要为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健康干杯，因为他们给会议做了很多工作。他明显地撇开了法国外长乔治·皮杜尔。在莫洛托夫第二次祝酒时，他说不应当忘记任何一位，所以他想向法国外长祝酒。这无疑地是对法国和皮杜尔的故意的侮辱。皮杜尔涨红了脸，十分愤怒。虽然他易于感情冲动并且好讲面子，但当他想到法国政府里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人时，他就很有理智地克制了自己，没有同莫洛托夫公开争吵。我相信这次故意的怠慢在以后几年里一直影响皮杜尔对苏联的态度。

莫洛托夫对皮杜尔的侮辱，是按典型的粗野的苏联方式作出的，苏联人用这种侮辱来表达他们对法国在这次会议上

所持立场的不满。在讨论对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和约时，法国的态度一般说来是有些迁就苏联的，这就使苏联人相信，在对德国的问题上法国将赞成对苏联让步，看来苏联人并没有意识到，德国在法国的对外政策上一向占有特殊地位，虽然共产党在政府中拥有较强的势力，法国在如何对待德国的问题上还是会保持它自己的看法的。

4 月 18 日，马歇尔将军在我陪同下，对斯大林大元帅作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从 1945 年 12 月以来，我一直没有看见过斯大林，这次相见使我惊讶的是他已显得苍老不少，灰白的头发比前增多，看来他由于操心过度，精神疲乏。对于这次会见，事先没有作具体准备，因为我们意识到苏联人在德国问题上是不愿改变立场的，而马歇尔要告诉斯大林的唯一论点是：让德国处于动乱和分裂的状态是多么危险。

我们的拜访历时约一个半钟头，在这段时间内，斯大林对263 于会议未能取得任何成果采取了宽心的态度。他一面用红铅笔乱涂着每次必然要画的狼头，一面问我们：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下次可能达成协议，下次不成，可以等再下一次。”对他来说，没有必要急于解决德国问题。我们应当持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甚至减少对这个问题的操心。这就是他的主要论调，他对于马歇尔提出的各项问题几乎都给以同样的答复。当我们回到大使馆时，我把谈话的内容口授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后来这份报告送交了杜鲁门总统。

对于当时德国发生的情况，斯大林看来是漠不关心的，这一点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得出结论，即斯大林在审察欧洲的局势以后，认为增进苏联利益的最好方法是听任

事态自行发展。经济状况是不妙的。欧洲正在从战争的创伤中慢慢恢复过来。还没有怎么修复那些被破坏的公路、铁路和运河。被多年的战争所切断的商业联系仍然是支离破碎的。失业状况极为普遍。千百万人靠少量的口粮配给过活。有发生瘟疫的危险。这是共产主义赖以蔓延开来的那种危机。在我们返回华盛顿的途中，马歇尔一直谈论着主动地设法防止西欧彻底崩溃的重要性。

在我们回国以后，马歇尔立即指示当时在乔治·凯南的主持下已经成立的政策计划委员会，把详细研究欧洲复兴问题以及美国在此过程中所能起的作用作为第一项任务。几个星期以后，马歇尔把政策计划委员会的第一篇初步报告、负责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尔·克莱顿的一份报告以及其他一些文件交给我看。政策计划委员会的这份报告与其说是报告，还不如说是一份大纲，它强调美国有必要对西欧采取一些积极措施，并指明西欧各国必须尽力实行自救自助。

马歇尔把这些文件送给我时，叫我代他起草一篇讲稿，因为他已经同意于6月6日在哈佛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时发表一次讲话。既然我手边有了政策计划委员会的报告和克莱顿的报告，同时又大致理解马歇尔的想法，我便花了大约两天时间写成这篇讲话的初稿。初稿全文是我自己动手写的。经过若干次会议最后商妥的定稿基本上按照我初稿的结构，并且采用了我的不少词句。两份草稿都谈到了生命的损失，城市、工厂、矿山和铁路的破坏，更重要的是那些看不见的破坏，即欧洲"整个经济组织"的脱节——这里引用了克莱顿在其报告中的原话。我的初稿和定稿以同样的语调结束。我写道："我相 264

信，只要有适当的深谋远见，并决心担当历史所赋予美国的责任和义务，这个问题是能够并且一定会得到解决的。”马歇尔改写了一下，用这样的语句结束这篇讲话：“只要我国人民具有深谋远见，并决心担当历史所清楚地赋予我国的巨大责任，我在这里所列举的各种困难是能够并且一定会被克服的。”

有人说，马歇尔没有想到他所建议的计划规模多么庞大。其所以有这种错误的看法，是由于马歇尔在他的讲话中没有举出数字——他只说欧洲“必须获得大量的额外援助”，并说这是“理所当然的，美国应当竭尽它的一切力量”。他告诉我们国务院里的一些人，他担心他的讲话可能被认为是圣诞老人给欧洲的礼物，从而引起中西部孤立主义者的抗议浪潮。所以他严格指示我们对于这篇讲话不可事先宣布，也不得作背景解说。结果，华盛顿的新闻界大都不理解这篇讲话的重要意义。虽然它被刊登在报纸的第一版上，却很少有解释性的评论，我所认识的主要专栏作家都不曾给以应得的注意。

但是，在欧洲所引起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法新社看出了这篇讲话的重要意义。此外，迪安·艾奇逊主动地同英国一些新闻界人士谈起这个问题，强调指出欧洲十分有必要作出积极的反应。在伦敦，贝文立即领会这一暗示。他与皮杜尔联系，约定同他在巴黎会晤。

在发表这篇讲话一天以后的国务院例行工作人员会议上，马歇尔问凯南和我，如果邀请苏联参加这个计划，它是否会接受邀请。他说，在当天上午稍晚一点的时候即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肯定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他也知道他只能作肯定的回答，因为美国提出的任何计划如果看来要把苏联

排除在外，都不大有可能被世界各国所接受。他也知道，如果苏联接受邀请，这个计划就很容易在国会遭到否决。凯南和我的答复差不多是相同的。我们认为苏联不会同意让美国去检查美援货物和资金的用途。而且我们认为，如果东欧各国能够参加这一合作事业，苏联也就不能够再保持它对那些国 [265] 家的控制。

事实证明我们的想法是对的。7月间莫洛托夫带了八十名外交随员来巴黎同英国和法国一起开探究性会议。代表团的规模和莫洛托夫的积极评价使人认为莫斯科打算参加。但当他提出的建议被否定以后，那些俄国人便回国去了。他们一定是奉斯大林的命令这样办的。

莫洛托夫的建议清楚地说明了苏联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原因。他建议每一参加国可按其需要提出购货单，由美国接受下来，照单送货并支付款项。这样就势必不会有对于货物用途的现场检查。按照莫洛托夫的计划，那就是把美国物资慷慨送礼，对于它是否按预定目的使用，美国无权检查。苏联领导人也认识到，马歇尔计划将危及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捷克人表示想参加这个计划，愿意接受邀请出席第二次会议。据后来逃出捷克的一名政府官员说，斯大林把捷克人召到莫斯科，扬言苏联感到愤怒，禁止他们接受马歇尔计划。布拉格政府没有其他办法，只好作罢。

马歇尔计划的一个特点在于它是以自助为基础的，其目的是要使欧洲各国联合起来，与美国共同设计出一套符合它们的需要的解决办法。这个计划在政治方面也有很大影响。我在初稿里曾经写道，我们政策不是去反对任何国家、任何意

识形态或任何政党，特别不是去反对共产主义。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战胜饥饿、贫困和混乱。马歇尔删掉关于共产主义的明确提法，在目标中加上“自暴自弃”的字样。这一段意味着，各国的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计划，就无异是站到赞同饥饿、贫困、自暴自弃和混乱的地位上去了。从宣传的观点看来，这些话对于那些內部有强大共产党的国家来说是很有分量的。尽管如此，在法国还是发生了几起反对马歇尔计划的严重的政治性罢工事件。共产党人们认识到，如果马歇尔计划给欧洲带来繁荣，他们接管政权的机会即使不是完全消失，至少也要减少。

到了 11 月，行政部门已经起草了一项体现着这个计划的详细的法案，但国会尽管热情支持，还不准备采取行动。参众两院都必须开好几次的意见听取会，要耗时数月才能通过这个法案。结果，行政当局不得不制订一项对欧洲提供短期援助的计划，而如果早日实行马歇尔的全盘计划，美国纳税人本来是可以少花几亿美元的。即使如此，马歇尔计划四年的费用比原来估计的一百七十亿美元少花了约四十亿美元。

266

有一段时间，马歇尔计划法案在国会被搁置起来。两个因素有助于法案的通过。一个是参议员范登堡的不倦的努力，因为他了解国会中的所有技术问题。另一个因素是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了政变。捷克政变发生在马歇尔讲话之后，它引起的震惊有助于使美国舆论趋于一致。

马歇尔计划之所以如此有效，其原因之一在于参加计划的十六个欧洲国家都有必要的熟练人员、技术干部和机构。美国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在已经停止起作用的机体內输进一

点经济血液罢了。后来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计划就遇到许多困难,因为那里还没有培养出所需要的技术干部。

可以说,关于欧洲的需要而言,马歇尔计划晚了两年。在联合国救济计划的安排下，美国花费了大量款项以解决战争破坏所造成的迫切需要以及为占领德国和日本担负费用。在尚未看清欧洲局面有必要实行一项复兴计划以前，国会不准备同意为它额外再支付几十亿美元。此外，美国缺少马歇尔计划中所应包括的许多货物项目。当时亟需农业机械和某几种工业机械，甚至在 1947 年，美国也很难把满足本国的需要放在第二位而去援助欧洲各国。虽然马歇尔计划给欧洲展示了经济复兴的希望，西方阵营中每一个人、尤其是欧洲人在 1948 年却是心情很坏的。马歇尔告诉我，贝文在一次餐会上对他说,由于苏联在东德保持了过多的军队,莫洛托夫在对德问题上又毫不妥协，欧洲大陆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对前途丧失了信心。贝文问道,面对着苏联武装力量的威胁,美国究竟能够做些什么。马歇尔回答说，他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将同经济领域中应用的办法一样——那就是,欧洲人应该汇集起来，267 研究一下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证国防的需要方面他们能够做些什么，然后要求美国去弥补实际局势所需要的力量与他们自身力量之间的差额。

不论欧洲人对苏联武装进攻的担忧是否有所夸大，这种忧虑确实是存在的。人们倒不是担心苏联要发动全面的军事进攻，而是担心苏联会在西欧各国共产党企图夺取政权时动用武装力量加以鼓励并直接予以支持。在战后的最初时期，大陆各国的共产党，除了西德的以外，都很强大，它们肯定是

不可轻视的力量。

到了春天，西欧各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以建立没有美国参加的西欧军事联盟，这时欧洲人讨论了他们的军事需要。马歇尔派遣业已升任助理国务卿的罗伯特·洛维特负责同国会商谈这个问题。原来的打算是想要求国会批准通过租借法案或赠送方式向欧洲提供军用物资。但在此后几次与参议员范登堡（他不仅是洛维特的密友，而且也同马歇尔相知）商谈时，谈出了一个广泛得多的设想。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国会不但批准了给予西欧各国以军事援助，而且还允许美国可以参加某种形式的区域性集体安全组织。这个法案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的终结，因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华盛顿产生了这种想法，并且肯定也是国会第一次批准任何这类的行动。这个法案是商谈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基础。

我没有直接参加签订北大西洋公约的谈判，但我在华盛顿时也断断续续参加过这些会议。我曾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的外长阐述我们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基本观点。后来有人告诉我，我帮助说服了挪威政府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完全必要的。对苏关系的局势发展使美国有必要参加西欧的防务。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都会使西欧这整个地区听凭苏联支配，这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是违反任何正当的世界秩序的。当 1949 年 4 月 4 日签订北大西洋公约时，我不相信任何人能预见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发展成为这样的军事机构，或预见到戴高乐会在 1966 年从这机构里撤出法国武装部队。当时它倒是被看作一个具有同样

观点的各国之间的传统军事联盟。它并不被认为是能解决欧洲所感到苦恼的各种问题的一剂万灵良药，而只是被看作一种预防共产主义侵略的初步手段而已。

现在很难回想起四十年代后期的一般情绪。那时苏联在前进，它不仅想实现俄国对外政策的传统目标，而且还充分利用世界各国存在着唯苏联之命是从的共产党这一事实。如果美国不开始实行马歇尔计划或某种类似的计划，如果美国不抛弃它的历史传统并不同意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共产党人就可能很容易地在大多数的西欧国家夺得政权。这些措施的最初创始人中肯定没有一个人打算用军事力量或其他手段把苏联的势力从东欧推回去。“推回去”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为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参加总统竞选时提出的一个外交目标。 268

1949年初，马歇尔退休，艾奇逊被提名接替他的国务卿职务。我从来不耽迷于英雄崇拜，但是在所有与我共过事的人中，包括一些总统在内，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应占我所敬仰的那些人的名单的首位。他善于激发那些有幸与其共事的人们的忠诚、尊敬和爱戴。他是一个绝对正直廉洁的人。你处处感到他的坚定性，仿佛他全身都用大字把它标出来似的。他告诉我，他的最困难的工作之一是他不能任命他的一些老战友去担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指挥职务，因为他们不能胜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所有高级指挥官几乎都是由他亲自挑选的，艾森豪威尔、布雷德利、佩顿、柯林斯、李奇微等人都是靠他的力量而被选任重要职务的。

马歇尔具有一种我认为无人能及的指挥能力。他对一个

问题常常仔细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定下决心。一旦作出决定，他就决不回头，这个特点显然是他在军队生活的锻炼中养成的。他的品格感染了整个国务院。它使人明确了方向和目的。他并不是一个爱好交际的人——他在国务院里认识的人不是很多——但在他担任国务卿以后，没有多久他的品格就渗透到国务院的各个角落。我们理解到我们是在为一位伟大的人物而工作。

他天性恬静，很少有放浪于形骸之外的事。他宁可多听取旁人的意见，自己不愿发言。偶尔，在餐桌上只有男客在座的时候，他会沉浸于回忆之中，一口气讲上个把钟头。在莫斯科，有一个晚上比德尔·史密斯和我就听他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他的记忆力特别强。他甚至还能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法国用过的一些电话号码。

269 在很少有的情况下，他表现出辛辣而尖刻的机智，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使得他的话产生加倍的效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理查德·K·萨瑟兰将军任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参谋长，他从前方飞回华盛顿，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请求收回有关战略的一项决定。萨瑟兰在申述理由时两次说，"我敢以我的军誉来担保我现在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在萨瑟兰第二次这样说时，马歇尔将军把头仰靠在坐椅上，平静地问道，"可否请萨瑟兰将军向在座的参谋长们说明一下，这个军誉到底是什么？"

同这样一个人一起工作，任何下属都不敢稍萌傲慢无礼的念头，他周围的人几乎都感到，似乎迅雷就要落到胆敢尝试的人的头上。马歇尔知道他自己的地位，一举一动都与他的

地位所带来的尊严相符合。1947 年春，在莫斯科举行各国外长会议时，莫洛托夫前来美国大使馆出席马歇尔主持的宴会。当时苏联的方针是取笑军人来当外交家，于是这位忠实的莫洛托夫便问道：既然美国让将军担任国务卿和大使（比德尔·史密斯那时任驻苏大使），那么，是否有必要迈着鹅步前进呢？在莫洛托夫的这句话被译成英语后，马歇尔侧过头来用他灰色的眼睛冷冰冰地看着我，镇静地说，“请告诉莫洛托夫先生，我不太清楚我是否理解他这句话的含义，但如果它确实象我所认为的那样，那就请告诉他，我不乐意听。”我很愉快地把这句话译成俄语，莫洛托夫便立即停止了嘲弄。

另一方面，与贝尔纳斯相反，马歇尔从来没有忘记身为总统的杜鲁门。1948 年秋，当我们在巴黎出席一次联合国大会时，马歇尔收到华盛顿发来的一封电报，说杜鲁门在打算派最高法院院长文森前往莫斯科，试图同苏联人商谈出一个解决若干问题的办法。马歇尔立即起草一封给杜鲁门的复电，开头的话大概是这样说的：“历来笨拙的外交行动中从未有过……”当我把他的原稿念给他听时，他说，“我不能发这样的电报。我是在同我的总统说话。”接着他就另外口授了一份发给杜鲁门的电报，说他还没有使总统完全了解当前的局势，准备回到华盛顿以后进行磋商。他请求约定时间。在华盛顿，他放出风声说，如果杜鲁门执意要派文森出国，他就辞职。总统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他不过是想让斯大林听听意见。但他终于同意放弃这个主张。

马歇尔对杜鲁门总是很尊敬的，他从来不和他的任何同事议论总统的长短。虽然他给予总统的职位以一切应有的尊 270

敬，但当他认为杜鲁门犯了错误时，他也毫不迟疑地当面指出。1948年春，杜鲁门召集了他的一些内政顾问，同时找了马歇尔和国务院的其他负责官员参加，其中也包括了我。当时所讨论的问题是，为了争取美籍犹太人的选票，是否应当取消向巴勒斯坦运送军火的禁令，以便帮助那些对英国人进行斗争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内政顾问劝他取消禁令（杜鲁门重新当选总统的希望很暗淡，他需要美籍犹太人的选票和经济上的支持）。总统侧过身来询问马歇尔的意见。马歇尔说，他认为总统是要听取他的"戆直"的意见的。我记得，按照军队的传统不行使选举权的马歇尔当时继续说，"我无论如何是不会去投票的，但如果我去投票的话，见到你这样降低美国总统的身份，我将投票反对你。"杜鲁门赶快对将军说，"这正是我希望从你那里听到的话"，于是决定不取消禁运。

马歇尔是富有人情味的。当他在华盛顿劝说杜鲁门不要派文森去莫斯科的时候，他听到有一个保姆带了我两岁的儿子查尔斯到国务院去把一些邮件寄给在巴黎的我和我的妻子。马歇尔知道我们已有几个星期没有见到这个孩子，便召来了国务院的摄影人员。他把查尔斯抱坐在膝上，连同比德尔·史密斯一起照了一张相。然后他把这张相片带回到巴黎，送给我们。他说，"这是查利昨天的样子。"

马歇尔对于他手下那些没有能力或者不愿尽力工作的人常常很客气，但又很疏远。对于他所不予重视的人们，他的态度是完全明确的。我幸而可以说，在我给他当特别助理和顾问的两年中，我从来没有掉进这一类人中去。

马歇尔也同政治家商量问题，但并不十分理解他们。对

于他们的动机，马歇尔常常捉摸不透。例如，当洛维特和其他一些人劝他去同范登堡多联系以便培养感情时，他回答说，这位参议员是根据国家利益积极行动的，所以不需要任何人去培养感情。他认为，这种存心拉关系的做法将是对范登堡的失礼行为。后来，由于自然的交往，这两个人成了亲密的朋友，从而给我们的对外政策带来很大的好处。

马歇尔同国会打交道的工作方式是很单纯的。他从来不 271 欺骗任何一个参议员或众议员，也不对他们说谎。在两院的听取意见会上，他从来也不说提问的议员无权知道消息，或者说事情太微妙。他不是拒绝回答，而是建议把意见听取会变成秘密会议，那时他将把情况坦率地告诉他们。他的第三种方式是仔细研究参议员和众议员的背景，这样他就不但理解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而且也可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问那些问题。几年以后，当我在国会中遭到严厉盘问时，我发现马歇尔的处理方式是极有价值的。

马歇尔有很高荣誉感。比如，一家杂志社愿意付一百万美元请他写三篇文章，他拒绝了。事后他告诉我，如果他答应下来，他势必要中伤那些与他无怨无仇的人。

在马歇尔手下工作，可以得到获益非浅的经验。每当我想起他时，我总是怀着莫大的敬意。

寻找一桩事件来标明一个时代的开始，这是很自然的。就冷战而论，则并没有精确的时间。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市发表的有关“铁幕”的演说，在有些人看来可以算是冷战时代的开端，但这种看法无论在美国或英国都没有得到广泛

的承认。1947年签订和约，从而西方世界承认东欧各国的卫星国地位，这也可能是另一个里程碑，另一个判断标准是苏联企图超过当年老沙皇的目标，把势力伸向地中海和中东。无论苏联方面用什么事件作标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到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时代，我们同苏联的争论无疑地已经变为冷战了。

引起冷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的看法非常简单。冷战可以追溯到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布尔什维克一派夺取政权的时候。每一个学过历史的高中学生都知道，布尔什维克党人深信资本主义制度天生就带着罪恶，他们把这种制度不过看作是剥削工人的工具，并且他们还相信共产主义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这样，他们就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只是一个敌人，而且是一个在历史舞台上停留得太久的敌人。不管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不同的设施，其间毫无区别；在苏联统治者看来，只要它们是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就始终是应当加以敌视的对象。他们只要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只能这样办。

从1917年到1933年，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是冷战的第一号靶子。苏联那时的报刊杂志充满了粗野的漫画，把一般资本家、尤其是大英帝国描绘成对人民的大剥削者。1920年，在巴库举行的东方劳动者第一次会议上，当时任政治局正式委员的季诺维也夫（后来被清洗和处决了）发表了一篇热烈的演说，号召到会的所有穆斯林都参加反对大英帝国的神圣十字军。那些部落成员高兴得跳了起来，歇斯底里地对季诺维也夫高声欢呼。

从1933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关于受资本主义

敌人包围的幻想成了现实。东有日本，西有纳粹德国。在大 272
战期间，由于现实的冷酷必要性，斯大林压低了苏联对外政策中共产主义方面的调子。苏联采用了传统的题目——保卫家园和俄罗斯母亲。只是当胜利已清晰在望的时候，共产党才作为推动力而重新出面，这个战争也就转变为争取实现共产主义原则的战争。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雅克·杜克洛在1945年攻击了美国共产党领袖厄尔·白劳德，因为后者主张：共产主义运动应该倾向社会进化，而不是倾向布尔什维克式的社会革命。这样做可能比较正确，当然也比较聪明。但对正统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罪大恶极的异端邪说。毫无疑问，杜克洛是受克里姆林宫的指使去痛斥白劳德的。结果，白劳德立即被撤销领导职务并开除出美国共产党。这是恢复原先布尔什维克关于革命的思想的第一件事例。杜克洛的攻击重申了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意识形态中的一切标准成分。第二年，斯大林发表了他的著名的选举演说，再次申述了布尔什维克哲学中一切严厉的和怀有敌意的成分。“布尔什维主义”一词在有些历史学家看来可能是过时了，但事实上这个词仍然是一个精确的名词，可以用来说明直到今天为止一向指导着苏联领导人的那种政治哲学。

冷战作为布尔什维克党人对资本主义国家经常表现出来的不可动摇的基本敌对态度的一部分，后来转而指向了美国。美国之所以被选定为第一号靶子，只是因为它在战后的非共产主义世界中是主要的力量来源。

我阅读苏联报刊达四十年之久，我从未见过这些报刊提到美国政府有任何值得称道的或中肯的意见。我们所采取的

行动，不管是多么文明或带有进步意义，都被根据这样的基本前提一概抹煞：即所有资本主义都是坏的，而从资本主义产生的任何好东西不过表面看来象是好的罢了。这是进行冷战的基础。

273

如今作出冷战已经结束的结论，看来是很时髦的。但如果有谁肯花一点时间读一下苏联的报刊或者苏联领导人的言论，查阅一下苏联宣传机构每天针对美国轰发的猛烈炮火，我看他就不会得出这种结论。如果美国的行动恰好与苏联的观点相符合，那就是我们在"进步"分子的强迫下干的。如果我们卷进某桩易受批评的事件，例如越南战争，苏联人就会充分利用它来进行抨击。自然，冷战已经经历了程度各有不同的激烈阶段。在我们帮助南朝鲜以抵御北朝鲜的侵略时，冷战就表现得最为激烈。然而，很少有人能够老实地证明是南朝鲜或美国发动战争的。当时共产党人经过周密部署，众口一辞地证明美国空军使用细菌战，这是他们所作努力的一部分。斯大林一死，关于细菌战的一切指控就立即不再提起，在苏联的宣传中不再出现，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同时也足以说明这些指控完全是虚构的。

我感到惊奇并有点不安的是，某些历史学家居然轻率地接受所谓冷战是由美国发动的这一论点。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历史的谎言比这更能导致有害的后果的了。

虽然美国和苏联的冷战从来没有变成热战，但也有过几次危险关头。头一次发生在西方正在开始重建欧洲并组织军事同盟之际。苏联人对柏林实行了封锁。由于我在国务院所处的地位，我得以有机会对解决这次危机作出贡献。

第十六章　坚持留在柏林

274

苏联对德政策的发展过程现在依旧是个谜。虽然战后我参加过大多数外长会议，我却弄不清苏联的眞正目的何在。苏联人对于德国是心情矛盾的。一方面，它确实想惩罚德国，使德国赔偿苏联所遭受的无法计算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同时也抱有一种与前者矛盾的想法，认为德国是欧洲的关键地区，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应当象列宁所梦寐以求的那样，把它爭取到苏联这方面来。这一矛盾的心理导致苏联在行动上举棋不定，下不了决断。按照惩办政策，他们掠夺了东德苏军占领区，把各种设备和整个工厂都用平板货车运回苏联，运回以后，有时好几个月扔在雪地里任其锈烂，最后不得不报废。同时，苏联人容许很多过去的纳粹分子在苏占区盘踞要津，当他们斥责西方留用过去的纳粹分子时，他们忽视了他们自己的这一事实。

在西方盟国方面，起初也同苏联一样，担心德国军国主义复活。所以罗斯福有时想要肢解德国，按照摩根索计划的方针把它重新变成一个畜牧国家。等到罗斯福逝世，盟国的政策就清楚了。西方盟国的意图是统一德国，对它施加必要的限制，以确保和平并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然后签订和约以结束军事占领。在这方面为了求得苏联合作，曾不断地作出努力。

人们往往忘记，当盟国1946年仍然十分担心会有一个新的德国崛起的时候，杜鲁门曾向苏联、法国和英国建议，缔结一个为期二十五年的公约，以保证德国的非军事化，并防止德国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任何倾向。这一行动由于通过了范登堡和康纳利决议案而得到参议院的支持。如果苏联人接受了这个建议，所缔结的公约就可从根本上改变全欧洲的面貌。我至今还不理解为什么克里姆林宫不接受杜鲁门的建议。英国和法国立即接受了，但克里姆林宫没有肯定下来。首先他们说定期太短，但当我们提出把期限延长到四十年以上时，他们又提出了显然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其他理由。大概那时候苏联人认为整个德国分明有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可能。

在多次场合，国务卿贝尔纳斯曾提出过，在起草对意大利和东欧各国的和约的同时，还可以建立一个委员会来探讨德国问题。但苏联却坚持须按照字面来解释波茨坦协定，即对德国的和约应在最后考虑。结果就没有讨论对德和约的问题。这样几乎白白浪费了两年时间。

到了1947年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外长会议才对德国问题加以认真的考虑。这一时期的外交工作，主要是就苏联的指控——例如说什么西方盟国正在力图建立一个军事化的西德——不断地进行争论。如果要详细叙述这些交涉，可以写几本书。最初，有某种理由可以相信苏联人想使整个德国共产主义化。后来他们转而采取使德国处于分裂状态的政策。苏联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准备容许东德成为统一而独立的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苏联不能控制全部德国，它

也将保持它既得的部分。

到了1947下半年，双方的态度都已变得僵硬。看来没有妥协的基础，也没有共同的立场，每一方面都着手使它自己所控制的半个德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在1948年2月开始的伦敦会议上，西方盟国的外长们决定把英美法三个占领区合并成为一个，这就向组成西德政府迈出了一步。外长们还决定复兴德国经济，重新规定马克的价值。苏联人担心币制改革将使没有价值的旧马克大量流入苏占区，并且看到在成 276 立西德政府之后势必要编组新的德国军队，于是在4月1日作出反应，对西方盟国占领区与柏林之间的军事运输实施一些临时性的限制。

早在1月份，预先就看到一些迹象，表明苏联可能要用封锁柏林的办法来回答西方盟国的举动。火车和大卡车的运输队常常被迫停下来，理由是所带的文件没有填写应当包括的项目。借口各条运河正在开始疏浚，使满载着运往柏林的各种急需物资的长长船队迟迟不能通过。然而，4月间对柏林的局部封锁使美国政府多少有点觉得突如其来，缺乏应变的计划。这种不足之处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现今回想起来却是难以想象的了。德国问题仍然摆在外长会议的面前，从1945年开始占领以来，在柏林的各种安排一直没有受到阻碍。临时性的限制想必只是局部的干扰。就我记忆所及，国务院里没有人想到苏联会全面封锁柏林。五角大楼倒或许因为苏联举行军事演习，对于共产党人可能采取大规模行动这一点比较敏感一些。既然情况开始恶化，也就考虑起许多计划来了。

驻德美军司令克莱将军和他的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提出了许多建议（第一次是在4月份），主张用武装护送队突破封锁。对于这些建议，报刊上已有许多文章加以论述。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这项建议，因为苏联人可设置坦克壁垒或拆毁桥梁，幷迫使美国首先采取敌对行动。在那年暮春时候，克莱将军又提出了这个主张。我作为国务院和国会之间的联络员，在洛维特的办公室里参加了一次会议，会上参议员范登堡在参议员康纳利的支持下坚决拒绝上述主张，因为如果这样做，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将被看作是战争煽动者。我和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强行冲破封锁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因为那是一项清楚、坚定而勇敢的决策。但它带有使美国承担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罪责的风险。

在5月份，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乔治·凯南担心苏联可能不理解美国的决心和目的，要求驻莫斯科的比德尔·史密斯大使设法同莫洛托夫认真讨论一下美苏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我们老实告诉莫洛托夫，尽管美国举行总统选举，277 亨利·华莱士代表亲苏的第三党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大多数的美国人却是相信那种既反对极权主义政权的扩张行动而本身又幷不带有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的。虽然我们要求莫洛托夫对这次会谈保守秘密，但他仍然发表了声明，其目的显然是想帮助华莱士幷在美国人和法国人中间散布猜疑的种子，使他们怀疑美国在背后做交易。华莱士没有从克里姆林宫得到什么帮助，但我们的盟国则怀疑我们的意图。这一想法便从此打消了。

随着时间一星期一星期地消逝以及共产党人在柏林周围

勒紧绞索，美国必须作出决定：究竟是在柏林呆下去，还是退出柏林；究竟是继续进行组织西德政府和改革币制，还是推迟做这些工作。在被包围的柏林，物资供应越来越少了。6月4日，西方盟国决定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并进。关于是否邀请苏联参加币制改革的问题，发生过热烈的争论。克莱将军反对这项邀请，其所持的理由是苏联可能会利用拖延手段，使恢复德国经济所必需的币制改革不能迅速实现。我主张发出邀请，因为我觉得西方应当让历史纪录表明，我们是赞成同苏联合作的。如果他们企图用拖延手段阻挠币制改革，我们总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动手去搞。

邀请是发出去了，但克里姆林宫置之不复。6月中旬，盟国在其三个占领区内对西德马克重新定值，并在6月23日将此项重新定值的措施推广到柏林的西方盟国占领区。6月24日苏联人对柏林实行全面封锁。最初西方盟国利用它们在欧洲可以调拨的运输机来应付封锁，但很快就发现非加派飞机不可。

7月20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出席会议的有马歇尔、洛维特、克莱、墨菲和我，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和国防部的官员。由于使用武装护送队的建议已被否决，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应否增加空运以打破封锁。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对此有些怀疑。他们指出军用运输机并非太多，如果把几乎全部的运输机都投入空运，那就沒有几架可以留作通常的军用，而一旦发生战争，实际上就沒有飞机可以调用了。经过一番讨论，总统便决定继续进行空运，并责成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必要数量的飞机使空运行动得以成功。

他断然表示要留在柏林，决不在任何形式的压力下撤出。我
278 沒有积极参加这次讨论，因为我对军事情况不够熟悉，但我完全赞同杜鲁门总统的决心。

苏联在通知对柏林实行封锁的照会中指出，西方盟国的币制改革已经“破坏了”进入柏林的权利。这个措辞是重要的，因为它同广泛的看法、尤其是这次事件以来的这种看法相抵触：如果当初就那些权利签订比较详细的协议，苏联人就不敢贸然加以破坏。实际上苏联已经默认要保证西方自由进入柏林，而克里姆林宫的一些照会也特别指出这些协议正在遭到破坏。所以，是否有更多的协议，其间并沒有什么不同，苏联人还是会那样办的。他们所以沒有阻止空运，不是因为存在着书面上的保证，而只是因为他们正确地估计到，如果实行这样的步骤，那就可能会引起对美国和西方各国的战爭。我们的计划是与英法两国配合的，英国派出了大量飞机参加空运。

在国务院进行讨论时，我发表过意见说，克里姆林宫在开始封锁柏林的时候沒有打算搞得这样彻底。实行封锁的最初动机是与马克的重新估价密切相关的，目的在于防止对苏军东德占领区货币和经济的不利影响。一旦封锁已经实行，同时西方盟国显然不打算用武力来打破封锁，莫斯科由于认为空运不能奏效，就决定想把西方盟国挤出柏林。毫无疑问，苏联的动机之一是企图挫败西方当时正在大力进行的建立西德政府的计划。最后斯大林本人阐明了这个问题。

在此以前，总统以行动向苏联人表示，美国说话是当眞的。7月，美国派了能够携带原子弹的 B-29 型轰炸机六十架

到英国去。那时原子弹是美国独家垄断的。我们不会退却，也不打算先发动战争。但如果我们不得不打仗，我们手头也有最后的武器。

为了迅速结束这种僵局，杜鲁门决定直接向斯大林呼吁。固然我告诉马歇尔，我怀疑斯大林未必会作出反应，但我看不出这样的接触有什么害处。无论如何，因为英法两国对于杜鲁门的有力反应越来越感到不安，对斯大林发出呼吁，将有助于使英法两国放心，知道美国并非一心想打仗。马歇尔派我去欧洲讨论美英法三国如何配合行动的问题。我和克莱乘了 279 他的私人飞机飞往柏林。这位将军患了严重的腰部神经痛，连扭头都困难。当他在柏林的下属看到他从飞机上被人用椅子抬下来时，他感到很窘。他认为在局势紧张的关头，自己作为一个司令员，病得行动不便是很不合适的。

我在柏林呆了两天，稍稍看到了一点刚开始的空运的情况。眼见那些巨型运输机掠过柏林的建筑物，在特姆佩尔霍夫机场降落，然后隔了三、四分钟又凌空起飞，确实令人难以忘怀。在以后的日子里，虽然天气不好，空运仍然继续进行，那种景象更为壮观动人。最初我们这方面有点顾虑，担心苏联人可能会干扰我们的无线电导航系统，使夜间和在恶劣气候条件下的飞航事实上成为不可能。但是很快就看出，苏联人并不打算公开干扰我们从空中进入柏林。如果苏联人妨害任何一架飞机，我相信那一定会很容易引起战争的爆发。那时人们一般认为，并且专家们至今仍然相信，克里姆林宫不想打仗，他们不愿由于某种公开的行动而把他们自己放在挑起战争的地位上。

比德尔·史密斯大使从莫斯科、刘易斯·道格拉斯大使从伦敦飞来柏林。我把我们的战略充分地告诉了他们。接着我们三个人飞往伦敦，同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法国驻英大使勒内·马西利一起会谈。在一次会谈时，贝文对我说，“我知道你们美国人都想进行一次战争，但我是不会让你们打起仗来的。”贝文虽然是半开玩笑地说这些话的，但话音里很有自信。法国大使也担心美国人仓促行动会导致战争。我尽了最大努力去劝他们不要这样看问题，但是否完全成功，却没有把握。

如果说英国和法国对于美国的意图有所怀疑，他们也找不出很多证据来支持他们的想法。贝文的话语在我看来是很荒诞的。它没有事实根据。贝文可能从辗转的传闻中听到了一些美国官员的好战言论。我完全了解当时的局势，除了克莱将军最初曾建议使用武装护送队以回答苏联的威吓以外，并无挑起战争的计划。只有在苏联人坚持要打仗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奋起战斗。但是我们决不会退出柏林。

当朋友们对你的动机提出诘难时，最好的办法是你把这些动机仔细检查一下。在国际政治活动中，这一点是不容易280 做到的。在我看来，贝文的话反映了英国人的莫大忧虑，唯恐他们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另一场战争。英国态度在那时和以后都对苏联可能采取的行动表现出过度的怯弱。根据英国国防的脆弱性看来，它的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有利于莫斯科。英国人没有了解到，在战后的历次危机中，美国事实上从来也没有想到或表示过要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我们所做的一切总是只为了保护分界线这一边的东西。在把计划协调

好以后，我回到华盛顿，马歇尔在那里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处理当时的局势。该专门委员会叫做柏林问题小组，由国务院的几位参与这次危机的人员组成。那时各个工作组和委员会在制度上不象今天这样严密，我们的工作是很不正规的。我作小组的领导，负责指示派驻海外各国的大使和国务院的官员如何执行政策。我向副国务卿洛维特和国务卿马歇尔汇报工作。由于我负责协调工作，我看到了所有从德国拍回的和发往国外的电报。

我也曾同格哈特将军一起工作过，他是五角大楼指派作协调工作的。我常常晚上到五角大楼去用电传打字电报同柏林交换信息。在那些漫长的日日夜夜的工作中，经常要开开玩笑的洛维特总讲些受大家欢迎的笑料以解除紧张情绪。有一天晚上，当出现了柏林阴沟问题的时候，洛维特便笑着打趣说，"我希望克莱将军会认识到我们的政策是阳沟，是要公开挖通的。"

按照我们的计划，美、英、法三个盟国的驻苏大使联名提出要求会见斯大林。苏联人以为会提出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他们通知三国大使说斯大林不在莫斯科。大使们又要求见莫洛托夫，苏联人说他也不在。最后，他们晤见了一位较低级的官员，把西方盟国的观点通知了他，这些观点根本不带最后通牒的性质。好象是因缘的偶然巧合，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又都在莫斯科出现了。三国大使于8月2日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8月23日又会见了一次。斯大林有两回表示他将取消对柏林的封锁，并说，"我们还是同盟国嘛！"8月2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要求西方盟国把建立西德政府的计划推

迟一步。当三国大使对此要求表示不能同意时，斯大林和莫281洛托夫便提出要把他们的这一要求作为苏联政府“坚持的愿望”记录下来。我在阅读比德尔·史密斯大使就这次会晤发回的电报时，看出斯大林实际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放弃成立西德政府的念头，苏联将解除对柏林的封锁。这是我们不愿付出的代价。

由于莫斯科会谈没有什么成果，我便起草一封电报给史密斯大使，建议他们告诉斯大林，如果不能达成协议，西方盟国将认为有必要把柏林问题提交联合国的“有关机构”处理。我们并未明指这个机构是安理会还是联合国大会，因为这里有个区别：在安理会，苏联人可以否决任何行动，而在联合国大会，苏联人不能行使否决权，但大会却没有采取行动的权力。8月23日，三国大使会见斯大林时，把盟国将把问题提交联合国的计划告诉了他。他进一步又就柏林问题提出保证，强调指出柏林的前途取决于关于德国统一问题的四国协议。一星期以后，当占领德国的四国管制委员会于8月30日发出指令时，有了一些希望。该指令把货币问题交由占领军司令官安排解决。象同苏联达成的其他一切模棱两可的协议一样，这个协议不久就被苏联人破坏了。

正是当年秋季联合国大会在巴黎召开会议时，西方盟国才决定把柏林问题提交安理会处理。我认为我们应当迅速行动，因为苏联人可能利用中立国家以及英、法两国对于战争的恐惧心理，在大会上开展争取“和平”的宣传攻势。

菲利普·杰塞普是我们派驻联合国的副代表，奉命承担安理会的工作。为结束柏林封锁而作的努力所以能够成功，

有很多事情要归功于杰塞普。他在司法界有很高的声望，以后充任国际法庭法官。他从来不愿贸然采取任何未经考虑成熟的行动。他也是一位优秀的外交官，不论政府给他什么指示，他总能动脑筋精确地加以执行。

我被委派与杰塞普共同工作。当我们把在安理会上将如何辩论的战略计划定好之后，我们就去见马歇尔。马歇尔告诉杰塞普说，只要他不采取姑息手段，他将支持他所采取的任何行动。

在辩论期间，我担心在德国的某一个性情急躁的美国人会做出冒失事情来。我便打电报给墨菲，提醒他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引起事态恶化的行动，并强调说明，只有在极为严重的紧急关头，才可以不经马歇尔事前批准去做某种不平常的事情。我所以这样谆谆叮嘱，是因为墨菲的强硬观点是众所周知的。

282

当我注意到维辛斯基竭力阻止把柏林争端提到安理会的议事日程上去而毫无效果时，我回想起斯大林是如何驳回莫洛托夫坚持要把否决权用在这种议程问题上的主张的。我猜想维辛斯基也会常常以痛苦和惋惜的心情想到同一件事。

安理会上的辩论没有得出什么结果。人们对西方盟国和苏联两方面的态度不同，使我有些恼火。好象几乎有这样的情况：联合国各会员国都认识到并且承认，苏联对于道义、舆论或者为全世界造福的呼吁是无动于衷的，因此联合国各会员国的注意就集中到可以感动的一方，即西方民主国家。澳大利亚外长赫伯特·伊瓦特（后任总理）抓住了我的膀子，对站在我身旁的杰塞普说，“这样看来你们是想打另一次战争

了，是不是呢？嗯，我们是不会让你们这样干的。”事实上，这是重复了贝文早先说过的话。我并不是说联合国的各会员国对一切问题都抱着偏颇的态度，但对于有引起战争危险的封锁柏林这样的局势，却确实欠公平。如果我们依靠联合国而不依靠西方联盟，恐怕结果就是放弃柏林。

到了10月，有六个中立国家联合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即苏联的封锁和西方盟国的反封锁都撤销，并由占领军司令官会商决定对货币的管制。在向华盛顿电传汇报（电文映在荧光屏上）时，马歇尔同意接受这一解决办法。说来好笑，我告诉华盛顿，在巴黎出名的喧闹场所蒙马特尔区的酒馆里，人们以八对一的赌注来推测苏联不会接受这个解决办法。维辛斯基果然否决了中立国家的提案，封锁仍然继续下去。

我们中间那些关心柏林问题的人也考虑了其他一些想法。联合国大会本来可以以压倒的多数赞成西方盟国的立场，但苏联人不会受这种行动的约束。我们只是想解决这个争端，而不是想赢得一场宣传战。克莱将军把他先前的计划改得温和一些，主张将公路、铁路和驳船的运输推进到封锁线上，如果苏联人不让通过，我们就召开四国司令官会议，商讨采取另一步骤。我指出，如果运输遭到阻挡，而我们又决定不强行通过，我们是必然要丢脸的。为了这个和其他原因，克莱将军的想法被搁置起来了。

283

季节由秋入冬，空运依旧在寒雾和冰雪中继续进行着。西方盟国也对苏占区实行禁运。11月，杜鲁门在竞选总统时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当选为下一届总统。非常幸运，外交政策并没有成为杜鲁门同他的主要竞选者、共和党的托马斯·E·

杜威之间的争论问题。

1949年1月，杜鲁门开始担任他最后四年的总统职务，他任命了一位新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艾奇逊是个上唇蓄着浓密小胡子、眼睛冷冰冰的高个子，他是马歇尔的很好的继任者。艾奇逊具有众口一辞的保守派的声誉，在国会中以其决不向苏联人屈服的顽强精神得到广泛的尊敬。他外表很温雅，异常机敏，善于辞令，同时也很直率。他任助理国务卿时，主管经济事务和国务院同国会的关系，他在欧洲以及在参众两院都有不少朋友。此外，他做两年副国务卿，这使他不仅了解国务院的各种工作情况，而且也了解外交界各个成员的才智和个性。尤其重要的是，大家知道他一向主张与西欧保持密切关系，而这一主张是杜鲁门总统对外政策的中心部分。

当艾奇逊就任国务卿还不到两个星期，我发觉在我看来象是斯大林发出的表明苏联对柏林的态度将有所改变的信号，于是我提请国务卿注意。当时我正在注视着苏联人可能发出的这种信号，因为西方盟国的反封锁措施大大损害了共产党人。担任赫斯特报系国际新闻社欧洲经理的美国记者金斯伯里·史密斯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询问有关柏林的一些问题。在那些年代里，时常有一些新闻记者写信给斯大林，希望得到答复。这些信件写去以后差不多都是石沉大海。然而这次史密斯的信中却提到了斯大林想要答复的一个问题。史密斯询问斯大林是否认为柏林的货币问题很重要。在1949年1月31日的复信中，斯大林完全不提货币问题，而是讲到了柏林封锁和反封锁对德国的发展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以及东欧与西欧的贸易问题。当我在报上看到这封复信时，我觉得惊

奇的是斯大林沒有谈及货币问题的爭执，而苏联人过去是一直把这个问题作为封锁柏林的主要原因的。

284 在同艾奇逊和柏林问题小组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提醒他们注意，我们还不能肯定斯大林是不是发出信号。还必须进行探索。经过杜鲁门批准，艾奇逊决定作一番试探。在2月2日国务院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艾奇逊说，如果斯大林眞想达成协议，那么还有一些比报纸不那么公开的渠道。然后我们把杰塞普召到华盛顿，叫他试图通过他本人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立克的晤谈，打开秘密谈判的渠道。2月15日，杰塞普在成功湖联合国临时总部內代表团休息室的门口附近等待马立克。(不是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在男厕所。)在聊过天以后，他问斯大林不提货币问题是否出于偶然。马立克说他不知道。杰塞普说，如果马立克能查明这个问题，他将很感兴趣。杰塞普把谈话內容写成一份报告，分送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参议员沃伦·奥斯汀、代表团的其他四个成员和华盛顿的柏林问题小组。这份报告作为“机密”文件分发，我看到以后感到担心。我批评杰塞普办事欠谨愼。这个报告被改为“绝密”文件，分发给驻联合国工作人员的那几份被收回销毁。

解除柏林封锁的努力获得成功，很足以说明在极为敏感的外交谈判中，保守机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杰塞普私下同马立克接触的消息泄露出去，新闻界和其他各界就会纷纷发表意见。苏联人就会认为我们是打算影响舆论，而不是眞正想达成协议。当苏联人认眞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总保守秘密，如果相反，他们就会大肆宣传，这几乎可以说是一条

原则。

在政府工作中，特别是在外交事务中保守秘密，始终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我在美国政府中的同事没有一个不认为人民有权一般地了解政府的政策，他们也并不责怪新闻界发表了它所找到的材料。然而，就涉及敏感问题的某些类型的外交策略行动来说，保守机密事实上仍然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只是凭常识和对共同目的性的认识才能处理好保密问题。

一个月过去了，马立克还没有回音。我认为我对于斯大林避而不谈货币问题的假设也许是错了。后来，杰塞普调回华盛顿，被提升为无任所大使。有一天他接到电话，说马立克 285 想见他。第二天是 3 月 15 日，马立克在纽约派克大街苏联驻联合国办事处说，莫斯科已通知他，斯大林没有提到货币问题并非事出偶然。

国务院的柏林问题小组有了试探的机会。按照我们的建议，杜鲁门和艾奇逊指示杰塞普向马立克探听，有无可能想出办法去解除对柏林的封锁，停止空运，使虽然仍旧分为两部分的德国恢复到大战结束后相对的平静状态。杰塞普做了好几个月的审慎工作，才取得同意。我想使安理会参加最后协议——这将加强联合国的地位——并且希望得到英国和法国对我们的支持。杰塞普花了很多心思设法让苏联人了解我们不推迟或者取消单独成立西德政府的计划。莫斯科则竭力要求确定，在波恩政府成立之前，先召开一次外长会议来讨论德国和奥地利的问题。

讨论将近结束时，法国外长罗伯·舒曼在法国接见新闻

记者时无意中透露了这个消息。但到了那个时候，消息透露出去已无关大局，因为杰塞普和马立克已就取消封锁、结束反限制以及召开外长会议等问题商定了一个试行方案。5月5日，发布了申述这项协定的公报。

在外长会议召开以前，发生了一桩经常会引起很多麻烦的事件。凯南及其政策计划委员会已经起草一个文件，建议减少美国和苏联在德国的驻军，作为走向德国最后重新统一的步骤。这个建议遭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他们指出，如果撤军，美国就要撤退三千哩以上，而苏联只需撤退几百哩。有人——并非凯南——把这文件的内容透露给了《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顿。他写了一篇报道，这篇文章在欧洲引起了很大骚动。法国人和英国人感到很惊讶，因为美国人在几个星期以前刚在北大西洋公约上签了字，便要减少他们在 286 欧洲所承担的义务。后来为了安抚英法政府，谈了几个小时的话，说明凯南计划并不是美国政府放出去的试探气球。以往政府也偶然放出过试探气球，但由于我国的社会性质、国务院的性质以及我国的宪法结构，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事实上，我知道凯南文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试探气球。

这次在巴黎召开的外长会议也有其愉快的时刻。维辛斯基出了一个严重的纰漏，没有取得苏联政府认为很重要的某些保证，就同意签订对奥条约。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法国人窃听到了葛罗米柯从莫斯科打给在巴黎的维辛斯基的一次电话，电话中葛罗米柯把可以想象得到的最粗暴的骂人话都用上了。法国人窃听苏联人打来的电话这一事实是不足为怪的。任何担任公职的人如果认为电话特别是越过国境的电

话非常安全，就应该先检查他的头脑是否清楚。每一个外交官都懂得这一点。那个电话也表明在苏联国内共产党的地位和政府的地位是有所不同的。维辛斯基是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不过是外交部副部长，然而葛罗米柯在党内的地位要比维辛斯基高得多，所以他敢于心安理得地辱骂他的上司。

虽然外长会议已经结束，维辛斯基却要求同西方外交部长们再开一次会。他在会上要求改正新闻公报中的一句话。当国务卿艾奇逊冷冷地问他，苏联政府是否准备破坏刚写好的协定时，维辛斯基不再谈这个问题，同意让那段话保持原状。可以设想，维辛斯基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人们对他的欢迎决不会是热烈的。

1949 年 5 月的那次外长会议事实上是这个机构的最后一次会议。这基本上是一次旨在解除柏林封锁的会议，它终于达到了目的。会议还在制定对奥和约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但没有什么结果。

柏林封锁的结果对西方盟国来说是一次胜利，因为苏联人没有能够把西方盟国挤出柏林，局势恢复到了封锁以前的状况。我们没有使用武力而占了上风。但西方盟国想要开辟一条通往柏林的走廊的种种企图却被苏联人所阻挠。

柏林的封锁使我们相信迫切需要着手建立一个西德政府。波恩政府成立以后，苏联人在东德也建立了一个政府。287 就这个意义来说，封锁柏林可以说是加深了德国的分裂，也可以说是使德国的分裂成为永久性的了。

至于这件事情对西方盟国政策的一般影响如何，却很难判定。封锁柏林的事件肯定并未引起美国重整军备；1950 年

春国会中辩论的不过是美国军事预算究竟应当为一百四十亿美元还是一百二十亿美元的问题。封锁也沒有导致美国国内反苏情绪的增长。封锁柏林事件的主要教训是：如果西方盟国准备坚决捍卫自身的权利，它们就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获胜机会。谁也不能断言，如果西方盟国为了对抗封锁而采取了更为强硬和更加危险的措施，其结果又将如何。固然我们很明显地不愿打仗，幷且尽量表明这一点，我们所做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派遣一中队 B-29 型轰炸机驻在英国，却一定使苏联人产生这样的印象：我们决心留在柏林，如果有绝对的必要，我们也准备使用武力。

柏林的封锁解除以后，整个欧洲呈现出一片安宁景象。眼前沒有任何危机，国际舞台上已经消除了一个十分危险的问题。但是在远东，情况稍有不同。共产党人即将在中国取得巨大胜利。此外，美国在朝鲜境內走上了热战的道路。

第十七章　朝鲜事件回忆

288

1949年夏，我开始认真地考虑我的前途。我在华盛顿已工作了七年多，对于美国外交人员来说，在华盛顿呆上四年是被看作到头了。我觉得，如果我还想留在外交界，我就应当再度出国才好。我向国务卿艾奇逊提出我的希望，他同意了。他让我挑选驻西欧任何一个较小国家的大使馆。我考虑了他的建议之后告诉他，如果我在外交界超过我的同辈而先升任大使，那将是错误的。在我毕生事业的那个阶段，我宁愿担任一个比较适中的职务。

正如前面说过那样，我一直认为，如果你在外交界升得太快，那是一种错误，因为那样你就会在年龄过早的时候就爬到许多人的顶上去，以后就不大好给你安排职务。如果我在四十五岁当上大使，那将使我未来的宦途发生复杂情况。此外，我愿意担任驻法公使，而不愿到次要的国家担任大使。艾奇逊于是任命我为驻巴黎的公使，充当大使馆中的第二把手，我立即接受了。凯南继我之后任国务院顾问和苏联问题专家。

我在巴黎充任的是新的职务。到那时为止，我们在任何驻外大使馆内都还没有正式的公使，即特命全权公使。1949年初，在我想要调往国外以前，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问我有什么建议可以减轻压在一位大使肩上的负担。我即提出在较大的大使馆内设立特命全权公使的办法，因为在许多场合下 289

公使可以代表大使出面。这个意见被采纳了，于是伦敦、巴黎、罗马和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内都添设了一名公使。在我抵达巴黎后不久，我被杜鲁门总统提升为常职公使。这纯粹是荣誉职衔，其本身并不具有何种权威。

我们的大使是戴维·布鲁斯，我同他很熟，可是不够亲密。大战时期他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成绩卓著，在他任驻法大使之前，是马歇尔计划执行机构的驻法代表。从各方面看，他都是一位值得钦佩的领导人，可惜我只同他共事一年。在他领导下工作是很理想的，他总是很能体谅人，并且非常谦虚，最后他成为我的密友。后来，他历任副国务卿以及驻德国和英国的大使。

我们与法国人的关系是密切的。法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巴黎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的所在地。上级交给我的任务之一是提出对法军事援助的第一个计划。我指定让曾任国防部预算官员的理查兹将军在我手下担任军事部分的负责人。他对于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很辛勤认真的，所以有时我需要安慰被激怒的法国人的情绪。他工作做得很出色。

军事援助还刚刚开始，必须开辟许多新的工作领域。我有一大部分时间不在巴黎，尤其是我要住在伦敦，在那里查尔斯·H·博尼斯蒂尔上校负责全欧军事援助的协调工作。他是一位有杰出能力的军官，后来充任美国驻朝鲜军队的司令官。关于军援计划，特别是在要求法国官方提出如何使用军援的详细计划方面，有很多困难的问题。但是，对于法国使用美国军援去镇压胡志明在印度支那的革命这个问题，从来没

有人提出过，至少我是如此。我感到法国正在印度支那打败仗，但对于提供我们的援助的问题，我不记得我有任何反对意见，当然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意见。法国是我们的同盟国，但关于法国殖民地的问题，如果要用我们的判断来代替法国人的判断，那是很困难的。

我在巴黎只呆了很短一个时期，国务院便考虑召我回国去审阅由保罗·尼采领导的政策计划委员会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准备的一篇研究报告。由于苏联人在8月份爆炸了他们的第一个核装置从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上级便命令该计划委员会写出一篇研究报告来。美国人原来高枕无忧地认为，还要经过几年苏联才能爆炸一个核装置。苏联人把时间缩短了，华盛顿为此很焦急地进行了讨论。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一直是美苏所有谈判中的主要因素；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当我们保持着核武器优势的时候，还继续是这样。这种优势无疑地使苏联不得不谨慎从事，尤其是关于封锁柏林，以及后来在朝鲜战争时期。由于苏联人爆炸了他们的第一个原子武器，人们就对与美国相比之下的苏联实际军事力量和潜在军事力量感到担忧。局势发展得很快，因此这份研究报告迅即分发传阅，并要求从速签署意见。后来国务院又决定不召我回国，我在1951年返美时才看到了这个文件。它被称为NSC/68号文件，其中有许多论点我是同意的，尤其是所提出的基本建议，即美国应当加强军事力量，以便与我国在世界范围内承担的义务相称。其中分析苏联政策的部分有些论点我不能同意，至今也不能赞同。文件把苏联的政策仅说成是苏联抱有断然的决心，要将共产主义制度推广到全世界。象我

290

以前所说过的，甚至在那些日子里我也相信，就其本身的行动而论，苏联的大部分动机还是在于维护它的国家利益，而推广共产主义的想法则是从属于上述这种考虑的。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目标是保护苏维埃制度，首先是在俄国境内，其次是在各个卫星国。把共产主义扩展到其他地区，乃是理论上的和次要的目标。

斯大林作为俄国的领袖，从来不愿在其基本政策中作出规定，争取把共产主义制度建立在他无法希望加以控制的地区。斯大林既把共产主义看作信条，又把它看作行动的手段，这两种态度是互相冲突的。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疑地相信共产主义的一切主要原理。但他又是苏联的一个民族主义者，完全不相信一个共产党如果听其自生自长，能够在任何环境下取得政权。正如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告诉丘吉尔的那样，无须担心建立共产党政权的问题。所以他把整个共产党的机构在世界范围内组织起来，作为一个完全处于从属地位291的傀儡，事实上听从克里姆林宫亦即听从他的命令办事。只是当某一共产主义运动完全受他的控制时，他才加以信任。任何他所不能控制的事物，尤其是共产党人，总要受到他的严重不信任和怀疑。所以他命令在苏联将继续控制的地区内建立苏联类型的政权。但是，如果一个共产党依靠它本身的力量取得政权，他也不能置若罔闻。在中国的情况肯定就是这样。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表明，斯大林未曾预料到或者不愿见到中国共产党人在大战结束后几年内取得政权。然而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斯大林就只好帮助它，别无其他办法可想。我相信，NSC/68 号文件关于苏联目标的错误判断，曾把艾奇逊

等人在看待朝鲜战争的问题上引入歧途。

而且，在阅读NSC/68号文件后，我感到其中要求大量增加国防费用的建议是绝对没有机会被采纳的。增加国防费用将意味着追加数以百亿美元计的拨款，提高捐税，以及随着大量增加军备而产生许多不利之处。象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有各种团体竞向政府要求拨款，看来任何一届国会都很难在和平时期认真考虑军事预算的这种大量增加。我并不否认有增加的必要，但我根本不相信它有实现的可能。然而，NSC/68号文件是一次有益的锻炼，我相信它有助于澄清美国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使他们注意到由于我国与苏联发生矛盾而出现的经济问题。

1950年6月25日，我的妻子和我在巴黎北部蒂埃尔镇的小别墅里度周末。将近午餐时，我接到大使馆秘书伍德拉夫·沃尔纳的电话，他告诉我朝鲜爆发了战事。他随即驾着汽车出来，带给我刚收到的几份电报，当天下午我们就一起回到市里。第二天，布鲁斯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当时他担任马歇尔计划的协调工作）和我一起讨论了局势。我们的情绪比较低沉，因为我们看不出有迹象表明美国打算采取任何有力的行动以阻止共产党人入侵南朝鲜。我们推测了美国这种无所作为的态度将产生什么后果，我们的盟国将多么灰心失望，它对将来又会招致多大的危险。当我们正坐在那里讨论时，杜鲁门总统来了电报。电文说他决定出动海、空军进行干涉，并训令布鲁斯把这项决定通知法国政府。我陪同布鲁斯谒见法国外长罗伯·舒曼。舒曼噙着眼泪说，“感谢上帝，这次不会重犯上回的错误了！”他是在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292

英、法两国没有及时制止希特勒这段历史。

在与华盛顿通过电话以后，国务院决定让我陪同哈里曼返回美国。我们到伦敦去赶乘一架飞机。这次飞航的经过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不知道朝鲜将要发生什么情况。一切事情都捉摸不定，我们的情绪就象随着气流颠簸的飞机一样。在黎明时分抵达纽约以前，我们遇到了一场雷雨。客机突然下降了大约一千呎。当飞机东歪西斜时，砂糖、菜碟和其他厨房供应品一下子都飞到过道里去了。哈里曼却戴着礼帽，在男子洗脸室继续不慌不忙地刮他脸上的胡子。

根据艾奇逊的要求，我在华盛顿住了一个月，任务是检查各种迹象来确定这次对南朝鲜的入侵是否为共产党在世界其他地区采取同样军事行动的先兆。当时我同碰巧在华盛顿的古斯塔夫·希尔格尔一起工作。他在第二次大战初期任德国驻莫斯科公使，那时我便和他认识。他是被召来充当朝鲜问题的顾问的。他生在俄国，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是公认的苏联事务专家。我的结论是，苏联没有什么可能在任何其他地区，例如德国，再进行武装入侵。苏联在朝鲜的行动完全局限于朝鲜。

希尔格尔和凯南是赞同我的看法的，但我们只占少数。艾奇逊和国务院的其他大多数人，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把朝鲜战争理解为苏联对外政策新阶段的开端。杜鲁门接受了他们的观点，认为苏联既然在朝鲜发动了进攻——共产党人公然使用赤裸裸的武力以扩张其体系的第一个事件——就可能号召其他卫星国家、特别是东德的军队去扩大共产党人的控制。他们显然受到共产党入侵所产生的情绪的影响。在

各次会议上，凯南和我竭力反对这种论点，但未能奏效。

我们特别反对对北朝鲜实行反入侵计划。我们提请注意，如果敌对的武装力量逼近共产党国家的边境，它们势必作出强烈的反应。当然，我们所考虑的既有中国也有苏联。我们的基本想法是认为共产党国家的领袖们的主要目标在于保存其现制度。如果美国军队出现在鸭绿江边的中国边界上，而且那里离海参崴也很近，这必将被视为严重的威胁。凯南和我都争论说，倘若冒冒失失地去刺激中国或苏联，或同时刺激两国，促使它们参加战争，那是蠢事。我们并不否认应当使用足够的军事力量去击退入侵者，但没有必要采取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因为对朝鲜的进攻并不是在其他地方实行一系列入侵的前奏曲。 293

为什么我们不顾反对意见而深信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呢？首先，我们认为苏联还远远没有准备好，从军事的战略观点来看，它还不能考虑对美国进行全球范围的战争。苏联那时离它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还不到一年。固然那次试验比许多人预料的要早，然而根据我国的经验，我们知道在生产出第一个原子装置以后，还要经过若干年才能拥有一个可供应用的原子弹武器库。在 1950 年 6 月，苏联还不可能储备许多原子武器。

我相信斯大林的主要动机是想完成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到 1950 年，他了解到他在日本不可能象在德国那样踌躇满志地割出一部分来。美国通过哈里曼已经通知斯大林，不同意在日本的北海道划出一块苏占区，并且麦克阿瑟实行一人统治的方式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此外，美国正在加紧

进行着同日本签订和约的计划，苏联人无法加以阻挡。但是，自从美国武装部队撤离南朝鲜以后，那里实际上处于无防御状态，看来是容易到手的。

斯大林也相信他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因为他继续相信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个标准的错误，即任何地方的工人阶级和贫民都是拥护共产党人的。斯大林在芬兰曾大失所望，但他没有吸取教训，一味相信武装入侵的冲击会引起反对李承晚总统的资本主义政权的国内叛乱。固然南朝鲜不存在庞大的工人阶级，但布尔什维克却相信贫苦农民大体上会赞成一个共产党政权。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可避免地要坚持这个谬论，因为如果放弃这项教条，其结果就是使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在一切国家始终都可适用的这种企图完全成为泡影。毫无疑问，斯大林和北朝鲜的独裁者金日成都相信294 军事行动将很快结束，因为南朝鲜人民将起来支持共产党人，而其他任何国家都来不及采取对策。

有些人认为，艾奇逊于1950年1月12日在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的演说中把朝鲜排除于美国在远东的切身利益范围之外，因而使苏联决心赞同(如果不是实际上下了命令)去攻击南朝鲜。我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很难设想，象斯大林这样一个小心谨慎的统治者会根据一篇对记者的演说而采取行动。斯大林的经验和本能使他不去理睬那些公开声明，认为它们未必能说明一个国家的真正立场。也许斯大林确曾根据美国从南朝鲜全部撤出支援部队这一点去估量艾奇逊的演说，从而得出结论，认定美国不会采取行动，尤其是如果一次入侵能迅速占领全国的话。肯定不是艾奇逊的演说本身引起

苏联的任何行动的。

现在也有一些人说，朝鲜战争并不是苏联发动的，而是北朝鲜人的独立行动。这是幼稚的胡言乱语。试问一个军队各方面都由苏联军官训练，每一级都有苏联的军事顾问，其军需物资全靠莫斯科供应，如果未经苏联批准，它怎样能采取行动呢？斯大林是不会如此粗心大意，容许北朝鲜发动一场可能会引起苏联同美国对抗的战争的。苏联从来没有拿战争开过玩笑。*

回到巴黎以后，我高兴地读到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在仁川胜利登陆的消息，但我仍然担心中国或俄国军队会参加战争。11 月 25 日，在美军抵达鸭绿江边后第三天，大批的中国"志愿军"渡过了鸭绿江。凯南和我事先关于武装干涉的警告不幸而言中了。

美军灾难性的撤退是够糟糕的。但又发生了一件使人伤脑筋的事。凯南告长假离开了国务院，到普林斯顿大学高等学科研究所担任驻所研究员并写书去了。这样，在这关键时刻，国务院就没有对于处理苏联事务富有经验的主要官员了。我打电话给凯南，敦促他到华盛顿去向马歇尔将军和艾奇逊国务卿面陈朝鲜局势逆转的基本原因。凯南照我的要求去做，艾奇逊热情地接受了他自动提供的临时帮助。 295

固然凯南和我预先说中了中国将出面干涉，然而甚至在今天我还不知道斯大林是否会袖手旁观而听任美军在朝鲜取

* 如果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可以相信的话，则入侵南朝鲜的想法来自北朝鲜的独裁者金日成。他对斯大林提出这个主张，斯大林犹豫不决。在与毛泽东商量以后，斯大林决定支持并武装北朝鲜人，以发动这次入侵。

得完全的胜利。我相信斯大林决沒有想到美国会插手干涉。他以为人们会把北朝鲜的进攻仅仅看作是內战的一部分。既然美国作出反应而战爭开始不利于共产党的军队，我相信斯大林一定担起心来，唯恐苏联被卷进一场大战。当中国"志愿军"打退了美军时，斯大林想必又担心美国将使用更大的武力，甚至使用原子武器。斯大林寻求使自己从陷入的困境中脫出身来的方法。他绝对不想在其他地方发动侵略，而与美国这个巨人打起架来。

斯大林是否曾怂恿中国人参战，这一点恐怕只有从莫斯科和北京的档案中才能查明。也很可能是中国的独裁者毛泽东自行决定出面干涉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政权所受的威胁太大，不能置之不理。苏联人肯定是十分愿意使中国人流血牺牲来保卫北朝鲜的。

苏联的审慎态度幷沒有阻止它发动一次恶毒的宣传运动，即一般所说的"仇美运动"。报刊、广播和电视把美国描绘成一个为了追求利润而决心要破坏别国的罪恶国家。莫斯科流行着反杜鲁门的戏剧。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会议呼吁禁止使用原子弹，据称有五亿人在呼吁书上签名，这个数字显然是捏造的。这个行动的目的在于使人们把美国看成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苏联还做了很多工作使全世界相信美国在朝鲜进行着细菌战。苏联的宣传机器动员了一些同情共产党人的科学家和其他人员去支持它的指控。有些影片拍出中国人正在消灭据说是由美国空军投在地面上的各种害虫。我参加了许多会议，会上中央情报局讨论了对抗"仇美运动"的方法，但我们找不出任何有效的措施。这个运动有它的

影响。甚至有些对军方一直有所怀疑的美国人也提出疑问，究竟空军曾否在朝鲜进行过细菌战的实验。美国政府多次企图把关于细菌战的指控提交联合国讨论，由于缺少证据，共产党人拒绝了。

艾奇逊一定已经感觉到，在华盛顿没有一个主要的通晓苏联事务的专家，工作上多么不便，因为几个星期后我接到国务院主管行政事务的卡尔·赫梅尔赛恩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说，国务卿艾奇逊认为我最好还是回国再担任顾问的工作。凯南正要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去。我的妻子正接近她最后一次怀孕的临产日期，不愿意放弃我们在巴黎所住的舒适房屋和巴黎的快乐生活，回到枯燥无味和问题很多的华盛顿去。然而，她毕竟还是外交官员的贤淑妻子，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决定。几天以后，在12月17日，我送她去医院，等待我们第三个孩子也就是第二个女儿的诞生，然后我乘火车赶往布鲁塞尔。那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正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西德的武装问题，这个问题于9月间已由美、英、法三国的外长原则上表示同意。 296

1950年11月的一个星期日，法国人曾就这个计划试探我的口气。舒曼外长的私人秘书雷蒙·克拉皮埃来到大使馆，我们讨论了从法国人的观点看来的防御问题，一共谈了几个小时。最后，他提出了建立欧洲军的想法。我转告了华盛顿，在那里这个想法却被泼了许多冷水。艾森豪威尔将军起先对它有些认识模糊，但后来他倒成为主要的倡导者之一。这个计划在法国也曾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没有被采纳。布鲁塞尔会议在原则上确曾同意德国的重新武装，但还是过了一

段长的时间德国人才穿上军服。

按计划我应在 1951 年初回到华盛顿去。在我们最后的休假日子里，我的妻子和我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赛勒斯·苏兹贝格和他的夫人玛丽娜一起去打高尔夫球，并在法国的几家餐馆中吃个痛快。我们最后到了靠近枫丹白露的巴尔比宗。这时我接到了大使馆来的电话，告诉我苏联人已接受我们的建议，召开一次会议来为讨论德、奥问题的另一次外长会议详细拟定议事日程。假日取消了，我回到巴黎去讨论这个议事日程。

我们起先以为这次会议可能为时不长，结果却几乎费了四个月才得出我们不能就议事日程达成协议这样一个结论。这次会议的地址是在一所奇形怪状的宫殿里，它是由博尼·德·卡斯勒昂用他妻子安娜·古尔德的钱建成的。这所宫殿倒和我们的会议过程很相称。一个已通世故的成年人在二十世纪初竟会用光怪陆离、奇形怪状的样式来装饰他的家（在天花板上画着些天使！)，简直无法令人相信。同样，世界上大国的代表坐在一起，居然会就议事日程上一个问题的措辞斤斤计较了那么长的时间，也似乎是难以相信的。杰塞普是美国的代表，我当他的助手。

297

这次在玫瑰宫开的会议是冗长和十分令人厌烦的。很明显，在朝鲜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西方盟国对于举行会议是特别不感兴趣的。我不能确定苏联方面有多大兴趣，然而当我们开始讨论议事日程时，我们双方根本达不成一致的意见。我们试搞了一套分别排列的议事日程，即双方在平行的栏目里填写议题，偶尔也分四栏填写议事日程。

葛罗米柯的译员是一位年轻的苏联妇女，她提供了一些解闷的笑料。她的英语知识并不十分广博。有一次，法国人给议事日程项目提出一种新的表述法。葛罗米柯说，虽然这是加上新的法国酱油端上来的，它还是原来那道菜。这位俄国女译员竟把这句话译成"它还是原来那盆菜，不过用了些新的法国果汁"。另一次，葛罗米柯说，苏联人将继续抨击南斯拉夫的铁托，需要花多长时间就花多长时间，这时她把"抨击"这个词译成"诽谤"，使我们感到非常好笑。

有一个俄国人，名叫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他告诉我，就他来说，他并不反对会议拖长下去。他喜欢巴黎。这使他有机会参观许多博物馆，从总的方面尝尝这个城市的罕有的风味。

法国人担心，如果他们也带头提出要结束这次无益和无效的努力（有几次只开了三分钟会），国内的共产党人就会在下次法国竞选运动中利用这一行动。最后大约在6月中旬，西方盟国鼓起了勇气，结束了这次会议。没有证据表明会议的结束对于法国的大选结果有什么关系。这并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使我看到，三个西方政府在苏联问题上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总是过分顾虑到对选民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会议结束后，我把我的幼女塞莱斯汀放在篮子里，坐上火车去法国南部，我的妻子和另外两个小孩在那里等着我。我们在热那亚乘意大利客轮返回纽约。

在我重新就任国务院顾问时，我发现我的任务有了很大 298 的不同。在马歇尔将军领导下，我是他亲密的顾问。我随同他出席各种会议，得到他的信任，专心一致地同他一起工作。

在国务院的各级机构中我没有特定的任务。事实上我只是一个无固定职务的人。在艾奇逊领导下，国务院的工作方法完全不同了。他身边已经有了很多私人顾问，他不大向我征求有关苏联问题的意见。凯南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也是他离开国务院的原因之一。虽然艾奇逊需要在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中有一名通晓苏联事务的专家，他也知道这个职务不会占用我的全部时间，我手头还会有空闲时间。所以他要求我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小组里充任国务院的高级代表。这个职位仅仅比部长低了一级。

我发现这个工作不是使人了解各种问题而是使人感到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这主要是因为在计划小组里至少有十五个单位的代表。其结果是所写出来的每一份文件都弄得四平八稳，异常圆滑，以避免不同意见，等到最后定稿，就象兑过多次开水的淡茶一样。我们谈了许多题目，从朝鲜战争及其后果一直到和平可能带来的大致的前景。事实上，全部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问题象浑浊的泥浆水一样流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桌上。委员会本身在杜鲁门总统领导下工作得很好，但我并不认为计划小组起草的文件对该委员会的各种决策有多大帮助。

例如，有一次我们讨论了苏联有无可能用一条船把一颗原子弹偷偷运进美国的一个港口的问题。联邦调查局和海关派来的官员说出了一些东拉西扯的看法。结果在开了几次会之后，我们才决定不讨论这个问题。

9月，当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约我陪他去朝鲜前线视察。由于日常工作把我有点搞腻

了，我立即接受这个意外的机会。于是我们乘飞机经过阿留申群岛飞往东京。在东京，马修·李奇微将军把当时的局势向我们作了简短的介绍。杜鲁门总统在把麦克阿瑟将军撤职以后，已任命李奇微将军为驻远东美军最高司令。我记得李奇微对布雷德利将军说过，如果在那个时期我们打算在朝鲜 299 取得军事胜利，他就需要再调六、七个美国师。由于这场战争在美国极其不得人心，那是办不到的。

我们飞到汉城过夜。在那里，我碰到担任驻朝美军政治顾问的老朋友艾伦·莱特纳。他对我谈了谈当时的政治情况。布雷德利和我到前线去视察，从战线的东端直到西端，地形的险峻使我感到吃惊。然后我们乘直升飞机飞向"新泽西号"战舰，当时这条军舰正在以十六吋口径的大炮轰击北朝鲜阵地。海军舰艇很清洁，与靠近前线地区里的泥土、灰尘、苍蝇和普遍的肮脏情况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我们在十分干净的甲板上降落，被迎入舰长的房舱。他们送来了咖啡、冰激凌和点心。我当时暗暗立下了誓言，如果我参加军队，我一定加入海军。

在汉城又过了一夜，又听了些军情汇报，然后我和布雷德利将军各乘一架 T-19 型教练机飞往前线。这种飞机只可以容纳一个驾驶员和一个乘员。当飞机颠簸着在四周飞行时，我们可以听到前线美军轰击的大炮声。驾驶员指出炮弹正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去。有一次他使飞机突然下降，因为他觉得炮弹离我们太近了。当他把飞机拉升时，它刚从一个山谷的谷底上空穿出去。

在朝鲜过了四天之后，我们飞回东京，听取更多的军情汇

报。李奇微将军已稳住阵脚，击退了敌军，因此战线大致同战争开始时一样。李奇微将军给人的印象是一位极其干练的军官，他彻底了解他的工作，清楚地、毫不含糊地和直截了当地懂得应当采取什么行动。他并不过分关心国际上和外交上的微妙关系。

那天我们在东京过夜，在大使馆的一座楼房里吃了日本火锅，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我就是被拘留在这所楼房里的。大使馆的一些比较年老的日本雇员参加了这次会餐，我们回忆了被拘留的那段生活。

第二天早晨，我们穿过阿留申群岛的浓雾，飞往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当我们降落时，天气放晴，我们饱餐了阿拉斯加瑰丽的秋色。我们在那里的空军基地的军官食堂内进餐，布雷德利将军并与当地的司令会谈。然后我们直飞华盛顿。

300 虽然我个人在这次视察中得以第一次真正在近处观察战争的实况，获益非浅，并且我肯定也了解到更多的关于朝鲜局势的现状，然而布雷德利将军的视察并未产生有重大价值的结果。他告诉李奇微将军说，美国不打算增加在朝鲜的美军师团数目，因为这样一来就至少要实施部分的动员。布雷德利的前线视察倒证实了在华盛顿流行的看法：没有希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在国务院，我直接参与了同朝鲜停战谈判有关的最难应付和最复杂的问题，即如何处理战俘的问题。随着战争的激烈进行，停战问题的一个难以解决的主要之点在于联合国部队所获的战俘大多数不愿回到北朝鲜或中国，他们肯定是反对共产党的。敌方坚持要我们把所有的战俘全部遣返，否则

他们就拒绝送回他们手中的我方被俘人员。对于这个问题，在华盛顿发生了过去就有过的典型的争论。军方主要关心我们被俘人员的安全问题，倾向于生硬地迫使敌方所有战俘返回本国。国务院则认为强迫遣返有损于美国主张人道主义的声誉。国务院的观点反映了主张选择自由的美国传统。此外，国务院还提出警告说，这样一来，受共产党控制的国家中持不同政见的人如果认为他们会象牲畜一样被赶回去，将来就不可能变节而投到我们这边来。我同国务院其他的人的意见一致，试图想出办法来突破僵局，但即使倾向于尽量缩小战俘的反共情绪，以便可以比较心安理得地把他们遣送回国，我们却找不出满意的解决办法。

到了另一届总统艾森豪威尔就任之后，朝鲜战争才告结束。甚至在那个时候，战俘问题也是被足智多谋的年老的南朝鲜总统李承晚解决的。他打开了战俘营的大门，放掉那些不愿返回北方的战俘。

关于朝鲜问题，总的说来，实际上是两个人最后阻挡住了共产主义的扩张。他们是小个子的意气高傲的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和目光冷淡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

哈里·杜鲁门作为一个总统，工作做得很出色。我象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当杜鲁门出人意料地成为总统时，我很担心。他从来没有干过外交工作。对于罗斯福同丘吉尔或斯大林办的交涉以及德黑兰和雅尔塔战时会议的详细情况，他几乎毫无所知。罗斯福显然从未想到他自己会在总统任内死去。与罗斯福不同，杜鲁门仔细研究给他准备的档案和文件，当需要对某一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时，他对这个问题的

301

各个方面都已心中有数。他具有充当一位有效率的总统所必需的最重要品质之一，即善于决断的真实本领。他无愧于他办公桌上的一句座右铭:“责任最后在我这里。”偶尔他的决心下得太快,但他在外交问题上不是仓促从事的。

就我个人所知，杜鲁门不顾 1948 年竞选处于劣势，打算派文森去莫斯科，乃是他让国内政治影响他对外交问题的判断的唯一的一次，虽然他也明显地想以援助以色列来讨好选民。

象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杜鲁门也是时代的产物。处理战后的各种问题需要作出很大的决断。在 1945—1952 年的环境下，用因循苟且的或肤皮潦草的态度来处理外交事务是不行的。他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需要作出明确肯定或断然否定的回答。他促使戴高乐放弃使用武力以获取意大利北部地区的那种坚决态度，他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对铁托的坚定的表态，他在欧洲经济复兴问题上显示出来的领导能力，他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支持，他在封锁柏林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谨慎，他在朝鲜断然使用美国武装力量的决定——凡此种种决策都不是第二流的总统做得出来的。杜鲁门满足了时代对他提出的要求。

以后几十年的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基石是在杜鲁门当政时期奠定的,这是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在希腊-土耳其采取的行动为我国帮助其他政府挫败外国支持的颠覆活动树立了榜样;马歇尔计划是一切援助计划的先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始终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础之一。

杜鲁门很倚重他的助手，他以要求于他们的同样的忠诚

对待他们。在他执政的初期，他只是信任由他带进白宫去的几个老朋友。其中有些人不能胜任。因为他们对外交事务沒有影响，我沒有必要在这里提他们的名字。当马歇尔将军在 302 1949 年初去职以后，他的主要顾问是迪安·艾奇逊。因为在杜鲁门任总统期间我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日子在国外工作，我无法评定其余的顾问对他的影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艾奇逊，因为艾奇逊同总统结成了十分美满的工作关系。这位国务卿提出许多想法；而总统、并且也只有总统，才作出决定。

艾奇逊是一位难以理解的人物。他具有精细而敏锐的头脑，对于法律和国际政治有渊博的知识。只是他自信到近于傲慢，才使他遭到许多麻烦。

他是一位牧师的儿子，保留着强烈的宗教感情，但多少也带一点怀疑主义。他不能容忍蠢汉，有时忍耐不住，可能会发一通暴躁的甚至蛮横的脾气。在私人函件中，他常常流露出对一些人的很不客气的评语。但在他任国务卿的期间，我从未听到他公开批评过人家。

在共产党取得中国政权后，艾奇逊和国会的友好关系变坏了。中共取得政权是艾奇逊无可奈何的事情。随着麦卡锡主义在全国猖獗一时，他愈来愈受到人们的攻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敢于顶住这种诽谤。他容忍下来，不动声色。他从未表现出他受到这些攻击伤害的样子，但我想他一定是深有感触的。他在国务院照常进行工作，好象根本不知道有这些攻击似的。

我总感到，人身攻击只有使艾奇逊离开政府以后更加坚

定他的反苏态度。他的怨气后来有所涌现。在描述人物时他变得更加尖刻，而他发表他对局势的看法时也明显地变得更加专断了。肯尼迪总统经常请他去磋商对外政策的一些主要问题。其中一次是在建立柏林墙的时候。艾奇逊竭力主张实行全国总动员以便向莫斯科表示美国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在发生古巴导弹危机时，艾奇逊强烈表示总统应当下令轰炸导弹基地。他总认为封锁比下令轰炸会冒更大的战争风险，然而实行轰炸却肯定是会使数以千计的俄国人丧失生命的。

尽管有意见分歧，艾奇逊倒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他对我很体贴，我常到他家里去，他也常来我家。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容忍和互相尊重的关系，还搀杂着一定程度的友爱。

303 他是历史关键时刻的一位好国务卿，但我认为他在一些重要的历史性的判断上犯了错误，特别是关于朝鲜战争。我前面已经提到，凯南和我断定斯大林在朝鲜的意图不过是要控制全国，主要是由于他认识到他在日本没有机会再搞他在德国所搞过的那种破坏活动。我觉得，艾奇逊受到国务院那些不了解苏联的人的影响，认为朝鲜战争说明苏联在推行一种新的对外军事扩张政策，欧洲邻近自由国家的地区都受到进攻的威胁。

由于这一错误的判断，美国夸大了朝鲜战争的意义，过分扩大了我们所担承的义务。政府得出结论说，不信上帝的共产主义者已经阴谋夺取全世界，而美国是身穿耀眼的甲胄要在任何地方对共产主义作斗争的武士。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在西半球之外只承担了一项政治性或军事性的义务。这就

是北大西洋公约。我们在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基地都被看作是临时性的，在军事占领结束后就要被放弃。固然，作为战前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菲律宾保留一些基地，但沒有保证要加以使用。另外，只是在英国和沙特阿拉伯才有美国的军事设施。在前者，我们享有过境的特权；在后者，我们有一个飞机场。由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共产主义的目标，到 1955 年我们在三十六个国家共有军事基地约四百五十处，并且我们在拉丁美洲以外同大约二十个国家订有政治和军事条约。正是朝鲜战争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美国变成一个世界范围的军事-政治大国。

我们必须保证继续捍卫南朝鲜。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在战争中也不会流那么多血和花费那么多物资，并且后来就可以脱身出来。但战争改变了北大西洋公约的性质。在朝鲜战争以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种标准的政治和军事联盟，它约束着各参加国在任何一个成员国受到攻击时进行联合防卫。朝鲜战争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为军事机构，从 1950 年以来基本上一直沒有变动。现在已经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即只有在危险的边缘上确实存在的军队，才能提供保护。我们保证在应当重新武装起来的西德至少驻有六个师。艾森豪威尔将军被派充第一任最高统帅，虽然我认为直到那时为止，304 沒有人认眞考虑过，除了在战争时期或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的时候以外，应当任命一位最高统帅。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化并非单纯是美国的想法，欧洲各国政府要求采取这一行动的呼声甚至更为响亮。当美国政府批准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时，我们的保证被认为是足

以保障欧洲的安全的。朝鲜战争是一个分裂国家中被共产党控制的一部分向非共产党部分发动的有组织的军事进攻，在这次战争以后，单纯纸面上的保证是不够的了。欧洲各国对朝鲜战争的反应同美国的反应相比是一样过分或者更过分一些。尤其是在西德，那里担心东德预备队可能会发动突然袭击，而这种预备队是苏联人违反盟国间的协议建立起来的民兵一类的组织。不顾人们的反对，西德终于被重新武装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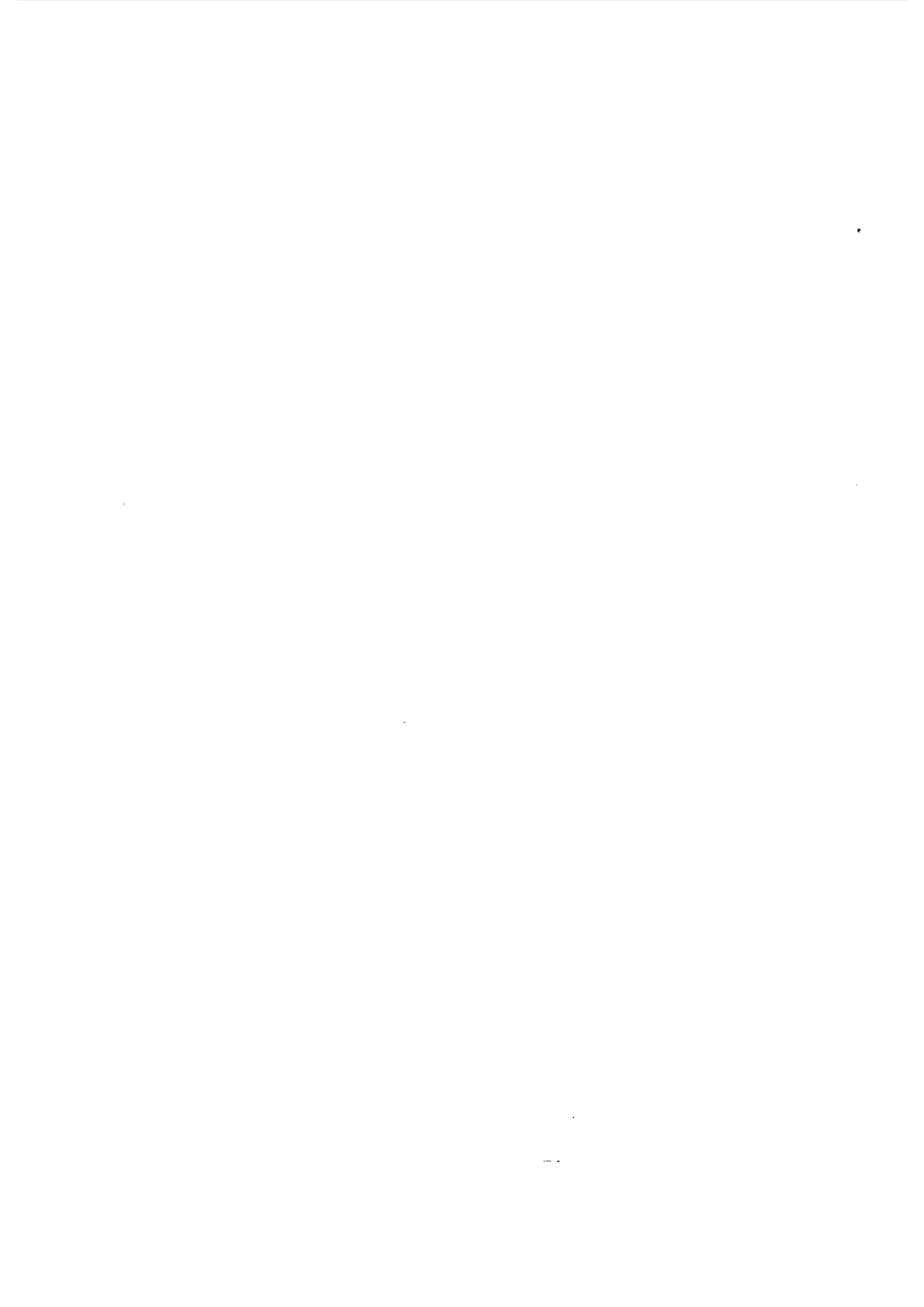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化不是一个明智的政策。美国政府只要略微增加它的军事预算，就足以使我们的欧洲朋友放心了。但甚至当西方各国匆忙地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时，驻在东德的苏军师团也未见增加。在大约二十五年的期间它们的数目始终没有变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化无疑地刺激了苏联的元帅们为红军要求更多的拨款。而且，这对苏联的军事计划是否有质量上或数量上的影响，还不得而知。苏联的特点之一是它从来没有忽视它的武装建设。

由于发生了朝鲜战争，美国被推为西欧的军事领袖。我们肯定是西欧防务的最大贡献者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比别国强大得多的武装力量。这样，我们就发现自己经常在吁请、恳求和强迫欧洲人去完成他们本身所必须承担的军事义务。

我们必须对盟国施加压力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坚信它们只要躲在我们的核保护伞之下，就可不花什么代价避免被共产主义征服的危险。有些欧洲人已经认识到这个立场的危险性——在有些情况下是不能使用核武器的——并已同我们一起来加强常规军事力量了。虽然这些年来开过多次会议，欧洲

国家还沒有接近于完成他们所应达到的目标，直到约翰·F·肯尼迪担任了总统，才重新审查了欧洲防务并制定了“弹性反应”的原则。

军费负担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一项政治问题，对民主国家来说更其如此。美国经常敦促他的欧洲盟国在其军备方面多拨一些款项，但这件事情沒有使美国更得人心。难怪我们获得了这样的名声，仿佛我国是一个一心想用原子武器打败共产主义的黩武国家。当共和党人在1953年执政时，新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一种狭隘的思想方法来推行他的反共运动，从而给反美情绪火上加油。然而，当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名选我出任驻苏大使时，杜勒斯受到了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和其他右翼分子的攻击。 305



第四部分

出任大使

309 # 第十八章 约瑟夫·麦卡锡的失败

1953年1月23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后三天，新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告诉我总统和他想让我出任驻莫斯科大使。我吃了一惊，因为我沒有理由相信能被杜勒斯垂青。当他担任共和党驻国务院代表的时候，我已经同他相识多年，但是幷不很熟。在那些年代里，在外交事务方面试图采取两党一致的政策。尽管我们之间从来不曾发生什么纠葛，我所持的对苏关系的看法同杜勒斯和共和党格格不入，却是清清楚楚的。

就在上一年11月，选举刚刚结束的时候，我和杜勒斯在当时由他兄弟艾伦·杜勒斯掌管的中央情报局的一次情况介绍会上意见相左。福斯特·杜勒斯在选举运动期间说过，他断然认为，由美国海军去保护中国压制福摩萨(这个日本人对台湾的叫法仍被普遍使用)是一种罪恶，幷且表示，政府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应当是取消朝鲜战争期间由杜鲁门总统所强加的、不许福摩萨的蒋介石军队对共产党中国采取任何行动的禁令。我认为把蒋介石"放出笼"幷沒有多大意义，因为大陆中国几乎沒有必要去担心福摩萨所能发动的微不足道的军事攻势。我说，倒是福摩萨需要我们提供的保护。杜勒斯承认，310 撤销禁令主要是象征性的，但是他争辩道，即使蒋无所作为，美国把它的舰队置于一种即使只是在名义上保护任何共产党

国家的地位，这在道义上也是错误的。他说，无论如何，舰队还是要保护台湾免受攻击。新政府很快就把蒋介石“放出笼”了。这一着无疑是个重大的错误。它煽起了国民党人最终重返大陆的希望，使我们同蒋介石的关系在好些年里变得很复杂。

把国民党人“放出笼”只是艾森豪威尔在选举运动中的口号之一，它使我们国务院的一些人感到头疼。艾森豪威尔还许诺超出杜鲁门的遏制政策，把共产主义“推回去”，“解放”卫星国。就在选举之后，我获悉杜勒斯是认真对待这些选举口号的。杜勒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为确认他担任国务卿作证时，谈到美国想在东欧把共产主义势力“推回去”的愿望。第二天，我的朋友乔治·凯南发表了一篇事先同我这个参事商量过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他间接攻击了“推回去”的想法。此后不久，杜勒斯告诉凯南说，政府里没有他的位置了。我告诉杜勒斯，我是赞同这个演说的；因此，如果乔治不见容于政府，我也不应当例外。杜勒斯没有理睬我的意见，说是我没有公开谈论这件事情。

1952年的选举运动是格外激烈的。在野二十年的共和党人渴望重新上台，在处理问题上是不那么审慎的。美国人被国际事件所惊吓，我看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挫败——这场战争引来了“黄祸”的幽灵，是我们同一个共产党国家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和蛮不讲理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的恶意颠倒黑白相结合，产生了一种真正的惊恐状态。自从指责雅尔塔会议迹近出卖一直到进行朝鲜战争，同共产主义斗争的问题仅仅是美国要不要

对受威胁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杜鲁门主义甚至并不包含使用武力在内。在朝鲜（当时战争还在激烈地进行着），美国的士兵正在被以残酷闻名的共产党军队所枪杀，或者据311 认为更糟的——所俘虏。许多美国人开始相信，共产党的军事扩张有殃及全球的危险。此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美国发现自己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之中——这是一个使得麦卡锡主义者把原因归之于政府中有共产党间谍的论据。

时过二十年之后回顾过去，就很难理解恐惧和怀疑的毒雾怎样影响了美国的生活，把外交推出正确的轨道而走上道德主义十字军的道路。我相信，要是没有朝鲜战争以及它所制造的气氛，麦卡锡也许会落得空欢喜一场，从此罢手。可是，连艾森豪威尔也拒绝为他的出谋划策者马歇尔将军辩护，使之免受麦卡锡的指控。在 1952 年的选举运动中，有一回南达科他州参议员卡尔·蒙特告诉我，他认为麦卡锡的行径虽然粗鲁，在某些方面或许有点不公道，但对于唤起美国公众注意共产主义的危险性来说却是必要的。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指出麦卡锡主义终将名声扫地，当共产党的行动确实威胁到美国安全的时候可能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我不幸而言中了。现在，在七十年代，当共产主义的危险确实存在的时候，就很难使许多美国人对这种危险多少有所注意了。

美国的政府机构曾经受到共产党间谍的某些渗透，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种渗透决不会严重到接近麦卡锡在反政府和反共运动的过程中所声称的那种程度。总的说来，美国政府对于安全措施相对来说注意不足，这倒是真实的。联邦调查局是活跃的，但是，安全制度松松垮垮，直到杜鲁门政府

后期才开始抓起来。麦卡锡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公众中间获得同情的响应，原因之一就是认为间谍渗入内部进行破坏这种想法所引起的恐惧心理。

就在这样一种猜疑的气氛中杜勒斯接手了国务院。此后不久，我半开玩笑地说（有人把这些话传给了杜勒斯），进入国务院的新人们使我想起了在敌对的印第安领地里的一列货车。每天晚上这些货车就围成一圈，有一个人放哨。许多新人对于指控共产党渗入国务院的运动产生了条件反射，竟然盼望发现相当一批政治上不可靠的官员。杜勒斯在第一次会见国务院官员的时候在言谈中就助长了这种怀疑。杜勒斯的言词象那2月份的天气一样，是冷冰冰、阴森森的。他说他将 312 坚持要国务院每个成员不光是表现忠诚，而且要“绝对的忠诚”。他没有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但是他的意图是明显的。国务卿的声明就是说明国务院是的确可疑的。他这番话激起了一些外交官员的厌恶，引起了另一些官员的恼怒，甚至使那些对新政府有所期望的人们也感到不快。

当杜勒斯要我出使莫斯科时，我们在那里已经四个来月没有大使了。1952年夏天，我在艾奇逊国务卿的要求下曾前往普林斯敦，帮他劝说那时已经离开国务院的凯南回来出任驻苏大使。他去莫斯科途中在柏林稍事停留。在那里，新闻记者们请他谈谈对苏联的看法。他说，因为他已经好些年不在苏联了，得等到再从那里出来时才能谈。9月19日，他去伦敦参加大使会议，路上在柏林停留，新闻记者们向他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乔治坦率地回答说，1952年的苏联使他想起1941—1942年的气氛，当时他受到纳粹分子的留难。他说：

“如果说纳粹分子允许我们逛大街却不让我们同各种德国人交谈的话，那末我们今天在莫斯科也必须在完完全全相同的条件下生活。”两个星期之后，苏联政府宣布凯南为不受欢迎的人。

那时我正好在维也纳，奉命前去日内瓦同凯南谈话。总的来说他看来并不沮丧，他说不大清楚是什么原因招来了苏联的严峻措施。他的个人看法是，他对苏联的了解比斯大林所能容许的程度稍为多了一点。很久以后，当我出使莫斯科的时候，在一次印度尼西亚的招待会上我站在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和拉扎尔·卡冈诺维奇(都是政治局委员)的旁边。我们谈起美国驻苏联的历任大使，他们都说有两位大使经常受到苏联人的尊敬——一个是凯南，另一个是我自己——因为我们对苏联事务是“认真的”。我问道，既然他们对凯南的评价如此之高，为什么他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呢？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强调说，凯南在希特勒的首都把苏联比作纳粹德国，言外之意是这种说法超出了斯大林所能容忍的程度。

313 凯南离任后，在我被正式提名之前，美国一直没有任命驻苏大使。在我同意接受这个差使时，我向杜勒斯提到确认我的提名时发生麻烦的可能性，因为我赞同过凯南的发言以及我同罗斯福政府和杜鲁门政府都有瓜葛。我得出席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听取确认意见，在那里肯定会有人对雅尔塔会议大事盘问的。那时，雅尔塔会议的文件还没有公布，包括若干著名共和党人在内的右翼分子指责罗斯福把东欧和中国出卖给了共产党人。我说我要拿出我认为是正确的会议纪录的文本，而这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选举运动期

间所提供的文本是决不会吻合的。除了强调我并不在我的任命问题上提出条件或保留意见以外，我说，为了不让政府作难，我相信在任命我之前同有影响的参议员们磋商一下是明智的。杜勒斯对我表示感谢，说他并没有想到那种可能性，但是不知道我能不能以我不过是个翻译为理由来谢绝回答问题。我说，由于我是顾问兼翻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回避作答。

因为杜勒斯没有说得很明确，我的理解是他要摸一下参议院的底。几个星期之后，一份要求苏联同意我的任命的电报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拿起电报连夜询问是否已经同参议员们打过招呼。杜勒斯办公室的回话是无需操心。因此我就让电报发出去了。

杜勒斯显然没有同任何重要的参议员商量过。他已经到欧洲旅行去了，这件事情可能已经丢在脑后了。也许他觉得没有必要磋商，因为我的提名是经过由三名前外交官员组成的一个在任命问题上向他提供建议的委员会认可的。这三个人是约瑟夫·格鲁(1941 年我在东京时的上司)、诺曼·阿穆尔和休·吉布森，他们全是共和党人，也都当过大使。格鲁和阿穆尔在听到考虑要我去莫斯科的时候，一致认为我是"唯一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的人。吉布森不认识我，他既不赞同也不反对，尽管他在推荐我的报告上面签了名。杜勒斯可能还受这样一个事实的影响，即总统(他本人了解我的工作)似乎决心对我的任命不再犹豫了。也许杜勒斯还认为，既然两年前参议院一致确认了我的参事的任命，就不会有什么反对的意见。 314

不管怎样,总统于2月27日把我的提名送交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3月2日安排了一次意见听取会。起初沒有什么反应。无论是右翼共和党人，或者是大肆造谣说美国被钻进国务院的亲共分子以及一些受骗上当对共产主义奉行温和路线的好心肠傻瓜出卖了的麦卡锡参议员为首的势力，都沒有大吵大嚷。我威到能够对付他们向我提出的任何问题——我毕竟参加过雅尔塔会议，而参议员中却一个也沒有——同时为了谨慎起见，我还得对这次意见听取会作些准备。我重温了文献，并要我的秘书玛丽·沃杰纳尔去国务院图书馆搜集资料。除了别的东西之外，她还从那以坚决支持蒋介石出名的《生活》杂志上找到了一篇赞扬1945年中苏条约的社论。在1953年,支持中国的院外集团正在提出指责，说罗斯福在雅尔塔出卖了中国，迫使蒋同斯大林签订了一项使苏联太占便宜的条约。

在同杜勒斯的另一次谈话中,我再次说明,在雅尔塔的时候我是国务卿的一名助手兼白宫驻国务院联络官。这样我就不只是译员了;我是了解那次会议上的问题的顾问,在问到这些问题时我不能装成乡巴佬。

我只身前去出席对报界和公众保密的意见听取会。亚历山大·威利这个身材矮小粗壮的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担任委员会主席,一开始他就为这个会定了调子。他是友好的,但是他想知道有关雅尔塔协定的问题。其他共和党参议员也一样，特别是密执安州的霍默·弗格森。他们力图叫我说雅尔塔会议关于中国的协定违背了大西洋宪章，违背了罗斯福于1943年在开罗向蒋许下的诺言，也违背了保证中国领土主权

完整的九国公约。民主党人一口咬定我在雅尔塔会议上不过是个译员，不起任何谘询作用，企图借此帮我摆脱困境。在我作了关于我的经历的通常开场白之后，提问就这样进行下去：

威利：你现在觉得雅尔塔协定就象有些人争辩的那样，那时是直接违背了1943年的开罗宣言的吗？

西奥多·弗朗西斯·格林参议员（罗得岛州民主党人）：主席先生，在我看来，他只是担负译员的职务，他的观点现在怎样或者过去怎样，远沒有任何区别——他现在的观点肯定不同于过去。 315

波伦：参议员，我要求作这样的说明，即在雅尔塔会议上我也是国务卿的一名助手，我负有某种备谘询的职责，但是几乎完全是关于欧洲问题的。除了因公去日本呆过一个短时间之外，我的全部经历在于欧洲地区的外交工作。为了回答您的问题，先生，我想指明具体的协定。在雅尔塔达成的协定有好几个，但是从所提的问题来看，我猜想您指的是有关远东的那一个；我说得对吗，主席先生？

威利：是的。

波伦：……事实上，那个协定在谈判中是被罗斯福总统当作军事问题的，我想在斯退丁纽斯国务卿关于这个问题的书里，您会找到表明那个意思的直接叙述。总统告诉斯退丁纽斯先生说，这不是与国务院直接有关的问题，而主要是同战争行动有关的问题……

威利：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答应蒋介石，凡是中国的领土，特别是满洲，都要归还中国，可是十四个月之后他们又转而着手把蒙古和萨哈林岛南部交给苏联，这不是事实吗？

波伦：开罗会议我不在场，所以我沒有第一手的知识。

我沒有回答威利的问题，而新泽西州共和党人H·亚历山大·史密斯参议员又重新提起这个问题：

史密斯：不知道是在斯退丁纽斯先生的书里，还是在别的地方，我看到这么一回事，尽管罗斯福总统、蒋介石大元帅和丘吉尔出席了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并且作出了那个开罗的解决办法——

波伦：是的，先生。

史密斯：尽管有那样的事实，在雅尔塔对待中国财产的处置权和中国问题时，蒋介石肯定沒有被邀请。我曾经听说斯大林先生明确表示反对邀请他到那里去，因为斯大林想同罗斯福先生和丘吉尔先生谈判这个为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索取代价而正在作出的具体安排。那可能是一个眞实的报道。

316 波伦：我从来沒有听说斯大林反对邀请蒋介石出席雅尔塔会议。我从来沒有听说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苏联和日本之间沒有战争，而那就是为什么，举例说，苏联沒有出席开罗会议的缘故。换句话说，那时有两场战争在同时进行；一场战争在欧洲，苏联是其中的交战国，另一场战争在太平洋，苏联沒有卷进去。事实上，这两个国家之间连外交关系都是保持着的，并且我还听说——对这我不能起誓，因为所有这些讨论我都沒有参与——如果他们要商讨远东的战争问题，俄国人就不准备参加任何这样的会议，即公开地、正式地讨论他们所沒有卷入的远东战争的会议。

我关于这个远东问题的唯一的背景知识是，一旦美国作出了我们将要进攻日本本土的决定，这个决定我相信是在1944年秋天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作出的，某些事情就自然而然地随着发生了。这些事情之一就是把苏联拉进太平洋战争的重要性，这不是象普遍设想的那样随便什么时候都行的，而是要在能够得到好处的时刻，比如说，要在能够拯救美国人的性命的时刻。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关于远东的协定是不必要的。雅尔塔会议之前提供给总统和丘吉尔先生的估计证明是错误的。无论情报有沒有缺陷，在战争中你不能碰运气，而由他们的军事参谋人员郑

重其事地递交给他们的估计是，太平洋的战事在欧洲胜利之后还要持续十八个月。

在那种情况下，俄国参加战争的整个问题成了在军事上十分重大的问题，而关于这个问题的可悲之处是，俄国的参战是不必要的。幷沒有进攻日本（本土）；俄国的卷入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必要的。

另一方面(在这方面我想现在沒有人会象过去那样在政治上加以辯护)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事情是背着中国人干的。当时我的理解是，那样做的理由是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如果苏联在欧洲胜利日之后两[illegible]才参加对日作战，这显然对日本在事前清楚了解战爭的进程有巨大的好处。它可能早就会打算采取某种涉及苏联的军事行动。提供的理由就是这些，先生。

共和党人还是不满意，亚拉巴马州民主党人约翰·J·斯帕克曼参议员试图帮我的忙：

斯帕克曼：嗳，如果我沒有听错的话，您在一分钟以前说，雅尔塔的决定是错误的，因为首先是沒有必要把俄国拉到战爭中去。您现在是从事后了解的角度来说话的，而不是那时的实实在在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317

波伦：是这么回事，我想把它说得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不认为在雅尔塔搞那个协定的人们自己以为是在跟国民党中国耍卑鄙的手段。他们幷不是那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我是说，把这个协定的內容体现在一项条约里，据我所知是受到中国的欢迎的。在雅尔塔，在罗斯福总统和霍普金斯先生方面肯定沒有这么一种想法，觉得他们是在出卖一个盟国。而且，在我看来，事情的结果证明沒有必要，因为太平洋战爭进程的军事估计幷沒有被事实所证实。但是我相信——

斯帕克曼：当然，由于原子弹的巨大成功，军事估计自然发生了

变化——

波伦：嗯，毫无疑问。

斯帕克曼（继续说）：——它连试爆都没有进行过。

波伦：是这么回事。

斯帕克曼：在雅尔塔会议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知道这个机械装置能行。

波伦：那是真的。

斯帕克曼：波伦先生，当时我是国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马歇尔将军在我们委员会讨论德国垮台的时候和雅尔塔会议以后的事情，在讨论中，他要我们对于进攻日本的时候将要承受的可怕损失作好准备。

然而，弗格森参议员并不罢休，当轮到他提问的时候，他来个单刀直入：

弗格森：这个关于远东的协定竟把别的民族的权利、自由和土地拿去送人，岂不是违背大西洋宪章的吗？

波伦：参议员，当我说雅尔塔协定本身并不是一项最后肯定的国际文件的时候，我想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肯定的文件是中国和苏联之间于1945年8月签订的条约。

弗格森：是的；但是我们谈论的是协定，说它在道义上是对还是不对，或者是否只是对一个错误的协定有所误解；我想知道的是，把另一国家、另一民族的这块土地送人，是不是违背了大西洋宪章？我们不是在宪章里说不允许搞扩张吗？这不是违背宪章了吗？

波伦：我并不认为雅尔塔协定在实际上起了那个作用。

318 弗格森：它起了什么作用呢？它承认我们可以施加我们的影响。

波伦：它同意我们支持那个立场。

弗格森：我们就决定支持那个违背大西洋宪章的立场，是不是呢？

波伦：可是，先生，我不认为大西洋宪章是反对国与国之间进行任何

领土调整的。也许我对它理解得不对。

弗格森：嗳，它是不是违背了我们制订的九国公约？

波伦：您指的是中国的领土完整吗？

弗格森：中国的领土完整。

波伦：可是，先生，即使在这个条约本身，另一个国家基地的让与或者铁路的某些权利、合营权利的让与，是不是就构成了对一个国家领土主权的侵犯，也是一个问题。我并不——

弗格森：就满洲而论，所做的全部事情是否眞的就是那么多？

波伦：是的，先生。有旅顺基地，有大连港的某些权利，在铁路经营方面有中苏合营的条件。至于外蒙古，当然罗，那是另一个问题。

弗格森：是的，当然罗。不是就写在这儿吗，

> 自不待言，上述关于外蒙古和港口、铁路之协议需要取得蒋介石大元帅之赞同——

以及

> 总统将按照斯大林元帅之劝告，采取措施，以便取得这种赞同。

瞧，难道他不是眞的要"采取措施"，而不只是要求实行一些措施吗？

波伦：我的理解是，"采取措施"这几个字在那里的意思是说他将运用他对蒋介石的影响以达到那个目的。

弗格森：这不是超出了影响的范围了吗？这不是意味着将要采取措施了吗？

波伦：先生，我沒有把"措施"这个词理解为你要去做除了敦促中国人接受这个协定之外的任何事情。

弗格森：那么你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你能够在雅尔塔协定、德黑兰协定或者我们同俄国签订的任何其他协定中找到的唯一错误，就出在解释上罗？

波伦：不，先生；我想主要的错误在于后来违背了这些协定。我相信，

如果1945年的中国的各项条约得到遵守，那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具有政治家风度的伟大举动。《生活》杂志对中国有很强烈的兴趣，

319 我可以把1945年9月10日出版的那一期《生活》杂志的社论列入记录。这篇社论把这项条约的签订看成对远东有重大意义的举动，仅次于日本的军事失败。他们认为这个条约把中国置于强国的位置。他们十分热烈地欢迎这个条约，先生。我是说那是对中国这个条约的反应——

弗格森：我说的是"采取措施"，而你说的是总统只同意居间斡旋。看看协定里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吧——

……三大国首脑同意，苏联这些要求应在日本战败后无条件地予以实现。

这难道不是对大西洋宪章、也是对凯洛格公约的违反吗？

波伦：我想，先生——

弗格森：我指的是九国公约。

波伦：我以为那个句子本来是不应该写在那里的。

弗格森：可是事实上就写在那里。

波伦：这个我知道；但我认为那是不应该写上去的句子。

不出所料，也问到了阿尔杰·希斯的问题，那时他在坐牢，被控在有关向俄国提供秘密情报方面犯了伪证罪。我证明说，希斯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活动主要限于国务院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有关联合国问题方面，并没有就远东问题向总统提供建议。

他们还问起利用"对抗"对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采取"遏制"政策的问题。关于"对抗"，乔治·凯南已于1947年春在《外交季刊》上写了一篇用"X先生"署名的文章。以杜勒斯为首的共和党人曾经批评"遏制"政策太消极——他们说这实际

上接受了东欧和其他地区出现卫星国的现状——而要求采取更积极的"推回去"和解放的政策。1952 年 7 月，我在科尔盖特大学讨论会上讨论美国对外政策问题时发表了一篇演说；我说"遏制"政策只是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一个部分。这个词只是在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的军事意义上使用的，因为美国不会带头以侵略的方式使用武力去进攻苏联。我说，"遏制"是根本的，因为相反的政策就是非遏制，或者就是对苏联的扩张无动于衷。

在意见听取会上，这个演说被提出来了。在史密斯参议员询问下，我为杜鲁门政府辩护，断言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和杜鲁门主义远不是消极的；它们对世界局势产生了"极为积极的"影响。希肯卢珀参议员逼着问我能否说得比仅仅"阻止别人前进"更深入一步，我只肯承认"遏制是个倒楣的字眼。" 320

在一整天的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成了主要询问人的弗格森参议员把我在 1947 年 7 月 10 日对一批国务院官员讲美国同铁幕国家关系的一篇不列入记录的谈话搬了出来。弗格森问我是否记得我想强调指出并说明，"我现在要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对那些批评我们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的行动的人感到厌烦了；实际上那些行动是我们最辉煌的外交胜利。"到今天为止，我还不知道是谁把我的话断章取义地告诉他了。我否认了这个引语，并且指出，"辉煌的外交胜利"不是我惯用的措词。

第一次会以友好的调子结束了。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民主党人休伯特·H·汉弗莱在以同情的态度问了我之后

说道：

> 波伦先生，我没有更多的事情要求您说明的了，只是再说一遍感谢上帝，我们的政府里罗致了会采取克制和诚实态度的人材，特别是在处理这些重大会议的时候，就象您所表现的，就象今天您在这里的证词所表明的。我并不同意您所必须说的一切。其中有些问题我也许要参加争论，但我认为您代表着我愿意相信并确实相信是我们外交工作中最优秀的品质，我想我们有了很好的外交人员。

在我离开那个房间的时候，我觉得这次证词听取会进行得相当顺利。我预料在赢得确认的问题上不会有任何麻烦。所有的参议员都是高高兴兴的。在这个委员会里，我看不出有谁会投票反对我，也许弗格森参议员除外。然而，我的证词实际上给提名带来一场风波。尽管证词听取会是秘密进行的。以威利参议员的情况介绍为基础的文章（汉弗莱对保守秘密提出了抗议）在诸如"波伦为雅尔塔公约辩解"之类的标题下出现在报纸上。对极右翼来说，战书已经下了。在他们看来，我是在反对仅仅在几个月前的选举中公众以压倒的多数赞同的观点。

321 证词听取会的后一天，我的提名表现出新的重要性。克里姆林宫宣布斯大林病危。杜勒斯把我叫了去，询问我如果斯大林去世莫斯科会发生什么问题。他对权力继承过程中或许会出现一次流血的可能性似乎饶有兴趣。我说，企图作出严肃的预言是愚蠢的，但是我对布尔什维克会听任局势恶化到这样一种地步表示怀疑。杜勒斯给我看了艾森豪威尔准备在那天晚些时候发表的一项声明的副本。声明只字不提对斯大林的病情表示遗憾的话，但对俄国人民给予同情。我认为

这是一个措词得体的声明。

3 月 4 日，斯大林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第二天他就死了。每个人都想知道这一变化对莫斯科和世界意味着什么。美国处于在莫斯科没有大使的不幸境地。为了弄清情况，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把副国务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叫到国会山来进行一次内部情况介绍。威利参议员提出了我的提名问题。

威利：嗳，史密斯将军，把您请到这里来，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也许您不但能够谈谈您今天为之在这里露面的局势，谈谈您能够从中央情报局弄到的这类情报，因为您是它的老首长，而且您也能够对这个我认为是重要的问题提供某些情况，那就是，如果您同国务卿商量过的话，你们大概已经商量过，关于波伦先生的提名的行动是不是应该推迟，或者是不是应该赶快进行，并且任何考虑都要拖延到星期二再作决定。我想得到您的判断，如果这是根据国务卿和您自己的判断，认为最好是赶快确认那个提名，或者根据这些世界大事而把它推迟一步。

史密斯：主席先生，我同他商量过了，并且我现在有机会提到这一点，感到很高兴。我们觉得，从这个危机来看，凡是可以做到的事情都应当去做，以促进它的发展。我们越早到那里越好；因为将有一系列极不寻常的事态发展，这样或者那样，而波伦先生，当然罗，也许是我们目前所能物色到的最合适的人了，应当在这个关键时刻到那里去，并提出报告。

参议院会很快确认我，这在我心里是毫无疑问的了。我们作了动身的准备。就在这个时期，新上任的负责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科特·麦克劳德开始对我表示怀疑。麦克劳德原是联邦调查局特务，以反共的狂热闻名于世。他当杜勒

322 斯的助手才几个星期，就以安全为名调走了二十来个国务院官员。我在国务院工作了近二十五年，从来没有就安全问题受到过调查。根据杜勒斯制订的办事手续，在一项提名送交参议院之前通常需要经过安全审查。我的情况是，政府急于派遣一名大使到莫斯科去，所以在提名的时候联邦调查局的审查才刚刚开始。流言蜚语很快就传开了，说麦克劳德根据政治上的理由反对我的提名，认为任命我是冒险的。

外交委员会本来决定于 3 月 10 日就我的提名问题进行表决。因为有流言蜚语，3 月 16 日又安排了一次证词听取会，表决日期定在下一天。

共和党右翼的领袖们觉得这是一个大可以争论的问题，就行动起来了。3 月 13 日，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参议员（麦克劳德当过他的行政助理）扬言，政府里的"高级"人士已经要求总统撤回我的名字。麦卡锡参议员告诉记者说，他正加入对我的战斗。由于强烈支持中国国民党人而被广泛地称为"福摩萨的参议员"的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威廉·诺兰参议员对我的提名表示怀疑。

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俄亥俄州的罗伯特·A·塔夫特参议员在电视论坛节目里出现，他对为什么会产生所有这些激动情绪感到大惑不解。他说，"这件事情不是重要到"非力争不可的。"我们的驻俄大使干不了什么事情，"他说。"他所能做到的，只是观察和汇报。他不会显著地影响我们的政策。"

内华达州参议员帕特·麦卡伦破坏了支持我的民主党人的坚强行列，声称我同雅尔塔协定的牵连足以构成他反对我

的理由。

到这个时候，杜勒斯变得神经紧张起来了。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说："奇普，我实在想知道你过去有沒有什么可能对你不利的行为。"我告诉他，我压根儿一无所知。他回答道，"嗯，那我就高兴了，因为我经不住再来一个阿尔杰·希斯呀。"

我后来听说，尽管提不出证据，杜勒斯曾一度考虑把我的名字从参议院抽回来，但是艾森豪威尔态度坚决，他说他本人了解我，并且他不能在麦卡锡势力面前屈服。事后艾森豪威尔对我说，曾经有人——他沒有说是谁——竭力劝他撤回提名，可是他拒绝了，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但也是为 323 我考虑。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杜勒斯是不是那个催着撤回提名的人。我相信，假如杜勒斯听从我的劝告同一些共和党参议员磋商一下，他或许会得到反对把我的名字送到参议院去的充分的不利反应，尽管艾森豪威尔可能会坚持这项提名。

杜勒斯也谈论了我的姻兄弟查理·塞耶的问题，当时他是驻慕尼黑总领事。麦克劳德曾经断言，因为查理有过一段同一个俄国女人有牵连的插曲，他不再适合当国务院的官员了。麦克劳德的这种说法我一无所知。查理从慕尼黑打电话来说，国內召他回来听候麦卡锡调查委员会诘询，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我力图劝他打消回国的念头。我确信他会有一段困难的日子，这不是由于他做了什么错事，而是由于麦卡锡的不公正做法。他刚回国，在他同一些新上任的国务院官员举行的秘密会上了解了那个插曲的性质之后，我们在我的办公室里见了面。在那里，大家一致同

意，因为查理希望写作，将允许他辞职。当时起草的辞呈里透露了一点事实眞相。查理写过一本关于苏联早期的有趣的书。决定辞职的眞正原因是想不让他母亲由于他的品行问题引起公开争论而感到难堪。

我渐渐地开始认识到，在一出远比对我的确认的表决结果更为重要的政治戏剧中，我成了一个中心人物。麦卡锡参议员及其拥护者正在企图取消总统根据宪法选择自己的驻在外国首都的代表的特权。而且，国务院的职业官员们在注视着我会不会象凯南一样，由于在另一届政府领导下执行过任务而被撇在一边。凯南已经被迫退休了，因为杜勒斯不愿给予任命。杜勒斯会为我战斗吗？如果他不为我战斗，他领导国务院就会遇到麻烦。雇员应对上级忠诚，同时头头也要对下面的人忠诚。我很难承认这样的事实，即我已经成了国务院处于绝境的一个象征。等到我开始明白了事情的眞相，我就振奋起来了。我欢迎这个为国务院辩护的机会。幸而，这一回杜勒斯看清了形势，他私下告诉许多人——我不在内——说，他认识到，如果得不到为他做具体工作的职业官员的尊敬和支持，他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活动。

324

第二次证词听取会预定在3月16日举行。然而，它不得不推迟了两天，因为当我在南卡罗来纳州向我姐姐告别的时候，我得了风疹。我刚刚回到华盛顿，我的医生把我隔离了四十八小时。

3月17日，第二次证词听取会的前一天，麦卡锡赤膊上阵了。他对报界说，“我要反对这项提名，理由是波伦在国务院的艾奇逊老班子里扮演了太重要的角色，以致不能适当地

代表本届政府，特别是在这个关键性的岗位上。”于是，他同上台才两个月的艾森豪威尔政府顶起牛来，他补充说，“在强行通过提名这件事情上，杜勒斯正在铸成大错。”

在举行第二次证词听取会那天，也是作为见证人的杜勒斯对我说，他觉得如果我们分别驱车前往国会山，那要好一些。他说，他认为如果我们俩不被照在一张照片上，那也比较妥当。我回答说，我根本沒有被照相的特殊愿望，不过我不大理解他的用意。他沒有再说下去，但是我猜想杜勒斯是在考虑我被参议院顶回来的可能性，他不愿同象我这样一个不可饶恕的人物有牵连，那怕是在一张照片中也罢。他的话使我怀疑他有沒有勇气顶住麦卡锡分子。

象前一次一样，第二次证词听取会是秘密的，当杜勒斯作证的时候我不在场。我听说他全力支持我的提名，但对我的某些观点表示怀疑。最后，在记录发表的时候，我看到了杜勒斯的证词。象国会大厦里任何别的人一样，威利参议员听到过一些流言蜚语，说我历史上发生过有损声誉的事情，因此他以抱怨的口气开始了这次证词听取会，他说两天以前，他要国务院从它自己的安全档案中提供一个有关我的情况的提要，而结果所得到的答复是沒有这类档案，因为从来沒有对我进行过调查。“据我看，这的确是很奇怪的，”委员会主席说道，“一个人在头等重要的国务院里，在绝密的岗位上干了二十来年，国务院本身竟然沒有对他进行起码的忠诚和安全审查。我希望杜勒斯先生解释一下，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的。”杜勒斯回答说，威利参议员得去问他的前任迪安·艾奇逊。他然后指出，他曾经亲自要求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而艾森豪威尔 325

总统给他澄清了问题，认为我忠诚可靠。

在列举了驻莫斯科大使的条件——“一个精通俄语、俄国的风俗习惯、苏联共产主义的手段和专门术语用语的人”——之后，杜勒斯说，“我们能够想到的唯一有资格担任那个可能是极端重要的、会影响美国福利和安全以及世界和平的任务的人物，乃是波伦先生。”

然而，由于谣言的浪潮在华盛顿一带流动，主要的问题不是我的资格，而是我是否安全可靠了。联邦调查局发现了什么呢？杜勒斯马上把话说到了点子上：

杜勒斯：一天以前我收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摘要。赞成的证明材料没有编成提要，只是列举了一大串证明波伦先生完全没有问题并且给予高度评价的显要人物的名单。

根本没有有损名声的材料，无论是怀疑波伦先生对美国的忠诚的，或者是暗示他在安全上有问题的，或者是暗示他以任何方式在言谈中泄漏机密或随便乱扯的，或者任何诸如此类的事情。

威利：我可以理解为没有明确的具体证据或者律师会认为是玩忽职守的证据吗？

杜勒斯：绝对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

塔夫特：您觉得有什么可以构成这类失职行动的哪怕只是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吗？

杜勒斯：没有，什么也没有。

杜勒斯一定已经知道人家会向他问起麦克劳德对我的评价，因为他赶快指出，“正如在任何出现报警信号的场合一样，我的安全官员把这一点提请我注意了。”然后他引述麦克劳德的话说，“这不是一个我能够自动地马虎过去的事件，因为无

论哪里发生了诸如此类有损声誉的情况，我认为我就有责任提请您亲自加以注意。”

正是这几句涉及麦克劳德的看法的话，对我的任命问题的争论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杜勒斯为我作的证词，虽然对我过去的交往采取慎重态度，还是直率而诚实的。尽管他屈服于右翼的压力，明确表示他不想把我置于制订政策的岗位，326 他对于我给他提供克里姆林宫情报的能力和我贯彻执行新政府外交政策的忠诚是深信不疑的。史密斯参议员这样提出了问题：

史密斯：根据您对波伦先生过去关于政策的看法的了解，您能保证没有什么问题会阻碍他成为国务院派驻莫斯科的百分之百有效的代表吗？

杜勒斯：根据我们当中同他有私交的人所了解的情况看来，也没有这样的问题——我可以顺便提一下，我曾经同先前的国务卿、现在的州长贝尔纳斯谈过，他为了一件事情打电话给我，他说，“派波伦到莫斯科去是一项挺好的任命，这件事必须完成。”他说，“我想不出谁能象波伦先生那样有资格去填补那个空缺。”

嗯，那就是贝尔纳斯州长的评价，我想我们大家对他都是高度重视和尊敬的。而他跟波伦先生的交往是很密切的。

州长说他对这件事情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我自己没有见到——可是他说那是在两天前在广播里讲到这件事情的。我找不到丝毫迹象，可以借此对波伦个人的忠诚或安全表示怀疑。

他没有给人说话随便的感觉，我也想不起来他泄露过秘密，正如几乎一切有资格的人相信的那样，我根本没有证据使我怀疑他是否适合于担任这项具体的工作。

希肯卢珀参议员对于麦克劳德所表示的怀疑进行了稍为

深入一步的探讨:

希肯卢珀:您的安全官员澄清了这个忠诚与安全案卷的疑点沒有呢?

杜勒斯:沒有。我告诉过你们,他说考虑到这么一个事实,即他的档案里包含着某些有损名声的情况,他不想承担澄清疑团的责任。他把事情推给了我,而在这种场合这是通常的做法。安全官员们的首要职责在于提出疑问,找出可疑的情况,我并不认为他们应当在这类事情上承担最后的责任。在重要的案件上,就象这一个,最后评价的任务应当交给上级官员。

在提问结束时,汉弗莱参议员问起有无必要在提名问题上采取迅速的行动。杜勒斯回答说,鉴于斯大林去世所造成的新形势,"这是眞正的当务之急……假如今天他〔波伦〕在那里,我想这对美国来说是有巨大价值的。"

杜勒斯说完之后,我被叫到会议室里再次询问。沒有什么新的东西。弗格森又是最沒完沒了的提问者。

接着委员会碰了碰头,以十五票对零票同意了我的提名。麦卡锡立即声明他要继续战斗,尽管他沒有时间利用提名问题小题大做。他建议总统查一查联邦调查局关于我的档案。3 月 19 日,在总统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总统竭力为我说话,断言我对于这项提名是确实当之无愧的。

第二天,杜勒斯勇敢地面对着眞正的问题。麦卡伦参议员坚持说杜勒斯为我澄清疑点给予信任是"干脆"置麦克劳德于不顾。他说,撤回我的提名是"严格考验"政府所作的要对国务院实行清洗的保证是否具有诚意。麦卡锡甚至走得更远。他谴责国务卿在其助手的职位问题上弄虚作假,他建议叫杜勒斯宣誓作证。在一次匆匆忙忙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杜勒

斯(威利参议员坐在他的旁边)说话时抛弃了和解的语调。他拒绝了麦卡伦的指责，他说如何处理我的提名，是“对我国政府是否按正常程序办事的一次严格考验”，说得具体些，就是要看看那种甚至缺乏“捕风捉影之谈的实质内容”的指控究竟能否得逞。他还说，在最后澄清我的问题方面，他和麦克劳德之间并没有分歧。

尽管对我的指控一直流传着含含糊糊的谣言，却并没有具体的说法。关于我档案中有损名声的指控，杜勒斯给外交委员会在口头上作了彻底的澄清，但是这些指控并没有列入很快就公布于众的书面记录。杜勒斯指出，司法部长和总统都看过联邦调查局案卷中的材料，对我可以充分信任这一点都表示满意。对于麦卡锡来说，那还不够。“我知道波伦档案里的东西，”他对记者说。“我了解他档案里的东西已经好几年了。”

我没有证据说明麦克劳德给麦卡锡提供了材料，但是我总感到有这么回事。3 月 21 日麦卡锡说，在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有十六页是“打得密密麻麻的”关于我有损声誉的材料。尽管有许多称赞的材料，他还是得出结论说，“按照我们的看法，他是不能信任的。”很受人尊敬的、保守的佐治亚州民主党人沃尔特·乔治参议员形容那些有损声誉的材料都是些匿名 328 信件、流言蜚语以及说我同某些“浪荡之徒”有来往的道听途说。我感到为难；我根本不知道档案里面是些什么玩艺儿。

在这前后，有一个传闻在国会山流传着，说是麦克劳德强烈主张不应该把我派到莫斯科去，所以他越过了杜勒斯，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白宫。据谣传，他同他的朋友、总统的国会联络

员米尔顿·珀森斯将军谈了两个半小时，催他们把杜勒斯叫去讨论这件事情。我到现在还不清楚这个传说是否真有其事，但是麦卡锡参议员在参议院的议员席上提到了这个传闻。无论怎样，总统对我的支持从来没有动摇过。

参议院关于提名问题的辩论于3月23日开始。旁听席里挤满了人，但是我没有在场；如果我去参加，也许不太合适。此外，我也想避开新闻记者，他们不断地追着要我发表意见。我通过新闻收报机了解辩论的情况，拒绝发表任何评论。

辩论以多少有点老一套的方式开始了。威利参议员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以关于提名问题的辩论的长篇回顾开始了这次会议。他很快地把焦点集中到对我的两项指控上——我同雅尔塔会议有牵连和我在安全上不可靠。由于涉及联邦调查局的审查的传闻，威利首先提出了安全问题，强调说明杜勒斯和司法部长赫伯特·布劳内尔已经证明我是清白的，前外交官员三人委员会也已经给我作了保证。至于在雅尔塔会议上，威利说我不过是个"技术人员"，因此，那里犯下的任何错误不能由我承担责任。"显然，"他说，"如果我们坚持换一个政府就要换一班人马这种主张，我们就永远不会有职业外交人员了。"

当时麦卡锡参议员犯了大错。因为谣传麦克劳德不仅拒绝澄清我的问题，而且还一直反对我的提名，麦卡锡建议把杜勒斯和麦克劳德叫到外交委员会来宣誓作证——类似阿尔杰·希斯-惠特克·钱伯斯那一类型的对质。言外之意是杜勒斯没有说真话，他扣压了一些有损于我的名声的情况，而如果麦克劳德能够不受拘束地泄露这些情况，那就能证明我在

安全上是不可靠的。这样一种污蔑并不投合塔夫特和诺兰的心意，麦卡锡对这两位参议员的反对是招架不住的，因为他们是共和党保守派的领袖。

于是麦卡锡建议由我自动进行一次谎言检查测验（尽管沒有提出最起码的根据说我作了与事实不符的回答）。塔夫 329 特被败坏参议院名声的行动激怒了，他试图进行干预。麦卡锡起初拒绝让步。当麦卡锡确实让步的时候，塔夫特脸红脖子粗地指出，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是反对使用谎言侦察器的。麦卡锡看不见自己制造的敌意，继续对杜勒斯的诚实表示怀疑，并且危言耸听地说起，我档案里的某些材料十分有损于我的声誉，以致如果不违反安全的规定，“我们就无法在参议院的议员席上加以讨论”。

关于安全审查问题以及外交委员会要不要调阅联邦调查局的判断摘要和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搜集的原始材料的问题，议会里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威利参议员说，讲到我“品格优良”的有“一百名德高望重的人”，“另外只有少数人提出了些微污点”。衣阿华州的吉勒特参议员提供了解决对我指控问题的唯一灵验的办法。他说，有一份来自一个自称具有一种能够查出人们道德败坏的第六感官的人的报告。吉勒特沒有指出其姓名的这个人说，他曾经注视过我，并且用他的第六感官断定我有一种缺德的倾向，因此我就不适合担任驻外大使。吉勒特说，这是外交委员会评价过的六、七份报告中的一份。另外有十五份报告，但是沒有一份是被认为重要的或者有可靠的论据足以推翻这项提名的。

这些涉及我的档案里到底有些什么材料的暗示，只是煽

起了把有损名声的材料性质弄个水落石出的欲望，第一天的辩论结束时，参议员们同意了塔夫特参议员的建议：由外交委员会的两个成员来审查联邦调查局关于我的安全档案的摘要。会议选出了塔夫特和斯帕克曼，他们于次日即3月24日在杜勒斯的办公室里花了两个小时阅读提要。他们沒有看到联邦调查局的原始材料，但是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保证，摘要中沒有遗漏任何有损名声的重要事实。我在我的办公室里等着，说不定参议员们要跟我谈话，但是沒有叫我。

然而，考虑到有关麦克劳德的爭论，塔夫特和斯帕克曼要他写一个关于他是否接触过他们所不曾见过的任何材料的书面声明。麦克劳德在一个表示凡是他所收到的材料都已转交杜勒斯的声明上签了字。换句话说，他从来沒有见过联邦调查局的原始档案；胡佛是看过原始档案的唯一官员。同杜勒斯以及塔夫特和斯帕克曼两位参议员一样，麦克劳德所接触过的材料只限于联邦调查局调查的摘要。

330 3月25日，辩论的第二天，塔夫特和斯帕克曼报告了他们对联邦调查局摘要的研究结果。塔夫特告诉参议院说，十六页有损声誉的材料大部分是那些在外交政策上与我意见不同的人的声明：

> 他们认为，在雅尔塔谈判中他所起的作用也许比别人为大，他接近艾奇逊先生超过了他们所愿意看到的程度。换句话说，那是一些跟波伦先生政治上有意见分歧的声明。
>
> 就我记忆所及，沒有一个人不是以这样的话来结束的：尽管他在政治上抱有不同的看法，他对波伦先生的人格、道德以及总的名望和信誉给予了充分的信任。

谁都沒有在任何地方暗示波伦先生的忠诚有什么问题，或者他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联，或者支持共产主义，或者哪怕是容忍共产主义。

当涉及有无理由可以认为波伦先生在哪方面不可靠的问题时，凡是提到这个问题的证词单单说起这一事实，即波伦先生多次同联邦调查局人员或国务院认为不可靠的人友好往来，并且在他家里宴请他们。

在证词摘要里，我找不到在我看来能够提出哪怕是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或者任何构成初步证据的东西，以表明波伦先生曾经在什么地方干了任何使他不可信任的事情。他的交往是任何人都可能有过的，无非是同那些本身又跟许多别人来往的人结交，同那些在波伦先生和夫人家里过夜或者度周末的人为伍。但是在所有的摘要里，我找不到任何东西足以构成凡是想得出来的最勉强的勾结罪的控告。

在我看来，沒有任何一点联想足以构成波伦先生方面有关恶行的即使是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控告或者有初步证据的指控。

所以我自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波伦先生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完完全全可以信任的，因此我愉快地向合众国参议院提出报告。

斯帕克曼参议员同意塔夫特的意见，他说“摘要里幷沒有暗示要对波伦先生的品德、正直或诚实的缺陷提出表面上证据确凿的问题”。他进一步说：“根据我的判断，沒有什么东西会引起任何通情达理的人得出结论说应该加以怀疑。沒有一个可以用来指责波伦先生的实例，或者任何可以引用来对他进行攻击的事件。”* 331

麦卡伦继续战斗，他坚持说，既然麦克劳德是国务院安全

* 这段话是不公开的，正如我当时开始了解我的档案内容的情况一样。

官员，应当听听他的证词。布里奇斯乘势进逼，对我进行了异常尖刻的攻击。在把我说成是“绥靖政策和遏制政策的代表人物”之后，他说“由于波伦先生自称是伟大的俄国问题专家，懂得俄国人的心理、语言等等，在雅尔塔会议上他怎么会认识不到我们正在被人当作马骑的呢？”过了一会儿，他把我叫做“有经验的失败者”，并补充说，“我发现，凡是波伦先生在场的每一次外交马市上，多数情况是俄国人得到肥壮的母马，而美国则以得到跗节内肿的驽马收场。”

最后，布里奇斯提供了一点新的证据来攻击我。他说，他已经核对了威利关于三位著名的前外交官员推荐我去莫斯科任职的声明。前大使格鲁和阿穆尔无法联系，但是布里奇斯在华盛顿的五月花饭店527号房间里找到了吉布森。因为吉布森患了心脏病，布里奇斯不能同他谈话，可是他通过吉布森的名叫施瓦茨的代理人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那三个人有没有同意波伦出任驻莫斯科大使。布里奇斯说，回答是“不，波伦先生的名字只是偶尔提起过，如果说他的名字确是提到过的话。他们并不是被要求去认可波伦的，而他们也没有认可波伦。”

威利跳了起来，说杜勒斯的话同施瓦茨的相反。因为论点混乱不堪，埃弗雷特·麦金利·德克森参议员和诺兰参议员就去打电话。德克森打给吉布森，后者坚持说三人委员会并没有被要求讨论莫斯科的空缺问题，也没有推荐谁去。诺兰打给杜勒斯，杜勒斯给参议院送去一份由格鲁、阿穆尔和吉布森签字的备忘录。该备忘录就许多外交岗位提出“某些推荐”；备忘录还附了一张外交官空缺和有希望被任命者的姓名

一览表。我的名字是被列为派驻苏联的。诺兰说，由于这封信里包含一些还没有宣布的任命，他不能随便宣读，列入记录。然而，麦卡锡并不满意。他要求诺兰把信给德克森看看，“以便证明它是否可靠”。诺兰的脸胀得绯红；他要求知道麦卡锡是不是“建议在参议院的会议大厅里对我的诚实提出异议”。他越说火气越大：“让我对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说，发生这样的事情这还是第一次。”麦卡锡对自己招来的不利局面茫然不知所措，卑躬屈膝地对诺兰说不要“这样激动嘛”。诺兰并不只是激动；他被麦卡锡的手法激怒了。最后，他在旁听席的一片喝彩声中说道： 332

作为合众国的一个参议员来发言，让我说，当一项提名从合众国总统那里送来，送到参议院议长的办公桌上，上面有“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签字的时候，我不需要把笔迹专家请来，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签名。当一封信从国务院，从一位国务院负责官员那里送到参议院的时候，我用不着把笔迹专家请来，鉴定一下是不是伪造了签名。如果我们对选举出来担任合众国政府高级职位的人这样缺乏信任，那就未免太可怜了；如果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工作，那就未免太可怜了。

但是，麦卡锡并没有罢休。他从旁听席的党羽里引来的一阵掌声中答复道：

议长先生，让我对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说，作为合众国的一名参议员，我对于我的职责所抱的见解显然有些不同于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当参议院负有确认或者拒绝某一个人的提名的义务时，我想在表决确认提名之前，我们应该尽量弄清有关那个人的全部情况。

据我看来，光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提名波伦这一事实，并不意

味着我们应当盲目地加以确认。如果非那样做不可的话，那就没有理由要由参议院来提供确认了……

如果我处在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的地位，在我发现有什么不忠实之处并且断定某个签名是否伪造，以及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一切情况之前，我就不会赞成波伦，不会投票确认他的提名。在提名一个人去担任我国驻莫斯科大使这样一项责任最为重大的职务的问题上，在提名一个二十六年来从未为反对共产主义而大声疾呼过一次的人的问题上，我并不认为我所采取的态度是不正确的。

我并不认为这是采取轻率态度的时刻。我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非常严肃的。

333 麦卡锡显然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以自己的策略使得塔夫特和诺兰两位参议员感到难受。这个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又补充了一件有损声誉的罪证来攻击我。他说他有伊戈尔·鲍戈列波夫的一份口供。此人曾任苏联外交部官员达二十年之久，在战争期间逃离俄国。麦卡锡说，鲍戈列波夫见到过苏联外交部档案中“波伦于 1939—1941 年期间在莫斯科提供的秘密报告”。麦卡锡引述口供中的话说：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秘密信件被直接影印下来，苏联外交部可以搞到，就因为这样，我记得看到过某些由查尔斯·波伦先生签名送往华盛顿国务院的报告。

据我所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全部高级人员中，只有劳伦斯·斯坦哈特一人被列为中间的，只有洛伊·亨德森一人被苏联当局列为敌对的。大使馆其余官员，包括查尔斯·波伦在内，都是显然被认为友好的。

必须指出，当我在那里时，所有外国驻莫斯科的外交人员都被分成三类：敌对的、中间的和友好的。

所谓友好，并不意味着那个人肯定就是苏联间谍或者同苏联特工机构有联系，我希望把这一点完全说清楚。

但是我们必须认为，当一个外国人的名字作为友好人士出现在名单里时，这就可能意味着，他或许被苏联特工机构视为情报的可能来源和把有关苏联的假情报渗进西方世界的渠道。

这份来自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此后也再没有听说过的人)的报告是大可怀疑的。亨德森从来没有在使馆与斯坦哈特共过事。显然，我的名字也不至于列入这份被断定是苏联对美国大使馆官员的鉴定表。推论出我被布尔什维克政府视为友好的判断是荒谬绝伦的。

这一天的辩论以纽约州参议员赫伯特·莱曼为我而作的一篇激动人心的发言宣告结束。他说，"在波伦先生的问题上所企求的仅仅是一个模式——这同反对其他许多忠诚的、埋头苦干的、诚实的美国人时所仿效的是同一个模式。除非现在的气氛有所改变，"他接着说，"否则我们的政府机构里除了对任何事情唯唯诺诺的人之外就没有别的人了。我们将不会有一个有胆量的人。他们都会惶惶不安，不知道两年、五年或者十年之后会有什么遭遇，到那时候，他们诚恳地、真挚地、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表达出来的意见说不定会被证明是不明智的了。"

334

次日即3月26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热烈赞扬了我，指出他认识我和我的"有趣的"一家人已经多年了，并且在巴黎时曾是波伦家里的座上客。他说我熟悉俄国人，献身于美国，担任这项工作是再理想不过了。

由于政府这时采取了全力以赴的攻势和麦卡锡得罪了有

地位的保守派，结果如何是不言而喻的。3月27日，格鲁的一封来信列入参议院的记录，信中说，他和阿穆尔对证过，一致认为他们确实曾经把我的名字列入被推荐任命的名单里。吉布森也写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杜勒斯表示已经决心提名我。吉布森说，因为他对我不熟悉，尽管格鲁和阿穆尔给予了"强烈的赞同"，他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在少数几个人再说了一些话之后，我终于以七十四票对十三票被确认了。那时我在维拉诺瓦的岳母家里。新闻记者们免不了跑来访问我，但我仍然拒绝评论这件事。我并不否认产生过情不自禁的胜利感。我愿意相信，这种感情是超出了我在一场赢得一个职位的战斗中取得胜利的个人满足的，为了这个职位，我已经锻炼了将近二十五年。这样一个胜利对我个人来讲自然是重要的。但是所发生的事件还含有更广泛的意义。对于不受政府更迭影响的职业外交人员来说，这个胜利给诸如麦卡锡和麦克劳德之类的政治迫害者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对杜勒斯来说，这次外交官士气所受的鼓舞对于顺利发挥国务院的作用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这个胜利对杜勒斯来说还意味着他——而不是麦卡锡或者麦卡伦或者麦克劳德——将掌握国务院的职能。对塔夫特、诺兰以及国会里的其他保守派领袖来说，这场战斗是无法同麦卡锡合作或者无法使麦卡锡感到满足的一个清楚的信号。在投票之后，立即有人问塔夫特，他会不会同麦卡锡决裂，这时尽管他回答说"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事实却是，从那以后他同这个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疏远了。对艾森豪威尔总统来说，这是他的政府同麦卡锡分子第一次严重的分裂。参议院同意我的提名

一事保留了他选择驻外代表的权利，并且向他表明，他随时有 335
力量压倒麦卡锡。对麦卡锡来说，这次失败肯定带来了最后灾难的预兆，尽管他还是沿着原先走过来的黑暗道路走下去。还要过一年多，麦卡锡才会受到参议院的谴责，但是这个行动却是无可逃避的。我感到自豪的是，围绕着我的提名而进行的斗争为制止麦卡锡进一步危害国家而作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奠定了基础。

在同麦卡锡的战斗中人们为我所作的宣传，除了产生其他的作用之外，还使我在美国出了名。不管好歹，我赢得了直言不讳的外交官的名声。当我从维拉诺瓦回来时，华盛顿的第一流记者在大都会俱乐部为我举行午宴。沃尔特·李普曼、阿瑟·克罗克、詹姆斯·赖斯顿、艾尔索普兄弟和其他人对我大加赞扬。我感到高兴，但有几分不安。

在向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接受任务提示期间，我去拜访杜勒斯，他问到了我的旅行计划。我说我将在个把星期内动身去莫斯科，途中在巴黎停留三、四天，在那里我的妻子将和我在一起。杜勒斯在同麦卡锡厮杀之后惊魂未定，呆头呆脑地说，“噢，您不觉得跟您的夫人同行更为明智吗？”

“请看在上帝的面上，您说到底为什么？”我问。

他回答说，“嗯，您知道，您的一部分档案里记载着有关私生活不检点的谣传，假如有夫人随行，看起来总会好些吧。”

当我告诉他说我不会做任何这类事情的时候，他说我不应该采取这种态度。“在选举运动期间，艾森豪威尔夫人陪着总统旅行，您想这是为什么？”他巧妙地问道。我告诉他我很遗憾，不过我不打算改变计划了。于是他就放弃了那个想法。

过了几天，杜勒斯说他想陪我去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告别。虽然这种做法是异乎寻常的，我不能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在去白宫路上的汽车中，我对杜勒斯说，作为外交学会会长，我感到有必要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国务院最近采取的一些行动所产生的影响。我说我不打算提任何具体事件，但是想告诉他有关挫伤一般外交官员士气的点滴情况。杜勒斯勉勉强强地回答道，"如果您一定要说，那就去说吧。"

336 在白宫里，我们泛泛地谈到了苏联之后，我把话题转到了外交人员的士气问题。我一提到这个问题，杜勒斯马上插进来问我要不要让他离开那个房间。我对他说不用，并且说，我要对总统说的话没有不可以在他面前说的。接着我提到了低落的士气，以及不知道颠覆活动调查下次要轮到哪里的惶恐心情。我只是稍稍深入接触到这个话题，艾森豪威尔就接了我的话碴。"噢，您说的是斯科特·麦克劳德那个家伙的任命问题吧，"他说，"嗯，我想那是我们方面的错误，不过我觉得，如果把他免职，会犯更大的错误。"我坚持说，我不是建议解除任何人的职务，但是，既然他提起了这个问题，我要说麦克劳德搞的并不是那种在外交官员中灌输信心的活动。我说，外交人员中若干最受尊敬的成员（总统很了解他们）正在考虑，与其忍受他们所感受到的迫害，还不如辞职不干。于是总统讲了一番道理，他说，四十来年的戎马生涯使他习惯于舆论界的任性，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挺起胸膛顶住，让风暴过去。因为对这个问题揪住不放没有什么意思，我也就没有继续说下去。

过去我同麦克劳德没有见过面，我被确认后不久，他在国

务院大厅里认出了我，并且作了自我介绍。他在千方百计阻挠我被确认之后，竟然好意思和我握手，我感到惊讶。他劝告了几句之后，我们就分手了。

1953 年 4 月 4 日，我的妻子和我启程赴莫斯科。我们改变计划一道前往，这并非由于杜勒斯的忠告，而是由于这样可使我们的孩子们早作准备。当我们在纽约登上了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的时候，我就把 3 月间那种不愉快的心情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终于踏上了去莫斯科的征途，在那里，布尔什维主义正面临着自从 1941 年希特勒进攻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337

第十九章　克里姆林宫换岗

我们于1953年4月11日到达莫斯科。在外交部的一名官员和美国临时代办雅各布·比姆的简短欢迎之后，我们就被送到斯巴索大厦去了。自从1945年我陪同霍普金斯同斯大林会谈以后，我沒有来过莫斯科。当时，这个国家正在从战争的毁灭和恐怖中痛苦地挣脫出来。1953年春天，城市的外貌并沒有根本的改变。街上的车辆多了一点。人民的穿著有所改善。商店的货架较前充实。建筑物多了一些，其中大部分是所谓新斯大林式的高层建筑，这是一种古典式和摩尔式以及一些莫名其妙的因素加在一起的相当糟糕的结合体。大力建筑公寓是后来的事情。总而言之，我发现变化不大，城市的特征还是老样子——冷酷，阴沉，单调。

斯巴索大厦倒是变化很大，而且都是向好的方面改变的。房间粉刷了，家具充实了，庭院打扮得漂漂亮亮。这座大楼比1934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可爱、舒适，当时它成了我在莫斯科的第一个家。

象其他的大使一样，我在斯巴索大厦把生活方式作了一些改变。首先办的事情之一就是雇来一名法国厨师长，他曾经是我国驻巴黎使馆厨房里的二、三号人物。新来的厨师长338使我们的餐厅成了莫斯科最好的就餐场所之一，但有时候我怀疑，为了吃几顿美餐，把他弄来是否值得。他爱搞女人，有

一天另一个佣人扬言要宰掉厨师长，因为对方调戏他的老婆。这个厨师长最后回法国去了。

比姆向我详细地介绍了苏联的情况。他在莫斯科的时间并不很长，但他是个精明的观察家，关于斯大林患病期间的情况以及这个独裁者死后发生的事件，他都使华盛顿充分保持消息灵通。对于我在华盛顿见到的比姆发去的电报，我有深刻的印象，想把他留下担任使馆的第二把手——参赞。可是杜勒斯想叫比姆参加政策计划处的工作，几个月后他调回华盛顿。过了几年，他出任驻莫斯科大使。

比姆和我讨论的主要问题自然是斯大林之死对苏联的冲击。杜勒斯除了要我密切注意事件发展趋势的任何迹象而外，没有给我什么指示。我不知道该怎样预料未来的事态发展，因为苏联简直是斯大林的产物。他对局势的控制达到了在几乎任何别的国家都难以想象的程度。他使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他的几次清洗几乎把国家弄得分崩离析，在纳粹进攻的时候已经把它带到了灾难的边缘。尽管入侵的震动很大，使斯大林有个把星期手足无措，他还是竭力振作起来，重建红军，领导俄国赢得了难以置信的胜利。在战胜的过程中，斯大林把苏联扩张成为一个帝国，象沙皇长期所梦想的那样统治了整个东欧，把1905年丧失给日本的所有亚洲土地作为战利品弄了回来，而且还要多。

在几十年的期间，他的名字被数以千计的社论、文章、书籍和影片所颂扬，实际是被神化了。每次提到他，总要使用“伟大的”、“胜利的”和“典范的”之类的形容词。他的话就是法律，他的心血来潮与他的言词有同等的分量。

约瑟夫·斯大林将永远是历史上最令人迷惑不解的人物之一。苏联的领导人同世界上其余的人一样，知道他是铁面无情、报复心重、冷酷残忍的，但是他的动机将永远是个谜。即使他的女儿斯维特拉娜，似乎也只能偶尔约略窥见他的个性。究竟斯大林不过是一个没有道德标准的现实主义者呢，还是一个由于偏执狂的驱使而不知不觉犯了罪行的怪物呢，339 历史学家将争论不休。从他的行动来判断，我相信他在世界怪物中名列前茅。当列夫·托尔斯泰伯爵说"设想一下拥有电话机的成吉斯汗吧！"这句话时，他一时成了真正的先知。斯大林给我的印象是，他同恻隐之心和其他人类情感是格格不入的。他不是不道德的；他只是超道德罢了。他不懂得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战时会议期间向他表达的西方思想或行为的任何因素。

斯大林残暴不仁的根子来自他的祖先。俄罗斯人是没有虐待狂的。他们不象纳粹分子。他们还保留着原始的心理状态，是不善于搞那一套的。他们是残酷的，他们是无情的，但他们不是没有人性的，不是心理上有病态的。斯大林不是俄罗斯人。他身上没有一点斯拉夫血统。他是格鲁吉亚人，而格鲁吉亚的历史是以复仇、阴谋、欺诈和残忍为特点的，尽管他们中间显然有许多品格高尚的人。他们是山里佬，其特性更象近东人而不象俄罗斯人。

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善于摆出宽宏大量的姿态，甚至对他的敌手也是如此。他曾多次摆脱了他那出名的疑心病去信任某个已经同他决裂的人。这样，当苏联驻罗马代办列昂·格尔凡德于三十年代叛党时，他答应不对格尔凡德或其家族

实行报复。格尔凡德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说明由于清党的关系他不再能够为政府工作了，但他允诺决不公开谈论苏联，或者给其他国家提供任何有损苏联安全的情报。斯大林完全信任格尔凡德的保证。象他类似的东方帝王一样，斯大林喜欢认为他自己了解他所能够信任的人，因而也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显示一下宽容。

斯大林除了是个天生多疑的格鲁吉亚人之外，还是个复仇心重的格鲁吉亚人。1928 年，当布哈林在巴黎的时候，他向包括第二国际某些成员在内的一些俄国革命者说起同一批布尔什维克的一次闲谈。那些布尔什维克各抒己见，提出什么是世界上最愉快的事。通常的想法都提到了，例如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之后的满意心情，或者出席音乐晚会。斯大林说那些统统都是错的。他说世界上最愉快的事情莫过于选择你的敌人，准备给予突然的打击，一下子打中要害，然后喝上一瓶红葡萄酒上床睡觉。

从斯大林在外国人面前的举动中很难看出这个人的真实 340 的性格或品性。许多外国人竭力想弄明白隐藏在黝黑的面孔和黑色的胡子后面的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但是没有成功。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以及 1945 年春他同霍普金斯会谈的十天中我所见到的，斯大林的举动堪称楷模。他很耐心，善于倾听人言，举止谈吐温文尔雅。在这个面具背后，看不出有什么禀性苛刻残酷的迹象——丝毫看不出他用以下令屠杀成百万俄国人的那种残忍。他总是彬彬有礼，讲起话来喜欢留有余地。

斯大林的面具有时偶尔滑下一点儿，这不是由于疏忽，而

是出于故意。例如，在德黑兰，他就把莫洛托夫叫来嘲弄了一通："过来，莫洛托夫，把你同希特勒签订的条约给我们讲讲。"他把重音放在"你"字上，而这个字眼是在同亲近的人私下说话时才用的，办公事的时候是不用的。这种细微的手法是故意向外国人显示，只有斯大林才是苏维埃世界至高无上的首领。

斯大林似乎始终能够完全控制自己，尽管我们知道，在纳粹发动进攻以后的那几天他并非如此。他总是专心致志地追求一项目标。他至少没有同外国人坐下来谈论琐事，互相怀旧。

我看到斯大林表现出某种超越表面情感的唯一的一次是在德黑兰举行的一个仪式上，当时丘吉尔赠送给斯大林一柄专为斯大林格勒城制作的宝剑，以纪念在那里对纳粹的胜利。剑上的刻词是："作为英国人民表示敬意的纪念品，由乔治六世国王赠给钢铁意志的斯大林格勒公民们。"斯大林的手颤抖得非常厉害，以致他把剑掉到了地上。他用一种低沉、沙哑的声音对赠送这件礼物表示深切的谢意，并请丘吉尔转达斯大林格勒人民对"国王陛下"的感谢。

尽管斯大林拥有控制苏联的一切——各种形式的舆论工具，有关军事、政治、经济问题的种种决定——这样一个无可估量的优越条件，尽管他无需对任何人感恩戴德，甚至不必考虑他可以操纵的舆论的要求，斯大林却不是他有时被说成的那种高超的外交家。他犯过严重的错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一个是1939年的芬兰战争，当时斯大林以为芬兰的工人341 阶级会举行起义，把红军当作救世主来欢迎。另一个错误是

对于希特勒不顾纳粹-苏联条约准备入侵苏联的警告置若罔闻，这个错误使俄国人在生命财产上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斯大林的最大错误之一是发动朝鲜战争。他对杜鲁门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差一点把苏联卷入一场同美国交锋的战争，而这种事态发展是他竭力想避免的。尽管苏联人沒有卷入战斗，这场战争还是促使美国承担义务，在世界各地反对共产主义的侵略，并成为军备竞赛的一个巨大因素。

显然，斯大林关于朝鲜问题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外部世界缺乏精确的了解。除了1907年有过短期的柏林之行，另一回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一次革命者大会，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德黑兰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之外，斯大林从沒有迈出苏联国门一步。而且，自从他成了苏联的主宰者之后，他遭遇到所有独裁者共同的命运——人家向他报告的是他爱听的消息，而不是眞实的情况。

事实上，斯大林似乎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群阿谀奉承的人。他们比革新者更投其所好。他不需要思想家，只需要执行者。

我想历史会表明，假如他对人道主义的考虑不是采取残酷无情和不为所动的态度，苏俄的工业化就决不会发展得那样快。在列宁去世之后，当世界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已经明朗化的时候，苏联人面临着重大的抉择。他们可以沿着托洛茨基试图唤起西方群众的道路前进，或者采取斯大林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把苏联建成一个现代工业国家。直到今天，苏联的形象都被强加在俄国人民身上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异乎寻常的牺牲所歪曲。如果照着托洛茨基的计划去

做，苏俄无疑会弱一些，但是，导致希特勒崛起的欧洲一系列可悲事件也决不是肯定会发生的。

斯大林得病的消息传来时，西方就曾断言，苏联肯定会在由谁继承的问题上发生大流血。比姆在向我介绍情况的时候指出，主席团（统治苏联共产党的核心组织的名称由政治局改为主席团，然后又由主席团改回政治局）在宣布了独裁者去世之后，对成千上万聚在红场的人们显然是惴惴不安的。所以它发表声明，告诫人民不要惊慌。在另一个步骤里，克里姆林宫表示格奥尔基·M·马林科夫被指定（或认为他被指定）为斯大林的继承人。事实上，还发表了一张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见的伪造照片，其中安进了马林科夫的头像。斯大林去世后几天，主要的工作分配给了三个人。马林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即政府部门的最高职务；拉甫连季·P·贝利亚留任内务部长，兼管秘密警察；莫洛托夫任外交部长。尼基塔·S·赫鲁晓夫被授予党的第一书记的某些职权，但沒有头衔。我沒有立即对这个集体领导予以评价。我对苏联问题的丰富经验使我认识到，一切重大事件都是秘密地掩盖起来的，小心谨慎是克里姆林宫奉为臬圭的特有行为。

我们有兴趣予以回答的第一批问题之一是，斯大林是不是被谋害的。谣传他不是自然死亡的。我沒有费很长时间就得出了结论：有很好的证据表明他是自然死亡的。有九名医生在诊断书上签了字。那九名医生都被允许享有行动自由的权利（后来有一名医生还参加了国际会议）。假如有什么阴谋诡计，为了防止泄露，医生早就会被逮捕。还有一项证据是，年过七十的斯大林在此以前至少得过一次中风。一个说法是

有一根血管破裂了，但我不知道是否属实。他可能是由于勃然大怒而发生中风的。

在比姆的简短介绍之后，我同使馆工作人员中某些其他成员见了面。我在过去几任的工作岗位上认识了他们中间的四分之三。这个班子比我1934和1938年在莫斯科共事时齐整得多。俄语专修计划收到了成效。几乎每一个使馆官员都能讲俄语。一等秘书艾利姆·奥肖内西不是俄国问题专家，但是他很能干。当比姆离职时，奥肖内西在我推荐下被任命为参赞。

使团不大。我们大约有一百名美国人和大约同样数量的俄国雇员。对于苏联这样一个重要的大国来说，这个班子是小的。然而，从我们同莫斯科的关系以及我们获取情报的门路被封锁这一事实来考虑，我们的人员是绰绰有余的。

343

我对使馆的组织机构没有大动。由于贸易和旅游业务只是点点滴滴地进行着，使馆人员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汇报政治情况和谈判争论问题。我们的武官在业务活动上经历了一段困难的时期。苏联人把正常接触和情报交换视为间谍活动。结果，在我在职的四年多时间里，就有七名美国武官被命令离开莫斯科，其中一次就有三人。由于受到限制，武官们只得依靠5月1日和11月7日红场阅兵式展示的军事装备这种可怜的线索。

我立即承担起大使馆的另外两项重要任务的大部分责任——使华盛顿了解斯大林之死对布尔什维克政府和克里姆林宫政策的影响，并就两国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朝鲜战争）进行谈判。

那时关于苏联政治事件的消息来源同斯大林时代一样受到限制。克里姆林宫沒有人愿意向外国人发表提供新闻的谈话。我们必须仔细阅读报纸，同别的大使交换情报，从美国记者那里了解一些道听途说的话(我同这些记者每周见面一次，并且常在一起玩扑克牌)。

我的第一项正式活动是到离我办公处只隔几条街的外交部去。我在大门口受到警卫的查问之后，被护送去乘一座电梯，然后被带进莫洛托夫的办公室。根据惯例，我把国书的副本和我准备在拜访名义领袖苏维埃主席克里缅特·E·伏罗希洛夫(我在以前的任上就认识他了)时的致词抄件递交外交部长。板着面孔的莫洛托夫在答谢我对斯大林的去世表示同情的例行客套时，感情激动得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几天之后，我在我的主要官员陪同下在克里姆林宫向伏罗希洛夫主席呈递了国书，并且就希望增进美苏关系的问题说了一些沒有害处的话。从这时起我就是正式的大使了。

我沒有企图晋见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或其他任何苏联实权人物，这种做法在当时是独特的。我对他们会不会接见我表示怀疑。何况杜勒斯并不赞同这类接触。他对于同苏联官员的任何个人联系似乎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担心。我不知道他是否认为这种影响是腐蚀性的，但是他相信，如果别人看见美国人同俄国人友好交谈，全世界抵御共产主义的意志就会受到削弱。我并不赞同国务卿疏远俄国人的观点，但是我也看不出力图开导他们会有多大价值。我从来不相信那套向俄国人献媚以博取青睐的做法，而这却是许多美国人和外国人所主张采用的策略。由于苏联社会的关闭性质，我们自己

344

也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这就是说，我们不要显得过分热心于讨好别人而降低身分，但是我们不应当错过同苏联官员交谈的任何机会。

在几乎任何其他国家，都会有广泛的机会同政府内外的许多个人讨论象斯大林去世这种重大事件的意义。在莫斯科，至少是在斯大林死后的许多个月中，根本没有同俄国普通公民接触的可能性。我们所保持的这类接触几乎完全局限于苏联外交部或有关部门的官员，处理的是两国政府之间的特定问题，通常是琐碎事项。

苏联的冷淡无疑是官方的政策，它使得某些俄国人感到烦恼。在行动受阻挠的人们中间，就有葛罗米柯夫人。在战时的华盛顿，我的妻子(她会讲一点俄语)作了特殊的努力，利用同葛罗米柯夫人见面的次数有限的机会同她建立友谊。她是羞怯的，常常很孤寂，因为她的丈夫经常外出旅行。在我们到达莫斯科之后不久的一次法国招待会上，葛罗米柯夫人热情地向阿维斯问候。葛罗米柯看上去不大高兴，但还彬彬有礼。友好、聪明、有教养的葛罗米柯夫人显然感到苏联生活的种种约束使她不舒服。人们不允许她寻求阿维斯的友情，只在官方的场合才能应邀前来。尽管她常说想请阿维斯和我到他们的寓所去，她却从来没有兑现过。事实上，在我们在苏联度过的全部岁月里，我们从没有被请到私人家里去作客。

当我到达苏俄时，敖德萨是除莫斯科之外向外国人开放的唯一城市。如果我要到离莫斯科四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就得有外交部的许可。我相信，这个禁令之所以继续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美国也给苏联外交人员规定了类似的

345 限制。尽管我们两种制度不同，我从来就不完全赞同在旅行条例方面采取绝对以牙还牙的办法。作为一个独裁主义的国家，苏联不会由于限制了外国人而受到苏联人民的批评。在美国，除非官员们能够证明有军事秘密需要保护，美国人民对于种种限制是很不满意的，美国报界对此还屡次加以批评。假如一个国家不是极权主义的，它就不会全国采取一致的行动。然而，就象春天慢慢消逝而夏日渐渐到来一样，苏联的其他地区也开始开放了，从那时起一直到1957年我离开时为止，我有机会经常外出旅行。我们漫游了中亚、乌克兰、高加索、克里米亚和极北地区。

作为大使，我始终受到当局这样那样的监视。当我到达莫斯科时，经常有四个保安警察跟着我。不论天气多冷，他们日日夜夜呆在我的住宅外面的一辆汽车里。当我的妻子和我上戏院时，两名保安人员就呆在看得见我们座位的地方。当我们上馆子时，同样是那两个人就坐在同我们保持适当距离的桌子边上。我们终于同这些人搞得挺熟，有时我们还可以说几句打招呼或者告别的笑话。我偶然请他们抽烟，他们也欣然接受。

我们多少有点怀疑苏联政府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安装了窃听器，听到了我们口授笔录和谈话的内容。当1953年春天使馆新楼正在修建的时候，使馆的保安人员整天戒备以防在最高的两层楼——七楼和八楼，我的办公室就在那里——安装传声器。糟糕的是，由于疏忽和为了节约开支，夜间没有人监视。过了几年，在我离开莫斯科很久之后，在那几层被认为莫斯科最安全的楼里发现了四十三个窃听器。这并不意味着苏

联人弄清楚了任何眞正的秘密。我始终假定我向秘书大声口授的几乎全部内容都是被苏联政府录了音的。在涉及眞正敏感的、对苏联政府重要的情报，例如提出美国政策行动的建议时，我常常把材料用普通写法写下来。大多数普通文电是沒有任何重大意义的，因为苏联人清楚地了解我们对苏维埃制度的总的态度，苏联保安警察听到什么不客气的话甚至都不会感到吃惊。

美国外交业务的一项原则向来是这样，作为总统的个人代表，大使在地位上高于派往驻在国家的任何其他政府官员。在贯彻这条原则的过程中，违背的多，遵守的少，一个软弱的大使可能不知道国防部、原子能委员会和其他部门的代表在干些什么。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按理是归大使领导的，他知道使馆人员中谁是属于中央情报局的，不论其头衔如何，并且一般说来他了解他们的活动。但是，如果大使不知道他们活动的详细情况，那有时倒是明智的。万一一个特工人员或一项秘密活动被揭露了，大使可以理直气壮地否认了解其事。据我所知，无论在莫斯科，或者后来在马尼拉或巴黎，沒有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是想在我手下越权或者背着我活动的。 346

在苏联，凡是使馆人员都应服从大使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他们不得自由行动，因为经常存在着苏联试图腐蚀美国人和网罗他们充当间谍的危险。大使的首要惯例之一就是把这种危险告诉全体人员和新来者。每一个人都得到这样的指示：如果他同苏联当局发生纠葛，应该立即向他的上级汇报。在我担任大使的四年多时间里，大约发生了十二起事件，受处罚的多半是办事人员，只有一起是安全官员，通常与妇女有

关。秘密警察用红外线摄取犯罪照片，然后竭力想拉那些美国人充当间谍。所有那些人都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了那个国家。由于这个问题，大使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对工作人员严加管束。派往莫斯科并不是好差使，对办事人员来说，尤其是如此。由于难免遇到讹诈的圈套，不许他们被苏联女人所纠缠。如果他们俄语讲得不好，连戏院也不让去。沒有正常的娱乐活动；生活冷冷清清。

在这种气氛中，使馆人员只好自寻消遣，有时候竟采用非常荒唐的办法。有一回，一些海军陆战队的警卫向照料他们寓所的俄国女佣人解释为什么某个队员如此愁眉不展。他们告诉她说，一个海军陆战队员能够得到提升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最亲近的亲属杀死。由于那个愁眉不展的队员沒有亲属，他就无法升级。那个女佣人尽管容易受骗，却不相信有这种事。于是他们就让那个“愁眉不展”的队员象死人一样躺在347 一个灌满了染成红色的水的澡盆里。他们悲痛地告诉女佣人说，他自杀了，并且把血淋淋的现场指给她看。

我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拜访其他使节。这些访问是耗费时间而又往往并无所得的，可是在莫斯科，这种拜访相当有趣，因为各个大使对于苏联的情况各有一番见解。尽管对所有的使节走访一遍需要一年半，可是我过了不久就同英国和法国大使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英国大使是阿尔弗里·盖斯戈因爵士，他在那年年底前由威廉·海特爵士接替，后者同我在巴黎共事过。法国大使是路易·若克斯，我同他交谊很深。当若克斯在法国外交部担任文化科长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是一个出色的同僚。三个大使馆密切合作，交换情报，互相传

看它们的汇报。

斯大林统治时期的严酷措施并未取消，但是几乎从一开始我就看出根本变化的苗头。最初的征兆之一是贝利亚对“医生阴谋事件”的指责，斯大林显然是打算以这个事件为借口发动一场新的清洗的。贝利亚断言，医生们（多数是犹太人）“阴谋”杀害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说法是“捏造”，并且释放了被告。另一个更重要的迹象是《真理报》的一篇文章，该文指出了“个人迷信”的罪恶和独断独行的危险。没有提到斯大林，但是文章的矛头显然指向他的独裁。这是第一次重新肯定了集体领导的原则，据说列宁是拥护这个原则的。随着时间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过去，苏联报刊上越来越激烈地使用“个人迷信”这个字眼来描述斯大林统治下的弊端。这个字眼并不仅仅是个委婉的说法。在苏联的重要报刊上登载的许多文章指出，一个人独揽大权和对他阿谀奉承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个人迷信”一词终于笼罩了斯大林统治下的整个政权结构。据我猜想，1953 年采用这个比较温和的字眼，是为了避免因全面谴责斯大林而引起全体人民特别是知识界的震动的。斯大林曾经被人崇拜了二十五年。如果让苏联人民突然得知他们的偶像原来不仅脚是泥塑的，而且手上沾满了鲜血，这对共产党来说是太冒险了。直到 1956 年才摆出事实，指名道姓地谴责了斯大林。

当这些变化的模糊征兆在国内舞台上出现的时候，对外政策方面发生了更为明显的转变。马林科夫呼吁为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努力。4 月初，外长莫洛托夫表示要进行一次新的接触以实现朝鲜停战。《真理报》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 348

动，拿整个第一版刊载了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苏联新领导人解决所有国际问题的一篇演说。接着，苏联政府撤回了斯大林于 1945 年向土耳其提出的对坎省和阿尔达汉省的主权要求。6 月 8 日，莫洛托夫告诉南斯拉夫代办说，莫斯科打算派一名大使到贝尔格莱德去，这是为了弥合同铁托的嫌隙而采取的第一个步骤。苏联的报刊还停止了仇美运动。

6 月份，谣传新领导人准备改变对德国的政策。严厉的经济管制取消了，但我无法肯定关于政治改革的传说对他们究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或者这些传说是不是仅仅出于外国人的臆测。接着，6 月 23 日东柏林工人举行暴动。暴动使得苏联领导人目瞪口呆，他们仍然不能想象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有可能反抗苏联。莫斯科来了个引人注目的转变，承认工人曾经反对了一个共产党政权。所有的苏联报纸详细报道了暴动的情况，有些报纸还竭力主张对群众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尊重。我在一份给国务院的电报里提出告诫，不要过分指望会对东德放松苏联化。我写道，假如斯大林还在世，几乎肯定会强化专政。暴乱蔓延开来了，胆战心惊的苏联领导人动用了二十多个师的力量来镇压这场叛乱。尽管如此，改革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我继续努力解决若干有碍苏美关系的问题，其中的多数在国际范围内是比较微不足道的，然而对有关的人来说却是极其重要的。例如，苏联人同意使馆人员使用莫斯科地区的三处湖滨游泳场，这些地方以前我们在理论上是可以去的，但是，把我们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某些地区的政策使我们无法前往。另一个问题涉及六个美国公民的俄国妻子。在这

些妇女中，有几个是在战争期间同隶属于驻莫斯科军事使团的美国军人结婚的。另外几个是嫁给美国记者的。在战争快 349 结束时，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禁止俄国人同任何外国人结婚的法令。英国也有些公民处于同样的境地，1945年12月贝文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问题，斯大林采取了惯常的回避态度，说这是最高苏维埃的意志，他无能为力。实际上这个禁令目的在于防止苏联在东欧的占领军士兵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外国人结婚并带回本国。苏联部队在东欧国家根本沒有发现苏联报刊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的一切可怕的东西。看来很明显的是，苏联当局担心较好的生活条件，特别是资本主义妇女的诡计对苏联军队的影响。他们的粗鲁办法就是禁止一切同外国人的婚姻。那些同外国人结婚的俄国妇女受到了处罚，尽管她们的要求不过是想同她们的丈夫团聚罢了。斯大林死后，政府很快就开始同意这些外国人的妻子迁居国外。六个美国人的妻子终于全部获准出国。

具有更大重要性的是朝鲜停战的谈判，这个谈判仍然在拘留在南朝鲜的共产党战俘要不要违反他们的意志强迫遣返北朝鲜和中国的问题上停顿下来。5月18日，国务院就要不要请莫洛托夫帮助使共产党人接受联合国在板门店谈判中的"最后立场"的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杜勒斯显然认识到，大使毕竟是个顾问）。我回答说，鉴于对共产党拒绝先前的建议所进行的宣传和联合国内部的不团结，如果我们的立场实质上沒有变化，我怀疑直接接触会产生什么作用。我在电报中对杜勒斯说，"另一方面，如果在联合国的建议中作些修改，这样一种接触或许会有眞正的价值。"我在建议暂缓释放战俘作为向

共产党人让步之后，就以如下的话结束了这份电报："我深深感到，特别是在同苏联政府打任何交道的时候，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全副精力放在决不退让的绝对重要的问题上，并且力图使苏联人深刻认识到，除非接受这些基本立场，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停战。"

5月25日，联合国在板门店提出了最后建议，作出了一些让步，但是没有同意强迫遣返战俘。次日，我收到从百慕大 350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那里同英国人和法国人会谈)发来的一份电报，指示我同莫洛托夫接触不必犹豫。两天之后我去见莫洛托夫。我坐在他会客室里一张棕色的大皮沙发上，告诉他说，美国已经提出了停战的最后建议，它反映了我们最大限度的让步。我在一张普通的纸上列出建议的六个要点作为备忘录递交给他。这张普普通通的纸象征着我们并不想把苏联推到那种使它觉得它收到了正式的请求，并且必须替它的盟国北朝鲜和中国撑腰的境地。他的译员翻译这六点时，莫洛托夫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几次打断翻译要求予以澄清。在译完第六点即要求召开政治会议之后，他问到将有哪些国家参加。我说我不知道，但是对于会议的组成在板门店并无争执。

于是我强调说，这个建议是我们"最大限度的让步"，并且逐点说明我们为满足共产党的要求已经做到仁至义尽。我说，既然过了三个月北朝鲜人和中国人仍然没有能够说服战俘转变念头，那显然只有采取某种形式的强迫行动才能把他们遣返。对于我这番话他并未争辩。我说，如果象共产党所建议的那样，要末在战俘营里永久监禁，要末遣返，而没有其

他抉择，这种建议实际上等于使用武力，对此他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我慢条斯理、字斟句酌地告诉他，如果北朝鲜人和中国人拒绝这些建议，那就会扑灭停战的希望，结果产生美国政府极其眞诚地想要避免的那种局面。

莫洛托夫问起美国政府是不是希望得到苏联政府对这个备忘录的答复。我说这次交换意见不是正式的，无需答复，不过我提起了莫洛托夫在4月2日说苏联政府准备合作以实现停战的话。莫洛托夫说他将把我的话告诉他的政府，并补充说苏联确实关心在朝鲜建立和平。当我说美国政府打算不宣布我的这次访问时，他点头表示同意。保密是至关紧要的。

在我给杜勒斯汇报这次会面的电报中，我的结论是："象我通常同莫洛托夫打交道时一样，关于苏联政府对这些建议会在行动上作出怎样的反应，我连试图预测的根据都没有。我唯一可以汇报的是，他十分专心、非常认眞地倾听了我的话，没有作出任何形式的宣传性声明或质问，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为共产党的立场辩护或撑腰的企图。他两次提到政治会议的成分，这可能是一种迹象，表明当前苏联的兴趣所在。" 351

这次精心安排的接触，目的在于加深苏联人对于扩大战争的恐惧，而不是迫使他们铤而走险。当时我不知道美国在与此有关联的行动中通过印度暗示中国它可能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在我同莫洛托夫谈话之后若干小时，北朝鲜人要求过两个星期再答复我们的建议。6月3日，莫洛托夫召见了我，用俄语向我愼重地发表了一个他显然已经背熟的口头声明。我听了一遍俄语的，然后听了莫洛托夫的译员翻译的英语译文，自己也背得下来了。他说："苏联政府注意到您于5月28

日通知我的关于板门店停战谈判的情况；如您所知，这些谈判的结果并不取决于我们，但是正在被满意地注意到的是，成功地结束停战谈判的道路已经规划出来了。”

莫洛托夫无意深谈，我也觉得向他发问并不明智，因为这个声明清楚地意味着苏联已经说服北朝鲜和中国接受我们的提议。我向他致谢，并对他说，如果他的声明意味着朝鲜的停战，这可是好消息。他未加评论。

过了两天，当法国大使若克斯直截了当地问我是不是同莫洛托夫谈过朝鲜停战问题时，出现了一场惊慌。他说这个小道消息是东京的法国大使馆传来的。我说他肯定懂得，在这谈判进入关键性时刻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谈论这件事情。若克斯说，他不仅理解稍有泄密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而且他还打算告诉巴黎说他不愿逼我回答。同我一样，他不想向全世界宣告，说苏联人正在压他们的盟国向我们让步，从而使他们难堪。杜勒斯对泄密现象深感不安，但是我同莫洛托夫密谈的消息没有进一步走漏，签订停战协定的谈判，除了在交换战俘问题上争吵之外，就如同俄国人所说的，“象在黄油上进行着”①。当南朝鲜总统李承晚释放共产党战俘的时候，我担心苏联人会取消停战协议。然而，维辛斯基（当时是莫洛托夫的助手）发表了一项谴责李承晚而不是谴责美国的声明。7月份签订了停战协定。华盛顿曾经一直开动脑筋，想要解决战俘这一难题。我是那些认为释放战俘会使谈判陷于僵局的人们中间的一个。李的行动表明，我们在他那样做之前，本来早就可以打开战俘营的大门，让战俘一走了事。

352

① 意即进展顺利。——译者

7月7日，在苏联呆了三个月之后，我觉得我已经能够就斯大林死后的事态发展作出某些结论了。我把我对新政府的初步分析写信给杜勒斯说，已发生的事件不能草草地归结为"无非是另一场单纯地或甚至主要地为了迷惑和分裂西方而采取的和平攻势。据我看来，这里发生的事件积累起来已经成为某种重要得多的事情，它同我们从战争结束以来所见识过的标准宣传姿态相比，一方面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又构成了大得多的危险"。

在强调说明苏联还是一个继续敌视不归它控制的任何国家或机构的极权国家之后，我认为有理由假设，苏联将回过头来利用外交作为推进它的利益、特别是防止西德重整军备和避免一场全面战争的手段。我断言，在对东欧卫星国和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方面几乎明确地一定要发生改变。对内，我看到了一个不那么严酷的政权，它将首先强调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它将约束警察的专横行为，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系统地推翻斯大林永远正确的神话，并且把他贬低到"共产党神庙里的低级成员"的地位。

至于谁掌握权力的问题，我写道，"我们简直不知道苏联政府的上层正在发生何种形式的结合或竞争，因此，我所能汇报的只是，自从斯大林去世之后，与一人专权截然相反的集体领导原则在这个国家已经得到始终如一的和坚定不移的发挥。这不仅在中央报纸上阐述得很清楚并在党的理论刊物上从理论方面加以论证，而且据我们所知已经在全国的工厂和党的会议上深入地作了传达。

"如果试图断言这种非个人的集体领导的试验会无限期

353 地延续下去，那将是愚蠢的，我们决不能排除最高层发生倾轧或可能根本改变现有路线的其他某种事件的可能性。作为一种见解，现在只能这样说：假如从目前的倾向彻底地倒退到斯大林统治时期所特有的专制恐怖的状态，那就会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忍受极度的痛苦，使这个制度完全改变性质。”

我写下这几行字之后三天，这个“团结的和不可动摇的”集体领导出现了第一道裂缝。政府宣布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被捕。

第二十章　集体独裁

1953年6月下旬，我要求从法兰克福派一架空军运输机接我和我的家属到法国去消度一个月的假期。我在苏联才呆了三个月，大使的津贴使得生活比先前几次出国优裕多了。斯巴索大厦是一个舒适的住处。我们在乡间还有一所别墅。乘坐挡板上插着星条旗的轿车漫游莫斯科是比较惬意的。尽管有这些变化，苏联仍然是一个难以忍受的社会，我们想要离开。我已经一年多没有休假，看起来现在是去度假的适当时间了。新政权牢牢地掌了权，夏季的郁闷天气已经开始。空军星座号定于7月6日到达，我们计划在下一天动身去巴黎。

在我们打算离开前一周，《真理报》上的一条关于新编歌剧《十二月党人》第二次演出的简短新闻引起了一阵街谈巷议，说是内务部长、秘密警察头子拉甫连季·贝利亚被清洗了。在列举出席莫斯科大剧院观看演出的政府和党的领导人姓名时，这条新闻里没有提到贝利亚。经过和使馆人员讨论之后，我电告华盛顿说，没有提到名字“未必含有重大意义”，因为苏联领导人的行踪是很少具体报道的。我指出，贝利亚可能在度假或出差，并补充道，如果发生任何重大的政治事件，我们会迅速探听出来。

根据我个人对苏联领导人了解的程度，我接下去讲不出贝利亚的什么情况。我在战争期间的一次克里姆林宫宴会上

见过他一面，但是在雅尔塔会议以前我始终没有机会同他攀谈。在那里，在一天的午餐上，我坐在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阿355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和贝利亚之间。我替他们当翻译。话题之一是鱼类的性生活。我记不起那位英国大使和苏联秘密警察头目是怎么扯到这个话题上去的。也是在雅尔塔，怪人阿奇博尔德爵士在斯大林的宴会上站起来说，在为精神方面的东西如亲善、友谊、同志之情一一干杯之后，他要为“照料我们人身”的那个人干一杯。他指的是警卫这次会议的蓝制服士兵的头头贝亚利。丘吉尔咆哮了起来，身子从椅子上向前一凑说，“别啦，阿奇，别闹那个啦。”贝利亚是个圆胖、苍白、戴一副夹鼻眼镜的格鲁吉亚人。他沉默寡言。他看上去象个教员，秘密警察头子的一种特征；希特勒手下的希姆莱从照片上看也是这个模样。

7月3日，瑞典驻莫斯科大使罗尔夫·肖尔曼（他同某些苏联人有深交）告诉我说，他已经听说贝利亚被捕了。我在以后的几天里力图核对这个传闻，却找不到任何材料来证实，尽管有大量坦克散布在政府机关附近。我同美国记者们讨论这个传闻，他们在莫斯科交际很广，但也无法证实这个消息。我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为星座机在莫斯科降落，通常需要两个星期进行必要的安排。此刻飞机在几小时内就要从法兰克福起飞了。我要末找个在俄国人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借口取消这次飞行，要末去消度我的假期，而碰巧就在我离开的时候宣布贝利亚的被捕。最后我还是决定去休假。我们没有证据来支持这个传闻，即使传闻属实，我呆在莫斯科也不能大有作为。然而，我不留下来的主要原因是我坚信，即使贝利亚被

捕，也不会发生巨大的内部动乱，因为克里姆林宫需要和平以巩固新领导人的权力。我充分理解斯大林的继承者们所强调的集体领导。他们极可能会加强团结来对付贝利亚，因为他在掌管秘密警察的十四年中树敌颇多。

7月10日，当我呆在巴黎的"法兰西和什瓦泽尔饭店"里时，副国务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从华盛顿打电话告诉我，苏联政府已经宣布贝利亚被捕。他问我要不要赶回莫斯科。我说我完全愿意回去，但是我深信，牵涉的问题不过是贝利亚的完蛋，而这一逮捕也不会象某些专家所猜测的那样引起一场骚乱。贝利亚的亲密同僚也可能被捕，但是我在莫斯科的助手们能够汇报这类事态的发展。史密斯表示同意，并建议我回华盛顿去商量。 356

于是，在我的家属去马利奥尔卡的同时，我飞向华盛顿，在暮色苍茫中到达那里。一辆国务院的车子在机场上接我，把我送到杜勒斯家里。尽管杜勒斯在招待一些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官，他还是立即把我领到他的书斋里去谈话。他对贝利亚的被捕可能引起导致苏维埃政权垮台的争权夺利的流血斗争的前景感到精神振奋。我再次说明了近两个星期以来我一直说过的话——即我不赞同这种见解。我并不自称确有把握，因为局外人无法知道克里姆林宫宫墙里面的活动，但是我解释说，布尔什维克制度看来是经受得住贝利亚被捕事件的压力的，因为所有领导人都懂得两败俱伤的斗争的危险。

我往最好处猜的结论是，贝利亚之所以被捕是由于他拒绝把他的秘密警察置于党的集体领导之下。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对斯大林如何利用秘密警察一事记忆犹新，即使贝利亚没

有企图取得最高权力，他们也不能容忍他独断专行。秘密警察必须受到控制。

杜勒斯捡起摊在一张桌子上的斯大林著作《列宁主义问题》，开始读了一些有关夺取政权的段落，在这些段落下面有他划的记号。我告诉他，斯大林的著作对他死后的苏联关系不大。杜勒斯勉勉强强把我的话听进去了。最后取得了一致意见：我回到法国去，从那里注视莫斯科的事态发展。假如出现任何严重纷乱的迹象，我可以迅速回莫斯科去。我偕同我的家属在法国安安静静地度过了这个月的剩下时间，而贝利亚案件则在报刊上逐渐不再提起了。

回莫斯科的时候，我同我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大使们商谈，就这个案件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征求他们的意见。我电告杜勒斯说，克里姆林宫可能已经决定不对贝利亚举行公开审判。我指出，进行公开审判就得为贝利亚的出庭受审提出起诉理由，这就包含着一种固有的危险，并且会造成国际问题，因为他被控为企图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阴谋的代理人。

357 秘密审判贝利亚的计划直到12月17日才宣布。据指控，贝利亚从青年时代起就是外国特务，受雇于外国资本，这种说法是荒唐无稽的。贝利亚及其六名“同谋犯”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这一事实，证实了我的观点，即该案的真正要害在于秘密警察这个机构的地位问题。我在给杜勒斯的另一份电报里说，似乎集体领导者们力图使内务部置于党的最高层的控制之下，从而剪掉秘密警察的翅膀。究竟这个计划是否一开始就以贝利亚为牺牲品，或者究竟是否因为进行抵抗

他才被捕，这倒不是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剥夺一个人通过他所控制的秘密警察视同事们的生命如草菅的权力。我强调说明了抑制秘密警察对克里姆林宫的危险性，因为在涉及全体苏联人民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是经不起摧毁警察的权威的。

圣诞节前夕，苏联报纸宣布贝利亚及其六名同谋犯已被苏联最高法院的特别陪审团判罪，并于12月23日执行枪决。

许多专家对斯大林死后的时期估计错误。他们认为斯大林式的统治是苏联社会的固定不变的结构。他们希望，随着各个领袖力图接管斯大林的权力的斗争而来的，是一场剧烈的大变动。当贝利亚被捕时，这些专家期望这场斗争爆发为公开的搏斗。那些事件都被误解了，因为专家们没有能够认识到，苏维埃制度的某些方面无非是斯大林的意志的一种表现。斯大林的统治是一种以秘密警察为强制工具的个人行动。共产党尽管在表面上是统治力量，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组织机构的本来面目。据我看来，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在他死后很快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无论是国家的现状或者他们的人望，都不可能造出另一个斯大林来。我们迄今还不知道，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去世后的几星期内主席团里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的强烈印象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得出了必须集体工作的结论。我很早就相信新政权中起支配作用的因素不是一场争取权力以造就另一个斯大林的斗争，而主要是一个调整统治结构使之适应集体领导（称之为集体独裁更为恰当）的过程。主席团的成员都有足够的自知之明，认识到谁也没有充分的力量登上斯大林的宝座，至少是在开头阶段。斯大林曾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的盛衰浮沉，他 358

们的生死存亡，取决于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和衷共济。他们也认识到，国家经不起争权斗争可能带来的另一次恐怖。他们肯定感觉到了人民对于更加自由、更加富裕的生活的迫切希望。

新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把秘密警察置于该集团的控制之下。如果秘密警察置于一个委员的完全控制之下，委员会的统治就要落空，这是个常识问题。这个委员掌握着他那无孔不入的监视工具，就大可以对其他领导人施加压力。我不了解贝利亚如何垮台的详情，但我认为基本的政治事实是十分清楚的。按个人争权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而言，这种斗争是不存在的。这个结论的最好证明是主席团的其余九名委员照常供职。假如贝利亚有追求最高权力的动机，他在统治集团中总会有几个同盟者；否则他就注定会失败。他也许开始在警察机构中进行巩固自身地位的活动，排挤斯大林时代留下来的可疑助手，提拔自己的心腹。主席团里的其他委员认为这是危险的，要他刹车。根据一个言之成理的理由他公开予以拒绝，于是他被捕了。

贝利亚倒台以来的一切证据表明，警察确实已经隶属于党的统治集团——主席团。结果是，警察的飞扬跋扈和以恐怖行动作为施政手段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在苏联不见了。警察仍然存在，如果莫斯科的统治者们想利用它，它仍然会是威力无边的，但是，斯大林以来的恐怖的毒雾，不知何时警察敲门把你带走的惶恐，已经大体上消除了。破坏法律的人将被逮捕，法律禁止西方国家许可的许多东西。"社会主义的合法性"——除非你违反法律，否则不会被捕的观念——是灵活

的，但同斯大林时代相比肯定是前进了一步。

平安无事地排除了贝利亚这个障碍之后，新的苏联领导人继而废除了斯大林的许多政策。在8月8日的一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当马林科夫以其优美、精确的俄语宣布发展消费品生产的政策以代替十分强调重工业的政策时，我坐在外交人员席上。他在发言中说明要以鼓励私有成分但不改变集体 359 化这一基本政策的办法，刺激在许多方面成为苏联经济中最落后因素的农业的发展。在我给国务院的分析报告中，我把这篇发言称之为“自从斯大林去世以来关于当前苏联政策的最重要最现实的声明”，并说马林科夫无疑是苏联领导人中主要的人物。

这个分析同一个月之后赫鲁晓夫被正式任命为共产党第一书记并不矛盾，第一书记在许多方面是苏联最重要的职位，因为党是绝对的权力中心。由他而不由马林科夫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通常是对外交界和报界保密的）作最重要的报告这一事实并不使我惊奇；看来分工同集体领导是一致的。赫鲁晓夫指出，苏联农业的状况远不是良好的，在农业制度方面必须实行某些非常重大的变革。首先，必须对农业集体化制度下允许农民保留的小块自留地实行减税。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农庄制度搞得很糟的另一迹象，但更重要的是，这是正在实行的非斯大林化发展到何种程度的一个线索。

我电告华盛顿说：

赫鲁晓夫已经被提升到伏罗希洛夫前面去了，在官方排名时他现在名列第三。此外，他似乎接近马林科夫，在两人都出席的会议上，他就坐在马林科夫的旁边，并且处处表现出踌躇满志和信心十足

的样子。尽管在官方排名时莫洛托夫名列第二，他似乎有点超然物外，在宣布把贝利亚免职的法令时，他相当引人注目地沒有和别人一起鼓掌。这些迹象当然不能据以作出结论，但是，从恢复党作为（居于政府机构之上的）国家支配力量的作用这种显然可见的企图看来，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成为马林科夫的亲密合作者，似乎是合乎逻辑的。

新领导人信心增强的迹象继续出现。一本贬低斯大林的新的历史书出版了。马林科夫嘲笑了美国拒绝俄国象棋选手访问长岛的格伦湾这一举动，因为它位于为了对苏联限制美国人的旅行范围实行报复而规定的界限之外。我曾提醒过杜勒斯，苏联人是会利用这样一种闭门羹而大做文章的。远为重要的是，8 月 20 日，在马林科夫暗示了之后，克里姆林宫宣布苏联试爆了第一颗氢弹，从而打破了美国在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武器方面的垄断地位。

360

10 月 6 日，我惊奇地注意到，使馆门前秘密警察的黑色汽车不见了。新任英国大使威廉·海特爵士告诉我，自从一个月前他到任以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已经不再钉他的梢了。随着“保护性监视”（俄国人当时是这样称呼于 1918 年开始的这种做法的）的废除而来的，是一种较为友好的社交方式的建立。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开始为外国人举行更多的招待会，自由自在地周旋于宾客之间，他们的谈话也比我过去所听到的要坦率一些。11 月 7 日在莫洛托夫于斯佩里多诺夫卡宫即外交部大楼举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的招待会上出现了一次突破。

我的夫人和我在通常的音乐合奏和丰盛的便餐的过程中

始终同其他大使坐在一起。当我们要退席的时候，莫洛托夫传下话来，说他希望英国、法国和美国大使到他那一桌就座。尼古拉·A·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都在那里，并且根据某种奇怪的挑选方法，还有阿根廷、缅甸和中国的大使。

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卡冈诺维奇隔着桌子打招呼，问我有没有忘掉"俄国式的"喝酒法。我微微一笑，说我肯定还记得用黑胡椒泡的伏特加酒。于是卡冈诺维奇递了一瓶给我。当我斟满了自己的酒杯的时候，坐在我右侧的一个秃顶的、蓄着山羊胡子的小个子用地道的俄语评论起来："啊，这可是乌克兰人喜爱的杯中物。"我问他是否乌克兰人。他稍稍挺直了一下身子，回答道，"不，我是德国人。"我这才知道原来我的座位挨着东德共产党的头子瓦尔特·乌布利希。因为美国不承认东德，两个政府在闹别扭，我们是不应该交谈的。出于对东道主的礼貌，我建议我们至少应该遵循社交惯例行事。他表示同意。

我立即怀疑莫洛托夫是有意让我们坐在乌布利希的旁边，借此使我们感到为难。如果莫洛托夫的用意真是这样，他就会没完没了地为中国人和东德人干杯，并在祝酒词里对美国刺一下子。实际上俄国人对中国大使刘晓或乌布利希都没有怎样殷勤招待。莫洛托夫对他们各敬一次酒，首先为中国大使干杯。然而，他从外交的角度注意到有许多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代表在场，他表示希望，出于对他自己和客 361 人的礼貌，他们即使不喝酒也最好起立。按照他的建议，西方大使们起立了，但是没有干杯。其后莫洛托夫对我说，对于我们同中国大使没有交往他感到遗憾，说中国大使是一个"对许

多问题颇有见识的人”。米高扬向中国大使瞥了一眼，大声说，“他对什么问题都没有自己的见解。”莫洛托夫也向乌布利希敬酒，同时我们仿照先例——起立而不饮。

接着莫洛托夫向美国、英国和法国祝酒，连对我们的任何政策的间接攻击都没有。乌布利希和刘仿照我们的先例，在祝酒时起立而不举杯。向所有的客人敬了酒之后，俄国人接着又频频为和平干杯。按照我的通常做法，每次祝酒我只啜一点点伏特加酒，但是酒精减弱了我的抑制力。在他们另一次提议为和平干杯之后，我站了起来，在新闻记者的簇拥之下说我欣然准备为和平干杯，不过我想加上“正义的”几个字，因为在国际事务中没有正义就没有巩固的和平。一提到正义，苏联官员们就活跃起来了，特别是卡冈诺维奇，他用长篇大论来回答，大意是说世界上对正义有不同的概念，但和平是一切人都理解的东西。于是朱可夫（他在布尔加宁醉了以后接替了后者的位置）站了起来，说他想支持美国大使对和平的祝酒，这使我大为诧异。我无意中听到米高扬悄悄问他是否自己也来敬一杯。朱可夫回答说不，他只想支持为正义的和平而干杯。随后，莫洛托夫为那一天早些时候安排了阅兵式的军事人员的健康干杯，他表示希望，他们将仅限于在阅兵式上一显身手。尽管莫洛托夫是把阅兵同战争作对比的，这次敬酒并没有使朱可夫高兴。我不能确定朱可夫为什么支持我的祝酒。有个美国记者写道，朱可夫显然惦念着那时在狱中的贝利亚的案件。这是想入非非的。充其量只能说朱可夫是在显示他对克里姆林宫的政界首领们的独立性罢了。

看着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试图制止卡冈诺维奇，我觉得好

笑，随着夜晚缓慢地逝去，他越说越陷到布尔什维克的行话里去了，然而没有攻击西方。卡冈诺维奇仍然对我早些时候为正义祝酒感到耿耿于怀，再次在和平问题上刺我。我终于又 362 站起来说，谁都看得很清楚，一切民族、一切政府、世界各国一切阶层的居民都渴望和平。但是，我强调说，解决国际争端是一回事，保持和平则是另一回事。为了保持和平，一个国家只需遵守一条简单的行动准则就行——避免侵略行为。如果军队不越过边界，和平就不致于被破坏。于是我建议为防止侵略而干杯。苏联官员有点迟疑不决地干了这一杯。

这次招待会在外交界谈论了好几天。我把那天晚上的友好气氛同莫斯科拒绝美国建议召开关于德国和奥地利问题的外长会议一事联系起来。我电告杜勒斯说，"苏联人实际上是在说，'我们是不会同你们谈判的，这都是你们的过错，可是我们不打算跟你们干。'"这是苏联人不想使他们的行动成为影响深远的结论的起因时所采取的特有的攻击姿势。

1954 年初，苏联的立场有了进一步解冻的苗头。美国能够在四国外长会议问题上取得一项协议。苏联人要求会议在东柏林举行；我们则要求在西柏林。最后决定会议轮流在柏林的美国和苏联的办事机构举行。这项协议连带引起了一件不必要的纠纷，然而它至少是一种妥协。在会议上我是杜勒斯的顾问之一。我没有特定的职责，没有承担任何具体的任务，只是在那里就一般问题提供咨询和参加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杜勒斯带了一个会说俄语的、能够单凭注视远处人家嘴唇的动作了解其谈话内容的人去留心观察苏联代表团。其目的在于弄清他们在说些什么，也许能够偶然得到一些秘密。

至今我还是不相信那个人曾经了解到什么重要的东西。

会议在德国问题上沒有取得进展，但是在奥地利问题上却几乎达成了协议。主要的棘手之点是，莫斯科坚持保留在它认为条约受到破坏的时候有随时重新派兵进驻奥地利的权利。会上也有涉及经济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石油开采权的问题。最后杜勒斯提出了一个一揽子交易，他表示，如果苏联放弃重新派兵进驻奥地利的权利，他准备就一切经济问题实行妥协。莫洛托夫迅速利用了这个动议，硬说如果美国愿意放弃自己的立场，这就说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本来就沒有十分坚定的信心。但是他在军队问题上还是寸步不让。

363 外长们倒是达成了一项协议，决定要召开一次关于印度支那（在那里，胡志明从1946年以来一直进行着反法游击战争）和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在杜勒斯同莫洛托夫商谈召开日内瓦会议的一次绝密会议上，我担任杜勒斯的翻译。我发觉担任这项任务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的俄语知识肯定沒有退步；说起来，还比战争期间有所提高。但是我的记忆力不象一个译员所应有的那样敏捷。然而，这次会谈进行得相当不错。我沒有参加日内瓦会议，而是回到了莫斯科。

1954年3月，在马林科夫同统治集团的其他成员之间出现了微妙的意识形态分歧的迹象。在竞选最高苏维埃席位的猜谜中，全部十一个委员都在他们自己的选区发表了演说。马林科夫说，任何核战争都意味着文明的毁灭。这篇演说引人注目地离开了苏联原先的路线：核战争只会给资本主义而不会给共产党国家带来毁灭。其余最高层官员仍然停留在老的路线上，说战争是革命的产婆，因而不可避免，与此同时，

在苏联报纸上隐隐约约地暗示着分歧的种种迹象。不出一个月，马林科夫被迫修改了他的说法。但是后来，在赫鲁晓夫当上部长会议主席之后，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说法就成了定论。这种观点的改变成了中国人把苏联人看作失去革命热情的修正主义者加以攻击的主要罪状之一。

当 1954 年的温暖春风溶化了莫斯科积雪的时候，赫鲁晓夫的股票行情有继续挺升的征兆。在 4 月 15 日给法兰西喜剧院授奖的仪式上，矮胖的党书记说个沒完沒了，毫不迟疑地打断莫洛托夫的讲话。两天之后，在他六十寿辰的时候，所有的莫斯科报纸在头版篇幅刊载了颂扬“工人阶级的光荣儿子”的报道。这时在受控制的报纸上，虽然赫鲁晓夫的名字排在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外长之后，看起来他的势力至少同他们不相上下。4 月 26 日，当他在联盟院作报告时，他受到了两次长时间的热烈欢呼，跟那天早些时候给予马林科夫的待遇相等。

到了 5 月，给予赫鲁晓夫的宣传报道再次引起人们对苏联领袖中间发生争权斗争的猜测。我在 5 月 4 日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指出了赫鲁晓夫行情的坚挺上升，列举了种种迹象，从 5 月 2 日他在《真理报》刊登的照片上“作为挥动帽子的唯一领导人”占据显著的地位，到除党的工作之外又兼任了政府职务为止。但是我再次提醒说，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分裂，更可能是由于深刻的政策分歧，而不是由于纯粹个人的对抗，因此，要分析自贝利亚垮台以来赫鲁晓夫的形象在公众中进一步突出的深远意义，时机还不成熟。 364

5 月底，赫鲁晓夫在新闻报道中时常名列马林科夫之前。

我还是坚持我的信念：这两个人在接管斯大林衣钵的斗争中并不是扭成一团的。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在马林科夫主张的增加消费品和农产品生产的纲领上发生了分歧。对于苏联的经济能力，马林科夫作了比赫鲁晓夫较为现实的估计。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同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领导的政府官僚机构相比，越来越多地强调党书记赫鲁晓夫所代表的共产党。自从斯大林逝世以后，谴责个人独揽大权和恢复党在苏联的主导作用的运动在坚定不移地进行着。我于6月1日给国务院的函件中写道，"的确，如果个人不能成为苏联结构的化身（不论将来如何，他死后的十五个月里还没有一个继承人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某个机构就应当如此。就其传统和性质来说，党是苏联能够填补斯大林死后留下的真空的唯一机构。"

心里有了这两个因素，我就密切注视着局势。* 9月底，由赫鲁晓夫而不是马林科夫率领苏联代表团去北京参加共产党政权成立五周年纪念活动一事引起了某些猜测。我想到的解释是这样的（并且不可能超出这一点）：归赫鲁晓夫掌管的共产党事务将是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和赫鲁晓夫同样引人注目的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则是陪同前去谈判军事问题的。我认为，虽然克里姆林宫正在被迫抬高中国在共产党系统中的地位，它却不想把头号人物马林科夫包括在代表团之中，以免走得太远。

10月1日，赫鲁晓夫在北京发表演说，保证苏联人民支

---

* 1954年7月4日，当主席团全体成员出人意外地来到大使馆出席美国独立节招待会时，我不在莫斯科。我的五岁的女儿塞莱斯丁肯定有点讨厌赫鲁晓夫。尽管他对在场的儿童表示友好，当他接近塞莱斯丁，象是要把她抱起来时，她站得直挺挺地瞪着他。那个卑怯的人后退了。

持中国“解放”福摩萨的运动。我是难于相信苏联政府会在福摩萨问题上冒一场较大战争的危险的，不过赫鲁晓夫的好战 365 性使我大惑不解。我有点过于精神紧张，建议杜勒斯在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由美国采取行动抵消共产党的运动，从共产党的心里“消除”对于美国在中国使用武力进攻福摩萨时有没有决心打仗的问题上的“任何怀疑的影子”。我建议利用苏联承认共处和公开支持武装进攻福摩萨之间的明显矛盾进行一场宣传运动；由总统重申这一警告：进攻福摩萨将卷入同美国第七舰队的冲突和同美国的战争；并向莫斯科发出私人信件，指出一旦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变为行动时可能产生的后果。

一个星期以后，涉及福摩萨的消息已从苏联报纸上销声匿迹，我也不再感到局势紧张了。鉴于苏联政府至少在当时倾向于不再讨论这个问题，我电告华盛顿说，除非中国加紧推行它的运动或者根据情报了解它有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我所建议的第二、第三两项可以缓行。我说，宣传攻势仍应大力进行。杜勒斯对两份电报都没有答理。

当中苏在北京会谈的协议于10月12日在莫斯科发表时，我认识到我对此行的第一个推测性的评价是错误的。协议是政府对政府的，而不是党对党的。这些协议意义重大，至少似乎是把北京提高到同莫斯科完全平等的地位。苏联人同意放弃他们在旅顺的基地，放弃苏联在新疆的矿产开采权和其他经济权利。苏联人保住了对外蒙古的控制。

在我对这些协定的评价中，我看出了苏联仍旧继续保持其影响的两种可能的根源，这些根源使人怀疑苏联人只是把

表面上的平等给了毛泽东。苏联的经济援助给予莫斯科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重要手段。另一个保持影响的根源是共产党。我以如下说明结束了我的电报:

> 这些完全以处理政府事务为限的协定，当然并不触及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在苏联领导人的心目中，这种关系可能是一种保卫苏联利益并为开辟更加开放的政府渠道对中国政策施加影响的较为安全的结构。象在欧洲卫星国的情况一样，克里姆林宫的现行政策显然是要更多地通过伴装的两党关系的渠道而不是比较公开的斯大林式的统治方法，来施加它的影响(在东欧卫星国的情况下则是实行控制)。这种做法对共产党中国是否适用或者确实可能，是一个大可探讨的问题，但在克里姆林宫的长远计划中却可能占据重要的地位。

366

那个评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六十年代后期中国文化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肃清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影响，尽管我怀疑苏联人曾否控制过中国党或其党内的任何重要分子。

我曾多次告诉国务院，在盟国计划武装西德的问题上可能出现对集体领导的最严峻的考验。我的理论是，所有的俄国人都会同意竭尽全力挫败这些计划——因为对于纳粹入侵，记忆犹新——但是，假如一支西德军队建立了起来，在如何对付的问题上却可能产生重大的分歧。莫斯科的压力有助于8月30日在法国国民议会里击败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提案，而如果建立这样的体制，西德军队就会同其他国家的军队实行混合编制了。但是，10月间在伦敦会议和巴黎会议之后，西德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一个正式成员，波恩政府可以

拥有一支五十万人的军队。莫斯科的反应是召开一次共产党集团国家的会议，谴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德国的计划。

12 月间在华盛顿的一次短期逗留中，我告诉有几分怀疑的杜勒斯说，克里姆林宫十分关心武装西德的问题，对它的警告不要看作只是宣传而不加考虑。苏联是肯定要采取反措施的。杜勒斯不相信，他要我回莫斯科后再把情况研究一下。我同使馆人员和外交使团讨论了这个问题，12 月 17 日我给杜勒斯发了一份电报，预测苏联将会采取的两项最低限度的反措施："以公开建立某种形式的统一参谋部和指挥部来巩固东欧军事体制，也许就采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办法，再就是增加苏联集团的军费开支。"

我是不反对西德重整军备的。我知道东德拥有准军事力量，西德不能作为一个真空而立足于中欧。然而我倒觉得武装西德的步伐应该放慢一些。

华沙条约是第二年签订的，它把包括东德在内的东欧国家本已存在的军事同盟正式化了。在防务上增加开支的前景加深了克里姆林宫的分歧。12 月下旬，共产党报纸《真理报》和政府日报《消息报》在苏联经济问题上提出了互相冲突的观点，这是罕见的。《真理报》在它发表的各篇文章里采取了不顾一切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布尔什维克传统立场。《消息报》则有点审慎地但一再地暗示应该把更多的分量放在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上。 367

苏联工业化的指导原则之一，一向是把生产机器和原料以奠定国家的长远潜力和制造军火的重工业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布尔什维克常常争辩说，一个在重工业产品方面依赖外

国的国家，实际上即使不受奴役，也是受殖民保护的国家。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是以集中力量发展资金周转快的轻工业、特别是纺织业来实现它们的工业化的，而苏联则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钢铁、电力和石油这样一些重工业。从短期来看，除了流露出对德国的忧虑之外，关于资源分配的争论对于苏联外交政策并没有多大关系。但从长远来看却有着重大的理论上的关系。在理论上，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意味着苏联军事威力的增长，因而使得莫斯科能够在国际事务中追求更大的目标。集中力量于生产消费品在理论上将意味着为苏联公民的福利作出更大的努力。事实上，这两派的分歧从来没有大到足以对外交政策发生很大影响的地步，但是，从象征提高生活水平的目标这方面来说，对人民的关系却是重大的。

这两家报纸在着重点上的分歧没有持续多久。1955年1月的第一周，《消息报》已经站到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面来了。我的兴趣不在于苏联的报刊，而在于显然是在领导人中间进行着的争论。举例说，赫鲁晓夫在头年9月曾经说过“全面发展消费品生产和最大限度地满足工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到12月，在重新武装西德的计划宣布之后，他一变而强调发展重工业了。至于生产更多消费品的最初支持者之一马林科夫，他却奇怪地保持沉默，几个月没有发表过一次比较重要的讲话。1月7日，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在苏联的青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次会议上露面。只有赫鲁晓夫讲了话，他傲慢地提了几句马林科夫，而马林科夫则显然出于对争论中的战胜者表示敬意，是以党的工作者的身分而不是以他曾在多数公开场合所表现的政府人员的身分出现的。多数报纸刊

368

登了马林科夫直瞪瞪地看着前面、主席台上的其他人把头转向赫鲁晓夫的照片。

就凭着这些线索（一个驻莫斯科的大使所能抓到的稻草是多么脆弱！），我在2月8日没有特别感到惊讶，那天我坐在苏维埃宫的外交官席上，听到联盟院主席沃尔科夫宣读马林科夫给最高苏维埃的声明，说他自己觉得缺乏"地方工作"和管理经济的经验，因此提出"请求"，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在声明被宣读的时候，马林科夫坐在主席台上同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亲切交谈。几个小时之后，赫鲁晓夫提名、部长会议迅速赞成年迈的布尔加宁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马林科夫辞职时不曾摇尾乞怜以及只是降级而没有处决一事，使得那些仍然拿斯大林式的章程观察苏联的人大为诧异。*

在估计这一变化时，我再次警告华盛顿不要抱有个人争权的见解，也不要有把这一易辙说成苏维埃制度失败的任何倾向。杜勒斯在2月12日把我的估计交付各使馆传阅的时候，在电报上加了几句告诫的话，说他"并不排除个人争权的斗争可能起着"比我所认为的"稍微大一点的作用"。杜勒斯同意苏维埃制度"仍然起作用"的观点，但是他不假思索地警告道，它对自由世界说不定是更加危险了。

2月18日，在总结马林科夫倒台的意义时，我苦心琢磨着全盘接受所谓一场个人争权的斗争笼罩着克里姆林宫这种简单提法的危险性。赫鲁晓夫单独策划了马林科夫降职的想

---

* 赫鲁晓夫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在马林科夫被罢黜后一年，他告诉我"为什么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法是沒有根据的。我打电报给杜勒斯说：

> 归根到底，对自由世界来说关系重大的是这个制度所执行或考虑的种种政策，而究竟是甲同志或乙同志上台或下台，是比较不重要的。在反映或体现政策的范围内个人是有影响的；而只有在发生一场两败俱伤的、规模之大足以危及苏联稳固性的斗爭时，这个因素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69

至于马林科夫被黜的具体原因，一切情况表明是由于在工业发展的优先问题上发生的爭执，西方武装西德的决定触发了这个事件。而爭执一旦交锋，力量的因素就成为决定性的了。赫鲁晓夫占了上风，是因为他能够为自己的观点纠集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在党内。象斯大林一样，赫鲁晓夫发现党书记这个职务是无价之宝。马林科夫则几乎无法操纵主席团为自己撑腰。

我们得到了伦敦《工人报》记者拉尔夫·帕克的一份报告，说莫洛托夫是对马林科夫强调消费品生产的主要批评者，指责他对原料和熟练技术人员分配不当。据帕克说，马林科夫大动肝火，在一次主席团的会议上拒绝接受批评。他在一怒之下退出了会场。结果，主席团虽然本来只是打算纠正马林科夫的错误，为了团结起见仍旧想保留他的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这时只好决定把他撵走。我们并不认为帕克的消息特别可靠，尽管我们确实知道他同国家安全委员会有联系，还有一位俄国妻子。我们怀疑这个报道的眞实性。

我是战爭期间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初次见到马林科夫的，但是从来沒有机会同他交谈。他似乎总是不动声色地处在幕后的。在那个时候，他看上去象个机械人，有一张忧郁

的、几乎是杀气腾腾的圆脸，一簇黑发蓬蓬松松横披在额角上面，身材矮胖而肥大，在三十年代的清洗中以心黑手辣著称，是个最阴险的斯大林式的典型。他负责党的档案工作，这些档案给他提供了打击受害党员的主要材料。马林科夫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至今沒有揭露出来，但是在1956年赫鲁晓夫向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所作的秘密报告里，他被含蓄地指控为同清洗运动有勾结。当然，包括赫鲁晓夫在內的斯大林的全部同僚都同清洗运动有牵连。这是无可逃避的。

当我作为大使，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遇见马林科夫时，他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谈话的时候面部富于表情。随时可能显露的微笑，含着笑意的眼睛，以及鼻子上的雀斑，给了他一种灵动活泼的神情。他不喝酒，至少在我参加的招待会上连一杯烈性酒也沒有喝过，这也是他显得与那个时期其 370 他苏联领导人不同的地方。他说的俄语是我听到过的苏联领导人中最好的。听他发言是一种愉快。马林科夫的讲话结构严密，前后的內容逻辑性强。他用一种清楚的相当高的声音来表述，说话时的抑扬顿挫表明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更重要的是，马林科夫给我的印象是他比别的苏联领导人更能适应西方的思想。看起来他至少察觉我们的立场，虽然他并不赞同，但我觉得他是理解我们的立场的。跟别的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在一起，那就沒有交点，沒有共同语言。象两条轨上的车，我们分道扬镳。

在1954年11月8日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马林科夫在同我的一次长谈中指出外交官准确汇报驻在国政府的眞实感情的重要职责，并且表示希望英国大使和我理解苏联

人民和政府对于和平的眞诚愿望。我利用这个良好机会说了两点。首先是大使们在莫斯科被迫处于孤立的状态进行活动。我们几乎从来没有机会同重要的官员进行长谈。我说，在其他首都有无数非正式的接触，可以用来交换意见。我的第二点意见是，苏联报刊缺乏关于美国的正确报道。关于同苏联官员接触的问题，马林科夫回答道，“我们正在试图创造能够改善现状的条件。”至于苏联报刊，他说“外国人常常以为，苏联政府领导人除了给苏联报纸口授每条报道之外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了”。

马林科夫给我的深刻印象是避免陈词滥调——诸如“华尔街帝国主义分子”——直到今天，这些陈词滥调在苏联官员嘴里还是屡见不鲜的。象我在一份电报里告诉杜勒斯的那样，马林科夫“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意志坚定和残酷无情的人，但是，同他的同僚相比，他具有更加敏锐和高度发达的智力”。

在同一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正在同法国大使路易·若克斯辩论北大西洋公约问题。赫鲁晓夫感情很激动，最后竟两手乱挥，并且说，“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啦。”马林科夫不动声色地评论说，“总有些事情可以办成的嘛。”我简直很难相信他会受不了批评，并且由于那个原因中途退出主席团会议。*

371 有个始终没有得到证实的传闻，说马林科夫事实上是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人，他的家族姓克莱因，改姓马林科夫（都是“小”的意思）。尽管他出生在南部的乌拉尔城市奥伦堡，他

* 我颇感兴趣地获悉，1967年在普林斯敦同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一起参加的一次午宴上，她认为马林科夫是她父亲最能干、最有人情味的同僚之一。

的个性和气质肯定有某些似乎是非俄罗斯的特点。

回顾过去，我觉得在斯大林去世的时候未曾建议艾森豪威尔响应丘吉尔的呼吁同马林科夫举行“最高级会议”（当时头一次使用这个名词），是一种疏忽。杜勒斯反对这个主张。沒有向我征询意见，而且，如果我在那时建议举行一次那样的会议，我的意见也未必会被采纳。杜勒斯已经告诉参议员们说，他不要我当顾问。但我认为，我沒有主动建议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犯了错误。

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本来可能有机会调整一些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德国的问题。除了《眞理报》全文转载艾森豪威尔总统呼吁和平的演说这一异乎寻常的行动之外，苏联报刊还停止了歇斯底里的仇美运动。“五·一”口号——这是了解布尔什维克想法的一条线索——同头年 11 月斯大林还活着的时候为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而发布的口号形成鲜明的对照。“打倒战争贩子”以及关于“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外国篡夺者”的提法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相信有能力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的词句。马林科夫上台不久，就亲自在一篇声明中说沒有不能谈判的问题。其后赫鲁晓夫指责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曾经打算改变苏联的对德政策，可能放弃对东德的控制，而允许以某种形式的统一作为德国非军事化和中立化的代价。赫鲁晓夫象他平常所做的一样，无疑是歪曲了眞相。我不相信哪一个苏联领导人认眞考虑过要放弃德国的苏联化地区。但是可能有过采取另一种和解办法的余地。

在紧接着斯大林去世的几个星期里，马林科夫何以选择政府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而不挑选权力更大的党的第一书

记的位置，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个不解之谜。十之八九是别的领导人不让马林科夫占据这个权力最大的职位。他很可能被迫在党和政府工作中间挑选一项，或者也可能根本沒有选择的余地。另一方面，马林科夫作为想象中的斯大林的继承人，可能有权选择党的职位。一切迹象表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当时是亲密的。很可能是这样：马林科夫打算以牺牲党权的办法扩大政府机构的权力。莫斯科的小道消息说，他垮台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试图以削弱党官僚的办法把政府官僚置于关键的岗位。甚至有人当眞以为这就是莫洛托夫在主席团里向马林科夫发动猛烈攻击的基础。然而，我不相信马林科夫是自由地选择了政府职位的，因为在统治集团中沒有人会不理解权力掌握在党的手里。

当马林科夫失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时，他仍然保留党內的职位，但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下降了。直到 1957 年他才从主席团里被排挤掉，最后从党內被排挤掉。从那以后，据说他被任命为哈萨克某水电站的经理。

随着马林科夫的垮台，赫鲁晓夫成为这个政权最有权势的人物。我感到很担心。这个我一度对杜勒斯描绘为“并不特别聪明的”人曾使用粗暴的话语议论过美国。我担心苏联会采取一种更加好战的对外政策。随后几个月的事态发展使我感到喜出望外。

第二十一章　东西方共处

1955年春季，我的妻子和我决定到我们的足迹从未到过的苏联一部分地方格鲁吉亚和中亚细亚去旅行。这里有个人的考虑。对于蔚为壮观的格鲁吉亚山水、巴库的波斯人的遗迹、塔什干的铁木儿时代的艺术作品、古堡般的沙漠城市布哈拉、熙熙攘攘的现代阿拉木图，我们已经久闻盛名。我们也有职业上的动机。我们想去见识一下被称为生荒地的地区，那里破天荒第一次种植了庄稼，企图借此增加苏联的粮食产量。这个计划的成败对新上台的领导人是十分重要的，我急于想亲自看看那个地区。我想同俄国人民见见面，自由自在地同他们攀谈，这本是大使的责职所在，尽管如此，我对能否得到这种机会却不存任何幻想。美苏关系已经出现一些解冻，外出旅行已经比较容易得到批准，然而，并没有迹象表明我能够不受阻挠地同个别的俄国人交谈。

4月间，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旅行的路线确定了，旅馆里的房间定好了，飞机票订购了。除了拿飞机票之外已经万事俱备，而在俄国，飞机票是非到起飞前几小时决不给你的。飞往第比利斯的时间预定在4月19日凌晨两点，年轻的大使馆二等秘书弗兰克·西斯科带着他的妻子陪同我们旅行，头一天傍晚他去售票处取票。在那里人们告诉他说，他拿不到飞机票了。理由是自相矛盾的——说是因为飞机已经客

满，又说因为班机取消了。我立刻给外交部挂电话，可是找不到任何负责的官员。

374 第二天清早，莫洛托夫捎信给我，要我到克里姆林宫去见他。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自然是有几分恼怒的。但是，莫洛托夫以罕见的热情微笑着向我打招呼，说他有点消息要告诉我。苏联政府决定，作为对经济让步的回报，一旦和约签订就放弃重新派兵进驻奥地利的权利。由于苏联坚决不肯放弃重新进驻军队的权利，条约的签订曾遇到极大障碍，这一变化为迅速行动扫清了道路。

这种变化我当时沒有理由可以理解，但是莫洛托夫关于奥地利问题给我的通知是走向赫鲁晓夫共处政策的一个具体步骤，这一政策将相当快地导致斯大林老友的垮台。当然，莫洛托夫并未表示，在奥地利问题上作出让步之后，将要对西德、南斯拉夫和美国提出建议。

莫洛托夫说，他担心已经耽误了我的中亚之行。我抱怨说，这次事先不通知就突然取消班机是对待一位大使的稀奇做法。莫洛托夫对我的话不予理会，说推迟二十四小时沒有什么差别，还着重说一路上会一切顺利的。他指出，他曾想把奥地利问题的消息直接告诉一位大使，但是，由于英国和法国的使节都不在莫斯科，他就冒昧地把我的行期推迟了二十四小时。他这种严格地合乎外交礼节的谈话使我沒法对他生气，我也就忘记了自己的焦躁情绪。实际上这一耽搁倒产生了一点好处。在我们停留的每一处，不论地方多小或者夜间到达的时间多晚，总有当地苏维埃的一名代表在机场迎候我们。在巴库，一位女士在夜里大约十点钟的时候出现了，她说她是

奉莫斯科的命令来迎候我们的。"我向你们问好,"她说道,然后就走了。

正当我们正在尽情欣赏中亚一些古城的景色的时候,杜勒斯来电要我停止旅行,陪同他到维也纳签订对奥和约。

直到今天,外间没有一个人确实知道苏联人为什么在奥地利问题上改变了立场。我得出的结论同西方各国首都的一般看法有所不同,那里人们认为苏联人试图阻止西德重整军备。我的观点是,他们认识到西德的重整军备是无法阻挡的。但是他们认为能够阻止奥地利的西方三国占领区并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体制。如果我的见解是正确的,苏联人将集中力量设法先使奥地利总理拉布、然后使西方三国同意奥地利中立化。只要苏联人不再保有重新派兵进驻奥地利的权利,375 承认奥地利的中立对西方来说问题不大。我在给杜勒斯的信中写道,关键的问题是应当由奥地利自身而不是由任何别的国家来确定什么时候它的独立受到了威胁。否则,苏联人就可能以奥地利受到别国的威胁为口实而派兵进去。

我相信,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也许还有苏联的军界首脑认定,确立一个真正中立的奥地利比维持一个红军只占领其较穷的一半的分裂国家,对苏联更为有利。苏联在奥地利的地位并不强,部分是由于苏占区从未苏联化,部分是由于该区很穷。

在莫斯科同拉布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然而,莫洛托夫提出的加速进行的要求却使华盛顿的杜勒斯产生了怀疑。他给我发了一份电报,说西方不应当被"轰"进未成熟的和会里去,他建议召开大使级的预备会议。我回答说,美国采取拖延

政策将在全世界造成一种印象，认为我们对签订和约的正当建议态度消极，并且提出我们至少要规定一个签字的日期作为目标。杜勒斯一意孤行，但是签订和约的日期则没有怎么拖延或者并未拖延，奥地利人得到了独立。

在对奥和约签订之后，我在给国务院的评论中再次表示怀疑，不相信苏联人会以奥地利式的中立保证作为交换条件，试图诱使西德放弃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计划。我写道：

> 奥地利问题和德国问题是无法比拟的，这不仅由于这两个国家的大小和重要性不同，还由于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即从奥地利撤退并不涉及苏联化体制的废除或垮台的问题。
>
> 我相信苏联人认识到，防止西德重新武装的唯一可靠办法或仿照奥地利的模式使德国中立化的任何希望，都意味着要牺牲东德的苏联体制……
>
> 眼下的迹象表明，他们仍然坚持抓住东德不放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我们能够预期苏联会向波恩政府进行试探，以建立关系作为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交换条件。

我还指出，假如苏联继续搞华沙条约，并把东德武装起来作为该组织的一部分，这将清楚地表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苏联会把德国的分裂作为确定不移的事实加以接受，而不考虑在对德政策方面作重大修改。

376

对奥和约签订后三个星期，苏联邀请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访问莫斯科，讨论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问题。东德被包括在当年晚一些时候建立的华沙条约军事组织之内。希望德国统一的一切托词统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采取了迅速行动，他们的下一步是

设法纠正斯大林的最大错误之一——把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逐出共产党阵营的教门，因为他坚持偏离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宣布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包括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在內的苏联代表团到贝尔格莱德去，幷不令人惊讶。莫斯科的报界已经暗示好几个月了。在1955年5月底至6月初前去访问的期间，苏联领导人幷沒有决定要揭发斯大林的罪行，所以赫鲁晓夫在贝尔格莱德机场上的讲话把同铁托的决裂归罪于贝利亚和其他“可鄙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元帅听了这一谎言一定是感到惊讶的。他了解得很清楚，斯大林不仅决定了政策，而且使尽了除军事入侵以外的一切形式的压力想搞垮这个政权。修补篱笆的俄国人还冒冒失失地敦促先前的异教徒铁托同志赞同俄国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结果是莫斯科的代表团受到了冷淡的接待。同机场上的错误相配合，赫鲁晓夫还扮演了大老粗的角色——跟米高扬摔角，在一次招待会上喝得酩酊大醉。访问结束的时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赫鲁晓夫沒有能够把铁托拉回羊棚。联合公报是一项政府对政府的文件，只字未提共同的意识形态见解。即使有了这一让步，南斯拉夫共产党还是拒绝参加听命于莫斯科的卫星国地区性集团。然而，赫鲁晓夫毕竟把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放在较好的基础上面了。承认错误，尽管躲躲闪闪，是直到那时为止公开抛弃斯大林政策的最明确的表示。

展望前途，我对赫鲁晓夫承认错误和间接保证铁托的独立地位对于东欧会起什么影响的问题抱着好奇的心情。我在6月3日写给华盛顿的一篇评论中说：

> 看一看苏联承认“內部的结构、社会制度的差别和发展社会主义 377

的具体形式的不同等问题完全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这一点对卫星国所产生的影响，将是极端有趣的。从表面上看，这是苏联政府正式地、公开地声明东欧卫星国有权根据它们的民族利益(当然总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框之内)而非遵循莫斯科的意志决定内部发展的道路……苏联人的动机完全有可能是想作出努力，为同东欧卫星国建立新的关系奠定基础，而同铁托的交易又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必不可少的步骤。克里姆林宫的人们也许看得很清楚，只要南斯拉夫人对苏联采取反抗的甚或疏远的态度，在同卫星国的关系方面实行自由化就会是极端危险的。但是，如果同铁托的裂缝得到弥合，这种风险就会减少。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或许是另一个因素。由于去年秋天南中关系的建立，克里姆林宫可能害怕这两个共产党国家实行和解以及最终建立一个敌对的共产主义中心，从而对诸如印度之类的亚洲中立国家产生影响。如果苏联在作出去贝尔格莱德的决定时考虑了这些因素，那么，会谈的结果虽然肯定是南斯拉夫的一次胜利，却不能视为苏联人相应的失败。如果苏联人认真地试图实行宣言中所承担的义务，而不是仅仅利用宣言中的规定作为重新对南斯拉夫建立某种形式的控制的一种诡计，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密切起来。因此，情况可能是这样，即贝尔格莱德会谈的结果或许标志着苏联同其他共产党国家、特别是东欧卫星国相互关系新阶段的开始。

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新班子沒有由于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缺乏成就而丧气，他们把注意力转到非苏联世界的巨人——美国身上。尽管杜勒斯不大情愿，四大国首脑的最高级会议还是定于6月间在日内瓦举行。毫无疑问，新头头们对于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是有兴趣的。在4月13日为奥地利客人举行的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布尔加宁同我进行了半小时

的私下谈话，他发挥了这样一个话题，即世界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大国的关系，过去的关系曾经听任较小的问题造成严重的分歧。我回答道，这样一种总的提法是无懈可击的，并补充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国际形势中有一些必然会影响我们两国关系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也涉及其他国家的切身利益。于是他就问我当前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我对他说，我认为中国对福摩萨的威胁潜伏着最大的危险。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但是我们不知道中国打算干什么。布尔加宁说他并不认为远东是最重大的问题。他说，美苏之间缺乏任何共同语言是更加根本的问题。我向他重复了11月7日对马林科夫说过的话：在莫斯科，外国使节和苏联领导人之间缺乏任何正规接触的状况，使得任何人都难于清楚地了解苏联政府的确实动机和目的。布尔加宁同意这一点，并说他要把这个问题向莫洛托夫提出来。 378

布尔加宁沒有提到最高级会议，但是后来苏联人提出了这个建议。5月间在巴黎，杜勒斯在即将出席签订对奥和约的工作班子的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新近担任首相的安东尼·艾登爵士和法国的埃加·富尔总理的推动下，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愿意参加的情况下，杜勒斯顺从了举行四大国首脑会议的意见。一般说来，我是支持这样一次会议的，尽管我怀疑这次会议是否能够达成任何重大的协议，但是同苏联人有所接触总比完全蒙在鼓里好。虽然他们是不会推心置腹的，我们还是能够得到一个洞察他们内心世界的宝贵机会。此外，我不同意杜勒斯的这一观点，即艾森豪威尔同赫鲁晓夫

握手言欢的情景会损坏美国在道义上的形象，在国内效果很坏，并会削弱盟国对抗共产主义的意志。我觉得道理正好相反。共产主义制度是个关闭社会，它想抵挡国与国之间正常外交接触中的缓和精神的冲击，是要难得多。

而且，在1955年夏季，似乎存在着有利于召开这次会议的良好基础。对奥和约签订了。德国的重整军备已经被莫斯科勉强接受了。朝鲜的战斗已经结束了。两个阵营的领导人身上没有眼前危机的压力，可以坐下来探讨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了。

379

最高级会议的计划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简单地讨论了一下。在杜勒斯举行的宴会上，法国外长安托万·比内对于莫洛托夫不愿谈及有关会议的任何细节——组织或议程——感到恼火。对于我们这些同苏联人交往经验较多的人来说，原因是清楚的。莫洛托夫还没有取得莫斯科的指示。主席团还没有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他是不会说出日后可能有损于苏联的任何话来的。这种态度比内是不能理解的，他大声嚷道，"你的意思是说，你这个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的外交部长，对这个会议的任何细节都没法讨论吗？"莫洛托夫微笑着，仍然采取回避的态度。那天深夜，莫洛托夫含着冷冰冰的微笑对我说，"我们的法国朋友显然缺乏同苏联打交道的丰富经验。"

虽然莫洛托夫仍任外交部长，显而易见他就要离开舞台。3月份，苏联报刊发表了关于铁托攻击莫洛托夫的一篇相当直率的报道，引起人们猜想这位老战士已经遭逢厄运。在赫鲁晓夫及其随从人员(没有莫洛托夫)去贝尔格莱德后，谣言

更盛。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罢黜铁托运动的主要设计师之一，他反对同铁托和解是定然相当确实的。在给国务院的一份电报中我告诫说，莫洛托夫被免职的猜测可能言之过早。事实正是这样。外交部长的头衔他还保持了一年。但是，1955年春季之后，他已不再拥有同样的影响了，最后被赫鲁晓夫斥为杀人犯。

在我同莫洛托夫打交道的几十年中，我终于对这个稳健、不苟的人物怀有某种勉强的赞扬。无论是喜是怒，他的情感难得改变他那长着黑色小髭的苍白面孔上的不动声色的表情。在紧张的时候他会结结巴巴，但我很少听到他发生这样的情况。1946年在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举行的庆祝同东欧国家缔结条约的宴会上，兴高彩烈的厄尼·贝文挽着他和贝尔纳斯的胳膊，开始唱起《可爱的莫利·马龙》时，莫洛托夫简直不知所措。莫洛托夫知道自己样子很尴尬，但不想挣脱，他带着傻乎乎的微笑，嘴唇微微颤动，好象是在一起唱歌。他很少想逗人发笑，有时这样做了，效果往往是笨拙的——就象他引逗马歇尔向一位国务卿敬礼时一样。 380

有那么一些人说，这个被丘吉尔描写成用冰冷的西伯利亚花冈岩石块雕刻出来的人身上并不缺乏激情。我并不确实知道他在1942年6月用“布朗先生”这个化名到哈莱姆去访问的详细情况。我相信他到过那个地方，并非如小道消息所说的为了消遣，而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想去考察资本主义的衰落的。关于他的私生活现在知道得很少。1949年，他忍受了他的犹太妻子的被捕和流放。象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一样，他从来不谈他的家庭或个人生活。他忠于职守。

他的酒量不大；我只在 1943 年 11 月 7 日莫斯科的招待会上看见他醉过一回。

由于秉性多疑和斯大林式的训练，他从来不冒风险。他无论到哪里，在国外或在苏联，总是随带两三名警卫。在英国首相的别墅契克斯，在总统接待贵宾的邸宅布莱尔大厦，莫洛托夫总要在床头放一支上膛的左轮。1940 年，当他在意大利大使馆出席宴会时，一个俄国人出现在大使馆的厨房里尝试食物。

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十全十美的助手。他的身高不超过五呎四吋，做一个不致于在体格上比这个独裁者高出一头的伙伴，他倒是合乎规格的。莫洛托夫也是一个漂亮的官僚。他办事有条不紊，通常都为自己的言行充分准备好申辩的理由。他坚决执行命令，不管他在别的外长面前可能显得多么可笑。那天在巴黎，当他弄错了议事程序的惯例而阻挠协议的达成时，我听到他在四个小时内断断续续地重复说同一句话，"苏联代表团决不允许这次会议成为橡皮图章"，并且对于贝尔纳斯和贝文提出的每一种解决办法概不理睬。

从无情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这个意义来说，他是一位干练的外交家。象希特勒在同他的著名会晤中发现的那样，他决不凭他自己确定什么政策。斯大林制订政策，莫洛托夫加以执行。他是投机取巧的，但是只限于在他受到的指示范围之内行事。他象拖拉机那样向前耕地。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运用过任何巧妙的策略；他的顽强精神使他收到了成效。

永远不可能说明斯大林对他的任何同事的真正态度是什

381 么，但是在大多数时候可以看出莫洛托夫对他的主子是卑躬

屈膝的。斯大林死后，莫洛托夫采取了新的作风，毫不迟疑地发表与马林科夫或赫鲁晓夫不同的意见，或打断他们的交谈以表示自己的见解。他甚至有点随便。当我提起我曾经看到赫鲁晓夫在印度骑在象背上的照片时，莫洛托夫评论说，“是的，大象骑在象背上嘛。”

尽管莫洛托夫总是使我感到恼火，我对他还是有几分钦佩的。他是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象列宁称呼他的那样，是“铁屁股”。他是地地道道的老布尔什维克，信仰马克思理论的最根本的真理。他相信工人阶级本质上是个革命的团体。他相信阶级斗争是历史的指导原则。他相信共产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这些信仰在他几乎所有的言谈中都很突出。他的垮台是由于他相信赫鲁晓夫是个危险的修正主义者。

总而言之，我尊敬莫洛托夫这样一个人，是因为他行其所信，信其所行。看到这个性情乖僻的小个子从世界舞台上消失，我有点惋惜。但是时代正在改变，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波茨坦会议以来的第一次最高级会议。

我参加1955年的日内瓦会议，只是因为我是驻苏联大使。我同本届政府的任何成员都没有亲密关系。鉴于我同雅尔塔会议的牵连，杜勒斯肯定不愿意我在日内瓦会议上居于最显著的地位。麦卡锡主义终于偃旗息鼓，但是阴魂不散。艾森豪威尔总统甚至觉得有必要公开向全国保证决不搞秘密交易。

虽然我只是从外部进行窥测，我仍然觉得有责任把我对苏联人在日内瓦可能采取什么行动的见解告诉杜勒斯。1955

年6月12日，在从莫斯科发回的一份一千二百字的急电中，我说正在改变的苏联政策方向是企图实行沒有独裁者的独裁和沒有皇帝的帝国(至少在欧洲)。在再次指出苏联外交政策两项优先考虑的问题——保住卫星国和避免战争——的时候，我注意到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希望缓和紧张局势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斯大林死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是和解的，因为他们担心国际局势会自动地朝着战争的方向演变。这种担心已经被那种对军备竞赛施加于苏联经济的压力的关心所代替。

382 我继续说，由于集体领导所加的种种限制(这些限制削弱了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谈判自由)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人典型的猜疑性，苏联人是不会愿意接受为实施原子武器裁减协议而设置的适当的视察机构的。尽管如此，仍然可能有一个比以前更眞实的基础来讨论军备限制。我说，苏联人可能在日内瓦提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将是旨在肢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全欧安全条约。诸如文化交流之类的次要问题也会列入议程。

至于杜勒斯打算提出的苏联对卫星国控制的问题，我说，苏联人会绝对拒绝讨论任何影响这些国家内部安全的方案的，这在情理上是肯定无疑的。然而，苏联人会企图讨论福摩萨问题，规避德国统一问题。在结束时我说：

从这里判断，西方国家是带着巨大优势进入会场的，它们面对着的是其自信心已比过去大为削弱的对手。然而，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可以期望苏联人准备在日内瓦作出一系列的让步，或者会在谈判中反映出软弱或犹豫的因素。确实，西方现有的这些有利条

件，如果加以公开强调或者所起的作用太明显，也可能化为乌有，因为苏联人同所有独裁执政者一样，极度害怕暴露弱点或者让人看出好象是屈服于外来的压力。

除了少数几次非正式的翻译任务之外，这个备忘录实际上是我对日内瓦会议的唯一贡献了。

布尔加宁作为部长会议主席，是出席日内瓦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挂名团长。在正式会议上，代表苏联发言的都是他，但是主宰一切的苏联角色却是赫鲁晓夫。在私下交谈中他毫不犹豫地打断布尔加宁的话，在宴会和招待会上他包办一切。对于赫鲁晓夫的主导地位或者他的粗卤的农民脾气，布尔加宁从不表露任何怨恨的痕迹。

在美国为苏联领导人举行的宴会开始前，艾森豪威尔夫人、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和我站在总统别墅的阳台上欣赏日内瓦湖的风光。一个菲律宾的餐厅侍者通过我问布尔加宁喜欢喝什么酒。布尔加宁说，尽管他几乎从来没有沾过伏特加，在这节日般的日子他想喝一杯。当我把这个要求转告侍者的时候，赫鲁晓夫丑态毕露地咧着嘴打岔说，"请您替我给艾森豪威尔夫人翻译一下，"接着就说了下面的故事，大意是这样："有那么一个共产党员，我作为总书记，在不大一会儿以前还不得不教训过他。这个人是个出色的工程师，可是不幸，他的酒瘾很大，不断有人向我们反映说他常在工作时间喝醉。最后我把他叫了来，向他提出了正式警告，指出即使他是个卓越的工程师，党也不能容忍这种行为。这个人发誓悔改，把酒戒掉了，我想他大概是戒掉了。过了一个月光景，我不断听到人们报告说此人根本没有戒酒，于是我又把他叫了来，更严厉地 383

训诫了他一顿。他抗辩说他受了委屈。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向您起誓，自从您对我说过以后，我根本沒有喝过伏特加。我一直光喝白兰地。'"赫鲁晓夫停了一下，接着又顽皮地补上一句，"这使我想起布尔加宁。"

以酒量宏大出名的布尔加宁保持着牧师般的宽厚气派，一声不吭。艾森豪威尔夫人有礼貌地笑了一声。我想起了斯大林当众贬低他的同僚的方法。这件事也显示了赫鲁晓夫的个人权力。虽然他还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唯一主人，他却能够泰然自若地把自己国家的部长会议主席奚落一通。实际上，外国人从来不认为布尔加宁有什么出众的才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他是向赫鲁晓夫负责的前台人物。两年后，他被卷入反对赫鲁晓夫的活动而渐渐消声匿迹。

总的说来，苏联人在会议上的行为是规规矩矩的。他们避免搞论战性的宣传，在私人交往上彬彬有礼，态度溫和。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深深感到，他们正在庄严的秘密会议上会见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从南斯拉夫之行中吸取了教训，酒喝得很少。

日内瓦会议不象战时的会议，在战时的会议上，领袖们围着桌子详细拟定协议。日内瓦会议要拘谨得多，每一方发表演说，发出声明。在这种情况下，会议沒有作出重大决定是并不奇怪的。会议的进程证实了我的预言。苏联人提出了他们的裁减原子武器计划和欧洲安全条约。前者在视察程序上碰了壁，后者则因西方不愿阻止西德重整军备而告失败。

384

当杜勒斯、莫洛托夫、麦克米伦和比内的委员会达成了我们认为是为导致德国重新统一的大选规定了阶段的协议时，

美国代表团曾经乐观过一阵子。可是，当协议草案提交全体会议时，布尔加宁对这个文件作了不同的解释，不承认莫洛托夫在不到一个小时以前同意过的东西。艾森豪威尔经过认眞考虑想要中止这次会议，并向报界发表一个揭露苏联人口是心非的强烈声明，这眞是彻底的大转变。进一步考虑之后，他认识到这样一来责任会落到美国身上，而且因为文件里有许多含糊之处，除了布尔加宁已经指出来的以外，说不定还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后来倒是沒有出现更多的纠葛。

艾森豪威尔以突然提出“开放天空”的建议赢得了一场国际关系上的胜利。这个计划要求美国和苏联交换它们的军事设施的蓝图和地图，以便对彼此的防务实行空中监视。这个想法是要给每一方提供免受突然袭击的保证。根据我的经验，我确信苏联人是决不会容忍有人窥视他们的秘密的。首先，他们不愿意显露他们在军事上多么脆弱。此外，他们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我们基地的位置就印在谁都可以买到的地图上。反之，美国却可以从迷信保密的苏联了解到很多东西。

苏联人对总统建议的初步反应是谨慎的，并沒有加以反对。在会议的一次休息的时候，赫鲁晓夫在一个小酒吧间里跟艾森豪威尔谈话，我当翻译。那个俄国人用他的乌克兰口音说，“总统先生，我们不去追究你们提出这项建议的动机，可是实际上你们打算捉弄谁呢？在我们眼里，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间谍手段，而您那些提出这个建议的顾问对于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您很难希望我们认眞对待这个建议。”艾森豪威尔指出，由于这个计划是互惠的，同美国相比，苏联也沒有巨大的不利之处。总统强调他的信念说，为

了解决裁军问题，十分有必要把某种越出常规的方式看作是正当的。他希望赫鲁晓夫不要把这个想法一脚踢开。赫鲁晓夫后退了一点点，说苏联政府自然要很仔细地研究这个计划，不过他个人对这个计划的采纳丝毫不抱乐观态度。苏联人从来没有正式拒绝过这个建议。他们让它死于营养不良。

385

苏联人把老军人朱可夫带去了，这显然是向艾森豪威尔表示友谊的姿态。有一天这两个人在艾森豪威尔的别墅里私下共进午餐。在场的其他人只有一名俄国翻译和我。我是在战争末了哈里·霍普金斯和我访问柏林时初次见到朱可夫的。他看来象个军人——象俄国的橡树一般粗矮结实，坚强有力，脸色有点红润，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他虽然满面笑容，但很谨慎，特别是在外国人面前。朱可夫是一个不偏离党的路线的布尔什维克，但他首先是一个俄国爱国者。他主张军队享有独立性，他所以终于垮台，原因之一就是企图摆脱政委制。他具有光明正大的气概，这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喜欢迂回曲折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对美国怀有一种容忍的甚至是尊敬的心情，我相信他对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感情是真挚的，不是为了应景而装出来的。

这次午餐上的谈话多半是私人性质的。两位军人回忆了战争年代，特别是结尾的日子。最后他们谈到了德国，艾森豪威尔把他自己和美国人民强烈同情德国人有权重新统一的情况告诉了朱可夫。不过总统强调指出，重新统一并不意味着德国人有权推行可能危及其邻邦的政策或军备。艾森豪威尔告诉朱可夫说，如果苏联同意重新统一，德国的军事发展肯定早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他说，即使没有重新统一，在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里面也规定了各种各样的控制办法，以防好战的日耳曼民族主义的爆发。既然欧洲大陆的力量建立了新的相互关系，德国要象四十年代初期那样独力进行两条战线的战争，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朱可夫遵循着克里姆林宫的路线，尽管语气委婉，却坚决认为，西方盟国的计划会在许多领域里给予德国人以行动自由，所以包含着巨大的危险。鉴于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苏联担心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只是一般而论。俄国人，特别是象朱可夫这样的现实主义者知道，如果美国不优加庇护，西德就发动不起军事行动。对德国的恐惧是一种错觉。 386

午餐结束时，艾森豪威尔询问朱可夫元帅打算怎样消度假期。朱可夫说，他要到欧俄的西南部去钓鳟鱼。他们两个人谈论了渔具的优劣，艾森豪威尔答应给朱可夫送一副美国钓竿和卷线框子去。我回莫斯科后大约一个月光景，大使馆通过外交邮袋收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送给朱可夫元帅的钓竿和卷线框子，还有一封信。信沒有加封，我想是出于对使馆的礼貌。信里除了表示友好的问候，提到钓竿和卷线框子已另行封寄以及在结尾时表达热情的善良愿望之外，沒有别的內容。当阿登纳总理通过西德情报机构风闻艾森豪威尔给朱可夫写信时，他把这件事曲解为阴谋诡计和迹近出卖。在阿登纳看来，艾森豪威尔是在利用朱可夫这个渠道同苏联政府搞秘密谈判。这位总理由于在国內受到强烈的反对，唯恐艾森豪威尔会破坏他那使西德强大和独立的计划，而在他看来，这个计划的实现可以促成他的国家重新获得统一。我从几个方

面听到阿登纳授意散布的谣言，因此竭尽全力进行辟谣。了解底细的其他美国官员也同样孜孜不倦地这样做。阿登纳并不相信真实的说明，继续对美国的动机心怀猜疑。

日内瓦会议在许多方面是所有最高级会议中最令人失望和气馁的会议之一。在我们离开日内瓦以前，就显然可以看出会议未能取得真正的进展，尽管含糊其词的最后公报还可能使人继续抱有希望，认为11月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谈或许要具体公布某种协议的结果。这个希望落空了。苏联人坚持他们对日内瓦公报的解释，即除非有关欧洲和平的"某些基本条件"首先得到满足，否则就谈不上德国的统一。他们从来不曾详细说明这些条件应当是什么。结果是所进行的讨论老是大兜圈子，四国外长会谈象日内瓦会议一样，气氛友好而毫无收获。

日内瓦会议和随后举行的外长会议，代表西方国家为了387 在保障欧洲其余部分免受德国军国主义复活之害的条件下重新统一德国而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从那时起，西方国家坚持了一项促进和发展西德国家的政策，苏联人则建立了东德。在外长会议之前，阿登纳去莫斯科访问，公开和私下都坚决表示，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代价是苏联同意举行全德选举和释放仍然拘留在苏联的德国战俘。他带着几分傲气地要我给华盛顿转达他的信念，即同克里姆林宫打交道时"坚定性"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当他实行让步并接受苏联提出的以释放战俘换取建交的建议时，我感到惊讶。

苏联的主要目标是同波恩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以便把德国的分裂固定下来，对此我心里从来没有怀疑过。九千六百

二十六名战俘，固然其中无疑地包括若干死硬的纳粹战犯，在苏联人眼里却是一个次要的因素。在苏联提出建议之前和之后，我都把我的感受告诉了阿登纳及其一行，同时根据华盛顿的指示，强调要由这位总理自己来作出决定。

我还觉得一个国家首脑跑到莫斯科去搞外交承认的交易是一个错误，我也这样说了。阿登纳中了圈套，接受了一项不够满意的协议。他的班子内部分歧很深，其中有一个人把我向华盛顿表示的保留意见告诉了他，阿登纳就在美国记者面前谴责我"毒化"气氛。不论怎么说，在阿登纳协议之后不久莫斯科就给了东德名义上的独立，尽管没有一个人受骗，东德人尤其是如此。

如所预料，苏联人在日内瓦会议上拒绝讨论卫星国问题，而提出了美国拒绝考虑的福摩萨问题。杜勒斯想讨论国际共产主义问题的计划——显然是企图讨好国内的右翼团体——遭到失败。

从日内瓦会议中也得到一些好处。两国的文化、教育和科学专家互相访问的协议有了一个开端。毫无疑问，同外国人有所增多的接触会长期影响苏联的思想状况。苏联官员们感觉到有必要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在谈判交流问题时（我参加了这个谈判），苏联人总是专门注意科学技术的交流。然而，他们也愿意进行一些文化交流，因为大剧院芭蕾舞团和其他表演团体能够挣一笔大钱。 388

会议也给了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一个互相估量的机会。从每一点迹象来看，赫鲁晓夫对总统颇有好感。从那时起直到 U-2 间谍飞机被击落，那个苏联头头一直赞扬这个美

国人。艾森豪威尔尽管谨慎行事，也深深感到有互相访问的必要。

我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发现苏联报刊和苏联外交官员在大谈"日内瓦精神"。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以南约一百公里的别墅里举行了一次野外大宴会，作为这次国际关系努力的一部分。这座别墅是斯大林所喜爱的东西之一，是供苏联官员休息和其他用途的。在此以前，它从没有对外交使团开放过。所有使团的头头及其夫人和子女都应邀参加了这一整天的游园会，内容包括午宴、茶会、游艺、以及诸如扬帆、划船、散步之类的形形色色的娱乐活动。天气是理想的，又热又干燥。我们在桦木林旁的草坪上挨着长长的桌子坐定之后，一长队男女侍者昂着头，端着大盘大盘的食物出来了。这活象莫斯科大剧院的一场演出。有高加索和克里米亚的葡萄酒、伏特加、白兰地——凡是你可能想喝的应有尽有。

午宴以后，我们在公园般的园地里漫步。我的夫人和我同米高扬在一起。他带着她去乘一只划艇。他尽管是以喜欢和女人交际出名的，却象第一次去赴约会的学生一样害臊。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自豪地指出一排活动盥洗室。他吹嘘说，那些装着橡皮轮子的盥洗室是苏联的发明，并解释道，它们在红场上庆祝"五·一"和11月7日游行时可有用啦。

夕阳西下时，我发现我跟卡冈诺维奇这个斯大林主义的老党棍在一起唱着"斯坚卡·拉辛"，战争期间我在斯大林格勒唱的就是这同一首农民起义歌曲。在三十年代清洗铁路工人时以疯狂虐待为乐而闻名于世的卡冈诺维奇已经喝够了酒，感到陶然自得。他就和平问题发表了一通热情奔放的讲

话，说妇女在痛苦中生下孩子，当他们长大成人时，却被拉去在毫无意义的战争中屠杀掉。他的观点受到热烈的喝采，游园会就在洋溢着“日内瓦精神”的气氛中结束了。尽管第二 389 天还有几分宿醉，这次乡间游宴总算是掺杂着某些虽然拙劣却始终受人欢迎的谐谑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起作用的动人范例。

关于“日内瓦精神”，人们已经写了很多，其中多数是贬低它的。毫无疑问，克里姆林宫正象杜勒斯所担心的那样把日内瓦会议作为资本。在随后的六个月里，苏联外交官们在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二重唱的领导下向亚洲、中东和非洲传布新的共产主义福音。赫鲁晓夫即使有所掩饰，如他在印度那样，也流露出露骨的趾高气扬的神态，从而第一次暴露了布尔什维克的本来面目。我觉得，这种放心大胆是从赫鲁晓夫对日内瓦会议作出的结论中得来的，他认为尽管西德要武装起来，西方国家也不会进攻苏联。苏联人可以对局势发生变化的方式感到满意。由于他们奉行中立主义(但对东欧卫星国，当然就不是如此)，他们对于印度这样一些国家颇有吸引力。取消了马林科夫发展消费品生产的纲领以后，苏联领导人有了出口武器和工业设备的可能性。对贸易深感兴趣的西方阵营各国认为，它们有生意可做了。

日内瓦会议后紧张局势缓和的结果使得自由世界在一个领域里取得了意义重大的收获——同铁幕后面的人们有了更多的接触。宣传得最多的是文化、教育和科学方面的交流，在这些交流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鲷鱼和贝斯》。1955 年 12 月在列宁格勒首次演出的那个晚上简直是一场灾难。剧场太

大，音响装置很糟。歌剧的脚本没有翻译出来以便俄国人能够了解这一美国特有的戏剧内容是什么。他们感到莫名其妙。接着，表演得很生动的岛上场面震惊了俄国人，因为他们对于舞台上出现有关性的表情是故意持拘谨态度的。结果是我们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剧场。不过，《鲷鱼和贝斯》还是开始赢得了名气，并且很快取得了成功。

这个剧组给俄国人出了一个难题。自由散漫的演员反对走到哪里都要有人带领。他们独自外出闲逛，拒绝前去游览。他们常常吸引一大帮好奇的俄国人，这些人在经过几十年的宣传之后，看见还有衣冠楚楚、很有教养的美国黑人，感到难以置信。苏联当局向大使馆抱怨说，应该叮嘱演员们守规矩一些。

在莫斯科首次演出之后，我们在斯巴索宫举行了一次390盛大的招待会。由于饱尝了美国菜肴（火鸡和火腿）和西方饮料（布尔邦、威士忌和可口可乐）而狂欢起来，剧组中的一些演员问我的夫人，他们是否可以表演一点节目。他们歌唱，表演即席舞蹈，最后要求一个名叫彼得罗夫的俄国年青男低音也唱一曲。彼得罗夫用俄语唱着《老人河》，《鲷鱼和贝斯》剧组象是按照《演戏船》的原本唱词坐在地板上哼着助唱，这个场面真是扣人心弦。后来，在文化部举办的告别音乐会上，《鲷鱼和贝斯》剧组用包括俄语在内的五种语言演唱难度大的古典抒情调而再次使俄国人为之惊叹。俄国人没有想到，黑人艺术家在古典音乐方面有如此坚实的根底。

除了文化交流之外，同苏联领导人的接触也增多了，他们

在越来越多的招待会上露面。*这些招待会通常是在克里姆林宫雄伟壮丽、四壁雪白的圣·乔治大厅举行的。那里有摆满酒食的便餐部，在大厅的尽头有一个不许记者进入的半隔开的部分，政府官员和外交官可以在那里谈话而不必担心被人偷听。交换意见是有价值的，我觉得我能说俄语比之必须依赖翻译的外交官占了一些便宜。

但是这些漫无计划的招待会并未让双方有机会彻底讨论彼此的观点，而这种讨论的必要性我是同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谈过的。1956 年 3 月 6 日，布尔加宁把我带到圣·乔治大厅的便于密谈的部分，告诉我说，他可以在他的别墅里给我安排一次同他和赫鲁晓夫或者同苏联的任何别的重要领导人"推心置腹"的谈话，时间由我来定。这正是我一直要求的那种约会。我向布尔加宁致谢，并说我并不想浪费他的时间来聊天，但是我将乐于在日后利用他所提供的机会。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布尔加宁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强调说明他是郑重其事地提出这个建议的。我指出，美国有盟国，它不会同意搞双边交易。布尔加宁赶紧回答说，他并没有想要背着任何一方的盟国搞交易，但是"不受拘束"的非正式讨论是重要的。391
我热切地把这一建议电告杜勒斯，并提出应让艾森豪威尔总统知道。不幸的是，杜勒斯从未授权我处理这个建议，我也肯定不能自行其是。这是杜勒斯的错误，虽然还要补充一句才

* 在这个时期，访问苏联的国会议员多了一些。我觉得他们的谈话颇有价值，经常在大使馆欢迎他们。少数议员因为要求使馆安排同苏联官员的约会而给我们增添了小小的麻烦。华盛顿国务院发出指示，要拒绝为国会议员接洽克里姆林宫的接见，这个方针是对的，因为担心苏联人会把国会议员在交谈中发表的任何意见当作政府的观点。

算公道，即沒有证据表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私下会说出足以防止即将发生的危机的任何话来。我仍然认为美国决不应当拒绝任何表示愿意认眞谈判的建议。

“日内瓦精神”也沒有能够改善甚至在非正式的基础上同个别俄国人交往的限制。大使馆有活动的时候，更多的俄国人接受了请帖，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他们到底会不会来，即使来了也很少携带夫人。虽然俄国人可能是友好了一些，他们却不能成为朋友。有一个星期，我的妻子、我的大女儿阿维丝、詹姆斯·罗斯福的女儿凯特·罗福斯（即现在的约翰·海·惠特尼夫人）还有我自己到列宁格勒以北的奥涅加湖，去参观彼得大帝改革俄罗斯教会时期逃离莫斯科的“老信徒”修建的著名木结构教堂。在前往小小的基日村的船上，我们注意到一伙人，为数五、六个，身穿深色服装，头戴黑色帽子，我们以为他们是被派来监视我们的秘密警察。当我们上岸的时候，我们很惊讶地发现他们走到跟前，自我介绍说是从莫斯科来的负责修复这一地区古老教堂的建筑师和技术员。他们是外交部派来给我们讲解的。他们关于这个荒凉地区教堂的建筑和历史的渊博知识使我们此行大为增色。我们乘船回来的途中举行了一次欢乐的聚餐会。我喝了过量的伏特加，同一位建筑师瞎扯了一些打野鸭的事情。尽管有这个愉快的开端，我们在返回莫斯科途中想增进友谊的反复尝试都失败了。所有的建筑师和技术员都戴着官方的面具，不愿意把它们摘掉。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并不赞成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眞正友谊，因为他们认识到，突破共产党政权

的密封性质的任何事情都会使它受到削弱。这个理论对于五十年代中期的卫星国尤为正确。那里，潜在的和被人低估的民族主义势力正在起着作用。这些国家的人民觉得，他们生活于其下的制度是外来的东西，是以苏联的经验为蓝本的，同 392 他们自己的传统或历史没有什么关系。来自西方的任何思想必然会激起他们要求独立的愿望。

我认为，“日内瓦精神”是激起1956年春波兰波兹南暴动的力量之一，而这场暴动则导致10月间俄国和波兰领导人在华沙的对抗，以及同年下半年匈牙利的流血反抗。另一股强大的力量是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

393

第二十二章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956年初，赫鲁晓夫的新陈代谢作用发挥得十分猛烈，以致我开始感到，我始终坚持认为集体领导就是没有谁高踞于其他人之上的那种领导的观点未必对头。那个有趣的乌克兰人支配着对内政策，正如他尽量支配着外交事务一样。从马林科夫去职以来，我在一年的期间里总是说他不过"在平辈中名列前茅"，难道果真是这样吗？还是他掌握着全权呢？2月10日，我同我的主要助手奥肖内西坐下来分析形势。这是在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五天，正是个作出判断的理想时刻。

苏联报刊和党的会议上的发言，是初步核对的好场所。在《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里，以及在地方党代表大会和会议上，继续提到集体领导的原则。有人可能会说，企图使人民离开这个原则的宣传活动可能会发生在个人独裁建立起来之后，而不是在此以前。但是，赫鲁晓夫至少需要树立个人的名望，而在研究了党的会议进行情况之后，却没有发现对他有什么格外的颂扬。通常只是在谈起他和布尔加宁的印度-缅甸-阿富汗之行时才一并提到他。有两处例外。布尔什维克统治集团中一个地位逐渐上升的成员列昂尼德·I·勃列日涅夫在乌克兰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一次发言中八次提到赫鲁晓夫，只有一次提到布尔加宁。但是，这种不相称的情况可能

是由于赫鲁晓夫曾经在乌克兰工作过。在哈萨克的党代表大会上，他也被单独提出来加以特别赞扬，其原因何在，奥肖内西和我都无法确定。

由于赫鲁晓夫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喜欢装模作样地大放厥词（往往很不圆通），他已夺取了布尔加宁的引人注目的地位，这也是确实的。而且，他公开承认在生荒地计划中存在着缺点，从而显示出他的力量。 394

毫无疑问，作为共产党的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比任何一个追求最高权力的领导人都处于更加优越的地位。通过对关键岗位的任命，他可以促使一个集团或个人同另一个集团或个人发生冲突，坐收渔翁之利。但是党的统治集团即主席团的所有其他成员都了解，避免重演斯大林式的统治的最好办法是不让一个人垄断全部的权力杠杆。因此，他们仍然由不同的人担负两项最重要的职务——党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

那时我仍然确信，在斯大林死后的将近三年中，集体领导是进行得顺利的。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想，主席团的成员刚刚从斯大林的个人统治下挣脱出来，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再去领受这种经历，除非这是维持政权的唯一办法。根据外部迹象看不出苏联面临着从政治的、经济的或者外交事务的观点看来需要采取这样一个步骤的紧急关头。即使从国家利益着想存在着重新建立个人独裁的压倒一切的需要，赫鲁晓夫的年龄——他快到六十二岁了——也妨碍着他入选。在一份给杜勒斯的电报里，我批驳了伦敦的英国专家们所说赫鲁晓夫将从这次代表大会显露头角，成为苏联的“头号首领”或独裁者这种猜测。尽管赫鲁晓夫可能在主席团的同辈中加强他的首

屈一指的地位，我仍然觉得，要断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将在把他树立为苏联无可爭辩的统治者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为时尚早。

当代表大会于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开幕的时候，沒有迹象表明会发生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在我阅读《眞理报》（外交官员不许列席代表大会）的时候，我注意到赫鲁晓夫正象预料的那样被给予主持开幕式的荣誉——而在斯大林在世时举行的上一次代表大会上，这个角色是给予莫洛托夫的。在进行了更多的准备之后，赫鲁晓夫发表了一篇无论在外交或內政方面都沒有提出新政策的令人厌倦的冗长讲话。他重申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并且坚决认为集体领导的成员是以"无私的动机"为指导的。他用同样的辩护的口气说，最高级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有"思想基础的，旣不允许互相仇视，也不允许个人怨恨"。赫鲁晓夫说明，意见分歧是有的，但是他爭辩说，爭论是由对政策的考虑而非个人的对抗引起的。然而，他的口气仍然表露了一种感情，这种感情很可能反映了党內有人指责他受个人野心的驱使。这一切是有趣的，但很难说是肯定的。我需要更多的线索。

395

2月16日，代表大会的第三天，主席团核心人物之一米高扬发表了一篇猛烈攻击斯大林的讲话。在开幕式上，赫鲁晓夫曾请代表们起立为"斯大林、哥特瓦尔德和德田球一"默哀，从而把这个大独裁者同两位也是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去世的不大出名的共产党人相提并论，以此间接贬低了斯大林。米高扬走得更远，直接批评斯大林是个拙劣的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要求编一本新的历史教科书

以代替斯大林的简明教程,暗示有许多事实和事件需要更正。

在这些模模糊糊的线索中我看不出什么东西，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我思考了一番，断定大使馆在会前所作的预测是正确的。赫鲁晓夫仍然是统治集团内部最有权势的人物，但他或任何其他领导人要成为第二个斯大林是困难的。有两个因素妨碍着个人统治的回潮。一个是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所有发言者对"个人迷信"和滥用警察权力的强烈谴责所筑起的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巨大壁垒。另一个是三年中发展起来的为防止他们伙伴之一攫取权力并避免把集体变成一个沒有成效的清谈俱乐部而采取的预防措施。这些领导人通力合作使这个制度发挥作用，并且精心挑选拥护这个委员制的党的官员。在一份给杜勒斯的电报里，我表达了不幸而言中的心情。我写道:

> 再沒有比能够预言在现领导之间将发生导致重建个人独裁的"权力斗爭"这样的事情更使我愉快的了。如果不经历一场对苏联的稳定性、政策和威望产生附带后果的眞正斗爭，这种个人独裁肯定是无法实现的。如果发生那种斗爭，这将眞是自由世界的天赐福祉。在这个时候我看不出可以这样乐观的理由。

这显然是一种幸灾乐祸的观点。我觉得任何重新硬搞个人统治的企图必将导致一场动乱，因而使苏联向着更加民主、更加和平的国家转变。实际上，产生这样一种动乱的可能性 396 很小，因为人民愿意接受这个使他们所经历过的严酷统治得到缓和的集体领导。

在个把星期之后的一次克里姆林宫的晚会上，当我提到

西方报界评论说赫鲁晓夫正在成为另一位“伟大领袖”时，看看他的反应是有趣的。他听到我的话没有觉得不安，而把这类文章说成是“纯粹胡说八道”，并坚持认为苏联的“客观环境”不容许有这种发展。后来，米高扬向我谈了同样的观点。同一天晚上，我因为对主席团行使职能的情况感到好奇，就向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问起主席团是怎样作出决议的。他们各自给了我不约而同的答复。主席团的决议通常不是表决通过的。在有意见分歧的时候才采取表决的办法，并且记录下来。少数票甚至少数人的意见都列入记录。赫鲁晓夫说，在发生无法协调的分歧意见时，表决是“必需的”。主席团的候补委员有权参加全部会议，但是并没有经常这样做。他们可以参加讨论，但不能参加表决。

我对党代表大会最感兴趣的事态发展，是米高扬对斯大林的直接攻击和其他发言者的间接攻击。这些攻击有点使我高兴。苏联社会的任何自由化，不论多么温和，都会使苏联的领导更加难于控制人民。我给杜勒斯的信中写道：“没有什么事情比头头们的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离奇场面更能清楚地说明强加于这个国家的苏维埃政权的蛮横无耻和道德败坏了，这些头头个个都是斯大林的走卒，彻底卷进了他的一切活动，现在他们起来反对他，却没有人提出要求，要他们说明亲自参与他们今天冷讽热嘲地加以谴责的罪行的经过。”

情况甚至比我了解的还要坏。2月25日，在代表大会结束时，赫鲁晓夫在除了党的代表之外没有旁人参加的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这个“秘密报告”(很快就这样叫开了)揭露斯大林是成百万人遭到枪决的三十年代的恐怖行动的嗾使者，

是在纳粹进攻时吓瘫了的胆小鬼，是把成千上万的士兵白白拿去送死的愚蠢的军事战略家，是篡改书籍颂扬自己的极端利己主义者。赫鲁晓夫只字不提他同斯大林的密切牵连。

我是在过了两个星期之后才对秘密报告有所风闻的。3月10日，在法国大使馆为法国前总统樊尚·阿里奥尔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散布出一个传闻，说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了尖刻的攻击。这个传闻也象其他许多传闻一样，是伦敦《工人报》驻莫斯科记者帕克传出来的。看来这个传闻的来源显然是在俄国人方面，他们想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根据这个传说，赫鲁晓夫曾经作了两三个小时的报告，相当详细地叙述了斯大林在清洗时期的罪行。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把党毁灭了十分之一，无缘无故地处决了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他列举了其中一些人的名字。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斯大林谋害了苏联军队中五千名最优秀的军官，从而破坏了国家的防卫能力，对于迫在眉睫的纳粹进攻的反复警告，其中包括丘吉尔的一些警告，斯大林置若罔闻。结果，苏联在战争中几乎陷入灾难性的失败。 397

在一份给杜勒斯的电报中，我说已从其他方面间接地证实了这个报告。尽管在传闻过程中无疑有一些加油添醋的地方（如说赫鲁晓夫在作报告时曾三次痛哭流涕），我认为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很可能是准确的。理所当然的情况是，党的中坚分子已经得到了多少比在代表大会正式发言中讲到的更为令人信服的证据，足以证明对斯大林的攻击是有理由的。关于这一点，作为观察员参加正式会议的南斯拉夫大使对我说，他在代表大会上听到的同报纸上发表的一模一样。

当局几乎立即下令把斯大林的塑像从建筑物上搬走。在介绍象埃米尔·基列尔斯这样的苏联艺术家的时候，再也不提他们是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了。“消除对斯大林的颂扬会走多远，眼下还不清楚，”我在给杜勒斯的电报中说，“可是，如果关于赫鲁晓夫报告的报道相当准确的话，这个运动可能有深远的意义，已经有个传闻，说马上就要把斯大林从陵墓里搬出去了。”

传闻有失实之处，但是，象报告的原文所最终表明的那样，传闻大体上是准确的。

第二天，我得到了证实这个传闻的消息。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保罗·A·巴兰博士来看我。巴兰是美国籍的俄罗斯-波兰血统的人，他在苏联呆了一个星期，探望了他的当医生的父亲。小巴兰博士说，请他父亲看病的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告诉他，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报告里极为详尽地谴责了斯大林。而且，打发到特列季雅科夫画廊去的一名使馆雇员只看见一个斯大林小胸像，而在几天前那里陈列着几十件斯大林的画像和雕塑。

398

苏联报纸上对于这个报告没有任何报道，新闻检查官也不准向国外发送电讯。但是，报告的精神在全国各地的地方党头头的会议上扼要地传达了，消息迅速地传了开来。这个消息对苏联人民是个巨大的震动，尽管三年的非斯大林化已经擦掉了这个独裁者偶像上面的一些光彩。在这种情况下，大使馆能够突破这层秘密，收集到某些表明这件事情的影响的材料。有个并不拥护斯大林的政策的电影剧本作者对一位使馆官员说，当他听说这个报告时，“我所信仰的某种伟大的

东西消亡了”。在斯大林出生地格鲁吉亚，学生掀起了示威运动，拥护这个垮台的英雄。一个工业企业头头的妻子对一位瑞典外交官的夫人说，格鲁吉亚学生正在提出抗议，反对下令拿掉颂扬斯大林的象征物。3月8日，当这位瑞典妇女把这个新闻转告我们的时候，第比利斯的示威运动闹得不可收拾，以致群众遭到机枪扫射。那里的警察（或者士兵）是残暴的，他们把机关枪对准群众的胸部开火。一些人被枪杀了。大多数示威者的年龄不满二十。那个俄国女人说，她的儿子在机枪开火之前就趴倒在地，因此沒有受伤。

苏联报纸一方面对秘密报告继续保持沉默，同时刊登了许多关于非斯大林化的文章。春末，克里姆林宫下令停止反斯大林的运动。有一些迹象表明，运动正在失去控制。我听说某大学的一个党支部通过决议，要求在苏联实行允许自由选举的眞正民主，把权力交给人民。据说，那些拥护这项决议的人被开除了党籍，赶出了校门，从莫斯科流放到了外省。不过，他们沒有被捕。

尽管不加说明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国外印行，其眞实性如何却始终是个问题。5月份，法国人弄到了一个据称是秘密报告抄本的文件，在《法兰西晚报》上发表了一部分。然而，它不是报告的原文，只是法国驻华沙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在一个钟头的时间里所作的笔记，在这个时间里，波兰方面允许他鉴定一下据说是一份秘密报告的眞伪。这个月底，我收到华盛顿寄来的中央情报局从华沙搞到的一个文件的原文。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我断定这多半是赫鲁晓夫报告的眞实抄本，或者至少是送给卫星国的译本。法文本里有案可查

399

的事实错误，在中央情报局文本里都沒有出现。此外，我从一个俄国人和保加利亚大使那里间接得来的秘密报告的具体细节，同中央情报局那个本子是一致的。

对于秘密报告应否发表的问题，我沒有拿定主意。6月2日我把复杂的个人见解电告杜勒斯：

> 关于发表的问题我有两种想法。总的说来，象这样一类有关被认为是眞实的苏联政策的文件，我想是值得发表的，因为它们可以澄清舆论，说明这个国家实际发生的情况，同时这个文件对于通常不会跟苏联打交道的苏联问题研究人员也是宝贵的。然而，从宣传的观点来看，我倒是确实怀疑，如果把它发表，这对于我方有什么价值。该报告极端郑重其事和令人信服，它卓有成效地提供了确实的证据，表明苏联现领导决心坚持其现行的"自由化"方针，肃清斯大林时代的某些弊端。我深信，贯穿整个报告的主旨，即斯大林的罪行不应重犯，将在许多方面被看作现领导确实已在某几点上得到"改造"的有力佐证。这个文件的內容比先前推测和透露出来的更为不偏不倚，我觉得这一事实不仅会有助于提高它的可靠性，而且使现领导更受信任而不是不信任。这个文件一旦发表，无疑会被共产党人斥为伪造，不过在我看来，他们这样做不会抵消对于现政权来说是聊胜于无的有利反应。
>
> 因此，我的结论是：如果发表的主要目的在于置当前统治者于不利境地，我倾向于不发表。另一方面，如果主要目的仅仅在于公布一份有关苏联政治形势的有趣而重要的文件，则发表出来将是有益的，尤其是因为文件的泄露几乎是确实无疑的。

如果决定要发表，我建议美国政府不要公开出面这样做，因为该文件最后有可能被发现为捏造的危险，尽管这种可能

性显然微乎其微。我记得美国政府于 1918 年发表了一份企图表明列宁是德国特务的假文件时，美国的声誉受到了损害。

我的意见未被采纳，6 月 4 日国务院把这个文件公布于众。就发表这个报告来说，杜勒斯是绝对正确的。我那时沒有考虑到，在这个报告全文发表之前，人们总会有难以排遣的疑惑——赫鲁晓夫是否眞的作了这个报告和他说了些什么。赫鲁晓夫引述斯大林的话(例如，"假如你弄不到医生的口供，我们就要你的脑袋")和援引的轶事(例如，斯大林重写他的正式自传，自诩为军事战略大师)可能是言过其实的，但是这些正是赫鲁晓夫的典型作风，也是说明这个报告确非伪造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秘密报告的发表可能在许多国家改善了赫鲁晓夫的形象，可是，由于苏联继续压制自由，我不认为它为苏联赢得了任何广泛的或持久的支持。 400

苏联人从来沒有对国务院发表的这个文件的眞实性提出异议，这本身就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行动。报告发表后十天，我在一次招待会上向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问起这个报告。他们微笑着回答说，这个报告在各国流传的文本是不准确的。次日即 6 月 15 日，我有机会询问赫鲁晓夫本人。这是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我正在圣•乔治大厅半关闭那一头同他喝酒。他不象平常那样热情奔放；他显得消沉，说是疲倦了。当时铁托在莫斯科，赫鲁晓夫接连同他进行会谈。赫鲁晓夫用一种比通常较为溫和的口吻抱怨杜勒斯的讲话和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说这些东西同日內瓦精神很难协调。我对赫鲁晓夫说，他不理解美国那种自由表达意见的制度，特别是记者招待会，在那里，政府官员们要受到五花八门的激烈盘问。

赫鲁晓夫说，同美国关系的改善进展太慢。我抓住这个好机会对他说，我认为在这类问题上光是谈论是不够的。只要诸如德国问题和裁军问题这样一些主要造成紧张局势的重大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光是愿意改善关系的言论是不会改变局面的。我说我个人认为，苏联领导人似乎相信他们对一切事情都能自行其是。他们的声明和苏联的宣传对于诸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及其盟国感到,它对它们的安全是十分重要的)之类的措施不断地进行抨击,我看这同苏联不断重申它争取和平共处和正常关系的愿望是水火不相容的。我对赫鲁晓夫说,苏联对美国的"实力地位"政策所进行的顽固攻击使我相信,苏联领导人希望我们从软弱地位采取行动,而他们则原封不动地保持自己的实力。赫鲁晓夫反击说，苏联在日内瓦就已表示愿意承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个国际事实，并建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国家签订一项放弃使用武力的协定。我回答说，鉴于联合国会员国作了弃绝侵略的保证,增添几张同样性质的纸头并无必要。此外,这类问题使我们对德国问题采取断然的反对态度，因为东部地区是华沙条约的成员。对这一点赫鲁晓夫并不争辩，但是他坚持说美国不理解苏联发生的变化的深度和意义。

401

我对他说我竭尽全力使我的政府消息灵通,但是,尽管有些改进——例如我们正在进行的谈话——保密工作还是太严，以致驻莫斯科的大使很难对当前的事态发展有个清楚的轮廓。比如,我嘻笑着说,我们知道他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临近闭幕的时候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可是莫斯科没有一个有权威的官员愿意就这个问题给我们提供任何情况。赫

鲁晓夫开始是否认他作过这个报告，说到一半又改口说，“外面流传的文本同事实不符。”同头天晚上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的说法一样，他也说没有看过国务院的文本，因为它需要“大量的翻译工作”。接着他把话题一转，谈到了即将到来的美国空军参谋长纳山·特文宁将军的访问。*

1970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一书对于作出揭露斯大林罪状的决定提供了一些零零碎碎的理由。三年之中，赫鲁晓夫的态度可以引用他说的“我们未能鼓起勇气和下定决心揭开幕布”这句话来概括。接着他说，即便在揭露了贝利亚之后，“我们仍然不相信斯大林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但是赫鲁晓夫“感到”有一种向前看的“冲动”，建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刚好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前提出了报告。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担心他们自己遭殃，但是赫鲁晓夫说，他克服了他们的反对，劝说他们要把真相告诉大家。这个解释所引起的问题比它解答的还要多。我相信赫鲁晓夫及其同僚的结论是，只要斯大林的神话继续流传下去，他们就无法改造苏联的政权机构。仅仅那个人的下台是不足以改变统治着这个政权的党和政府的官僚的。多少年来，斯大林受到社会上的层层仿效。有数不清的小斯大林，他们在自己的特定领域里实行着斯大林自己行之于全国的同样残酷无情的专制政治。赫鲁晓夫肯定了解到布尔什维克理论的绝对正确性要担受风险，但是，假如要改革苏联的制度，即使所采取的办法相当温和，这种工作作风非改变不可。 402

* 后来赫鲁晓夫开玩笑说，中央情报局没有付足它得到的那份报告的代价——只付了五百兹罗提——或者大约一百美元。

6月底，苏联领导人开始关心国外共产党人不断提出来的试探性问题。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怎么能在苏维埃制度里发展起来的？为什么赫鲁晓夫和其他人那时不起来反对斯大林？独裁政治难道沒有长期损害苏维埃制度吗？在意大利，甚至忠心耿耿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也在谈论苏联社会的"堕落"。为了清除这些怀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6月30日发布了一项公告。它把斯大林主义的崛起归之于历史条件——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资本主义的包围、迅速的工业化——这些都需要"铁的纪律、不懈的警惕性和领导权的最严格的集中"。至于为什么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其他人不起来废黜斯大林的问题，公告说，这并非由于缺乏个人勇气。公告说，这样一种行动会被人民理解为"颠覆活动"，因为斯大林同这个制度是十分明显地结成一体的。再说，当时条件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现在苏维埃民主已经不可估量地发展了，并要继续发展下去。"公告的意思是说不会再走回头路了。非斯大林化运动将不顾怀疑者（我确信这些人仍然高踞党内要津）而进行下去。

苏联人对卫星国特别担心，在那里，他们一直企图以放松严格控制的办法来消弭民族压力。同铁托的和解提供了公开的证据，表明有不同的道路可以走向社会主义。当铁托于6月间对赫鲁晓夫的访问进行回访的时候，苏联人沒有重犯他们在贝尔格莱德所犯的错误。有一位南斯拉夫人对我说，苏联领导人用以承认他们过去所犯错误的坦率态度使他们感到惊异。

反对和解的莫洛托夫正好在铁托访苏的前夕被D·T·

谢皮洛夫所取代。尽管盛传莫洛托夫被黜，我根据他在一次招待会上所表现的高兴心情，认为他是辞去职务，以免在铁托面前被当作单纯技术人员的屈辱的。他只当了一年挂名的外交部长。

苏联人挖空心思奉承铁托。连最微小的机会都不放过的赫鲁晓夫，把他在狄纳莫体育场的主要讲话稿在发表前送请铁托过目。他还要求确实做到，对铁托的欢呼要比对他自己多得多。有一个人站在体育场的顶上给聚集在场上的体育表演者打信号，示意他们何时鼓掌，何时停止。

有一两回传出不愉快的语调。我听说，当南斯拉夫专家发现凡是铁托所到之处几乎都安了窃听器时，铁托大为恼火。他还私下说，老一辈的苏联领导人对这个政权的自由化是搞得认真的，但是他担心，当年轻的一代接手时，他们也许会不知不觉地重新采用他们自己从中训练出来的斯大林主义的一套办法。

铁托坚决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这促使我于6月23日给杜勒斯的电报中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 在国际事务方面，南斯拉夫已经确实重新加入了共产主义集团，今后我们可望在一切重大国际问题上发现南斯拉夫同苏联支持者站在一起。然而，总的说来，铁托是根据他自己的条件重新加入这个集团的，在公报或宣言里看不出有什么迹象，可以认为南斯拉夫已经失去至少到现在为止尚未失去的独立性，或者回到苏联卫星国的地位，尽管他由于公开采取苏联的立场而自愿限制了自己的行动自由。

由于铁托没有说过一句西方盟国的好话和只字不提美国给予南斯拉夫的千百万美元的援助，我感到恼怒，因此我对杜

勒斯说，根据多方面的考虑，突然停止援助是有足够理由的，但是可能会被指责为迫使贝尔格莱德更加依附莫斯科。另一方面，我说，继续援助也不会打破甚或减低这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亲密情谊。

然而，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卫星国。我听说铁托曾经私下404敦促克里姆林宫逐步恢复东欧国家的独立。赫鲁晓夫原则上表示同意，不过他觉得这需要经过一个长时期才能完成，因为突然采取的行动会产生"引人注目的和危险的"事态发展。不需要采取什么突然的行动了。吹遍共产主义世界的这股新鲜空气本身就足以震撼苏联帝国了。过不了几个星期，苏联人差一点使用武力去粉碎刚刚起来的波兰革命；秋天，红军的坦克扑灭了匈牙利的一场组织完备的叛乱。我作为驻苏大使的最难捱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第二十三章　匈牙利革命

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我作为大使所主要关心的是苏联制度的自由化是否行得通的问题。对于俄国人民它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将享受较多的自由和较好的生活吗？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对外政策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不幸得很，自由化并沒有给外交官们增添他们借以工作的工具。苏联领导人继续出席招待会，在那里他们参加交谈，可是仍然缺乏外交工作所必需的定期的、认眞的和广泛的讨论。大使们基本上还是依靠受控制的苏联报刊获得苏联决议的新闻，在外交团寻觅另外的线索，估量传闻，交换意见，偶尔也捞到一项重要的事实。

我认识到，独裁统治的任何自由化都是充满着走得太远太快或者做得太少太晚的危险的。1956年6月，苏联领导人有一切理由为他们的成绩感到自豪。在国内外事务中，事情办得很顺利。牢骚和不满依然如故，但是同成就相比，怨言显得微不足道了。甚至知识界，即艺术家、作家、教师、大学生和其他脑力劳动者组成的集团，也在欢迎变革而沒有过分提出更多的要求。在国外，苏联赢得了新的尊敬。

同卫星国的关系是个难题，但已作了一些调整工作以承认各国的民族主义压力。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认识到，他们沒有斯大林那种威望。受斯大林指挥的外国共产党人不大

406 愿意倾听象赫鲁晓夫或米高扬那样的人的话。赫鲁晓夫相信，如果放弃直接的控制和斯大林那种力图指挥每个卫星国中每个共产党头头的各项行动的难以置信的政策，他就能够保住东欧帝国。

到贝尔格莱德去承认错误是丢脸的，但是，同克里姆林宫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铁托其人是苏联人有理由害怕的对抗力量。如果铁托归队，或者至少不出来反对，前景就要好得多。

6月间发出了卫星国在酝酿重大麻烦的警报。波兰工业城市波兹南发生了骚乱。随着示威游行的蔓延，暴动分子呈现出了反共的趋势，党的总部和保安警察局遭到了袭击。当局不得不调动波兰军队去镇压暴动分子，但是有迹象表明，这些军队是同情示威者的。我坐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大厦的办公室里，除了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里了解事态发展以及从《真理报》和《消息报》上研究苏联的反应之外，几乎无所作为。苏联的方针是可以预料的。骚动是由"帝国主义代理人和反动的波兰地下组织挑动起来"的。但是，受控制的报界说，波兰总理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对于进一步"民主化"的决心不会动摇。据说波兰全国工人通过了谴责"帝国主义挑拨者"的行动的决议，以表明对政府的支持。当时我既不了解波兰局势的严重性，也不知道布尔加宁和朱可夫于7月间到华沙去同波兰中央委员会面谈。我现在也不认为苏联领导人那时就认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在斯大林时代，凡是送到莫斯科去的情报，以符合斯大林爱听的话为限，无非是说苏联体制"十全十美"，人民拥护共产主义，只有一小撮"人民的敌人"才反对共产主义，等等。需要有绝大的勇气才敢汇报苏联帝国的不幸

消息。我认为，在苏联的外交工作中，当时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现在还存在着)那种危险的汇报方式。不管是什么原因，被审讯的暴动头头们普遍受到从轻发落。并没有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

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处于困境的赫鲁晓夫转而求助于他在卫星国问题上的新朋友和顾问铁托元帅。尽管铁托于6月间去过莫斯科，赫鲁晓夫又匆匆去了一趟贝尔格莱德，而铁托又于9月间进行了第二次回访。这时我在伦敦参加会议，讨论已被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收归国有的苏伊士运河的问题。当我于9月26日返回莫斯科时，根据苏联报纸的报道，铁托在克里米亚度假。后来弄清楚，取代了受人蔑视的斯大林主义分子马加斯·拉科西而成为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埃诺·格罗，当时也在那里。在同外交使团核对了之后，我发现人们普遍认为赫鲁晓夫和铁托在苏联对卫星国的政策上出现分歧。苏联报纸不再称铁托为“同志”，而管他叫“总统”。 407

我在猜测苏联动机的时候得出的结论是，克里姆林宫之所以着手这次会谈，如果不是因为对于传闻南斯拉夫可能从苏联拉出某些卫星国的活动——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个敌对政策——心怀不满和忧心忡忡，就是想就某种拟议中的改变同卫星国关系的计划谋求铁托的默许，甚至拉他参加。争论的焦点很可能是对赫鲁晓夫第一次访问贝尔格莱德时提出的“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命题有不同的解释。对于这个命题，苏联人总是比铁托提出更多的限制。他们从旁注视着东欧国家不断增长的独立性和较多的平等，但是这些只能限

于整个共产党集团的总的范围，并从属于这个集团。南斯拉夫人的概念同民族共产主义要接近得多。我于10月3日告诉国务院说，苏联领导人可能担心，卫星国一旦摆脱了羁绊，就会同西方建立经济联系，从而引起东欧集团的逐步瓦解。然而，我不相信赫鲁晓夫正在受到克里姆林宫其他人的巨大压力，也不相信波兰和匈牙利的混乱会导致恢复斯大林主义的高压政策。"悲痛无可挽回的事情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办事的特点"，我写道。

10月中旬，在阿富汗大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我得到一个机会向赫鲁晓夫本人问起他同铁托的谈话。赫鲁晓夫异乎寻常地沉默寡言，但是他承认，当铁托在克里米亚停留期间他们两人谈过政治问题。他自称对会谈表示满意，把西方报纸关于他同铁托有意见分歧的报道斥为"胡说"。三个晚上之后，即10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为正在建馆的日本人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赫鲁晓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都没有出席。人人注意到他们的缺席，因为这在莫斯科是足够使人议论纷纷的。小道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说是这四个人虽然头一天晚上还在大剧院露面，却已经动身到华沙去参加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了。我向捷克斯洛伐克大使J·沃萨格里克核对了一下，他告诉我，赫鲁晓夫已经到华沙去了；这位大使是从权威方面获悉这次旅行的。他对另外三位苏联领导人的情况却不知道。次日，莫斯科广播电台证实了这一消息，即代表团已去华沙参加波兰党的会议。就在这一天内，俄国方面的一个消息说，苏联代表团已经同"某些波兰同志"回来了。来自华沙的传闻说，苏军在进行调动。就象

408

全世界很快就知道的一样，波兰共产党给斯大林时代坐过牢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恢复了名誉，任命他为党和政府的首脑。与此同时，波兰血统的苏联将军、首先忠于苏联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被免除了波兰国防部长的职务。在莫斯科，苏联人在新闻方面所获得的只是一纸十分简单的公报，它包括关于"进一步加强"苏联和波兰两党之间"兄弟般的友谊和合作"这种通常的废话，却只字不提哥穆尔卡的当选和罗科索夫斯基的去职。在外交使节的圈子里，我们听到了关于军队调动以及甚至在什切青附近苏波两国军队发生冲突的更多传闻。由于暗中摸索，我只能给国务院提供有关正在发生的情况的假定性意见和推测。在危机的整个过程中——尽管布达佩斯的不满之声响彻云霄——我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仍然不相信苏联将使用红军去摧毁波兰的异端分子。

随后的情报表明，俄国人到华沙去完全是打算用强硬手段对付波兰的那些傲慢家伙的，并且计划动用武装部队，但是波兰党的所有派别组织都对他们说，波兰的军队不能指靠。只有那个受了屈辱的哥穆尔卡，一个仅仅由于先前勇敢地抵抗过苏联人而成名的英雄，才能阻止一场爆炸。我相信，只是在赫鲁晓夫和其他俄国人同波兰人会谈之后，他们才认识到原来苏联在波兰的朋友是寥寥无几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党内并不只是受少数军官支持的一小伙人。象斯大林一样，他的继承者被意识形态和来自下属的误人汇报所迷惑，以为普天之下人们都是拥护苏联的。在这件事情上又同斯大林有别，他们大胆地面对现实，开始了解几乎全体波兰人民都是反对他们的。假如苏联人使用武力，一场血腥的冲突肯定会接着发

生。所以他们后退了，决定由哥穆尔卡继承作为保持苏联体409制和使波兰留在华沙条约组织里的最大希望。这一解决办法起了作用。11月15日哥穆尔卡去莫斯科，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他得到了相当大的行动自由，但是没有超越界限。

此后赫鲁晓夫吹嘘说，对哥穆尔卡的安排是他的最大胜利之一。实际上，到华沙去的苏联代表团差一点就要命令苏军出动了。10月25日，即匈牙利起义后两天，朱可夫元帅引用波兰的事例作为苏联不愿对别国的内政进行军事干涉的例证。他同我在土耳其大使馆的招待会上谈话时说到，当时在东德、白俄罗斯和波兰的苏军很多，要按照克里姆林宫的条件强迫实行一项解决办法是绰绰有余的。他的蓝色眼睛闪着光芒，他坚持认为，“他们能够把那些人象苍蝇一样扑灭掉的。”当我问他“他们”指的是谁时，他没有直接回答，但是他显然指的是苏军，因为他说红军在波兰显示了“巨大的克制”。他说，为了叮嘱驻东德的军队不向波兰进军，他曾急电驻在那里的华沙条约国武装部队总司令I·S·科涅夫元帅。揣摩朱可夫的言外之意，我相信他曾竭力主张在波兰采取军事行动，但是被制止了。朱可夫随后对匈牙利问题的观点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怀疑。

波兰的妥协使得暴乱没有蔓延成为一场民族革命。苏联人也想在匈牙利的风波中寻找一条出路，但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苏势力不愿半途而废；他们要求完全独立。结果他们被苏联的坦克镇压下去了。

匈牙利起义开始于10月23日，当时我们的注意力还集中在华沙。好象使馆的工作量还不够重似的，苏伊士运河危

机(下一章里要谈到)也爆发了。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在那非常时期，我每天要开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幕僚会议。我们讨论事件，估量传闻，试图分析苏联的动向。我们的任务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我们大家的工作时间都很长。总的来说，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要同别的大使交谈。我还明确规定大使馆要有一名高级官员去参加比较重要的招待会。如果有任何迹象表明赫鲁晓夫、朱可夫或者克里姆林宫其他任何领导人要出席的话，我就亲自出马。接替奥肖内西而成为第二把手的纽博尔德·沃姆斯利是我的主要助手，在有些事情上为我填空，对另一些事情则和我一同前往。武官们到其他使馆去找他们 410 的同行打听消息。工作人员中的年轻成员则去发掘可资利用的少数苏联来源——诸如大学、演讲厅和公园——搜集小道消息和街谈巷议。

我们仔细阅读《真理报》和《消息报》。但是，由于苏联的宣传手段沉默得出奇，在新闻方面我们只好依靠外国广播，辅之以国务院提供的一些情报。匈牙利革命的第一天，大约有二十万人在布达佩斯游行示威。随着抗议活动的继续进行，群众变得粗野了。他们袭击秘密警察总部，私自处死一些密探。苏联人把成功的波兰公式改变一下作出反应。他们以纳吉·伊姆雷代替格罗。纳吉曾经当过总理，但被斯大林主义分子拉科西赶下了台。显然，纳吉总理——我们至今不能肯定就是他——请求苏联军队帮助他平息叛乱。在随后的两天里，暴动蔓延全国。在苏联报纸上，关于匈牙利的新闻成了空白，但是外电报道说，苏军只是三心二意地试图对反叛者作战。

我几乎沒有察觉到米高扬和另一名主席团成员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沒有出席招待会。在华盛顿转发了一份关于这两个人已去布达佩斯的情报之前，这种缺席看来幷不怎么重要。他们确实于10月25日去了，而且在这星期中还要再去两次。他们的首要活动之一是挑选另一个反对拉科西的共产党人卡达尔·亚诺什作为党魁。当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离开苏联前往布达佩斯时，我到莫斯科矮小而阴森的匈牙利大使馆去拜会新上任的匈牙利大使博尔博茨基·亚诺什。这一约会是在匈牙利这次突然着火之前约定的，只能算是一次社交性的访问。然而，大使自己提起了暴动这个话题，似乎急于表明党或政府內部幷沒有阋墙之争。他以标准的共产党的态度描绘这次起义，说这是包含那些试图利用学生的不滿情绪的犯罪分子在內的一起反革命阴谋。骚乱一旦平息，他说，纳吉将宣布政府的"民主化"纲领。

那天(10月25日)晚些时候，苏联报纸打破了在匈牙利问题上的沉默。在一条题为"反人民的冒险勾当在布达佩斯的失败"的电讯里，塔斯社把这场暴力行动归之于"反革命"分子，提到了要苏联给予军事支援的请求，幷说这一"叛乱"已经平定。电讯还徹头徹尾地捏造说，全国各地的工人打电报到411 布达佩斯，在电报中他们"表达了对反革命分子罪恶行径的愤慨，幷向党和政府保证他们随时准备保卫人民民主社会不受敌人的侵害，加强同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

关于苏联这个第一次报道，我告诉国务院说，显然，莫斯科将坚持认为匈牙利的乱子是国外煽动起来的。鉴于纳吉向苏军求援，我至少在表面上看不出匈牙利政府同苏联政府之

间存在分歧。而了解事情底细的苏联人是看到了分歧的。在克里姆林宫为比利时人举行的招待会上，在主张对卫星国少加控制的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同主张采取更强硬政策的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之间，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差别。特别是布尔加宁，看上去疲惫而沮丧。他不打算装出通常彬彬有礼的举动，并没有到客人中间走走，而是同比利时人围桌而坐。赫鲁晓夫虽然看起来不象布尔加宁那样忧心忡忡，也不象平时那样热情奔放，信心十足。另一方面，两个强硬路线者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看上去要自由自在得多。莫洛托夫把我找了出来，当我问他布达佩斯有什么情况时，他说尽管孤立的战斗还在进行，局势正在平静下来。他说，不愉快的事态发展说明了一个"小小的有组织的集团"能够在某种条件下起多大的作用。我对他说，根据我手头的有限情报，这次骚乱远远超出了小集团的范围，而是反映了匈牙利广泛的不满情绪。他回答说，人民群众很少有自己的主动性，只有在有组织的集团的指导下行动。当我提到整个东欧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时，莫洛托夫说新的情况需要新的政策，有时候还需要新的人。我情不自禁地对他说，苏联领导人显然有不需要变革的充分经验。他罕见地笑出声来，并说，"我们比新的人民民主国家的一些人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这倒是真的。"

10月27日，在强调了对于匈牙利和波兰事件完全得不到任何可靠消息之后，我告诉国务院说，要对苏联的未来行动作出有见地的预测是不可能的。我毫不迟疑地继续发表我的意见，得出了一些在技术上证明是正确的但有点儿误人的结论。首先，我错误地说"苏联不会对一个共产党政权公开使用

412 武力，不论该政权所采取的政策是否同苏联的愿望背道而驰”。我说这是从解决波兰问题得出的“主要经验教训”。然后，象谨慎的外交家通常所做的那样，我的话留有余地。假如一个“亲苏的共产主义少数派集团”要求进行干预，也会根据这个原则作些“可能的变动”；但是这种可能性看来“未必存在”。我的第二个结论是，苏联人将“无疑地准备将来在共产党政权的请求下使用苏联正规军予以支援，就象在匈牙利那样”。

关于美国的政策，我觉得把匈牙利局势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从而给苏联制造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困难是有好处的，但是我说我们对纳吉的判断对于作出决定是至为重要的。如果国务院认为纳吉正在领导的一场运动将最终导致匈牙利沿着波兰或南斯拉夫的路线取得更大的独立，则把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去就很可能驱使纳吉进一步靠拢苏联。然而，如果国务院的判断是纳吉已经无可挽回地做了有失体面的事情，并且实际上成了苏联人的俘虏，那末，我认为把问题提到联合国去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第二天即 10 月 28 日的晚上，纳吉在布达佩斯电台宣布说，他已经成功地取得了一项困难的停火协议、一项苏联立即从布达佩斯撤退军队的保证，以及一项就撤出该国进行谈判的约定。我感到迷惑不解。难道纳吉同克里姆林宫决裂了吗？从塔斯社提到他时表示大体赞同的语调来看，这似乎不可能。尽管还需要澄清，我倾向于认为苏联领导人决定减少损失，撤退军队，渺茫地希望纳吉凭借其人民革命的领导地位能够阻止共产党政权的彻底垮台。当挽救共产主义的可能性

已经微乎其微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很可能已经得出结论，认为那种方针比对匈牙利实行全面军事占领较为可取。可是我无法摆脱这样一种疑虑：另外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我提醒国务院说，苏联从布达佩斯撤军的保证说不定“只是在增援部队到达之前放的烟幕”。我对苏联怀有本能的怀疑，那时我要是能够给予更多的注意就好了。赫鲁晓夫和其他集体领导人早已授权朱可夫把军队源源开进匈牙利。尽管苏联人从布达佩斯撤出来了，可是不到一周他们又猛扑回去，迅速粉碎了革命。

使用武力的决定想必是早就作出了的。我想可能是在10月28日或29日作出的。人们看见29日有不少吉斯牌黑色轿车开进克里姆林宫，这表明主席团全体会议正在举行或者已经举行过了，官员们正在接受执行计划的指示。我刚刚接到杜勒斯的一份电报，他急着要给苏联领导人送个信，表示美国并不把匈牙利或者任何苏联卫星国看作潜在的军事盟国。电报援引了杜勒斯在达拉斯发表的同样内容的一段讲话，并且强调这是经过“最高级”——显然是指艾森豪威尔总统——深思熟虑以后写成书面的东西。 413

那天下午在庆祝土耳其国庆的招待会和阿富汗大使馆的招待会上，我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了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但是美国的保证没有受到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重视。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粉碎这场革命，并实行一个我认为是隐藏着他们意图的掩盖计划。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寻找英国大使和我，急于让人看见在和我们谈话。赫鲁晓夫的言谈是一般性质的。他说，虽然更多的“困难和倾轧”是意料中事，苏联

政府不会偏离它的方针。这话的含意是，东欧的自由化政策还会继续下去。在有一点上我发表了意见：认为斯大林在对东欧实行严厉控制方面铸成大错。我说，如果斯大林听取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战时会议上的建议，给予人民以选择他们的政府的更多自由，那末，本来是有可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的，我还引用芬兰的例子，说明这样的关系可以达到多么友好的程度。赫鲁晓夫认眞地回答道，“也许您是对的”，但是补充说，斯大林尽管有错误，还是一个有才智的人，甚至是个“天才”。

朱可夫元帅倒对我做起工作来了。他把假话和半眞半假的话同某些眞实情况搅在一起。我问朱可夫，对于纳吉在广播中宣布的苏军即将撤离布达佩斯，并且将要就苏军从匈牙利完全撤退的问题举行谈判一事，苏联是不是事先同意了。朱可夫回答说，纳吉沒有提到立即撤出布达佩斯的问题，应匈牙利政府的请求到那里去的苏联军队将留在那里，直到那个政府要求他们撤走或者“秩序已经恢复”时才能撤离。他说，从整个国家全部撤退是有待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考虑的问题。

朱可夫通常是一个诚实人，那一回他作为一个好党员对414 我说了几句明显的谎话。他说“近来”沒有苏联援军开赴匈牙利，因为那里的苏军已经足够了。我对这种说法提出诘难，指出有着与此相反的情报。我说，就我所知，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对于英国代表所说的苏联已从罗马尼亚派出增援部队的说法沒有发表任何声明予以否认。朱可夫说他沒有看到关于安理会辩论的报道，并且重申了他的未派援军的说法。

朱可夫还坚持说，苏军是在他们的某些军官被叛乱分子

杀害后才在布达佩斯开火的，在过去的四十八小时苏军没有开火。我再次对他说，我得到的情报同他的说法相反(那天早晨英国广播公司说到苏军炮轰匈牙利的陆军兵营)。朱可夫再次说那些报道是捏造的。

他还说布达佩斯的苏联军队不归他统率，而由匈牙利国防部长领导。这是公然撒谎。苏联人决不会放松对他们武装部队的控制。他断言苏军的行动只限于布达佩斯，并没有对外省的"新的"地方当局采取敌对行动。他说得很快，感情激动，硬说同外国的新闻报道相反，没有任何苏联士兵投向叛乱者的事件。他采取了军人维护苏联军队的态度说，他不是政治家，而军队的职责在于执行命令。此外，他企图根据标准的苏联方针把匈牙利的行动说成一场反革命暴乱。当华沙条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国的政府要求援助时，苏联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他提出了任何别的同盟处在类似条件下会发生什么情况的问题。我回答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公约并不包含使用外国军队干涉内部事务的条款。他说，华沙条约组织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因而也要保护社会主义的政府不受任何威胁。我评论说，我不知道华沙条约的本文中有哪一条是能够为干涉内政辩解的。朱可夫说这种行动是可以从条约中"直接了解到的"。

这位元帅虽然态度还算温和，却企图说明叛乱者同"国外有联系"，并提到他们缴获了大量的美国枪支和德国大炮。不过他没有声明这些武器是美国运去的，只是说它们可能是二次大战的存货，从奥地利走私到匈牙利去的。 415

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我问他说，在一个政府被迫呼吁外

国军队来帮助镇压一场起义的时候，是否完全可以肯定这是政府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最明显的佐证。朱可夫软弱无力地谈到了肆无忌惮的犯罪分子利用人们对过去政策的正当不满情绪的问题——这是地地道道的苏联说法。

在向华盛顿汇报这次谈话时，我说：

> 我无法判断朱可夫言论的真伪，即苏军的行动仅限于布达佩斯，绕过了民族主义者控制的匈牙利城镇和其他地区。然而，从他的谈话以及谢皮洛夫和他对报界声明的大意来看，似乎苏联是决心要支持纳吉政府到底的，虽然首先可能是在布达佩斯，把外省和其他城镇留待以后再去扫荡(如果首都的抵抗能够粉碎的话)，从而可望避免由苏联军队对整个匈牙利实行军事占领。照此看来，纳吉于28日晚上发表的关于苏军从布达佩斯撤退的声明似乎无非是一项得到苏联默契的、旨在促使起义者停火的诡计。

次日，即10月30日，局势变得甚至更为混乱了。莫斯科各报登载了苏联中央委员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其主要内容是对卫星国采取缓和得多的政策。它接受了“民族共产主义”的基本概念，根据这个概念，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发展完全是各个国家自己的事情。决议提出了就“召回”苏联专家和苏联军队在罗马尼亚和波兰以及匈牙利(意味深长地略去了东德)的驻扎问题举行谈判的建议。甚至这个比苏联政府前此在这问题上所采取的任何政策都要自由化的决议，也包含着许多模棱两可的东西。显而易见，它是以保全“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为根据的。就象随后几天就要表明的那样，对于用非共产党政权去代替共产党政权的任何企图，苏联的忍耐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样，到了1968年才出名的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在

1956 年就已付诸实施了。继赫鲁晓夫而为党书记的勃列日涅夫说，他幷沒有宣布这样的主义，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苏联人早在勃列日涅夫以前就已清楚地表明，他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采取军事行动，防止他们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的模型被侵蚀、破坏或推翻。这就是斯大林的政策，现在幷沒有改变。 416

10 月 30 日晚，有些细微的迹象表明苏联人眞的想给予卫星国更多的自由。在另外还有一次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怒气冲冲的朱可夫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苏军已经奉命撤出布达佩斯。"已经给苏联武装部队下了撤离这个城市的命令，"他说。然后，他不耐烦地把胳膊一甩，说道，"让他们自己去对付吧。"他指的是匈牙利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看来都是心情沉重的。我电告杜勒斯说，"朱可夫的话反映了以我们这里还不知道的某些匈牙利情况为依据的一夜之间发生的态度变化。"

眞是有这么一些情况。在人民的革命热情的压力下，纳吉在随后的几个小时內宣布结束一党制和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幷向联合国请求帮助。纳吉就这样决定了他自己和匈牙利的命运。他正在试图结束而非仅仅修改共产主义制度，他正在割断同苏联联在一起的脐带。莫斯科是决不会容许这种局面的。

在我听到纳吉的关系重大的举动之前，苏联政府宣布它正在从布达佩斯撤退红军，这向我表明，克里姆林宫已经决定减少损失，同意给予卫星国高度的独立，否则就是准备采取更大的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杜勒斯急于知道急剧变化的形势是否改变了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平衡。他之所以特别渴望知道，是因为另一场危机已经爆发了。由于难于置信的失策，英国和法国与以色列成立默契，协力对抗埃及，企图攫取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10月29日，以色列入侵埃及，此后不久，英法开始轰炸，为军队登陆作准备。

应杜勒斯的要求，我说，关于主席团如何站队，实在一无所知，不过全体领导都参与了匈牙利问题的决策，则是毫无疑问的。我写道，“当前沒有可资利用的证据表明赫鲁晓夫不再是此间集体领导的头头。”

417 虽然苏联人已经决定大规模使用武力并成立一个新的匈牙利政府（忠诚的党书记卡达尔已经被送到苏联的安全地点），布尔加宁还在蒙骗我。11月2日，在一次为叙利亚人举行的晚会上，他否认了关于红军增援部队开赴匈牙利的一连串真实报道。他说匈牙利境内苏军调动频繁，这可能造成有援军开进去的虚假印象。我告诉国务院说我不相信他的话。布尔加宁还说，将成立一个苏匈委员会来考虑纳吉声明中关于全部苏联军队撤出该国以及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的问题。我被骗了几个小时，相信苏联或许会煞住军事行动。次日晨，由于注意到苏联报纸上根本沒有提到什么委员会，并回想起朱可夫元帅和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头天晚上那种胜利的神态，我便提醒华盛顿说，关于委员会的报道无非是为准备军事行动爭取时间的一种诡计。我写道，假如纳吉坚持不屈，“眼下看来苏联好象就要采取行动了。”

那天晚上——那是11月3日——赫鲁晓夫扫除了人们

对苏联意图的所有怀疑。在给叙利亚人举行的另一次招待会的末尾，他和马林科夫露面了。在跟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交谈之后，他跑来找我。当时我正在同挪威大使埃里克·布拉德兰德谈话。赫鲁晓夫不加掩饰地讽刺说，他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华沙条约组织的某种“脱臼”的可能性是兴高采烈的。我问到苏联对于纳吉要求全部苏军撤出匈牙利和那个国家想退出华沙条约组织有些什么打算。他说谈判正在进行，问题将会“得到解决”。我说在谈判和苏联增派大量援军进入匈牙利的不断报道之间看来有个矛盾。赫鲁晓夫火冒三丈，他回答说，苏联在对付它所面临的危险时将是要多么强大就有多么强大。“我们在那里有足够的军队，”他说，“但是，必要时我们还要补充越来越多的军队。”我想必在脸上露出了某种笑容，尽管我并不认为他的话是好笑的，因为他补充说，“这不是开玩笑。”然后他把话题一转，谈到了苏伊士运河危机。

我赶回使馆，把消息电告华盛顿。赫鲁晓夫已经表明，苏联人准备把红军投入战斗。正如我告诉国务院的，“我能够从赫鲁晓夫身上看见的唯一可以辨别出来的美德就是残忍的坦率。” 418

关于残酷镇压匈牙利革命的真正原因，赫鲁晓夫对我从来不讲真话。最接近于反映他的真实思想的是11月7日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同瑞典和芬兰大使的一次私下谈话，谈话的内容又传到我的耳边。我的朋友瑞典大使索尔曼说，他认为苏联的军事行动将对斯德哥尔摩产生不良的影响。赫鲁晓夫承认，这可能是真的，但是他说克里姆林宫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解释说，克里姆林宫曾经同意支持纳吉，但是纳吉对

"法西斯"反革命分子失去控制。索尔曼插话说，瑞典政府所获得的情报是，全体匈牙利人民而不光是"法西斯匪帮"都卷进去了。对此，赫鲁晓夫给予标准的苏联式的否认，他说，如果所有的匈牙利人民都反对他们，苏联人就不会使用军队了。他援引了芬兰的例子作为证明。他转过身去对芬兰大使说，"在你们国家，我们知道全体人民都反对我们，因而战后我们没有占领芬兰。"赫鲁晓夫说，匈牙利的"法西斯匪帮"正在杀害"我们的人"和共产党员，狙击苏联军队。他说，要红军在敌对火力面前撤退是完全不可能的。

赫鲁晓夫继续搞他的宣传工作，他说，作为共产党的第一书记，他可以声明苏联在匈牙利并没有特殊利益。芬兰大使埃罗·A·沃里说，他认为苏联在匈牙利有相当大的战略利益，但是不知道这种利益可否按照奥地利的办法通过匈牙利的中立地位得到保护。最后赫鲁晓夫变老实了。他承认苏联在匈牙利的战略利益，并说苏联领导人觉得，从布达佩斯的事变进程来看，匈牙利不会满足于中立，而是要作为一个"敌对"国家同西方站在一起。他说，如果匈牙利要求中立，苏联政府将对这个要求给予有利的考虑。后面这种说法不过是装璜门面；赫鲁晓夫的真意是，莫斯科是不会对一个苏联化的缓冲国放弃控制的。

11月4日，红军开始了粉碎这场革命的进攻。当纳吉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的时候，苏联人广播了卡达尔宣布成立新政府的一篇录音讲话。《真理报》谴责纳吉是"反革命势力的工具"，报道暴民怎样毁坏了"在把布达佩斯从希特勒匪帮手中解放出来的战斗中阵亡的"苏军纪念碑。这场革命几天

419

工夫就被压垮了，卡达尔傀儡政府上台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川流不息地越过奥地利边界。

奇妙的是，苏联人对匈牙利人重演了1939年纳粹-苏联条约签订时他们施之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欺骗伎俩。同匈牙利人谈判的苏联将军就象1939年伏罗希洛夫对付英国人和法国人一样，以为他是在眞心诚意地谈判苏军撤退的问题。我听说，当另一个苏联军官进入房间并逮捕匈牙利人时，他感到震惊。同1939年唯一不同之点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沒有被捕。

西方除了抗议苏联的行动之外几乎无能为力。对于我想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大使一起抵制11月7日的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庆祝活动的请求，华盛顿表示同意。我沒有去参加，而是送去一张表示祝贺的名片。11月8日，我收到苏联礼宾司司长F·莫洛奇科夫的如下来信：

大使先生：

我奉命退回你给苏联外交部长D·T·谢皮洛夫的祝贺名片，因为考虑到，根据你对苏联国庆节的庆祝办法所采取的态度，投送名片同它所表示的意义实际上是不相符合的。

F·莫洛奇科夫谨启

我告诉国务院说，这封信是近来苏联通信中唯一包含眞实情况的东西。不幸的是，西方为了向全世界表露其强烈嫌弃苏联在匈牙利的行动而作的努力，被艾森豪威尔愉快接受布尔加宁对他再次当选总统的祝贺抵消了一部分。在这件事情上杜勒斯沒有征求我的意见，当我收到总统对布尔加宁来

信的复信原文时，我吓了一跳。因为回信是用明码而非密码拍发的，苏联人无疑地截取到了这份电报，我沒有机会设法阻止。不过，我还是让杜勒斯知道我的愤懑：

420 我不能不感觉到，在这特定的时刻进行的公开通信将对苏联的心理产生极其不幸的影响。正如本使馆所报告的，祝贺总统重新当选的目的在于向全世界表明，尽管世界舆论对苏联在匈牙利的行动有了强烈的反应，同美国的关系仍然可以被看作是正常的。我十分担心，这些函电往来将证实这一策略收了成效。

在这一年的其余时间里，西方的代表们沒有参加克里姆林宫的大部分招待会。我出席了一次克里姆林宫为波兰人举行的晚会，但因赫鲁晓夫谩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中途退席。1月初，我觉得我们已经达到目的。在谢皮洛夫外长同我接洽并建议我们恢复联系之后，我把这件事情同英国、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大使商量。我们大家一致认为，永远采取抵制态度会使我们显得荒唐可笑，于是我们又开始接受参加招待会的邀请。

新上任的法国大使莫里斯·德倘始终反对用抵制社交活动的办法来显示我们的反对态度。他使劲奉承苏联官员，过分信任他们的言论。甚至在1956年夏季苏联出卖巴黎，违背葛罗米柯的诺言去投票支持联合国把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列入议程之后，甚至在同年秋季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莫斯科向法国递交了一份威胁性的照会之后，德倘还是去拍苏联人的马屁。苏联人很了解他的态度，并且把他看透了。

当我的精力集中于克里姆林宫对匈政策的时候，我的班

子则忙于设法搜集匈牙利事变对俄国人民的影响的线索。当西方人向俄国人提问时,他们总是按照传统的方式不置可否。然而，他们对匈牙利的感情十分深厚，偶尔也流露出一点眞情。使馆人员很快得出结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广播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是同情匈牙利叛乱者的。有许多导致这个结论的事件。11 月初，一位大使馆官员到列宁图书馆去听国际问题讲演。听众约有二百人，多数是学生。讲演结束时，讲演者要求听众提问。他收到了五十一个写在纸片上的问题，都是关于匈牙利或波兰的。当讲演人拒绝讨论这些问题时，听众中间有个年青人要求听一听匈牙利的“眞相”。讲演人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作为回答:“听众中间有谁认为苏联报纸是不报道眞实情况的吗?”全体听众一齐站了起来。当讲演人继续阻挠大家谈论波兰和匈牙利问题的时候，听众走出了讲演厅。在几天之后的另一次讲演会上，当讲演人用陈词滥调回答问题时听众一哄而散。

421

有个莫斯科大学生是一位苏联高级官员的儿子，他在苏联进攻匈牙利以前对一名使馆官员说,匈牙利人憎恨俄国人,匈牙利政府只是因为有红军驻在那里才保住政权。他说红军必须撤走，匈牙利人应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有个俄国知识分子对使馆的另一名官员说，“我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

有些年轻的俄国人为苏联使用武力辩解，理由是独立的匈牙利可能威胁苏联的安全。有些人还指出，苏联人有采取行动的权利，因为苏联人民为了把匈牙利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有过很多牺牲。

然而，毫无疑问，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使得俄国人想到他们自己的命运。学生常常提起的话题之一是政府和党的头头同工厂工人之间在工资上的大相悬殊。12月11日，在一次公开讲演会的提问时间里，听众中有两个人想起了列宁在革命前提出的工资平等的纲领。他们指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以及专家每月挣两万到四万卢布，而工厂的合格工人的收入则不足一千卢布。“列宁的纲领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提问者中有个人问道。当讲演者表示不相信存在这种悬殊时，他从人群中得到一片嘲骂声。听众中间有些人就苏联农业的失败说了一些坏话，说不能叫斯大林一个人来负责。言外之意是赫鲁晓夫也要受到谴责。

在莫斯科大学上学的法国青年告诉法国大使馆（它同我们分享情报）说，这所大学的一个共青团小组通过了一个三点纲领：要求收入的分配更加平均，报刊的报道更加广泛，并公布其他国家生活水平的统计数字。这个决议一定会使一些党棍不寒而栗。就维持政权来说，布尔什维克党人最担心叛逆的知识分子和心怀不满的工人结成联盟。工人闹事的迹象我们了解不多。最可靠的消息之一是莫斯科的卡冈诺维奇钢珠轴承工厂因新的操作规章和工资制度而罢工三天。

422

赫鲁晓夫认识到学生对劳动条件表现不满的潜在危险。他在11月8日的一次演说中提到青年在匈牙利革命中的带头作用，然后接着说，“必须不断提高我们的警惕，更多地注意改正对青年的教育。”《真理报》和苏联其他报刊抓住这个暗示，要求加强思想工作，肃清外国反动思想的残余。

风潮继续闹了一段时间。1957年1月，曾经向瑞典大使

暗中透露贝利亚被捕消息的那个俄国人报道，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汽车工厂的三万五千工人在罢工，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由于学生的越轨行为而遭关闭，莫斯科的警察加强了监视活动。

莫斯科为镇压匈牙利暴动而付出的最大代价是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共产党和同情者所受的损害。在反对希特勒的战斗中成百万人抛头颅洒热血建立起来的苏联的英雄形象损坏了。许多党员抱着厌恶的心情退了党。共产主义的形象再也恢复不了原先的那种纯洁性了。苏联人在匈牙利使用武力的行动得到共产党集团其余部分的支持——它一定曾经力求征得中国的赞同——但他们随后的行动却导致了同铁托的进一步疏远。南斯拉夫人决不原谅苏联人对待纳吉的行为。作为对苏联保证纳吉不受伤害的答复，南斯拉夫大使馆把他交给了苏联当局。最后纳吉被处决了。12月，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对我说，他认为"斯大林主义分子"正在进行动员，要把南斯拉夫同其他共产党国家隔离开来。虽然米库诺维奇被另眼相看，他对同莫斯科的未来关系仍然抱着悲观的看法。尽管互相频频访问，表示友好的言词说得天花乱坠，南斯拉夫人和苏联人却从来没有解决过他们的意识形态争端。

美国怎样才能利用它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巨大挫折呢？驻维也纳大使卢埃林·汤普森在11月初建议说，我们应该竭力想出一些具体的办法，把反苏情绪导入建设性的计划。他说，由于在卫星国上空放送带着自由信息的气球和播送美国之音及自由欧洲电台的节目这样一个大事宣传的运动，美国是负有采取行动来帮助东欧国家的道义责任的。不过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谴责艾森豪威尔政府、特别是杜勒斯所发表的

423

遏制共产主义和解放"俘虏国家"的言论。他们指责说，美国为了保证援助匈牙利而弄得精疲力尽。

我不相信从美国发出去的解放俘虏国家的任何广播或言论同匈牙利叛乱有什么关系。暴乱来自匈牙利内部的事态发展，是人民憎恨共产主义的清楚表现。在我于1957年回华盛顿之后不久，对于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在暴动之前和暴动期间究竟广播了些什么，作了一次仔细的检查。在任何广播节目中都沒有可以解释为建议提供援助的东西。有过那么一次可能有点不够策略的广播，但它只是泛泛地谈到外部世界同情和支持匈牙利人民解放自己的努力。充其量也只能说仅有少数匈牙利人被1952年选举运动中政府使用的"解放"这个字眼所迷惑。"解放"一词是二次大战期间使用武力使被占领的土地得到自由的意思。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解放"可能意味着美国将使用武力去拯救卫星国地区。不过沒有证据表明匈牙利人就是按这样的含义来解释这个词的。

汤普森大使建议由美国迫使苏联明确答应在六个月或一年内从匈牙利撤军。我反对这个主意，理由是苏联人和卡达尔傀儡政府将有充裕的时间来巩固他们的政权并肃清留下来的反共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我劝告杜勒斯说，"除了继续坚持我们的道义立场之外，在这紧要关头我看不出有什么可能帮助匈牙利人民的好办法，要不就是使用武力，"而这种办法自然不在考虑之列。我自己的意见是，应该考虑向莫斯科建议举行关于裁军及有关事项的高级会议，作为对苏联保证遵守联合国关于匈牙利问题的决议的回答。对此，国务院表示有兴趣，但指出——我也同意——时机不合适。总统刚刚拒

424

绝了瑞士提出的五大国举行裁军会议的建议，原因是其中的某些问题正在由联合国加以研究。

西方国家的行动自由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限制，即以色列-英国-法国入侵埃及的危机损害了我们作为小国保护者的道义立场。如果这场革命是那个时期的单一事件，我不能担保西方国家会在匈牙利问题上采取什么行动。美国同英法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争端在某种程度上转移了对匈牙利问题的注意力。尽管我确实不相信有什么东西能够抑制苏联，联合国里却可能采取强烈得多的行动。

425

第二十四章　苏伊士运河危机

当纳赛尔总统于 1956 年 7 月 26 日宣布埃及要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时，苏联报界显得得意忘形。《眞理报》用了两栏的篇幅报道这个新闻，详细援引了纳赛尔在亚历山大的讲话，自豪地指出所提到的埃及购买苏联武器的事情。几天之后，我奉杜勒斯国务卿之命前去拜会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就美国抗议纳赛尔片面废除 1888 年苏伊士运河国际条约一事进行解释。谈话变得有点激烈，我一度批评说，纳赛尔的行动在我看来是希特勒的手法在国际场合的复活。一听这话，布尔加宁明白表示极大愤慨，他挺直了身子——他身材肥胖，但个子不高——说他不能忍受对一个友好国家的元首作这样的评论。我指出，我的话并非评论，只是一种比拟，而我认为这样比拟是恰当的。希特勒也曾单方面废除了条约。我沒有说出来，不过，经历过纳粹违背 1939 年的希特勒-斯大林条约而于 1941 年发动侵略的俄国人完全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当然，在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方面，我沒有把纳赛尔同希特勒相提并论。我们的谈话转到了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并且和和气气地分了手。苏联打算充分支持纳赛尔，这是清清楚楚的。理由之一是布尔什维克党有支持国有化的传统；另一个更为不祥的理由是，苏联对于用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办法在中东获得立足点的兴趣不断增长。

苏联曾经是最早支持以色列的国家之一。1948年，它在美国之后不过几分钟就承认了中东的这个新国家。苏联显然认为，以色列将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反英飞地，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组织是那里唯一的反帝团体。此外，在这新国家里有许多左翼的欧洲移民，苏联人错误地认为他们将是亲共的。当以色列同西方、特别是同美国发展了牢固的联系，而纳赛尔谴责了反共的巴格达条约的时候，苏联一下子转到埃及那边去了。布尔什维克党人这样做，只是恢复他们的传统政策而已。布尔什维克运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由来已久，其原因不是种族上的，而是组织上和政治上的。例如，列宁认为东欧和俄国的犹太人工会组织全犹太社会民主联合会同布尔什维克的目的是针锋相对的。斯大林觉得，犹太人把无产阶级革命从属于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目标。在二十年代的权力斗争中，斯大林毫不犹豫地使用反犹主义作为反对托洛茨基的武器。苏联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是极端自相矛盾的，有时严峻，加以压制，另外一些时候则采取宽容态度。但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从来没有把具有任何犹太复国主义倾向的犹太人看成地道的苏联公民。犹太人竟有高于苏维埃国家的效忠对象，这是他们感到不快的。 426

在我当驻莫斯科大使的时候，我常常听到秘密审讯犹太人的事件。例如，1956年7月23日，我从以色列大使馆间接听到，4月间在莫斯科有过一起审讯十二名犹太人的事件，罪状是进行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组织犹太复国主义地下团体以及给以色列人提供绝密情报。被告们被判处三年到十年徒刑。大约同一时间，据说列宁格勒也发生过一起类似案件。

苏联支持阿拉伯人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俄国人在中东的野心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沙皇们总想获得温水港，他们想使俄国成为地中海国家而沒有成功。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领导人的行径不过是效法沙皇而已。在二十世纪中期，重要的区别在于，随着英法势力的衰落，俄国人发现了打进去的大好机会。美国支持阿拉伯人的死敌以色列，给苏联人的行动提供了完美的环境。阿拉伯人口的分量——也许是三千万对二百五十万犹太人——对于通常有远大眼光的苏联人来说肯定是有影响的。

使困难复杂化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纳赛尔受到了美国的阻挠。1954年初，纳赛尔要求美国向埃及出售武器。他说，以色列的袭击迫使他向埃及军队提出的武装起来保卫国家的要求让步。当他被华盛顿拒绝的时候，他就求助于莫斯科，它于1955年秋作出了由捷克斯洛伐克出卖军火的安排。这样就开始建立了埃及的军事能力，这件事情终于使苏联成为中东地区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家。

427

在1954年和1955年的莫斯科，苏联政府的亲阿拉伯、反以色列的姿态一直是比较明显的。1955年4月27日，沒有一个苏联官员出席以色列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这显然是对释放袭击特拉维夫的苏联和捷克使团的“恐怖主义分子”一事表示抗议。我电告华盛顿说，“我们见过苏联官员回避外交界的国庆招待会(如对巴基斯坦)，但是从来沒有象这次这样彻底。另一方面，‘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相形之下却一直受到最热情的对待。”1956年2月1日，俄国出生的以色列大使J·阿维达拜会莫洛托夫，他鉴于苏联公开支持阿拉伯国家，

要求莫洛托夫澄清苏联对以色列的政策，但是显然沒有得到满足。十天之后，苏联宣布它将帮助埃及在开罗建立一个为和平利用原子能服务的核-物理研究所。这年春天，赫鲁晓夫对法国社会党的一个代表团说，阿拉伯-以色列之争实际上是一场老式帝国主义的石油之争，美国反对英国，也在较小程度上反对法国。他说，苏联在其毗邻的近东国家有着切身利益，因而给埃及提供武器援助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这年暮春发生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秘密审讯。7月间，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苏联人对他颂扬备至。

杜勒斯国务卿关于撤消美国援建阿斯旺水坝的建议的蛮横通知，跟纳赛尔总统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之举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我倒倾向于认为杜勒斯的拙劣行动无论如何不是接管运河的唯一原因。对纳赛尔来说，英法占有和运用这条水道破坏了埃及的主权，他想纠正这种局面已非一日。杜勒斯不过促使纳赛尔早下决心罢了。为杜勒斯说句公道话，也应当指出，世界银行对于埃及政府提供一部分修建水坝的资金的能力是持否定态度的。

西方国家对于纳赛尔夺取运河提出第一次抗议之后，就开始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争端。苏联人起初并沒有暗示他们要从中渔利。7月31日，赫鲁晓夫发表讲话，建议就苏伊士运河问题进行国际谈判。他一方面原则上支持埃及有权实行国有化，同时并不完全同意纳赛尔认为埃及有权单方面决定运河使用规章的主张。赫鲁晓夫说，应该有通航的自由。鉴于土耳其人占有达达尼尔海峡，苏联人多半也不愿意看到为单方面控制一条国际水道树立一个先例。他的讲话显 428

然是打算给国有化提供支持并在任何谈判中给纳赛尔以友好声援，借此安抚埃及的。"赫鲁晓夫维护苏联通航自由的利益的言论，"我电告华盛顿说，"可能是企图证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有权参加任何国际谈判的第一个步骤。"

8月1日，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瑞士人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向我强调说，苏联对于运河的通航自由感兴趣，但是，在我指出国际协议已被破坏的时候，他沒有直接答复。我深信苏联人是眞正担心中东爆发战争的，并且想参加盟国正在筹备的苏伊士运河使用国的会议。起初，苏联沒有被邀作为发起国，这显然是由于它的亲纳赛尔立场。这是苏联人为了宣传的目的而加以利用的一个错误。8月3日盟国决定邀请苏联与会。

杜勒斯把邀请苏联的决定通知我时，要我悄悄告诉克里姆林宫：美国好不容易才制止了英法的军事行动；在华盛顿看来，设立一个国际机构以保证对运河作出自由而不加限制的安排，是最符合美苏两国的利益的。几天之后，杜勒斯指示我向莫斯科的高级官员表明，如果苏联人认为一旦会议失败美国不会同英法团结一致，那将是"严重的误解"。为了激起苏联官员对那些同苏联保持特殊关系的政府施加影响，杜勒斯要我给俄国人讲点儿历史教训：不管美国同它的盟国开头有429 什么分歧，只要它下了赌注，它必然是会卷入世界危机的。杜勒斯在电报中补充说，他个人认为问题十分严重，除非会议开成，会议的结果基本上为埃及所接受，否则"其后果将是采取强制性的行动，从而有使问题扩大化的严重危险"。

这一时期招待会频频举行，我要让苏联领导人了解美国

的观点是并不费事的。即使没有这类交谈，我也容易断言，苏联会派出代表但同时又对会议的组成和宗旨表示强烈的保留意见。果然，莫斯科于8月10日以高度宣传性语言在一份照会中谴责英法的"镇压"，并表示支持埃及。那份照会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苏联的目的在于挫败西方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当时关于英法可能使用武力按照它们自己的条件重开苏伊士运河的议论甚嚣尘上。在给国务院的一份电报中，我表示相信：克里姆林宫断定时机不利于西方国家采取实际军事行动；即使有限度地使用了武力，苏联也能够成功地置身于冲突之外，同时充分利用整个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的反应。我相信，他们所指靠的是苏联报刊如饥似渴地加以转载并且无疑是加油添醋的证据，认为英法两国的舆论反对使用武力。我用也许是太动感情的口气作出结论：

在这个形势下，苏联政府有一切机会可以对埃及施加其确定无疑的影响，使之走向和解并适当照顾旁人的权益，但是它却为自己打算，选定了挖空心思向阿拉伯人煽风点火并使得按照西方国家所能接受的办法来解决问题难上加难这样一条道路。

我从莫斯科飞往伦敦参加8月18日开幕的会议。我的任务主要是旁听性质，因为我没有充分获得杜勒斯的信任，无从了解他的内心活动。我总觉得杜勒斯在这次会议上表现得非常糟糕。他隐蔽了露骨的诡计甚或欺诈的锋芒。简单地说，他说话两面三刀。当着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面，他讲起来好象是支持他们的；对俄国人呢，听起来他是反对英法的。他到苏联大使馆拜会苏联新外长谢皮洛夫时我跟了他去。谈话 430

使我感到尴尬。尽管杜勒斯的欺诈是笨拙的，他还是成功地欺骗了对外交事务不很熟悉的谢皮洛夫，使对方同意给予运河使用国在运河管理上享有支配权的规定。后来，显然是在同莫斯科磋商之后，谢皮洛夫认识到这个规定违反了他所受到的指示和苏联的基本目标，就收回了赞同的意见。

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对杜勒斯感到惴惴不安。他肯定是同情他们的立场，不为纳赛尔辩护的。但是他也深切地了解美国的舆论，理所当然地竭力劝说英法放弃军事行动。困难就在他对问题的处理方面。他太圆滑了，总想象华尔街的律师那样证明他的论点。

如果断言杜勒斯推动了英法在苏伊士运河采取军事干涉，那也许是言过其实的。如果美国全心全意支持英国和法国的立场，愿意对纳赛尔施加更大的压力，巴黎和伦敦说不定会取消它们的军事行动计划。我并不是说我们应当附和英法的任何军事行动的威胁，当然更不应当参与他们的实际进攻。虽然英法振振有词，它们不能倒转历史的进程。杜勒斯把苏伊士事件看成是帝国主义的垂死挣扎。

也许杜勒斯这样做是因为关于英法要进行武装干涉的谈论很多。在一次午宴上，英国两院情报委员会负责人肯尼思·斯特朗爵士告诉我，决定还没有作出，但是这个问题在郑重考虑中。他是强烈反对这种行动的，并且说，只要我捡起报纸看见法国和英国已经进攻苏伊士运河，我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这整个冒险行动描写为一场败局。他说，英国在运河区驻兵八万人达几年之久，但对埃及政府的政策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他说，1956年在运河区重新确立西方的据点，也许收效

更微，除非英法去卡住脖子，那就是说，占领开罗和亚历山大。入侵发生时我记起了那一番话。

会议沒有采取军事行动，而是派遣使者向纳赛尔提出某种可能会恢复1888年条约和通过谈判规定国有化的方案。这一努力由于双方都不准备作出必要的让步而以彻底失败告终。这里应当顺便指出，在阿拉伯国家同英法交涉的过程中，大街上滋事的群众往往影响了政府的最后决策。从性格上讲，阿拉伯人是个感情容易冲动的民族。但是在广播台上阿拉伯各国政府可以作出决定，并把这些决定强加于人民而不必担心他们抗议，因为政府沒有什么可以同人民群众沟通情况的工具。然而，广播改变了每个阿拉伯政府的国內地位。由于喇叭遍布于集市的每个角落，任何煽动家都可能煽起居民的民族主义的、种族的和宗教的激情。假如有言论自由，一个反对派领袖是有可能煽动暴民去反对政府的。有趣的是，广播变成了对任何想要妥协的政府的一种有力的约束。它于1956年肯定地束缚了纳赛尔。他必须顾虑人民的反应，因而拒绝了这次会议的建议。

431

英国人觉得上了杜勒斯的策略的当。他们认为美国并沒有明确的政策，只是试图阻止埃及公然采取非法行动而已。尽管杜勒斯继续主张通过联合国的讨论采用“制止”的办法，英国人还是向法国人的压力屈服，参加了对纳赛尔采取闪电式的惩罚性讨伐的秘密计划。法国政府想进行这一打击的原因同苏伊士运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巴黎之所以想给纳赛尔毁灭性的一击，是因为他在开罗窝藏了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以色列人则由于对埃及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感到

担忧，早就希望削弱他们的仇敌。

10月29日，以色列没有正式地或非正式地关照美国，就进攻西奈半岛。次日，英法把它们的进攻舰队停泊在埃及海面，向纳赛尔提出了最后通牒。正当全世界都在等待他的答复时，我在克里姆林宫参加招待会。我正在跟朱可夫谈话时，莫洛托夫走近我并且问道，“美国打算怎么办?”我告诉他，我的政府对于以色列的侵略看得极其严重，并已建议把这个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莫洛托夫用极端挖苦的语调含蓄地说，如果美国真想阻止以色列的侵略，它本来是能够做到的，因为它对以色列有着巨大的影响。我回答说，他弄错了，美国已经竭尽所能去阻止军事行动，我还提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给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写了几封私人信札这件事情。

莫洛托夫稍稍改变了他的论据，说英法将要参与这次进432攻，因为它们想惩罚埃及。我问他怎么会相信那个看法的，因为他必然知道英国曾经警告过以色列：如果约旦受到进攻，英国就要保卫约旦。我说，除此之外，我也不信英法这两个民主国家不经过大量的舆论准备就能作战。莫洛托夫含着冷笑说，“咱们等着瞧吧。”于是我也刺了几下莫洛托夫，回顾了前一年杜勒斯国务卿对苏联提出的在局势如此紧张的时候向埃及提供军火是多么危险的警告。“侵略者是以色列，而不是埃及”，莫洛托夫说。我感到在反击中有点处于劣势，就限于反复申述美国为了防止中东战争已经尽力而为，并且表示，如果他相信我的话，那将是明智的。

过了几个小时，英法开始轰炸埃及，我后悔不该过早地为我们的盟国辩护。我下一次见到莫洛托夫的时候向他承认了

错误。他有几分洋洋得意，但是没有重提这件不愉快的事情。

附带提一句，我的初步见解是，尽管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进攻是令人遗憾的，它也表示了苏联的中东政策的失败，因为它表明苏联无力保护埃及。不过，这场战争也起了转移对当时处于高潮的匈牙利革命的注意力的作用，并可能使克里姆林宫相信，它能够更加放手摧毁这场叛乱了。

在为英法辩护时碰了壁之后，我就守口如瓶，并且叮嘱使馆工作人员也这样做。有些美国人沾沾自喜地在这种关系重大的问题上反对我们的盟国，我可没有这样的思想感情。我电告杜勒斯说，"当前形势中最令人不快的特点之一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发现自己竟同苏联人站在一起。"在一次为比利时举行的招待会上，卡冈诺维奇在自取饮食的餐桌边上碰到我，他说他认为美国和苏联一道应当有所作为。随后，谢皮洛夫在外交部召见我，给我一个照会。照会在谴责了这次入侵之后，建议在必要时由美苏采取联合行动——它的含义是军事行动——对付美国的两个最亲密的盟国英国和法国。我大吃一惊，询问苏联政府叫我把照会送给美国政府是不是在开玩笑。当谢皮洛夫向我保证他的政府是郑重其事时，我对他说，照会我可以转达，但华盛顿未必会认真受理，也没有接受这种想法的可能。照会警告说，如果侵略不停止，苏联将"保留其行动自由"。与此同时，向英法发出了暗示要使用核弹头洲际导弹的严厉警告。 433

我立即把照会送交华盛顿，两小时后又紧接着送去对照会的评价，指出莫斯科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即使不完全是)想转移世界对匈牙利问题的注意力。然而我提醒说，如果把

这个照会草草地归结为“空洞的宣传姿态”，那是轻率的。我说，因为苏联在匈牙利已把道义责任的任何借口弃置不顾，说不定这次在中东会“比正常情况下更愿意冒孤注一掷的风险”，并具体提到对伊朗进行威胁的可能性。在那份电报里和次日(11 月 6 日)的电报里，我指出了有诱导英法宣布立即停火的必要性。我也敦促华盛顿警告苏联，针对英法的任何军事行动将会遭到美国的武力对抗。我高兴地获悉白宫确实发出了这样一个警告。在法国人和英国人对于美国在苏伊士危机中所起作用的激烈批评中，美国这一强烈的反应往往受到他们忽视。

艾森豪威尔也向伦敦和巴黎发出了严峻的照会，要求停止入侵。我相信，正是这种压力而不是苏联的威胁，迫使英法于登陆后一天要求停火。

虽然苏伊士的大部分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苏联人在把他们的坦克隆隆地辗过匈牙利人脆弱的防御工事的同时，却继续在中东煽风点火。报纸充塞着有关抗议集会的文章。据报道，如果英法和以色列人坚不撤走，红军老战士就要志愿到埃及参加战斗了。这种想法显然在两个月前已经由赫鲁晓夫提出来过。在一次为罗马尼亚人举行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对法国大使德尙说，如果为了苏伊士问题发生战争，“阿拉伯人是不会孤立的”。他说将有大量“志愿人员”，并补充说，“如果我的儿子想参加志愿军，我要为他祝福。”入侵开始之后，我在给华盛顿的大量电报中提到了苏联有派遣志愿部队的可能性。在这些电报里并没有惊慌的心理，不过，直到 11 月中旬我才充分强调了苏联报道的宣传目的。气氛非常紧张（人人

记得中国扬言要派志愿军到朝鲜去的威胁曾被忽视)，以致华盛顿真的认为苏联快要派遣志愿人员了。11月15日，我通知国务院说，我倾向于认为“志愿军”的威胁主要是一种旨在威动阿拉伯人和对英法增加压力的宣传武器。我认为，如果恢复战斗，某种形式的志愿军计划可能付诸实行。在同一电报里，我比较准确地预测了苏联的意向。我说，如果苏联人能够在苏伊士地区赶走一切外国军队，他们接着就会进行包括人员的培训在内的军事援助，以装备和训练阿拉伯人。对阿拉伯人来说，军事建设的目的是针对以色列的。但是我说，苏联的最终目的是组织阿拉伯民族，以便在中东和非洲扫除西方的影响和经济地位(当然包括美国在内)。

我越是琢磨苏联志愿军问题，我就越觉得苏联人是在虚张声势。苏联人是不会采取有可能使他们直接或间接投入中东战斗的公开行动的。苏联的军事态势并不同美国及其盟国旗鼓相当。此外，苏联并没有能够把志愿军运到这个地区的方便途径。他们必须借道同西方友好的国家——土耳其或伊朗。

在苏伊士危机期间，赫鲁晓夫只有一次暗示了他担心在中东爆发一场大战。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私下谈话中，他对于在苏伊士问题上“有必要”向英法递交措词严厉的照会一事向瑞典和芬兰的大使表示遗憾。根据我所了解的谈话情况，赫鲁晓夫退而依靠这样一个借口：苏联必须采取行动使联合国不致垮台——如果敌对行动再延续一周，联合国必将荡然无存。他坚持说克里姆林宫从来没有考虑在中东单方面采取行动；它总是打算同其他国家在联合国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

赫鲁晓夫对斯堪的纳维亚人说，苏联想同西方维持良好的关系，但是他对以色列人显示了根深蒂固的愤怒。他说，苏联无需使用飞机或原子火箭，只消用常规火箭就能够把以色列人解决掉。这一番话给中东地区依然存在的危险火上加油。传闻叙利亚和约旦正在考虑对以色列发动一次进攻，这一消息使局势更加紧张。

435 苏联的大规模宣传运动和布尔加宁所发出的照会（这些照会一定出诸于赫鲁晓夫手笔)的好战语调，使我们的中东盟国感到忧虑。与苏联毗邻的伊朗是特别敏感的。我不知道建议是哪里来的，不过 11 月中旬国务院问我：如果美国宣布它愿意帮助伊朗保卫主权，以此来发动巴格达条约国家，苏联可能作出什么反应。我的判断是，苏联会大吵大嚷，一口咬定美国要建立空军基地，并把这一行动指责为表明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包围苏联的又一证据。我不相信苏联会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但是会设法促使亲苏的人民党恢复活动，并加紧动摇伊朗的民心。不过我反对援助伊朗的建议，理由是它会降低美国对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并使我们完全同名声扫地的英国人站在一起。此外，我并不认为苏联打算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土耳其也是焦急不安的。土耳其人确信苏联人在他们的上空飞行，他们给美国送了一份备忘录，要求给予援助，并表示愿意考虑对叙利亚作一次预防性的打击。在拍发给华盛顿的一份电报里，我表示不相信苏联会直接威胁土耳其，也不相信苏联人正在侵犯土耳其的领空。我认为帮助土耳其加强空防并无危险。至于派遣美国军事力量，我认为派遣防御性部

队——雷达分队和歼击机中队——是“值得一冒的风险”。但是我规劝说，派遣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携带全部核武器配备的轰炸机，则可能被苏联人视为进攻迫在眉睫的明显迹象，因而可能引起慌忙的反应。我劝告华盛顿不要派任何飞机去，至少在对土耳其有更加可靠的危险证据之前不要这样做。

至于对叙利亚的可能打击，我写道：

> 目前的一种危险是土耳其人乐于在美国撑腰下考虑对叙利亚采取防御性行动的明显迹象，因为这种行动在当前条件下将是极端有害的，我也不敢冒昧地预测在发生这种事件时苏联会作出怎样的反应。这种行动除了含有重新掀起对埃及的敌对行动的全部危险之外，还要加上某些特殊的危险。总的来说，我想我们应当准备采取任何足以保证土耳其自身安全的合理措施，但以土耳其人不首先进攻叙利亚为条件。英-法-以军事行动的后果看来已充分说明了新的预防性行动是愚蠢的，除此之外，我相信存在着其他政治的和经济的办法，很可以用来挫败苏联在这个地区的长远计划。 436
>
> 如果证明确实侵犯了土耳其的领空，我认为除了采取实际措施……以加强土耳其的防空能力之外，对付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莫过于通过联合国(必要时以美国为后盾)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

苏伊士危机在莫斯科产生了反对外国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批游行示威。以色列、英国和法国的大使馆成了示威的目标。游行示威是由党的机构仔细策划好的。每一个参加游行示威的人都被告知他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暴力行为通常是禁止的。11 月 5 日——在埃及登陆那天——当一个官员匆匆进来说他刚刚接到英国大使馆的一个成员打来电话，说是一群俄国暴徒正在“袭击”使馆大楼的时候，我正好坐

在我使馆的办公室里。我感到吃惊,许多想法涌上心头。当时我们正在开一个骨干碰头会，我们就琢磨这个消息从苏联政策的角度来看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莫斯科是沒有自发性示威游行的，这次示威游行准是当局下了命令的。在我们得出结论之前,从英国人那里传来了比较准确而使人安心的消息。幷沒有“袭击”使馆大楼的事情。一群举着诸如“从埃及滾出去”之类标语的示威者窜入院子，在那里兜着圈子。沒有发生暴力行动。同样的情景也在法国大使馆和以色列大使馆出现。

有一些好笑的侧面新闻。会讲俄语的英国大使海特向站在游行示威者中间的一个民兵将军询问这场胡闹的举动何时结束。那个将军看着手表回答道:“还有二十分钟。”另一个民兵拣起一块已经掉下来的牌子，把它重新钉在栅栏上。在法国大使馆，有些示威者的标语是用中欧现代犹太语写的。显然,这些示威者本来是应该到以色列大使馆去的。

我命令美国大使馆的人员一律不要上街，但是几小时之后,一切都很平静,我收回了命令。

12月17日,葛罗米柯把我叫到外交部去，对于纽约的匈437牙利人及其支持者针对苏联使团的一系列游行示威大发牢骚。我给华盛顿发了电报,迅速收到回电,说明纽约警察怎样大力保护苏联使团及其雇员的情况。我拿了电报到外交部去，给经验不足的部长助理扎哈罗夫念了一遍。我还沒有念完,他就从硬纸夹里掏出一张打了字的纸,念给我听。这是一个声明,它硬说美国沒有为纽约的苏联官员提供充分的保护。它还接着说,莫斯科“居民”对这种情况感到义愤填膺,最后明

白地说莫斯科人民可能要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表示愤慨。我马上对扎哈罗夫说，我将被迫向我的政府报告，说苏联政府正在策划一次针对我们大使馆的示威游行。他否认有这种计划，但说他不能预言莫斯科人的反应。游行示威没有举行。我不清楚为什么取消了。

苏联那种受控制的游行示威究竟有什么价值，是值得怀疑的。这种游行示威表示了苏联政府的不快，但是也教给了俄国人民一种申诉他们真正冤情的方法。我认为，1970 年由于对犹太人的处置和审讯而爆发的自发游行，是诱使克里姆林宫放松其向以色列移民的限制的一个因素。

赫鲁晓夫没有把苏联的敌对表示局限于正式的照会和受控制的示威游行。对他来说，这是一件私事，他在喝酒的时候，他的嘴巴是没有遮拦的。11 月 17 日，在为哥穆尔卡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当赫鲁晓夫在一篇事先准备好的讲话里对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由于它们入侵埃及而加以粗暴攻击的时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其他大使和我中途退席。次日，他在波兰大使馆作了即席发言，显然是伏特加酒对他产生了影响。他嘲笑了英国人和法国人把入侵叫做警察行动的说法，把以色列说成是“大老板为了减少自己的牺牲而派去打头阵的马前卒”。在这个时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大使们走进了隔壁的房间，等到这篇冗长的杂乱无章的讲话结束了才出来。当我们离开那个房间的时候，我们听到赫鲁晓夫说，“我们要埋葬你们。”这句话并不包含象西方人可能认为的一种致命攻击的意思。它只是一种比喻，表示对长期斗争最后取得胜利——参加对手的葬礼——的信心。

1957年2月，紧张局势有些缓和，4月间克里姆林宫再次强调和平共处。在我没有出席的一次阿尔巴尼亚招待会上，赫鲁晓夫着重表示了苏联跟西方重新建立外交接触的愿望。他情不自禁地提到了共产主义由于其“优越的原则”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他说，生活在同一星球上的现实使得有必要维持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的友好关系。他把法国大使德尙称为“亲爱的朋友”，温和地谈到了苏伊士入侵，并且强调了这样一个论点，即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已经认识到这场冒险是个错误。

438

的确，苏伊士事件是一桩令人遗憾的事情。英国和法国遭受了明显的失败。政策是糟糕的，效果是可悲的。这场入侵使得英国的安东尼·艾登政府和法国的居伊·摩勒政府垮了台。不论作了多大努力，美国没有赢得朋友，虽然美国的反对无疑是有助于导使伦敦和巴黎中止军事行动的，可是阿拉伯人并不感恩戴德。

对我们的政策有过很多怀疑，而且是怀疑得有道理的。它在夏天引起人们的误解，而在入侵前几星期则是犹豫不决的。然而，即使此刻回顾起来我也认为除了取消阿斯旺水坝的援助之外，我们的总政策是正确的。我看不出我们还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以色列-英国-法国的意图明确了，美国就坚决加以反对。局势的性质和参加国的政策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夹在中间。夹在中间那个人照例是两头受气的。

从苏伊士事件中坐收渔翁之利的是苏联。莫斯科根本没有放过一枪，也没有采取过任何行动，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一些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认为有功于制止这场战争。对埃及的

吵吵嚷嚷的支持大大地提高了克里姆林宫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声誉。当然,莫斯科同以色列的关系受到了损害,但是苏联人并不特别在意。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决心在中东获得一个立足点，而苏伊士运河危机正好提供了机会。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苏联交付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武器有了显著的增长。赫鲁晓夫同意帮助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苏联人利用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不共戴天的敌意，已经稳步地提高了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影响。

苏联的中东政策特别不受意识形态的限制，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沙皇和布尔什维克都会采取的大国行动。439 由于缺乏意识形态的依据,苏联的理论家们已经感到苦恼,他们多次试图制定某种公式或者根据它来灵活掌握。赫鲁晓夫借口纳赛尔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埃及继续使共产党人处于非法地位这一事实置之不顾。最后莫斯科定下了支持“进步的”阿拉伯政权和反对“反动的”阿拉伯政权的调子。真正的区别在于那个政权是否亲近苏联并反对西方。赫鲁晓夫肯定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说服克里姆林宫的一些成员支持他的政策，因为他后来提到“那些思想狭隘的下流坯”的满腹牢骚，他们对他执行的苏联同埃及保持友好联系的政策竟“说了那么多屁话”。当时我是不知道有这样的反对意见的。

后来,苏联派遣苏军到埃及去。在那以前,苏联是小心翼翼地避免把军队派驻到共产党集团以外的国家去的。这个行动可以解释为苏联对于它的军事力量同西方相比有了更大的信心。由于苏联逐渐增加了它在中东的卷入，别的机会和别的诱惑也出现了。现在苏联变成地中海国家、印度洋国家和

红海国家了。

我不能等待这类事态发展出现以后才给华盛顿一个关于1956年秋天的东欧和中东事件对苏联的影响的评价。12月间，在我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给总统、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其他成员准备了一个两千字的分析。

我的第一个结论是，对于苏联政权的稳定性没有出现任何威胁的迹象。对于苏联的行动表示不安和怀疑的主要限于学生。我的第二个结论是，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由于这几次危机，苏联的对内政策（无论是政治方面的或经济方面的）发生了任何明显的变化。

我也认为，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从波兰和匈牙利的起义中得出两点主要教训是合乎逻辑的。第一点教训是，在工人们某些具体的经济方面的不满仍然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哪怕有限度地放松政治控制也是危险的。第二点教训是向青年和知识分子灌输共产主义教育的失败。“我确信，在布尔什维克的心目中，工人的牢骚和知识分子的不满相结合是他们会从东欧的事态发展中看到的主要的前车之鉴，”我写道。

440 至于将来的政策，克里姆林宫这样做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为了防止这样一种结合，它会很快给予经济上的让步，特别是对工人阶级，同时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生的控制，但不恢复斯大林的严峻手段。

至于对苏联领导的影响，主席团内部想必有过意见分歧，这样推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就其确切含义来说，集体领导几乎肯定包含着意见分歧，分歧的深度取决于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得出结论说，“关于苏联领导有可能发生人员变动的问

题，尽管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情报，中东和东欧危机的境遇以及他们在匈牙利似乎正在面临的无法摆脱的困境肯定会使这种变动比1955年2月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领导体制确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

这个预测证明是正确的。1957年2月，赫鲁晓夫宣布长远的经济改革，分散决策的权力以提高工业效率和对公众要求的敏感性。与此同时，主席团里被某些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笼统地称之为“老卫兵”的一个集团——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正在拟定计划想搞掉赫鲁晓夫的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他们这一举动在几个月内是不会表面化的。

我还蒙在鼓里，华盛顿却正在策划更动它自己驻莫斯科的代表了。杜勒斯国务卿已经决定我不再担任美国驻苏大使了。

441

第二十五章　流放马尼拉

1956年12月26日，杜勒斯国务卿给我一封信，信上说："知道您想专门从事写作，我正在考虑更动一下莫斯科的人事。"他继续说，他打算任命我的朋友、驻维也纳大使卢埃林·汤普森接替我。他建议这一变动在六个月内进行。我并不完全感到惊讶。报上有过一些报道酝酿人事更动的文章。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出杜勒斯是从哪里听到我想退休或写作的。我既无意退休，也无意写作。我还感到恼火，因为这封信看起来是想用一种狡猾的办法解除一个外交官的职务。杜勒斯采取这种策略是没有理由可以辩解的。如果他说他认为一个人担任四年驻苏大使是够长的了，他已经把这个差使答应给汤普森了，这样讲本来方便得多。我是会毫无问题地理解并接受这一决定的。尽管我情愿在莫斯科再呆上一年，因为我对了解那里的事态发展是有兴趣的，我却并不怀疑杜勒斯有权在他喜欢的任何时候进行人事更动。

信中提到所谓我有写作的愿望，言外之意无非是说外交部门不会有我的差使了。虽然我往往同杜勒斯意见相左，我可想不起同他有过真正的争吵。我记得，当杜勒斯在1954年的柏林会议上对雅尔塔协定说了一些刻薄话的时候，我私下对他说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并要他知道我的保留意见。他一声没吭。我当然总是不采取对他公开批评的做法。在某些私

下谈话中我确实对他有过批评；也许我的某些评论传到他的 442
耳朵里去了。

考虑到我同杜勒斯沒有严重的冲突，同时回想起杜勒斯对我的口头赞扬，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给我的一封信里所说“我这里关于你的每一份报告都讲，沒有一个驻莫斯科的美国代表能够象你现在这样作出非常出色的成绩”，我认为可能他眞的相信我想退休从事写作这样一个错误的想象了。我打电报给他说，我从来沒有想到要退休从事写作，如果他的行动在任何意义上以这种虛妄的前提为依据，这个行动必须加以纠正。我在电报里指出，为了辟谣，几个月来我曾对莫斯科的记者讲过我无意辞职或者要求调动。因此，如果有人问起，我就不能说我已要求调任了。“最好的解决办法”，我说，“或许是声明说，四个年头已经超过了正常的任期，因此这项职务已经事先答应让另一名官员来接替了。”我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调动的决定。但建议这项更动要“在尽可能早的时机”进行。至于我的未来出处，我建议回华盛顿商谈各种可能性。

我相信杜勒斯认为，经过四年之后更动一下莫斯科的任命是适当的时候了，但是当他考虑到如何处理我的时候，他感到进退两难。他不愿意我在华盛顿，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得把我放在制定政策的岗位上，而这是他所不喜欢的。如果他挑选我去另一个国家当大使，那就可能要为我的确认问题在参议院再作一场战斗。尽管麦卡锡遭到了责难，杜勒斯对共和党的右翼分子还是提心吊胆的。我觉得杜勒斯想到以写作为理由，正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汤普森风闻我的感想之后，给我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

他在信中说，他从来不曾怀有排挤我的念头，决定心甘情愿地要求不再考虑他的提名。这是汤米方面特别令人钦佩的举动。我立即回信说，我不愿他撤回自己的名字，因为我是肯定就要离开莫斯科的，也想不出比他更好的继任者。汤米虽然不是俄语专家，战争期间却曾在莫斯科供职了四年。

在随后的通信中，杜勒斯断定说我想当作家的把戏是行不通了，就提出要我当驻巴基斯坦大使。由于种种理由我拒绝了这一建议。理由之一是派遣前任的驻苏大使到一个邻近国家去是一个错误。这项任命会引起猜测，认为美国卷入了巴基斯坦涉及苏联的政策的拟订工作。第二个理由是，我对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没有兴趣，对它的国情也不了解。那时我想继续搞我的专业——苏美事务。

虽然如此，我还是认眞考虑辞去外交工作或者告假。在给洛伊·亨德森（当时他负责国务院的行政工作）的一份私人电报中，我解释了请假一两年的好处。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斯·米利肯来信邀我参加他那个机构。我被打动了。看起来这是解决整个不幸事件的最好办法。乔治·凯南去普林斯敦大学差不多有一年了。对我来说，这样一个步骤可以避免离开莫斯科之后随着引退而不免要产生的关于意见分歧的猜测。我可以完全坦白地说，我觉得与其接受可能任命的任何外交职务，还不如请假为妙。这样做还可以使我有机会同国务院商量问题或者担任我或许够格的任何特殊使命。

亨德森建议，在我下定决心之前回美国同杜勒斯谈谈。我曾不断敦促杜勒斯让我到华盛顿去澄清一下情况，但是他

担心，由于报界还分明记得我的任命问题所引起的争论，它会以为另一场争论又出现了。最后，我建议他把我的回国说成“例行磋商”，杜勒斯同意了。2月底，我乘飞机离开莫斯科。

同杜勒斯会晤是合乎礼仪的，也是正确的。对我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我是否辞去外交职务。对于他要把我免职的决定，我不去争论，对于我想从事写作的说法，我也不打算驳斥，我只是告诉他我没有离开外交岗位的打算。杜勒斯向我保证说，想更动莫斯科的人员同我在那里的表现毫无关联，言外之意是——虽然他没有直说——我的工作是令人满意的。我想，在他的决定中，对汤普森的许诺是同其它任何因素一样重要的因素。

杜勒斯接着提出要我担任驻菲律宾大使的职务。我对他说我将在下一天给他答复。在我离开国务卿的办公室的时候，我相信我应当辞职。派我去马尼拉将使我离开自己的专业知识领域。我对苏联事务的全部经验将被弃置不用。在一定意义上，我将从我特别够格的美国外交政策领域里放逐出去。我抱着为难的心情前去拜访艾奇逊、洛维特和亨德森，他们一致劝我要平稳地度过风暴。因此我接受了马尼拉的职位。 444

几天之后，当《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显然是国务院有人授意的文章时，我对杜勒斯处理这件事情的恶感加深了。那篇文章说，波伦干了四年之后要求调动工作，还说我辞去莫斯科职务的要求被勉强地接受了。我认真考虑过想进行公开答复——这是可能以我的辞职来收场的举动——但是决定不这样做。

几个星期之后，我在去马尼拉途中在华盛顿逗留期间，到白宫去向总统致敬，这是大使首途履新前的例行公事。在谈话过程中，艾森豪威尔总统说，他看到我离开莫斯科感到很遗憾。他说，对于要不要同意调动我的工作的问题，他争论过很长时间，可是，既然这是我的意愿，最后他只好勉强同意。我愣住了，我告诉总统说我不曾有过离开莫斯科的意思。“噢，真的吗？”他说，然后就撇开了这个话题。总是有人向他提供了错误的消息。

在这不愉快的时节，我收到了法国政府的一份电报，它热情洋溢地竭力赞扬我在莫斯科所执行的任务。我知道这份电报是前法国驻莫斯科大使路易·若克斯鼓动起来的，我同他亲密合作过。

生活在莫斯科与当地隔绝的环境中困难很多（我在那里的全部岁月里，竟没有能够结交一个俄国朋友），但我还是舍不得离开。我幸喜有个出色的班子。我必须特别感谢充任参赞这个二把手的两个人。他们是埃利姆·奥肖内西（他在几年之后死于布达佩斯）和纽博尔德·沃姆斯利。在我离任前几个月，设立了公使的职位，理查德·戴维斯被任命为公使。实际上这个班子的全体成员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俄国问题的专家。他们能说俄语，致力于工作。我的两位秘书——玛丽·沃杰纳尔（她在头三年和我共事）和海伦·艾贝尔（她和我在莫斯科共事了一年，随后跟我到马尼拉，最后同返华盛顿）——忍受了苏联的艰辛生活而极少怨言。

我不能说在莫斯科的四年中建树很多，也想不起我们在445 使馆里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苏联体制的性质没有为个人主

动性提供很多机会。任凭困难重重，我们对苏联的事件和政策的估计在十五年以后的今天还经得住考验。我已经提到某些被证明是错误的判断和某些我乐于未被采纳的建议。但是，权衡得失，我认为我们保证了美国政府经常得到关于苏联的态度、动向和政策方面的充分而精确的情报。大约在我任期的一半，我收到巴里·戈德华特参议员的来信，信中说虽然他于 1953 年在参议院里反对过我的提名，但在听到关于我在莫斯科的工作的良好反映之后，愿意投票确认我到可能被提名的其他任何岗位上去。我想到自己克尽职守而感到自慰。

我的离任伴随着照例的宴会。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于 4 月 17 日为我举行了例行的午宴，这是我在莫斯科的最后一个整天。稍微不同于常例的是米高扬到了场。席间宾主表达了通常的善意和对未来的希望。那天晚上我在叙利亚招待会上有机会向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告别。赫鲁晓夫说，对于我的调动是否意味着改变政策的问题，主席团有过讨论。“他们干吗把您从我们这儿弄走呀？”布尔加宁问道。我解释说，这次调动并没有政策上的意义，总统在其新的任期内更换大使是传统的做法。我说，汤普森是挑选出来的卓越人物，他无疑会采取和我一样的态度。

回顾了种种问题之后，赫鲁晓夫把话锋转到德国问题上去，他说，“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向艾森豪威尔总统表明，除了鼓励东西德接触之外，我们决不前进一步。”布尔加宁随声附和说，“我们决不前进一步。”说了这番话以后，他们就向我告别。

我知道，汤普森这个大使给了苏联领导人深刻的印象。

我离开莫斯科六个月后，汤普森写信给我说，在一次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曾对我的工作表示赞赏，说我总是正确地执行指示，努力改善关系。他表示向我"问候"——致以最好的祝愿。两年半之后，赫鲁晓夫对我的赞扬说得更具体了。我的姻兄弟查理斯·塞耶于1959年夏天访问莫斯科，赫鲁晓夫对他说，我是一位卓越的大使，很受俄国人的喜爱，又完满地代表了美国的利益。但是他补充了一句，说我不诚实。他说他从情报系统得到可靠的证据，证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其他外国的记者曾经援引我的话说他是酒鬼。

446 我写信给汤普森，请他告诉赫鲁晓夫说他"完全是疑神疑鬼"。我竭力否定赫鲁晓夫是个酒鬼的说法，也根本记不得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记者谈过话。赫鲁晓夫爱喝酒的名声是1955年他首次访问贝尔格莱德时得来的，当时记者报道说，他们看见他喝得酩酊大醉。1956年内森·特文宁将军访问莫斯科期间，新闻记者也看见他喝得醉醺醺的。"实际上，"我给汤普森的信中写道，"假如您愿意的话，您可以告诉他，我认为同杯中物难解难分的是布尔加宁，肯定不是尼基塔，当他喝起酒来时，他不过（您也不必跟他说这个）象俄国人那样喝法。"

在我离开莫斯科时有过一点小小的麻烦。4月6日，我就要求允许一架C-124型飞机在莫斯科着陆，以便接运我的家属和我们的家用什物。外交部于4月15日通知大使馆说，可以允许C-54型飞机着陆，但不准C-124型飞机降落。我告诉国务院说，虽然可以设想俄国人在这种巨型飞机在莫斯科着陆时会产生自卑感，我却无法看穿苏联这个决定的背后

隐藏着什么理由。我向布尔加宁求助，他批准了 C-124 型飞机的着陆。

在去马尼拉途中路过华盛顿时，我到弗吉尼亚州的兰利城去，向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介绍了苏联情况（在这之前我向汤普森作了介绍)。这一介绍是把我在莫斯科的四年作一总结。我一向都很尊敬中央情报局的苏联问题专家。他们的密切注意、他们对材料的广泛阅读以及他们从名为美国内部消息的地下工作者那里得来的资料，使得他们洞悉苏联的內情。我首先向他们详细介绍，然后回答他们的问题。在我的总结里，我对苏联的事态发展提出了下列几点：

·秘密警察隶属于主席团是一个成功，政府使用恐怖手段的现象大体上已经消失。

·地方分权的稳步进行是苏联最重要的动向之一。在司法系统和许多正常的警察工作方面，最明显的是在工业部门，权力都在下放。根据来龙去脉，共产党在经济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将日趋缩小。地方党的头头们沒有给人深刻的印象。我不是说党正在消亡，而是大量眞正的权力正在从党的手中一点一点地漏进工业管理人员的手中去。在莫斯科举行的告别午宴上，我向米高扬问起工业上的分权会不会导致政治权力的分散。这个经久不衰的亚美尼亚人脸上毫无表情地回答说，“主席团里有些人懂得这一点。”权力分散的第一步是把制订政策的权力从十一人的主席团扩大到三百人的党中央委员会。 447

·假如我处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位，我对当前意识形态的陈腐和空洞会比对任何其他事情更为担忧。布尔什维克未能

产生那种使其条件反射趋向集体行动的新的苏维埃人。布尔什维克以摭拾马克思主义的一套互相关联的思想起家，用它来排斥并摧毁其他任何哲学、伦理学或行为的体系。然后苏联的权力机构迫使他们在实际行动中不断地戳穿他们自己的学说，加以牵强附会和花样翻新（有时达到非常荒谬的地步），取消其全部真实的内容，只留下空洞的躯壳。俄国人有个恰到好处的字眼可以用来形容这种东西，叫做"陈规旧套"，意思是指一种令人厌倦的、荒唐可笑的死板公式。许多年来思想意识只是个严令遵守的问题。稀奇的是，中国竟是你们所得到的带有生气或活力的任何思想材料的唯一来源。

· 1957年的时候，中国已经被给予了苏联的伙伴地位——诚然是低级伙伴，但到底是个伙伴。另一方面，我看不出有什么迹象表明，由于它们之间有了摩擦，我们就能高枕无忧了。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们的共同利益大大超过任何可能发生的摩擦之点。*

· 东欧的故事远未结束。苏联人心里是极端不踏实的，尤其是对波兰。在他们眼里，他们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是遇到有必要采取行动以对付匈牙利那样的局面。我的预感是，苏联人宁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愿意接受东欧任何一块苏联地盘的垮台，为了保住北朝鲜它也甘冒同样的危险。

· 确实只有一个国家是苏联非常认真对待（当我离开莫斯科的大使馆时）和时刻提防着的，那就是美国。我们是可能

448

* 瑞典大使索尔曼在中国旅行后于1956年6月对我说，苏联驻华大使P·F·尤金告诉他，苏联在原子领域里给中国提供了科学和技术知识，使它能够生产核武器，但是没有给它原子弹实物或生产原子弹的设施。尤金还预料，五年之后中国将变得很强大，以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向它发号施令。

在军事上同他们对抗的唯一的力量集合体，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们是个庞然大物。他们以这样那样方式所做的几乎一切事情，都可以看出美国给予他们的印象所产生的作用。

苏联人对裁军是非常认眞的。我并不认为这是宣传的把戏。显然，他们为本性所决定，总想做一笔对他们有利而对我们不利的交易，但是我们认为他们还沒有抛出他们愿意让步的全部尺寸。为什么？眞正的原因是他们确实相信，不受控制的军备竞赛几乎可以肯定迟早是会以战爭来收场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是确定不移的——那就是，布尔什维克相信促使形势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并不十分注意主观的因素。他们并不怀疑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眞诚和公正，可是他们并不认为各国的重大政治事件或事态发展依赖于个人的纯洁性。*他们相信力量在起作用。他们就是以这种与个人无关的、定数论的态度对待历史的。经济的因素我认为是次要的。假如我们认为苏联的经济经受不住军备竞赛，那我们就是欺骗自己。

在我介绍之后，中央情报局的专家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下面是其中的一些提问和我的答复：

问：您是否认为党的统治的减弱预示着正式政府机关威信和权力的提高？

答：那可能是事态发展的一种情况。我想实实在在地把事情说得非常清楚，当我读到党的作用在减弱的时候，我确实还是指很长的时期而言的。党还是党。斯大林去世后他们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把

---

* 赫鲁晓夫多次对我赞扬总统的裁军问题特别顾问哈罗德·史塔生，说史塔生对这个问题有很深的研究，希望他去访问莫斯科。

党恢复成为一个机构，使它机构化而不是个人化。我在琢磨着这个玩艺儿的不可避免的削弱——更多的权力可能移到冒尖的正式政府机构，最后落入最高苏维埃之手。但是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问：您认为他们长期停止积极使用恐怖手段的结果会对苏联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答：在苏联，无疑地还有巨大的紧张的领域，还有大量痛苦的残余。

449

我认为斯大林死后四年的苏联〔历史〕会引导你们得出不愉快的结论，即现在苏联的局势比在斯大林的统治方法下要稳定得多。苏维埃制度作为一种生活的现实而被广泛地接受。有许多方面是人民希望得到纠正、放宽尺度和加以改进的，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目前正在考虑使用武力去推翻它或者真的要用某种根本不同的东西去代替它。我不相信你能找到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会同意说，"是的，我们想恢复私有制和工业所有权。"我想，那种盼望集体农庄制度垮台的农民是越来越少了。想要废除苏联的集体化制度的任何尝试，现在都会产生难以想象的混乱。你们差不多可以断定会发生饥荒。怎么能废除呢？蛋卷已经煎好了，鸡蛋都打破了。

问：您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苏联最高领导越来越相信我们宁可进行军备竞赛，不愿为达成裁军协议而作出任何真诚的努力呢？

答：我不想深入讨论军事政策，不过人们有这样一点印象，即我们在军事方面的所作所为从遏制的观点来看已超出了形势的需要。

问：是指"斗牛士"〔一种带有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已经部署在西德〕吗？

答：正是。您知道，他们把那件事确实看得非常严重。我觉得他们想起被这些原子支援部队所包围就很担心，而我认为那是很自然的。我并不认为这些对手正在考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对谁发动任何军事行动。显然，假如我们让自己的防卫力量削弱下去，他们的态

度也许会改变。但是，象目前这样的情况，他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在所有这些新武器方面保持优势。当然，他们是有这种大国心理的，而当我说到这一点时——我在离任前说过好几遍——我说，“啊呀，瞧瞧匈牙利吧。如果你们认识不到这样的行动使得我们的政府人士和美国人民不安到什么程度，你们派到美国去的特务人员也就太差劲了。”他们的态度却是：他妈的，在友好国家之间发生几千起匈牙利人命算个啥？

问：您对他们要求和平的决心寄予很大的希望，可是难道没有另一个问题，即他们准备，比如说目前在中东地区，冒什么样的风险？

答：他们并不准备冒任何真正的风险。

问：但是，他们的政策的调子，比如说吧，是前进的。

答：你们瞧，〔在〕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历史〔中〕，冒险一向是最激烈的字眼之一。如果回去读一读1919和1920年他们在内战未见胜负时所作的一些声明，你们就可以看到对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若干前所未闻的最粗暴的攻击。那是搞宣传——他们为了发动人民而有意那样做的。但是，在中东的事态发展中，我没有看到他们的政府采取任何形式的冒险行动。在苏伊士危机中，他们什么事也没有干。在一个星期里他们毫无动静，然后，单单由于他们所袒护的国家还在进行战斗，他们受到的压力也许开始增加了。 450

问：嗯，这就意味着，如果埃及同西方发生严重的纠纷，他们就会抛弃纳赛尔罗？

答：他们干吗要抛弃纳赛尔呢？他们不会抛弃纳赛尔的。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只要在某种程度上不同苏联磋商，只要苏联人感到他们在那个地区的利益得到承认，他们就会施展各种伎俩在这个地区反对西方的政策。我在那里的最后一天同米高扬谈起了这一点。在谈到中东问题时我说，“你们到底在那里干什么？你们使许多人相信，而我自己倒还不能那么肯定地说，你们的目的是在那个地区

获得深远的影响，以便利用石油作为向西欧施加压力的手段。"当然，他矢口否认。然后他继续说，苏联人在中东"只是为了安全"。他说，"我们将竭力反对在那个地区建立西方的、特别是你们的军事力量。"关于经济问题，他说，"我们无法利用石油，阿拉伯人也消费不了。我们并不那么愚蠢，竟然相信你们会靠那种东西过日子。"他接着说，"你们为什么不同我们谈谈呢？你们害怕同我们商谈吗？"我说，"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共同的利益。"于是他又说，"如果你们同我们商谈，我想你们会发现有许多地方是利害相同的。"我认为，那就是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某种秘密的外交途径在莫斯科很好地加以探索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那条手臂。并不是因为我当过驻那里的大使我才说这样的话——可是我觉得现在恰恰还有这样的清规戒律：每逢你同俄国人握手，你的手臂就要短去一截。

对中央情报局的情况介绍结束了我驻莫斯科大使的职责。从那时起，我就为我在马尼拉的工作进行准备。

我在菲律宾逗留的两年半，是我职业生活主要工作中的一个插曲。差不多从我进入外交部门之时起，苏美关系一直是我的专业，而在菲律宾是沒有什么有关俄国的事情需要美国大使去操心的。（菲律宾同苏联沒有外交关系，这项政策是美国所赞同的。）

451

很难想象有什么差别比驻马尼拉大使和驻莫斯科大使这两个职位之间的差别更大的了。这两个城市本身截然不同。它们之间的唯一共同之处是，这两个名字都是用字母M开头的。在菲律宾，社会是松散而自由的。实际上政府对什么事情都不加控制，存在着完全的言论自由。在莫斯科，一切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府控制着一切；沒有批评的自由。马尼

拉是个光彩夺目的城市，有着蓝色的海洋、羊毛般的白云，以及被贫富之间的惊人悬殊煞了风景的迎风招展的棕榈树。莫斯科则灰暗而寒冷，单调而沉闷。不过在俄国，你会体味到一种力量感，这却是菲律宾所缺乏的。

这两国人民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菲律宾人是讨人喜欢的、友好的、热心的和坦率的，而俄国人则是冷淡而多疑的。我在马尼拉几个月所建立的友情比我在莫斯科的全部岁月所建立的还要深厚。

普通的菲律宾人怀着敬爱的心情看待美国。这种感情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千成百的美国教师于本世纪初在全国的几乎每个市区建立学校幷教授青年读写英文的结果。这些人留在人民心中的记忆仍然是清清楚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远征中把日本人赶走以及随后给予这个群岛以独立地位，肯定有助于增加菲律宾人对美国的感情。这种近乎对美国表示忠诚的感情十分强烈，以致成为马尼拉年轻一代的一些政治家所关心的问题。为了抵消他们认为的哪怕在情绪上对美国的过份依赖，他们煽起了小小的反美心理的火焰。一些政治家同我私下谈话时承认，他们奋起从事反美性质的攻击以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

在我的新职中最显著的差别之一是，改善关系的最大障碍不在于驻在国政府，而在于华盛顿。我在马尼拉任内的主要工作是处理克拉克空军基地、苏比克湾和桑莱岬海军基地这三大基地所产生的问题。我在基地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的谈 452
判完全是同外交部长费利斯维尔托·塞拉诺进行的。我试图克服国会和五角大楼的一些成员的反对，促使美国政府修改

1946年的基地协定。根据协定，美国军事人员在基地内外所犯的罪行由美国军事法庭而非菲律宾法院审判。我坚持不懈地劝说五角大楼接受一种从长远来看是可取的做法，给予菲律宾人以设有美国基地的其他国家在其国土上得以审判犯罪行为的那种司法权。不过我并沒有取得多大进展。对于美国人受到与我国不同的司法制度的审判，似乎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恐惧，特别是在国会里。我往往不大相信军事人员会有同样的想法，因为菲律宾法院的宣判可能比美国军事法庭的判处要轻得多。我重新划定苏比克湾基地的范围，从而顺利地使得居住在基地边上一个名叫奥隆加波的村庄里的大约八万菲律宾人能够迁回原地。为了这点小事，我变成该村的名誉公民。

在我向华盛顿汇报的时候，我强调说明了菲律宾的若干一般情况。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对菲律宾人来说，偏偏是仿效我们自己的体制设立的政府机构过于生搬硬套，无法有效地进行管理。我们也对菲律宾人过分吹嘘自由企业的优点（一个见过苏联式社会主义由于矛盾重重而收不到效果的人是满可以这样说的）。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结果几乎总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年年从大学毕业（这是另一笔美国遗产），社会却无法吸收他们。这两个因素为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贪污腐化泛滥成灾；事实上，在菲律宾人的心目中，有机会饱私囊的时候不这样做，那是不道德的。实际上，沒有一个人的道德标准是把为国效劳放在首位的——这同苏俄人又有明显的差别。有头脑的菲律宾人甚至在那个时候就预见到前途的艰难。拉蒙·麦格赛

赛刚刚在我到达马尼拉之前由于飞机坠毁而去世，这就使这个国家失去了一位能为国家提供巨大希望的领袖。然而，即使他还活着，菲律宾也不见得能够避免 1972 年发生的挫折。这个社会的弊端实在是太多了。

在马尼拉的沒有压力的气氛中，我有时间轻松一下，打打我还在上大学时玩过的高尔夫球。每逢周末，有时是星期三，453 我在马尼拉和瓦克-瓦克高尔夫球俱乐部打球。这是一种很普通的运动，许多菲律宾官员整个星期都是黎明即起，在上班之前打上一场。我跟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试了两三回。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汽车前灯照到第一开球处把球打出去。我很快发觉一天的其余时间身体疲劳，因此就放弃了早场。

总的说来，生活是极端惬意的。但是，我心里总是缅怀着苏联。汤米·汤普森从莫斯科给我来信，凡是有关那里的情况的材料，只要我能找到，我都要看，特别是关于想撵走赫鲁晓夫的惊人尝试。当时我沒有看到详细材料，但是后来知道，1957 年 6 月 19 日，当赫鲁晓夫访问芬兰回来的时候，主席团的另外十名委员通知他说，他已被解除了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沒有象“牢不可破地”团结一致的集体领导人中别的任何人一样温顺地接受决议，而是坚持认为主席团无权撵走他。他把他的问题拿到权力圈子的外边去，说他是由拥有整整三百名委员的中央委员会选出来的，只有它才能够罢免他。赫鲁晓夫在主席团的另外三名委员的支持下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朱可夫元帅前来援救赫鲁晓夫，他派出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接来。由那些坚持要从经济改组计划中得到好处的地方党组织头头们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

争吵激烈的八天会议中投票撤换了主席团，保住了他们恩人的权力。这样，在我劝告中央情报局等待苏联权力圈子扩大到中央委员会之后几个月里，赫鲁晓夫就完成了这件事情。

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赶出了主席团，取消了谢皮洛夫的候补委员资格。根据斯大林死后的传统，四个被废黜者沒有丢脑袋，而只是被派到偏僻的地方去工作。

10月7日，在给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和我的私交弗兰克·威斯纳的一封信中，我指出我对莫斯科发生过的事情缺乏材料。尽管如此，我还是就驱逐赫鲁晓夫的尝试的意义表示了我的看法。我写道：

> 尽管我肯定沒有预料到事态会有这种惊人的发展，或者至少不会这样快，但是从6月份在莫斯科发生的事件中我沒有发现有什么东西足以改变我对苏联事态发展的基本想法。相反，我认为这件事情的做法可能比任何别的事情更能说明，集体领导确实是个现实而非虛构。假如赫鲁晓夫象许多人设想的那样，已经建立了绝对优势的实权地位，他就沒有必要进行两星期的斗爭（其中包括为时八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来压倒反对派了。从我在这里得到的各种迹象来看，主席团里的辩论是眞实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我还有待于得到进一步的情报，才能证实曾经使用或扬言要使用警察或武装部队以取得最后的结果。看起来问题在于谁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拥有多数。当然，预言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愚蠢的，但是我决不认为，驱逐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以及级别较低的谢皮洛夫，就标志着集体领导的终结和个人统治的恢复。这个事件甚至可能表明一种相反的倾向，就我所知，它在主席团的这种性质的爭论中第一次起了最后仲裁者的作用。因此，它可能意味着未来的权力圈子会从主席

454

团扩大开来，包括一百三十三名有投票权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其结果，不管谁当掌柜，归根到底都必须取得并保持比斯大林去世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多的人的支持。

把事件解释成纯粹和单纯是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之间个人的权力斗爭，我是有所怀疑的。这一概念看来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的，即存在着一个权力很大的职位（即党的第一书记），它本身就有爭夺的价值。我指出，反赫鲁晓夫集团可望获得成功这一事实也似乎表明，这一职位本身并沒有这样的力量。我的解释是，克里姆林宫內部同所有政府內部一样，如果分歧的意见不可调和，有关政策的爭论在某个时候就归结为爭论者之间的权力斗爭。马林科夫在斯大林死后的政策是太自由化了，以致无法列入"老卫兵"的名单。因此，他同赫鲁晓夫之间的政策分歧的性质可能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同赫鲁晓夫之间的政见分歧有些区别。但是，所有这三个人都根据不同理由看出赫鲁晓夫的对內政策有一种丧失最高领导的集体政治权力的眞正危险。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害怕经济上的权力分散，如果用赫鲁晓夫通常在这些事情上所使出的那股劲头加以推行，就会不可避免地使上层领导丧失一些控制的能力。

我并不认为在实际冲突发生之前任何一方对自己的阵地作过十分周密的布置。既然所有这三个反对派头头都具有从事阴谋活动和一般卑鄙勾当的经验，如果他们眞是把发动政变的时机仔细地挑选在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不在国內的时 455
候，他们似乎就不大可能干出这种弄巧成拙的事来。如果赫鲁晓夫为他的反击作了准备，他就不会刚好在驱逐他的行动

发生之前到芬兰去消度一个星期。尽管我缺乏证据，我看肯定有一股由于不同的原因而不同意赫鲁晓夫政策的政见合流。莫洛托夫的反对，在比较不大公开的情况下还有卡冈诺维奇的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是人所共知的。马林科夫的具体作用还不清楚，但是，因为他比较年轻，可能他是注定要打头阵的。除了涉及经济上的权力分散之外，显然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我倾向于注意一个比较不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这三个相当严肃的、总的说来是清醒的人物担心赫鲁晓夫的自由行动和他那种信口开河的言论会使这个集团为猝然作出的（特别是对外政策方面的）决定承担责任。

虽然我再次声明我对情况缺乏了解，我却看不出有什么事情足以表明赫鲁晓夫的胜利是由于抱成一团的独立力量——军方的支持。明眼人一望而知，如果朱可夫反对他，他要清除别人就会有巨大的困难。但并不能由此推断，他在任何意义上成了军方的俘虏。相反地，有几分实用主义的朱可夫大体上可能是赞同赫鲁晓夫的多数政策的。我还认为，只有当内政或外交上发生了重大的紧急变故，以致威胁到政权的命运时，军事专政才有可能建立起来。我看不出任何理由可以说明，即使我们假定军队对其自身可能抱有特殊的看法，它会愿意在并非为保存这个制度所极端必需的情况下接管苏联全部事务的指导权。

因此，我不同意乔治·凯南的观点。凯南认为赫鲁晓夫的胜利是代价高昂的，理由是他可能在若干问题上向军方或许向别的派系承担了责任。我并不认为赫鲁晓夫向任何一个派系作了保证，而是断言他的前途取决于他的国内政策的

成败。*

在结束时，我指出了未来一段时间里克里姆林宫可能遇到的麻烦：

> 我倾向于把6月间苏联发生的事情视为由工业化过程以及在大不相同的环境里设计出来和完善起来的陈旧政治统治方式所引起的苏联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之间基本矛盾的进一步表现。故事并没有结束，我想我们会看到进一步的事态发展，虽然不一定在最近的将来。

456

发生这些事件的同一个月里，苏联取得了惊人的科学成就。10月4日，它把第一颗人造卫星射入轨道。人造卫星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宣传上的巨大胜利。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狼狈不堪，并给民主党人提供了一个争端。发射卫星之后不久，苏联宣布削减重型轰炸机的生产。国务院在给美国新闻处的一项指示中高兴地说，这一声明是苏联经济无力担负发射人造卫星和加强国防力量的佐证。换言之，发射人造卫星是苏联经济制度失败的预兆。我自动给华盛顿发了一封尖锐的信，断言没有证据表明苏联的经济无力生产轰炸机和发射卫星，并且大胆地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即莫斯科只是试图跳过中间防卫阶段，直接从事导弹计划而已。几个月后，我去华盛顿作短暂逗留时发现，那个指示原来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作品。

人造卫星的明显的重要性是，它显示了苏联在技术和科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不同意那时普遍流行的暗示，即俄

---

* 这年秋天朱可夫被免职。不到一年赫鲁晓夫接管了布尔加宁的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同时仍然保持了党书记的职务。

国人已经在这些领域里把美国远远抛在后面了。苏联能够集中资源和最有才能的人在有限的领域内取得蔚为壮观的成果。这些成就同苏联的科学技术的一般状况沒有关联。我们是遥遥领先的。

我在菲律宾闲混了两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苏联和美国，慢慢地失去有朝一日重操旧业的希望。我一度考虑过在马尼拉任期届满时退休去挣几个钱。接着，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 1959 年 1 月辞去国务卿职务，此后不久死于癌症。

正如无论哪一位一直读到这里的读者都清楚地知道的那样，我同杜勒斯是有爭论的，但是他的优点比缺点多得多。他有个性，能够坚定不移地去达到目的，在履行职责方面老成持重。在赫鲁晓夫于 1958—1959 年冬天提出把柏林国际化并切断西柏林同波恩和盟国的联系的最后通牒时，他作为对付

457 赫鲁晓夫的西方国家坚定政策的设计者是特别坚强的。西方答复的坚决态度想必使赫鲁晓夫感到吃惊，他终于退却了。

在莫斯科时，我常常听见赫鲁晓夫把杜勒斯斥为阻挠缓和的头号坏蛋。苏联人是否眞的觉得这样，我就说不上了。我认为，他们对于作为目标坚定的外交家、熟练的谈判者和外交事务的研究者的杜勒斯是尊敬的。然而，杜勒斯从来不懂得苏联的政策。他过分注意纯属意识形态的方面，不理解同苏联的国家利益有关的微妙关系。他到晚年才了解斯大林，并且贪婪地阅读他的理论著作。他被苏联共产主义是一切正直的人们必须加以反对的阴谋这样一个观念迷住了心窍。他这种用毫不含糊的言词表达出来的对事物的看法，我认为来源于他头脑里的喀尔文主义。这对他从事国务卿的工作是个

严重的障碍。他反对中立主义，从而损害了我们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他使美国过分地受地区性反共条约的牵累。他用战争边缘政策的言论吓走了我们的盟国。

由于苏伊士插曲，杜勒斯在英国和法国的威信已经一蹶不振。他象律师那样同伦敦和巴黎争辩，而不是向我们的盟国阐明他的观点。然而在西德，年老而固执的阿登纳却总是竭力颂扬国务卿的。

我不能肯定历史会怎样评价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是个强有力的国务卿;至于他是否明智,这是可以怀疑的。

新任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脫很快就写信要我回华盛顿当他的苏联事务顾问。杜勒斯的身边不曾有过苏联问题专家。赫脫打算安排一个顾问之类的职位。当时的副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到马尼拉参加大使会议的时候也提出过这个问题。虽然我感到拮据,需要增加收入,我还是告诉赫脫说，如果我能够回到高级职位上去，我是愿意呆在外交部门的。那年夏天,赫脫同一些重要的参议员讨论了这种可能性,结果他和我都发现麦卡锡主义并沒有死亡。当副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在莫斯科时，汤普森大使问他，如果总统任命我在华盛顿任职,会发生什么情况。尼克松对汤普森说,他深信总统能够顶住反对意见,决心提出一项任命,不过可能是一个不需要参议院确认的职位。

赫脫放弃了叫我任顾问或助理国务卿的念头，而任命我当特别助理，这是参议员无权过问的职务。虽然我喜欢有个同我的职责相称的头衔,但是,我在华盛顿政府上层工作的经验教导我,只要同当权的人有良好的私人关系,头衔同任务或

458

影响没有多大关系。我深信我同赫脱的立场是一致的。我于1947年初同他初次见面，当时他是负责研究拟议中的马歇尔计划的可能性的委员会的主席。从那以后，我同他的交往越来越密切。赫脱举止温和，但是他在作出决定的时候是很坚决的。杜勒斯最初让他担任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对于有赫脱这种经历的人来说，给他这个职务近于侮辱。赫脱说他无论如何不会接受那样低的职位。于是杜勒斯向他提供了副国务卿的职务。我认为赫脱领导下的国务院搞得比任何别的国务卿(马歇尔可能是个例外)掌权时都好。鉴于赫脱把外交官员提升为助理国务卿并让他们制订政策这一事实，我承认得到了一点狭小的利益。事实上，这一方针使国务院全部有才干的人得以在各个方面施展才能，并且我们工作得很顺利。然而，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大考验是一场只有总统才能处理的危机——U-2间谍飞机事件。

第 五 部 分

最 后 的 年 代

461

第二十六章　U-2飞机事件和最高级会议的流产

我的新工作的第一个使命，是同赫脫一起到巴黎参加1959年12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年会。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刚结束了对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的友好访问，停留在巴黎同戴高乐总统、麦克米伦首相和阿登纳总理作一次短暂的会晤。政府首脑们会晤结束时，我正站在爱丽舍宫的前厅里。从菲律宾回来以后，我还没有见到过艾森豪威尔总统。他站住了，跟我打招呼。寒暄几句之后，他说，"顺便提一句，奇普，你见过戴高乐将军没有？"我说没有。他把我介绍给了戴高乐将军。戴高乐讲了几句客套话，无非是说，他已听到几位同事谈起过我，然后就转身走了。刚走几步，他又回转来，俏皮地含着笑容说，"波伦先生，你听说我们刚作出的决定了吗？我们决定，在同赫鲁晓夫先生谈判时，对一些含糊不清的问题要采取坚决的态度。"这句用法语讲的原话听起来要清脆悦耳得多："Nous avons décidé de parler à M. Khrushchev sur un ton ferme des choses vagues." 戴高乐把最后一个字的音调拉得长长的，然后走出门去。

回华盛顿后，赫脫要我协助准备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访苏之行，这次访问预定在1960年5月进行。艾森豪威尔同意这次旅行，是因为赫鲁晓夫1959年9月成功地访问了美国，这

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是破天荒第一次。赫鲁晓夫一直把这次访问看作一个胜利。这次访问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帮助了他。462 那时我在马尼拉，但是从我听到的情况看，我认为美国的生活水平和自由打开了他的眼界。当然，他沒有改变他的基本观点（他对美国人说，"你们的孙子将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但是我想，他开始意识到自由社会对苏维埃制度的某些优越性。这只是我的推测，但是赫鲁晓夫访美后很快发展起来的政治路线和他讲话中的一些暗示使我相信，这次访问给了他有益的影响。

对于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访问是否适当的问题，尽管双方各有许多说法，但是权衡轻重，我相信这种访问是好事情。我对于艾森豪威尔预定的访苏之行确实非常热心。艾森豪威尔不仅是一位总统，还是一位战争中的英雄。俄国人是会喜欢他的。苏联当局要压制人民的热情是会感到困难的。赫鲁晓夫对此不会在乎，他会得到改善苏美关系的声誉，他的共处政策会显得是有成效的。但是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看到一位美国总统受到这样的欢迎，是会不寒而栗的。既然俄国人对于象尼克松副总统那样令人扫兴的人物都爭先恐后地挤着去看，那么，对于象艾克这样讨人喜欢的人，他们又会怎样呢？

在赫鲁晓夫访美期间，特别是在戴维营会谈期间，他对艾森豪威尔的尊敬更为加深了。苏联人也象美国人一样，对艾克一向抱有好感。甚至斯大林对这位允许苏军攻占柏林的美国将军，也曾大加称赞。当我在莫斯科任大使的时候，俄国人——也象美国人一样——往往把艾森豪威尔同他们所不喜欢的美国政府的政策区分开来。1956年，赫鲁晓夫在欢迎特文

宁将军的招待会上，赞扬艾森豪威尔是受到苏联政府尊敬的“高尚人物”，尽管对“他周围的其他一切人物”（显然指杜勒斯）不能这样说。1956年10月匈牙利和苏伊士危机时期，莫洛托夫问我谁可能当选总统。当我谈到艾森豪威尔有希望连任时，他说，“这很好。”他也询问了总统的健康状况。我回答说，总统动手术后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这时，莫洛托夫提到了总统送给布尔加宁的那封警告他不要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的措词强硬的信件，并且说，“我们的印象是，紧张的竞选影响了他，刺激了他。”有意思的是，苏联领导人也象斯大林有一次评论杜鲁门那样，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他周围的人的“俘虏”。

463 4月，我急忙处理一些苏联事务，赶到巴黎参加一次东欧问题专家会议，接着又到莫斯科同汤普森大使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同一些外国的外交官交换了意见，并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毫无结果地呆了一小时。这时，许多专家都认为，赫鲁晓夫是苏联的绝对首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赫鲁晓夫正在扬言要单独同东德签订和约，把西柏林变成国际城市，从而危及西方的权利。我需要摸一下形势。

我发现在莫斯科的外国外交官员和新闻记者实际上都一致认为，尽管赫鲁晓夫无疑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和第一号人物，他却没有独自制定和决定重大政策的权力。他不是斯大林，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会变成斯大林。

消息灵通的外国人相信，主席团内部存在着反对他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反对派。但是我却倾向于认为，与其说有人反对赫鲁晓夫的政策，还不如说有人反对他的高度表现其自己的作风。苏联领导人接受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人欢宴的情景，

一定会使那些死硬的布尔什维克感到污辱。他们所担心的与其说是对俄国人民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对匈牙利或东德之类卫星国家的傀儡领导人的影响，因为在这些国家的公众中存在着强烈的敌对情绪。

至于政策方面，我的结论是，赫鲁晓夫扬言要迫使西方退出柏林，并同东德单独签订和约，这决不是虚张声势。尽管他很谨慎，沒有规定实现这一威胁的任何明确期限，但是，如果他最终不采取行动，那么，他作为领导人的威信将蒙受难堪的损失。

莫斯科的情绪比我三年前离开的时候要轻松得多。汤普森一家为几个来访的美国人举行招待会，一大批苏联官员、艺术家、作家等等都出席了。这种情绪是共处气氛的一部分。它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且后来确实发生了变化，不过仍然是有希望的。

在回华盛顿的途中，我在哈佛大学停留了一下，商讨美苏文化交流的问题，然后坐晚车去首都。第二天早上，5月3日，国务院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休·卡明斯到我的办公室来告诉我，一架U-2侦察飞机在对苏联进行侦察活动时失踪了，并且被认为是在周末被击落了。他不知道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是否还活着。 464

我在莫斯科任大使的时候，就听说过这种飞行计划，但是并不了解什么时候进行。把U-2飞机的实际飞行日期即使告诉大使也被认为是不明智的。这需要绝对保密。此外，如果飞机出了问题，大使可以老实说，他一点不了解情况。1956年7月14日在法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布尔加宁问我是否知

道苏联在华盛顿提交的一份抗议美国飞机在7月初侵犯苏联领空的照会。我回答说，我知道这份照会，可是除此以外"别的情况一概不知"。布尔加宁说，苏联政府通过雷达追踪，掌握确凿的证据，足以证明对美国侵犯领空的谴责是有根据的。"这是一桩非常严重的事件，"他说。他的话说得很平静，力图使我获得强烈的印象，感到苏联政府是认眞对待这件事情的。我疑心苏联人已经发现U-2飞机的飞行了。

九天以后，在埃及武装部队节日的招待会上，新闻记者就苏联提出的指责向苏联空军参谋长R·A·鲁金科元帅提出询问，问他怎么知道这是美国的飞机。鲁金科承认，沒有看到什么标志，因为飞机是在二万公尺的高空飞行的。可是他爭辩说，尽管这种飞机是在苏联米格式飞机达不到的高度上飞行，苏联飞行员还是可以从飞机的外形轮廓鉴别出这是美国飞机。记者们指出，许多国家都有美国制的飞机。鲁金科说，既然飞机是美国制造的，归根结底美国对这些飞机的活动就负有责任。我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指出，记者们错过了一个质问鲁金科的好机会：苏联是否要对在朝鲜和中东的米格式飞机负责呢？记者们还着重询问了有关苏联对未经允许越过领空的外国飞机是否开火的政策问题。鲁金科回答说，苏联不想加剧国际紧张局势，所以苏联飞机奉命不得对偶然误入苏联边界的外国飞机开火。对任何飞机开火都必须得到地面的特别批准。鲁金科沒有说的是，苏联沒有能够达到入侵飞机那样高的飞机，也沒有能够达到这种高度的防空武器。这种飞机当然就是美国的U-2飞机，它的任务是拍摄苏联的火

465 箭基地和其他军事设施的照片。鲁金科警告说，如果继续越

境飞行，苏联将采取“必要的措施”。过了三年多时间，苏联人才把这个警告兑了现，击落了一架 U-2 飞机。

当中央情报局得知 U-2 飞机失踪的消息时，总统正在弗吉尼亚州一个隐蔽所作例行的巡视，这个隐蔽所是准备在华盛顿面临轰炸的危险时使用的。他会见了代理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因为赫脱这时正在伊斯坦布尔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议）、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和总统军事助理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在这次会上改变了计划。按照预先准备好了的掩饰计划，凡是飞越苏联的飞机失踪的问题，全部交给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来答复，这个局准备着一个现成的新闻公告，说它的一架“气象飞机”失踪了。在弗吉尼亚的会议上，总统决定由国务院负责处理全部新闻质询的答复工作，并指定由古德帕斯特把计划改变的情况通知白宫新闻秘书詹姆斯·C·哈格蒂。但是，或者古德帕斯特没有这样做，或者做得太晚了，哈格蒂已经按照过去的指示，同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局长休·德赖登进行了联系，由德赖登发布了新闻公告。这种混乱情况是不幸的，因为新闻公告上提到了飞机飞行的区域，并且特别提到飞机只越过边界几公里。这个公告发布的时候，国务院已经得知侦察飞机是在俄国中部地区击落的。甚至到了 5 月 5 日，当赫鲁晓夫宣布击落这架飞机的时候，我们仍然不知道飞行员的命运如何。所以赫脱回华盛顿后，坚持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原有的饰词，发布了另一个公告，说这架“气象研究飞机”必定是迷失了航向，也许是驾驶员失去了知觉。这样一来，赫鲁晓夫就洋洋得意地宣布：飞行员鲍尔斯及其犯罪的摄影装置都被掳获了。

在国务院内部的一次会上，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分歧之点在于：或者承认涉及到一架美国的侦察飞机，但竭力编造情节，进行蒙混、抵赖，或者按照传统的国际惯例，对间谍事件拒绝发表意见。我强烈主张以“无可奉告”为限，而一些主张承认真象的人，则从道义的角度大唱高调，坚持认为美国不仅有权利，而且实际上有义务对苏联进行侦察，因为共产党国家由于其固有的邪恶本性，总是热中于向西方派遣大批间谍。我感到这种论据是不合适的，因为尽管它可以投合美国人的偏见，却会损害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会议最后的决定是，美国应该承认这次事件的真象。

466

当赫脱带着国务院的意见到白宫时，总统已经决定宣布：被击落的飞机的确是美国侦察飞机，固然他本人不了解每一次具体的飞行情况，但是，空中侦察的计划是经他批准的。甚至在这种承认中，也可能有一点与全部事实真相稍稍不符的地方。我了解到，中央情报局主管这一活动的负责人理查德·比斯尔曾要求古德帕斯特向当局请示，把鲍尔斯的飞行时间从4月30日推迟一天，因为气候条件不好。人们告诉我，古德帕斯特把这个请求报告总统，得到允许。不幸的是，所有熟悉苏联情况的人都不知道已把飞行时间改到5月1日。“五一节”是苏联的主要节日之一。抱着侥幸的心理选择这天进行飞行是很愚蠢的。这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无异于向他们的脸上啐唾沫。美国知道，苏联过去已经查觉了U-2飞机的飞行，因此有理由相信，5月1日的飞行将会被发现。对于过去侵犯领空的飞行，苏联人没有宣布过，因为这种宣布只表明苏联防御的脆弱性。当5月1日防空武器击落U-2飞机以后，

赫鲁晓夫就可以得意洋洋来加以宣布了。

我想，艾森豪威尔决定承担U-2飞机事件的全部责任的理由是：他怕别人批评他沒有负起总统的责任，不了解他政府的可能引起核战争的活动。过去就有许多批评，说艾森豪威尔缺乏一个总统应有的精力和坚强领导。他一定意识到了这些指责。我直到现在仍然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事情处理得好一点。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笨拙的公告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我想，其结果一定也差不多。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被俘，就使得问题无法解决了。

自然，U-2飞机事件使得预定在巴黎举行的大国首脑会议已不容乐观。我们不能确定克里姆林宫将采取什么行动，甚至不能确定赫鲁晓夫是否会出席会议。苏联大使馆参赞斯米尔诺夫斯基5月9日对《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的谈话，倒是了解苏联想法的一个线索。他说，他发现美国的态度同"戴维营精神"相比已有所改变。他列举了以下几件事作为证据：副国务卿狄龙4月20日发表的要俄国从东德和其他卫星国家撤军的"严厉的"谈话、国务卿赫脱的一篇"强硬的"谈话、美国关于恢复核试验的声明、以及U-2飞机事件。赖斯顿告诉斯米尔诺夫斯基，这些事件是互不相关的。他向这位俄国人讲解了民主国家的活动惯例。根据斯米尔诺夫斯基说明的情况来看，我断定苏联人把这四件事联系到一起了，并且真正相信美国又恢复冷战政策了。我对赫脱说，苏联领导人往往认为其他政府也象他们那样行事。因此在他们看来，这四件事是精心安排的计划的一部分。

467

在我们出发去巴黎之前，我建议总统在最高级会议上向

赫鲁晓夫提出，当苏联对柏林进行威胁时，是不可能实现缓和的。"特别是，"我在给赫脱的备忘录中说，"应该告诉赫鲁晓夫，如果他实现他的威胁，单独同东德签订和约，企图借此损害西方在柏林的权利，那就会出现危机，使任何缓和局势和改善关系的期望完全成为泡影。"我还建议总统说明，除非赫鲁晓夫明确保证不单方面对德国采取行动，否则艾森豪威尔就不可能访苏。我相信赫鲁晓夫是指望通过这次访问来提高他在国内的威信的。

开会前两天，5 月 14 日，赫鲁晓夫抵达巴黎。他拜访了戴高乐和麦克米伦。他们立即把交谈的情况通知了美国代表团。赫鲁晓夫想说服他们向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要艾森豪威尔对 U-2 飞机事件公开道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并处分有关人员。戴高乐和麦克米伦都同意转达这个口信，但是认为这不可能被接受，并且明确表示：他们不会给赫鲁晓夫任何支持。事实上，我相信戴高乐还说过，他不认为这样的要求是行得通的。

由于得到英国和法国的通知，总统对赫鲁晓夫在首次会议上的激烈发言已有了充分准备。我们方面出席会议的有总统、国务卿赫脱、美国译员亚历山大·阿卡洛夫斯基和我，我是作为官方记录员参加会议的。我之所以被选定担任这个职务，是因为我懂得所有这三种语言。在美苏双方互相作了冷淡的礼貌性的致意和短暂的没有笑容的握手之后，会议就开468 始了。赫鲁晓夫站起来发言，作了二十分钟激烈的讲话。他扮演受害一方的角色，质问道：谁能够飞越一个友好国家的领土，侦察它最隐秘的机密，而不认为这是一种敌对行动呢？言

外之意他没有料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竟会这样做。他宣布撤销对艾森豪威尔的访苏邀请。他问道：他怎样能够向俄国人民解释，他竟然邀请这样一个敌对国家的首脑来进行访问呢？最后他要求赔礼道歉。

在赫鲁晓夫发言时，艾森豪威尔的秃头上泛起一阵阵又红又紫的颜色，这是他用尽全部意志力来控制自己脾气的明显标志。戴高乐接着发言。他说，尽管他并不宽恕间谍活动，但这种宽恕还是必要的。至于说到飞越别国的领土，那么，他知道苏联卫星在一个月当中曾多次飞过法兰西共和国的领土。这些卫星上也可能带有摄影机。戴高乐指出，他并不认为有必要为此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麦克米伦作了类似的发言，只不过他的声调和神态透露出更多的惋惜。麦克米伦表示对最高级会议抱有巨大的希望。他觉得，在他去年冬天访问莫斯科之后，这次会议提供了巨大的和平希望，同时他尽可能地夸大公众对这次会议的期待。

当艾森豪威尔发言时，他一点没有显露出几分钟以前那种明显的暴怒。他正式透露了他一周前做出的决定，宣布他已下令停止侦察飞行。但是他拒绝道歉。西方希望艾森豪威尔的讲话可以满足赫鲁晓夫的要求。但是很快就明白了，除了总统低声下气地正式道歉以外，苏联人不愿接受任何别的东西。会议只好休会，预定四十八小时后再行召开。

第二天，我们一些人在美国大使馆陪同总统进餐。饭后大家对会议的前景进行了长时间的非正式的讨论。我不相信赫鲁晓夫还会回到会议桌上来，除非总统向他道歉，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 U-2 飞机的飞行是有理由的，而且美国总统又

不能自卑身份。我对即使复会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样表示怀疑。总统问我为什么。我说，我看不出苏联人怎么会为了德国两个部分的统一而放弃东德。以前他们有过许多机会。到1960年,东德的苏维埃制度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在柏林问题上或许能够取得某些进展，但是我也表示怀疑。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善于听取意见的人，他征求了各种人的意见。有人建议由汤普森和我去找葛罗米柯谈一谈，努力寻求解决争端的办法。但是大家断定这样做是无济于事的。阻碍会议的唯一问题是总统不可能公开向赫鲁晓夫道歉。这一点没有认真考虑过。

469

到了预定复会的时间，三位西方领导人一起来到爱丽舍宫,看赫鲁晓夫是否回来开会。赫鲁晓夫没有来。麦克米伦便劝说艾森豪威尔和戴高乐，让他以私人身份亲自去请赫鲁晓夫回来开会。麦克米伦含着眼泪说，所有不列颠岛上纯朴虔诚的人民昨天都在小教堂里祈求和平。这次会议的失败，将是对他们的希望和意愿的致命打击。他觉得，他们几个人作为国家的领导人，有责任为了自己的人民和人民的热烈的和平愿望再作一次努力,我坐在总统后面,听到他对赫脱说,“你知道,可怜的老哈尔对这件事情感到很烦恼,我想我们不妨尽可能在这一点上满足他的要求。”我赶快给赫脱写了一张条子,指出用私人感情去打动赫鲁晓夫是一个错误,并说在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打交道时，不能采用这种手法。尽管它不会造成多大危害，我总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的纸条还没有递到赫脱手里,戴高乐就正颜厉色地用法语说,他不能同意首相的意见。他说,这种方式过于拜占廷式了,但是决不应该

忘记，拜占廷帝国所以垮台，就是因为它热中于搞阴谋诡计以及采取诸如此类转弯抹角的方法。他的语调是冷淡而轻蔑的。无论如何，他有效地制止了另一次接近赫鲁晓夫的想法。

在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大发雷霆。他用一些村俗土语破口大骂。奇怪的是，他骂英国人和法国人跟骂美国人一样多。后来，两个老练的美国记者问我是否认为赫鲁晓夫就要回莫斯科并且要发动一场战争。其中的一个人说，赫鲁晓夫的语言使人想起希特勒的某些激烈的言论，这种言论往往是军事行动的前奏。记者们感到印象很深的是，苏联国防部长、二次大战中的英雄、相貌严峻的罗吉昂·Y·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同赫鲁晓夫寸步不离。尽管皱着眉头的马利诺夫斯基的出现使苏联代表团增添了好战的色彩，我可不相信所谓军方正在接管政权的推测。他的出现可能意味着政治局(当时称主席团)的其他委员希望绝对做到使赫鲁晓夫不致越出常轨。必须记住，议事日程上有一个项目是裁军，而美国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同样出席了这次会议。 470

我告诉记者，我根本不相信克里姆林宫会有意发动一场战争。同一天，在美国代表团的一次会上，我谈了同样的意思。我想，赫鲁晓夫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表明，他的恼火主要是针对法国和英国的，因为他们没有向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要他正式道歉。显然，赫鲁晓夫到巴黎来，就是决意要搞到这样一个道歉，否则主席团就不授权他参加会议。在回莫斯科的路上，赫鲁晓夫在东柏林停留了一下，发表了一篇温和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他不打算加剧柏林的争端。

赫鲁晓夫的愤怒和失望是真实的。他把艾森豪威尔当作

一个心地善良爱好和平的人，在这方面走了很远。他真正相信总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战争贩子"。在其他布尔什维克看来，这种信任近于背叛。毫无疑问，在共处政策的总路线问题上，赫鲁晓夫同他的某些同事之间是存在着分歧的。赫鲁晓夫对U-2飞机事件最初的反应是，认为这种飞行是在总统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当艾森豪威尔说所有的飞行都经他批准，他对这些飞行承担全部责任时，赫鲁晓夫觉得受了欺骗。他的希望实际上完全破灭了。唯一能使赫鲁晓夫平息下来的是充分的赔礼道歉。很可能他向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保证过，他或者得到赔礼道歉，或者离开会场。

俄国人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克服U-2飞机事件造成的困难。7月，米哈伊尔·A·缅希科夫大使跟我提起这件事。我告诉他，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看不出有再谈这件事的必要。缅希科夫坚持说，U-2飞机事件将继续成为苏美关系中的重大障碍，除非赔礼道歉。如果艾森豪威尔政府不道歉，就等待下一届政府。我告诉他，"你们将不得不遥遥无期地等下去，"并且补充说，如果这就是苏联的态度，那么任何改善关系的前景都很渺茫了。缅希科夫从他的立场后退了一步说，他认为下届美国政府不会再继续搞这种"侵略性的和挑衅性的"飞行了；我指出艾森豪威尔在巴黎已经宣布停止飞行。缅希科夫说，如果恢复这种飞行，苏联将要对飞机起飞的基地进行报复。我说，"让世界和平取决于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偶然飞越苏联领土的可能性，这种做法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471

有一次，缅希科夫问我，作为苏联事务顾问，我是否了解或者赞成这种飞行。我微笑着告诉他，"在我们彼此从事的工

作中，有些问题是不能指望得到答复的。”

苏联在最高级会议失败后开展的反美运动使我感到忧虑。苏联的宣传目的在于加剧紧张局势，制造混乱。在6月27日西方提出新方案的前夕，苏联中断了裁军谈判。7月1日，苏联飞行员击落了一架在巴伦支海国际水域上空飞行的美国侦察飞机。克里姆林宫破天荒第一次在一篇政策声明中宣称，将给任何适合苏联目的的政权提供军援。

尽管这些威胁不能按其表面价值来对待，但是我想，它们可能说明苏联今后进行军事干涉的新观念：只要适合苏联目的，就不惜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军事干涉。7月19日，我在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备忘录中说：

> 正是对于苏联当前的这种态度，需要作出某种超过言词的反应。应当采取某种行动，沉着冷静地让苏联注意到它当前态度的危险。尽管他们可能不想把这些威胁付诸实现，但是，如果苏联人感到宣传运动是成功的，他们就可能在未来的军事行动方面作出越来越多的诺言。一旦这些诺言遭到考验，要他们改口是极其困难的。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到，苏联的这种威胁和讹诈运动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世界上未承担义务的地区所起的影响。如果它看来似乎进展顺利，而美国未予以任何强有力的反应，那就可能造成一种印象，好象苏联人实际上完全主宰着局势，而美国则不能或不愿采取任何相应的反措施。

我建议总统向国会提出追加三十亿至五十亿美元作为国防部和对外军援的开支。我在备忘录中写道，这将是“一种行动，而非言词”。这个建议得到赫脱和狄龙的支持，也得到艾森豪威尔的批准，最后得到国会的批准。 472

到了9月，赫鲁晓夫仍然没有善罢甘休。他建议对联合

国实行改组，并亲自到纽约提出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建议用“三驾马车”(三人委员会)来代替单一的秘书长，同时把总部迁到瑞士、奥地利或苏联去。这个计划本身并没有什么耸人听闻之处，倒是赫鲁晓夫的举止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当别人发言时，他大喊大叫，高声大笑，并且脱下一只鞋来敲打桌子，打断麦克米伦的演说。

当时有些人盼望艾森豪威尔(他也出席了联合国大会)和赫鲁晓夫能够举行一次会晤，这种空气是苏联制造出来的。我坚决反对这种会晤，除非莫斯科事先做某些事情以表现其诚意，例如释放被击落的侦察机飞行员。在9月23日的备忘录中我写道，如果赫鲁晓夫不明显改变态度而受到总统的接待，这只能使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和世界大部分人士相信，苏联是如此强大，它既能侮辱美国，又能在它选定的任何时间回到“戴维营精神”上来。总之，在许多未承担义务的国家的眼中，这意味着苏联实际上是国际事务的主宰。

国务院里所有其他的人也反对艾森豪威尔采取会见赫鲁晓夫的步骤。大概这个俄国人也还没有准备会见U-2飞机事件的制造者。他没有要求举行这样一次会晤。赫鲁晓夫在联合国的咆哮表明他还没有从盛怒中平息下来。早些时候，汤普森大使在莫斯科受到多次难堪的对待。在一次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提起U-2飞机事件，向汤普森大使大肆发作了一通。为了解释他的观点，他说，“你认为这样做对吗?”接着狠狠地踩了一下大使的脚。后来他对汤普森说，“我并不是有意想伤害你。”赫鲁晓夫曾经把艾森豪威尔描绘为很明智的政治家，但是他在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作报告时却说，他认为总

统缺乏领导一个大国的性格和品德，虽然他可能是一个好的校长。

有许多美国人对艾森豪威尔甚至比赫鲁晓夫更加吹毛求疵。我在白宫会见艾森豪威尔的次数不多，没有资格来评论他。但是我认为，在U-2飞机事件这个我得以较近地观察他的唯一危机时刻，他的表现是不错的。的确，他思想上有点懒散，他宁愿读西方小说和玩桥牌，而不愿从事必要的折磨人的脑力工作，以便使他的心思能够适应他所必须作出的决定的需要。 473

杜勒斯曾经拥有进行外事活动的广泛权力，但是，当需要作出重大决定时，还是由艾森豪威尔动手。而且，作为总统，艾森豪威尔必须对杜勒斯的全部政策负最后的责任，而我并不认为他反对过杜勒斯的任何重大错误，例如，签订各种条约，扩充军事基地，从而使美国承担过多的义务。艾森豪威尔跟苏联打交道比杜勒斯更注重实际。总统没有那种使杜勒斯精神为之焕发的在意识形态方面自告奋勇反对共产主义的劲头。他用妥协的办法结束了朝鲜战争。他赞成同苏联人会谈，赞成邀请赫鲁晓夫访美。

艾森豪威尔不是一个伟大的总统，但他是按时代精神办事的。在他执政的八年期间，国家在寻求一个没有危机的感情融洽的时期。人民希望回到生活上简单而普通的事务中去。这不是一个总统能够干一番大事业的环境，也不需要作什么伟大的决定。

11月，另一个总统约翰·F·肯尼迪当选了。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年轻，精力充沛，在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方面敢作

敢为，但结果并不总是愉快的。我成了他的朋友和顾问，不过我错过了机会，沒有劝他制止对古巴猪湾的损失重大的入侵。

第二十七章　古巴导弹危机

当理查德·尼克松在1960年总统选举中承认败于约翰·肯尼迪之后不久，我接到了新当选的总统的电话。电话是从马萨诸塞州海恩尼斯波特肯尼迪的老家打来的。肯尼迪说，他收到了赫鲁晓夫的贺电，他想知道应该如何作复。我有点茫然了，不知该怎样回答，因为我对于参议员肯尼迪在苏联问题上的观点一无所知。他希望开头就采取友好的姿态呢，还是想表现出冷淡的样子呢？我思索了一下，告诉他说：我想最好的回答是讲几句礼貌性的感谢的话，而不涉及实质性的问题。他按照我的意见给赫鲁晓夫回了电报。这封回电是对赫鲁晓夫贺电的礼节上的、客气的答谢，并且保证说，争取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将始终是美国的基本目标。

在竞选运动中我沒有见过肯尼迪，选举以后也沒有马上见到他。12月下旬，当我在马里兰州的东海岸打野鸭子的时候，我接到电话，叫我到华盛顿去见迪安·腊斯克。腊斯克已经被选定担任国务卿，这是大大出乎他本人的意料之外的。他本来在威廉斯堡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但是得到了通知，叫他在华盛顿停留一下，去见肯尼迪。新当选的总统向他问起可以担任国务卿的人选，并且告诉他，如果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沒有在攻击高等法院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南方宣言上签名，那就选定他当国务卿了。腊斯克回到纽约州斯

卡斯代尔的家里，告诉他妻子没有必要考虑搬家。他还没有把话说完，电话铃就响了。这是肯尼迪来的电话，他建议腊斯克担任国务卿的职务。腊斯克接受了。尽管后来由于他在越南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他出色地干了八年。

475

腊斯克告诉我，他正在考虑派我到欧洲某个大国——可能是英国或法国——去担任大使。我说，总统和他派我到任何地方我都遵命，但是，就我个人的愿望来说，还是愿意在华盛顿呆一两年，以便熟悉这个我感到正准备进行革新的新政府。腊斯克说，已经没有适合于我这样的级别和经历的职位了，因为实际上凡是我可以担任的职位都有人充任了。我告诉他，对于头衔，我并不介意，但是希望能参与重大政策的讨论。腊斯克说，我可以继续担任苏联事务特别助理。我同意了。在总统就职典礼之后，我被重新任命担任这个职务。

对艾森豪威尔感到灰心失望的苏联人，对总统选举表现出强烈的关心。7月8日，即在1960年两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之前，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午宴上，缅希科夫大使问了我一系列的问题:谁可能成为候选人，他们会选择谁来担任国务卿。我一面吃着通常都有的基辅式炸鸡，一面把从报刊上看来的所有消息告诉了他，因此谈的内容并不比他了解的情况为多。11月1日，缅希科夫向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想开始同新政府作试探性的对话。道格拉斯说，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选举以后，缅希科夫邀请我们中的一些人——有一天请腊斯克、另一天请我——到苏联大使馆作私人交谈，继续进行试探。我在给腊斯克的备忘录中指出，“显然，缅希科夫一定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了强有力的指示。”

腊斯克不知道肯尼迪将采取什么政策。在一次便宴上，缅希科夫问我：肯尼迪是准备走扩充军备从而导至战争的道路呢，还是走和平的道路呢？他同样希望知道，肯尼迪是否愿意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我说，我不知道新政府将采取什么政策，不过我确信它将遵循传统的美国路线，力求通过谈判来解决悬而未决的争端。接着，缅希科夫强调了全面彻底裁军的必要性，而我则按照通常的回答，指出需要进行监督。他相当严肃地回答说，"美国一定了解，在两三年内其他国家将掌握这种武器，这可能使整个问题无法解决。"苏联最怕的不是美国的核武器，而是中国掌握原子弹。

尽管外交官在传统上不参加党派斗争，但是，我和实际上全部在国务院工作的我的朋友都为肯尼迪的当选感到高兴。476 我于 1939 年夏天在莫斯科第一次见到肯尼迪。当时他刚病愈，到欧洲作一次旅行。在他到莫斯科短暂停留期间，我的妻子和我同他共进了一次午餐，大使馆的另一位秘书和他的妻子也在座。肯尼迪的魅力，他思想的敏锐，特别是他对苏联的无偏见的态度——这在战前那些日子是罕见的——使我们所有的人大为钦佩。他给我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位年轻总统的某些特征，如精练的才华，新颖的见解，充沛的精力，使人感到一场真正的变革开始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对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政策过于失望，而是感到国家需要另一种类型的领导。

我的首批任务之一是参加老挝问题的特别小组。在老挝，亲西方的政权受到苏联支持的巴特寮的强烈反对。虽然我对世界这一部分地区没有直接的经验，但是为了适当考虑

苏联的政策，把我加到这个组里来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支持亲西方的政权并不明智，所以建议转而支持中立派。

1961年4月，我们飞到基韦斯特去会见麦克米伦首相。肯尼迪急于希望了解，如果我们决定对老挝进行军事干涉，是否可以指望英国跟我们一起派部队去。他也给戴高乐发去了一封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麦克米伦给了一个不肯定的许诺，戴高乐则明确地拒绝了。显然，肯尼迪不能指望这两个盟国给予很多支持。我想，他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探索其他的可能性的。这最终导致了1962年的老挝问题会议。在这次会上，达成了一个脆弱的、不稳定的协议：建立以梭发那·富马亲王为首的联合政府。协议还规定任何外国不得在老挝驻扎军队。这个协定几乎立即遭到北越的破坏。

在从基韦斯特回来的路上，肯尼迪对我说，"奇普，我想找个时候同你谈谈古巴问题。"我象个书呆子似的回答说，尽管我自然愿意陪同他谈任何他想谈的问题，我对拉丁美洲的情况却是一窍不通的。我从来没有去过古巴，因此，我想我不能贡献多少意见。肯尼迪说，"好吧，好吧，"就把这个题目丢开了。后来我常常想，如果我当时机敏一点，我至少能够努力劝说总统放弃那个灾难性的猪湾入侵计划，那个计划是由美国装备和训练的流亡军队进行的。

477

我知道这次行动的计划，并同某些参与其事的人作过一些交谈。关于古巴人、特别是青年人对革命政府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不满的情报是否准确，我提出过一些疑问。在历史上，一个革命政权失去支持的过程是比较缓慢的。只有在发生多次不愉快事件或各种消极因素互相发生作用之后，

才会严重地丧失民心。我并不认为卡斯特罗政权已经经历了足够的时间，达到丧失民心的地步，也不认为流亡军队能够得到多少支持。卡斯特罗巧妙地保持住了革命的热情和全国的拥戴。为了使入侵获得成功，就必须由美国提供大规模的援助。我不能说我向最高当局中的任何人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制定这个冒险计划时，我放弃了提供意见的机会。

因此，到了2月下旬，当我参加白宫的一次讨论苏联可能作出什么反应的会议时，我对计划中的入侵的细节并不了解。总统问起苏联人可能干些什么。自1959年1月卡斯特罗执政的头几个星期起，莫斯科就拥抱了他。米高扬到哈瓦那进行了访问，提供了一亿美元的贷款和技术援助，签订了一个大量购买食糖的协定。巴黎最高级会议失败后不久，赫鲁晓夫就伸出保护的手臂把卡斯特罗搂住。在一次讲话中，他说美国"显然在策划采取背信弃义的犯罪步骤来反对古巴人民"，并警告说："如果五角大楼的侵略势力胆敢干涉古巴，苏联的炮手就将用他们的火箭来支援古巴人民。"尽管赫鲁晓夫挥舞火箭，我对总统说，不问这次入侵将迅速取得成功或失败，苏联都不会采取军事行动，只会在宣传上大叫大嚷。克里姆林宫是不会为了象古巴这样在战略上并不很重要的地区打仗的。我说，如果入侵发展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苏联人会给古巴运去武器，但不会派遣军队。

在离开白宫的路上，我在汽车里向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和他的两个助手提出，是否可以选择另一种办法，即派遣小股游击队渗透到山区去建立一个政府，象卡斯特罗过去做的那样。如果这个行动获得成功，美国就可以承认这个政

478 府，把它作为以后实施军事行动的基地。中央情报局的人提出一大堆技术性问题，拒绝了我的意见。我对这个想法也没有考虑成熟，提不出好的论据，所以也就没有坚持。但是我仍然对入侵感到担心，不相信那些被卡斯特罗唤起希望的古巴人会转而支持流亡分子。这些流亡分子都是些有中等或上等收入的生意人和专业人员，广大的穷人是不喜欢他们的。

不管这个意见是否转达到了肯尼迪那里，入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首先，早在1960年竞选运动中，肯尼迪就远远超出了他所应该做的程度，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卡斯特罗在整个拉丁美洲造成的威胁采取的反措施太少。作为总统候选人，肯尼迪保证他将采取更为明确和直接的行动来反对卡斯特罗。同时，他继承了一项正在执行中的计划，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危地马拉的难民部队并使美国在军事上卷了进去。如果肯尼迪取消这次行动，他将特别受到共和党右翼人士以及肯定受到同这项准备工作有关的人们的强烈批评。要他继续搞下去的压力是很大的，特别是他的某些顾问竭力申辩，这次冒险有获得成功的极好机会。我没有参加那次作出决定的会议。当我听说入侵即将进行时，我对于总统这个新思想的体现者决定执行这样一个可疑的计划感到失望。

4月17日，入侵军在猪湾登陆，立即就陷入灾难。苏联人的反应正象我预料的那样。入侵的当天，赫鲁晓夫给肯尼迪打来一份电报，说苏联将给古巴“一切必要的援助”，并再次提到苏联火箭的威力。在另一个声明中，克里姆林宫敦促联合国采取行动。肯尼迪实际上回答说，苏联最好管它自己的事情。

最初几天就清楚了，入侵正归结为一场灾难。在肯尼迪总统力求结束这场灾难时，我在早餐会和午夜会议上有机会从近处观察总统。他很平静，沒有把时间浪费在互相埋怨上面。在小会议室的一次会议上，副总统林顿·B·约翰逊讲了几句批评中央情报局的话，可是肯尼迪马上插嘴说：现在不是背后埋怨人的时候，我们应该和衷共济地面向未来。

猪湾事件可能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在猪湾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和错误做法，可能使得赫鲁晓夫在1962年相信，苏联能够安然无事地在古巴设置导弹而不会受到美国的断然反对。当时，苏联向古巴运送了大量的其他武器，但从这一事实中，不可能推论出苏联对外政策在不幸的猪湾入侵事件后有任何改变。苏联总归是要给古巴运送武器的。 479

5月，赫鲁晓夫接受了肯尼迪三个月前提出的双方会晤的建议。我竭力主张举行这次会晤，因为这对于新总统估量自己在世界上的主要对手，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在交换若干信件以后，确定6月份在维也纳举行会晤。

大约在这个时候，肯尼迪也接受了戴高乐将军（他已当了总统）要他访问法国的邀请。临访问前几天，阿尔及利亚的一些法国将军暗示，他们可能要反抗戴高乐给予北非省自由的计划。局势紧张了几个小时，看来好象叛乱分子可能要派一支伞兵部队到巴黎去。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在给法国国民议会的一份报告中，竟然影射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了阿尔及利亚将军们的近乎反叛的活动。肯尼迪非常不快，问我是不是应当取消这次访问。我告诉他，要回答顾夫的影射指责

是困难的，如果取消访问，那就会损害美国同法国人民的关系。我告诉他，最好的方针是密切注意形势，指示驻法使馆观察法国舆论，了解反美情绪是否有所增长。如果敌对情绪增加，就取消访问。肯尼迪接受了这个意见。当驻法使馆观察到反美情绪并无重大发展时，总统便决定进行这次旅行。

5月31日傍晚，我们乘总统座机从纽约启程，第二天早上到达巴黎，巴黎地面有些泥泞。我没有参加同戴高乐的大部分会谈，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们两个人交谈的。我看到了会谈的记录。总的说来，除了戴高乐对国际问题的一些固执见解以外，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内容。戴高乐预先警告了肯尼迪，说明卷入印度支那是危险的。他虽然没有超出国际礼貌的范围，实际上却是告诉肯尼迪，如果他陷进亚洲的泥坑，他就会变成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戴高乐同样坚持认为，在苏联——如他所说——进行威胁的情况下，同它谈判柏林问题是一个错误。纵然苏联在柏林问题上越来越发出刺耳的喧嚣声，肯尼迪还是倾向于同它进行谈判。

480

戴高乐在凡尔赛举行的欢迎肯尼迪总统夫妇的招待会，是我所参加过的最豪华的盛会之一。在镜宫举行了宴会并在刚修饰一新的路易十六戏剧厅观看了芭蕾舞之后，我们走到凡尔赛宫的阳台上观看焰火。在返回巴黎的路上，车队弯弯曲曲地穿过公园，不时停下来观赏法国照明艺术的某些惊人的绝妙景致。这个黄昏的特色之一是总统夫妇的极其美妙迷人的容貌：总统显得英俊、洒脱，充满青春的活力和兴致勃勃；他的夫人举止雍容，梳着精巧的发式，穿着洁白的长袍，一直拖到地面。我们为他们感到骄傲。

两天以后，我们启程去维也纳。经过一段平稳的飞行之后，我们在维也纳郊区机场着陆，然后驱车进城。一路上两旁到处挤满了欢声雷动的奥地利人。他们对总统的这种热烈欢迎同对赫鲁晓夫的冷淡接待，恰好构成尖锐的对照。这两个人之间的对照也是同样鲜明的：赫鲁晓夫粗鲁、生硬、精神旺盛；肯尼迪则灵活、通情达理、头脑冷静。

第一次会谈于6月3日午后不久在美国大使的住所举行。两位领导人在花园里作了短时间的散步，只有苏联翻译在场。然后他们回到屋子里，双方的人员都参加了会谈。我是作为顾问而不是作为翻译参加会谈的。

会谈是以轻松的语调开始的。肯尼迪说，当赫鲁晓夫1959年访美同一些议员讨论国际问题时，他们曾经见过面，赫鲁晓夫记得那次会见，甚至还记得那天肯尼迪来晚了。总统说，赫鲁晓夫当时说他好年轻。"我真对你说过这样的话吗？"这位六十七岁的部长会议主席回答道，接着又补充说，虽然他二十二岁时头发就开始变灰白，但是人们常常告诉他，说他看来比实际上要年轻些。

谈话转到实质性问题上，两位领导人都表白自己的和平意愿，说看不出有发生冲突的必要，因为美苏双方都拥有为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接着肯尼迪犯了一个错误，他听凭赫鲁晓夫把他引进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殖民主义国家的作用这种半意识形态的争论中。赫鲁晓夫从他早年被训练为布尔什维克鼓动家的时候起，就是处理这些主题的能手。肯尼迪也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但是对于布尔什维克思想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却没有深刻的了解。肯尼迪在出发到维也纳

481

的时候曾说,“我是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国家的领导人到那里去的。”但是会谈才几分钟，他就表现出对于夺取国家政权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伙伙微不足道的”共产党人感到担心。“你们希望在那些传统上存在着我国影响的地方摧毁我国的影响,”总统诉苦似的说。“你们想推翻其他国家的自由制度。”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说起话来象是自由主义者,而肯尼迪则象殖民主义者。

赫鲁晓夫: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总统先生,你们希望在人类思想发展的道路上设下某种堤坝。这是不可能的……思想从来没有被消灭过，这是人类发展的整个进程所证明了的……如果你们企图消灭思想，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冲突……如果你们能够保证在你们的制度下经济发展达到更高的水平，那么胜利将属于你们,我们愿意承认你们的胜利。但是，如果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保证工农业经济发展达到更高的水平,我们就将获得胜利。当然,我所说的胜利不是指军事上的胜利,而是指思想上的胜利。

肯尼迪:我国政府对美国人民的责任，而且我相信还有苏联政府对苏联人民的责任,都迫使我们关心,不要让这种斗争影响到我们两国的安全利益。我承认,在世界的一定地区，苏联有它真正重要的利益。美国也有与之相当的利益。在所有这些方面，重要的是使世界其他地区的斗争的发展不致影响到我们两国如此重要的切身利益……

赫鲁晓夫:……从你的谈话中,我得出的结论是,你想把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在全世界增长的责任转嫁到苏联的身上。为了在我们之间不发生任何冲突，你希望在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不宣传这样的思想。但是，我再说一遍，总统先生，思想是不能制止的……显然,如果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到其他国家，我们是会高兴的，正如你

482

们对于资本主义思想的传播，无疑也会高兴的一样。无论如何，这完全取决于人民自己。

第一次会议以后，肯尼迪有点沮丧。他沒有能够使赫鲁晓夫理解，美国新政府正在谋求建立以现实的世界力量对比为基础的和缓。我告诉总统，苏联的政策并沒有变得强硬。苏联人的言论总是这样固执的。

维也纳的会谈只举行两天，谈话时间至多不超过四、五小时。肯尼迪的大部分讲话维护我们方面的立场，赫鲁晓夫则维护俄国人的立场。有时腊斯克或葛罗米柯也插进来发表一点意见。我们其余的人只是听着。会谈期间，我身体不适。医生诊断我的甲状腺萎缩，给我开了可的松。这种药弄得我昏昏欲眠。在总统和赫鲁晓夫的一次会谈时，我竟打起瞌睡来了。汤姆森大使踢了我的脚踝才把我弄醒。

讨论的收获不大。达成了一个召开老挝问题会议的协议，这一点使总统感到满意。赫鲁晓夫对老挝兴趣不大，欣然同意了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其结果是在1962年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中立的老挝。苏联领导人向肯尼迪保证，除非其他国家首先恢复核试验，苏联将不这样做。但他一定是在撒谎，因为8月份苏联就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一系列的爆炸，最后以一次威力空前强大的爆炸作为结束。赫鲁晓夫在6月份应当知道这些计划，因为进行这种试验需要有很长的准备时间。在维也纳会谈中，德国和柏林问题沒有取得进展。赫鲁晓夫强调了他要在12月同东德签订和约的意图——这是他1958年以来就一直扬言要采取的行动——想把盟国进入柏林通道的问题移交给这个卫星国去负责处理。肯尼迪进行了争辩，

但毫无结果。

面对这样一种不妥协的态度，肯尼迪感到悲观。当两位领导人分手的时候，肯尼迪带着苦笑说，“好吧，主席先生，我看今年将有一个很寒冷的冬天。”

这次会谈给人的总的印象是，赫鲁晓夫试图用强硬的言词来恐吓新总统。也许由于我听赫鲁晓夫用这种语言谈话的次数多了，我倒沒有产生这样的印象。也许我对赫鲁晓夫理解错了。他可能是在考验总统。如果眞是这样，他很快就得到了答复。肯尼迪回到华盛顿后不久，就向全国作了电视演说，宣布由于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发出了威胁，决定部分动员后备兵服役，并增加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有些顾问建议全面动员，说赫鲁晓夫的话不是开玩笑的。固然我并不认为赫鲁晓夫是态度认眞的，我却相信肯尼迪作出的反应很有意义。如果说赫鲁晓夫还有什么怀疑，那么肯尼迪就清楚地表明，他是不会任人摆布的。当苏联的意图还不可捉摸的时候，最好是对任何威胁都认眞看待。

不管维也纳会谈对赫鲁晓夫的影响怎样，这次会谈给了肯尼迪深刻的影响。此后几个星期，他都跟他的同事们议论赫鲁晓夫的谈话。他在弗吉尼亚州格伦奥拉的别墅里，对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读了会谈记录的副本。在另一个场合，他又对《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菲利普·格雷厄姆读了同样的材料。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读着有关柏林问题的部分。我相信维也纳会谈影响了总统对后来不久就发生的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的态度。

1961 年 8 月 14 日，全世界的人们一觉醒来，发现一夜之

间在柏林安装起了铁丝网栅栏，把东柏林同西柏林的三个部分隔离开来。采取这个行动的目的是阻止东德人逃往西方。战后东德已有三百多万人逃到了西方，其中很多是年轻有为的人。在柏林设置铁丝网的消息使西方领导人大为震惊。1961年7月，西方三国的外交部长曾在巴黎开会，但是谁也沒有提到设置柏林墙的可能性。(铁丝网很快就换成砖墙。)经过紧急协商以后，西方三个盟国认为它们沒有什么事情好做。采取军事行动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将导致对抗，而在这场对抗中西方将不得不实行退却。

肯尼迪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设置柏林墙是对写成文字的和未写成文字的协议的破坏。他决定派遣副总统约翰逊到柏林作短暂的访问，以鼓舞德国人的士气。当总统派人召我的时候，我碰巧因别的事情到白宫去。他说，他要克莱将军和我陪同副总统到柏林去。克莱将军是柏林封锁时期美国驻德武装部队司令和美国驻德高级专员，柏林人民把他看成英雄，因此选派他去是非常合适的。我们在黄昏前从安德鲁斯空军机场起飞，第二天早上到达波恩。在同阿登纳总理一起吃过饭以后，副总统约翰逊把我拉到一边，问我，约请阿登纳陪同我们到柏林去是否合适。虽然我并不认为阿登纳的出场会有多大关系，我仍然指出这样做是错误的。这将给苏联人一个宣传的机会，把阿登纳说成是我国的傀儡，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副总统的作用。约翰逊同意了我的意见。我们把理由向外交部长勃伦塔诺作了解释。勃伦塔诺便去找阿登纳总理，向他委婉地提出，如果他不陪同我们到柏林去，那会更好一些。阿登纳欣然接受了这个意见，单独派一架飞机把勃伦塔

484

诺送往柏林。

在飞机上，克莱将军说，假如他现在还继续担任美国驻柏林武装部队司令，他将命令部队把东德人设置的栅栏和铁丝网统统拔掉。我不相信这样做会不引起严重危机，尽管这一类大胆的行动可能是有效的。任何这样的行动将是一个严重的冒险行动。我们对东柏林沒有承担义务，苏联人在许多场合都表示了他们不惜采取极端措施来维护苏维埃制度的意图。约翰逊沒有回答克莱的话。在旅途中，副总统更多地是听取意见，而很少评论政策，显然他是在座的人中最高级的美国官员。他再三征求我的意见，弄得我都感到有点过意不去了。他这样谨慎是为了避免犯任何错误。

我们乘坐的空军星座号飞机于下午五时飞抵柏林。从滕珀尔霍夫机场到市政厅的路上，车队成了凯旋归来的行列。有五十万人在街道两旁列队欢迎约翰逊。有二十五万人聚集在市政厅前面向他欢呼。约翰逊在其事先在华盛顿准备好了的讲话中，用他本人和美国的"神圣荣誉"保证：美国决心保卫柏林。第二天上午，我们欢迎了美国派到柏林来的第一支一千五百人的先遣部队。这是我们对设置柏林墙的回答的一部分。约翰逊显然很受感动，欢迎了先遣部队的指挥官，一位外貌刚毅的上校。当副总统访问一个难民营时，克莱将军、艾伦·莱特纳(美国驻柏林的政治代表，我的老朋友)和我一起，乘一辆汽车到东柏林去逛了一趟。我们乘坐的军用汽车一次也沒有受到阻拦。我们看到，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东德士兵，在一个广场上停有十几辆苏制T-34型坦克，坦克的引擎开动着。

约翰逊一行于次日上午四时启程回国。飞越东德时，约翰逊的新闻秘书乔治·里迪问我，如果飞机故意超出苏联规定的空中走廊的高度飞行，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这年春天，苏联突然强行规定，凡是进入柏林的飞机，无论民航或军用飞机，只能在规定的低空飞行。对于要不要考验苏联执行这一规定的决心，我们进行了大量的争论。我告诉里迪，有副总统在飞机上，不是考验苏联人的时候。即使成功了，这也只能被看成是一种廉价的示威行动。而且，它不可能证明什么东西，因为苏联人也许会让副总统约翰逊平安飞过，但对于其后的飞行则给以加倍严厉的管制。 485

在这次访问中，约翰逊表现得很出色。他在适当的时候做了恰如其分的事情。我在给国务卿腊斯克的报告中写道，副总统的访问和增援部队的到达，"有声有色地向柏林人民表明了美国将在这个围城中留下来的决心和意志"。这两件事取得了"完全彻底的成功"。但是，我补充说，"持久的效果怎样，现在还不能十分确定。"我指出，华盛顿低估了西德人对设置柏林墙的"深刻的"反应。我列举了得出这一结论的若干因素:

1. 西柏林人通常对东德政权是嗤之以鼻的，而现在这个政权居然被允许采取这样的行动。这个事实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如果隔离柏林的行动是苏联军队干的，这自然也会引起西柏林人的愤慨，但是这作为一个占领国采取的行动，尽管不合法，毕竟还是可以多少加以容忍的。

2. 在西柏林官员中，似乎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感觉，我们驻西柏林的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同感，这就是：面对

东德的行动，我们沒有以某种大体上不易捉摸的方式作出断然而明确的反应，这样就使共产党人增加了信心，以致在今后可能得寸进尺，接二连三地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和刁难手段。这里存在着一种趋向，把两件事情混淆在一起了，即把防止难民出逃而采取的隔离措施同共产党人蓄意制造的一系列事端混为一谈了。

3. 起初，人们对于盟国今后保卫西柏林和捍卫自身权利的意志和决心是存在着很大疑虑的。副总统的访问和增兵大大消除了这种感觉。我们应当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访问本身486 以及副总统的重新声明在群众心目中增加了美国对柏林承担的义务，并可能成为某种公开评论的题目。

我仅仅作了一个明确的建议：

> ……对于任何制造事端的清楚信号，对于共产党人任何损害我国权利、特别是损害通道权利（包括西柏林同联邦共和国之间的交通）的企图，我们都必须敏捷地、断然地作出反应，而且如果必要的话，作出加倍的反应。我们对于任何这样的企图在作出反应时如果有何踌躇和迟疑，都将使西柏林人的士气一落千丈，象8月13日以后至副总统访问以前那段时间的情况那样。

1961年的其余时间是在一种惴惴不安的和平中度过的。沒有出现眞正的危机，但也沒有安宁。我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了柏林特别小组的会议。这个小组制定了无数处理柏林问题的应急计划，同时带着某种预感，等候着赫鲁晓夫把单独同东德签订和约的威胁付诸实现。莫斯科自己是反复无常的。在10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撤

销了他在德国问题上发出的威胁，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却大肆吹嘘苏联远程导弹的高度命中率和杀伤力。与此同时，中国的周恩来则称肯尼迪政府是“至今最狡猾和最富于冒险性”的政府。接着葛罗米柯来到美国，他用一种异常和解的语气说话，赞扬肯尼迪和腊斯克，并且建议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一起会商，达成一个协议。我认为葛罗米柯的温和谈话有两个原因。一是有意抵消周恩来讲话的好战性，另一个是企图表明，由于肯尼迪的坚决行动，苏联人正在重新考虑对柏林的态度。唯恐有人把葛罗米柯的谈话当作克里姆林宫给华盛顿发出的表示愿意缓和的信号，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温和的讲话是在任何国家从未进行过的一系列最大规模的原子弹试验的背景下说的。

在赫鲁晓夫讲话以前，我们还不能肯定他是否要在德国问题上进行恫吓。我觉得，肯尼迪总统的坚决态度是使赫鲁晓夫刹车的因素。我们有保卫西柏林的义务。肯尼迪明白表示，他不会在这个问题上畏缩不前。赫鲁晓夫懂得，除非同美国作战，他不可能实现他的柏林计划。这种冒险的赌博是不值得的。无论如何，柏林墙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把东德人禁锢在他们苏联化的“天堂”里。这个墙始终是苏维埃制度失败的最鲜明的象征。 487

1962 年 3 月，国务卿腊斯克率领一个代表团到日内瓦，希望重新开始的裁军谈判能够提供一个讨论柏林问题的机会。但是，象我参加过的任何一次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一样，会谈毫无结果。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方式——大会、小会、私人交谈、秘密会议、限制性会议——苏联人清楚表明，他们

无意允许柏林成为一个能够生存下去的实体。他们尤其是毫不含糊地表明，那怕柏林都不允许实现任何形式的统一，更不必说整个德国了。裁军谈判之所以能够举行，是因为苏联人结束了他们的一系列核试验，包括一次六千万吨级装置的爆炸在内。这些试验的目的是一个谜。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企图改善一种大约在五十英里高空爆炸的武器，这种武器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次试验是试图生产一种能够破坏无线电联络，从而破坏洲际弹道导弹的制导系统的中子弹。苏联无疑是有它的重要考虑的。这些试验一经结束，苏联人就准备考虑签订一个禁止在大气层和水中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这些谈判导致了 1963 年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我沒有参与任何裁军谈判。

1962 年 5 月，由于安德烈·马尔罗来访（他当时是戴高乐的文化部长），总统请我到他在格伦奥拉的乡间别墅去。他派了一架飞机到西弗吉尼亚州来接我，当时我在那里给医学协会的听众作一个报告，解释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可把他们搞糊涂了。（我沒有把这两者都说成是祸害，我说社会主义并不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但共产主义却是如此。）我认识马尔罗是在 1934 年他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年代，当时他是透过粉红色的眼镜来看待苏联的。*

在格伦奥拉，马尔罗解释说，戴高乐实际上已经完成了488（这种说法有些不准确）使法国脱离殖民主义世界并恢复独立

* 在莫斯科，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话题转到麻醉品问题上，马尔罗说，“我不能吸鸦片烟，它对我不适合。另一方面，印度的大麻叶倒很合我的口味。”马尔罗曾花了几个月的工夫远道去中东从事考古工作。

外交所必需的步骤。他说，戴高乐复兴法兰西民族的努力尚未完成的部分是国内改革。整个法兰西制度，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制度，都必须改造。他感到怀疑的是这种改造是否象戴高乐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接着肯尼迪用哲学家的口吻谈到了未来政府的职能问题。他坚持认为，在二、三十年之内，随着经济的繁荣，政治问题将开始消失。他说，其结果是，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将变成管理性质的机构。马尔罗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指出，在走上这条道路以前，法国还必须做大量的改组和改造工作。通过译员（肯尼迪不大会讲法语）进行的这次谈话非常笼统。我在这里提到，仅仅是为了说明肯尼迪喜欢研究问题的精神。

把我请到格伦奥拉，作为马尔罗的陪客之一，这是要任命我担任驻法国大使的强烈暗示。我记不清肯尼迪是在什么时候要叫我担任这个职务的。他解释说，现任大使詹姆斯·M·加文将军要求回国。我说，我将非常高兴接受这个任务，因为法国在我感情中始终占有特殊的地位。在这个时候离开我的专业——苏联事务——我并不介意。我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两处服务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汤普森就要回到美国，他能够担任国务卿腊斯克的有关克里姆林宫事务的专家。在戴高乐当政时期，驻法大使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肯尼迪希望找一个他熟悉的人担任这项职务。到这个时候，我已经了解到新总统是怎样考虑外事工作的了，在我跟他之间建立了这样友好关系的基础上，我相信我能够在国外代表他。此外，我法语讲得很流利，在巴黎担任过公使，喜欢这个国家。我具有全部这些条件，很乐意去。

肯尼迪说，他想知道是否存在着同戴高乐进行交易的任何可能性。在正式任命我的时候，我收到了肯尼迪夫人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她表示信任我的能力。参议院对我的提名沒有表示异议。经过认可以后，我就开始准备动身到巴黎去。我决定坐船去，因为沒有什么特别紧急的事需要我早日到达。

10月17日，当我到总统办公室正式辞行时，肯尼迪对我说："奇普，到这儿来，看看这些东西。"他的办公桌上铺了许多照片。这些是U-2飞机拍摄下来的苏联正在古巴设置的导弹基地的照片。尽管在参议院和报刊上曾经谴责过苏联进行这样的活动，这些照片是说明苏联人正在干些什么的第一批确凿的证据。在这之前，中央情报局还说苏联人只是在设置射程为二十五英里的防空导弹。我陪总统呆了半个小时，去法国的事连一句话也沒有提到。他告诉我，尽管材料似乎还不够充分，我们的专家却能够精确地确定这些设施的性质。奥列格·潘科夫斯基提供的材料，对于分析这些照片起了无可估价的作用。他可以说是西方在苏联的最成功的间谍人员了。总统告诉我，这些照片表明了二十四枚中型和十六枚中程弹道导弹的基地。这四十枚导弹给美国带来多大的危险，这个问题是无须讨论的。这些导弹一经安置起来，准备发射，实际上就是核讹诈。

489

总统还沒有想好怎么办。中央情报局的照片是10月14日拍摄的，10月16日即我去辞行的前一天呈送给总统。总统说，他决心要使这些导弹从古巴撤走，虽然他还不清楚应该怎么办。"我们前面将有一段十分艰难的时间，"他说，"我们将作出一些严峻的决定。"

总统告诉我，他要派我参加以腊斯克为首的一个委员会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的会开到深夜，估量可供选择的各种办法。包括我在内的一部分人主张，在最后转入军事行动以前，应该采用外交方法。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摧毁这些基地的最迅速、最可靠的方法是轰炸。轰炸将炸死数以千计的安装这些导弹的俄国人，这一点在他们心中不象在我心中这样至关紧要。我觉得，对于如此巨大的损失，俄国人是会感到非回击不可的。其结果将是爆发一场核战争。

第二天，10月18日，委员会再次开会。这天傍晚，即我应该动身去法国的前两天，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在他乔治城的家里设宴，招待我的妻子和我。肯尼迪总统夫妇也参加了。宴会以后，总统把我拉到屋外的走廊上，同我讨论导弹危机问题，谈了几乎半个小时。我们再一次审查了各种可供选择的办法，但总统仍然没有定出行动方针。他说，他可能要我推迟去巴黎的行期，因为需要我留下来商量问题。国务院对他询问古巴和导弹危机的事迟迟未作答复，他似乎很恼火。他斥责说，“奇普，你们那个该死的国务院究竟是怎么回事？无论我给他们提出什么问题，从来不能很快得到答复。” 490

“总统先生，”我回答说，“原因之一自然是在于外事工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无须我告诉你。但是，你不能凭空搞出一个答案来，也不能迅速拿出现成的解决办法。”我犹豫了一下，接着说，“至于国务院，整个说来，这个错误是你自己造成的。”

“什么？”他吃惊地说，“你怎么会这样想？”我解释说，如果总统在任命国务卿之前先任命两三个下属人员，那么这个国

务院就不能很有威信地进行工作。我沒有指名道姓，但是总统知道我说的谁。他挑选切斯特·鲍尔斯为副国务卿，挑选G·门南·威廉斯为助理国务卿，最后才选择腊斯克为国务卿。我并不想暗示他用人不当，而是说任命的原则错了。国务卿应该有权挑选他的下属。总统笑了笑，说可能存在着我讲的这种情况。

当我们离开艾尔索普的家时，我对总统说，在去巴黎之前，我不准备再去见他了。他对我的妻子说，“你们能否离开，我还沒有十分把握。我想我可能要求你们留下来。”这句话似乎沒有被其他客人听到。回到家里，我告诉妻子，她的腰疼可能要恶化了（她的腰椎有病），“因为我们将不得不编造一点情节作为留下不走的理由”。我沒有告诉她突然改变计划的原因，她也沒有问起——她是一个很守纪律的外事人员的妻子。这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在黄颜色的法定拍纸本上用正楷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总统应该如何处理古巴的苏联导弹问题。

第二天早上，我的妻子打电话给艾尔索普夫人，感谢她的招待，同时说，她的腰疼得不能起床，根据这种情况，她能否离开美国，自己也开始怀疑了。在国务院，我接到肯尼迪的电话，他似乎认为我将会参加第二天上午十一时召开的讨论导弹危机的一次重要会议。我同迪安·腊斯克作了交谈，把头天晚上写好的备忘录交给他。我们两人都不主张取消我的动 491 身计划（包括原定第二天到纽约法美协会作一次讲演），认为改变计划未必明智。如果临时取消法美协会举办的这次将近有二百人参加的午餐会，那就可能使苏联人警觉到美国已经发现了导弹。此外，我的继任者、腊斯克的苏联事务顾问汤

米·汤普森刚从莫斯科回来，他能比我提供更多的有关苏联意图的最新意见。

腊斯克认为我的备忘录完全概括了我的主张。我们决定，我应该按时动身。腊斯克同总统谈了，总统显然也同意了。我写给腊斯克转呈总统的备忘录如下。

绝　　密

国务卿先生:　　　　　　　　　　　　1962年10月18日

由于昨晚的谈话比较一般，而明天我将离开这里，我觉得我有义务向您并向总统尽可能扼要地提出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我的观点如下:

1. 苏联在古巴的中程弹道导弹基地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我们的目的是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予以消灭。

2. 实质上有两种方法:(1)采取外交行动或(2)采取军事行动。

3. 任何人不能保证依靠外交行动可以达到目的。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应该试用这种方法。如果我们的决定是坚决的(它必须是坚决的)，我看不出同赫鲁晓夫个人通信有什么危险。通信的措词应该使赫鲁晓夫了解我们是认真的。

4. 在回答不能令人满意时，不管我们决定采取什么军事行动，我认为外交行动是重要的第一步。赫鲁晓夫回答的语气和内容会给我们透露一些情况，但我认为不应该让一场全面核战争的威胁来阻止我们采取行动。如果他真要打核战争，他自己也不会感到轻松，即使他先发制人地进行打击。

5. 我并不迫切感到需要给卡斯特罗写信，这个做法可以放弃。

6. 我主要关心的是，如果不作任何外交努力而进行打击，那就必然导致同古巴交战，并且将不可能象设想的那样干净利落和迅速

地解决这些基地。而且，我有理由确信，盟国的反应将完全对我们不利，特别是如果苏联对局部地区实行报复的话（如对土耳其、意大利或柏林）。

7. 给赫鲁晓夫写信是很有好处的，这可以把我们采取行动的理由纪录在案。

8. 一般说来，我觉得[对古巴]宣战是值得的，这使我们可以采

492 取各种军事行动——空中打击、入侵或者封锁。但是我们必须向盟国阐明立场，以证明这样的宣战是有理由的。如果我们先采取行动，然后才力求申述理由，那么我们就将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9. 最后，我强烈感到，任何关于有限度的突袭行动的想法都是幻想，它将引导我们一步步陷入同古巴的真正战争，这个战争势必极大地增加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

我认为最好的方针是：给赫鲁晓夫写一封措词谨慎而严肃的信，收到回信以后（如果答复不能令人满意的话），同我们的主要盟国联系，把我们的意图通知它们，然后向国会提出宣战要求，发表一篇申述理由的适当声明，并且做好充分准备。

请原谅我的书法不好，我没有时间用打字机打出来。如果总统问到我的意见，这就是我的意见。祝您幸运。

查尔斯·E·波伦

自然还有其他许多意见，但是我觉得，上述意见是主要的。我完全看不出有采取军事行动的紧迫性。如果出现这种紧迫性，并且我们已经开始采取外交行动，我们就能够加以掌握。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我在华盛顿国家机场接到一个电话，是总统安排约会的秘书肯尼思·奥唐奈打来的。他说，肯尼迪总统迫切希望我出席上午十一时在白宫召开的会议。我说，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确实就要到纽约去，在那里发

表演说。我拿着话筒等了一会儿，奥唐奈同肯尼迪谈了情况，回来对我说，他很抱歉，但我必须取消这次预约，并且设法不声张出去。我很失望，要奥唐奈请肯尼迪本人接电话。"总统先生，"我说，"我的飞机过十五分钟就要起飞了，如果在这最后的时刻忽然取消这次飞行，取消有大批听众参加的在纽约的约会，我看不出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不冒泄露机密的严重风险和不致引起大量的猜测。"肯尼迪不了解，这次演说事先已经通知新闻界。如果最后一分钟取消了，那一定会使苏联人警觉起来，预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同俄国政治的关系太密切了，这是任何人都清楚的。总统要求保密。头一天，当葛罗米柯对他说苏联在古巴的活动与任何针对美国的攻击意图无关时，总统连眼睛也不曾眨一眨。看来肯尼迪立刻就理解了我的意思，因为他说，"我想你是对的，奇普。你走罢。我 493 想，你不在这儿我们也能够对付。"

10 月 22 日，肯尼迪向全国发表讲话，揭露了苏联设置导弹的事实，宣布封锁古巴。这时，我正在大西洋中部"美国号"轮船上。我坐在吸烟室里听着广播讲话。开始时无线电的静电干扰太大了，听不清总统讲些什么。后来广播清楚了，我听到了讲话的后部分，包括总统提出的八点措施。这是大快人心的。许多乘客只听了一部分，以为肯尼迪已经命令入侵古巴，因而欢呼起来。我告诉一些朋友，我不相信有这么回事。我不了解细节，但是我知道总统的方案是外交和军事双管齐下的。总统命令海军"隔离"(这是避免用"封锁"这个外交术语的委婉说法)古巴，迫使所有运载进攻性武器的船只折返。同时，总统警告说，从古巴发射任何核导弹都将遭到美国对苏

联的全面报复。总统清楚地表明，除非迅速从古巴撤走这四十枚导弹，美国将采取军事行动加以摧毁。

当我正在横渡大西洋而总统的讲话尚未发表以前，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秘密飞往巴黎，把苏联设置导弹和我们打算采取的行动通知了戴高乐。艾奇逊同美国代办塞西尔·莱昂一道，通过厨房门偷偷进入爱丽舍宫。戴高乐说，如果爆发战争，法国将站在我们一边。

10 月 24 日我们在瑟堡靠岸，大使馆有车在那里等候，我们就驱车直往巴黎。我的牙疼得厉害，所以我最先要做的事情之一是赶紧找牙科医生。第二天，我急切地注视着新闻消息。苏联人已经命令全部军事力量处于戒备状态，但是语气仍很平静。克里姆林宫没有作出什么决定。莱昂向我简略地介绍了艾奇逊同戴高乐谈话的内容。以后的几天我在巴黎等得很心烦，因为在向戴高乐将军呈递国书以前，我不能履行大使的职务。他的老规矩是每星期六上午接受大使呈交国书。我是星期三到达的。我收到华盛顿发来的几封电报，上面消息不多。我还接到总统外交特别顾问麦乔治·邦迪的一次不成功的电话。这个电话是通过一个新的无线电路发来的，按预定情况应该是在发话后立即被搅乱，而到受话的一端又把它分析清楚。但是，这个安全措施把发话搅得太乱了，以致受话的一端怎么也分析不出来。我们不得不把它放弃。

494

星期六上午，我同大使馆全体主要人员一起到爱丽舍宫，受到戴高乐将军和法国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的接见。这位外交部长我已经认识多年了。双方说过几句在这类场合通常说的开场白——保持友好关系之类的话——之后，戴高乐

把我领到一个沙发旁边坐下。他对我重申了对艾奇逊谈过的保证：如果爆发战争，法国将同美国站在一起。我把这个保证转告了总统。戴高乐没有公开宣布这个保证。

第二天，10 月 28 日，星期天，我收到一个紧急电话，又是麦克·邦迪打来的。这次不是用带有干扰的转变电话机打的，所以我能够听清楚他的意思。他谈的是赫鲁晓夫同肯尼迪交换信件的情况，华盛顿希望立即通知戴高乐。赫鲁晓夫在一封信中表示，如果美国保证不侵犯古巴，他同意撤出导弹。戴高乐这时在科龙贝双教堂村他自己的别墅里，距离巴黎大约有一百英里。我们的驻军告诉我，可以派一架直升飞机送我去。我给爱丽舍宫打了电话，找到一个官员，他把我的要求转告了戴高乐。但得到的回答是：戴高乐在科龙贝双教堂村度周末期间，不因公接见任何人，无论法国人或外国人。如果我把函件交给爱丽舍宫，可以立即转送总统。我向华盛顿汇报了情况，华盛顿听了以后哑口无言。这件事是戴高乐在危机时刻表现沉着的一个明显例子。他不让自己被卷进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那种狂热中去。

星期一，苏联开始撤除导弹，古巴危机过去了。这是肯尼迪总统个人的巨大胜利，这是他完全受之无愧的。他曾经受到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另一方面是核战争的危险。他在这两个压力面前没有畏缩。他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采取有限度的、然而是明确的军事行动——封锁；另一方面采用最强硬的外交语言——以消灭苏联相威胁。这种手法是很高超的。

有的人直到现在还认为，美国当时应该轰炸导弹基地，同

495 时摧毁卡斯特罗政府。这样一种干脆简单的作法是吸引人的,但其后果是成问题的。不错,导弹是从古巴搞掉了,但是几千名苏联技术人员也可能被炸死了。克里姆林宫有时是按其本能作出反应的,它可能不顾后果,直接进行军事反击。美国将会打赢这场随之而起的核战争。我们在导弹和原子武器方面继续对苏联占有优势。但是千百万的人要丧生,而发动战争的责任却落在我们头上。肯尼迪成功地搞掉了导弹而又避免了战争。古巴导弹危机表明,如果肯尼迪还活着的话,他将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总统。

苏联人为什么首先在古巴设置导弹呢?后来为什么又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实行退却和撤走导弹呢?这个行动带有赫鲁晓夫手法的全部标记:狂妄、好战、冒失和危险(苏共中央委员会1964年废黜他时还提到轻率)。关于赫鲁晓夫这样做的动机,我所听到的最可以接受的看法是,赫鲁晓夫企图用导弹作为威胁,迫使美国同意按照苏联的条件解决柏林和德国问题。这个卤莽的行动也是对中国人的回答,因为中国人坚持指责苏联背弃革命,说它喜欢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如意交易。在制定计划时,赫鲁晓夫可能低估了肯尼迪和美国人民。他大概以为,总统会把这件事提到联合国,在那里进行无休止的辩论而毫无结果。苏联导弹将被美国人民当作既成事实接受下来。这样下去,到了一定时候,赫鲁晓夫就可以决定,或者把导弹留在古巴当作长期的讹诈手段,或者答应撤除而作为解决德国问题的一部分。赫鲁晓夫错误理解了美国政府和公众的意见,这是克里姆林宫对其他国家愚昧无知的典型表现。苏联领导人始终没有理解其他国家在危机时刻抵抗他

们的勇气。

苏联人在外国人的面前历来是立足不稳的，这一次在导弹危机中丢了脸。中国人在紧张的日子里支持苏联人，后来则批评这个行动是冒险主义。撤除导弹这种深感苦恼的决定促使苏联人加紧制造导弹。在撤退导弹时，苏联老资格的外交官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对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之一约翰·J·麦克洛伊说，"你们美国人以后休想再这样对待我们。" 496

尽管赫鲁晓夫在古巴事件上打肿了脸充胖子，把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说成是一个胜利，但是他再也没有从这个挫折中恢复过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同中国的关系继续恶化下去。更重要的是，苏联经济没有达到赫鲁晓夫吹嘘的那种目标。苏联人在肉类和奶类的生产方面没有超过美国。他们落在后面，生活水平仍然很低。心血来潮的大话和口号不能产生赫鲁晓夫所许诺的奇迹。经济体制的改组使党的头目们深感不安。最后，到了 1964 年 10 月 14 日，在他废黜马林科夫这个克里姆林宫头号人物将近十年之后，赫鲁晓夫失去了一切职务。他的两个主要职务——共产党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分别由列昂尼德·I·勃列日涅夫和阿列克谢·柯西金继任。这两个人都是苏维埃制度培养出来的保守派人物。他们那个热情奔放的前任，那个时而逗引世界发笑、时而震撼和吓唬世界的人物，那个带给苏联共产主义一点空前绝后的人情味的人物，销声匿迹了。赫鲁晓夫的晚年过着一种隐居生活，只有一次回光返照似的闪烁了一下，这就是西方出版《赫鲁晓夫回忆录》的时候，这本回忆录显然是根据录音带整理

的。他死于1971年。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是布尔什维克党抚育培养起来的。他基本上是一个农民，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哲学家，虽然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雄辩家。他沒有给共产主义学说增添任何新东西,除了一点实用主义的异端之外。这异端就是：他承认用核战争来达到任何目的——无论是民族的或革命的目的——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从不怀疑这些原理,并在某种程度上加以运用。尽管这样,更为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怀有眞正的感情。1957年中期当他开始独揽大权时,他凭着农民的机灵和实用主义，领悟到必须有所作为来振兴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下来的制度结构，否则这个制度将会崩溃。而最后，正是这种拯救制度的努力导致了他的垮台。主席团的其他人不赞成必然随着经济权力下放而来的政治权力下放。

497 赫鲁晓夫也是一个感情容易冲动的人。这种感情冲动同他惊人的精力结合在一起,使他具有某种吸引力,但确实也带来了某些不幸事件。他是粗鄙的,庸俗的,爱说一些世俗幽默的下流话，喜欢编造谎言来渲染事实或哗众取宠。尽管赫鲁晓夫说过我是一个饶舌的人,我还是得说,他的确是喜欢喝酒的。1956年5月27日，在克里姆林宫花园举行的欢迎西方空军军官的招待会上，伏特加酒如流水般大量倾倒出来。这天赫鲁晓夫眞正喝醉了。他显出了农民的原形。首先，他认为那些小国是无足轻重的,不屑一顾。对于法国,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装出大国的样子。法国人力图制造一颗原子

弹，但是缺乏财力和物力。对于英国，他抱怨在苏联第一流飞机设计师A·N·图波列夫访问英国时，一些工厂给他吃闭门羹。他摇晃着酒杯说，这没有关系，英国人毕竟拿不出什么新东西来了，除了外交上的"灵巧"以外。整个下午过去了，赫鲁晓夫越来越放肆无礼。朱可夫和其他苏联显贵们都表示厌恶，公开指出这些话是不妥当的。最后，我听到一个俄国人说，"现在大概是结束的时候了，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从这儿带走吧。"酒会很快结束了，赫鲁晓夫顺从地跟着走了。过后，朱可夫轻蔑地摆了摆手对我说，"你别介意，这儿的事情就是这样。"

在外事方面，赫鲁晓夫是一个十足的实用主义者。他的决定都建立在苏联外交的两个根本原则上：巩固苏维埃制度和避免战争。因此他愿意放松对卫星国家的控制，但又镇压匈牙利的革命。中国人搞得他很狼狈，因为北京提出要取代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的中心，并且通过它对金门马祖的剑拔弩张的姿态，大有把世界推向战争之势。

在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中始终有一个基本的矛盾。一方面，显然他确实希望同那些主要的非苏维埃国家改善关系，甚至同美国缓和关系。他似乎真诚地寻求达成裁军协议的途径。这是"和平共处"。另一方面，他不断地扬言要在柏林问题上采取行动，把西方赶出这个城市。这种矛盾的原因是，赫鲁晓夫头上戴着两顶帽子：一项是苏联政府的首屈一指的人物，另一顶是东欧苏联集团的领导人。我们不断地力图使他相信，他不能这样脚踩两只船，左右摇摆，但是他无法改弦易辙。他是苏维埃制度本身的矛盾的囚徒。 498

赫鲁晓夫具有印象主义的特点。世界旅行改变了他的看法。他看到美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种恶梦般的恐怖世界：赤贫如洗的劳动人民同富埒君王的资本家形成尖锐的对照。他领会了我国的力量，虽然他错误地认为我国有了高度生活水平就会缺乏刚毅精神。艾森豪威尔的声望和热情的性格俘虏了赫鲁晓夫，如同它们俘虏了美国人一样。赫鲁晓夫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总统——“一位高尚的人”——的身上，希望同他达成交易。U-2 飞机事件震撼了赫鲁晓夫，它无疑使政治局的某些人相信，他们的领导人对美国人太软弱了。

如果赫鲁晓夫还继续当权，他可能愿意探索走向缓和的道路，而他那些谨慎的继任人对此则是迟疑不决的。这个塌鼻子的、矮胖的俄国人没有在他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多呆几年，这对苏联、对美国和对全世界都是一件憾事。如果他仍然呆在领导岗位上，我将怀着巨大的兴趣看他将做些什么，虽然我主要的兴趣已经转移到二十世纪不朽的人物之一夏尔·戴高乐的身上。

第二十八章　伟大的夏尔

1962年12月，在巴黎开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之后，国务卿腊斯克邀请我和我的妻子乘他的专机回华盛顿。我们在华盛顿的住宅还没有关闭，我们的家只有一半搬到了法国，所以我们决定接受他的邀请。我去见肯尼迪总统，他告诉了我关于同麦克米伦首相在拿骚举行会谈的笼统计划。他说，问题是要找到某种办法来满足英国人获得核武器以代替闪电式导弹的愿望。美国曾经答应向伦敦提供这种导弹，但是由于费用昂贵和效果令人怀疑而取消了。伦敦对此反应激烈，因为没有这种导弹英国就没有核威慑力量，注定要降到二等国的地位。

国务卿腊斯克决定不到拿骚去，显然因为他觉得应该留下来主持国务院一年一度的外交宴会。国务卿的动机是非常好的，但他决定留在华盛顿却错了。凡是涉及核武器和英国的任何事情，都会引起同法国的关系问题，因为戴高乐总是怀疑伦敦和华盛顿之间有某种"特殊关系"。不能说腊斯克的缺席给拿骚会谈的最后决定带来了什么变化，但是他作为国务卿，这样做肯定无助于增进他同肯尼迪的关系。

会谈开始后不久，总统国际事务特别助理麦乔治·邦迪给我打来电话，问我能否回巴黎给戴高乐将军送封信去。我

向巴黎查询能否会见戴高乐，但是在收到回答以前，总统就召我到拿骚去，派了一架飞机来接我。到了拿骚，总统向我解释

500 了他同麦克米伦商量好的计划。美国将交付英国装置在核潜艇上的北极星导弹，要我去告诉戴高乐，美国也准备向法国提供同样的东西。我当即向总统指出，这个计划可能是开诚布公的好主意，但对戴高乐来说，却未必是慷慨的，因为法国人至今缺乏建造一艘核潜艇的资力，也不能制造装在北极星导弹上的弹头。英国人在这两个方面都是有能力的，它只需要北极星的制导系统。肯尼迪理解我提出的问题，但指出，如果法国接受这个计划，那就有可能修改美国禁止出口核秘密的立法规定，有可能向戴高乐提供成为原子强国所需要的情报。在我能够动身去巴黎之前，我收到了回信，说戴高乐正在科龙贝双教堂村度圣诞节假期，不能够打扰他。他将在 1963 年初接见我。

我随同总统飞到棕榈滩，在那里同总统夫妇和英国大使奥姆斯比·戈尔一起进餐。我们痛快地度过一个晚上，喝了大量甜酒，谁也没有喝得烂醉。总统因为白天过于劳累，很早就睡了。第二天上午，在我飞回华盛顿之前，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纽约时报》当时驻白宫特派记者威廉·劳伦斯和我玩了一阵高尔夫球（塞林杰的恶作剧的一棒差点打中我）。

我计划乘除夕的飞机，预定于元旦早上八时半到达巴黎。这样我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回大使馆，换上礼服和条子裤，然后出席爱丽舍宫一年一度的新年招待会。但是，严寒推迟了我飞离华盛顿的时间，当我到达纽约后，我发现去欧洲的唯一飞

机只剩下飞伦敦航线的阿利塔利亚飞机了。我是头等座舱的唯一旅客，在横跨大西洋的三万英尺的高空上同机组人员一起喝香槟酒，迎接1963年的到来。不管怎样努力，我毕竟沒有能够按时赶到巴黎参加新年招待会，但是对于我履行1月2日同戴高乐的约会来说，还是够早的了。

在去爱丽舍宫之前，我接到英国大使罗伯特·狄克逊的电话。他是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就认识的朋友。他头一天见到了戴高乐，向他详细介绍了美国的建议。狄克逊说，他接到的指示非常紧急，所以不得不在我到达之前就去见戴高乐。我感到，英国人是想抢先对戴高乐说明他们对这个建议的意见。狄克逊说，他的印象是戴高乐对拿骚计划幷未关门。

当我见到戴高乐的时候，我的说明多少有些添枝加叶，但幷不严重。我告诉戴高乐，如果他接受这个建议，我确信这将为法美合作开辟广阔的前景。我沒有明确提到核情报的问题，但戴高乐领会到了这一点。他保证说，法国政府将不仓促作出回答，将对这个建议仔细加以考虑。这是我第一次同他进行外交接触，所以表现出一定的天眞是可以理解的。我把他所说的不仓促采取行动解释为有接受的一半可能性，幷这样向华盛顿作了汇报。 501

1月14日，仅仅十二天之后，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作了回答。他说了一个强硬的执拗的"不"字，断然拒绝了拿骚建议，沒有留下任何讨论的余地。这可使我大吃一惊。他沒有提出具体的理由，我倾向于相信发生了某种意外的事情，使得戴高乐比预定的时间更早地作出了决定。这个事件可能就是乔治·鲍尔作了一次例行的欧洲访问，来到了巴黎。鲍尔

是副国务卿，他曾经多年在华盛顿担任代表法国政府的律师。他在美国政界相当活跃，是艾德莱·史蒂文森的好朋友。我同他一起去见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鲍尔说，美国准备大力推动由盟国混合部队组成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希望英国人能够象他们在拿骚说过的那样给以协助。顾夫明白表示法国将不参加任何多边力量，但是也不反对建立这种力量。他并不认为我们关于多边核力量的想法是认真的。但是戴高乐看到美国决心要实行这个计划，被这个前景吓了一跳。他当然反对同其他国家实现任何类型的一体化，理由是任何这样的行动都将降低巴黎对法国活动范围的支配权力。他不喜欢美国对多边力量使用核武器拥有否决权。他的反对是自相矛盾的。首先，他有一种欧洲所共有的、由来已久的担心：头脑发热的美国人可能把欧洲拖进一场原子战争。其次，戴高乐觉得，在发生苏联进攻欧洲的情况时，美国不会愿意使用核武器，因为苏联人已经建成了足以摧毁美国城市的导弹。不管这些疑惧怎样，戴高乐不准备放弃任何法国的主权。

在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同样断然否决了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申请。尽管他含糊其词地谈到英国的非欧洲倾向和它同美国的特殊关系，他把英国排斥在欧洲之外的真正原因是，他不希望在大陆上有一个争霸的对手。自然，伦敦对此大为震惊和恼火，美国则深感失望，也有一些恼火。

502

肯尼迪在处理戴高乐将军拒绝加入多边力量和拒绝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问题上，象他以前的罗斯福和他以后的约翰逊一样，表现了堪称范例的克制态度。他没有公开作尖锐的回答，仅仅表示了遗憾。肯尼迪很快就识透了戴高乐的心思。

他知道，这位将军并非不喜欢同美国总统进行某些争吵。这种争吵在法国政治上对他有利。肯尼迪不肯满足戴高乐的愿望。

在戴高乐举行记者招待会后的一个月内，我至少找了十位内阁官员探讨法国政策和将军的意图。我得到了种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断定戴高乐并没有把他正在做的事情告诉他们。甚至顾夫·德姆维尔，尽管他个人热忱相待，也很少知道戴高乐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凭着这些有限的情况，1963 年 3 月 2 日 我在给邦迪的信中提出了对戴高乐的下述估计：

> 首先，重要的是应当记住，戴高乐显然是这样半个法国(或不到半个法国)的产物，这半个法国自 1789 年以来一向是、现在仍然是保守的、实行等级制度的、信奉宗教的和注重军事的。这是他激烈反对贝当的原因之一。他也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军事训练的产物，因为他习惯于从剖析入微的而又相当简单的观点出发来对待特定的问题。我要说，他对其他国家的行动是极其无知的，对美国尤其如此。我确信他对美国宪法结构及其与外交事务的关系毫无了解，也没有真正的兴趣。
>
> 就法美关系而论，我看不出能够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这种关系……除了日复一日地继续处理一些发生的问题和事情外，我看不出我们能够采取什么特别的行动。

邦迪问我邀请戴高乐访问美国有无价值。过去一段时期，白宫就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我看不出在总统和戴高乐之间有进行认真对话的任何前景，而且我有理由确信，戴高乐不希望会见总统，因为按其性格来说，他是不喜欢进行一般性的讨论的。表面上他往往听取他的部长们的意见，但 503

是他并不同他们认真讨论问题。我提了一个不大肯定的建议，是否由总统写一封信给戴高乐，彻底分析一下美国对欧洲的政策、美国在欧洲的防务和经济利益，以及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这个主意不是试图改变戴高乐的思想，而是为了避免加深他对华盛顿每个细微行动的怀疑。显然，白宫没有认真考虑这个意见，因为总统没有写这样的信。

从戴高乐的独立性来看，不可能指望法国会在美英苏三国于 1963 年 7 月达成的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肯尼迪亲自给戴高乐写了一封信，敦促法国签字，并提议由美国帮助法国克服在其努力建立核力量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困难。戴高乐愿意接受援助，但是拒绝接受对法国的任何约束。在华盛顿没有人抱有幻想，认为戴高乐会放弃他那发展法国核能力的努力，而这种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

我最后一次看到肯尼迪总统是在 1963 年 4 月，当时我飞到棕榈滩，同他在海上呆了一天。他兴致很好，象哲学家似的评论戴高乐。当肯尼迪夫人让游艇在水面上滑行时，我们讨论了法美关系，探讨了美国能否采取什么行动来改变戴高乐对它的态度。最后我们认定没有什么好做的。我想，是我说服了肯尼迪，以后又说服了约翰逊，避免同戴高乐争论。这个政策收到了效果。

1963 年 11 月 22 日，我的妻子和我乘火车从巴黎到斯特拉斯堡，准备在那里同一些法国朋友打猎，度过周末。在南锡车站停车的时候，一位身穿白色雨衣的法国站长走进我们车室里来，很有礼貌地问我是不是美国大使。当我作了肯定的回答时，他用地道的法国语调对我说，“Monsieur, j'ai une chose

terrible et solenelle à vous annoncer.”（“先生，我有一件可怕的重大的事情通知你。”）他告诉我，肯尼迪总统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被暗杀了，同时还错误地说，约翰逊副总统受了伤。我下了火车，请当地地方长官的汽车司机送我回巴黎。这四小时的行程是惨淡的，车外凄风苦雨，昏天黑地，同我心灵上的一片漆黑交织在一起。

以后几天，法国人列队到大使馆来，在吊唁簿上签名，作为对已故总统的悼念。信件雪片似的飞来。人们给我妻子送来不少花束。法国人民表现出来的悲哀和怅然若失的心情，504 极其有力地说明了肯尼迪总统在法国人民心中所占有的地位。他们感到悲痛的是，出现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的希望破灭了。

戴高乐一直到第二天晚一些的时候才宣布，他准备参加葬礼。我想他是要看一看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态度。当他了解到许多人、特别是比利时国王和英国首相都准备去的时候，才决定也去。

我参加了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为肯尼迪举行的安灵弥撒。我作为大使，同总理乔治·蓬皮杜和戴高乐夫人一起，坐在大教堂的第一排椅子上。人们的感情往往是难以回忆的，但是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感情。当我坐在高高耸起的大教堂的圆顶之下的时候，我觉得未来在眼前倒塌了。我在外交界服务了三十五年，经历的事情不少，对于担任公职的伟大人物是抱极端怀疑的态度的，但是在这里，肯尼迪之死却使我悲不自胜。直到现在我还觉得，一个伟大的未来由于他的逝世而夭折了。

如果肯尼迪还活着，他极有可能访问苏联。这种访问同艾森豪威尔的访问比较起来，对于促进苏联政策的改变不会起更大的作用，但是他将能够赢得俄国人的同情。

除了古巴导弹危机和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外，肯尼迪在外交方面的成就是不多的。但是，在他遇刺的时候，他正开始以更大的信心进行活动。我确信他将试图采取某些革新措施来结束沉闷的冷战。我不知道他会采取什么措施，但是他多半将出色地蝉联总统的职位。

肯尼迪遇害以前，戴高乐已经最终同意接受邀请，访问美国。他并不真正希望访美，这是有相当理由的。他曾经坦率地告诉我，尽管他丝毫不反对回访，并且深深感谢总统对他的邀请，但是他感到这样一次访问将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而又不可能完成任何事情，这就会给他们双方带来严重的影响。他保持这种观点达一年之久。他理解到不能无限期地拖下去，所以答应作一次工作访问，要求把仪式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个计划就是到肯尼迪在科德角海恩尼斯波特的宅地去，那里将很少有公开活动的机会。他们将进行一两天的讨论，如此而已。

505 肯尼迪的葬礼结束后，戴高乐拜访了新总统。约翰逊对戴高乐说，他等待着欢迎他正式访问美国。约翰逊认为，戴高乐将履行他对肯尼迪的许诺。戴高乐回答说，这种访问需要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安排。约翰逊把这回答理解为只要对一些细节——地点、时间、会谈事项——作出决定，而访问的原则已经同意了。第二天，他怀着诚意在美国州长会议上说，他等待着戴高乐的访问。戴高乐当时还在华盛顿，他听到约翰逊

的谈话后，派法国大使埃尔弗·阿尔芳匆匆来到国务院，坚持说幷沒有答应进行访问。他说，戴高乐将军对约翰逊的回答的意思是，是否进行访问，需要通过外交途径来确定。结果，戴高乐沒有来。

1964 年 12 月，当我在华盛顿的时候，约翰逊总统要我查明，大使馆报告的关于巴黎准备在外交上承认共产党中国的传闻是否属实。我回法国以后，向顾夫·德姆维尔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对一个外国外交官是不会公然撒谎的。我提出问题后，他犹豫了一会，说他需要查明一下，在一周內告诉我。当时显然酝酿着什么事情。一周以后，当他告诉我法国就要承认中国时，我已经把那种清楚的可能性向华盛顿作了汇报。戴高乐采取这个行动，仅仅是因为他觉得同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建立关系是荒唐的，不管它的意识形态怎样。他也相信，法国能够同中国发展有利的贸易。正如他对其所执行的对苏政策抱有的期望那样，他对中国的希望结果也证明是幻想多于现实。

对于戴高乐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部的决定，存在着许多误解。重要的是要记住，当 1949 年 4 月签订北大西洋公约的时候，这一划时代的事件固然使美国承担了义务，可是对于其他签字国来说，却是标准的工作程序，在它们的历史上曾几百次地签订过类似的协定。这个条约本身幷沒有建立某种机构来执行对受到攻击的成员国承担的援助义务。仅仅在 1950 年南朝鲜受到攻击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才建立了最高司令部。甚至就在那时，最高司令官在和平时期也沒有权力调动军队，不能象一般总司令那样下达命令。他甚至不能指 506

挥警卫班。只有参加国政府才能断定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应当把自己部队的指挥权移交给总司令。

然而,戴高乐在公开场合和私下谈话都强调,在和平时期实行军事一体化,会使法国的利益从属于盟国中的支配力量即美国的利益。实际上,我想戴高乐担心的是,一旦战争爆发,指挥权将落到美国将军手里,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最高司令官一直都是美国人。戴高乐无疑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德国人在阿登发动攻势时,他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关于如何使用法国部队问题的一次争论。当时艾森豪威尔根据正当的军事理由,准备放弃斯特拉斯堡以缩短战线。戴高乐反对这样做。幸亏在艾森豪威尔发布命令前德国人的攻势被制止了,否则戴高乐一定会带着法国部队退出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我同样相信,古巴导弹危机使戴高乐清楚地认识到,苏美之间可能由于与欧洲安全和利益毫不相干的争端爆发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体化结构中的西欧就将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漩涡。

戴高乐宣布他的决定的做法几乎使每一个人感到惊讶。1966年1月下旬,在他一年一度招待外交使团团长的宴会前不久,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暗示,应当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采取某些措施,但是并没有说明法国将立即采取行动。宴会以后我问戴高乐,他打算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做些什么。他回答说,"噢,我不会轻率从事。我们将在这方面花些时间,非常仔细地审查每一个问题,肯定不会操之过急。"我又一次上了戴高乐的当。我给华盛顿发回的电报说,他不会考虑在最近的将来采取任何激烈的行动。三个月后,1966年3月,顾

夫把我召到外交部，交给我一封戴高乐写给约翰逊总统的信，信上宣布法国的退出。我把信看了一半，对顾夫说，“这是一个可悲的日子。现在我不打算同你争辩这件事了。但是我感到难过的是，不能不把这封信送交我的总统。”顾夫没有回答。他们把同样的信件送给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国家。

虽然我不能够引证文件，但是我相信戴高乐选择1966年3月作为“调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事务的日期，主要是由于他预定要在6月份访问莫斯科。如果他等到访问以后再宣布，人们将会强烈地认为，他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克里姆林宫怂恿的。为了避免这样的猜测，他在访问莫斯科之前采取了行动。 507

根据从多塞街得到的消息，戴高乐的决定是相当突然的，连外交部的官员都不知道。事实上，多塞街拟定了一系列建议，保证给法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有更多的回旋余地，特别是关于法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基地的主权问题。所有这些建议都没有要求退出组织或撤除美国在法国的军事基地。这些意见提到了戴高乐那里。戴高乐告诉顾夫·德姆维尔，这些想法根本不行。这显然使顾夫·德姆维尔感到意外。戴高乐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安排，使法国退出整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人们还告诉我，他甚至暗示想要废除条约本身，虽然他没有决定这样做。这个说法可能是真实的，但是我倾向于怀疑它。条约要求每个签字国进行战争来保护受到其他国家进攻的任何成员国。面对他所承认的苏联的威胁，戴高乐是不会甘冒把法国孤立起来的风险的。他事实上可能是沿着这些思路考虑过，因为，法国所处的地理条件使它在受

到进攻时需要美国的援助，而美国也保证过要保卫所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

我被召回华盛顿同约翰逊总统和腊斯克国务卿一起商量怎样作出回答。问题之一是戴高乐要求在1967年4月1日以前撤出美国在法国的驻军（当初是应法国的强烈要求进驻的），并关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法国的军事基地。这是一个无理的要求。约翰逊总统决定尽可能不超过戴高乐要求的期限。五角大楼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但是总统根据我的劝告命令美军完成这一任务。我不认为对法国进行惩罚或采取强硬态度是明智的。我们没有丝毫可能去说服或强迫戴高乐改变方针。

一切按照戴高乐规定的期限完成了。在4月的期限以前，军队运走了八十万吨作战物资，撤除了全部空军基地。这是一次给人深刻印象的成功的行动。法国人无疑地以为我们会拖延时间，每走一步都要提出异议，一般说来会显得狼狈不堪。当我们庄严体面而卓有成效地按期撤出法国时，法国人大吃一惊。我相信我们的行动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对于一些需要移交给法国人的资产，我们预料只会取得有限的补偿。恰恰相反，戴高乐政府在对这些设施进行估价时，表现得格外大方。在谈判中没有丝毫阻碍。

508

并不是所有的法国人都高兴看到我们离开的。当美国国旗从凡尔赛附近的洛格营(美军总司令部)降落时，甚至一些法国将军都哭了。

在戴高乐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后，法国人对退出的理由改变了说法。阿尔芳大使告诉我，其所以采取这个

行动，是为了创造一种便于同苏联搞缓和的条件。顾夫·德姆维尔有一次在布鲁塞尔也提出了同样的论据。1966年6月30日我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分析了这个论据。我说，根据过去的历史和经验，为了谋求同苏联缓和紧张关系，在苏联并无类似行动之前就拆毁西方的防务，并把这种做法当成是正当的途径，这是没有什么理由的。正是由于看不出明确的动机，人们才对戴高乐的政策产生了根本性的疑问。我认为，戴高乐的政策如果继续搞它六年，必将导致西方联盟的彻底瓦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将受到诱惑，试图摆脱任何组织义务，特别是如果苏联领导人在策略上搞得非常漂亮，继续采取温和态度的话。我告诉华盛顿，华沙条约组织也可能发生类似的演变，但是决不应当忘记，华沙条约主要是一个门面，这个联盟的真实力量掌握在苏联手中，这不仅是由它的军事实力和党的控制所致，而且是由它对欧洲所占有的比美国更好的战略地理位置使然。我所担心的，不是美国的欧洲政策猝然崩溃，而是部队数量逐渐减少，以及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苏联在欧洲的威胁逐渐丧失警觉。美国不仅可能从实体上脱离欧洲，而且可能从心理上不再关心欧洲的发展。我的电报的结尾是：

> 我认为，戴高乐的政策的真正危险在于，如果这种政策再继续实行若干年，德国人很有可能对西方盟国灰心失望，因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想要走上以前遵循的道路，同苏联人达成交易。如果在苏联的外交政策中出现这种前景，莫斯科就会立刻抛掉戴高乐，这是无可置疑的。我确信，所有参与苏联事务的人都会同意我的论断，苏联政策中一个恒久不变的意图——过去已经两次实现过——就是同德国达成

509

某种形式的协议和和解，因为苏联人对于德国的力量，是有理由感到害怕的。戴高乐政策的唯一基础似乎是，他相信苏联人已经真正有所改变，抛弃了使用军事实力和进一步扩张共产主义的想法。尽管这种设想是符合戴高乐的目的的，这种观点的极端荒谬性是完全不言而喻的。我还可以补充说，就我所知的几乎所有了解苏联事务的法国人都强烈反对这一点。

约翰逊政府中有一些人说，“法国是永久的，而戴高乐是暂时的。”我警告说，任何乐观情绪都是虚妄的。我写道，“要法国政策再回到赞成联盟的基础上来，是没有多大可能性的。相反(这也正是戴高乐匆忙行事的原因之一)，戴高乐要把事情做得非常彻底，以致继任的任何法国政府都很难、甚至不可能(特别是按照左翼的看法)再走回头路，重新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个真正的而非虚有其名的成员国。”

戴高乐的中东政策，也同他对欧洲的观点一样，是独立于西方盟国之外的。他把法国的亲以色列立场改变为中立立场。1967年春，戴高乐从一篇报纸文章中了解到，以色列航空公司经常派飞机到法国来运走一些备用零件和其他军事装备。戴高乐下令停止这一活动。到了6月初，他又下令进一步限制向有纷争的地区运送军用物资。根据顾夫·德姆维尔的说法，戴高乐的禁令是在一个星期五发出的，但是，蓬皮杜总理也许由于他同罗思柴尔德家族的关系，显然没有让戴高乐的命令在星期六以前生效。以色列进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在星期一。如果不是以色列迅速取得胜利，我相信这个禁令将给戴高乐造成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法国人民的亲以色列的情绪是浓厚的。

当战争过去以后，戴高乐没有改变他对以色列的态度。在戴高乐政策的后面是有其冷静的理由的。他理解到，美国和英国已经在阿拉伯国家中丧失了地位，他看到了法国进入阿拉伯世界的机会。对于西方来说，这个政策并不坏。随着苏联影响的增加，在阿拉伯人中间保持某种西方的友谊是有好处的，而法国是有成功希望的唯一国家。 510

我只能推测戴高乐执行这种中东政策的原因。对于他的行动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戴高乐经常是我行我素的。在我担任驻巴黎大使的五年期间，他没有同盟国商量过任何一个重大的对外政策问题，无论是越南问题、承认北京问题、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或者是中东的六日战争问题。进行讨论和努力求得共同观点的做法，对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

7月11日，在六日战争过去一个月之后，我去拜会戴高乐。象我到爱丽舍宫的所有访问一样，这次访问在形式上简直象做礼拜一样。我走到爱丽舍宫的大门口，上一段阶梯，有一名副官来迎接我，把我带到办公室的外间，这里有一名军事副官警卫着。我坐在椅子上等了一会，直到信号器响了，这位军事副官才把我送进一间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陈设得象十八世纪的沙龙一样，有着宽大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草地、花坛和栗树。戴高乐绕过那张当办公桌用的大桌子走来，在屋子当中迎接我，然后用手势请我坐下，自己再回到办公桌后边坐下，双手交叉在胸前，说道，"Monsieur l'ambassadeur, j'écoute."（"大使先生，我听着。"）

戴高乐几乎从不主动提出话题。我提到了中东战争。他对以色列和以色列外长阿巴·埃班颇有反感。"大使先生，"

他用一口优雅的法语说，“当埃班先生路过巴黎的时候，我对他说，以色列决不应该凭持武力。你想他们怎样对待我的劝告呢？他们完全置之不理。”我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感到它的生存受到威胁，有时就不会接受别人出于最善良的意愿提出来的最好的劝告。他耸了一下肩膀。当他再次批评以色列时，我说，“我的将军，假如你是一个以色列人呢？”他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傲慢地回答说，“但我不是一个以色列人。”

戴高乐不是反对犹太人，他只是反对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他一经相信以色列为了征服土地而发动战争，就牢不可破。他的观点很固执，只有彻底的和解才能改变他的态度。

我不认为戴高乐在任何时候对美国有过多少了解。我们511缺少戴高乐认为一个稳定的国家应该具备的那种属性的大部分。我们沒有自己的军事传统；我们的军队主要是非战斗人员组成的。我们沒有起统一作用的宗教遗产。我们是来自几十个不同国度的移民——在他的眼中，是一起来开发一个大陆的多少有点杂乱的部族集合体。他觉得我们一味注重物质，沒有比方说法国那种敦品励行的坚实传统。我们美国是过分强大了，这对我们自己沒有好处。他多次对我说，在同世界其他各国的关系上，美国的政策是以过分使用实力为基础的。他说的不是军事实力。苏联在军事上极其强大，不容忽视，因此他理解到在核武器方面存在着力量扯平的问题。他认为，在其他各种实力方面——工业、商业、农业、科学和财政——美国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包括苏联在内，这样，我们就可能陷进错误的泥坑。1968 年我陪着副总统休伯特·H·汉弗莱去拜访他时，戴高乐对我们派兵到多米尼加共和国表现出十

足的蔑视态度。他举出这个行动作为例子，说明我们是错误地迷信武力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当我们撤出圣多明各时，我对戴高乐提到这件事。他耸了耸肩膀，什么也没有说。

我最后得出结论，假如国家之间的关系同行星系统的运行是类似的，那么，戴高乐固执地要使法国脱离美国的做法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每一个行星都有其引力。一个中等大小的行星必须摆脱较大行星的引力场，或者成为一个卫星。正是根据同样的理由，法国必须摆脱美国。

除了戴高乐对美国的看法以外，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他对苏联的态度。还在战争期间，戴高乐就已经同莫斯科调情。1943 年 12 月他在阿尔及尔的一次讲话中，称俄国是“chère et puissante Russie”(“亲爱的和强大的俄国”)。1944 年他去莫斯科，未经同西方盟国商量，就同斯大林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诚然，签订这样的条约并没有什么过错，英国在 1942 年就签订过。但有趣的是，当戴高乐提出这个建议时，斯大林和丘吉尔的最初反应认为这个联盟应该也把英国包括在内。戴高乐表示反对。

尽管戴高乐对苏联的看法有些天真，他对苏联采取的立场也同对西方一样强硬。在讨论 1944 年的同盟条约时，俄国人企图要法国人承认亲苏的波兰人卢布林委员会，而不承认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不管施加多大的压力，戴高乐都拒绝了，512 并准备不达成协议就离开莫斯科，这时斯大林屈服了。在以后的年代，戴高乐把斯大林的退却理解得太过分。他似乎认为，只要其他西方大国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它们就可以压倒苏联最顽强的意见。戴高乐错了，因为苏联占领了东欧，任何

统一的外交阵线都不能改变这个结局。他也沒有了解，法国对波兰问题的态度在斯大林眼中幷不重要。对斯大林来说，美国和英国的观点才是至关紧要的，然而，甚至这两个强国在波兰问题上也是无能为力的。

戴高乐的对苏政策是建立在他对国际关系的基本态度上的。根据我同戴高乐十几次以上的谈话，我相信戴高乐认为在国际上具有连续不断的生命力的唯一实体是民族国家。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转瞬即逝的暂时性的东西，所以政治家对此幷不感到很大兴趣。共产主义是一种小儿病，象痲疹似的，患这种病的人——这里指苏联——肯定会从疾病中恢复过来。一个国家在患这种病的时候，其他国家应该当心它的危险，善自处理。最后，意识形态会渐渐消失，俄国将恢复它过去的传统目标和政策。

戴高乐认为，只有具有始终一贯的、悠久的民族性传统的国家，才眞正有把那种传统贯彻于国际舞台上的素质。有一次，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比利时代表说，比利时是法国由于对外政策的考虑而制造出来的一个人为的国家，因此它沒有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的合法权利。在另一个场合，他说意大利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些城市和省份的凝积物。德意志正处在成为一个国家的过程中。虽然他往往称德国人是伟大而可怕的民族，他却很少称他们是一个国家。事实上，他只把法国、英国、西班牙和俄国当成欧洲眞正的国家。戴高乐认为，民族国家奉行一种冷酷的谋求利益的政策。下面就是一个非常确凿的说明。在法国内阁的一次会议上，顾夫·德姆维尔提到了“法国和它的朋友”。戴高乐插口说，“部长先生，

一个伟大的国家没有朋友，只有利益。”他不允许他的政府在分析国际问题时夹杂着感情，因为他认为这样做的人多半会上当受骗。他错了。谁不注意贯穿着美国政策的强烈的感情因素，谁就不可能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美国政策作出公正而客观的分析。然而冷静地考察一下，戴高乐的理论是对的。513 在政治中不应该让感情起作用。不过，按照人的本性，感情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象法国这样的同我们有传统联系的国家，美国是愿意为它们作出牺牲的。

尽管戴高乐对美国和苏联似乎采取对等的政策，实际上可完全不是这样。他知道美国是一个宽厚的国家，虽然他往往尖锐地公开批评我们。他也知道苏俄是个怀有恶意的国家，但是因为他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感到忧虑，他没有象我们这样看到危险的深刻程度。他错了。五十年以后他可能是对的。到那时，我不相信还会留下那种指导着积极政治信仰的布尔什维克理论的任何残余。但是现在，意识形态还起着作用。1968 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可以归因于需要保护苏联的国家安全。但是用来增进苏联国家利益的整个体制——共产党的全面控制——无疑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苏维埃的意识形态一经被采用，它就强迫人们承担义务，导致一种在其他情况下不会出现的后果。戴高乐没有了解这些真实情况。

戴高乐坚持认为，在外交事务中，民族主义高于意识形态。1967 年他访问波兰时，这个观点得到了体现。波兰人给了他盛大的接待，这是可以理解的。法国和波兰之间存在着传统的友谊。但这里也有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因为戴高乐正

在摆脱美国，而共产党人是讨厌美国的。戴高乐发表了一篇演说，强调法波友谊，但他暗示说，波兰所受的威胁既来自西方，也来自东方。换句话说，他试图勾起波兰人传统的担忧。但是，戴高乐的意见是不适合苏联给波兰规定的意识形态的模式的。波兰共产党首脑哥穆尔卡在致答词时，纯粹从意识形态发言，强调苏联和波兰人民永恒的友好团结，用尖锐的措词暗示任何人都不能破坏这种友谊。

戴高乐常常用“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这句话来形容欧洲。这句话最初见于1907年《小拉鲁斯辞典》，指的是传统上属于欧洲的土地。西伯利亚不是其中的一部分。苏联人不喜欢这种说法，因为它暗示西伯利亚并不真正属于苏联。但是戴高乐坚持采用这个说法。

514 戴高乐怎样想象苏联在欧洲的作用，这一点还不完全清楚。俄国是欧洲的一部分，但是我想，戴高乐是故意不清楚地说明俄国同这个地区各国的确切关系的。他设想的不是一个统一的欧洲，而是一个联邦，所有参加这个联邦的国家都有明显的欧洲特性。这些国家由于这种共同的利益，结成一个单位来对抗世界其余的国家。甚至在戴高乐的眼中，建立这样的联邦也要花很长时间。这种说法是很不平常的，因为，如果这里有一点戴高乐思想的特征，那就是超时代的趋向。（马尔罗形容戴高乐是前天和后天的人物。）戴高乐常常讲一些只有在下一代才能开始见效的事情，但是他却把它说得好象现在就实有其事一样。这就是他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想法的基础。

戴高乐的悲剧在于，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基础。假如他是象美国这样大国的领导人，那么，对于柏林和德国问题，他会

愿意比我们作更大的冒险。他也许能够同莫斯科作交易，虽然他暗中乐意德国的分裂。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们美国人为什么对德国的统一这样感兴趣？”我给了他标准的回答：德国的分裂是一个永久的脓疮，迟早会引起麻烦而危及世界的和平。戴高乐反驳说，“一个统一的德国也会是这样。”

戴高乐的思想有一半能够现实地估计法国在现代世界中比较脆弱的地位，另一半则不承认法国没有力量。他讲起话来好象法国是个拥有一亿人口的国家，但是实际怎样他知道得较为清楚。因此，他总是陷于自相矛盾。一方面，在他的观念中法国是举世无双的——的确，差不多是天之骄子——另一方面，他对法国人民又表现出一种荒谬的蔑视。他认为法国人是轻浮的。据说他曾经讲过，“对于一个有三百一十五种不同形式的奶酪饼的国家，你有什么办法？”但是，他对我这个外国外交官，从来没有说过任何轻视法国的话。

戴高乐对法国的功劳是实在的。毫无疑问，只有他在丢掉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能够独挽狂澜，避免了内战。他放弃了法国对殖民地的统治权，而又在除几内亚以外所有过去的殖民地保持了法国的卓越地位，这种做法也是很高明的。最重要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打击之后，他恢复了法国的士气。法国1940年由于遭到可怕的失败而蒙受的奇耻大辱，远比我们局外人知道的严重得多。戴高乐了解这一点，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提高法国人的信心。法国人没有花多长时间就恢复了他们的优越感。 515

戴高乐并不总是很成功的。他没有能够象他企求的那样发展同苏联的亲密关系。他的最大错误是拒绝英国加入共同

市场，这纯粹是由法国人的骄傲造成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同美国政府的观点直接抵触。自从实行马歇尔计划以来，美国一直赞成西欧结成一个整体。既然欧洲已经无可挽回地和永久地分裂成为东欧和西欧，那么，在个人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持有相同观点的西欧国家就应该联合起来进行自卫，使它们自己在现代世界上成为一个能够生存下去的实体，这在我们看来是基本的常识。我们呼吁欧洲人采取行动，但是我们决不想强迫他们。的确，我们强调要由他们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连这种谨慎的赞助也受到戴高乐反美论调的压制。在原则上我同意我们的官方应该保持心平气和的态度，但是我的确认为，我们应该经常让人们知道，我们是竭力赞成西欧的统一的。

戴高乐也赞成欧洲的统一，然而是在法国支配下的统一。这是戴高乐的巨大目的。他对德国怀有一种法国人的本能的恐惧。他尊重这个强大的东方邻国，但对它并不信任。他同样觉得，法国由于许多世纪的文明和巧妙的外交手腕，应该起一种历史作用——简直是上帝赋予它的领导欧洲的使命。他还没有虚妄到完全忽视世界力量对比的程度，但是他确实觉得，只要法国掌握核武器，它就能够单枪匹马地阻止德国成为核大国，防止德国再次威胁欧洲和平。无论如何，主要是法国的骄傲和要求控制的欲望，阻碍了共同市场大陆各国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不管他使我多么气恼，甚至愤怒，我不能不尊重这位以伟大的夏尔闻名的人的非凡品格。他不是最使人感到舒服的，但他确实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有礼貌的人之一。只有当他在

科龙贝双教堂村的时候，我不大容易见到他。他从未对我表示过厌烦。他总是彬彬有礼的、安静的、轻松的，我需要占用他多长时间，他就给多长时间。当然，我也注意避免坐得过久。 516

他授予我一枚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这是法兰西共和国授予外国人的最高勋章，对此我的确应该感激他。我想，戴高乐是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的：对于他采取的某些为美国所反对而又不能制止的措施，我沒有大喊大叫。我力排众议，始终更多地着眼于我们未来同法国的关系，而不是只看到同戴高乐暂时的不和。这个事实受到高度的赞赏，至少有人是这样对我说的。

戴高乐也给了我两次到朗布依埃堡——位于巴黎南面约有半小时路程的一座属于政府的城堡——打猎的荣誉。这种精心安排的活动，主要是为外国大使们举行的。在这种场合，士兵们穿着白色的衣服担任追猎者，把野鸡驱赶到射击者跟前。打猎的程序也是老一套的。士兵们先赶野鸡，赶了三次以后，暂时停下来。这时开来三辆黑色雪铁龙牌小轿车。戴高乐身着便服，从第一辆车上下来，同所有参加打猎的人一一握手，然后就站在某个人的后面。我射击过四次，其中两次戴高乐选定站在我后面。当我弹不虚发时，他就说“噢！打得好！”或者“好枪法！”要是我转过身来，一不小心，就可能打中他，因为他那六呎四吋的身材是一个庞大的目标。想到这里，我当时神经真有点紧张。有一次打猎以后，一位重要的法国官员责怪地笑着对我说，“先生，您刚才站的位置太妙啦！紧挨着我们的总统。”

打猎完毕，我们大家就到别墅去吃一顿精美的法国午餐

——备有三种葡萄酒的午餐。最后两次，因为我是首席大使，我坐在将军的旁边。在一次这样的午餐上，戴高乐说，只有战争年代才能眞正创造历史，这的确是可悲的。他说，在和平时期，人们所有的全部东西就是政治。他是用一种轻蔑的音调来说“政治”这个词的。1967年我最后一次到那里去打猎，我问戴高乐是否看过塞尔范-施赖贝尔的《美国的挑战》这本书。他回答说，“沒有，我沒有看过，也不准备看它。我不喜欢这个作者。”

在这样的打猎活动中，苏联大使维诺格拉多夫把我看成他的敌手。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射手，尽管他自以为这样。有一次，我射击得比他好，这位苏联大使就暗示说，法国人给了我较好的射击地点。他变得更象一个资产阶级人士，而不象共产党人。他最自豪的回忆之一是，让·德·博蒙伯爵曾517经邀请他到阿尔萨斯去打野鸡。

戴高乐善于随机应变地讲讽刺话。在他声望下降的时候，有一次，他的热烈支持者、电视评论员达斯迪埃·德·拉维热里向他诉苦说，他所有的朋友都为将军的政策感到忧虑。戴高乐说，“亲爱的达斯迪埃，你另换一些朋友吧。”

几乎沒有一个星期不发生一两件关于戴高乐的自尊心的传闻，其中不少是眞实的。1964年，他不允许法国政府中任何重要的官员参加纪念诺曼底登陆二十周年的活动，因为无论他本人或其他法国人都沒有参与这场具体的战役。沒有把这场历来最伟大的两栖军事作战列为历史上的大事。另一方面，他却同意纪念在法国南部的一次登陆，因为自由法国的部队曾经参加这次战役。庆祝活动是在有纪念意义的土伦举行

的。英国大使帕特里克·赖利爵士和我就站在戴高乐的后面，靠近一个大石头花盆。几个月以后，法国报纸报道，法国保安部门在这个花盆里发现了一个烈性炸弹，是从几英里外用无线电操纵的。显然因为装置失灵，炸弹沒有爆炸。我不清楚这个报道是眞的，还是为了提高戴高乐的威望而捏造的。这里可能有一点眞实性。无论如何，英国大使和我是紧挨着那个花盆站着的。

戴高乐是铁面无情、不假辞色的。1964 年，当他离开斯特拉斯堡的时候，他同列队站在飞机舱口旁边送行的一批将军握手告别。当他走到法国驻德部队总司令雅克·马絮将军面前时，他垂下了手，转身走上飞机。但是，这种自从阿尔及利亚时期就开始结下的怨恨，并沒有妨碍戴高乐在 1968 年 5 月骚乱时乘直升飞机去找马絮将军商谈，估量军队是否仍然忠于政府。

戴高乐在政治上是很不近人情的，这个特点旣是优点，也是缺陷。他在一种神秘气氛的笼罩下避开他的追随者，对于他是否帮助还是损害了自己的追随者，他是完全漠不关心的。当他认为那些为他工作的人不再有用处时，他就把他们抛开。在他一生事业的最后日子里，由于他脱离公众，他对法国人民作了错误的判断。1968 年元旦他对全国发表了一篇讲话，他说，“法兰西能够镇靜沉着地展望新的一年，因为在许多大国中，只有法国在自己的国土內不曾受到任何重大事件的震撼。”过了不到四个月，学生起来闹事，法国成了所有国家中震动最大的国家。 518

尽管我们同法国政府的关系中有过失望和困难，我的法

国之行既是一种任务，也是一种愉快。原因之一就是我有一个好的班子。在莫斯科和马尼拉时，我也有好的班子，但是在法国的班子则是突出的。它是一个团结而和谐的合作单位。这里存在着正常的矛盾、猜忌和分歧，但这些并不妨碍我们的大使馆成为一个模范。有过一些错误的判断，但这些是比较少的。我感到自豪的是，无论在国务院或法国外交部，我们都有极高的声望。华盛顿知道，我们对于所有的事件都能高瞻远瞩，洞若观火。巴黎信任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说过闲话，没有曲解形势的发展。我们的工作卓有成效，主要应归功于三个人，他们是我在大使馆供职期间的主要副手。第一个人是赛西尔·莱昂，我多年的老朋友，他放弃了驻智利大使的职务，到巴黎来做第二号人物。第二个人是罗伯特·麦克布赖德，他后来担任驻刚果和墨西哥的大使。第三个人是伍德勒夫·沃尔纳，他对法国政治舞台和法国人的性格具有无与伦比的知识。我的工作也得到我的秘书安娜贝尔·米切尔的极大帮助。

我喜欢法国的另一个原因是法国人民对我们的殷勤款待。我在巴黎五年，只有一件事情真正引起了不快。受法国政府控制的电视系统的评论员达斯迪埃在一次晚上的广播中说，被北越俘虏的任何美国飞行员都应该用铁链锁在车轮上，拖着在越南巡回示众，作为轰炸无辜妇孺的惩罚。尽管达斯迪埃有权发表意见，受政府控制的电视系统居然允许他这样嚣张地攻击美国空军，未免有些过分了。我向法国外交部写了一封抗议信。我没有想公开这封信，也不相信我从莫斯科时期起就结识的老朋友、代理外交部长路易·若克斯会公开

它，因为在讨论我的申诉时，他甚至还说他完全理解我的意见。然而这封信却透露给了法国新闻界，法国新闻界指责我干涉言论自由。对于达斯迪埃有权发表任何意见，我并沒有 519 提出爭议，我只是指出法国政府要对它自己的电视系统发表的言论承担责任。幸而，这个爭论沒有持续多久。

我们在法国的其他经历全是愉快的。我的妻子和我定期招待各方面的人士。我们大约每月举行两次招待会，招待內阁部长、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劳工领袖、实业界人士、艺术家、知识分子——法国生活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我们还每月举行两三次正式宴会以及无数小型便宴。我们沒有举行过如大型舞会之类引人注目的铺张活动，我们觉得，由于越南战爭，举办这类活动是不适宜的。

而且，在戴高乐当政期间，我们很容易找法国政府讨论我们的共同问题。我在巴黎将近五年，见过戴高乐三十五次。顾夫和我每月至少见两次。我们兴之所至，到处游逛，这在莫斯科是办不到的。

我们周游了整个法国，从布雷斯特到尼斯，从敦刻尔克到比阿里茨，到处受到法国人民最热诚的接待。原因之一是，尽管戴高乐同美国的关系有了裂痕，许多法国人还是希望表示他们仍旧是亲美的。他们觉得，戴高乐的行动是给法国人的礼貌抹黑，他们对两度在欧洲战场上同法国并肩战斗的国家的代表，表示了比通常情况下更多的善意。法国人民这种了不起的殷切之情，将永远是我记忆中最愉快的篇章之一。

1968 年 1 月 30 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为我和我的妻子举行的送别宴会上，谈到了法美友谊正在经受的考验。他说：

“……在已有将近两百年之久的友谊的历史过程中，这并不是第一次。的确，在我们两国之间，经常是当一个国家本能地倾向稳健的时候，另一个国家就同它分道扬镳。当法国在不同时期想要过一种冒险生活的时候，它沒有得到美国持久的支持。今天，反转过来，当美国特別容易受权力冲动影响的时候，法国也确实并不始终赞成这种冲动。也许，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分歧毕竟是有助于保持世界平衡的。虽然结果是，在现时我们的态度有一定分歧，我们的感情有些不和，但是我们两国共同积累起来的相互利益、相互吸引和相互敬佩——从几次情况来看它们对世界命运关系十分重大——一定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520

我在致答词中表达了同样谨慎和乐观的态度。我说：

“尽管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我们大家都意识到的政治问题，或者对一些问题有分歧看法，但是我感到，美国和法国之间的深厚友谊是始终存在的。当我离开法国时，我坚决相信，在发生任何使国家生存受到考验的巨大事件时，你们会发现法国和美国仍将象过去那样并肩站在一起。”

在给国务院的最后一次报告中，我对问题的提法与此稍有不同。1968 年 2 月 9 日我给腊斯克国务卿的信中写道：

既然戴高乐的态度如此，任何真正改善法美关系的机会看来都是极其微小的。把越南战争问题提到谈判桌上，这对舆论当然有所帮助，但即使这样，我觉得戴高乐对美国力量所作的基本解释，实在不能提供多大希望和机会，通过美国政府的行动或者甚至通过法国政府的行动，来改善两国的关系。戴高乐对美国力量的基本解释，[迫使]法国人在除了全面战争以外的任何情况下撤销对美国的支持。只

要戴高乐坚持这个观点（现在还看不出他有改变观点的迹象），就不会出现任何根本改善法美关系的希望。简言之，在戴高乐去职之前，我不能促使别人相信我们能够改善同法国的关系。

就这样，我带着开始时就有的同样悲观的调子结束了我在法国的五年经历。回到华盛顿后，我的精神并没有振奋起来。我发现，反对越南战争的怒潮席卷全国，总统已经绝望，不知该怎么办。不到半年，我又适逢同莫斯科的另一次危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521

第二十九章 莫斯科的最后一瞥

1967年底，我在回国休假期间有一次按例到白宫去，约翰逊总统愁眉苦脸地向我问起一个他在这些乱糟糟的日子里几乎向每一个人提出过的问题："如果你主管这个国家，你将对越南怎么办？"

我很少参与对越南战争的正式讨论。亚洲不是我的专业范围。象所有别的人一样，我对这场战争有自己的看法。象大多数的美国人一样，这些年来我的观点有了变化。当1954年3月29日国务卿杜勒斯开始暗示，美国可能派部队帮助法国打败胡志明的革命军队时，苏联政府通过它所控制的报纸，表示了一种惊慌的态度。《眞理报》说，杜勒斯感到"激怒"的是，他沒有能够"挑动"中国干预这场战争，因为他需要一个派遣美国部队到越南去的借口。1954年4月12日我从莫斯科给杜勒斯发回一个电报，其中指出：通常苏联报纸透露苏联官方对一件所谓挑衅行为不予反应时，这说明克里姆林宫非常担心它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它希望避免的局势。我补充说：

> 最近美国在对印度支那的政策上表示的坚决态度（按照您在柏林同莫洛托夫的谈话），使苏联政府看到美国眞正下了决心，因而似乎产生某种特有的举棋不定的状况。倘若西方大国能够保持统一阵线，共同施加压力，并对它们在印度支那所希望达到的确切目标具有

鲜明的想法，那么，并不是完全不可能按照我们的条件求得解决的。我不相信苏联愿意或者能够强迫共产党中国沿着希腊方式的路线完全抛弃胡志明。但是，无论如何，假如英国和法国能够同美国并肩站在现有的坚定立场上，那么，谋求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可能性无疑将会增加。 522

五周以后，当四大国，加上中国，在日内瓦开会解决越南战争问题时，我担心盟国会过分急于想对共产党人作出让步。法国人厌战心切，他们准备接受几乎任何一种解决办法。英国人也过分愿意赞同一种不合理的方案。尽管我赞成结束战争，我却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为了谋求和平而放弃不需要放弃的东西。在莫斯科，我感到苏联人，大概还有中国人，为了担心美国参加战争，非常愿意结束战争。这里有一个危险是，盟国正在丧失他们的希望。5月18日，我拍发给杜勒斯一封长电报，竭力向他表明，虽然莫洛托夫发表了无关痛痒的警告，苏联想要避免战争的念头则是一个主要因素，在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时，对此应该加以仔细考虑。电报中说：

我认为，苏联现阶段的对外关系是由两个决定性的因素支配着的……第一是，决心保持共产党人在战后获得的全部东西。第二是，希望在其对外关系中避免可能导致军事卷入的严重危机。我认为，苏联外交活动的一些直接目标，诸如挫败欧洲防务集团，离间美国同其盟国的关系等等，都是在这两种考虑的范围内进行的。在欧洲，分界线已经清楚地划定了，这在柏林会议上得到了确认。根据上述的因素来看，苏联的行动或政治立场是不难预测的。关于朝鲜，情况也是如此，分界线也是清楚地划定了的，不管中苏之间可能存在着怎样敌对的情绪，它们在决不放弃共产党对北朝鲜的统治这一点上无疑

是牢不可破地一致的。以印度支那来说……由于共产党中国进行干涉，以及我们对于苏联控制或影响中国政策的程度缺乏了解，这里的情况要难以捉摸得多。

我觉得很难相信，对于一个在地理上距离苏联边境如此遥远，因而与苏维埃国家沒有什么直接利害关系的地区，苏联会有意识地冒军事卷入的眞正风险……无庸赘述，苏联希望避免军事卷入，并不起因于斯大林死后它本质上有什么改变。新领导在农业、经济和其他领域提出的国內纲领，他们关于普遍改善生活水平的宣传，以及强调需要和平的言论，所有这些都不能使一个政府在心理上作好准备，打算很早就卷入严重的军事行动。同时，现在试行的集体独裁，不管在任何情况下能维持多久，肯定是不宜于应付重大的突然事变的。如果对外事务中发生严重危机，那就会使上层领导內部的关系极端复杂化，甚至可能达到危险的地步。

523

上述考察只涉及苏联。由于苏中关系错综复杂，这些判断可能要加以修改，甚至完全错误。根据推断，苏联对中国行动所施加的影响，也许同某个行动方针对整个共产党集团的危险成正比。例如，倘若苏联政府（以及中国政府）明确认识到为了印度支那确实有发生大规模冲突（特别是同美国）的危险，那么我想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就可能是决定性的。相反，如果共产党人得到的印象是，由于西方不团结，他们能够不冒大规模战争的严重风险而得到整个印度支那，那么，苏联政府甚至就不愿意对中国施加起抑制作用的影响。这里似乎很难理解，特别是英国人怎么会不知道在同现代极权国家打交道时，应当记住的基本教训：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重大问题，那就是，如果谈判失败，其结果将危及它们制度的存在……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无疑是，让苏联政府明确无误地知道我们关于印度支那的立场。如果我们能够说服我们的盟国以某种形式制定

一个可以接受的共同立场，那么，越快把这种立场私下转达给苏联政府越好。

我没有参加日内瓦会议，所以很难说日内瓦的解决办法给予共产党人的东西是否比需要给的为多。*

这一时期，苏联开始关心所谓"亚洲人的亚洲"的说法，这种说法在日内瓦会议后增多了。北京显示了一种新的主动精神，外交部长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甸。莫洛托夫告诉印度尼西亚人，苏联希望被邀请参加雅加达会议，因为它是一个亚洲国家。苏联报纸强调，只有依靠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东南亚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我在9月16日给华盛顿的电报中指出，上述情况表明，对于当前形势的发展，"苏联是并不特别高兴的"，因为这"似乎会使中国共产党人在亚洲获得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

524

当北越和南越之间的战争不顾日内瓦协议而猛烈展开的时候，我从莫斯科不断汇报了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报纸的评论。我在菲律宾两年期间，没有人向我询问过对越南问题的意见。当我回到华盛顿时，主要的问题是老挝。通过1962年的日内瓦会议，老挝至少部分地实现了中立。

在肯尼迪和约翰逊当政时期，美国对越南的干涉有增无已。这时，戴高乐的批评逐渐增多，而我对我们的政策也更加怀疑起来。1966年1月31日，我给当时在华盛顿担任无任

* 在《赫鲁晓夫回忆录》那本书中，援引了赫鲁晓夫的一个说法，说越盟当时已经精疲力竭，胡志明准备结束革命。当法国孟戴斯-弗朗斯总理提出以十七度线作为越南分界线的建议时，"我们大吃一惊。我们没有料想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十七度线是我们自己本来要提出的真正最大的限度"。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准确的报道员，但是他的观点同我在1954年春天的观点是一致的。

所大使的卢埃林·汤普森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谈到了越南战争：

> 使我不安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在美国政府中有些人相信，只要轰炸北越，就能够诱使或强迫河内走到谈判桌上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论调，因为在我看来，共产党人的全部历史表明，他们是不会在这一类的外部压力面前让步的。共产党人事实上认为，两种不同制度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他们相信，对外来压力的让步将导致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让步。我同样认为，过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朝鲜，当仁川登陆使局势看来对共产党人非常不利的时候，就根本谈不到任何停战的问题。据我所知，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提出过和平试探。只是在1951年6月，当军事形势实际上形成僵局的时候，俄国人才有可能提出停战的建议。

到1966年底，戴高乐已经采取了公开的敌视态度。他的态度部分地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上，即在法国已经失败的地方，美国也不会成功。同时，这里也有一种真实的担心，唯恐这场战争被认为是白种人反对黄种人的种族战争，这就可能升级为一场世界性的冲突。

现在来说越南战争是一个错误，这是容易的，但是我不知道有哪位总统能够以不同于对待南朝鲜的态度来对待南越，听之任之，撒手不管。错误不在于援助南越，而在于这个政策的执行情况。美国军队所倚仗的是火力，这种火力对平民造成严重的杀伤。其结果是，大多数外国人和相当一部分的美国公众都开始相信，这场战争是不道德的；美国为了支持一个腐败的独裁政权，对越南人民恣意屠杀。

525

1968年我回到美国时，关于越南问题的决策方针已经

确定，参加各种工作组的人员早已开始工作。我间或被召到白宫参加会议，讨论同苏联交涉的办法，但我只起很小一点作用。

在回答约翰逊1967年向我提出的问题时，我告诉他，我沒有资格来判断轰炸北越的军事价值，但这在政治上是美国曾经做过的最糟的事情。它迫使苏联人对北越提供更多的援助。苏联人认为，保持他们在共产党世界中的领导地位是至关紧要的，如果他们在“帝国主义”大国的进攻面前背弃一个共产党小国，他们就将遭到中国人的批判。对于北京来说，如果苏联人不采取行动，这将是苏联政权的修正主义不革命性的又一明证。此外，我告诉约翰逊，轰炸使得欧洲的舆论反对我们。欧洲人看不出轰炸乡村地区的小茅屋有什么军事价值。对于他们来说，空袭是一种暴行。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沃尔特·罗斯托参加了会议，对轰炸进行辩护。他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的空袭杀伤了平民，但仍然继续下去，因为这有助于军事努力。我回答说，尽管我不知道在越南的军事效果怎样，但是，在传统的大规模军队作战与游击战之间，是存在着区别的。在传统战争中，需要铁路和卡车来运送人员和供给品。在这种情况下，轰炸是有效的。在游击战中，供给品是靠自行车和越南人的肩背运送的。轰炸并不能阻止敌人。这些论证都不是新的，约翰逊在各种时候都听人说过。对我提出的论证，他沒有再提什么问题，也沒有说什么。

越南战争不仅对于国家，而且对约翰逊本人，都是一个悲剧。这场战争无疑地损害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尽管他在国內事务方面是一个很出色的领导人，这场战争却转移了他对

国内事务的注意。在一般的对外政策问题上，我不打算评价526约翰逊，因为我同他不接近。约翰逊对苏联问题的实质缺乏深刻的理解，不过这一缺点对美国尚未造成损害。约翰逊在新泽西州葛拉斯堡罗同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举行了会谈，但沒有什么收获。至于对戴高乐，约翰逊表现了成熟性和深刻理解，为此他应该得到最高的评价。迪安·腊斯克也是如此。

在同约翰逊谈话几天以后，我到马里兰州东海岸打野鸭，迪安·腊斯克从那里把我召回华盛顿。“奇普，你给总统的印象太好啦，”他说，“他要你回来接替福伊·科勒的职务。”科勒是负责政治事务的代理副国务卿，他就要退休了。虽然我更希望继续完成我在巴黎的使命，但是作为一个公职人员，是很难拒绝总统的要求的。上一年，我谢绝了派我回莫斯科的建议。当时腊斯克召我回国，告诉我说，约翰逊正在认眞考虑再次派我出使苏联。我回答说，我当然愿意服从命令，但是我觉得，鉴于我在苏联问题上的长期阅历，我有权对自己的任命提出意见。国务卿表示同意。我指出，根据我的观察，至少在越南战争继续进行的情况下，甚至在这以后，很少有改善苏美关系的机会。

我同样指出，派一个大使第二次到莫斯科这样的岗位是错误的。头一次到那里出任大使，精神振奋，可以对工作产生兴趣。这时存在着希望，认为情况将会发生变化，关系将会得到改善。最后，兴奋的情绪衰退了，希望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无聊和单调。除非有某种眞正的发展前景，否则派我回去是错误的。腊斯克说，他将把我的想法转达给总统。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汤普森和我拟定了一个可供任命驻莫斯科大

使的名单，交给了腊斯克。1966年晚些时候，我见到总统时，向他重述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并补充说，我的调动可能会触犯法国，因为这个举动叫人看来好象是莫斯科比巴黎更为重要。我的论证救了我，但沒有拯救我的好朋友汤普森，他又被派回莫斯科去了。汤普森后来把他第二任的情况告诉了我，证明我的预料是正确的。他认为他在那里的时间过得很无聊。

在华盛顿，我发现负责政治事务的代理副国务卿的职责并不明确。这个工作旣涉及同其他各部的关系，也包括对国务院內部某些部门的管理。例如，政治军事处是跟五角大楼打交道的，它向我的办公室汇报工作。负责协调全部学术关系和科学协定的科学顾问，也向我的办公室汇报工作。我也是国务卿在海洋委员会、空间委员会以及类似的组织中的代表。我发现工作很有趣味，但是并不费力。此外，当然我还保持着对苏联事务的特殊兴趣，充当国务卿在苏联事务方面的顾问。 527

我的上司是国务卿腊斯克。自1949年马歇尔将军把他从军队带到国务院来以后，我就认识了他。虽然我们共事是亲热的，但我们沒有成为亲密的朋友。有时候，我们一起工作，他对形势作出的冷静而周密的估计引起我的尊敬。他具有一个卓越的公职人员的品质：勇敢、克制、善于分析问题。作为国务卿，他的缺点之一是对人采取一种过分保留的态度，即使对他非常了解的人也是如此。我想他是仿效马歇尔，尽管我沒有听他这样说过。用海军的行话来说，他是一个站在舰桥上的地道的海军上将。下属向他报告什么，他只是听着，不表示态度，不说话，在他那佛爷似的圆脸上也毫无表情（有

一次他对我说，他的相貌看来象一个酒吧间的伙计)。他对谁也不信赖。他的这种保留态度已达到损害他的地步。国务院的下属人员对他感到格格不入，不愿同他接近。肯尼迪总统也被他这种不与人交往的作风弄糊涂了。有一次他问我，“为什么腊斯克是内阁中我唯一不能用小名称呼的人呢？”在肯尼迪的同意下，我问了腊斯克。他回答说，“哦，我喜欢这样”，并解释说，他不认为内阁成员应该同总统过于亲昵。马歇尔曾用同样的方式回答罗斯福的平易近人不拘礼节的态度。

尽管这样，腊斯克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国务卿。在越南问题上他以鹰派著称，但是，由于采取了某些鸽派的行动，例如停止猛烈轰炸，他在这方面更值得称道。然而这说来就话长了。

1968 年，我在国务院的工作很快成了接二连三开会的例行公事。我每周至少出席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要交换对世界各方面形势的意见。但越南问题除外，这个问题是单独处理的，而且差不多总是在白宫处理的。我没有参加过越南问题的会议。由于我担任国务院在空间和海洋委员会里的代表，

528

我周游了全国。所有的事情都非常有趣，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其中阿波罗号飞船载人攀登月球的准备工作更是这样。

1968 年 7 月，我以外交官身份最后一次访问苏联。这主要是一次礼节性的事务。我率领一个代表团参加泛美航空公司开辟纽约至莫斯科航线的首次飞行。我住在斯巴索大厦，同汤普森大使进行了若干次长谈。

莫斯科是阴郁沉闷的。知识界和文化界毫无生气，只有少数几个青年艺术家除外。公众情绪冷漠。确实，街上行人表情忧郁，面无笑容。人们告诉我，青年人离心离德，逃避政治

生活。显然，他们之间甚至不谈论政治。尽管在莫斯科的某些部分，如加里宁大街和阿尔巴特区，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商店和建筑物，一般说来莫斯科的外表没有多大改变。居民穿得稍好了一点。许多公共建筑都呈现出同样的破烂景象。

1968 年农业前景是暗淡的。北高加索地区出现干旱。虽然要作出任何明确的结论还为时过早，新垦区的收成看来是希望渺茫的。上半年的经济报告也表明，工业发展的速度有所减缓。

我还发现莫斯科在外交方面是奄无生气的。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从来不在公开场合露面。外国外交官员很少有机会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讨论问题。一句话，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领导人至少在非正式的社会活动中露面的做法被一笔勾销了。

莫斯科缺少的是希望。在苏联短短的历史中有过一段时期，希望曾经是非常显著的。这就是革命刚结束后的一段时期。1934 年我到莫斯科协助建立美国使馆时，那里充满着强烈的乐观精神。人们相信，国内战争和集体化造成的贫困已经被克服了，他们能够期待日益增长的繁荣和更大的自由了。大清洗使这种希望烟消云散。接着爆发了战争，战争初期遭到失利。战争快结束时，红军势如破竹地直趋德国，人们对未来又产生了新的信心。但是，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工业和经济而采取的严厉措施，无疑地使这种希望成为泡影。斯大林死后，特别是 1956 年初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以后，在莫斯科苏联社会的一些比较先进的人们中又产生了十分明显的乐观主义。

529

然而，到1968年，由于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生活的加紧控制，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普遍消沉，经济进展缓慢，于是莫斯科呈现出一片死气沉沉的景象。同样明显的是，共产党象死神一样控制着苏联的全部生活，人民对这个制度是憎恨的。他们并不希望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所要求的只是放松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生活的控制。

我写了一份关于访苏情况的报告，这是我关于苏联问题的最后一个正式报告，其中谈到了我对希望的估计。我的结论是：

> 我当然不是在预言苏联将会垮台。已经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的势力十分巨大，在这一时期很难出现任何这类事情，但是我觉得，长远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当现在的青年一代成长起来以后。这种变化对于俄国、甚至对于全世界的前途，将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至于这些变化是通过进化还是革命来实现，只有未来才能决定。

在整个旅行期间，我所关心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危机。苏联军队密集在捷克边境上。我得到命令，如果在我们抵达莫斯科之前苏军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就取消这次飞行。捷克斯洛伐克的骚乱是1967年开始的，当时学生在布拉格大学举行示威。发生骚乱的基本原因是经济崩溃和当权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不断采取镇压措施。抗议的怒潮扩展开来，到1968年春达到了危险点。捷克共产党的头头们认识到了这种危险，采取了行动，任命党的忠实卫士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为这个政权的新首脑。杜布切克试图监督改革运动，但他并没有打算使捷克斯洛伐克摆脱苏联阵营或严重破坏共产党的

领导权。杜布切克仅仅赞成某些经济改革，放松一些压制手段。象常有的情况那样，自由的力量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到了5月，大部分新闻检查被取消了。很快提出了实行真正多党制的要求。没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能够容忍这样的自由。克里姆林宫得出结论，杜布切克正在失去控制。华沙条约国的军队被调到捷克边境。在国务院，一个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特别情报小组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注视着形势。

在这期间，我对国务卿腊斯克说，十有六成苏联会带头入侵。腊斯克把这个看法告诉了约翰逊总统，总统又转告了专栏作家乔·艾尔索普。艾尔索普对我大为生气，因为我没有让他知道这个"秘密"。我解释说，这种推测不是秘密，不过是一种判断，更多地属于盖然性而不属于可能性的范围。一个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是，莫斯科究竟把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看成一种可以允许的改革呢，还是看成一场反革命呢？ 530

7月底，苏联和捷克领导人在捷克边境小镇切尔纳会谈。下面这个事实可以表明这次会谈的重要性：实际上所有苏联政治局委员都从莫斯科来到这里参加会谈。他们住在俄国境内的一列火车上。会谈后发表的公报表明彼此达成了一个勉强的妥协。双方同意在各自的报刊上限制论战，杜布切克承认共产党在捷克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切尔纳会谈以后，华沙条约国召开了一次会议（罗马尼亚未参加），在这次会议上，两个忧心忡忡的卫星国的小暴君——哥穆尔卡和乌布利希——非常热中于在捷克实行休战。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这次会议重申了捷克对华沙条约的忠诚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这种休战究竟能持续多久，在国务院内显然有各种不同的看法。8月13日我在给腊斯克的备忘录中说，看来俄国人到切尔纳去是基于对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一种错误想法。这部分地是由于苏联人有一种典型的错误信念，相信（他们必须相信）群众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我推测苏联领导人可能毫不犹豫地认为，只要苏联大军压境，加上捷克斯洛伐克内部的一支小小的分遣队，捷克主席团就会在切尔纳会议上分化，有很大一部分人倒向苏联（在苏联人眼中这些人反映着广大工人群众的意志）。会谈的第一天就很棘手，杜布切克得到主席团全体成员的一致支持，之后，苏联领导人不得不改变他们的策略。显然，他们并未真想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全力以赴的军事进攻。由于没有亲苏的集团出现，他们只好退却。

尽管没有采取任何紧急行动的迹象，苏联军队却仍然停留在捷克边境一带。莫斯科宣布进行新的军事演习。同时，有一些迹象表明，停止论战的协定可能正在失去作用。我对腊斯克说，也许正是这一点——新闻控制——将成为杜布切克最不好解决的问题。

我的结论低估了苏联加紧策划使用军事力量的可能性。

531 现在相当明显的是，苏联将通过陈兵于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继续对这个国家施加压力。我预料，苏联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内部进行大量活动，力图扶植某种亲苏集团。这一过程无疑将继续到9月9日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可能还要持续到大会之后。

总之，捷克的局势虽然不算危急，但将继续保持其固有的严重性，这决不是苏联人感到满意的。但是，我不相信在这个月剩下的日子里将出现任何惊人的发展。

处理完这个问题之后，我就到罗得岛休假去了。我眞不应该走。仅仅一周以后，8月20日，俄国人在其卫星国的支持下，终于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白宫派了一架空军的专机，把我以及也在新英格兰的副国务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助理国务卿威廉·B·梅康伯匆匆地接回华盛顿。

回到华盛顿，我得知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向总统面交了一份照会，声称苏军应捷克政府的"请求"已经出动。不仅当递送这份照会时捷克斯洛伐克沒有政府（杜布切克已经被捕），就是在至少十天以后也沒有政府。显然，苏联驻布拉格大使向捷克总统卢德维克·斯沃博达（他在二次大战时曾同苏联红军一起战斗）送交了一份组织未来政府的名单。斯沃博达愤怒地拒绝了，并且禁止捷克的新闻通讯社公布这个名单。但是，莫斯科以为这个要求会被接受，给多勃雷宁规定了照会中的措词。多勃雷宁本人显然事前不知道这次入侵。两个晚上以前，他参加了在"可爱的菲茨"游艇上举行的宴会(海军部长经常乘这艘游艇出游)，丝毫沒有表现出即将进行军事干涉的迹象。当然，他可能隐瞒了这个消息，但是更可能的是，克里姆林宫那时还沒有告诉他。

另一个证据表明，入侵的决定仅仅是在部队奉命出动的前一天作出的。在入侵的前两天，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给白宫送来一份照会，同意跟约翰逊总统会晤，以开始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还同意邀请约翰逊总统访问苏联。柯西金如果明知总统将会因抗议入侵而取消这些行动，怎么还会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和邀请约翰逊访问俄国呢。看来情况很可能不是这么回事。 532

我相信苏联人是并不乐意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他们知道，他们的声誉将因此遭受损害，全世界的共产党将陷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至少有四种因素的配合促使苏联作出这一决定。第一个因素是意识形态的。苏联人相信，就要在杜布切克的主持下消灭捷克斯洛伐克的苏维埃制度。第二个因素是，苏联西部边界的卫星缓冲国地带将因此削弱。第三个因素是，乌布利希担心，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化运动获得成功，那就会严重破坏东德共产党政权的稳定。既然苏联一贯重视苏维埃化的东德，布尔什维克对此当然不能掉以轻心。第四个原因是，苏联害怕自由的传染病会从乌克兰的手臂发展到苏联自身的心脏。

对于这次入侵，美国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时期的经验中知道，如果美国表示它将采取某种行动以击退入侵者，那将是一个错误。这将被认为是虚声恫吓。我们同样相信，如果美国采取任何公开的行动，那就会增加杜布切克的困难。因此，约翰逊总统反应的调子是低的。他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苏联提出的入侵理由是"明显的捏造"，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违反"。他提议召开安全理事会，并要求俄国人撤出军队。接着他取消了同柯西金就限制战略武器举行会谈的预定计划和访苏计划。

在整个捷克危机时期，美国都遵循着这一低调政策。我们没有提出警告照会。我们不希望美国在处理这一形势时显得软弱无力，也不希望有任何行动被别人当成把柄，证明美国在煽动捷克的改革运动。捷克人知道，华盛顿的公开支持将使他们受到损害，因此私下向我们表示，他们赞成我们的沉默

政策。

我们的沉默并没有妨碍《真理报》对我们大肆攻击。7月 533 19日，它报道说，苏联掌握了美国旨在破坏和推翻东欧、特别是布拉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秘密"行动计划"副本。《真理报》还报道说，在西德边境附近发现了贮藏美国武器的"秘密仓库"。《真理报》文章发表后，国务卿腊斯克在我陪同下召见了多勃雷宁，告诉他说，苏联政府不要对美国的态度抱幻想。美国人仍然信仰独立宣言所表达的原则，人民有权自行决定他们将在什么制度下生活。腊斯克说，但是，《真理报》提出的所谓美国卷入了捷克的反革命运动这一指责是虚妄的，而多勃雷宁也知道这是虚妄的。象往常一样，多勃雷宁有礼貌地听着，没有进行解释。

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无疑地使戴高乐将军感到震惊，尽管他没有承认这一点。他的直接反应是求助于他的一个标准公式，指责雅尔塔会议把东欧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作为回答，国务院由我帮助起草，发表了一个声明，指出在雅尔塔会议上没有任何协定是那怕间接地涉及东欧的势力范围的。完全是由于红军占领了东欧国家，布尔什维克才有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当时艾夫里尔·哈里曼正在巴黎，他发表声明，坚决拒绝戴高乐的指责。尽管戴高乐的反应是陈腐的，但这次入侵却促使他修改自己的某些估计，并可能使他重新考虑自己的对外政策。俄国并没有象他设想的那样迅速恢复一个大国的风度，它是按意识形态办事的。1969年戴高乐同英国大使索姆斯的谈话，是戴高乐有所转变的一个表现。在这次谈话中，他预示了西欧国家，也许包括英国在内，结成

一个比较松散的和更加扩大的集团的可能性。虽然英国沒有很好利用这个机会，但这一事实幷不损害这个意见本身的重要性。另一个线索是1969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法国时受到的热烈欢迎。戴高乐的转变能有多大，这一点不得而知，因为1969年4月在他改组法国政府结构的计划失败后，他就辞职了。他死于1970年，再也沒有重新执政。

由于美国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沒有作出有效的反534应，许多美国人也感到苦恼。一些重要报纸发表社论，说华盛顿和莫斯科在划分势力范围问题上一定至少有某种默契。9月6日，我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帮助国务卿腊斯克去回答这种批评。备忘录的结论是，毫无疑问，无论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以后，美国从未参与、而且事实上还反对任何划分势力范围的安排。

我承认苏联事实上为它自己在东欧攫得了明确的势力范围，但是我强调指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把苏联化的制度强加给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东德的结果。我的备忘录继续写道：

> 无论我们对于苏联的控制东欧和华沙条约的存在感到多么遗憾，但是，由于常识的缘故，由于美国不希望卷入同苏联的核战争，美国并沒有不顾苏联统治的现实，这种态度是合理的。因此，我们认识到，美国很难通过威胁或使用军事力量来保护这些国家中的一个（我们沒有对这些国家承担义务），否则就会自动地同苏联发生冲突。然而，既然美国沒有同苏联达成任何谅解或默契，把这一地区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那么，美国就尽可以采取外交上的或我们希望采取的其他行动。

俄国人采用典型的布尔什维克的残酷手段来处置杜布切克和他的同事。他们遭到逮捕、虐待，被戴上手铐押往苏联。斯沃博达坚决主张，如果要进行任何讨论，就得释放他们。俄国人勉强同意了。在华盛顿，我们伤心地注视着捷克人称之为赋予苏维埃结构一点人性的尝试受到摧毁。我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爱莫能助，这是每个人都不愉快的。国务院不断进行探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谁也提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主张。

我本来以为西方同莫斯科的关系会冻结得更久一些，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在入侵事件发生之后没有几个月，西欧国家就重新走上缓和的道路。美国稍为缓慢一些，但也不太晚。西方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使用武力的现状，这同1956年匈牙利革命遭到镇压时表现出来的猛烈的示威，适成鲜明的对照。原因之一是，在布达佩斯，许多人在街上遭到屠杀，那里爆发的是一场武装起义。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实际上没有开火，被杀害的人屈指可数。此外，公众对于苏联的行为已经有点司空见惯，无动于衷了。 535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后不久，苏共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发表了被报纸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理论。正如本书前面谈到过的，这个理论仅仅是重申了布尔什维主义一开始就有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苏联有责任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去保存和保卫任何地方建立起来的苏维埃结构。这个原则无疑地适用于全部东欧卫星国家。1968年秋，我试图向葛罗米柯探问明白，勃列日涅夫主义是否适用于南斯拉夫和古巴。他回避了这个问题。对于勃列日涅夫主义的限度，我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澄清。

我早已决定，到 1969 年 1 月新政府就职后，不管谁当选，我都得结束自己在外事部门的生涯。在外事部门服务四十年已经够长了，应该给年轻一些的人让路。而且，对一个大使来说，也有一个常人所不可避免的日益强烈的爱好，希望讲述他本人而不是他的职务所受到的尊敬和礼遇。此外，到了六十五岁，我觉得我还有足够的精力给自己弄点钱。外事工作虽然使人感到振奋并有优厚的报酬，但是却很难提供充裕的财源来过一个舒适的晚年。由于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我决定向新上任的政府提出辞职。我终生的好友和我在苏联事务方面的同事汤普森大使，也完全不受外力影响地作出了同样的结论。

我不是以显赫的成就、更不是以呜咽啜泣来结束自己的外交生涯的。当迪安·腊斯克提出辞职后，我作为国务院中级别最高的事务官员，被指定代理国务卿职务，直到新国务卿威廉·罗杰斯的任命得到批准并宣誓就职为止。两天的时间比预料的要长一些，因为国会在批准沃尔特·希克尔担任内政部长职务上面拖延了时间，直到 1 月 22 日内阁才宣誓就职。于是我去拜访罗杰斯，向他祝贺，最后离开了国务院，回到C街，开始了自己的退休生活。

结 束 语

一个头脑清醒的外交家，即使他同苏联打交道已将近四十年，也不会企图多少有点把握地预言美苏关系的未来状况。这种关系是太曲折了，太捉摸不定了，这是由于经常发生一些完全意料不到的事件的缘故。这种状况使得以往在这方面最有知识的专家的预言落了空。尽管如此，我想，对于未来作一个粗略的估计还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我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今后几十年间美苏关系将是困难的。造成这种状况，双方都有过错——如果可以用这个字眼的话——但主要是苏联的过错。

斯大林死后将近二十年来，苏联的政治哲学实际上仍然没有改变。在理论问题上，可能有点小的变化，特别是关于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事实上，今天莫斯科的意识形态问题象我 1934 年初次踏上俄国国土时一样重要。所以今天用"布尔什维克"这个词来形容苏联统治者同三十年代一样是确切的。这也是我在本书通篇上下都使用"布尔什维克"这个名称的缘故。

对于美国来说，苏联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是至关紧要的。这意味着同莫斯科不可能建立通常所谓的和谐关系。早期的布尔什维克认为，而今天的布尔什维克仍然坚持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被一些准备摧毁它的资本主义国

家所包围的。在列宁时代，这种信条还多少有点根据。而今天，把苏联这样一个拥有卫星国缓冲地带的强大国家设想为被敌人包围的、受到围攻的国家，是荒唐可笑的。尽管如此，这个教条仍然是苏联政治思想的特征。而且，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仍然把每一个非共产党国家的政府看成是实现苏维埃体制道路上的过渡状态。因此，同这些国家达成的所有解决办法都是暂时的，当世界力量对比变得对苏联更有利时，就得加以改变。

苏联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不取决于个人的、制度性的、官方的和历史性的产物。它并不使俄国人对美国人产生私仇。但是，它拒绝遵守任何客观的道德标准。谎言是完全被容许的，如果它们能够推进苏联的事业。（这并非说美国天生比苏联更注重道德。但是，在我们进行活动的这个社会中，善恶是有区别的；共产党人则不是这样。）在布尔什维克的心目中，使用暴力是根本不应当手软发抖的。的确，用红军来推进苏维埃制度或阻止自由化，被认为是一种职责——只有当战争的风险危及俄国的苏维埃制度本身时不在此例。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武力是错误的。

苏联的意识形态也意味着，不管苏联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怎样，只要对苏联没有风险，克里姆林宫都会力图支持和控制外国的共产党。尽管莫斯科的控制放松了，但是，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政权如果谋求任何真正的独立，通常都会遭到武力的镇压，象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所证明了的那样。

南斯拉夫是这种规律的一个例外。铁托的异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教条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教导说，国

家界限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工人阶级是不承认这种界限的。而铁托则证明，在许多世纪的共同经历、共同文化和共同历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是不容低估的。

中国同俄国的争端是同一原则的表现。斯大林主要关心的是维护俄国的苏维埃制度。他并不希望看到毛泽东的胜利。援助中国的负担对于苏联来说是太沉重了，苏联当时正在为医治战争创伤而斗争。他也预见到毛泽东有叛离苏联观点的可能性。无论如何，有案可稽的是，他在1945年说过，他看不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有成功的希望，因此敦促“中国同志”尽可能同蒋介石搞好关系。从苏联利益的观点出发，斯大林宁愿中国是一个软弱和支离破碎的国家，让共产党在这个国家中充分发挥作用，缓和或阻止中国政府可能采取的任何反苏行动。 539

当毛泽东打败了蒋介石以后，苏联如果想要保持它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就必须援助这个新的共产党政权。没有多久，两国的关系就冷淡下来，最后这两个共产党巨人开始争吵。这里牵涉到民族主义因素，但争端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中国人指责苏联领导人是修正主义，因为莫斯科主要只关心保护苏联的利益。尽管争端是实在的，但如果美国指望莫斯科和北京会长久分裂下去，那将是荒诞无稽的。只要这两个国家中无论哪一个同美国发生纠纷，我相信另一个国家就会站在它的共产党姊妹国家一边。

毫无疑问，许多有思想的俄国人把意识形态看成一种极不合理的扼杀生机的力量。然而统治者却决定，意识形态是不能改变的，他们把它看作永恒不变的真理，通过报刊、无线

电和电视，送到公众面前。其结果是，大部分俄国人似乎都把布尔什维克对国际事件的分析当作天经地义，深信不疑。

当苏联变得更加强大的时候，意识形态问题在统治者的眼中可能会变得不那么重要。但它仍将保留下来，因为它是共产党和苏维埃制度赖以维护其至高无上的统治权的根本。

正如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一样，苏联的政治结构实际上也没有发生变化。集体统治代替个人统治，对事情没有多大改变。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圈子中，有一些离经叛道的征兆，但是这对政权没有什么威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比赫鲁晓夫时期更加保守的克里姆林宫，将会在什么时候改变它的政策。也没有迹象表明，苏联在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会变得较为合理一些。在国内，党的官僚机构如此庞大，党员人数达数千万之多，很难设想它会同意朝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大概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苏联的结构会发生某些变化，但这不会是通过演变的方式实现的。有某种迹象——但很小——似乎表明，具有夺取政权的潜在能力的苏联军方将会给党的领导人施加压力。应该记住，苏联的军事领导人本身都是党员，但是在布尔什维克的最高委员会中不占席位。朱可夫是唯一进入政治局的元帅，但是仅仅在1957年的一个短暂时间内。我不打算预言军方可能采取行动的前景。因为这种可能性的确太暗淡了。

540

美国在对待苏联关系上的一个大问题是，美国舆论经常发生大幅度的摇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勇敢的俄国人总是正确的，批评是不能容忍的。当战争结束，苏维埃制度的帝国主义本性重新显露出来以后，舆论转变为强烈反对莫斯科。

入侵朝鲜以后，反共主义发生了一个可悲的错误的转变。在世界各地反对共产主义扩张变成了美国的政策。在国内，整整十年期间，反共主义成了破坏公民自由思想的十字军。接着，随着共产党中国变得日益强大，美国人开始对苏联抱有比较宽容的看法。到七十年代，对苏联政策的批判性评论降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

不幸的是，对于我们面临着的同苏联接连不断的意志力的斗争和永无休止的外交危机，美国并无准备。美国是分裂的。对政府的信任在 1968 年降低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有些有思想的人提出疑问，约翰逊总统是否已经丧失了领导能力。特别是青年人对政府说的话很少相信。这种不信任是对外政策中通称为越南战争这一灾难性的冒险行径的必然结果。不管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作了多大努力，人们对公职人员的信任没有得到恢复。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要问，美国现在是否有能力领导自由世界。领导是势必要有的。我们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是具有领导能力的唯一西方国家。疑问在于，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否具有克敌制胜的纪律和坚韧精神。在国外需要和国内需要之间哪一方占优先地位的矛盾可能无法解决。你不得不拿出东西去。我担心美国可能被迫奉行一种新的孤立主义，把注意力集中在公认的国内迫切问题上。

有人说，不管现在的发展怎样，从长远看，前景是美好的，美国社会和苏联社会将“殊途同归”，就是说，每个国家由于面临同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最终将采取类似的解决办法。也许，美国会更多地采用苏联的计划技术，而苏联也可能变得民主一些。殊途同归的理论是由许多著名学者提出来的，但我

541 担心这是典型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同苏联的关系上，西方周期性地迷恋于这种想法。从理论上说，殊途同归有一定道理，因为，当人类的组织面临类似的问题时，都倾向于得出类似的结论。但是，苏联和美国的殊途同归即使果真到来，也是需要许多世代才能实现的事情，假如不是需要许多世纪的话。美国社会同苏联社会的基本成分差别太大，它们的文化和历史传统相距十万八千里，很难期待这两个国家会变得相似起来。

我虽然看不出在苏联的以贯彻其意识形态为己任同美国坚持其保护盟国独立的决心之间能够架设一座桥梁，但并不因此就可以说两个超级大国已经走上自动冲撞的道路。双方政府都深信一场核战争是不可思议的。谁也不愿开始走上一条导致互相自杀的道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惯例，他们是不会忽视军事行动的。克里姆林宫清楚地表明，为了维护苏联在卫星国的霸权，必要时它是不惜使用武力的。但是，使用武力的巨大阻碍之一是其后果将危及苏维埃制度在俄国的统治。如果莫斯科在一场战争中败北，整个纸房子就会倒塌。由于这个原因，战争是必须避免的。因此，我认为，苏联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意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局势可能沿着强权方针的边缘发展，它将一步一步地导致一场双方都无法退让的对抗。中东就是这样一个地区。由于双方政府都认识到这种可能性，这就提供了保证，担保我们不会卷入大灾难的漩涡。

担心爆发战争是克里姆林宫认真考虑裁军的另一个原因。但是，对于苏美 1972 年达成的限制导弹和反导弹力量的

五年协定，我并不过分乐观。在这个协定中，可以作出各种各样解释的条款太多了，而且，象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克里姆林宫总是利用不严密的条文，回避条约的精神实质的。

同苏联进行任何谈判，都不能抱幻想。我们应该经常注意发现两国利益相一致的领域。即使在利益不一致的地方，通过巧妙的外交，有时也能够作出对双方都有利的妥善安排。文化交流就属于这个范畴。克里姆林宫特别希望搞科学技术交流，而我们对艺术家的访问更感兴趣。可以达成协议，两个国家既派出科学家，也派出艺术家。

除了力求达成这样一些协定之外，我看不出美国还能做点别的什么。美国只能继续沿着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般遵循的政策路线前进。这主要是使我们的防务保持充分强大的威力，以杜绝苏联由于受到诱惑而对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的任何可能性。我想，只要苏联仍然以目前的形式进行活动，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安宁的世界。唯一的希望，也是相当微薄的希望是，到了某个时候，苏联将开始象一个国家而不是作为一种主义进行活动。